



葛兰西文选

(1916—1935)

葛兰西文选

(1916—193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

人民出版社

033521

封面设计：王师颀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毛韵泽、
宋洪训、陈 玮、李贻良、夏道源、
纪 涛、李吟波

葛 兰 西 文 选
GELANXI WENXUAN
(1916—1935)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875印张 510,000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ISBN 7-01-001110-9/D·369 定价 10.35元

编者序

一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意共创始人之一,曾任意共第二任总书记(1925—1926)。他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意大利实际,他的革命理论一直是意共制定策略的基础,陶里亚蒂在意共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葛兰西教导我们:“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行动不能局限于经济要求,而必须正视意大利国家在历史上的形成所造成的一切问题,必须扩展到政治、思想和文化等上层建筑的领域里去,在这些领域里,新与旧的矛盾以及旧统治阶级的领导权必须通过彻底的批判和斗争予以破坏和摧毁。要是没有葛兰西的指导,我们的道路就要艰难、曲折得多,我们的进展也要缓慢得多。”^①

70年代初,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重新抬头,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样,葛兰西的关于革命改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引起西欧的左派力量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他们认为,葛兰西的政治理论截然不同于他同时代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他是个上层建筑的理论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经济决定论和极权主义作了决裂,强调了人类意志和思想的重要作用。他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把马克

^① 参看《陶里亚蒂言论集》,第3卷第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

思主义的分析从对经济和自然科学的领域，转向哲学、知识分子、人民群众的心理以及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文化机构。他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描写成历史必然的产物，而是把它当作人类必须通过创造性活动才能赢得的一枚不轻松的金牌。

80年代后期，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风云骤变，形势出现逆转，于是再一次掀起各国学者对葛兰西理论的研究“热”。

二

葛兰西 1891年1月22日诞生于撒丁岛阿莱斯村一个小公务员的家庭。1905年，他读完桑图卢苏朱和卡利亚里的中学，1911年考上了都灵大学奖学金，开始接受大学教育。尽管菲薄的奖学金和不固定工作的收入只能维持清苦的生活，但他在文学系中是语言和语言学方面成绩优异的学生。

在都灵这个工业大城市中，葛兰西有很多机会参与或接触到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运动。1914年，他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第二年他放弃了大学学业，开始为都灵社会党《人民呼声》周刊撰稿，后来成了该周刊的编辑。1917年8月，都灵工人举行的为时5天的武装起义失败之后，社会党都灵支部的大多数领导人被捕，他被选入社会党临时委员会。12月24日，为了庆祝俄国革命，他为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写了《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当时列宁的著作还没有意文版译本，葛兰西是依靠自己的观察和判断来评价俄国革命的。

1919年5月，葛兰西同他的同学陶里亚蒂、塔斯卡、特拉契尼共同创办《新秩序》周刊；6月，该刊发表了他同陶里亚蒂共同执笔的《工人民主》一文，提出应当把工厂的“内部委员会”改造成“无产阶级权力机关”——都灵“工厂委员会”。此后，《新秩序》周刊成了都灵工厂委员会的机关报，也是社会党内第三国际支持者的喉舌。

葛兰西参加起草的《都灵社会党支部的行动纲领》在该刊发表后，得到列宁的支持和表扬。

1921年1月，意大利社会党召开里窝那代表大会，会上党发生分裂，左翼反对派自行成立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当选为中央委员。可是，把革命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厂委员会的直接行动上的“新秩序”派在党内没有产生主要的影响，而起主要影响的则是总书记博尔迪加所强调的纪律、集中制和原则的纯洁性。葛兰西认为，博尔迪加把共产党作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力量，这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它应当同反法西斯的群众结成广泛的联盟。他继续主张“工农委员会”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表达方式；共产党只有在同那些独立的无产阶级机构并行的道路上才能得到发展。这时，葛兰西仍留在都灵担任《新秩序》的编辑，周刊改为日报。

1922年5月，葛兰西作为意共代表被派往莫斯科。在逗留的一年里，他会见了那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由于健康原因他还在莫斯科近郊“银色的森林”疗养院呆了几个月，在那里结识了未来的妻子朱丽娅·舒赫特。11月5日，葛兰西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心思想是革命的政党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退却。葛兰西在莫斯科深入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和俄国革命，并受到列宁思想的熏陶，他开始认识到列宁提出的“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性。1923年11月，他被共产国际派往维也纳去担任国际新建的一个反法西斯活动机构的领导工作。他观察到国内形势越来越紧张，意大利法西斯的镇压越来越残酷；无产阶级革命看来非常遥远，这时他关心的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重建民主秩序、北方工人阶级最低层同南方农民群众建立联盟的问题。1924年2月，他在这里创办了新的意大利共产党报纸《团结报》，宣传他的关

于上述问题的观点。同时，他同原来的“新秩序”派的老战友，如陶里亚蒂、斯科奇马罗等人，讨论建立一个没有博尔迪加参加的新多数派中心的问题。他认为党应当同非党群众，也就是同广大居民建立联系。3月，他重新出版了面向非党人士的刊物《新秩序》双周刊，再次提出建立工厂内部委员会的建议，这是因为意大利最大工会组织劳工总同盟的改良主义领导人越来越同法西斯主义采取调和态度。此外，他认为办这个刊物在党为争取实行一个新战略的政治运动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924年4月，葛兰西当选为威尼托议员，这样有了豁免权就能回国。5月1日，他离开维也纳回到意大利。他在议会的第一次讲演，驳斥了墨索里尼在议会提出的取缔“秘密社团”法，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残暴和反对工人阶级的行径。同时，在他的建议下，意共还建立了“国外中央”，以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1924年6月，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特奥提在向议会发表一篇指责法西斯的反民主政策的讲演以后，被一伙法西斯党徒暗杀。于是议会中各反对党离开议会在亚文丁山召集会议，要求国王罢免墨索里尼，并严惩凶手。葛兰西出席了反对派的会议，提出要依靠全国的力量举行一次总的政治罢工。他认为只有动员群众才可能使法西斯专政垮台。但是其他反法西斯党派坚持用温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11月，意共议员退出亚文丁，重新回到议会。1925年1月，法西斯终于进行反击，掀起了新的镇压浪潮，把这场为时半年的政治危机平息下去了。

1926年1月，意共在法国里昂秘密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标志着意共战略明显转变的一次代表大会。葛兰西的路线是：实现共产国际提出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组织北方工人和南方农民，使这两个阶级建立起革命联盟、统一战线作为揭露改良主义的手段。他的路线获得90%的选票，并当选为意共第二任总书记。

1926年11月初，墨索里尼借口有人企图暗杀他，通过一项“非常法”，把所有反法西斯党团都视为非法而一概取缔，就此把意大利最后一点点自由都取消了。11月8日，葛兰西被捕，当时他年仅35岁。1928年5月，墨索里尼的特别法庭判处他20年4个月零5天的监禁。在狱中8个月以后，他就开始写著名的《狱中札记》，这似乎是对检察官的宣判词：“我们必须使这个脑袋停止工作20年！”的极大讽刺。1937年4月27日，他在提前刑满释放后3天在罗马“圭西萨纳”医院与世长辞，终年46岁。10年囚徒生活中留下的《狱中札记》（共2848页，约100万字）在法西斯监狱官的眼皮底下被巧妙地偷运出来，通过苏联大使馆外交邮包寄给在苏联的意共领导人。直到10年之后即1947年，埃伊诺迪出版社终于使该书问世。

三

这本《葛兰西文选》的文章选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两卷本，昆丁·霍尔编译，1977年和1978年英文版）、《狱中札记》（昆丁·霍尔编译，1978年英文版）、《狱中书信》（林恩·劳纳编译，1975年英文版）、《葛兰西文选》（三卷本，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7—1959年俄文版）。

《文选》译文根据葛兰西思想的发展阶段和他的文章著作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他的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1911—1918），即从进都灵大学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选译了4篇文章。其中《社会主义和文化》是他早期提倡文化重要性的作品。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一）他认为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和意大利哲学家贾·维科真正触及到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范围和原则，前者主张“文化的至高无上的问题是赢得一个人先验的自我，同时又是他本人的自我”；后者主张，了解自己产生的自我会对平等和政治权利提出要求。人性平等的意识是古代的民主共

和国产生的基础和历史原因。(二)文化并非是百科全书的知识,而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人们借助于文化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三)文化不是通过自发演变产生的,而是逐渐通过历史作为“明智判断的结果”。开始是少数人,后来是整个一个阶级都有这样的明智的判断。

葛兰西的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1919—1920),即从创办《新秩序》到领导“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为止,我们选译了23篇论文,主题围绕着“工厂委员会”的理论问题,如《工人民主》一文中,他向工人阶级提出了三点精辟的建议:(一)利用现在的组织“内部委员会”发展成一个既能实现当前真正的工人民主,又能适应将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组织就是工厂委员会;(二)这个组织同资产阶级国家相抗衡,“并立即准备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履行与掌握同管理国民财富有关的一切主要职能”;(三)工厂企业和它的“内部委员会、社会党的基层支部、农民公社是劳动者必须在其中进行活动的生活中心”,“企业的全部权力归工厂委员会”。关于《工团主义和委员会》这篇文章的产生,是由于工厂委员会运动在发展过程中,该组织同社会党和工会的职能发生了矛盾,后者的一些领导人指责葛兰西为工团主义者,葛兰西为此作出公开答复。他在文中指出:(一)工会官员存在着“官僚主义”,使他们对全国范围内工人运动的危机有目无睹;而且工会无力帮助工人培养革命意志,工会领导人从来不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二)工会只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活形式之一,而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的潜在形式,因此它无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三)依靠劳动群众的威力,根据劳动地点和生产原则组织起来的工厂委员会体制的观念是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事这项运动的人不是工团主义者,而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为了社会党的新生》一文，是由葛兰西执笔作为社会党都灵支部和省联合会代表们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一份报告，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意大利的阶级斗争将出现两种局面：或者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者是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反动派十分猖獗；（二）社会党的领导机构根本不懂得当前发展的革命形势，也不懂得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应起的作用。社会党只是扮演着事件的普通旁观者的角色，没有对工人做组织、教育和领导工作，以使他们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三）领导机构既不了解情况又无所作为，原因是党的领导人不深入到工人阶级斗争的现实中去。因此，社会党成了“官僚主义”组织的一部分。这份报告还警告说，由于社会党不知道群众的需要和抱负，群众就会抛弃社会党；要避免这一命运，只有把社会党改变成一个“同质的有内聚力”的政党，也就是一个“具有自己学说、策略和严格纪律”的共产党。

葛兰西的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1921—1926），即从意大利共产党的成立到他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逮捕入狱为止，我们选译了8篇论文和两个文件。关于论述法西斯的有《意大利危机》、《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关于论述南方问题的有《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关于把意共改造成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有《意大利的形势和意共的任务（里昂提纲）》。《里昂提纲》中提出了当时党的三大基本任务：（一）为了革命，把工农业无产阶级组织和统一起来；（二）把取得革命胜利和建立工人国家所必需的一切力量在无产阶级周围组织和动员起来；（三）把举行起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问题摆在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面前，并通过一系列局部斗争，从政治上和物质上指导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此外，反映党内葛兰西同以博尔迪加为首的极左派之间在一些主要观点上的论战有《由中央委员会提名最后审定里昂代表大会文件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这里，葛兰西提出，意共领导同

极左派的意见分歧有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问题同党及其领导机构的性质问题有关。葛兰西认为，在给党下定义时，必须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党在事实上不仅通过意识形态，也通过一种“物质”的结合同工人阶级联合在一起，而这是同党对工人阶级必须承担的义务有密切关系的。而极左派则把党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机构”，这样，极左派把工人和来自其他社会阶级的分子相提并论，它不关心维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极左派认为，知识分子是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最先进的分子，因而注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党也就成了工人阶级的一个“机构”。第二个根本问题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单枪匹马来夺取政权，它需要有同盟军，党必须遵循这种政策，才能使它在具有反资本主义利益的其他阶级中居于领导地位，并且在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中对它们进行指导。此外，工农联盟问题同工人阶级组织及其政党的问题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作用。总之，党的策略旨在赢得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产生决定性影响，以便在实际上引导工人阶级走向革命。而博尔迪加则认为，党不应当在任何时刻都提出赢得大多数的问题，而是在长时期中应当只限于对总的政治原则作宣传活动。

葛兰西的思想发展的第四阶段(1927—1937)，即从葛兰西被捕入狱到他逝世为止，这是他从年轻的鼓动家、政治家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时期，我们选译了《狱中札记》中的《现代君主》、《国家和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问题》三部分；《狱中书信》16封。葛兰西在《现代君主》的札记中把马基雅维利称为“最早的雅谷宾”。他说，“现代君主”(即共产党)必须是一支同农民结成联盟和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雅谷宾”力量。可是，在意大利的历史中始终没有出现过有效的雅谷宾力量。在城市无产阶级兴起和具有一定历史政治文化条件下，这个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只有使大批农民自发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才有可能。他认为，党要

成为市民社会的新机体，即党是社会的一部分，它要比其他部分更“自觉”，并且是市民社会中的主要部分，才能起到“现代君主”的作用。

在《国家和市民社会》这部分札记中，葛兰西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性质、适用于西方的革命战略等。他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看作是消极革命的一种形式。所谓消极革命是指在发生有机危机时，不依靠人民的积极参加，而只是通过国家机关的作用，从上面对国家的经济结构作相当广泛的改革。历史上法国的大革命和意大利复兴时期的统一运动就是明显的对比。前者雅各宾党人通过支持农民的要求同农民结成联盟，动员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后者加富尔及其温和党很少依靠人民大众进行斗争，他们的主要手段是皮埃蒙特公国及其军队、它的君主政体及其官僚机构，才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由消极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只能得到一部分领导权，意大利后来的历史标志着它是一种妥协的体制，这种体制很不稳定，也缺乏人民大众的支持。因此，复兴运动时期奠定的意大利自由民主国家的衰落，是使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得以兴起的原因之一。

关于适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战略，葛兰西是分析市民社会而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那里的市民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原因是经济的迅速发展、高度集中，社会化机构越来越多，群众的思想受到资产阶级的蒙蔽、歪曲宣传，已逐渐结合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了；此外，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工人贵族，建立起了工会官僚制度以及社会民主集团，这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的意识形态高度的制度化和国际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这种环境下，对国家进行正面攻击的“运动战”已经不适用了，否则暂时取胜的革命力量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大量敌对民众，他们仍然被束缚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樊篱中。只有采取“阵地

战”，即在文化战线上不断地渗透，颠覆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庞杂机构，攻克一个接一个的所有市民社会的机构（例如新闻出版机构、学校、工会、教会等），才能夺取政权。总之，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建立一个“相反的领导权”，是革命成功的前提；但这不是简单地由一个领导权取代另一个领导权，而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原则把一个受资产阶级思想蒙蔽的情况改变成揭露剥削制度的领导权原则。照葛兰西的说法，“阵地战”在政治上就是两种领导权原则之间的斗争。“阵地战”不是被动的防御战，而是长期艰苦的文化斗争，需要发扬首创精神，一旦“阵地战”取胜，政权就成定局。

《马克思主义问题》这部分札记主要是研究哲学问题，其中有批判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一书的《关于建立通俗社会学的一种尝试的批判札记》。葛兰西评论说，这本书的标题与书的内容不符，总标题“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副标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的联系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加以说明和证实。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社会学，是恩格斯已经批判过的错误观点。《通俗读本》的出发点是假定，而不是以批判地分析常识哲学为出发点。在常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唯物主义的成分，都是天然感觉的直接产物。这同宗教成分一点也不矛盾，不过后者是“迷信的”，非批判性的。《通俗读本》不是采取科学的批判，而往往是加强这些非批判性的成分，这是它的一种危害所在。

葛兰西批判说，《通俗读本》对任何一种辩证法都没有加以论述。它对于形而上学和思辨哲学没有进行批判，这是由于作者并不真正了解形而上学的概念。作者一开始想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学”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恰好意味着朴素的形而上学。作者对那些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存在于具体历史著作

中的批评者根本无力回击，他未能按照真正辩证法的观点，提出并解决柯罗齐按照思辨的观点提出的那些问题。《通俗读本》中的旧式形而上学，其最显眼的痕迹之一是企图把每一件事情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最终原因，这证明它就是一种“寻找上帝”的表现。

《通俗读本》把全部过去的哲学都看作胡言乱语、一无是处，葛兰西认为，这即使不是一种反历史的谬论，也是事实上的形而上学的残余，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古人的思想同今人完全一样，否则便是时代错误。有些哲学体系固然已被超越，但这并不排斥它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不少的作用。对于这些体系的衰微，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要从现实辩证法的角度去认识。

关于《狱中书信》，我们选译了1927—1932年期间葛兰西主要写给他的二姨子塔齐娅娜等人的信。塔齐娅娜在葛兰西系狱10年中一直到处奔波，从购买药物、营养品到书报杂志，从中转书信到聘请医生、律师，莫不由她代劳。葛兰西写的这些信有些反映了他在狱中的心理状态，如他在1927年6月6日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的处境并不十分美妙。但是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会根据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所保持的感情而改观。我很冷静，对一切处之泰然，充满信心……我相信我绝不会就此在狱中了却一生。”此后几乎过了两年，即1929年4月22日，他在致塔齐娅娜的一封信中写道：“过去，我总是克制自己要忍耐，以便同笨蛋和讨嫌货相处（根本无法避开他们），如今已不再有任何紧张感——监狱的惯例和自卫的本能已经使我养成了忍耐的习惯。有时我变得麻木不仁或漠不关心，这种精神状态缠住我不放。”又过了一年，1930年1月13日他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写道：“至于我的心情，我想你是难以理解的，其中有好多因素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从以上书信内容来看，他也偶尔产生一般入狱者感到孤寂、灰心丧气的心情，不同的是他能用意志的力量控制消极情绪，克服病

体的痛苦,把感情和思想转向阅读和革命的理论研究工作。

从很多信中看来,他的革命的乐观主义使他在狱中的精神生活显得丰富多采。他同塔齐娅娜讨论哲学、文学、戏剧,甚至花卉、植物,以至佛教、犹太人。他自学多种外语,阅读各种书籍杂志并做笔记。1927年3月29日,他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写道:“我想订个计划,认真而系统地研究问题,使我的精神生活有所寄托……第一,研究意大利知识分子史,他们同文化思潮的渊源及其派别,他们各自的思想方式,等等;第二,研究比较语言学;第三,研究皮兰德娄以及在他大力倡导下形成的意大利戏剧趣味的改变……”。

在狱中搞研究工作,实际上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首先是资料匮乏,其次是思想上的各种干扰。1927年5月23日,葛兰西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写道:“由于精神状态以及实际情况,不可能进行名副其实的,我很难做到集中精神,专心致志于某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只有全神贯注,我才能弄明白手头这些材料的全部可能的关系,并把它们理出一个头绪来。”这也说明《狱中札记》是个痛苦的创作过程。

这些信里也反映了葛兰西对柯罗齐和马基雅维利这两位意大利人具有浓厚的兴趣。前者是他学生时代所崇拜的人,而这时已成了他札记中的被批判者。由于柯罗齐对意大利和英国的影响很大,因此,他认为柯罗齐有点象“一位世俗教皇,是领导权的一种极有效的工具”。1932年5月,他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写道:“柯罗齐的历史观必须被解释为‘思辨’和‘哲学的’,而不是伦理—政治的。这种历史观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他在这个时期展开了对柯罗齐哲学的剖析,而不是一味追从了。

马基雅维利是他制定党的理论所研究的对象。他在1927年11月14日给塔齐娅娜的一封信中表示想购买《马基雅维利全集》或《选集》。葛兰西认为,马基雅维利曾经寄希望于增加和发展军事组

织，能形成城市对乡村的领导权，因此，他可以算是第一位意大利的雅谷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编译这本《葛兰西文选》，目的是向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理论教育工作者综合介绍葛兰西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和文艺书信。我们在编译过程中增添了部分注释，凡释文后面注有“编者”字样的均为我们增添的注释，其余则为原编者的注。标有星花的是葛兰西的原注。由于《狱中札记》和《狱中书信》部分中出现的原注数量较多，作为脚注不好处理，因此一律改为书后注，注符为不带圈的阿拉伯数字。本书选材的取舍是否准确，译文的处理是否妥当，都可能存在问题，敬请读者指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1991年5月

目 录

编者序	(1)
-----------	-------

政 论

社会主义和文化	(3)
反《资本论》的革命	(9)
阶级的不妥协和意大利历史	(14)
俄国的乌托邦	(25)
共产国际	(34)
工人民主	(37)
夺取国家	(42)
工人和农民	(49)
革命的发展	(54)
都灵省的政治斗争	(59)
工团主义和委员会	(83)
革命者和选举	(88)
政权问题	(91)
党和革命	(97)
首先是更新党	(102)
都灵社会党支部的行动纲领	(107)
执政党和执政阶级	(112)
为了社会党的新生	(118)

塔斯卡的报告和都灵劳动协会代表大会	(125)
工会和委员会	(130)
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 (1920年7月送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135)
两种革命	(147)
共产主义小组	(152)
《新秩序》周刊的纲领	(156)
共产党	(165)
国际的纪律	(175)
阴谋和党	(178)
工人国家	(183)
里窝那代表大会	(187)
对代表大会的干预	(191)
意大利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应当保持什么关系	(196)
《新秩序》的纲领	(199)
意大利危机	(205)
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219)
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	(226)

文 件

意大利的形势和意共的任务(《里昂提纲》)—— 葛兰西；陶里亚蒂	(255)
由中央委员会提名最后审定里昂代表大会文件 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	(294)

《狱中札记》

现代君主	(321)
------------	-------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的札记·····	(321)
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	(327)
政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330)
政治要素·····	(337)
政党·····	(341)
世界观和实际态度：全局的和局部的·····	(350)
关于“经济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几个问题·····	(352)
预见和前途·····	(361)
国家的经济—团体阶段·····	(364)
对形势的分析。力量的对比·····	(367)
论官僚制度·····	(377)
定比定律·····	(381)
代议制政府的数量和质量·····	(383)
连续性和传统·····	(386)
自发性和自觉领导·····	(387)
反对拜占庭主义·····	(391)
总体工人·····	(392)
唯意志论和社会群众·····	(393)
国家和市民社会 ·····	(395)
略论政党发生内部危机时在结构方面的几个问题·····	(395)
凯撒主义·····	(403)
关于海狸的传说·····	(408)
鼓动和宣传·····	(410)
“时代的哲学”·····	(412)
政治斗争和战争·····	(413)
从运动战(正面进攻)变为阵地战——在政治领域里亦然·····	(421)
政治和军事学·····	(422)
国际主义和国家政策·····	(422)
关于“总体的人”或“社会一致”的问题·····	(424)

社会学和政治学	(425)
领导权(市民社会)和三权分立	(427)
法的概念	(428)
政治和宪法	(429)
议会和国家	(435)
自我批评和虚伪的自我批评	(436)
国家	(438)
关于全国性团体的组织	(445)
谁是立法者?	(446)
宗教、国家、政党	(448)
国家和政党	(449)
中央集权论	(449)
统治阶级的“功过”	(450)
历史的文学	(451)
“颠覆分子”	(454)
“唯物主义浪潮”和“权威危机”	(457)
马克思主义问题	(459)
实践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459)
一般问题	(499)

《狱中书信》

致塔齐娅娜(米兰, 1927年3月19日)	(547)
致塔齐娅娜(米兰, 1927年5月23日)	(550)
致妈妈(1927年6月6日)	(553)
致塔齐娅娜(米兰, 1927年11月14日)	(555)
致朱泽佩·伯蒂(1928年1月30日)	(557)
致塔齐娅娜(米兰, 1928年2月27日)	(560)
致塔齐娅娜(图里, 1929年4月22日)	(562)

致塔齐娅娜(图里, 1930年1月13日)	(565)
致朱莉娅·舒赫特(图里, 1930年2月10日)	(568)
致塔齐娅娜(图里, 1930年12月1日)	(570)
致塔齐娅娜(图里, 1931年9月7日)	(573)
致塔齐娅娜(图里, 1931年10月12日)	(576)
致塔齐娅娜(图里, 1932年4月18日)	(580)
致塔齐娅娜(图里, 1932年5月2日)	(583)
致塔齐娅娜(图里, 1932年5月9日)	(585)
致塔齐娅娜(图里, 1932年6月6日)	(588)
注 释	(591)

政 论

社会主义和文化

不久以前，恩里科·莱奥尼^①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这篇文章里，他以自己偏嗜的隐晦和拐弯抹角的笔调，违背工人阶级正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未来的实践和历史事实，重复了一些涉及无产阶级的文化和唯理智论的老生常谈。我们认为重新谈谈这个主题并非毫无好处，这个主题以前曾经在《呼声》报上出现过。年青人的《前卫报》上关于那不勒斯的博尔迪加^②和我们自己的塔斯卡^③之间的论战中，对这个主题的论述，更加死搬教条^④。

① 恩里科·莱奥尼是1908年曾被社会党开除的“革命工团主义者”之一，又是后来重新入党的少数人中的一个。然而，他的研究经常倾向于混乱的行动主义，有时还似乎为暴力行为作辩解。从墨索里尼对莱奥尼的著作和行动所作的解释来看，莱奥尼代表法西斯主义先驱者当中的一种类型。

② 亚马多·博尔迪加(1889—1970)，是意大利政治活动家。1910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2年组织卡尔·马克思主义小组；1914年主编那不勒斯《社会党人》，撰文反对战争。大战期间，他主张把改良主义者开除出社会党，并反对工人阶级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他是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创建人之一；1921至1923年当选意共第一任总书记。由于他实行宗派政策，降低了党抗击法西斯进攻的战斗能力，造成了党群脱离的危险，因此意共第三次代表大会(1926年)批判了他的极左观点，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1930年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而被开除出党。自第二次大战结束到他逝世为止，他一直同他的小集团一起开展反共产主义的政论写作活动，并建立了“国际共产党”，但他的政治活动造成的影响不大。1970年7月24日他在福米亚逝世。——编者

③ 安杰洛·塔斯卡(1892—1960)，是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1919年同葛兰西一起创办《新秩序》周刊；是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创建人之一；1926年，意共总书记葛兰西被捕入狱后，与陶里亚蒂共同领导意共；1929年由于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见，被作为右派开除出党。后来流亡巴黎，参加社

让我们回忆两段文章吧。第一段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1772—1801)写的,他说:“文化的至高无上的问题是赢得一个人先验的自我,同时又是他本人的自我。因此,如果对其他人缺乏预感或完全理解,我们并不感到奇怪。而如果我们对于自己都缺乏充分理解的话,那就绝无希望能真正理解其他人。”

我们概括的另一段文章是贾·巴·维科写的,他(在他的《新科学》一文中的“关于优等民族富有诗意语言的第一个必然结果”这一章中)对梭伦的那句有名的格言作了一个政治性的解释,这句格言就是:“了解你自己”。苏格拉底后来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哲学中。维科认为,梭伦是希望用这句格言来告诫那些相信自己起源于兽类,而贵族则起源于神的平民们,要他们反省自己,并且看到他们有着和贵族同样的人性,因而应当宣称他们在民法面前是平等的。维科接着指出这种平民与贵族之间人性平等的意识是古老的民主共和国产生的基础和历史原因。

我们并非随便挑选了这两个片断。我们相信,这两段文字尽管被大家认为表达和解释的方式模糊不清,这些作者却触及到了正确理解文化,甚至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的范围和原则。

我们需要使自己摆脱这样的习惯,即把文化看成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把人看作仅仅是塞满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这些材料和原始事实必须在头脑中编排保存,

会主义运动。晚年精心撰编《拉布里奥拉和恩格斯通信集》,并著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1938年,伦敦版)一书。1960年逝世前,他把自己收藏的一部分意共文献赠给了米兰弗尔特利尼里研究所。——编者

- ④ 在1912年9月20至23日于波洛尼亚召开的青年社会党人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青年的文化和教育”的辩论中,塔斯卡与报告起草人亚马多·博尔迪加展开了争论,博尔迪加认为过于强调学习的必要性。“任何人都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他所属的阶级带来的现实生活的需要成为社会党人的。”另一方面,塔斯卡则强调迫切需要文化更新和意大利社会主义的理性的复苏。博尔迪加称塔斯卡及其支持者为“文化主义者”。

就如同字典的条目一样，使得它的所有者能够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刺激作出反应。这种形式的文化确实是危险的，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这种文化只能用来造成一些心理失调的人，这样的人认为他们比所有其他人都优越，因为他们记住了一定数量的事实和日期，并且一有机会便要喋喋不休地卖弄它们，几乎使之成为他们自己同其他人之间的障碍。这种文化只能用来造成一种罗曼·罗兰曾经加以无情痛斥的虚弱和苍白的唯理智论，这种唯理智论所产生的一群自命不凡的空谈家们给社会生活带来的破坏作用，比之结核菌和梅毒菌对人体的美和健康带来的破坏作用更大。一个略知拉丁语和历史的青年学生，一个由于教授们的怠惰和无所谓的态度而成功地搞到一张被称为学位的纸片的青年律师，他们最后都以为自己与最熟练的工人不同，要比他们高明。可是最熟练的工人毕生完成明确而必要的任务，他的活动同这种青年学生和青年律师的活动比较起来，其价值要超过百倍。因此以上所说的不是文化，而是卖弄学问；不是知识，而是炫耀聪明；反对它是绝对正确的。

文化是与此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这些东西的产生都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演变，通过不依赖于人们自身意志的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如同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情况一样，在那里每一个品种都是不自觉地，通过一种宿命的自然法则被选择出来，并且确定了自己特有的机体。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说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否则，怎么能够解释这一事实：既然向来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财富的创造者和自私的消费者，为什么社会主义尚未实现呢？事实是这样的，人类是逐渐地、在一定的阶段上才意识到它自

身的价值，并且赢得这样一种权利去抛弃掉由少数人在前一个历史时期强加于它的那些组织形式。这种意识不是由于生理需要的残忍刺激形成的，而是对于为什么存在着某些条件和如何最妥善地去把居于附属地位的事实转变成为起义和社会重建的导火线这一问题作出明智判断的结果，开始是少数人后来是整个一个阶级都有这样的明智的判断。这意味着每一次革命都是以激烈的批判工作，以及在群众中传播文化和思想为先导的。这些群众开始产生对抗时，他们想到的仅仅是解决自己当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他们与处在同样条件下的其他人没有休戚相关的联系。最近的一个例子，同我们最接近因而同我们的时代绝非无关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它的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先导的文化时期（即被一些老练的理论推理批评家们加以如此歪曲的时期）无论如何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一些浅薄的百科全书派知识分子的激动，这些人对任何问题都以同样泰然自若的态度来东拉西扯一番，并自以为只要读过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大百科全书》，便成了当代的人物。总之，这不仅仅是卖弄学问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理智论的现象（类似的东西我们今天在眼前就看到了），这种现象在一些最平庸的普通大学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就象德·森克蒂斯^①在他的《意大利文学史》一书中所敏锐地提到的那样，启蒙运动本身是一场宏伟的革命，它以一种统一的意识的形式，给全欧洲提供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精神国际，这个国际对平民的所有灾难和不幸是敏感的，它为后来法国的流血起义作了最好的准备。

^① 弗朗切斯科·德·森克蒂斯(1817—1883)，是19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欧洲著名文艺评论家。他在黑格尔思想影响下所写的《意大利文学史》，是19世纪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因为其中有相当多的历史和政治资料。他当选过众议员，担任过教育部长。1861年意大利统一后，他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并担任大学教授。1883年12月29日在那不勒斯逝世。——编者

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都讨论过同样的题目、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原则。每一部伏尔泰的新喜剧，每一本新的小册子，都象星星之火一样沿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伸展开去的路线蔓延着，并且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找到了同样的支持者和同样的反对者。拿破仑军队的刺刀，发现它们的道路已经被 18 世纪上半叶从巴黎涌出的书籍和小册子的无形大军所扫清；这支大军为必然到来的复兴时期准备了人员和制度。后来，法兰西事件锤炼出了统一的意识之后，巴黎的一次示威运动便足以使米兰、维也纳和一些较小的中心激起同样的骚动。这一切在肤浅的观察家们看来都是自然的和自发的。然而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那些以共同事业名义而引起的爆发事件提供精神准备的文化因素，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就社会主义来说，今天也在重复着同样的现象。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无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统一的意识；这种批判含有文化的性质，而不仅仅是一种自发的和自然主义的进化。这种批判恰恰含有那种在诺瓦利斯认为是文化末日的自我意识。一种与其他人相对抗的自我意识，一种已经分化出来的自我意识，一旦它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它就能够评价种种事实和事件，不仅就事论事地进行评价，而且看它们是驱使历史前进还是后退。了解自己意味着要成为自我，成为自己的主人，要识别自己，把自己从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要作为秩序的一个因素而存在——但这是力求达到某种理想而奋斗时的自身的秩序和自身的纪律。而且我们也要去认识别人，认识他们的历史，认识他们为使自已达到现在这样的状况并且创造出现有的文明（我们力求用自己的文明来代替这种文明）而连续不断地作出的努力，否则我们在这方面是不能成功的。换句话说，为了认识支配着人的精神的规律，我们必须形成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某种概念。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而同时又不

忘却最终的目标：通过别人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自己更好地认识别人。

如果说世界的历史真是由人们为把自己从特权、偏见和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而作的努力所形成的一副链条的话，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试图在这副链条上增添另一个环节的无产阶级不应该知道，在它之前谁创造了什么东西，那些东西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或者它能从这种知识中得到什么好处。

署名：阿尔法·加马

载于《人民呼声》报1916年1月29日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1920）》1977年英文版第1卷第10—13页

反《资本论》的革命^①

布尔什维克革命现在已确定无疑地属于俄国人民总的革命的一部分了。直到两个月以前，最高纲领派还是作为不可缺少的积极动力，他们保证事件不会停顿、保证奔向未来的通道不会受阻、并使事情获得最终解决（资产阶级的解决）。现在这些最高纲领派已经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他们的专政。他们正在创造一种社会主义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如果革命要在已经取得的巨大收获的基础上继续协调地发展而不遇到正面对抗的话，它将不得不稳定下来。

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多于事件的意义（因此，实际上我们的确不需要作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论证了事件应该如何沿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在俄国无产阶级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它本身的起义、它本身的阶级需要和它本身的革命之前，由于西方式样的文明的建立，怎样会必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又怎样会必定开始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但是，已发生的事件战胜了意识形态。事件已经冲破了这种分析公式，而根据历史唯

① 本文是葛兰西第一次给都灵以外的报纸《前进报》（米兰版）写的稿。从题目及其内容来看，当时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尤其那种认为人的意志力量是这次革命成功的最大历史因素的观点，显然是受到黑格尔和柯罗齐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但他肯定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准则的强大生命力，他歌颂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无疑当时他已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编者

物主义的原则，俄国历史好象应该按照这一公式发展。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象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也还有宿命论的东西。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本论》中的某些结论，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它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思想。总之，这些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没有用这位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他们实践着马克思的思想——一种不朽的思想，它是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的继续，马克思也沾染了实证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色彩。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互相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是了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并且终于像一股火山熔岩一样，能够按照人的意志所决定的那样，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开辟道路。

马克思预见到了可以预见的事情。但是他无法预见到欧洲战争，或者更确切些说，他无法预见到这场战争会如此旷日持久，会发生如此的影响。他也无法预见到，在难以言表的艰难困苦的三年中，这场战争竟然在俄国唤起了它已经唤起的那种人民的集体意志。在正常时期，要形成这样一种集体意志，需要一个通过社会逐步传播、扩散的漫长过程；还需要有范围很广的阶级经验。人是懒散的，他们需要组织起来，首先是从外部组织成社团和联盟，然后在内部，在他们的思想和意志中〔……〕^①需要一种不断持续的

^① 此处文章中有脱漏。

和多样化的外部刺激,这就是为什么在正常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准则能抓住现实、掌握并阐明现实。在正常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两个阶级通过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创造历史。无产阶级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贫困和经常的艰难困苦,因而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以求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它参加斗争,强迫资产阶级改善生产技术并使之更加适应于无产阶级的迫切需要。其结果是:为得到改良而拼命地竞赛,生产节奏加速,有益于社会的商品产量不断增加。可是,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人倒毙路旁,这就使得那些留下来的人的需要更加迫切;群众经常处于动乱状况。由于这种混乱,他们在思想上形成了某种秩序。他们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潜在能力,认识到自己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并且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这是在正常条件下发生的事件。此时,事件是按照某种规则重复着的。此时,历史按阶段发展,尽管这些阶段在意义和价值方面要更加复杂和丰富,它们却是彼此相类似的。但是在俄国,这场战争激励了人民的意志。作为三年多累积起来的苦难的结局,他们的意志几乎在一夜之间完全一致了。饥荒迫在眉睫,饥饿和由饥饿造成的死亡可能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可以一举毁灭数千万人。人民的意志一开始是机械地,而在第一次革命后,便主动地和自觉的一致起来。

社会主义宣传使得俄国人民接触到别国无产阶级的经验。社会主义宣传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历史在一瞬间戏剧性地苏醒过来:它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它的漫长的连续不断的努力,要使自己从奴隶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奴隶枷锁曾使它处于如此卑下的地位),要使自己锻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并在今天成为一个尚未到来的世界的宣言。锻炼俄国人民意志的是社会主义的宣传。他们何必等待英国的历史在俄国重演,等待资产阶级成长起来,等待阶级

斗争开始，以便形成阶级觉悟，并且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终灾难呢？俄国人民，或者至少是少数的俄国人民，在思想上已经有过这些经验。俄国已经超出了这些经验，现在它将利用这些经验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同它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来使自己迅速达到与西方世界同样的生产水平一样。用资本主义的话来说，北美比英国更要先进，因为在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从英国经过长期发展后才达到的水平上一下子起飞的。现在，受着社会主义教育的俄国无产阶级，将要在英国今天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上开始自己的历史。既然它必须从零开始，它就将在别处已经改善了的基础上起步，因而将迫使自己达到被马克思认为是集体主义的必要条件的那种经济成熟水平。革命者自己将创造为全面达到他们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而且他们创造这些条件的速度，将比资本主义所能做的更快些。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批判，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和对财富的浪费，现在，革命者们可以运用这些批判把事情做得更好，可以避免浪费和不成为这些缺陷的牺牲品。这将首先是一种贫困和痛苦的集体主义制度。但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也会继承同样的贫困和痛苦的条件。在俄国，资本主义不可能立即比集体主义制度做出更多的事。事实上它今天只能做得更少，因为它将立即面对一个不满意的和激烈骚动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再也不能代表别人来忍受这种随着经济失调而来的苦难和贫困。因此，甚至从纯粹的人的方面来说，现在在俄国能够证明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无产阶级能够承受住和平实现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困难。当然这只有在无产阶级感觉到事情是在他们控制之下，并且知道他们能以自己的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征服这些困难的时候才能这样。

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即最高纲领派在这个时刻是一种生物本能的必然表现——如果俄国人民不想沦为一场可怕灾难的牺牲

品，如果为了自己的新生而茹苦含辛的俄国人民想要少受饿狼的利爪之害，如果俄国不想变成毒蛇猛兽互相厮杀得血肉横飞的巨大的杀戮场，最高纲领派就必须掌握政权。

署名：安东尼奥·葛兰西

载于《前进报》米兰版1917年12月24日

《人民呼声》报1918年1月5日重新发表，并附有以下说明：“都灵审查当局曾经一度把《人民呼声》报上的本文全部删掉。在通过米兰和罗马审查当局的详审之后，我们用《前进报》上刊载时的原文重新发表于此。”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1920）》1977年英文版第1卷第34—37页

阶级的不妥协和意大利历史

最近《新闻报》就“社会主义的分裂”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新闻报》强调了这些文章的纯粹“知识性”和资料性。多么了不起的公正无私！这种对意大利民族提供知识和进行教育的愿望中有着怎样一种圣芳济修会式的好意啊！但是且慢下断语。让我们集中注意一下实质性的问题，看看在当前我们党内的争论中，不妥协和相对主义者所表明的态度对于政治事件和意大利历史来说可能产生怎样的实际后果。

实际上，《新闻报》已经出来公开支持议会党团。对不妥协和者的攻击进行得很巧妙，充满了焦利蒂的信徒所特有的狡诈手法。《新闻报》上的文章是某个“同情者”写的，这一情况有利于缓和这家报纸的无产阶级读者的不满情绪。写这些文章的是一位有才华的人，一位熟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术语的人，一位文化水平很高的人，一位擅长于根据唯心主义哲学的最新发展来区别各种思想的能工巧匠。这位“同情者”，由于事物和价值的自然逻辑，已经成为合作主义者的理论家，他在迄今发表的3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大堆有争议的问题、思想和逻辑方法，这些东西将会用在各种文章特别是私下的谈话中来支持相对主义者的观点。

由于这种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这些论点全部揭露出来，进行逐字逐句的批判。遗憾的是，我们终于不得不这样做，但是那些始终注视着我们的好心的读者无疑会深信这样做是值得的，而且他们会看到《前进报》编辑们和合作主义者之间的这场论战，远远

超过了一场有关议会策略或者党的纪律的小争论，这场论战实际上是一场可怕的战斗的序幕，在这场战斗中将被置身于……均势之中……（被检查员删去一行）……对于今后20年的意大利历史来说。

这场争论的核心，用《新闻报》上刊登的相对主义者的话来说，在于：“这些干涉主义者的政党正在逐步接管国家机器的全部权力和机构，并直接和间接地对它们进行操纵和控制。此外，他们正在利用他们的政党对国家政权的这种控制，对国家政权的这种逐步‘吞并’以致现在居然把国家组织与他们自己的党组织等同起来，以便削弱和破坏工人阶级的政治机构，即社会党，并使它最终变得软弱无力。”

这就是《新闻报》为之喝采的合作主义者发挥的论点。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吞并”现象的最初和唯一的牺牲者是焦利蒂^①和他的党。因为对意大利来说，这种“吞并”现象代表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的开始，这种新的政府形式以阶级国家为前提，在它面前，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平等的，就是说，谁也没有任何特权地位。它代表一个民主时代的开端，这并不是由于某个政党斡旋的结果，而是事物的不可抗拒的逻辑的结果。焦利蒂独有的统治权利遭到了挫折，另一个政党在成功地保有政权方面比预料的时间要长，而且

① 乔万尼·焦利蒂(1842—1928)，是意大利自由民主政治家，从1892至1921年，担任过5届内阁首相。他在法西斯党徒暴行猖獗时期采取中立的立场，相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当被“束之高阁”。面对社会党、共产党和天主教的反对和不合作，1921年5月，他号召实行新的大选，希望建立一个赞成民主自由国家的集团，使他能有效地治理国家。大选结果证明对焦利蒂集团是个灾难，34个法西斯党人进入议会，从而使这个集团瓦解。1921年6月21日，他的内阁不得不提出辞职。墨索里尼上台后，他担任议会主席，容忍法西斯政府，批准了法西斯党控制议会的“阿契波选举法”。在马特奥提事件发生后，他不支持政府。他的最后一次政治行动是在他逝世前几个月，声明反对法西斯的1928年选举法。1928年7月17日，他在加富尔镇逝世。——编者

正力求巩固自身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逻辑导致了以下的最理想的结局（英国各政党的历史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两个同样强大的政党（它们互相惧怕对方取得优势）之间紧张竞争的冲击下，国家摆脱了那些成为累赘的职能所加诸的负担，政府实行了分权，官僚主义的暴政减轻了，权力的席位获得了独立。国家的封建专制的、穷兵黩武的性质消失了，它的组成使得执政党的专政成为不可能，因为经常存在着权力交替的可能性：谁代表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的精华，谁就能取得政权。同时，国家将会看到它的由经济活动而产生的自然能力和自发的能力会受到鼓励，而不会由于寄生阶层的增长受到窒息——那些寄生阶层为了得到经济利益而玩弄权术，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得到自己的超特权。

阶级、国家、政党

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国家代表什么呢？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组织。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现代的具体的体现。资产阶级不是国家之外的一个统一的实体。作为自由竞争的结果，经常会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实业家集团，去履行这个政权的经济职能。每一个集团都渴望借助于垄断来使自己从竞争的血腥斗争中摆脱出来。国家的职能是为内部的阶级争端，为互相对立的利益冲突谋求法律上的解决；因而它使不同的派别统一起来，并给予这个阶级一种稳固的、统一的外表。派别之间的竞争都集中在政府和国家权力上面。政府就是最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党或派别的战利品；它的实力为自己赢得了一种权利：控制国家权力，使之转向任何特定的方向，并根据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纲领随时加以操纵。

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党对于国家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资产阶级政党或是实业家利益的代表者，或者只不过是一群对于国家结构起不到丝毫影响的“鱼饵苍蝇”，它们只会嗡嗡作声，吮吸着由于受宠而得到的甜头。

社会党不是地区性的，而是阶级的组织：它的形态与任何其他政党的形态迥然不同。它只能把国家，这个资产阶级的权力网，看作敌对的东西。它如果直接或间接参加夺取国家的竞争，就等于自杀，就会丧失自己的本性，变成一个脱离无产阶级历史活动的单纯的政治派别，就会变成一群叮食一碗甜食的“鱼饵苍蝇”，在那里被粘住而可耻地死去。社会党不夺取国家，而要取代国家，取代政权，取消党派的政府，并且以生产和交换的组织取代自由竞争。

意大利有一个阶级国家吗？

在讨论和争辩中，言词往往违背历史现实。当我们谈到意大利时我们用的是诸如资本家、无产者、国家、政党这样的字眼，似乎它们代表着一些社会实体，这些社会实体达到了自己的历史发展的顶峰，即达到了堪与经济发达的国家相匹敌的成熟水平。但是在意大利，资本主义还处在自己的幼年时期，它的法律同它的现实状况完全不相适应。法律只不过是长在古老大厦上的一个现代化的赘疣。它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模仿国际政治的产物，它是法学知识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劳动工具的产物。

最近，朱泽佩·普雷佐里尼^①联系有关“民主”的争论，注意到

^① 朱泽佩·普雷佐里尼(1882—1982)，意大利作家，1908至1914年，他主办《呼声》周刊，把它作为民族主义文化和绝对历史主义的喉舌。1930至1960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文学史教授兼意大利室主任。1937至1948年编辑出版4卷本《意大利文学史和评论的书目提要》。战后，回意大利，不久移居瑞士的卢塞恩。他一生为136种期刊写过文章，为许多国家的杂志写过评论。他著有文学书籍57本，编集子70本。他的披露自己思想的著作是《无用的意

了这一点。意大利国家在民主制度的外表下保留了专制国家的实质和结构(法国也如此)。这里存在着一种建立在拿破仑一世的暴政制度上的官僚主义的和中央集权的政体,它的明确的目的就是粉碎和遏制任何自发的倾向和运动。外交事务的进行是极端保密的——不仅不公开讨论,而且连签订条约的条件对于那些终将受到其影响的人也是保密的。军队(直到战争使它的古老的制度站不住脚为止)是职业性的,而不是全民皆兵。这里存在着受到国家财政和其他方面支持的国教;这里教会与国家不是分离的,也不存在所有宗教的一律平等。学校或者不存在,或者只有寥寥几个出身穷苦、斗米车薪的教师。他们同国民教育的需要是不相称的。选举权直到最近的选举中仍然受到限制,甚至在今天,国民还远没有得到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的基本原则)尚未触及国家事务中最重要的方面。因此,我们所处的情况是,政治结构只是一些随意建立的上层建筑——它们没有任何效力,因而一事无成。权力的席位仍然混乱而互相依存;还没有出现由农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组成的大党。(删掉84行)

因此,这里并不存在这样的阶级国家,其中自由竞争的原则保证有高效率,一些大党代表皮埃蒙特的巨大利益,皮埃蒙特为了保持国家的统一而实行个人(皮埃蒙特的狭隘的政治利益的代表)独裁,并且为了保持国家的统一,把一个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的殖民统治强加给意大利。现在这个制度正在崩溃,新的资产阶级势力已经兴起,并且在不断强大起来——它们愈来愈坚持要求承认它们的利益。干涉主义是一种偶然的現象,和平主义也是如此——

大利人》(1954);《友谊史》(两卷本)是1900至1956年他同乔万尼·巴比尼的通信集。《日记(1900—1944)》(两卷本,1978)等。1982年7月14日在瑞士的卢加诺逝世。——编者

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迫在眉睫的危险是焦利蒂的国家，全部巨大的寄生利益都渗透了这个旧国家，因此衰落了旧资产阶级由于青年资产阶级的鼓动而感到自己的超特权受到威胁，青年资产阶级要求在政府中占有位置，并自由参加政治竞争。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使演变中断，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一代无疑将使这个国家复活起来，并把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渣滓抛弃掉。民主国家并不是一种慈悲心肠或自由主义教育的产物；对于大规模生产、繁忙的交换和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人口集中来说，它是不可或缺的。

无言的许诺^①

这些都是历史局面形成的条件。焦利蒂集团经过20年横行无忌的专政，已经装出一副正式承认自由的姿态，而实际上它巩固了这个为伊曼纽尔·非利贝托所梦想的专制国家。这个集团统治的武器，即它的专政，现在已经落入了反对派的手中（由于二者都既无政治的，又无经济的组织，因此，我们无法把它们称为政党）。后者控制这个武器比人们预期的时间要长，而且正利用它，使它按照自己的目的发展，并用它来反对过去的首领。如果这场代表不同的局部利益的资产阶级派别之间的斗争继续下去。那么，一个新的、自由主义的国家就将在双方激烈的冲突中兴起。小的分歧将要消失，由于更高的利益它们将趋于一致，将要形成一些大的政党，并开始党派政府的时代。

^① 《新闻报》今天（5月17日）发表的第四篇文章，明确地讨论了为实现和平而合作的可能性。《新闻报》认为这场讨论必须推迟到时机成熟时再进行。而我们站在对立面，认定我们的党章是民主的，相信党派联盟和地方分支同样有必要立即进行关于和平问题的全面讨论，以使党对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立场。

焦利蒂分子希望避免这场冲突。他们不希望为大量的组织纲领而进行论战，否则这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将会热到令人不适的程度。资产阶级的主宰者知道这个国家是否能经受得住另一场狂热，以及这场骚乱会对无产阶级产生怎样的影响。焦利蒂分子希望避免这场冲突，他们宁愿在议会讲坛上去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在大事化小这个同样的老传统范围内行事，使国家排除政治事件，避免受到舆论的非难。焦利蒂分子是少数派。如果国家要前进、要行动、要同情性决裂，那就注视那些游手好闲的社会党议员们，注视那些高唱自由、议会控制和合作必要这类怀旧的咏叹调的海妖们吧。

且看《新闻报》是如何用“同情者”的文章来帮助他们的吧，用无产阶级的议会代表们所不幸缺少的新文化来为错误的事业效劳；向他们提供一种“现实主义”，一种他们全然不懂的马克思黑格尔主义。且看如何把不妥协者描绘成为神秘的空想家，愚蠢的抽象派，甚至是白痴，因为他们的想法只不过是基于一些最简单的和无根据的假设，即“工人们将从战壕中回来，并以自觉的意志和政治力量来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把不妥协说成是精神上的和政治上的惰性，还暗示无产阶级能够赢得地位的改善，一种又堂皇又诱人的无言的许诺，构成了整个方法的基础。这种无言的许诺，正由于它未曾表现出来而显得迷人。其结果是，在枯燥的、简单的词句里似乎隐藏着神秘的含义。这里暗示的是，通过议会撮合，战争能够消除，和平问题能够解决。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主题。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特别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无产阶级内部将会产生理智上的迷失方向，即它的批判性的阶级观念的迟钝化，这就可能给党的领导带来压力，从而导致议会党团即使对结成联盟并不热心或甚至勉强同意，至少会在纪律约束方面暂时松弛下来。议会行动带来的结局是什么呢？那就是使焦利蒂

分子取得政权的选举。这样，无产阶级对政治事务的直接干预，就会像妖魔一样被驱除。俄国的例子和被汹涌澎湃的群众怒潮所涤荡的反沙皇的资产阶级的可悲结局，吓坏了这些民主主义隐上的胆怯的灵魂，这些寄生虫本来只习惯于在暗中啃食国家的资金，他们就像修道士们把通心粉汤分给一群下贱的穷人那样，交出管理权和特许的权利。

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

《新闻报》认为相对主义者的观点，甚至在理论上也基本上是幼稚的。不论是用偶然的理由，还是用逻辑的推理，都不能证明合作是正确的。这既是历史的错误，也是逻辑上的错误。

合作主义者的现实主义无非是经验主义。它和不妥协的关系就如同理发师—外科医生和奥古斯特·穆里^①的关系一样。

按照《新闻报》的说法。“历史证明了两种社会命题之间的矛盾，即阶级的对立是怎样常常在综合中得到解决，其结果是：一部分过去的东西常常会被分离出去，而一部分将来的东西会日益结合起来，因此通过这种渐进的转化，乌托邦变成了现实，并且在它的设计中显示出一种新的相应的社会结构。”

确实，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它并没有证明，这种“综合”、“将来形成的东西”是预先通过契约决定下来的、预知历史的综合是一种幼稚的梦想；把未来抵押在阶级之间订立契约上，这是经验主义，不是敏锐的历史感。我们在上周那一期的《呼声》报中用更为简洁的语言说明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的最大需要（乌托邦）的一部分日益得到实现（将来形成

^① 当代著名的外科医生。

的东西)；这一部分是不能通过演绎推断来决定的，因为历史并不是一种数学的计算。已经实现了的那一部分，是社会活动和最高目标之间连续的相互作用的辩证结果。只有不妥协地追求这些最高目标，历史才能是辩证的，而不是幼稚的偶然性，这是一种坚实的成就，而不是必须予以取消和加以纠正的错误”。

用更简单的话来说，不妥协者和相对主义者都在说，要想取得火花，就必须用燧石来击打钢铁。但是，当不妥协者正要打击它的时候，相对主义者说：住手吧，我已经得到火花了，在我口袋里。他擦燃一根火柴并且说：这就是无目的地摩擦就会产生的火花。于是他燃着他的雪茄烟。但是有谁会在这种可悲的魔术玩意儿看作是黑格尔对历史的解释或者是马克思的思想呢？

无产阶级的作用

社会党这个无产阶级的组织，不能够参加夺取政府的竞赛而不失去自己的内在价值并转变为一群鱼饵苍蝇，它同样也不能与任何有组织的资产阶级议会党团合作而不带来危害，而不去捏造一些终究必将被取消和纠正的虚假事实。阶级合作带来的政治上的堕落，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恶性膨胀，资产阶级政党不满足于仅抓住国家不放，而且还要利用与这个国家敌对的政党。这样，它就成了一种非驴非马的传奇动物，一种缺乏意志或特殊目标的历史怪物，它关心的只是自己对国家的占有，它就像铁锈一样粘在国家上面。国家活动归结为只不过是墨守法规，归结为形式上解决争端，而从不触及实质。国家成为一列由木钉和铁栓制成的四小轮古象拖车所凑合起来的吉卜赛大篷车队。

如果社会党想要维持并保住它作为无产阶级执行机构的地位，那它本身就必须遵守并使所有其他人都尊重最激烈的不妥协

的方法。如果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想要依靠它们自己的力量来组成一个政府，它们就必须按照自然的程序来发展，使自己同国家进行接触，终止它们自己之间的争端，并且形成一个有特色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如果它们不愿意这样做。那么，由于没有任何政党能够自己独立起来，就会出现一个永久性的危机：在这个危机中，坚定而严密地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将加速兴起并得到发展。

既然不妥协迫使别人前进和行动，它就不是惰性。它不象《新闻报》如此巧妙地暗讽的那样，是出于愚昧无知。它是一项原则性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深知自己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进化的推动者的革命使命，它深知自己作为一种反应试剂的革命使命，这种反应试剂被用来净化资产阶级生产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迫使现代国家彻底完成自己作为封建制度的摧毁者的天然使命，因为在以前的各种社会崩溃之后，这些封建制度至今却仍然存在并阻碍历史的发展。

不妥协是能够把阶级斗争表达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我们拥有的唯一证据是：历史在发展并在创造着坚实的成就，这种成就不是由正题和反题之间的共同协议所捏造出的“不受任何规律制约的”随意的合题，如同被传说中的水与火决定命运一样。

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法则，是所有社会力量之间的自由竞争。商人为夺得市场而竞争，资产阶级集团为夺得政府而竞争，两个阶级为夺得国家而竞争。商人力求在保护性立法的支持下造成垄断。每一个资产阶级集团都想要垄断政府，并且都希望能够独自利用那些不参与争夺政府的阶级的可观力量。不妥协者都是自由贸易者。他们不需要什么大王——不管是糖业大王、钢铁大王还是政府中的什么大王。自由的法则必须无限制地起作用：这是资产阶级活动所固有的东西，是一种化学试剂，它在不断地分解自己的干部队伍，迫使他们进步，并使他们完善起来。强大的盎格鲁

一撒克逊资产阶级干部队伍就是通过自由竞争的你死我活的较量而获得了他们的现代化的生产能力。通过资产阶级社会力量的自由冲突,英国得到了发展并且消除了它的有害的因素;这些资产阶级社会力量最后组成了有历史意义的大党——自由党和保守党。无产阶级从这种冲击中间接地获得了便宜的面包以及由法律和惯例加以保证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权利:集会权、罢工权以及人身安全;而在意大利,人身安全仍然只是幻想中的神话。

阶级斗争并不是幼稚的梦想——它是一种自由决定的行动和社会秩序的内在必然性。用冥顽不灵的幻想家们所炮制的预定的“综合”,来肆无忌惮地阻挡阶级斗争畅通的进程,这是一种幼稚的错误,一种历史性的时间浪费。当今执政的非焦利蒂政党(完全撇开战争的事实,战争是偶发的事故,而且已充分证实了小民族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正在无意识地执行着摧毁乔万尼·焦利蒂的这个军国主义的封建专制国家的任务,而乔万尼·焦利蒂为了把国家变成自己的专政工具想使它永存下去。焦利蒂分子能够感觉到垄断正在从他们的控制中滑走。让他们去行动吧,确实,让他们去斗争吧,让他们呼吁全国来裁判吧。但是不,他们宁肯让无产阶级为他们采取行动,或者更理想的是让社会党的代表来投票表决。

因此,不妥协是一种惰性,不是吗?运动无论如何绝不会仅仅是体力的行动,它也是一种智力的行动。的确,除了被牵引的木偶之外,智力行动总是先于体力行动。如果剥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那么,你还有什么呢?只是一些被牵引的木偶的舞蹈而已!

未署名

载于《人民呼声》报1918年5月18日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1920)》1977年英文版第1卷第38—47页

俄国的乌托邦

政治体制必然是由经济结构、由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决定的。许多人认为通过简单地宣布这个公式，他们就能解决每一个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就能把教训传给左派和右派，肯定地判断事件。例如他们得出结论说，列宁是空想主义者，而不幸的俄国无产阶级是彻底的乌托邦幻想的牺牲品，因此，一次可怕的觉醒不可避免地等待着他们。

真实的情况是，不可能有两种相同的政治体制，正如同不可能有两种相同的经济结构一样。真实的情况是，这个公式决不是对突出明显的自然规律的枯燥的表述。前提（经济结构）和结果（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简单的和直接的；一个民族的历史也不只是由经济事实的文件来证明的。阐明这种因果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要弄清楚它，就要求对每一个智力的和实践的活动进行必要的深入广泛的研究。只有在这些事件已经有了一定的连续性之后，就是说，这些事实发生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可能进行这种研究。一位学者也许能够肯定地说，一个特定的政治体制不会胜利（不会存在于永久不变的基础之上），除非它固定地和实际地依附于一个特定的经济结构——但是，他的话除了是一个一般化的说明外，并无任何价值。何况当事实真正展开时，他又怎么可能知道，将确立怎样一种从属的模式呢？未知的东西比起能够查明和确定的事实来要多得多，这些未知的东西当中的每一件都能够推翻最后的结论。历史不是数学计算；它没有什么十进制，没有服从

于四则运算的等量累进计算，没有分解方程式和开方。数量（经济结构）转化为质量是因为它是人手中的一种行动工具——人的价值不应该仅仅从他们的体重和身長，从他们的肌肉和神经所产生的物理能量上来看，而要从这样的事实来看，即他们具有头脑，他们能受苦、推理、高兴、期望和拒绝。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未知的、变化无常的“人性”要比任何其他事件中的情况更为神秘。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心理，如同其他一般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心理一样，从未被研究过，而且也许不可能研究。革命的成功与否的结局都将为我们提供可靠的文件证明，说明它创造历史的能力。现在，我们别无办法，只能拭目以待。

那些不肯等待而是试图立即作出明确评价的人，有着其他的目的——当前的政治目的。这是说给他们的宣传对象听的。把列宁说成是空想主义者，这不是文化上的事情，也不是历史的评价，这是一个会带来直接后果的政治行动。如此直截了当地说政治体制如何如何，这不是学术上的陈述，而是企图引起一种特殊的心理，以便使这种行动而不是另一种行动得到人们的赞同。

在生活中，没有任何行动不留下后果。相信一种理论而不相信另外一种，这本身就对行动有特殊的影响。甚至一次错误也会在这样的程度上留下它自身的痕迹，即接受这些错误的东西并加以传播能够延迟（当然不是防止）达到目的。

这证明，直接决定政治行动的并不是经济结构，而是解释这种结构及控制其发展的所谓规律的方式。这些规律同自然规律毫无共同之处——即使假定自然规律也没有客观的、真实的存在，而只是我们的智力思维的产物，它们被构思出来以便于进行研究和教学。

事件并不取决于某个个人的愿望，也不取决于甚至为数众多的一群人的愿望。它们取决于极为众多的人民的愿望，这些愿望

通过他们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通过他们的相应的理智态度表现出来。事件还取决于少数人所掌握的与这些愿望有关的知识，取决于少数人在把这些愿望体现于国家权力之中以后，能否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是否因为大多数个人的行动都是事先注定的呢？不，这是因为他们除了维护他们自己身心健康之外别无其他社会目标。因此，事情就是这样：他们适应环境，并且机械地重复某些姿态，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或者他们受到的教育（别人经验的结果），这些姿态本身已经证明同期望的目标即生存相适应。大多数人活动中的这种类似情况，导致了类似的活动效果，因而赋与经济活动以某种结构：出现了法律的概念。只有对更高目标的追求，才能打破这种对环境的适应。如果人类的目标不再只是生存，而是一种特殊标准的生存，那么人们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同时，由于对更高的人类目标进行传播，因而人们成功地改造环境，并建立起一些新的等级制的结构。这些新的结构不同于现存的那些调整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结构。而且随着愈益普遍地达到更高的人类目标，将逐渐地长期取代现存的结构。

* * *

任何人如果把这些虚伪的规律看成是处于个人意志之外的绝对的东西，而不是由于个人的弱点（由于他们未曾组织起来，因而最终不能把握未来）而产生的对周围环境的心理适应，那他就不会看到心理能改变，弱点能变成力量。然而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于是规律（或虚伪的规律）被打破了。单独的个人抛弃了他们孤独的生活，联合到一起了。但是这种联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也只能用绝对规律和常规来说明——如果人们由于愚蠢和偏见，没有立即掌握规律的话，他们就会发布判决书，宣判：乌托邦，空想主义者。

这样一来列宁就成了一个空想主义者。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起直到今天，俄国无产阶级的观点完全是空想主义的，一次急剧的觉醒不可改变地在等待着它。

如果有人把根据西方世界经济和政治活动正常发展的各个阶段构造出来的抽象的一般图式，套用到俄国的历史上，那你就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每一种历史现象都是“个别的”；发展受“自由”的节奏所控制；研究不应该集中在一般的必然性，而应该集中在特殊的必然性上面。对于因果关系变化过程的研究，必须严格限制在俄国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范围之内进行，而不是从一个抽象的和一般的前景来进行。

俄国的一些事件无疑存在着一种必然关系，而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必然关系。战争是一种经济条件，是组织实际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它决定了新国家的发展并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必需；落后的俄国不得不象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这场战争。

工业化社会出现的那种单个个人的集中，在宗法制的俄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无产者要互相认识，组织起来，并对自己的能够用来达到全世界人类目标的阶级力量有所认识的话，这种集中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广阔的农业国家会使单个个人孤立起来，并妨碍产生任何一致的和普遍的认识；这就不可能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单位和具体的阶级意识，而这种阶级意识能向人民指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用这种力量建立长期的合法政权的意志。

这场战争表明了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集中在少数人（国家领导人）手中；而与此相适应的是单个个人最大限度地集中在兵营和战壕里。在战争中，俄国确实是一个乌托邦的国家；由于野蛮侵略者的入侵，这个国家试图进行一场需要技术、组织和精神抵抗的战争——而这一切都只有一个在智力上和物质上被工厂和机器团结

在一起的民族才能做到。这场战争是空想主义的，宗法制的沙皇俄国的崩溃是因为它自己愿意承受一个战争老手的敌人强加给它的疲于奔命。但是由这个专制国家无所不包的权力人为地制造的条件，带来了必然的后果：广大群众（他们在社会上原是孤立的个人）被迫挤在一个狭小的地理范围内，他们之间产生了新的感情和前所未有的人类的团结。他们在过去孤立的状态中愈是感到软弱，在专制制度面前就愈是弯腰屈膝，他们现在的集体力量愈加显露出强大，他们维护这种集体力量并依靠它来建设新社会的意志就愈加大胆顽强。

专制的纪律被清算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单个的人们试图把自己组织起来，但是如何组织呢？他们怎样来维护这种从苦难中成长的人类团结呢？

于是，庸人跑上前来回答道：必须由资产阶级来恢复秩序，因为这种方式是经常发生的——跟随在宗法的和封建的经济后面的，往往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和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这种庸人看不到在事先建立的图式之外还有什么解救办法；他们把历史设想为仅仅是一种要经历固定的和可预知的生长阶段的自然有机体。如果你种下一棵橡子，你肯定能得到一棵橡树苗，你也肯定要等待若干年，橡树才能成长并结出果实。但是历史并不是一棵橡树，而人也不是橡子。

在俄国，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呢？如果资产阶级要进行统治是一条自然规律的话，为什么在这个场合这一规律不起作用呢？

这个特殊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被发现。有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曾试图负起这项责任，但是都被压垮了。难道尽管他们人数不多、无能和软弱，他们也必须取胜，必须负起责任吗？但是这些不幸者要涂上什么样的圣油才能甚至在失败中获得胜利啊？难道历史唯

物主义只是正统主义和神权的再生吗？

任何认为列宁是空想主义者并声称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是空想主义者的尝试的人，不可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通过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来获得文化修养。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已经陷入到《圣经》之中。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空想主义者。

* * *

事实上，乌托邦思想在于不能把历史设想为一种自由的发展，在于把未来看成是事先制作好的商品，在于相信事先制定的计划。乌托邦思想是一种市侩气息，一种被海因里希·海涅嘲笑过的市侩气息。改良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庸人和乌托邦分子，正如同保护贸易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庸人和空想主义者一样。海因里希·冯·特赖施克是德国市侩作风最主要的倡导者（德意志国家崇拜者是他的精神继承人），正如同奥古斯特·孔德和希波尔特·泰纳代表了法国的市侩作风，文钦卓·焦贝蒂^①代表了意大利的品种一样。这是一些鼓吹国家的历史使命，或者相信个人的天职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拿未来作为抵押，并企图把它限制在他们事先确立的图式中的人，是一些不去设想神圣的自由，并且由于事情已经变得如此糟糕而总是为过去呻吟叹息的人。

他们不是把历史设想为自由的发展（自由能量的产生和自由

^① 文钦卓·焦贝蒂（1801—1852），是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的牧师、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1825年当牧师；1831年任都灵大学神学教授；1833年因被指控同革命活动有牵连入狱，不久出狱，后流亡巴黎和布鲁塞尔。他在政治上主张采取温和的非暴力的方法去解决意大利的统一问题，提出在教皇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意大利联邦国家。他的最有影响的政治著作是《论意大利人的道德和公民第一》（1843）。1847年，他返回都灵；1848至1849年，先后担任议长和首相，此后，他移居法国，1852年11月26日在巴黎逝世。——编者

结合)，这种自由的发展与自然界的进化完全不同，就象人与人类的联合同分子与分子的聚集体完全不同一样。他们不了解自由是历史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破除了任何事先确立的图式。社会主义的庸人们贬低和败坏了社会主义学说，而且如果在他们看来有谁不尊重社会主义学说，他们便会莫名其妙地火冒三丈。

* * *

在俄国，自由表现出来的个人的和联合的力量，已经把事先作出的保证和计划所设置的障碍清扫在一边。资产阶级力图确立自己的领导权，但是失败了。于是无产阶级接管了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指导，并正在建立它自己的秩序。我们是说它自己的秩序，而不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不能通过一道魔术的命令召之即来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从一个社会阶段发展到另一个更富有集体价值的阶段。无产阶级正在建立它自己的秩序，它正在建立那些将保证这种发展的自主权并将把它自己的权力置于永久性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

专政能够防止少数派别活动者搞政变，因而是保证自由的基本体制。专政是自由的保证，因为它并不是一种要永远保存的方法，而是一个使永久性机构得以产生和巩固的过渡阶段，专政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将消亡在这些机构之中。

* * *

俄国在革命之后仍然是不自由的，因为这里没有对自由的保证，因为自由还没有被组织起来。

这是制造一个等级制度的问题，但它是公开的，不会进一步强化成为阶级等级和门第等级的问题。

这种等级制度必须有群众位于其底层，有一个单独个人位于其顶端；但是它必须形成一个社会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权威纯粹是精神上的。

这个等级制度的现存核心是苏维埃和人民的政党。苏维埃是有待于联合起来和发展起来的基层组织；正因为布尔什维克主张国家政权应该由苏维埃来支撑和控制，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政府的政党。

这些秩序的要素正在从俄国的混乱当中明确起来；新的秩序已经开始。一种等级制度正在被建立，在它的底层是无组织的苦难的群众，其次是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然后是苏维埃，然后是布尔什维克党，最后是一个人：列宁。这是一种基于威信和信赖之上的等级分类，它是自发形成并通过自由选择保持下来的。

在这种自发性中哪里有什么乌托邦思想呢？乌托邦思想是权力主义，而不是自发性；也就是它竟然已经变成追名逐利的野心，成为门第等级制度，并且声称自己是永存的。自由不是乌托邦，因为它是一种根本的愿望；人类的全部历史是由建立能够保证最大自由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与努力所构成的。

这种等级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发展它自己的逻辑。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封闭的机构；它们不断地同社会溶合成一体。正是在这当中，自由居于统治地位，并且得到保证。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不是特权阶级，而是处于不断发展状态的机构。它们同意识的发展保持一致，并且体现了把俄国社会组织起来的能力。

所有的工人都能参加苏维埃，所有的工人都能为改造苏维埃施加他们的影响，并使苏维埃更接近于同所需要和要求的東西一致起来。现在，俄国政治生活所采取的方向与国家的道德生活，与俄国人民的普遍精神所采取的方向是趋于一致的。在等级制的各级之间存在着不断的运动：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参加选举苏维埃代表的讨论中得到一次提高他自己的机会——他自己可能就是代表。他控制着这些机构，因为他经常检查这些机构并熟悉它们。他有着一种社会责任感，成为一个积极参加决定自己国

家命运的公民。通过这个等级制度的作用，权力和意识从一个人传给许多人：这样一种社会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这是新俄罗斯历史的生命力。从哪些方面看它是乌托邦呢？人们想要付诸实行的甚至是与经济和政治条件格格不入的预先制定的计划又在哪里呢？俄国革命是自由的胜利；组织这样的革命是以自发性为基础，而不是以某个通过暴力自称为“英雄”的命令为基础的。这是一个民族沿着等级制度的路线连续而有系统的提高，并且为自己建立一个接一个新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机构。

但是难道这就不是社会主义吗？……不，这不是那些有着宏伟蓝图的庸人们所给予的那种意义荒诞可笑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着的人类社会。一旦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被组织起来，社会生活将比现在更富于社会主义的内容，社会主义化的进程将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不是在某一特定的日子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一个向着由大多数公民（即无产阶级）组织和控制的自由王国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署名：安·葛·

载于《人民呼声》报1918年7月27日这篇文章前面加上了下列按语：“都灵的审查当局阉割了《呼声》报最后一期的这篇文章，把它缩减成为只是几条不连贯的新闻片段。我们从《前进报》上把它全部重印于此，并附有米兰和罗马审查当局证明，这样，读者可以判断这个标准……（两行被审查删掉）……它规定了都灵新闻记者的活动，而且因为此文与《呼声》报上发表的论俄国革命的其他一些文章密切有关。”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1920）》1977年英文版第1卷第48—55页

共产国际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共产国际诞生了，它与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向前发展。已有三个无产阶级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它的现实的历史基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74年9月12日致左尔格的信中谈到第一国际正处在瓦解的道路上时写道：

“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①

第二国际辜负了恩格斯的希望；但是，现在，当战争已经结束，我们有了俄国的好经验的时候，革命的国际，战无不胜的共产主义的国际具有了明显的雏形。

根据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所制定的下述基本论点是新国际的纲领：

（1）当前的时代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瓦解和崩溃的时代，即使资本主义不会与它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同时消灭，那也是欧洲文明的衰败。

（2）当前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夺取政权就是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

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

(3)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业无产阶级和贫农的专政，它应当是系统地镇压剥削者阶级并对它们进行剥夺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就其类型来说不是作为假仁假义的财政金融寡头政治统治形式的资产阶级假民主制度，而是切实给予劳动群众以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不是议会制度，而是群众通过他们自己选出的机关进行的自治；不是野心勃勃的官僚的政权，而是在群众实际参加国家管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下群众自己创造的行政机关的政权。无产阶级国家的具体形式是苏维埃政权或者与之相似的组织。

(4)无产阶级专政是立即剥夺资本和消灭应当变为全国财产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的工具。使大工业及其组织中心即银行变为公有；没收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变为公有(公有的意思就是取消私有制，私有财产转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建立由工人阶级力量实行的社会主义管理)；建立大规模商业交易的垄断；使城市私人大住宅和农村地主庄园变为公有；实行工人管理，把经济职能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手中——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任务。

(5)为了保证反对国内外敌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保卫，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全国队伍得到支援，必须彻底解除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武装，把一切工人都毫无例外地武装起来。

(6)当前存在的国际形式要求革命无产阶级的各种队伍尽量多接触，并且要求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紧密地联合起来。

(7)斗争的主要方法是无产阶级群众采取直至公开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进行搏斗的行动。

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坚定地转到共产国际

方面。所有工人和农民都了解——尽管往往了解得还不十分清楚——，俄罗斯、乌克兰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使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一切渴求和希望得以实现的新社会的基层组织。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使之免遭世界资本主义进攻的思想会推动群众的革命酝酿过程；在这方面需要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社会党坚毅和同时地协同动作，因为它们有可能制止对苏维埃的任何进攻。西方资本主义要是战胜俄国无产阶级，那就意味着欧洲将会有 20 年左右的时间处于极端残暴无情的反动势力的统治之下。如果由于不惜牺牲而能制止事件得到这样的结局，如果能够加强唯一会使世界得到劳动和正义的基础上的和平的共产国际，那么无论作出多少牺牲也不算过分。

署名：安·葛·

载于《新秩序》1919年5月24日第3
期“国际政治生活”栏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294—296页

工 人 民 主

每一个深刻理解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该阶级中最有觉悟、最能批判地对待现实和最积极的部分——所肩负的历史责任的全部意义的社会主义者面临着以下一个迫切问题。

怎样使战争激发出来的巨大社会力量来接受自己的影响？怎样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并赋予它以政治形式，使它能够正常地得到发展和不断地协调一致，以便最终变成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架？怎样把现时和未来紧密地结合起来，既能满足现时的迫切需要，又能成功地创造这个未来，并“加速”它的到来？

本文的目的在于激发人们思考和行动，号召最优秀的和最有觉悟的工人来考虑这里提出的问题，号召他们——每个人根据自己活动范围内的能力所及——来解决这个问题，使某些同志和某些组织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只有通过共同的齐心协力的解释、说服和相互教育的工作，才能产生具体的创造性的行动。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潜在地寓于对被压迫的劳动者阶级来说具有代表性的机构中。要把这些机构彼此联系起来、协调一致并共同隶属于一个统一的具有层次的体制，在保持（在必要的程度上）这些机构的自主性和特点的基础上把它们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需要在今天立即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这种民主应与资产阶级国家坚决地和有效地相抗衡，并立即准备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履行和掌握与管理国民财富有关的一切主要职能。

目前，工人运动是由社会党和劳工联合会领导的，但是社会党和劳工联合会对广大劳动者群众的影响是党的威信、群众的热情、权势的压力、有时甚至是习惯势力等间接因素的结果。党的影响在与日俱增；它的影响已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最底层，使迄今站在政治斗争以外的那些居民阶层也产生同情和为共产主义胜利贡献一切力量的意愿。必须使这些杂乱无章的力量具有固定的形式和组织性，加以控制、整顿和加强，把工人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变成有组织的团体，以便使它今后不断得到发展，取得知识和经验，并意识到准备夺取国家政权的各阶级所要解决的那些任务的全部责任。

社会党和工会只是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才得以掌握整个工人阶级的。他们还不能立即把自己与无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事实上，在共产主义共和国中，它们将作为动力（政党），或者作为监督机构，或者部分地作为管理机构（工会）而继续独立地存在。党应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机构，是信念的源泉，是〔共产主义〕学说的维护者，是协调和引导工农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力量达到目的的最高权力机关。正因为有必要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这一职责，党不能敞开大门，让那些责任心和纪律性还不够高的拥护者大量地涌入党内。

但是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是通过许多机构进行的，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机构和各种不同的活动方式必须加以发展，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联合成一个广泛的和有其分支机构的体系，使整个工人阶级都包罗在内并使它具有纪律性。

工厂企业和它的“内部委员会”、社会党的基层支部、农民公社，是劳动者必须其中直接进行活动的生活中心。

“内部工厂委员会”是工人民主的机构，这个机构必须摆脱企

业主强加于它的限制，必须注入新的生气和新的活力。今天，“内部工厂委员会”约束着资本家在企业中的专横，起着仲裁机构和惩戒机构的作用。明天，当它发展起来并履行新的职能时，则将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机构，以便在执行企业的技术领导和行政管理的一切有效职能方面代替资本家。

目前，工人们应当着手在“企业的全部权力归工厂委员会”的口号下，把最优秀的和最有觉悟的同志选进广泛的代表机构之中，“企业的全部权力归工厂委员会”这个口号应当同另一个口号，即“国家的全部权力归工人和农民”的口号结合起来。

这样，在组织成政党和区组织的共产党人面前就会呈现出开展具体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基层支部在与城市分部协同行动时，应对该地区工人的力量进行估计，而他们的所在地应成为区的工厂代表委员会（区的无产阶级力量集中的中心）从事活动的经常场所。选举制度是可以根据企业的规模加以改变的，但是，必须使该行业的每 15 个工人选出一名代表（象英国的工厂那样），以便通过多级选举的办法最终成立工厂代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包括企业的所有工作人员（工人、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代表。最好在区委员会中还包括生活在该区其他行业的代表：餐厅和咖啡馆的服务人员、马车工人、电车工人、铁路员工、街道清洁员、私人服务人员、店员等。

参加区委员会的应当有该区的所有劳动者阶层的代表，它应当是法定的和权威性的机构；它应当拥有人们自愿托付给它的权力，成为迫使人们服从纪律，能够命令立即和完全停止整个区内各项工作的机构。

区委员会将扩展并变成由社会党和职业联合会领导和监督的市委员会。

这种工人民主制度（同相应的农民组织有机地联系着的制度）将是组织群众的经常形式，将使群众具有纪律性，并成为培养政治经验和行政经验的最好学校，吸引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活动，使他们成为坚强不屈的人，把自己看作是战场上的一支大军，而如果不愿被打败和沦为奴隶的话，这支大军就应当紧密地团结起来。

每个企业将是这支大军的一个或几个团队，这个团队有自己的下级指挥人员，有自己的联络网点，有自己的军官，有自己在自由选举基础上产生并拥有权力的、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于它的司令部。

只有通过召开工厂的群众大会对最有觉悟的分子进行经常宣传和说服教育的办法，才能根本改变工人们的心里，才能使工人群众成为训练有素和能够执掌政权的人，发扬和加强同志和劳动者的责任感和权力意识，发扬和加强这种具体而有效的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是通过生动的历史经验自发地产生的。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初步的设想只是为了激发人们思考和行动。问题的每一个方面都要求作出详尽和深刻的分析、解释、补充和协调。但是，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践，通过有效地影响群众的意识，使他们彼此接近并激发他们的真正热情的共同讨论，才能具体和全面地解决这些社会主义生活的问题。说真话，共同探求真理——这就是为共产主义和革命而工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不再应当只是一种公式，不再应当只是炫耀革命词句的一种借口。谁接受目的，谁就应该接受手段。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新的国家的建立，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的建立；其中体现着被压迫阶级社会活动的经验，而工人和农民阶级的社会生活将成为广泛流行的和组织上牢固的制度。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魔棒一挥就出现的。俄国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在8个月过程中推行和实现了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而苏维埃从 1905 年起早就为俄国工人所周知。意大利共产党人应当利用俄国的宝贵经验，并珍惜时间和精力。国家的改革要求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以致每日每时和每个步骤都应当致力于这项工作。

未署名

本文由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合写载于
《新秩序》1919 年 6 月 21 日第 7 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 年俄文版
第 1 卷第 28—32 页

夺 取 国 家

受生产方式制约的资本主义积聚，相应地引起劳动群众的积聚。这里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革命原理的根源，找到产生无产阶级新的生活方式，即旨在取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由自由竞争、阶级斗争产生的资本主义混乱的共产主义新秩序的原因。

劳动者由于处在总的资本主义的活动范围之内，因此他们也是在自由竞争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市民个体。但是，对于所有人来说斗争的起始条件是不同的：私有制的存在使少数人处于特权地位，使斗争力量悬殊。劳动者不断遭到生存的威胁；他们的生命本身，他们的文化生活，他们家属的生活和未来常常处于危险的境地，由劳动市场上的出其不意的变化和波动来决定。正因为如此，工人总希望摆脱竞争和个人主义的樊篱。联合和团结的愿望成为劳动者阶级的特性，改变着工人和农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于是出现了体现这种愿望的机构和组织；在这些机构和组织的基础上开始了历史性发展的过程，导致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

团结的愿望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极重要因素。社会党和工会正是作为这一历史倾向在前一个时期（可以称为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时期或积聚力量的时期）的产物而出现并发展壮大的。

当然，这些无产阶级组织和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不是由于劳动者阶级的生活和历史经验所固有的某种特殊内部规律而发生的。历史的规律是由组织成为国家的私有者阶级提示的。国家常常是历史的主要角色，因为在国家机构中集中了

私有者阶级的力量。尽管存在由于竞争而引起的纷争和冲突，私有者阶级能够组织起国家，建立单一的联合体，以便在竞争的最高阶段——在争取政权，争取领导社会的统治作用，争取使社会服从自己的意志的阶级斗争中维护自己的特权，使之不受侵犯。

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运动无非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从属现象。无产阶级组织在不是内部规律而是外部规律的影响下，在由资本主义竞争所产生的环境和强制手段的巨大压力下，应当具有一定的形式。在迄今以前的整个时期里，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来说具有代表性的并导致第二国际破产的内部冲突、各种倾向、动摇和妥协，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某些派别毫无保留地认为工人工会组织是革命的基本因素，并把自己的宣传和活动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似乎认为工团主义运动正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解释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工团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具有目前这种形式和执行目前这种职能的工会看作是劳动者联合的一种永久的、不变的形式。其实，这种形式和这些职能是由外部强加于它的，因此不可能具有经常不变的和事先预定的发展路线。工团主义把自己描绘成“自发性”自由主义^①传统的创始者，实际上它是抽象的雅各宾主义的变种之一。

工团主义派别的错误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它在对劳动者进行革命教育方面不能代替社会党。工人和农民意识到，从历史规律由私有者阶级和议会制民主国家来提示的整个时期来说，任何要想摆脱这些规律的作用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和可笑的；当然，在工业生产发达的社会所具有的那种具体形式下，每个人积极参与生

① 自由主义在这里是指劳动和资本之间的自由竞争的拥护者。

活并对环境发生影响的程度，是以他作为市民个体，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一员而进行活动为限度的。自由主义的经验没有白白失效，在没有被用尽以前它可能还要大显身手。不参与政治者的不问政治无非是政治的变种：否定国家和反对国家的斗争也同样是一种政治行为，就象参加国家机关、议会和市政当局在一定范围内安排的总的历史活动一样。只是这种行为的性质有所不同：工团主义者是在完全脱离现实的情况下从事活动的，因此他们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社会党议会主义者则是在同现实紧密联系的情况下从事活动的；他们可能犯错误（并且已经犯过许多重大错误），但是他们的错误不涉及他们活动的方向，因此他们在这场“竞争”中占了上风。广大群众团结在社会党的周围，他们的参与客观上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尽管党犯有各种错误和失策，但它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使过去微不足道的无产者成为举足轻重的人，使他们有了觉悟，使解放运动有了正确的和朝气蓬勃的方向，这个方向基本上是符合人类社会发 展过程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错误曾经具有与工团主义运动的错误同样的性质。社会主义者在参加人类社会的整个国家活动时，曾经忘记了他们应当主要是站在批判、对抗的立场上，他们让现实来吞没自己，而不是让它来服从自己。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应当具备这样的心理，这种心理可以称为“接生艺术”^①。他们的行动不是随事变进程的摆布、受资产阶级竞争规律控制的优柔寡断的运动，而是从可以预见的发展前景出发的批判。历史是不断地形成的，因此它在根本上是不可预见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一切”都是不可预见的，也就是说在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都是随意性和意外性。历史既是自由，同时也是必然。一些机构（历史体现在它的发展和活动中）出现并且保留下

^① “接生艺术”源出希腊语。苏格拉底曾用这个术语来表述自己的研究和学习的方式，即对话方式，通过证实和反驳，通过引起的问题来发现或阐明真理。

来，因为它的任务就是付诸实现。人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精神活动的一定的客观条件形成了，并得到广泛的发展。如果这些客观条件（这些条件由于其物质本性几乎只能是物质地确定的）改变，那么调节和决定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关系的总和也随之改变，人们的觉悟程度也有所改变，社会制度形成了，传统的机构则衰落下去，不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任务，并变成有害的障碍。假如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的智慧不能掌握节奏，不能确定过程的实质，那么文明的发展就成为不可能。政治上的天才人物正是根据这种掌握尽可能大量具体征兆以便确定过程实质的能力来加以鉴别的，也就是说根据预见最近和遥远的未来并借助这种预见来制定国家活动的方向、承担对人民命运的责任的才能来加以鉴别的。在这方面，卡尔·马克思大大超越了现时最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社会党人充分认识（常常甚至奴颜婢膝地）作为资本主义主动精神的产物的历史现实。他们陷入了自由派经济学家们的心理错误：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设施是永恒的，相信这些设施基本上是完美无缺的。在他们看来，这些民主设施的形式可能作某些改变，某些方面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基本上它应当是不变的。这种狭隘眼界和虚荣心的典范就是菲利浦·屠拉梯^①的武断说法，他

^① 菲利浦·屠拉梯（1857—1932），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意大利社会党创建人之一。早年在米兰当过律师、编辑和新闻记者。1890年创办《社会评论》双月刊，这份杂志当时成了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喉舌。1893年代表意大利社会党出席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1896至1926年为众议员，社会党议会党团领袖。他在政治上主张放弃革命策略，采取通过议会道路逐渐夺取政权的策略。1915年，他反对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认为如果国家受到攻击，社会党人必须奋起保卫祖国。1919年反对意大利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1922年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后，他成为改良主义的统一社会党的领袖。1926年12月，法西斯政权大批逮捕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时，他流亡法国。1932年3月29日在巴黎逝世。著有《犯罪和社会问题》（1883）等书。——编者

认为议会同苏维埃相比就好象城市和野蛮的部落一样。

与历史发展的这种虚假观念、以往的妥协实践和“议会痴”策略相反，出现了目前“夺取国家”的公式。

根据俄国、匈牙利和德国革命的经验，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体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施，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历史上的崭新的现象，那么无论如何同上述设施比较起来也是崭新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施是为了自由竞争的目的而建立的；不必“更换人马”，就可以改变这些设施的活动方向。社会主义国家还不是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还不是确立在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实践和秩序，它是过渡型的国家；它的任务是通过废除私有制、阶级、经济的民族界限来消灭竞争。这个任务不可能用议会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夺取国家”的公式应当理解为：在无产阶级集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国家，以代替议会制民主国家。

这里我们应当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来。我们说过，在迄今以前的时期，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所建立的机构不是孤立地发展的，而是直接有赖于资本主义最高法则所控制的社会化总形势。战争根本地改变了阶级斗争的战略条件。资本家不再是无所不能的了；他们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他们的独占权力被摧毁了。资本的积聚达到了顶峰，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在世界范围内实行了垄断化。与此相应的工人群众的积聚给革命无产阶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工人运动的旧机构在革命活动如此蓬勃发展的条件下显得不够有效。它的形式本身对于领导已经纳入自觉革命过程的力量来说已不中用了。但是它还没有完全过时。它作为自由竞争的产物必须继续存在到竞争的最后残余消灭为止，存在到阶级和政党完全消灭——民族的无产阶级专政溶合到共产国际中来为止。但与此同时，新型国家的设施必须产生和发展，以便取代议会制民主国

家的私有的和公有的设施。这些设施必须代替资本家来执行行政职能和对生产的控制，保证企业中生产的自治；它必须执行生产和交换的复杂关系体制所固有的一切职能，把企业的个别车间联合成一个基本的基层经济单位，把农业的各个不同部门联合起来，通过合并和并列从属的办法形成民族和国际经济的严格体制，以摆脱私有者寄生性压迫的束缚。

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潮还从未达到如此巨大的地步。但是我们认为，明确地意识到目的还不一定同时明确地意识到为达到这一目的目前所要采取的手段。群众已经确信，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体现在工农兵苏维埃体制中，然而还没有制定客观地保证建立这个国家的策略观念。因此，目前就必须建立已经牢固地进入群众意识之中的无产阶级机构网，这些机构网应始终能保证广大群众的纪律和忠心，保证给团结一致的工人和农民提供充满活力和富有发展前途的组织形式。显然，如果群众运动目前具有革命性质，处于无产阶级组织的当前水平，那么其结果只能是民主国家的活动有某些形式上的改善，例如扩大议院权力（通过成立大会）或允许具有反共情绪的社会党人糊涂虫入阁。从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中应得出某些教训。民主国家和资本家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资本主义主要是依赖为它效劳的叛徒和走卒，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这样的人还没有绝迹。

无产阶级国家是不能魔棒一挥就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和准备工作的过程，例如将现时的机构体制化并进行宣传。必须大力发展工厂里现有的无产阶级机构，赋予它们更大的权力，并在农村建立这类机构，以便使参加这些机构的人成为意识到这些机构所面临的革命任务的共产主义者。否则，工人群众的任何热情，他们对革命事业的任何忠心都不能阻止事变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以致把革命归结为建立一个新的由一些骗子、饶舌者和不负

责任的人组成的可怜的议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建立无产者的国家，就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惨痛牺牲。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19年7月12日第
9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33—39页

工人和农民

在战争期间和为了战争的需要，意大利国家承担了调节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职能。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工业和商业托拉斯，这是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积聚的一种形式，造成了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剥削条件的均等，从而引起了这些群众的革命行动。假如不考虑到这些现象和由此产生的心理后果，那就不能理解目前这个时期的本质。

在资本主义还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城乡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农业方面，保留着纯粹的封建经济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心理状态。现代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念在这里还没有广泛地为人们所了解，经济和政治设施还没有被看作是历史范畴（这些范畴有其初始阶段，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当它为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更高形式创造条件之后将会消失），而被看作是自然的、永久的和不变的范畴。实际上，大土地占有制不在自由竞争之列，现代国家关切地保护着它的封建实质，制定了法律准则（类似转分遗产），这些准则实际上保留着封建制度所固有的权利和特权。因此，农民的心理依旧象农奴的心理一样，在一定条件下会愤怒地起来反抗“地主”，但不会把自己看作是集体（即私有者所理解的民族，无产者所理解的阶级）的一员，不会采取系统的和经常的行动来改变共同生活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农民的心理是不确定的，他们的真实感情是复

杂的、朦胧的，蕴含着为免遭剥削而养成的纯粹利己主义的、丧失逻辑连贯性的行为体系；这种行为的重要因素是性格的内向和虚假的逢迎。阶级斗争同匪徒行为、敲诈勒索，同焚烧森林、追赶牲口、拐骗妻儿、袭击市政机关等交织在一起，这是原始恐怖的一种形式，不会引起长久的和严重的后果。由此可见，农民的心理客观上可以归结为以社会条件为转移的、由议会制民主国家所产生的某些基本感情：农民完全受制于地主、雇佣者和卖身求荣的政府官员；农民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生命不受自然灾害的侵袭，不受土地占有者和政府官员的滥用职权和残暴行为的侵犯。农民一直是生活在法制之外，没有法人的地位，不被看作是人。农民一直是无政府主义分子，是混乱中的一小分子。只有一样东西能制服他，那就是他害怕宪兵和魔鬼。他不知道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纪律。农民在自己的日常劳动中任劳任怨、顽强不屈，一心指望从大自然的恩赐中得到一点果实，为了自己的家庭能够忍受空前的牺牲，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得极不耐烦和极其残忍，不能为自己规划最终的目标，不能通过经常的斗争来争取达到这个目标。

在战壕中度过的4年、无数的流血牺牲根本地改变了农民的心理。这种变化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俄国，并成为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工业发展的正常过程所做不到事情，战争却做到了。战争迫使资本主义不甚发达，也就是说技术装备较差的国家动员所有适合于服役的男子充当炮灰来与中央帝国的军事威力相抗衡。对于俄国来说，战争意味着把分散在广大国土上的人们联合起来，意味着把那些直接遭受苦难和生命危险的、屈服于同样一种残暴纪律的人们在多年的过程中不断地聚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此长期的集体生活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包含着难以预料的后果。

个人的利己主义的本能削弱了，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心理、共同

的感情；农民们养成了遵守社会纪律的习惯，开始领悟到国家的诸多伟大、无限力量及其体制的全部复杂性。他们开始把世界不是看作象宇宙那样无限广阔的庞然大物，也不是看作象农村钟楼那样无比狭窄的渺小天地，而是看作由一些具体邦国和民族构成的具有社会生活的长处和短处、军队和机器、贫困和富裕的综合体。建立了团结一致的联系，不然这种联系只有经过几十年历史经验的积累之后，只有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才能建立起来。在4年的苦难和流血中，在战壕中出现了新的精神世界，它迫切需要在社会的不断完善的组织和机构中表现出来。

就这样，在俄国的战场上出现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就这样，农民—士兵们得以积极地参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俄国其他工业中心城市的苏维埃的生活，获得了劳动者必须团结一致的意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正是由于俄国的军队复员，士兵们回到了故乡。俄罗斯帝国的整个领土上，从维斯拉河到太平洋布满了地方苏维埃网——这是作为俄罗斯国家改组基础的基层机构。从工业城市开展起来的共产主义宣传是建立在这种新的心理的基础上的，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自由选举的和由革命集体生活经验检验的新的社会体制。

意大利生活的历史条件过去和现在都很少同俄国人有所差别。无论在俄国，无论在意大利，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团结问题都同样地存在着。这种团结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在工人和农民共同战壕生活中养成的新的心理的基础上产生。

意大利农业经营的方式应当加以根本的改变，以便使它能够摆脱战争引起的危机。牲畜头数的减少要求采用机器，迅速地过渡到用工业方式经营农业，建立有可能使用高效率的技术手段的大型农业企业。但是这种改造不可能平安地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而只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在符合联合成共产主义生产单位的

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在生产中采用机器常常会引起失业的深刻危机，这个危机只有通过劳动的需求的增长逐渐地加以解决。目前，劳动市场上的条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农业中的失业现象由于实际上不可能输出而开始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而农业的工业化只有征得贫苦农民的同意，在由产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苏维埃所体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可能进行。

产业工人和贫苦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对于他们来说，共产主义乃是头等的需要，因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生命和自由，而保存私有制则是受压迫和丧失一切以至生命的经常性威胁。他们是象岩石一样不可摧毁的坚强力量，他们所体现的是不会衰退的革命热情，不满足于妥协，不获最终胜利誓不罢休、在暂时和局部失利时决不灰心丧气、不迷恋于点滴成就的钢铁般决心。他们是革命的主要骨干，是无产阶级进攻部队的钢铁营，这个营将以不可阻挡的攻击力扫除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或者由准备作出忘我努力和无数牺牲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顽强不屈的围攻来逐渐地加以摧毁。共产主义——这是他们的文明，是他们借以获得真正的个性和尊严、真正的文化并使自己成为进步和美的创造者的历史体系。

全部革命工作只有建立在群众的生活条件、他们的文化水平所确定的要求的基础上才能指望取得成功。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应当理解这一点。他们还应当懂得，多么需要把革命的这股不可摧毁的力量纳入适应群众心理的形式之中。

在战前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下，群众性的农民组织是不可能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农民们在这些组织中将受到在资本主义崩溃后改组国家所必要的阶级斗争和日常纪律的教育。

假如把所有的人都纳入新的集体生活的机构之中，假如这些机构的活动能够使成果得以巩固，使经验得以发扬和丰富，并自觉

地用来达到具体的历史目标，那么在战争年代中所得到的群众的精神成长，士兵们在肮脏的战壕里并肩度过的4年流血战争中所得到的对共产主义运动有益的经验就不致归于徒然。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农民将成为秩序和进步的因素。不然的话，如果他们有可能开展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活动，那么他们就会变成无秩序的乌合之众，就会被前所未有的和愈来愈可怕的苦难弄到极其悲惨的境地。

对于共产主义革命来说，首要的是组织和纪律。在意大利生活的目前客观条件下，革命的主要中心是工业城市及其密集的和单一的工厂工人群众。因此，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厂，即产生直接工业生产领域中阶级斗争新形式的新的生活上。但是，光靠一两个工厂工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那样的话，革命就不能巩固地和普遍地得以取胜。必须使城市和农村团结起来，在农村建立贫苦农民的组织，以便使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创立和发展中有所依靠，并通过这些组织得以采用机器，保证农业改造的宏伟过程。在意大利，做这件事要比人们设想的困难少一些。在战争期间，城市企业里来了大批农村居民。在他们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很快收到了成效。这批人应是城市和农村之间联系的纽带，应利用他们来进行日常的宣传，以便消除农民的不信任和怨恨心理。应当利用到工厂里来的这些人，依靠他们对农民心理的了解和农村对他们的信任，开始进行建立和巩固新的机构的工作，以便把广大农民群众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19年8月2日第
12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44—49页

革命的发展

共产国际的基本提纲可以简短地表述如下：

1. 1914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是当代历史发展中的严酷的时期，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灾变。

2.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人类不至于被绝望和失去理智的私有者阶级推入野蛮和经济崩溃的深渊。工人们只有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以便在政治上和工业上建立自己的专政，才能做到这一点。

3. 无产阶级革命是强加于工人阶级的，而不是它自愿选择的。战争导致为满足整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日常需要所必需的经济资源的耗竭，它导致国际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导致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对世界各国的殖民掠夺，导致私有者阶级的政治力量集中在民族的范围內。摆脱这种现状的出路何在呢？这或者是工人阶级借助自身固有的方式和方法夺取社会权力，以便制止文明世界的解体过程并为新秩序奠定基础，使社会得以恢复自己的有效活动并有力地、迅速地实现向新的、更加完善的生产和集体生活方式跃进；或者是使大部分劳动者死于饥饿和衰竭；或者是居民的经常性的毁灭——一直到在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规模和大批消费者之间确立应有的关系为止。

加入共产国际也就是确信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即确信赋予无产阶级运动以最合适的形式和方向的必要性，以便使无产阶级政治体制成为工人和农民群众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正常的和

必要的阶段。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活动和力量”与1892年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意大利社会党纲领所说的不同，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展：

1.工人和农民按生产原则(工厂、农业企业、农村、城市、地区、国家)组织起来，目的是使群众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学会自我管理。

2.共产党人开展经常性的和系统的宣传，目的是使这些无产阶级组织迅速地取得领导地位，并通过联合和集中的途径把它变为新型的国家(工农委员会国家)，在取消资产阶级经济政治体制以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理应列入1892年纲领中的极重要的新原理是俄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的劳动群众在实现革命改造的尝试中积累的具体经验的总结。应当把这些原理看作是世界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们已经将这些原理不是作为一般政治形势(如战事失利等等)影响的结果，而是作为在本国内，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的正常发展的结果而开始付诸实现的。

国际工人运动的具体革命经验可以表述如下：

1.应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消灭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后，正在成为劳动者阶级——工人和农民组织的最紧张活动的因素。

2.工人阶级的现时的组织体制——按职业的联合(工会)、按行业的联合(工会联合会)、按地区的联合(劳动协会和劳工总同盟)，即为了调节劳动市场上的竞争而出现的体制，因其实质上具有“竞争”的性质，对于共产主义的生产管理来说是不中用的，因此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按职业的联合对于维护劳动

者的利益来说是有效的工具，因为它可以限制资本家的暴虐和专横，当事情涉及到劳动日的长短和工资的数量时可以使他们承认被压迫者的权利。它将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里执行自己的这些任务，作为关心技术性质的问题、调整各等级劳动者利益的冲突并在一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确立统一的共产主义劳动报酬的平均标准的组织而发挥作用。

3.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权力和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劳动者组织只可能是委员会体制，它按劳动地点选举出来，完全适应工业和农业生产的过程，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进行协调，以保证劳动者的团结一致，尽管由于分工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等级。

这类联合的原则目前已在劳动协会和劳工总同盟内采用，但是在这些组织内还没有达到群众的真正的团结一致，因为归根到底群众同中央机关、同领导人物的联系是不经常的和系统的。在企业里，这种联系将是有效的和经常的，因为在那里联系将受到和谐的和无所不包的生产过程体制的直接制约，因为联系将建立在生产者的创造积极性的基础上，这种创造积极性使他们的愿望、利益和感情接近起来。

4. 只有通过这种类型的组织才能有助于生产单位意识到自己从事生产和实现主权（主权应是一种生产职能）的能力，而越过资本家并且不把权力转交给任何人；才能有助于生产者意识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他们的有组织的集体可以在物质资料的整个生产过程中，也就是说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代替私有者或雇佣者。

5. 生产单位应联合成为按地方利益一致的原则或按省、地区、国家范围内行业的原则互相联系的最高组织，形成委员会体制。由相互关系的紧密网而彼此联系的、以关心维护劳动过程中出现的权利和利益为基础的生产集体代替个别的私有者，将导致竞争和虚假自由的消灭，将为建立共产主义的自由和文明奠定基础。

6. 紧密地联合成生产集体的劳动者将根据生产和交换关系所内在固有的原则和规律，自动地和必然地提出权力的要求。中等无产者的心理将迅速地摆脱神秘的、乌托邦的、宗教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一切特性；它将迅速而牢固地变成共产主义的心理，成为革命热情、争取在劳动中的铁的纪律而顽强斗争以及反抗那些明显的和隐蔽的旧残余的源泉。

7. 共产党在劳动界不可能有竞争对手。在阶级斗争的现阶段，纷纷出现伪革命的党派：基督教社会党人（他们在农民群众中容易取得威信）、“真正的”社会党人（过去的战士、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所有标新立异的不安分的人）、“自由的”个人主义者（一些吵吵嚷嚷的分子，追求虚荣、举止狂妄和图谋不良的人）。这些党派控制街头，用空洞的和东拉西扯的、不能兑现的和不负责任的允诺在选举地点进行自我标榜，他们用最卑劣的本能愚弄人民，以盲目的利己主义欺骗人们。一旦劳动者有机会不是在喧嚣和混乱的议会场上，而是在工人集体中间，在今天他们还是奴隶、明天就要成为主人的机器中间表达自己的意志时，这些党派在他们中间就不可能有任何威望。

8. 革命不是出奇制胜的行动，而是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在某个生产单位出现的每一个产业工人或农业工人的委员会都是这一发展的出发点，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步骤。促使工农委员会的产生，促使委员会在数量上的发展，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有机的隶属关系，直到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建立统一的委员会体制，开展紧张的宣传以争取在委员会中的多数——这就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根据广大劳动者群众的创议而蓬勃发展新的政权机构，导致两个阶级的剧烈冲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假如在生产生活中没有为革命过程奠定基础，那么革命将是毫无成果的号召、渺茫的神话、不足信的幻景，而混乱、崩溃、失业、饥饿将吞

噬和毁灭最优秀的和最有才能的无产阶级力量。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19年9月13日第
18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49—54页

都灵省的政治斗争^①

——焦利蒂派的内幕

必须克制目前在焦利蒂派和法西斯分子之间进行的争论所引起的厌恶情绪，既然“胜利同盟”是个地地道道的腐败根源，谈一谈“自由主义”的名单，支持这个名单的报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单，那会是适当的。首先，没有经验的人可能想到这样的问题：我国资产阶级中普遍存在着怎样的变质和迅速腐化的过程，为何资产阶级有如此令人厌恶的表现？这个阶级是秩序的维护者，是国家必需的无数“安抚手段”的拥有者，它已习惯于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仪表礼貌准则，它是在许多年代中，当它在政治舞台上占据垄断地位，破坏仪表礼貌准则，开始很不客气，以至在这方面打破纪录的时候学会遵守这些准则的。这就是说，已经到了“丘必特要害人……”这个谚语开始证实的时候了。当然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有其特点，那就是有瓦解的征兆，这种瓦解不是个别地方的现象，也不是暂时的现象；它遍及整个阶级，破坏其统一，结束其历史使命和历史上有益的作用。不过也有可能，目前互相争夺政权的资产阶级各集团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公众的天真、人民的健忘上面，就会表现得更稳重得多。

假使他们更深入地在自己的听众和读者之中觉察到那些能够分析事实和论据（只要十分粗浅的分析就够了）、经常把现在和过

^① 介绍1915—1918年战争以后最初举行的议会选举。

去联系起来、以便加以比较、借以吸取对将来的教训的人，他们无疑会更多地表现出羞耻之心，这种羞耻之心便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使他们有所克制。即便意大利人民在记忆方面加倍地具有任何其他民族的一切缺点（他们至少打算使统治阶级成为这样的），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他们也过分重视了时间的因素，好象时间是块海绵，它完全可以用来擦掉那些以后可能象法官席的阴影一样成为惊慌不安的根源的遗迹。

在整个这一时期内《新闻报》所从事的运动便是这种无耻地把希望寄托在意大利人缺点上面（靠他们的特点苟且偷生）的做法的特殊后果。

《新闻报》在自己进行复杂而巧妙的活动过程中了解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总结，以唯心主义的精神加以解释，以适应“善良的皮埃蒙特人”的需要，这样是多么有利。它尽更大的努力来美化其战争期间的活动，把其活动归结为遵守某些原则，或者正确些说，归结为遵守政治方面美好行为的准则，它认为这种准则有着可惜还没有列入“神圣的团结一致”药典的神奇效力，即能够拯救意大利，使之免于罹难的效力。

在《新闻报》上有一个不断编造神话的过程：该报知道，它的读者需要形象的和象征的政治……它到现在为止所利用的全部思想和全部语言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用在许多以某些著名箴言（在从政治上教育焦利蒂执政时期的未来公民方面是不可或缺的）装饰起来的告示上。

首先我们面临的是“健康、强壮和忠诚的皮埃蒙特”，它在原则上、根据合乎情理的考虑，赞成中立，它参加战争并不是因为它是战争的拥护者，而是因为崇高的责任感促使它参加的，这同空谈家和唯利是图者的伦巴第完全相反（就让《晚邮报》生一頓气吧）。

这种地方色彩的趋势是毫无疑问的，即便把这种趋势看作对某种兽性的仇恨（这种仇恨是某种军官看待战争初期应召入伍的“皮埃蒙特人”时采取公开蔑视和怀疑的态度的原因）的反应，那么这也是《新闻报》所进行的运动的最可恶的方面之一。显然，所有这一切从来也没有在报纸上采取直接的、公开的形式，而满足我们皮埃蒙特人过分自尊的心理，就同时会出现夸大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关于沉默而坚定的英雄主义的“神话”这个现象。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皮埃蒙特，我们认为，它也象意大利其他省一样，根据情况进行了战争并利用了战争，我们拒绝对这类新说法采取赞赏态度。

其次，“模范的”大国务活动家乔万尼·焦利蒂被赞扬过分，这个人掌握了意大利的幸福，但是由于纯偶然的因素，他象神奇的马廷诺一样未能保持住这种幸福。于是，他便陷于鄙视的沉默之中，象新出世在格福西曼花园中的耶稣一样，流出血腥的眼泪，而现在，他经历过了他必须带上“保卫祖国”的事业所强加的铁一般的纪律和严格统一等光荣枷锁的时期，而后，他又登上舞台，要求承认他有权宣称自己是爱国主义者，希望在选举之后会宣称他是“祖国救星”。这个模范的大国务活动家有一个模范的、“经典的”、有些类似尼木法·爱海利亚^①的先驱者，这个先驱者能够在桑廷那——卡米洛·加富尔古堡中激起爱海利亚的精神。

最后，下一步当前应解决的问题是“模范的”政治：如在维护秩序之下的民主，国内的需要和国际政治的要求之间的正确关系，努力和目标同现有手段的完全适合，在改革方面的最大勇敢精神，一切阶级的团结一致，如此等等。因为在意大利没有发现过有关这

^① 尼木法·爱海利亚，根据神话，是第二任罗马皇帝努马·庞皮利的女谋士。任国务活动家的谋士的人被讽刺地称为尼木法·爱海利亚。

种政治的“神话”，议员弗兰凯蒂^①便以异乎寻常的顽强精神在其他国家去寻找；在英国，因为自由主义有些衰败，他便在工联主义运动中寻找这种神话；在德国，他在多数是莫逆之交的社会党人那里寻找；在意大利，除了钟情于劳工总同盟，徒然希望有一天最大的工人组织在坚决同革命的社会主义决裂之后重新热中于改良主义的时代，重新向乔万尼·焦利蒂调情以外，他是什么也没有了。

报纸所描绘的情景在某些地方由于明暗光线的闪耀而鲜明起来，不过，我们暂时无须乎深入谈这个题目。也许（甚至确定无疑），描绘得如此理想化的人物和（我们将称谓的）纲领能够有魅力，成为灯塔，因而在资产阶级瓦解的混乱状态中对之寄以希望是很适宜的，然而，我们否认这些“神话”之中包含着现实，否认《新闻报》有权为尊敬他们而表示任何崇拜。

《新闻报》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其原因很简单：它在4年的战争期间一直是在“祖国秩序”、国家纪律的可靠保护之下，因而避开了甚至把最坚强的人也可以毁灭的风暴，避开了把锻炼成的铁石心肠也折磨得难以忍受的熔炉。它反对那些为了行善而作恶的人……这些人本想作恶，但由于各种不利情况凑在一起，由于法西斯的阴谋而未能作成。它的一切功绩正象乔万尼·焦利蒂的功绩一样，都是相对的。这些功绩愈具有反作用，力量也就愈大。它们象是巨大的、经常改变轮廓的阴影，沿着我国在这些苦难年代所经历过的道路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么，如何检查所吹嘘的药方能否治病呢？

假使乔万尼·焦利蒂仍然执政……尽管我们是理想家，我们

① 列奥波尔多·弗兰凯蒂(1847—1917)，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地主。他主张以扩张殖民地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1882至1909年任众议员，后被任命为参议员。1917年意军在卡波雷托惨败，他感到失望于同年11月4日自杀身亡。——编者。

认为在这种场合也应当遵循……实证的经验，拒绝在对人和制度作出评价就等于在发给信用期票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评价。何况，我们还记得，我们在战前几年中已经有了如象焦利蒂在特别适于进行对比的形势下进行活动的那种范例——这就是利比亚战争。

我们并不过分热衷于比较研究法，我们可以说出以下的结论而丝毫不必担心被驳倒：

(1) 在利比亚战争期间也有过象现在战争时期这样依靠官方和半官方新闻界炮制(在规模上有所更正)社会思想的现象。制造社会舆论、假造消息、有计划地和形同犯罪地“培植幻想”的手法完全一样；

(2) 在利比亚战争期间有过这种把一切可以用来投机的东西都利用来进行投机的现象，“提供者”的成规完全变成了“本国的”，于是便流行起来；

(3) 当时侵略成性和野蛮粗暴的沙文主义势力为了同拒绝支持战争的社会主义少数派作斗争，到处组织起来，这种势力无论从他们使用的论据(其中最主要的是所提出的“外国宝贝”)来看，还是从斗争方法(臭名远扬的贝尔热列在《新闻报》上赞扬的“用坚忍不拔的革命者的伤痕加以装饰”的做法就是其中一例)来看，都应当称为“法西斯主义”势力；

(4) 进行利比亚战争的时候，丝毫没有考虑国内的现实情况，丝毫没有注意“目标和现有手段之间的正确关系”。《新闻报》当时搞了个“理想”运动，有一家报纸用大号字在第一版转载了弗朗切斯科·克里斯比的名言：能够赖以振兴国家的杠杆需要在该国以外去寻找；

(5) 如果完全调查清楚利比亚的战争是如何进行的，那么在人力和资金的消耗方面尽管数字上有出入，但其结果同关于卡波雷托战役调查得出的结果完全一样。

我们就谈到这里，因为我们觉得，这就足以拒绝承认《新闻报》有权把自己扮演成伽图^①了。它的毫无道理不仅在不久以前可以证明，我们认为，就是现在也有十分充足的因素可以表明，焦利蒂集团登上斗争的舞台时所穿的盔甲是多么陈旧。关于这一点，下一篇文章再谈。

二

焦利蒂的拥护者在他们反对意大利参战的斗争中，仿佛有两个主要动机：一是军事上和外交上没有准备好，二是担心参战会破坏日耳曼体系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最符合意大利利益的对外政策的基础。

糟糕的是，这些主要考虑是在战后才说出来的，已是“事后聪明”的不及时的成果了。借口在文章和私人信件的某个地方曾谈到过这个观点，是反驳不了这一点的，因为愈是有更多的理由认为，对意大利的实际情况有一定了解和对另一种政治路线的实现会导致的后果有先见之明，曾有助于乔万尼·焦利蒂确定自己的立场，他对于国家所犯的罪过也就愈大。其实，“法西斯”怎么能够在“喜庆的”5月时日掌握了政权，把国家湮没在几乎所有意大利期刊在4年期间每天都不断重复的谎言的汪洋大海之中呢？感到战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好处的少数人怎么能够毫不费力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发动战争？战争问题的解决不是民族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萨朗德腊^②个人获胜和焦利蒂个人失败的结果，这种情况

① 马尔克·波尔茨·伽图(公元前234—149)，古罗马的大政治家 and 作家。公元前198年为大法官，公元前184年为监察官。——编者

② 安东尼奥·萨朗德腊(1853—1931)，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4—1916)意大利政府首相。1872年毕业于那不勒斯大学法律系；1886年当选议员；1899至

是怎么发生的？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焦利蒂在多年实行专政期间执行了完全不顾全国愿望的对外政策，他不考虑和不体现全国愿望，这样就妨碍《新闻报》认为可以供作意大利的指南和防止船舶失事的那些宝贵准则成为民族政治文明的天然内容。在哪一个新议会开会时所阐明的纲领中，在哪一次关于外交部预算或者关于军费开支的议会讨论中，在哪一个向国家发布的文告中，是从这个角度、根据对现在所说的意见的考虑，来说明对外政策的呢？如果说意大利能够成为老生常谈、诡辩、极为拙劣的谬论等的俘虏，那不就是因为焦利蒂专政本身千方百计避免采取可以促使预防这种疾病的免疫力得以产生的行动吗？为此需要防止国内一般公民的这种看法：认为对外政策无非是在每届国会议员换班时象宗教仪式那样的老调重弹以及要求切切不要忘却特兰托和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巴尔齐莱^⑤的漂亮号召。

是否在什么时候看到过乔万尼·焦利蒂在议会中网罗到了能够围绕着十分明确的对外政策纲领而联合起来的多数人？他一直是主要靠由于南方选举而出了名的强盗手腕来尽力把没有确定的思想和志向的广泛的、形式不定的多数人联合在自己周围。因此，焦利蒂在1915年5月被焦利蒂派的毒蛇咬伤了。为什么给他送了显赫的名片和成为议会多数的300名议员投票赞成宣战呢？因为

1900年任农业部长；1906年任国库部长；1909至1910年任财政部长。1919年，巴黎和会意大利代表团成员；1923年，意大利驻国际联盟代表。他公开支持法西斯主义，曾试图同墨索里尼协商组成有法西斯党人的政府。后来他号召恢复宪法政府。1925年他退出社交生活；1928年，他被任命为参议员。萨朗德腊的著作有两卷本回忆录《意大利的中立》（1914）和《记忆和思考》（1915）等书。1931年12月9日，他在罗马逝世。——编者

⑤ 萨尔瓦托雷·巴尔齐莱（1850—1939），意大利著名共和主义者和民族统一主义者。1890至1919年当选国会议员，1912年由于反对对利比亚的战争而退出共和党。他支持萨朗德腊政府的政策，1915年任该届政府不管部长主管掠夺到的土地。1916年6月萨朗德腊下台，他被解职。1920年乔万尼·焦利蒂任命他为参议员。——编者

使他们与焦利蒂结合在一起的**不是信念和共同的纲领，而是个人的处境和选举后所形成的局势。**当这300名议员觉得专制者丢弃了权力的魔仗，而“法西斯主义”匪帮开始从各方面猛攻蒙特奇托里奥的时候，他们没有参加战斗，没有由于维护……意大利是欧洲平衡的保证这种概念而象李奥倪大的300名斯巴达克人那样垮台。相反，他们四处逃散了，他们抛弃了（虽然不是没有由于异常恐惧而产生的悲痛）自己的领袖。因此，应当认为，对战争的爆发负有罪责的不是“法西斯主义”少数人，而是焦利蒂派多数人；焦利蒂派多数人之所以缺乏力量来避免战争，就是因为焦利蒂把他们当作一群绵羊，通过长期的训练使他们失去了任何严肃的信念，任何精神的力量。

而在战争期间是怎样的呢？自由主义候选人现在都乐于接受“中立主义者”的称号，因为以这个称号出现在选民面前是很适宜的，而焦利蒂以前则一直是忿怒地加以拒绝。在这些年代，《新闻报》在自己的言论中一直使用了这种轻薄做法：它对参战采取否定态度是决定于对这个步骤是否适时、国家是否有准备的考虑，是涉及到形式和时间的问题，不应当把这种态度与社会党人的坚定的和原则性的反战立场混为一谈。所以，如果焦利蒂执政，这完全不意味着，他不会进行战争；“可能”，他也会进行战争，不过是在有充分的准备之后，取得了可能得到的一切保证和补偿，在可以迫使同盟者付出最高昂的代价的时刻参加战争。

轻薄的作风在于，《新闻报》往往企图靠某些估计，靠某种音调，靠赋予所阐述的思想以某种色彩来为自己制造根本反战者的荣誉，同时又尽量以完全有关及时参战、实际实现这个步骤的论据作为挡箭牌，尽力不伤害自己读者的爱国主义感情。因此，它面对工人时，便以最坚决的语调讲话，它面对资产者时，便以最温和的语调讲话；而现在，当群众重新开始迎来被战争体制消除了的一切

影响作用的竞选运动时期，焦利蒂派候选人在抛弃实际性的论据，竭力强调一般性的看法，即工农群众更易接受的看法。因此，现在焦利蒂派从原则的角度来看，好象同社会党人再也没有什么区别了，他们只不过是认为（见法克塔^①的演说），当已经宣战的时候，他们为了不让国家罹难而服从了“神圣的团结一致”的纪律。

其次，对议会中焦利蒂派的立场，首先是对现在的“自由主义”候选人的立场进行这样总的分析，可以使我们知道，从这一派中一次也没有听到过诚实而勇敢的声音，这一派一次也没有采取过诚实而勇敢的立场，而采取这种立场便会划清它和其他议员的分界线，同时也会阻止犯那些目前《新闻报》只是强加在自己对手头上的十分严重的错误。

自从议员一致热烈欢迎萨朗德腊的1915年5月“爱国主义”会议和只有社会党人拒绝信任萨朗德腊的1915年12月会议开始，我们就再没有发现焦利蒂派（他们后来给予社会党人在战争结束后在国家面前充当卡桑德尔角色的权力，可是后者没有及时照办）有采取任何行动的迹象。

目前（在他这把年纪的时候！）在“胜利同盟”中成为实力人物的波泽里^②的内阁，得到了《新闻报》的极多的言过其实的赞扬。

① 卢易吉·法克塔(1861—1930)，是自由意大利的最后一届内阁首相。1892年起任国会议员，在乔万尼·焦利蒂政府中担任过几次部长。1922年2月和8月两度组阁。当意大利法西斯“罗马进军”正在进行之际，他试图实行戒严法，国王没有同意。墨索里尼上台后，1924年法克塔被任命为参议员，但他不参加社交生活。1930年11月5日在比内罗格逝世。——编者

② 保罗·波泽里(1838—1932)，1870年自由主义右翼的众议员；1871年罗马大学财政学教授，担任过五次部长职务：教育部长(1888—1891)；农业部长(1893—1894)；国库部长(1894—1896)；财政部长(1899—1900)；教育部长(1906)；1915年，他支持萨朗德腊政府关于参加大战的决议；1916年，他当选为战时民族联合政府的首相，这一年，由于他从事议会活动46年时间，被授予“报喜节”勋章。——编者

在以“报喜节”勋章授予极可尊敬的保罗·波泽里阁下时，这家报纸于1916年1月1日写道：

“意大利公民所能盼望的最高的功绩奖赏授予了保罗·波泽里。我们认为，无论就受人尊敬的议长的地位来说，还是就在首相岗位上的各种英明活动、崇高而高尚的爱国主义、他的灵活头脑显示的惊人天才来说，都没有人比他更无愧于这种奖赏了”，如此等等。

当萨朗德腊垮台后组成波泽里内阁时，当年6月15日，《新闻报》表达了“最真挚的满意心情，我们甚至可以说，最真挚的高兴心情”。不妨回想一下，参加波泽里内阁的有比索拉蒂^①、索尼诺^②、奥兰多^③和作为助理秘书的切萨勒·罗西^④阁下，后者目前被列

① 列昂尼达·比索拉蒂(1857—1920)，是1892年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之一。1896年，任该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第一任编辑。1912年由于他反对社会党对利比亚战争的谴责，并支持政府的立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他自行组织意大利改良社会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一度参加战时内阁，因他的威尔逊主义的思想同西德尼·索尼诺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矛盾而辞去职务。1920年5月6日在罗马逝世。——编者

② 西德尼·考斯坦丁诺·索尼诺(1847—1922)，意大利政治家。1880年当选议员；1893年任财政部长，以使意大利财政收支平衡而享有盛誉。1901年创办《意大利日报》，他的政治主张是意大利扩张殖民地、解决南方问题、实行社会经济改革；他崇尚英国宪法政府的模式。他于1906年和1909年曾两度组阁，都只维持100天而宣告垮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萨朗德腊政府任命他为外交部长，他成了伦敦条约的主要设计师。他曾出席巴黎和会，讨论意大利的领土补偿，特别是对亚得里亚地区的要求，没有如愿以偿。1920年，他被任命为参议员，但他在里窝那附近的海边一个城堡里过隐居生活。1922年11月24日在罗马逝世。——编者

③ 维多里奥·伊曼纽尔·奥兰多(1860—1952)，是1917至1919年意大利政府的首相，经历过卡波雷托战役的失败和大战的胜利。巴黎和会中意大利没有获得领土要求的预想目标，引起普遍的不满，他于1919年6月辞职。1922年11月，他支持墨索里尼，但对法西斯政权转变成宪法政府的幻想破灭之后，他在1925年1月公开同法西斯政权决裂。1943年他参与国王发动的把墨索里尼撵走的政变。1944年当选为众议院议长；1948年被任命为共和国终身参议员。1952年12月1日在罗马逝世。——编者

入焦利蒂派候选人名单中。可是，在此之前，在1916年3月20日，议会曾表示信任萨朗德腊，在投信任票的人当中有波泽里、丹涅奥、萨乌第诺、布维埃、法克塔、罗西以及其他一些人；4月17日又重演了同样的情况。

在1917年11月，继卡波雷托之后，波泽里内阁倒台的时候，奥兰多—索尼诺内阁取而代之，助理秘书的职务仍由切萨勒·罗西担任，无论是干涉主义者，还是焦利蒂派，都在它垮台之前一直投票支持这个内阁。

在这些人当中无论谁一次也没有实现过任何一个勇敢的步骤，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可以表明他们的真实观点并使他们有权在一切已经结束之后否认他们也同样对所发生的情况承担责任。固然，议会联盟成立了，但是，它的活动仅限于在侧厅耍手腕，在“法西斯主义分子”那里夺取内阁和各委员会中的职位；可是，它没有做出任何事情，可以使国家多少有些关于它会被拖入多么险恶的深渊的概念，可以提出稍微比较完整的纲领性政纲。同盟的生活是在蒙特奇托里奥侧厅度过的，它的斗争、它的胜利、它的失败，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当它的活动有可能具有某种实际意义的时候，它的参加者便急忙去解散它，从而使他们都有可能消失、溶化于怯懦但却舒心的团结一致议会之中，隐藏在老生常谈的议会演说的幌子之下。

焦利蒂派的妥协还不限于此；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由于这种妥协行为而玷污了他们整个的竞选运动——从提出候选人名

④ 切萨勒·罗西(1887—1967)，是前革命工团主义者和法西斯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墨索里尼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直到1924年。由于1924年马特奥提事件中他指控墨索里尼对此负有责任而被捕，释放后逃往法国，在那里加入了前法西斯主义者的流亡团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意大利共和国法庭指控犯有法西斯罪行，但未判刑，后来他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编者

单直到制定纲领为止。

三

焦利蒂派在详细地、显然高兴地计算着，战争吞没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几十亿的财产；如果竞选斗争变成了竞赛，有人会以最阴沉的笔调描绘战后的局势，那么甚至社会党人也会陷于惊慌失措的境地；在笔调方面，《新闻报》具有可以稳操胜券的秘诀。

《新闻报》虽然这样经常地、有步骤地强调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却尽力避免在这样确认恶果的同时相应地对其原因进行彻底的和勇敢的评论。欧洲战争的起因、在技术和文化欣欣向荣的时代爆发战争这个事实、各阶级和政党的责任，总之，这个骇人听闻的悲剧的意义从来没有为“中立主义者”——焦利蒂派十分深刻地揭示过。《新闻报》让自己的读者饱尝编年记载的导致意大利参战的事件，却很少重视战争本身（意大利参战只不过是次要的插曲）的历史。战争迫使一切无愧于人的称呼的人彻底地重新考虑一切制度、一切纲领、一切形式的现代政治和经济生活。

在战争造成的可怕破坏面前，再也没有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了；唯一没有失去威严的东西就是死亡，无助于死亡最终行善的一切都真正是“死亡陛下的侮辱”。

这样，焦利蒂派最大的罪过之一就是他们把战争问题归结为意大利参战问题，而把我们参战问题归结为〔法西斯主义分子〕获胜问题，〔任何的〕^①表面勇猛的《新闻报》激烈言词、当今的观点和对“明智的”资产阶级的“正常理智”发出的启示录式的号召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即这个报纸进行的运动按其性质根本不能使任何

^① 原文缺字，根据上下文意思予以恢复。

人学会任何东西；它会有助于给法西斯主义者暴行设置障碍，但是却显然不会有助于治愈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近视，不论是干涉主义者的近视，还是中立主义者的近视。战争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导致战争或者说没有阻止战争爆发的一切良善和邪恶的力量都经历的过去历史的现象；问题最多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某些集团对意大利的“形势”进行了研究；只有对所遭侮辱感到忿怒和有愿望要同属于它们的阶级的一些集团作斗争中进行报复，才赋予上述资产阶级集团以勇气和“远大”眼光——这种品质显然根本不取决于他们的精神优势。

我们已经看到了“自由主义”候选人的“纲领”。这是抽象议论、空洞总结、含糊暗示方面的杰作，根据它既看不清这个纲领属于哪个政党，也分不出它（如果撇开形式不谈）同天主教徒、占少数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法西斯主义者的纲领有何区别。

我们看到那里有这样一个看法：“我国一切参加生产的居民阶层，不管是参加工业生产，还是参加农业生产和商业工作，不管是领导者，还是执行者”，都必须复兴国家和积极行动。接着就是些常见的废话，如节约预算开支、要公正地分配税收、进行职业教育、整顿诉讼程序、公布对外政策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

恰恰是在这方面，衡量一下战争，估算一下战争造成的损失，研究一下甚至在上述措施都被采用并取得成效的情况下靠这些措施能否弥补这些损失这样一个问题，这倒是很适宜的。在象我们这样的国家内，参加生产的各居民阶层可以向哪方面努力呢？在由协约国垄断原料的条件下，意大利工业还能维持多少年呢？甚至依靠大胆的税收政策、征收超额利润税的政策，即令（用诺曼·恩杰^①的说法）依靠动用一切资源的政策，是否就可能达到平

^① 英国和平主义作家，《伟大的幻想》一书的作者。

衡呢？

《新闻报》的悲观失望现在全都消失了，它承认形势严重（做到这一点费不了多大力气），但却避而不去研究其各种因素，因为现在它面临的是比打击法西斯主义要渺小的任务：夺取议会席位。如果《新闻报》诚心诚意地、全面地分析国家的形势，它的“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者喜欢这样称呼它的路线）会变为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样，最可尊敬的弗拉萨蒂^①阁下就应当解除自己参议员的职权，率领他所有的感到为了“拯救”意大利而必须根本改变制度的那些信徒，申请参加社会党。

也许《新闻报》在描绘意大利的“悲惨”处境，说明意大利统治者把国家拖进了死胡同的时候，在激烈争论当中渲染过分。也许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明显事实的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出路（至于是否轻易，是否冒险，这是另外的问题）、唯一可能拯救意大利的途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彻底改造社会的问题并在共产主义之中找到唯一能够实际解决该问题的办法。

《新闻报》对克里孟梭和劳埃·乔治等法国和英国的那些保守分子（他们不理解对灾难负责的资产阶级已经到了应当给无产阶级让路的时刻），说了那么多的乏味的俏皮话之后，突然毫无忧虑地宣称，“实现最广泛的自由，作为一切社会力量重新组合和相互均衡的一种很重要的途径，有助于很快就找到解决劳资矛盾的方法，使双方知道最广泛领域中的共同利益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使他

^① 阿尔弗雷多·弗拉萨蒂(1868—1961)，意大利新闻记者和政治家。1900至1920年，任都灵《新闻报》社长。他支持焦利蒂政府的政策。1913年任参议员；1920至1922年，任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因反法西斯立场被墨索里尼解职；1926年退出新闻界；1930至1943年，主管工业联合企业意大利煤气公司，在战后仍然担任此职。1945年以后他回《新闻报》工作，并任参议员。——编者

们关心民族的繁荣。”

当问题涉及到反对我们的干涉主义者(他们装出相信的样子,并且也想使所有的人都深信战争仿佛是凯撒及其周围的人的恶毒阴谋的结果)的肤浅观点和抽象理论的时候,《新闻报》喜欢攻击这种对战争这种事件所作的幼稚可笑的解释,同时坚决证明,不能用个别人的意志来说明战争产生的原因,战争起因于两个联盟(盎格鲁撒克逊联盟和日耳曼联盟)的政治对抗,首先是经济对抗。这样撇开个别人物不谈而谴责制度,是有好处的。

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对抗是资本主义制度、该制度在历史上的形成、它的内部结构的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不需要成为社会主义者,也可以理解这一点。

现在,当谈到社会改造时,《新闻报》仅限于声明需要使“长时期的和平”降临“祖国”,而忘记,这种和平也象战争一样取决于国际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为了使这种和平有保障,人类需要消除这种(确实在历史上)必不可免的、由资本主义固有和天生的国际竞争制度所带来的“规模愈来愈大的血腥战争”(如象社会党纲领中正确说到的那样)。

“自由主义派”纲领可以开出的唯一药方就是许诺:人民选出的人会进行斗争,“反对一切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国内或国外进行的、妨碍创造持久和平所必需的条件之疯狂行动”。好象持久和平所必需的条件可以由“人民选出的人”来奉献,不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法西斯主义者,而不是决定于各国资本家为了恢复其竞争,为了通过比甚至由最普遍的选举选出的议员面临的大路更直接得多的道路来决定国家(其要害掌握在他们手中)命运而提供的那些可能性。“国家政权”目前也象战前一样,属于银行和股份公司。以前说:“要想和平,就准备战争”;现在则应当承认,为了创造出“持久和平的保证”,需要根本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因为只有在这

这个条件下，才有可能随着生产者掌握政权而得到作为“持久”和平保证的真正“自由”。

自由主义者在偷偷地用抽象的和机会主义的“社会和平”问题代替社会的彻底改造问题：他们象《新闻报》如此拥护的民族主义者一样认为，在每个民族内部都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一致，这种一致是“民族繁荣”的基础。

这样的利益一致是存在的，可是它的性质则与例如战前把德国工人和工厂联系在一起并且确实导致“民族繁荣”的利益一致的性质完全一样，但是，各“繁荣民族”之间的必然冲突引起了欧洲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各国无产阶级为了他们不谨慎地、目光短浅地创造的繁荣而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社会党人消除了把两个阶级联系起来的利益一致，也就是说，取消了目的在于损害其他民族、最终也损害本民族、以保证物质福利的共谋，从而否认有可能在这个范围内改造社会。改造社会在所有国家都是不可能的，在意大利就更不可能，因为在这里显然没有能够对工人放弃阶级政策给予某种程度的报偿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够表现出丝毫的领导能力、起码的明智而有效的主动性的资产阶级。

我们得知《新闻报》的“新鲜”政治观点已所剩无几，但是我们还应当指出：有一个论断使我们看出焦利蒂派的可能是最典型和致命的方面。

《新闻报》在11月1日发表的社论中反对法西斯主义者纲领的纯粹虚张声势的手法时说道：“正象为了建立立宪国家而需要相信宪法的人一样，为了实际实现社会民主也需要将来有相信民主和社会主义、至少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人，——这个推测看来并不过分大胆。”

能不能知道，焦利蒂派相信什么？相信资产阶级吗？不，因为

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庸碌无能。相信无产阶级吗？不，因为他们害怕无产阶级的过激行动。相信自由主义吗？不，因为对于“新时代”来说，这已是过去的阶段。相信社会主义吗？不，因为照他们的领袖的说法，卡尔·马克思现在已“被束之高阁了”。

实际上，焦利蒂派既没有信仰，也没有纲领：焦利蒂主义是丧失任何会成为其累赘的思想武装的小小的统治实践。这一点可以使焦利蒂主义更自由地起作用，可以使它在最大的困难中易于随机应变，可是这一点同时又使它丧失可以成为指引正确道路的指南的一切东西。焦利蒂主义是变为统治国家的最高原则的“国家利益”，而对国家利益的解释无助于把握例如作为加富尔的文明保守主义之基础的高级而完整的国家观。

《新闻报》立场素来十分含糊不清，它那表面大胆的观点毫无成果，其原因恰恰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被它用好奇怀疑的目光视为应当为了作为最高法规的秩序……和照旧“没有耻辱和荣誉地”生活的可能性而加以注意和容忍的集合因素。

《新闻报》的“社会主义”不会有任何成果，因为《新闻报》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它同时把大型报纸（它建议社会舆论重视众所关心的问题并力图争取愈来愈多的读者）所固有的远大目光，变成了统治的原则。

但是，这种远大目光，再说一遍，就是由于对一切毫不在乎而什么也不怕的观察员、好奇观众的远大目光。正象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宗教只不过是巩固政权的手段一样，在这个小一百倍的马基雅维利——焦利蒂看来，社会主义是用来“日常统治”国家的手段。

对社会主义的观察不是从它得以产生的原因、它拟定的答案、它尽力加以解决的有巨大意义的问题等角度出发，而是从它所掀

起的、必定纳入现存国家框框的运动的角出发。

焦利蒂主义国家什么也不解决，它只力求站得住脚。焦利蒂派拼命要实现一个奇迹：做到使意大利继续生活下去；它只要生活下去，而不管生活得怎样。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来说，这太不够了，为此不值得诅咒战争夺去了几百万人生命，破坏了城市，消灭了财富，不值得在这种灾难的处境中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四

在焦利蒂派的方针变成了竞选纲领的条件下焦利蒂派的批评的缓和是与在制定候选人名单时在最可怜的机会主义的旗帜下所作的这类改变相适应的。在看一下名字和就此结束我们的评论之前，我们想谈一下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虽然不在我省的候选人名单上，但它是最可恶和最可赞的对象，这个名字就是乔万尼·焦利蒂。我们谈到他的时候，打算说出尽可能客观的关于这位“理想的”国务活动家的判断；《新闻报》提出，他是值得仿效的榜样，说他应当直接或间接地、即通过他的那些根据他提出的原则进行活动的信徒，在意大利实现在选举没有进行时期这个都灵报纸竭力维护的战后政纲。《新闻报》认为，旧皮埃蒙特的传统国家政策所固有的优良本质在焦利蒂身上得到了体现，这种政策曾是民族统一的主要因素之一，它明天会使被战争拖垮的意大利重新得到复兴。在谈到焦利蒂时往往乐意提起卡米洛·加富尔^①，在达维德·贝

^① 卡米洛·加富尔(1810—1861)，是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代表温和自由派的政治家。1848年当选撒丁王国议会议员；1850年为王国政府农业部长；1852年任王国政府首相；他的政治信条是“诚实的中庸之道”。他为意大利统一作出了很大贡献。1861年意大利王国宣布成立，他任第一届首相，当年6月6日突然逝世。——编者

托洛蒂街上的编辑部看来，加富尔成了一位类似“土著神”、庇护神的人物。但是，即便考虑到了时代的区别，而把焦利蒂和加富尔看得相似，那也等于新闻工作者在彼此吹嘘自己博学的场合才能进行的一种诈骗。

问题不仅在于加富尔和焦利蒂是不可比拟的智力人才，而且在于这两个人之间，从他们的文化、气质、精神面貌和他们所体现的国家管理制度的角度来看，是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的。

只要把焦利蒂的言论同加富尔的言论加以对照，就足以了解，有才能的官僚和国务活动家有多么大的差距。焦利蒂的官运亨通，没有经过动荡和精神危机，他登上了政治舞台，已经完全形成、变成如此完美的“工作机器”，以致从那时起看来就没有必要哪怕改换一个小螺丝钉；年轻的加富尔充满了激情，他很富有理想的动机，可以毫不夸大地把他与他的年轻的顽强对手朱泽佩·马志尼相提并论。扶摇直上的升官道路使焦利蒂达到了目的，而加富尔为了重新得到充分的言论自由，辞职了二十年，退出了军官团，过着在编人员、最多也不过是大家庭中最小的儿子的生活，毫无希望升官和得到靠山。加富尔之所以能给自己开辟了道路，完全是由于有出色的才能、有文化：一切有关政治、财政、经济、农业等方面的问题，他在一生中都作了精密的研究，一切发生在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和政治事件，他都进行了仔细而敏锐的观察，因而他成长为具有真正“世界主义”文化的人。而乔万尼·焦利蒂的文化是怎样的呢？他在研究中哪怕作出很小贡献的问题是怎样的呢？哪些解决某个重大国家问题的方法是他想出来的呢？

焦利蒂是很宁静、稳健、精细的人，正是从这些品质的角度把他往往与加富尔相提并论。相反，加富尔却很容易受最初观感的影响，他是个容易冲动的人（所有很了解他的人，从卡斯特里到德拉·里夫，都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最初内心活动从来没有白费过，

因为它产生了一系列的思考、探索、尝试，而这些便成为后来实现的深思熟虑和有计划的行动的准备阶段。

焦利蒂缺少加富尔所特有的两个才能：实际的头脑和对原则的忠诚，看起来可能很奇怪：大家都承认，焦利蒂有实际精神，因而他能够执政这么久，而我们却否认他有实际的头脑；但是，如果把讲求实际理解为争取实现某些具体创举的能力，那么，在焦利蒂的活动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同卡米洛·加富尔个人直接促使实现的那些创举（如在维切列泽开凿运河的工作、促进农业发展的尝试、信贷机关的建立、贸易协定的签订）有哪怕稍微相似之处的。

此外，加富尔使自己的一生和首相工作都遵从一些他从未背离过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他活动的基础，保证他在国内外政策方面获得了成功；他甚至在最不足道的小事情上也注意遵守这些原则，正象一位同时代人所说的那样，“始终以不可制服的和不知疲倦的活动家的顽强精神追求自己的最终目标”。焦利蒂的政策是这样的：“焦利蒂主义”的含义就等于是为了解决焦利蒂认为是关键的问题（意大利永远保持风平浪静的问题）而经常敷衍应付、乃至系统地伪造原则。停滞比风浪要好，这就是这位新出现的“再生的加富尔”的全部国务活动的座右铭。

加富尔也乐意同其他党派接近，他不回避妥协的解决办法，不厌恶同自己的对手进行谈判；但是，在这种事情上，他从来没有出于这样的一般动机：尽力迫使反对派沉默不语、削弱他们，力争达到所期望的目标——奴役式的一致，根本没有！

加富尔同拉塔齐^①于1851年末结成的“联盟”，加富尔和加里

^① 乌尔班诺·拉塔齐(1808—1873)，是1843年伦巴第和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合并的立法起草人。1859年任撒丁王国众议院议长，1862年接任加富尔为意大利王国首相，1867年再度出任首相，曼塔纳战役失败后下台。——编者

波第关于西西里进军的秘密协定(目前可以认为,这个协定的存在已被证实),或者加富尔到隐居在“维巴涅拉”的布洛费里奥那里的访问,同焦利蒂的“同盟”和“协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加富尔的政策导致各党的立场更加清晰明确,它没有减少当时任何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影响;焦利蒂的政策是在象目前一样在我国极少提出明确的纲领性政纲和出现明显的特性这样一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它对于政党和思想起了极大的腐蚀作用。

对比还可以列举下去,这样只会更清楚地说明,认为象加富尔这样大的国务活动家目前能够把资产阶级从等待它的厄运中拯救出来的这个看法即便是正确的(而我们社会主义者并不相信这一点),那么,乔万尼·焦利蒂也显然不会成为靠自己的实干品质和道义力量就能担负如此毫无希望完成的任务的这样一种人。

根据《新闻报》在选举前进行的运动来看,意大利资产阶级只有在两种可能性中进行抉择:不是坚定地走更大胆的改革道路,就是被革命的洪流冲垮;不是革新,就是灭亡。这就是《新闻报》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对那部分最有远见和最受偏见拖累的资产阶级,一直到选举开始之前都反复说的 *Delenda Carthago*^①(《新闻报》为此被指斥为布尔什维主义)。弗拉萨蒂警告说,为了不丧失一切,应作出许多牺牲。需要有这样一些新人:他们能有胆量采取这种作为紧急措施的行动,尽这种最后的、最大的努力,以挽救所谓统治阶级,使之免遭必然的灭亡。我们却看到,这种启示录式的极端危险的英雄观点丝毫也没有留在自由主义派的纲领之中,根本没有。仿佛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事情不太妙、但尚能维持生存的小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的业务报告。有能力实现最可尊敬的弗拉萨蒂和焦利

^① *Delenda Carthago* (“迦太基定遭毁灭”)是老迦图在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争)之前,在罗马元老院结束自己的演说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成了俗语,用以表示摆脱不掉的政治思想。

蒂共同相信的奇迹的人，我们在“自由主义”联盟的名单中应当找得到。那我们就去找吧。那里面有几个“过去的人物”。他们为什么列在这里？他在过去表现了什么才能，以致博得了新人的名声？他们，特别是狄·罗比兰特，罗西，布维埃，乔尔丹诺，萨乌第诺（我们觉得，列举这些名字就足够了），不是直接在选举中碰运气的人，又是什么人呢？他们有什么实干品质，他们是哪些主张革新的力量的代表呢？

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谈出一些事情，揭穿他们实质上是选举他们的地区的恶习不改的商品推销员；但是，这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总起来说，他们都有甚至更动人的仪表，而他们的行动表明，“大胆的”纲领、即由一批议会庸才和坏蛋中最大的草包担保执行的“革新”纲领在资产阶级范围内实际上受到怎样的局限。

“过去的人”列入名单是因为他们能够保证得到更多的选票，因为他们是焦利蒂的比较忠诚的崇拜者。意大利、新意大利在这里根本丝毫说明不了将来：这里，一切都是十分可怜过去，这里充满着派系、小商贩习气，是“死者抓住生者”。

其他的候选人也完全是从保证在他们已当选的地区的选举中获胜的角度选拔的，根本没有考虑纲领和民族利益。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可以做出如下结论，拟定焦利蒂派名单的原则同“胜利同盟”名单完全一样：它们的产生是出于同样的竞选意图，因此，由于它们来自同样的根源，结果彼此非常相似，以致容易弄混，这是很自然的。诚然，两方面是互相仇恨的，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些兄弟之间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仇恨。甚至在最细微的地方也可进行两个名单的对照。由于在法西斯主义派名单中有一位将军，在焦利蒂派名单中便提出一名将军与之抗衡，而忘记在《新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曾宣传反对军人作候选人，建议将军只从事做

将军的事业，赞扬巴多里奥^①不同意推举自己作候选人的行为。如果照这篇文章来办，那么焦利蒂派的名单就会落得没有金银饰纽，没有“银质奖章”，而焦利蒂派没有很重要的理由就准备放弃自己的原则。

完全同样的，既然在法西斯主义派名单上有一个虽不说话、但是出钱的人——切萨勒·马尔蒂尼，那么为焦利蒂名单也找到了切兰诺这棵摇钱树。真难以想象，就在不久以前，《新闻报》还大声疾呼地埋怨在尼提^②内阁中有象丹特·费拉里斯这样贪婪的豺狼！

还可以继续谈下去，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证明，焦利蒂主义根据其所提出的纲领和被委托去实行该纲领的人来看，只不过是意大利资产阶级平庸的、十分不光彩的面目之一，对于意大利资产阶级，我们已有好几十年的了解，它在利比亚战争和欧洲战争中表明，它既没有指导思想、必要的实干品质，也没有道义力量。

《新闻报》的一切娓娓动听的言词和对个别人进行的严格的、清教徒式的批评，落得个可怜的、甚至庸俗的结果。焦利蒂派的飞

① 比埃特罗·巴多里奥(1871—1956)，意大利军人，1919至1921年任意大利陆军总参谋长；1922年政治危机时期，他支持法西斯政变；1925年任法西斯政府陆军总参谋长；第二年升任陆军元帅；1936年完成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他反对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他认为意大利没有准备，这无异于自杀，但他没有辞职，一直任职到1940年12月。1943年7月25日，他取代墨索里尼任意大利政府首相（他是撵走墨索里尼的政变的主要参加者）；9月他同同盟国签订停战条约；1944年4月，他说服各反法西斯政党参加他的政府，6月被迫辞职。
——编者

② 弗朗切斯科·尼提(1868—1953)，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1911至1914年，在焦利蒂政府中任农业部长；1917至1919年，在奥兰多政府中任财政部长；1919至1920年，任政府首相；1924年，他作为法西斯的反对者被迫逃离意大利；1943年，在法国被德国人拘捕入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获释，此后重新参加意大利的政界活动；1948年，他被任命为参议员。1953年2月20日在罗马逝世。
——编者

黄腾达只是使得可笑的小耗子得以降生。再追逐这些手中握有纲领的小耗子，已没有什么意义：这只是为了竞选而降生的偶然流产儿，投票选举的铁扫帚足以把他们清扫干净。

未署名

载于《前进报》皮埃蒙特版1919年11
月5、6、7、8日第306、307、308、
309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369—391页

工团主义和委员会

我们是不是工团主义者？都灵出现的车间代表运动是否只是一种工团主义的地方现象？这个运动是否只是预示着“国产的”工团主义风暴即将到来的一阵狂风？它是否只是充满着假革命的华丽辞藻的蛊惑宣传、无纪律性、无责任心和少数目光短浅、大喊大叫、常常把群众弄得糊里糊涂的个人的躁狂性精神错乱的混合物呢？它是否就是意大利工人运动编年史上被称为“意大利工团主义”的那种货色呢？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工团主义理论已经彻底破产。工会已被证明有它的局限性，它无力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工会的发展通常带来群众革命性的削弱；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战斗精神日益削弱或完全消失，生活激情渐趋衰退，机会主义的实践，“面包加黄油”的实践代替了英雄主义的不调和精神。数量上的增长引起质量上的一致和适应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形式的倾向，促使工人中出现一种卑琐的心理，一种中小资产者的舍本逐末的心理。而吸引“全体”群众，即所有工农业劳动者参加到自己的队伍里来乃是工会的首要任务。因此，这个因素对于达到目的来说是不中用的，而由于手段是达到目的的必要因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工团主义并不是实现革命的手段，无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不是正在进行的革命的体现；工团主义不是革命的，革命的工团主义只有作为这两个术语的和谐结合才是可能的。

工会只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生活的形式之一，而不是消

除资本主义的潜在形式。它把工人组织起来，不是作为生产者，而是作为雇佣劳动力，作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出卖者。工会把使用同样劳动工具的或者加工同样材料的工人联合起来，换句话说是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即经济个人主义的制度所赋予工人们的那些特点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正是使用这种劳动工具，而不是其他某种劳动工具，正是加工这种材料，而不是其他某种材料，要求无论从所耗费的力量观点看，还是从所得报酬的大小的观点看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才能和技巧。工人获得一定的专业和一定的技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东西看作某种生产要素，而只是看作取得工资的手段。

工会把工人同该行业或该工业部门的同志，即在工作中使用象他使用的那种劳动工具或加工象他加工的那种材料的人联合起来，这样有助于加强这种心理，愈来愈妨碍他们理解自己作为物质财富生产者的作用，使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确定其价格和价值的“商品”。

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的整个体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时，只有当他们意识到要求企业中干粗活的工人、熟练工人、职员、工程师和总工程师紧密合作的生产过程的统一时，才可能把自己看作是生产者。工人，只有当他们在心理上溶和在某个工厂（例如都灵汽车制造厂）的生产过程中，并意识到自己在生产小汽车的社会总体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从而把自己提到更高的高度，综观生产小汽车的都灵工业活动的全景；只有当他们看到都灵是统一的生产整体，在那里小汽车生产起着主要作用；只有当他们懂得，都灵工人的绝大部分活动是有其地位并正在发展，因为汽车工业存在着并正在发展；只有当他们因此懂得，从事这些为数众多的活动的工人也应当归入汽车工业生产者之列，因为他们创造着使这一生产部门得以存在的必要的和足

够的条件；——只有这样，工人才能把自己看作是生产者。

工人从这个基层单位出发，从作为生产某种产品的生产单位的企业出发，在自己的意识中出现关于愈来愈大的生产联合体一致性的观念，直到以出口——用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去交换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世界其他许多巨大生产单位的等量财富——为其特点的作为统一的巨大生产单位的国家。只有这样，工人才能成为生产者，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上——从个别工厂到整个国家，到整个地球——的作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意识到自己是阶级的一员，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私有制决不是生产过程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革命者，因为他们把资本家，即私人所有者看作是一具尸体，看作是必须排除的障碍。只有这样他们的头脑中才能产生“国家”的观念，社会组织的复杂体系和社会的具体形式的观念，因为这种形式无非就是巨大的生产机构的形式，即随同它的一切关系、联系和新的最高职能（这种职能的产生要求机构具有巨大规模）一起反映着工厂生活并作为该工业部门、该工厂以及生产本身存在和发展所必要的各种条件的内在相互联系的、和谐的整体的一种机构的形式。

都灵的车间代表运动既是对意大利假革命的工团主义实践的否定，也是对改良主义的工团主义实践的否定；它是双重的否定，因为改良主义的工团主义是对假革命的工团主义的抑制。的确，假如工会只能向工人提供“面包加黄油”，假如工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保持工资的稳定水平，只能消除工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的最危险的某些威胁，那么很明显，改良主义的实践要比假革命的实践更能达到这些成果。谁要求某种工具提供它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谁硬要人相信这种工具可以提供比它的本质所允许的更多的东西，谁就是在做蠢事，谁就是在进行纯粹的蛊惑宣传。意大利的假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常常争辩说：是否应当使工会（例如铁路

工会)成为闭关自守的组织,即只包括能够吸引漠不关心的和满不在乎的群众的少数勇敢分子的组织,换句话说,他们否定工团主义的起码原则——吸引全体劳动者群众加入工会的原则。问题在于,他们在内心深处感到自己的宣传毫无成果,工会无力帮助工人培养革命的意识。他们从来不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因为虽然他们也认为自己是“生产者”理论的信徒,但是在他们的头脑里却从来没有生产者的意识;他们是蛊惑宣传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以大喊大叫的言论来惊动群众,而不是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觉悟。

但是,难道都灵的车间代表运动只是为了用博尔吉^①去替代布奥齐^②或达拉贡纳^③吗?代表运动是对任何个人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否定。这个运动是这样一种伟大历史过程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群众开始意识到自己建立在生产上,建立在具体劳动上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它赋予这种意识以有机的形式,形成自己的领导,从本身的队伍中推举出领导干部,这样,他们的活动就会

① 阿芒多·博尔吉(1882—1968),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1912至1920年,任意大利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同盟的总书记,劳工联合会的创建人。1902年后一再被政府逮捕,开始流亡生活,起先在法国,后来(1926至1945年)在美国。返回意大利后,他任《新人性》编辑,仍然宣传他的无政府主义。1968年4月21日在罗马逝世。——编者

② 布鲁诺·布奥齐(1881—1944),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1926年11月以前,他担任意大利劳工总同盟的总书记,此后他移居巴黎,在那里主编《意大利工人报》,发表文章既反对法西斯的总体制,也反对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30年代末,他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43至1944年,他在罗马重新组织独立的意大利工人运动;1944年6月3日,德军从意大利首都撤退时,他遭德国人杀害。——编者

③ 卢多维科·达拉贡纳(1876—1961),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1918年,他担任意大利劳工总同盟总书记;1919年当选众议员;为了使劳工总同盟不至于被墨索里尼没收,曾同法西斯政府进行妥协,但他的政策终遭失败,劳工总同盟遭解散。1929年以后,他退出社交生活;1946年,他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党;1946至1951年,他在加斯贝利政府中任部长。1961年6月17日在罗马逝世。——编者

成为群众为争取达到完全明确的目的的有意识的行动，成为伟大的必然的历史过程的表现。尽管可能发生个别人的差错，可能发生由于国内和国际条件引起的危机，但是这个历史过程必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导致共产国际。

在工团主义的理论中，从来没有生产者的观念和生产者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概念。工团主义理论从不承认劳动者组织应当具有这样的性质，具有这样的方向。工团主义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只承认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各该行业或各该工业部门的劳动者的联合。诚然，他们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是从现实出发的，然而是从受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劳动力的私人占有制约的现实出发的。这就是说，他们建立的只是乌托邦，只是抽象的空中楼阁。

依赖劳动群众的威力、根据劳动地点和生产原则组织起来的工厂委员会体制的观念是建立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的，是我们俄国共产党人同志们理论探索的成果，他们决不是工团主义者，而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19年11月8日第25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70—75页。

革命者和选举

有觉悟的革命者、工人和农民认为，在普选权的基础上，按地区（由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双方）选举的议员组成的议会，是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他们是怎样期望选举的？他们当然不会争得一半零一个席位；新的议会会颁布成打的旨在磨去锐角并使得两个阶级（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更容易和更适合共处的指令和法律。但是，他们期望，无产阶级会通过自己的竞选运动把坚强的社会党积极分子队伍选进议会，这个队伍将十分庞大和老练，因而使得资产阶级的任何首领都不可能组成稳定的和强有力的政府，从而迫使资产阶级扯掉民主的帷幕，超出合法的范围，激励最边远和最广泛的劳动阶级的各阶层起义反对剥削者寡头政治。

有觉悟的革命者、工人和农民已经有了一个信念，即共产主义革命只有通过建立工农委员会制度所体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他们之所以为把大批社会党代表选进议会而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有如下看法。

共产主义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少数革命者依靠实力掌握了政权，这少数人次日也会由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力量的反击而被推翻，因为多数未被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会使优秀的革命力量被消灭，会使得由腐化而产生的、由资本家金钱所激起的一切卑鄙贪欲和野蛮本能得以大肆泛滥。因而，必须使无产阶级先锋队物质上和精神上组织这些消极的和萎靡的多数人，必须使革命的先锋队靠他们掌握的手段和特有的方法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

都创造出这样的条件：使得有产阶级再也不能安心地统治广大人民群众，而且由于受党监督并遵守党纪的社会党议员毫不妥协而不得不对广大群众实行恐怖政策，胡乱地进行打击，致使这些群众愤然举行起义。目前只有议会活动才能导致这一目标得到实现；议会活动被认为是这样一种活动，它的目的在于麻痹议会，揭开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真实面目的民主外衣，证明它的一切丑恶，一切卑鄙龌龊。

共产主义革命对于意大利来说是必然的，这十之八九是由于国际方面的因素，很少是由于与本国生产发展过程相联系的因素。当改良主义者们和整个机会主义帮派说意大利不存在客观的革命条件的时候，他们是正确的，说他们正确，这只是就他们作为民族主义者进行思考和发表讲话而言，只是就他们把意大利看作不依赖于整个外界的机体，把意大利资本主义视为纯意大利现象而言。他们并不认为，国际主义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还是在无产阶级历史上都是现实存在和起作用的因素。

反过来说，如果把意大利视为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视为依赖于这个世界体系的一个国家，那么历史评价就要改变，每一个感到自己在其阶级完成其历史使命方面负有责任的有觉悟的社会党人、工人和农民所应作出的结论会是这样的：需要我们有很好的准备，需要我们掌握用以夺取社会政权的武器。革命的必然性是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条件产生的，这个实际情况使得意大利人民的革命先锋队的任务更加复杂而艰巨，但是这种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应当使我们抱有幻想和产生怀疑，而应当产生争取得到更好的锻炼和修养的愿望。

的确，现在革命所碰上的意大利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还是一盘散沙，是一些处于动物特有的毫无秩序的运动之中的、没有纪律和文化的、只受填饱肚皮的欲望和野蛮的激情支配的

人们。正因为如此，有觉悟的革命者才参加了竞选斗争；他们参加这种斗争是为了把团结和组织性因素灌输到这些群众中去，是为了把他们的行动同社会党的活动结合起来，是为了给予他们的本能和激情以理性的表达并依靠提高政治觉悟使他们心里亮堂起来。但是，由于同样的缘故，革命先锋队不希望这些群众误入歧途，不希望他们产生一个印象：通过议会的改良活动就可以克服当前的危机。必须使各阶级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必须使资产阶级证明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满足群众的需要，必须使群众根据切身的经验确信，存在着明确而严肃的抉择：或者是饿死，在那些将迫使工人和农民在车床旁和田块上拚命劳动的外来人的铁蹄下过奴隶生活，或者是意大利工人和农民作出英勇的、超人的努力，以建立无产阶级制度，消灭私有者阶级和消除一切消费、无效活动、纪律松懈、秩序混乱的根源。

有觉悟的意大利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是根据这种理由才参加了竞选斗争，才积极参加了议会集市。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民主幻想，不是为了磨去锐角，而是为了给无产阶级的胜利创造前提条件，保证旨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它体现为委员会制度，它是在议会之外，不顾议会的反对而产生的）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19年11月15日
第26期“一周政治生活”栏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395—398页

政权问题^①

目前，意大利被剥削者阶级的地位可以表述如下：

政治生活领域

大约有 350 万工人、农民和职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共约 1500 万人，在议会中总共有 156 名社会党议员。在政治生活领域中，意大利的不拥有劳动工具及生产和交换手段、受国家经济机关支配的生产者阶级竟能如此地集中自己的力量，以致使议会不再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不再作为宪法规定的政治管理形式而活动。因此，意大利的被剥削者阶级能够给予资本家的政治统治，即建立在保守党和民主党轮流坐庄的基础上，建立在使资本主义的强盗行为和钱袋的统治具有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各种政治派别轮流执政的基础上的政治统治以极大打击。

经济生活领域

具有行会性质的劳动者运动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
依靠劳工总同盟、在最现代化企业中就业的产业工人的运动，

① 11 月 15 日第 25 届议会举行选举，社会党取得很大胜利（拥有 1 840 593 选票和 508 个席位中的 156 个）。“人民党”选出了 100 名议员。这样，传统的执政党丧失了多数。

以及在集约耕作地区工作的农业工人的运动；聚集在意大利工会联合会^①周围的、永不安分守己和以革命词句代替具体革命活动的落后工业部门的工人运动。

联合着最广泛的群众的铁路员工工会中有：最先进的产业工人以及依附于小资产阶级的职员、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程技术人员、靠国家赡养（象意大利的小资产者和小农那样）而获得薪水或工资的一部分不能划分为阶级的人员。

天主教农民工会。它们对参加劳工总同盟的农业工人的态度，就象意大利工会联合会的工人对待劳工总同盟的工人一样。参加天主教农民工会的是农村中落后的贫农群众，这些人把同工会精神格格不入的或者截然矛盾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宗教，另一方面是含混不清的无政府主义因素）带到工会运动中来。

在意大利各地，特别是在其南部地区和各岛屿常见的农民联盟和劳动协会说明在国家经济和政治机关的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缺乏联系。这些组织是由个别人发起的，它们苟延残喘，它们的整个活动无非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发动，丝毫没有具体的稳定的目的。

残疾人和老战士无产者联盟，残疾人和老战士独立协会。这是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尝试。

所有这些不同流派和组织形式所代表的行会性质的群众运动至少涉及到600万意大利劳动者（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大约为2500万人）。这个运动导致“闲散”人手在劳动市场上的消失，也就是说使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瘫痪。争得8小时工作日和最低限额的工资是劳动市场这些总的条件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遭到剧烈

^① 意大利工会联合会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组织；是在工团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党以后（1908年）成立的。

的震动，剥削“自由”，即攫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大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国家的税收、报纸和钱袋、仆从的贡物）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并被置于工人的监督之下，尽管还是间接的。资本主义组织（其顶峰就是资本主义联合企业的最高形式）的经济基础——议会制官僚国家，由于攫取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威力的主要源泉的自由受到限制而遭到了破坏。

社会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使 156 名社会党议员进入议会，使得议会作为法定的政权形式的活动遭到瘫痪，这是上述主要的、极为重要的经济现象的直接结果，这一现象使得劳动力市场不再成为法定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形式，不再成为资本家控制生产和交换过程的形式。

先进的工人和农民感觉到，这种形势是在战争时期造成并在战后时期确立的。他们懂得，这些成果只有不断前进，只有在 8 小时工作日成为工人和农民制定的“法律”，成为各地共产主义社会的“习俗”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障；如果最低限额的工资成为能够保障工人和农民靠自己的劳动满足一定水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种需要的“法律”，成为工人和农民权力的法律，这种权力同时也将是已革新的工农业生产体制存在的政治表现；如果联合起来的工农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政权基原（剩余价值的形成）的监督超出群众现实初步的和尚未成形的直接压力和反抗的形式，并体现在最终表现为工农国家、工农政府、工农中央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机关之中；如果农民夺取土地不仅导致他们占有基本生产资料，而且导致靠这些生产资料所生产的产品也转归他们所有，也就是说建立起他们对商品生产和流转形式的监督，对代表这种流转各阶段：银行，联合银行，贸易、铁路运输、海河运输管理机构的经济组织的监督；如果不建立能够保障农民不受强盗资本主义和金融寡头侵犯的工人国家，那么战争将付出“大规模”土地革命的代价，资产阶级

国家和较小的资本主义组织将通过在农业中采用机器、剥夺农民并使他们变成没有职业斗争经验的农业工人，从而使他们遭受比城市产业工人更为残酷的剥削，使他们的财富——劳动力被侵吞的办法来实现这场革命。因此，沿着革命道路前进，直到剥夺剥夺者并建立共产主义国家——这就是意大利两个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所切身关心的事。对于城市工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保护已经争得的成果，不让这些成果由于工业生产机构的破产和社会的崩溃而丧失，以便不致弄到这样的地步：混乱和恐怖具有经常不断的性质，劳动者阶级的地位不再有任何改善的希望；而对于农民来说，这就意味着掌握全国的生产机构，以便改善劳动者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状况；对于农民来说，这就意味着把已经得到的土地牢牢掌握在手里，扩大自己的地块，摆脱赋税和地租的负担，在农村中以共产主义的办法同城市工人紧密合作实行工业革命。

先进的工人和农民懂得由于目前的经济状况及其固有的生产机体的灾难性状态所引起的这种必要性。而他们也已经在目前这种政体的民主社会的范围内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他们把捍卫他们所要实现的那些主张和纲领的社会党看作是当然的政治领袖，他们向社会党指出了夺取政权的道路，即成立不是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普遍享有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议会，而是以工农委员会，即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力、可以把资本家排除在生产过程以外、使他们在集中领导国家经济活动的一切机构中失去统治阶级作用的委员会体制为立宪基础的政府。

这就是说，社会党的直接的具体的任务是解决政权问题，解决把意大利全体劳动群众联合到由政党领导的独立的集中的组织体系中来，解决建立一个民主地进行活动，即能够保证一切反资本主义的流派有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统治政党的自由和可能，而在本身的范围内又作为彻底摧毁资本的一切经济和政治权力机构的机

器而无情地从事活动的国家机构。

意大利劳动人民拥有大批群众。目前，他们在政治上分为两个主要派别：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党人，另一部分是天主教社会党人，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次要的派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老战士，地方上的具有革命倾向的各种派别）。这些群众大约占意大利居民中的2 500万人，也就是说，这是无产阶级政权的牢固基础。

还有一系列职业性的组织和半无产者的协会，这些组织和协会从汇入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之列的某些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政治素质来说是各不相同的。

还有社会党，而其中革命的共产主义派代表着无产阶级群众中的成熟的和觉悟的力量。

对于革命者来说，目前极重要的问题是：

1. 吸收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加入与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有直接联系的社会组织（建立所有劳动者都享有投票权的工厂委员会和乡村委员会）。

2. 使委员会内的多数属于社会党党员、工人组织的成员和同情者。但是，不排斥在开始的时候，即尚未消除犹豫和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多数暂时落到“人民党”信徒、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改良主义者之手，但条件是他们仍当雇工、在劳动地点推选出来并承认工人国家。

在上级组织（城市或区——对农村来说），市或区委员会的代表权不仅应当给予生产中心：即不仅应当给予该地区的劳动者群众，而且应当给予党的支部、地方俱乐部、工会、无产者协会、合作社。社会党的多数在地方政权机关中将是明显的，在大工业城市中将是占绝对优势的，也就是说在那里，工人国家将真正是无产者（工厂工人）的专政，它将在那里克服最大的困难，因为它必须掌握

资本主义中心,掌握那些触须伸向全国的资本主义组织。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19年11月29日
第28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85—90页

党 和 革 命

社会党是由许许多多支部组成的（这些支部在大工业中心成为区组织的完整而坚强的体制的支柱）；社会党分为若干省联合会，以各个市支部的思想影响以及它们所进行的各种不同的实际活动而牢固地联成一个统一整体。社会党每年举行党的代表大会，行使党内的最高权力；这个权力属于全体普通党员群众，在代表大会上由被选出的、享有一定的和有限的权力的代表相应地代表他们。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讨论和解决具体的重大问题。代表大会选出领导，作为它的常设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由此可见，社会党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机关，一些政治幻想家容易把它看作是一种“完善无缺的”机关。

社会党是建立在自愿的、自觉的纪律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典范。如果把整个人类社会设想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党，可以申请入党和声明退出，那就有助于确定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以及许多与其说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经济学说的教育、不如说受卢梭的学说和无政府主义小册子的教育的革命者所固有的偏爱。俄国的人民自主权所赖以行使的原则同确定社会党组织结构的形式的原则惊人地相似。独立自主的俄国人民政府从事活动的方式是同社会党领导所采取的方式惊人地相似的。因此，在这些类似之处和本能意向的基础上产生某种革命的神话，似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建立社会党支部体制的专政，这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观念至少是与下述观念同样地不现实的，即工会和劳动

协会是实现革命发展过程的形式。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被认为只是一种适应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一定发展水平的“自然”形态，而革命可能被理解为只是历史地承认这一形态的“自发性”的行为。这就是说，革命过程无非是劳动群众的自发运动，这个运动是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占有制居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所固有的矛盾冲突所产生的。被禁锢在资本主义矛盾之中的、处在终身判决并失去精神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群众挣脱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并在自己的行动中超出资产阶级宪法的界限。要不是人民群众历史地意识到，必须寻求新的组织形式，在生产和分配财富的领域中实行新的秩序，那么社会就会解体，有效财富的生产就会下降，而人们就会堕入贫困、愚昧、死亡的深渊。无产阶级为了进行斗争而建立的组织是群众的这种大规模运动的“代表”。社会党无疑是这种旧事物解体和新事物形成过程的重要“代表”，但它并不是也不可能被认为是这一过程的形式，即容易根据领导者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形式。德国社会民主党（整个说来它是工会和政治运动的综合体）发明了一种怪论，它强迫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纳入自己组织的形式，并认为历史必须服从于它。它通过强制的办法建立了自己的委员会，使自己在哪里拥有稳固的多数，从而束缚了革命的手脚，使革命听命于它。目前，它已丧失了同历史现实的任何联系，丧失了并非是诺斯克^①的拳头和工人的脑袋的那种联系，而革命过程却以自己的不受人们操纵的、空前未有的途径在发展，目前还难以想象，它将遇到怎样的压力和遭受怎样的苦难。

社会党在政治领域内的毫不容情将会取得象工会在经济领域内取得的成果：结束自由竞争的局面。社会党以自己的革命纲领

^① 古斯塔夫·诺斯克(1868—1946)，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首领之一，1919至1920年任陆军部长，是镇压柏林工人和杀害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的策划者，因此得到“血腥豺狼”的绰号。——编者

使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失去自己的民主基础——被管理者的同意。社会党对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起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相信，他们所处的悲惨境地不是暂时的现象，不是没有尽头的死胡同，它是符合客观必然性的，是一定会导导致暴力粉碎，导致社会新生的辩证过程的必然因素。这样，社会党就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的历史意识的体现者，就领导起他们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运动。这种领导没有有形的形式，它是通过无数精神联系来实现的，表现在它在群众中的威信的提高上；只有在紧要的关头，即当需要引导群众走上街头，具体地部署战斗力，准备解除面临的威胁，反击采取暴力的反动势力时，这种领导才可能是有效的直接领导。

对于社会党来说，只有当它失掉了人民群众“合法”管理体制的职能时，才是最困难的、最微妙的活动阶段，即正面行动的阶段。党所广泛宣传的思想将对人们的意识起到独立的影响，并召唤接受这些思想的新的社会力量，动员根据内部规律行动的组织 and 处于萌芽状态的政权机构投入到生活中来，通过这些组织和政权机构，群众实行自己的领导，增强自己的历史责任感，来创造条件建立新兴的共产主义社会。党作为一个团结的战斗的思想组织，对新机构的这种潜在活动，对几百万基层社会组织的活动将起深刻的影响，就象逐渐形成红色珊瑚礁的珊瑚一样，在不远的将来升起在海面上，劈开狂暴的海浪，恢复海面的平静，重新稳定海上的浪潮和气候。这种影响具有有机的性质，它表现在思想的不断传播上，由于保留了思想领导机关而得到保证，受到以下事实的制约，即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建立新政权、新秩序的时候深信，指导他们的历史意识体现在社会党身上，被社会党的理论所证实，有赖于社会党政治力量这个强大的堡垒。

党是群众这个不可遏止的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实行着最有效的专政，建立在威信基础上的专政，即建立在自觉自愿地承认

这种对于保证事业的完全胜利所必需的威信基础上的专政。如果出于对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宗派观念而想去实现这种集中制的领导，想依靠直接政权的机械形式去控制参加运动的群众，想去把革命过程纳入党的组织形式，那就糟糕了。这样虽然可以领导一部分人，可以使历史“服从于自己”，但是现实的革命过程将会失去控制，失去党的影响，使党不自觉地成为保守的组织。

党在自己的宣传中必须依据以下不容争辩的论点：

建立在资本家占有劳动产品基础上的传统关系得到了根本改变。在战前，意大利劳动者不得不一小撮资本家和国家占有60%的劳动所生产的财富，而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居民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和文化需求只能享受40%的财富，这对意大利劳动者来说还不能算是意外的重大打击。而现在战后，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意大利社会只生产一半消费财富，国家却要从未来生产的物质财富中借去很大数量，也就是说愈来愈使意大利工人受国际金融寡头的奴役。在过去占有财富的两种人（资本家和国家）当中现在又增加了第三种纯粹寄生的人，这就是战时形成的由军事官僚等级构成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个等级恰恰吞噬了全部消费财富的另一半，即只有在将来才能创造出来的价值，这个等级吞噬这些价值的一部分是直接以薪俸和津贴的方式，另一部分则是以间接的方式，因为整个寄生性机构的存在都行使着寄生的职能。如果说意大利社会所消费的财富的价值是300亿，而它所生产的财富的价值是150亿，而这150亿是千千万万劳动者每天在8小时工作的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为此他们只得到60—70亿的工资，资本主义的预算只能用一种办法来平衡：强迫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得到同样工资的条件下多做1小时、2小时、3小时、4小时、5小时的工作，以便增加富人们的资本，重新开始资本主义的积累，使国家能够偿付自己的债款，使它能巩固寄生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

使它能奖励他们为国家和资本而作出的军事治安方面的效劳，奖励他们为迫使劳动者在机器旁和小块土地上卖命而作出的努力。

在这种资本主义关系的总的状况下，阶级斗争的任务只可能是由工人阶级来夺取政权，以便使这个强大的政权转而反对寄生虫，迫使他们工作，并一举结束对劳动者的骇人听闻的掠夺。全体劳动群众必须抱着这个目的团结起来，必须培养符合于自己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地位的某种意识。因此，每个工人和每个农民都应通过委员会参加复兴国家的事业，参加建立生产管理机构 and 专政机关的事业。委员会体现着旨在夺取政权的现时阶级斗争的形式。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机构网：委员会、工会、社会党，其活动乃是革命过程发展的形式。委员会是对生产机构实行领导的必要性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组织的历史性形式，是由于生产者的自我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形式。工会和党是自愿的协会，刺激革命过程发展的组织，是革命的“代表”和领导者。工会调配生产力并使生产机关具有共产主义形式；社会党则是生动的和富有活力的社会共存的典范——它将纪律和自由结合起来，使人能够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能力和热情。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19年12月27日第
31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98—104页

首先是更新党

社会党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党。它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出现在自由民主领域(即政治竞争的领域,这种政治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投影),这种社会力量力求为自己创造一个政府的基础并赢得国家政权,以便指导它去维护自己追随者的利益。它的使命是把工人和贫苦农民组织成一个统治阶级,研究并促进有利于无产阶级民主来临的一些条件。

意大利社会党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中最容易和最基本的部分。它成功地发动了直到最低层的群众;它成功地把劳动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进行革命和建立工人国家的纲领上;它成功地建设了一个拥有300万公民的政府机构,如果这个政府机构得到巩固并形成永久性的革命机关,它就完全能够接管国家政权。但是就其历史任务中的基本方面而言,社会党却没有取得成就。它未能赋予由于它在群众中间的宣传鼓动而成功地建立起来的机构以一种永久的和坚实的形式。它没有取得进步,因而导致了一场无秩序和死气沉沉的危机。为了赢得权力并作为决心去进行挑战的战斗力量的联盟而建立的社会党的政府机构,正在土崩瓦解。每天都可以看到,党同进行活动的广大群众愈来愈失去联系。事件发生了,然而党却不在。国家正在经受狂热病发作的折磨,腐蚀着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政权的势力继续在顽固地无情地起着作用;而党却没有干预,没有使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受到启发,没有为它的活动或无活动作辩护,没有发出口号去平息急躁情绪和制

止士气低落，使队伍秩序井然，并使工农大军的结构变得强大。曾经是意大利民族中最伟大的历史力量的党，已经沦为了一场政治幼稚病危机的牺牲品；今天它最充分地体现意大利民族的社会软弱性。因而毫不奇怪，在这样的顺利环境中，涣散革命团结的种子——机会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虚无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贩卖的虚伪的革命空谈（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表现的两个方面）——将成群地分裂出来并以如此惊人的速度进行繁殖。

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内和国际条件每天都显得愈来愈清楚明确；这些条件正在造成。但是现在，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工具——社会党，却陷于分裂之中，并受到议会政客们和全国性工会官员们以及一些个别人的攻击和阴险的纠缠；这些个别人要求得到代表权，而这种代表权却没有真正具体的基础，它是建立在模棱两可、缺乏任何行动的连续性、以及工人和其他一切意大利人所特有的思想懒惰的基础之上的。而共产党这一翼，革命的这一翼，即革命的多数所任命的指挥机构，没有任何联合行动来制止这种解体；来给党消毒并把它组织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把它组织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部分，强有力地结合到革命力量的世界体系中去，这些革命力量正在极其认真地努力实现共产主义的纲领。

俄国工人国家在军事上的胜利，粉碎和打破了曾使得全世界隶属于一小撮财团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抵抗。今天，以俄国工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作为基础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体系，已经能够支配一支拥有 200 万人的军队；它的胜利和它自己作为当代历史主人公的意识使它成为一支充满战斗热情的军队。第三国际的大军所取得的胜利和进展震撼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根基；它们正在加速资产阶级国家解体的过程，并加剧着西方民主国家的内部冲突。现在英国人关心着印度、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

中国，在这些地方起义的温床正在增多；他们温和地施加了压力，把克里孟梭从政治舞台上换下来。反布尔什维克傀儡的垮台立即暴露出了反动的法兰西集团的弱点，并且准备好了这个政治国家的瓦解；工人运动内部共产主义的和不要妥协的倾向已得到加强。俄国问题使得劳埃·乔治的机会主义对温斯顿·丘吉尔的反革命的不妥协持反对态度。但是英国民主的领域，以前是劳埃·乔治进行激进的煽动的一个绝妙场所，现在完全改变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结构继续在演变，缓慢地但确实是在朝着更高的形式演变。工人们在吵吵嚷嚷要更加经常和直接地参与制定他们的行动纲领。工会代表大会变得愈来愈多，革命者们正在使自己的意见更加频繁地和有效地在这些大会上发表出来。工会代表大会的常设总部正在从议会劳工党团的掌握中滑到一个中央工人委员会的手中。德国的谢德曼政府正在崩溃，在白色恐怖猖獗之时，它感到所有人民的支持都消失了。共产主义的和独立的工人们又获得了某种运动的自由，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德国民族从经济崩溃和军事反动中拯救出来这样一种信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由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巨大的推进，国际反革命体系正在崩溃。在公用事业巨大规模的罢工和内外政策可笑的失败的冲击下，意大利资产阶级国家正在土崩瓦解。

无论在国内和国际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必要条件都已充分具备。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社会党却没有尽它的职责。如果党只是一伙在总策略问题上的鼓动家、否定论者和不要妥协者，一伙基础理论的鼓吹者，它就没有能力组织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运动，它就没有能力充分利用时机和没有能力找到一个能使自己同广大群众保持经常接触的行动领域。社会党在组织自己内部的统一方面没有获得成功。它没有任何理论的和实践的游说使自己

能与国内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条件保持密切联系以便能掌握这些条件，控制事变而不被这些事变所制服和压倒。作为革命的工农的政党，它允许革命的常备军——工人的工会——处于机会主义者的控制之下，这些机会主义者能够任意施展它的魔力来耍花招；他们有计划地破坏每一项革命行动；他们形成了一个党内的党——而且是力量更大的党，因为他们控制着工人阶级主体的运动神经中枢。发生了两次对于国家可能是致命的罢工——它们现在将留下一长串来自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控和论战性的攻击——并且除了那种比第二国际更为过时与陈旧的办法外，党也提不出其他的办法：这就是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之间的区别。^①因此，当国家正经历一场极度的危机，当全副武装和充满仇恨的资产阶级可能已经对工人阶级发动一场进攻，当军国主义的政变隐隐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工人的革命中心只能株守自己的老方法，而又提不出一句口号来加以指导。工人阶级发现它自己被诱骗和禁锢在一个严密的水密舱系统之中，困惑不解，幻想破灭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的诱惑。

难道我们灰心丧气、士气低落了吗？不——但是必须把赤裸裸的原始真相说出来；把能够而且必须改变的局势暴露出来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社会党要不被那些几乎就在我们身边的事件所制服和压倒的话，它就必须更新自己。它之所以必须更新自己，因为它的失败将会意味着革命的失败。社会党必须真诚地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必须把在自己内部，在有组织的工人统一组织内部贯彻执行第三国际的纲领作为起点。有组织的群众必须成

^① 这里所指的罢工是邮政和电话工人的罢工(1920年1月14—20日)和铁路工人的罢工(1920年1月20—29日)，两次罢工都是由意大利工团主义工会领导的。意大利社会党把自己局限于表示一种含糊的团结姿态，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指责它是革命形势下对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工作拜占庭式区别的奴才。

为他们自己的斗争机构的主人，必须首先在他们自己的机构内部“把他们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必须和社会党在一起工作。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们，认识到当代巨大责任的革命者们——正是他们必须更新党，必须赋予党以确切的形式和明确的方向，他们必须防止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把党降低到普尔契尼拉^①之乡的这片土地上如此众多的其他政党的水平。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20年1月24—31日
第1卷第35期“一周政治生活”栏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1920）》1977年英文版第1卷第154—157页

^① 普尔契尼拉(Pulcinella)是意大利式的“笨拙”先生这种小丑角色。

都灵社会党支部的行动纲领

选举委员会已经决定挑选能够信赖的同志去完成并进一步开展前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新需要来组织它的革命行动^①。选举委员会因而宣布了指导它工作的基本准则，依据这些准则，它所编制的名单代表的不仅是一些名字的汇编，而且是一个含义明确的行动纲领。

* * *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这个最近的时期，党表明它自己没有能力对意大利劳动人民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给以坚定而明确的指导。党的活动已经和议会党团的行动混淆起来了——换句话说，这种行动或者是公开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行动，或者完全缺乏任何具体的内容，不可能有助于教育（从波洛尼亚代表大会所确定的革命意义上说）人民中的最广大部分，使他们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和纲领而团结起来。这种混乱的和无目的的状况在全国委员会佛罗伦萨会议所进行的讨论中最为突出：从那些变化无常的混乱的讨论中，显然可以看到：1. 党的一些领导机构正在比以往更多地为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所操纵；2. 最高纲领派的行动之所以软弱无力，是由于他们对于阶级斗争正在经历的阶段没有坚定的和具体的概念，也没有办法使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持久活动去和无产阶级运动最高机构中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持久活

^① “选举委员会”所承担的任务是准备选举都灵社会党支部的各领导机构。

动相对抗。

如果要克服这种混乱和迷惑的状况，那么，党就必须在群众中发动一场研究第三国际提纲的积极的运动，这些提纲曾经在波洛尼亚受到压倒多数的人的赞扬，然而由于议会的吸引力又立刻被丢之脑后了。

都灵社会党支部必须负责推动社会党去促使在意大利全国建立起工人和农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首先要以扩大工会行动为基础，这些行动不再是致力于赢得工时和工资上的改进，而是要把无产阶级对劳动工具和工农业生产的管理问题放在首位。要求实行这种管理的目的，是要把全体劳动人民在他们劳动的生产地点组织起来，把一个基层单位内部的群众中最广泛的阶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在这个具体而牢固的基础上——由于意大利没有公开进入激烈的内战阶段，这是一个唯一能提供灵活机动的自由的基础——使党能够开展宣传工作并开始建立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机构（政治的苏维埃）。因此，党必须抵制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想要把管理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职能，并使工厂委员会变为与资产阶级的国家官僚和议会进行合作的工业合作机构的任何企图。管理必须由纯粹的无产阶级机构来执行，工人阶级必须使这种管理成为他们的群众性革命行动的媒介。

都灵社会党支部，在现有的已经形成的健康而强大的工厂委员会的基础上，能够而且必须进入已经谈到的革命进程的第二个阶段。都灵支部为此而采取的每一项有力的行动将会鼓舞其他工业中心的劳动群众，并且阻止机会主义者的阴谋诡计，这些机会主义者总是想要把委员会的名义给予一些根本没有希望去开展和促进革命行动的机构，以此来愚弄工人。

在都灵，工厂委员会目前在劳动群众中建立了坚强的无产阶级纪律。

现在，这个支部必须利用这一牢固的基础去促进建立这个城市的工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力求使群众的政治和革命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并力求被群众认为是未来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地方机构——现在就必须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在过渡时期，这个委员会将必然既作为对议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经常进行批判的机构，又作为直接控制市政当局的机构而起作用。

市政的选举将必须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斗争：所有真正的决定权归工人委员会。地方支部将必须赢得委员会的大多数并保证主席、教育、宣传等等职位都委托给共产党员同志。

工人委员会应在地方支部的督促下准备、讨论并公布法律草案，之所以制定这些法律草案是为了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的真正目标的教育，并向他们指出，只有纯粹的无产阶级权力中心，即工人国家才能找到解决现阶段迫切问题的办法。因此，制定这些法律草案，是为了给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一个真正的、直接的意义。

为了给予革命运动以完全的自主和灵活机动的自由，支部必须对党和工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出组织上的解决。为此目的，支部必须着手在每一个联盟和工会内部在持久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将要在组织内部进行革命宣传并经常地批判和防止工会运动内部任何机会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退化。这样，阶级斗争的两个主要工具将要进行紧密合作，这种紧密合作不是单纯地建立在一次偶然的联盟条约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内部的联合和它们纲领的一致的基础上。通过工会内部的这些共产主义团体，支部将能够促进产业工会（手工业工人、白领工作者、技术人员的产业工会）的建立。这些产业工会同工厂委员会一起，将担负起制定和创建生产上的工人管理和共产主义经营的更高机构的任务，从而实际上超过了现阶段为工时和工资而进行的斗争。

《前进报》的问题将在讨论中提出来，这样，在与主管机关取得一致时，就能找到一项与我们的地区不断增长的需要相一致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必须加紧收集必要的资金，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资金，任何关于改善技术和管理的讨论都纯粹是学院式的空谈。

我们必须保证在最近的选举中所采取的工作纲领将尽可能地完全得到实现。同时，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正努力赋予我们主要的合作社机构的新生命不会损害这个机构，相反，将加速它的发展，把工人阶级群众内部愈来愈广泛的支持者阶层吸引到它这里来——他们将会看到它是进行防御和阶级斗争的一种有效的工具——并且准备发挥它作为征用和社会分配的最高机构的作用。

和都灵合作社联合会一样，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要求管理委员会每6个月就企业的发展情况和对已通过的纲领所进行的工作作一次汇报。

必须经常召集劳动群众参加协商会议，以便保持本阶级的和谐一致，这种和谐一致在过去有丰硕的成果，而今天和将来则会构成我们最大的力量。

严格地按照全国性领导机构的决定，我们将必须在群众中对所有带有真正阶级利益的问题进行鼓动工作，其目的是保持和加强无产阶级的政治敏感性并指引它向着共产主义前进。

我们相信资产阶级除了求助于反动的军事专政之外，是无法避免等待着它的命运的，而这也是它迟早要作的事。因此，党必须采取步骤以保护自己的组织。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步骤以保护自己的成果，不仅通过我们在上面提及的政治和工会范围的行动，而且还要进行特殊的物质准备。

这些活动显然不能是一个执行委员会的职责，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执行机构。但是执行委员会必须支持自愿承担这项任务的同志和团体在这方面的所有积极和认真的努力。在这一工作

中——它既有价值而又难以处理——执行委员会首先必须关心的是要防止出现孤立的和无纪律的行动，这些行动很可能是损害而不是加速我们的胜利。

地方支部必须将自己的所有活动置于这个主轴——它与现实革命的过程恰好一致——的基础上，并指向：1. 解决武装无产阶级的问题；2. 在全省发起一个强大的贫农和小业主的阶级运动以与工业运动团结一致。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20年1月24—31日
第1卷第35期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1920）》1977年英文版第1卷第158—151页

执政党和执政阶级^①

社会党是执政的党，是应当执掌政权的党。社会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即代表由工厂工人组成的、没有财产、永远不会成为私有者的阶级的利益。社会党正是把自己的现实活动建筑在这些利益之上，建筑在没有财产和确信永远不会成为私有者的人的利益之上。劳动者阶级不仅由产业工人构成：所有劳动者迟早会变成无产者，变成没有财产和确信永远不会获得财产的阶级。因此，社会党面向全体劳动者阶级，面向职工、贫苦农民、小私有者，向他们说明自己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证明所有劳动者，不管他从事何种劳动——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将成为工人阶级，而每个人似乎都能成为私有者的一切民主幻想都是天真的幻想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

自由党是工业家的党，是主张自由经济竞争的党，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党，是资本家阶级的执政党；它试图利用竞争，把整个有组织的社会劳动工业化，试图将整个私有者阶级变为自己的经济雇主的典型——资本家—工业家。

共产党是无产者的党，是主张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党，它是无产阶级社会的典型的党，是工人阶级政府的党。它试图通过协调和规划生产活动的国民经济中央委员会对曾经被资本家所工业化的全部工作实行社会化，并对还没有被资本主义所工业化的其

^① 本文是由两篇短文（《执政党》和《执政阶级》）合成的。这两篇短文原登在《新秩序》同一栏内，内容有紧密的联系。

余一切劳动部门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它试图使全体社会成员成为无产者，不过是新型的无产者：解放了的和获得新生的无产者，不掌握私有财产，但是管理社会财富并享受他们因自己在生产过程中付出的劳动而理应得到的欢乐和福利的无产者。

这个历史地位使社会民主党承担着一定的职责。既然它主要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产业工人阶级，那么它是执政的党。私有制使无产阶级面临着灭亡的威胁，面临着饥寒交迫的威胁。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经济竞争起先导致生产过剩，然后导致民族垄断的建立，导致帝国主义，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残酷冲突，导致财富的大量消灭，导致物价上涨，导致失业，导致因饥寒而死亡。没有财产的阶级，永远不可能成为私有者的人始终迫切地关心实行社会化，建立共产主义。但是，在其他的劳动者居民阶层中可能产生和发展新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实行工业化的那些生产形式中，私人所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可能开始发展起来并具有惊人的规模。在资产阶级国家被摧毁、金融资本所利用的国家机器被打碎以后，手工业者为了垄断全部劳动和全部生产为自己谋利，可能试图利用社会主义政府来发展自己的企业，使用雇佣劳动，成为工业家。假如无产阶级政府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就可能起来暴动，宣布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等等，并造成政治基础来建立无产阶级政府的反对党。小私有者（或者来自大地产、粗放经营体制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的贫苦农民），利用战时的食品供应条件还在延续这一情况，将1公斤土豆卖得比一个汽车轮胎还贵，一个面包比1立方米砖垛还贵，还可能要求在交换过程中将他的非机械化的、从而经济价值较小的劳动10倍于工人的价值较高的劳动。假如无产阶级政府不允许农民在剥削工人方面取代资本家，那么农民就会起来暴动，就会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中间找到一批人，来组织旨在反对工人的农民政党。在所有这些生

产领域里，即在无产阶级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可能丧失政治权利，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不是私有者并且绝对相信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私有者的无产者还未能创造劳动条件的领域里，可能甚至在革命后出现反对无产阶级的力量，这些力量试图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社会党既然代表受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死亡威胁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那么它就会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组织革命民族政府的委任状。但是只有当社会党能够帮助工人阶级消除一切诸如此类的困难，能够把一切社会成员变为新型社会所特有的新型的人——解放了的、获得新生的和摆脱了雇佣劳动奴役的无产者，能够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即各民族的统一的国际，没有国家的社会时，它才能成为执政的党。假如社会党能给革命提出具体的目标，假如它宣布无产阶级革命就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决使人民群众为之激动并陷入绝望的现时生活中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它就能成为革命政府的政党。这样的革命是目前社会党的最高纲领，但是它本来应当是最低纲领，而最高纲领应当指出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工作争取消灭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种对抗和冲突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使其切身利益在于建立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作好达到自己历史目标的准备，那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应当在自己身上培养象目前资产阶级那样的心理；当然，这里指的不是剥削的艺术，而是管理的艺术，即把无产阶级国家的这样或那样的创举，这样或那样的大规模行动进行到胜利结束的艺术。然而，即使无产阶级愿意，它也不能在自己身上培养剥削者的心理。无产者不可能成为私有者，如果它不破坏工厂和机器，不成为一堆破铜烂铁的所有者，那么它过不了几天就会死亡。正因为这样，由于工业生产的高度技术条件，它不可能成为私有者和剥削者，无产者负有历史使命去建立

共产主义社会，去解放所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

社会党将在实际上成为革命政府的党，如果无产阶级确信，只有通过革命途径执掌政权的阶级政府才能解决它的直接的迫切任务。

工人阶级懂得，只有从事生产，它才能统治社会，才能把社会引向共产主义。因此，从事生产和扩大生产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基本的和经常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包含以下内容：如何争取使工人阶级能够维持生产并能够扩大生产；如何争取使工人们不为每日的面包而发愁，以便使他们体力上健壮，文化上得到发展，能以全副革命热情献身于工业劳动，献身于生产，探索和采用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链条中的牢固环节的新的劳动方法，新的生产方法。工人阶级面临的直接任务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保证劳动者的粮食，建立这样的政治制度，使食品的分配不是自流，不是按私人所有者的愿望，而是根据劳动者的需要和生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将日益具有具体的历史意义，将愈来愈成为丝毫没有雅各宾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的原则，同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公式毫无亲缘关系的原则。

无产阶级的原则公开承认，它对受资产阶级社会带来的腐败和破坏所威胁的人类社会必须加以维护的时机已经成熟。必须生产物质财富，而要生产这些财富，工人阶级必须在体力上和智力上能够胜任英勇的劳动。正因为这样，必须使现有的粮食资源首先用来维持工人阶级，维持生产者阶级，以实现这样的政权，即能够强迫采取这样的措施，能够保证工人阶级有这样的生活条件，有这样的物质水平，使它能够进行工作，扩大物质财富的生产。如果现有的粮食平均每人每日只能消费200克，那么政府就必须保证工人每天有300克粮食，而让不工作的居民每天只有100克以至更少

的粮食，甚至根本不给他们提供任何粮食。这样的政府只能是工人的政府，只能是成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的政府。

如果工人阶级根本不能行使工人国家的执行权，那么工人政府也就不可能实现。工人本身必须注意工人国家法律的实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国家才不致面临落入冒险家和政客们之手的危险，才不致面临与资产阶级国家混同的危险。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学会从事公共事业，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必须取得统治阶级的文化和心理，通过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在群众大会上，在代表大会上，在各种讨论会上，通过相互教育的方式来取得。工厂委员会就是试图在工人国家中进行自治的意大利工人阶级这一历史经验的最初形式。第二步，即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将是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将请意大利所有工厂的代表来参加。代表大会将由专门选举出来的代表而不是工会官员所代表的全体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将提出并力图解决使意大利无产阶级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阶级的内部问题，如无产阶级统一、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加入第三国际、通过第三国际的某些提纲（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工会等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对工业实行工人监督、8小时工作日、泰罗制、劳动纪律等问题。现在同志们就应当在按企业召开的大会上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全体工人群众都应关心这些讨论，都应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用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工厂召开的所有大会上，必须将有关这些问题的详尽的和有根据的建议进行讨论并提付表决，而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应当分析在工厂大会上展开的讨论情况，协调全体工人群众所进行的工作，即探索真理和把决议具体化。这样，都灵的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就会真正成为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从整个意大利汇聚起来的工人们就会得到光辉的证据，证明工厂委员会为了把工人阶级引向解放、引向胜利能够作

出什么样的事情来。都灵的工人们将比现在更明显地在发挥革命热情、在自我教育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取胜和巩固的条件方面作出榜样。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20年2月28—3月6日第39期“一周政治生活”栏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127—133页

为了社会党的新生

(这份报告是作为社会党都灵市支部和省联合会代表们的报告向在米兰召开的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会议提出的，是对社会党领导的活动和方向提出批评的基本论点。)

1. 目前意大利阶级斗争的特点是，国内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充满决心、明确无误、不畏暴力地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国内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导致货币愈来愈贬值的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现存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最起码的需求，它之所以还保留着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武装力量强烈地保护它；意大利劳动者的整个斗争将不可遏止地导致经济领域内的巨大变革，其结果将确立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而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将从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手中夺取领导权，在生产领域中占据领导地位。

2. 工业家和土地占有者最大限度地积聚了自己的阶级力量并通过残酷的纪律联系起来：意大利工业家总同盟的任何要求立即能在每个企业中付诸实现。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了雇佣的武装军团^①，其使命就是充当工具来忠实地执行私有者阶级这一新的和强大的组织的意志，这个组织则竭力通过广泛采取同盟歇业和恐怖手段来恢复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通过大大提高无报酬劳动的份额来不断加强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不久前都灵金属加工

^① 指“皇家近卫团”。

工厂发生的同盟歇业就是说明工业家企图迫使工人阶级屈服的明显例子：工业家利用意大利工人队伍中缺乏协调和革命团结这一点，企图给予都灵无产阶级以毁灭性打击，并在工人当中破坏为争取工人监督而斗争的生产组织（工厂委员会和车间代表组织）的威信和影响。

在诺瓦拉省和洛美林区不断发生的农业工人的罢工证明，土地占有者打算缩减农业生产，以便使农业无产者阶级落到绝望和饥饿的境地，陷入最困难和最屈辱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之中。

3. 继意大利阶级斗争的目前阶段之后，将出现两种局面：或者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便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是有产阶级和统治阶层反动派十分猖獗，为了驱使工业和农业的无产阶级去从事劳动，将使用暴力武库中的一切手段；将竭尽一切手法来无情地破坏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机构（社会党）并把经济对抗机构（工会和合作社）纳入资产阶级国家的机构。

4. 工人和农民缺乏协调的行动和革命的团结，因为社会党的领导机构根本不懂得意大利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现阶段 的性质，根本不懂得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应起的作用。社会党只是扮演着事件的普通旁观者的角色，它不提出自己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革命立场上的观点，不提出能为群众所接受的、能使革命力量具有总的方向、能使这些力量具体化并团结一致的口号。社会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组织，应该开展全面的、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细节上都经过深思熟虑的活动，以便保证工人阶级有可能在革命中取得胜利，而且取得巩固的胜利。社会党作为工人阶级中不会被资本主义制度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压迫而弄得精神萎靡和处于完全消极状态的一部分，作为能够保持独立性和发扬建立在自觉性和纪律基础上的主动精神的一部分，应该成为

整个被剥削阶级的深刻领悟的革命意志的体现者。党的任务就在于成为全体劳动者群众的吸引中心，就在于它的指示能深入全体劳动者群众的心灵并牢固地赢得他们的信任，从而成为这些群众的领袖和大脑。因此，党必须每时每刻同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进行的具体的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必须理解这一斗争的各个阶段、各种因素和表现的特点，以便善于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斗争中找到一条轴心，能够给整个运动提出总的符合具体条件的指示，并使群众相信，在目前这种混乱局面中包含着秩序的萌芽，后者的胜利就会使人类社会复兴，使劳动重新保证人们的起码需求和成为进步的源泉。事实上，甚至在波洛尼亚代表大会^①之后，社会党也依然是纯粹议会型的政党，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范围内，只是对统治阶层政策的外部表现作出一点反应；社会党没有自己的面貌，不具备革命政党所特有的品质。

5. 波洛尼亚代表大会后，党的中央机关本应立即开展有力的工作并将其贯彻到底，以便使党成为单一的和完整坚强的革命队伍，以便在自己身上培养加入第三国际的共产党所应有的品质。然而，同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甚至没有开始进行；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前进报》都没有提出自己的革命观点来同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在议会和工会里不断进行的宣传相对抗。党的领导机关在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没有做任何工作，没有激励群众将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排除出工会和合作社的领导机关，没有给个别支部和一些积极的党员提出统一的方针和策略。因此，当党的革命多数派还没有在党的领导和报纸上拥有反映它

^① 社会党波洛尼亚代表大会是在1919年10月5—8日举行的。大会以改良主义者失败而告终，并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塞拉蒂的决议案，其中谈到意大利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

的意见和执行它的意志的代表时，机会主义者则在组织上得到加强，并利用党的威望和影响来巩固自己在议会和工会中的地位。党的领导使他们团结一致并投票通过与第三国际的原则和策略相违背、与党的路线不一致的决议；党的领导给予下级机关充分权利进行活动和散布与第三国际的原则和策略相违背的观点；党的领导始终不变地站在各支部和各组织以及个别一些党员的生活和活动之外。在波洛尼亚代表大会以前党内存在的、由于当时战时条件决定的混乱现象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大大加强；很自然，所有这一切不能不损害广大群众对党的信任，而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倾向重新占优势的危险。只有当工人阶级政党把无产阶级力量联合起来并审慎地加以协调，只有当它以实际的革命政权来对抗资产阶级国家的合法政权并限制后者发挥主动性和施展手腕的自由，它才有权利存在；如果党不能联合和协调力量，如果党成为毫无生气和缺乏意志的纯粹官僚主义的组织，那么工人阶级当中就会本能地产生重新建党的愿望，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来不断地批评党的机构的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

6. 党过去和现在一直站在国际运动之外。阶级斗争在世界各地具有宏大的规模；无产阶级被迫在各地制定新的斗争方法，并常常——例如德国在发动军国主义叛乱之后——一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党对应用共产国际所作的分析和评价来向意大利劳动者说明这些事件的意义漠不关心，它不进行教育工作，以便使意大利劳动者意识到这样一个真理，即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性和每一个事件都应从它的国际意义来看待和评价。第二国际已经在西欧召开了两次代表会议，一次是在1919年12月在德国的一个城市，另一次是在1920年2月在阿姆斯特丹；意大利党不仅没有出席其中的任何一次会议，中央机关也没有告知党员，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哪

些问题和通过了哪些决议。至于第三国际，那么在它内部就共产国际的纲领性方针和策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事态甚至发展到某些党的分裂（例如德国）。意大利党站在这场锻炼了革命意识、锻炼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的卓有成效的思想争论之外。党的中央机关报在法国、英国、德国、甚至瑞士都没有自己的记者。在意大利，代表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党的报纸处于这样的境地实在令人惊讶，而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的工人阶级竟不得不从资产阶级通讯社和报纸的片断的和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中得到情报！作为中央机关报的《前进报》本应成为第三国际的机关报；在《前进报》的版面上，第三国际所密切注意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事件、一切争论、一切问题都应有所反映；在《前进报》的版面上，应当根据统一的原则开展反对一切错误倾向和机会主义妥协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事实上《前进报》却给机会主义的宣传提供篇幅，例如不久前特雷维斯^①在议会上的讲话^②就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解释国际关系，在关于无产阶级力量的问题上发表了反革命的和失败主义的观点。

党的中央机关完全忽视向无产阶级告知关于第三国际内发生的事件和理论争论的必要性，还表现在党的书籍出版活动上：出版社继续出版没有任何价值的宣扬第二国际的方针和观点的小册子和文章，而忽视第三国际的出版物。俄国同志的著作（没有它们就不可能理解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特点）在瑞士、英国和德国都已经翻

① 克劳狄奥·特雷维斯(1869—1933)，是继屠拉梯之后意大利最著名的改良主义领袖。1906至1926年任众议员；1909年任《前进报》编辑；1926年法西斯上台后，他流亡法国，在各党派联合组成的“反法西斯中心”工作，并主编该组织的机关报《自由》周报，一直到1933年6月11日他在巴黎逝世。——编者

② 指1920年3月31日克劳狄奥·特雷维斯在议会上的“赎罪性”演说。它的主要思想是：资产阶级不能再行使政权，而工人阶级还没有力量夺取政权。特雷维斯还一口咬定，这就是负有“赎罪”使命的统治阶级的悲剧所在。

译出来，而在意大利却不为人知。只要举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样一部著作就够了。最后，翻译出来的东西却非常糟糕，常常是由于意思曲解和语法错误而弄得令人根本不懂。

7.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我们认为必须进行的更新和在组织上加强党的工作应当包括哪些。党应该具有自己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面貌，它应该从小资产阶级议会型的政党变成通过工人国家为争取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单一的完整的具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策略、保持坚强和严格纪律的政党。每一个并非革命者——共产主义者的人都应被驱逐出党和党的领导班子，那时党的领导就不必为维护统一和保持各派和各首领之间的平衡而操心，就可以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用来建立战斗的工人组织。意大利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生活中的每个事件都应立即在党的领导的号召和指示中加以评论，以便使它能够通过用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群众革命意识的教育。领导应同党的各个支部保持经常的联系，应当指导无产阶级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的全部活动。各支部应当促使在所有企业、工业、合作社、部队建立共产主义团体，这些团体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在群众中宣传党的纲领性方针和策略，保证建立工厂委员会以实现对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监督；这些共产主义团体应进行必要的宣传，以便牢固地占领工会、劳动协会和劳工总同盟，取得群众的信任，使群众授以建立政权机关——苏维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权。一旦有了完整坚强的和服从严格纪律的共产党，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可以通过党员群众在工业企业、工会和合作社进行活动，指导和协调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活动，并成为采取某种尝试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的和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尝试都必将作为荒诞的尝试加以抛弃，而只对那些企图败坏苏维埃思想的人有利。还必须抛弃关于建立某种类似小规模社

会主义议会的建议^①，因为这种议会将很快变成议会党团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多数派的工具，变成散布民主幻想和反革命空洞计划的工具。

8. 党的领导应该立即制定和宣传社会党的确定革命政府任务的纲领，在纲领中将明确规定，无产阶级一旦成为统治阶级，将打算如何解决一切极重要的经济政治问题、宗教问题、教育问题和其他使意大利所有劳动阶层关心的各种问题。根据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是党在自己活动中的力量源泉和支柱，而其他劳动者阶层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方针，党应当发表宣言，明确提出革命地夺取政权的问题，号召工业和农业的无产阶级作好战斗准备并武装起来，根据共产党人的意见制定出作为解决以下迫切问题的基础的措施：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解除雇佣部队的武装，工人组织对地方政权机关实行监督。

9. 根据上述原则，社会党都灵支部提出将同各支部内为讨论和赞同这些原则而成立的各派达成协议。在达成协议的同时，还应采取组织措施，以便有可能在最短时期内筹备召开代表大会来讨论无产阶级的策略和组织问题，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监督党的执行机关的活动。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20年5月8日第
1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157—165页

^① 指关于召开由社会党议员以及最大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而不是党的领导或党的全国委员会）的建议，以制定法律草案并对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类大会里，改良主义者将取得大多数。

塔斯卡的报告^①和都灵

劳动协会代表大会

在上一期杂志上，我们全文发表了安吉洛·塔斯卡受都灵劳动协会执行委员会委托起草的、在劳动协会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无论如何没有得到《新秩序》的批准，从而也不是对《新秩序》上为了建立和推广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思想 and 理论而阐述的提纲的某种具体的互相呼应的或者表示赞同的研究。这个报告发表出来和应当发表出来，就象在《新秩序》上发表埃尔科利·布科同志向组织上属于波洛尼亚劳动协会的工人们发出的纲领性宣言一样，是作为与工厂委员会发展重要阶段有关的、表明在一定时期内一些著名活动家和工会代表团对这一新的工人机构所可能采取和正在采取的理论立场和实践立场的文件。

塔斯卡同志认为，他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工会组织的委托就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这样做是对的。他认为，他同意作为劳动协会执委会的正式报告人，尽管实际上并不是正式报告人，这样做是对的。他所采取的立场，他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很有意思和很有成效的——例如，从知识的和抽象的观点来看，它确实可能是这样（他表演了一个站在党派斗争的卑下环境之上的集传教士和教师的特点于一身的人物），但是实际上塔斯卡的行为只会产生误解和

^① 关于同塔斯卡论战的起因和发展经过，见《〈新秩序〉周刊的纲领》一文。

幻想，并有助于造成倾轧和机会主义手腕。塔斯卡通过自己的行为只能达到并且确实已经达到了一个结果：使都灵劳动协会代表大会可能具有和本来应当具有的历史意义化为乌有。

在塔斯卡仓促拟就的报告中，没有报告叙述的材料所集中围绕的从而使报告赋有生命力的中心思想。塔斯卡同志没有掌握关于俄国工厂委员会发展的确切情报，虽然要得到这类情报并不十分困难。例如，塔斯卡同志硬说，“俄国人的最新经验的材料似乎使他们得出结论，必须将每个企业的管理权不仅交给该企业的工人，而且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直接代表。”

《新秩序》在1919年8月16日的一期上发表了《苏俄怎样实行国有化》一文，文中对俄国工厂中这种领导体制的确立从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描述和阐释，把它说成是发展过程的最高阶段，是由共产党人倡议并促其实现的。在布哈林《共产主义ABC》一书（1918年5月出版）的《从工业的监督到管理》一章中，谈到这种体制是企图克服俄国工人阶级落后部分中的小资产阶级心理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的纲领性要求。俄国人的“最新”经验是工业军事化，这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工厂委员会的解散。问题在于，由于能源和工业设备的缺乏，工人国家不得不允许大批与无产者心理格格不入的、从而不能在生产领域实行自治的农民群众进入某些企业。对于这些落后的农民群众来说，工厂委员会没有任何意义（在生产领域上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他们来说，革命军队的纪律，连同它的语言和它的革命热情，乃是集体纪律唯一合适的形式。

塔斯卡报告中存在的有关工厂委员会问题的“书目”的缺点和不确之处，还表现在对时间和发生地点较近的文献上。在就劳动协会展开的讨论所作的决议草案（载《前进报》）中，他把车间代表任务的表述归功于斯克雅威洛，实际上是都灵工厂的车间代表自

已提出的，而斯克雅威洛只是从1918年11月8日《新秩序》上发表的章程中引用下来。在章程中，收集和整理了反映都灵车间代表具体经验的大量材料和许多建议；所有这些材料使工厂委员会研究委员会付出了不少劳动，因此把上述表述归功于斯克雅威洛是不公允的，因为他只是抄录了报刊上公布的最后方案。

塔斯卡在同加里诺同志争论关于工会的基本任务不是培养工人的生产者意识而是维护雇佣工人的利益的说法时，情况也是这样：这个说法包含在同一天，即1918年11月8日《新秩序》上发表的《工团主义和委员会》的社论中。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里诺在1919年12月劳动协会非常代表大会上以非凡的热情和巨大的辩证艺术阐述和捍卫这一论点时，我们与塔斯卡同志相反则表示欣喜的惊讶和深刻的不安：我们认为建立工厂委员会是必然要导致成立工人国家的历史过程的开端，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里诺同志的立场再一次证明经常存在的一个深刻信念，即在真正的革命过程中，全体工人阶级将自发地导致理论和实践领域中的统一，而每个工人，只要他是真诚的革命者，他在执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面临的、决不是作为在个人意识中自发地产生的某种朦胧意愿的任务时，不可能不趋向于同整个阶级的合作。

但是，我们所考虑的和现在坚持的工厂委员会的观念在塔斯卡的报告中连提都没有提到，也没有相等的东西来取而代之。我们设想的工厂委员会是一个崭新的特殊的机构，它的出现是由工人阶级的地位，目前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不能把它同工会混淆起来，它不能同工会相一致或者服从于工会，相反，它以自己的产生和发展引起工会结构和形式的根本变化。

目前，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统治，是银行对工业企业、交易所对商品生产、垄断组织对工业资本的统治。这是资本主义的有机的正常的结构，而不是象塔斯卡同志所

说的、同考茨基的说法相一致而违背共产国际基本论点那样是“战时习惯产生的毛病”。第三国际的理论家们(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罗莎·卢森堡、潘涅库克等)早在世界大战之前就捍卫这一基本论点,他们主要根据希法亭《金融资本》一书中的材料和结论,在同世界大战期间和世界大战之后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中派”的考茨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他思想家们的论战中捍卫了这一论点。根据这一经济论点,国际的理论家们那时就阐述了其他论点——关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由于英国和德国之间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而笼罩天空的大屠杀阴云所必然发生的国内战争。国内战争,各国工人建立自己的国家,承认委员会和委员会体制是整个国际本身的共同的工人国家的形式,是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使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合乎规律地产生的国家的形式,——这就是作为共产国际基础的、考察新的工人机构的产生所依据的一系列逻辑思想。塔斯卡同志用大量共产主义和革命的辞藻粉刷自由的报告,来替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帮忙,他们根据官僚主义的“纪律”,即充当生产领域内意味着在法律上巩固工厂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关系的合法准则的捍卫者,一直企图歪曲使阶级斗争超出这些合法准则范围之外的工厂委员会的性质。

这样,由于塔斯卡同志的这个缺乏必要知识(无论从一般理论观点,还是从委员会的观点看都是这样)来正确阐述该问题的报告,由于这个“正式的”同时也是“非正式的”报告以不偏不倚的、似乎证明报告人善于凌驾于工会运动中派别斗争之上的态度给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留下了愉快的印象,这样,都灵劳动协会代表大会只能使人产生茫然和混乱,只能加强对于工会运动来说,尤其是对于工会和劳动协会来说最有害的局面。

当我们同塔斯卡同志一起创办《新秩序》时,我们曾经约定首

先确立互相监督和互相批评的权利和义务，开诚布公地说出最痛苦的真理，因为我们打算在我们这派当中建立相互关系的最高形式。塔斯卡同志，请允许我们说，你的几个小时的发言破坏了教育和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工作，这是《新秩序》周刊和“新秩序派”需要付出一年的劳动和努力才能挽回的。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20年6月5日第
4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171—176页

工会和委员会

工会，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工会之所以成为工会，也就是说它之所以采取一定的历史形式，是因为组成工会的工人们的力量和意志使它具有一定的方向并向它提出这个组织的名称所表明目标。

工会客观上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组织起来以便在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时所采取的和唯一可能采取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由职员、专家（当他们确实是专家时）组成的机构，在组织问题上，在技艺上把劳动力联合起来并领导他们，以便在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之间建立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均势。

工会的发展有以下两个特点：（1）工会包括愈来愈多的工人，也就是说使愈来愈多的工人具有纪律性；（2）工会联合和集中着自己的组织，但还没有把惩戒权力和对运动的领导集中于一个领导中心，换句话说，工会使自己脱离它所组织起来的群众，从而使自己不受情绪激动的群众所特有的瞬息变化的愿望和反复无常的情绪所左右。这样，工会就有可能签订协议，承担义务，迫使雇主将自己同工人的关系合法化，因为雇主相信，工会能够使工人群众遵守所签订的协议。

在工业中确立合法的关系是工人阶级的巨大成果，但是它并不是最终的成果。在工业中确立合法的关系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但这只是一种妥协，是在力量对比对工人阶级来说不利的时候必须作出和必须忍受的妥协。如果工会组织的领导人把

工业中确立的法制看作是必要的妥协(但不是永久性的),如果他们运用工会所可能拥有的一切手段使力量对比朝着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方向改变,如果他们开展意识形态和物质方面的全部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工人阶级能够对资本转入胜利的进攻并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那么工会就是革命的工具,工会的纪律,即使是为了让工人遵守工业中的法制,那也是革命的纪律。

在确立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之间应有的关系的性质时,必须根据对工业中确立的法制的本质和意义所作的评价出发。

委员会是对工业中确立的法制的否定,它经常试图消灭这种法制,始终试图引导工人阶级去争取对工业的统治,使工人阶级成为对工业享有权力的源泉。工会是法制的因素,它的任务应当是使会员遵守法制。工会对工业家负责,但是它对工业家负责的程度是以它对会员负责的程度为限的:它保证工作不间断,保证取得工资,即取得工人及其家属所需要的面包和赡养。委员会按其革命性质来说竭力试图随时开展阶级战争;工会由于其官僚主义的本性而竭力不让某种阶级战争发生。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委员会考虑欠周的举动不致引起工人阶级的退却,不致引起工人阶级的失败,换句话说,不致造成这样的状况,使委员会不得不服从工会的纪律。这些关系应当这样来建立,以致使委员会的革命性质给工会以影响,成为克服工会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试剂。

委员会随时试图超出工业中确立的法制的范围。委员会是被剥削、被压迫、被迫从事奴隶劳动的群众,因此它希望把任何一次革命发动变为普遍的发动,使自己在通向政权的道路上的每一个步骤都具有决定的性质和意义。工会作为对遵守法制负责的机关试图使这种法制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并使其永久化。工会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应当创造这样的条件,即能够在对工人阶级最有

利的时刻，在工人阶级进行为保证取得持久胜利所必要的最低程度的准备工作时，得以超出法制的范围，实行进攻。

工会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只应建立在以下的基础上，即委员会的大多数或者大部分当选人都应参加工会。想要使一个机构服从另一个机构的任何企图都不可能不导致两败俱伤。

有一种观念认为委员会是工会斗争的简单工具，它具体体现在官僚主义的纪律中和工会拥有直接监督委员会的权力中，假如这样，那么委员会就不再是扩大革命斗争的机关，不再是自发地导致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导致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发展的形式。由于委员会的产生是同工人阶级在工业生产领域中占据愈来愈牢固的地位联系着的，由于委员会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想要使它服从工会的企图迟早会引起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冲突。委员会的力量在于，它已牢固地铭刻在工人群众的意识之中，它已成为竭力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争取创造历史的权利的工人群众的自我意识。全体群众参与委员会的生活，并感觉到，由于这种参与而成为一股力量。而参与工会生活的只是一小部分会员。这是工会具有现实力量的源泉，但也是它之所以包含着极其严重后果的弱点的泉源。

如果工会直接依赖委员会——不是为了统治它，而是为了充当它的最高形式，在工会的行动中表现出委员会所固有的倾向，即随时超越在生产中确立的法制的范围，随时发动坚决的阶级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就会丧失自己的签订协议的能力，丧失自己作为制约和调节工人阶级冲动性运动的力量性质。

如果工会会员在工会中确立革命的纪律，确立被群众看作是工人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所必要的纪律，而不是受资本奴役的纪律，那么这种纪律无疑会被委员会所欢迎和接受，会成为委员会活动的自然的形式。

如果工会的领导机关成为准备革命的机关，并且被群众看作是这样的机关——根据它从事的活动，根据它组成的人员，根据它进行的宣传——那么它的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将得到群众的谅解，并被看作是一种巨大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在决定性斗争中的补充条件（极重要的条件之一）。

在意大利现实条件下，工会的官员把工业中确立的法制看作是永恒的法制。它常常从与私有者相同的立场出发来维护这一法制。它把工人群众中发生的一切只看作是混乱和放肆。它不能从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工人对资本主义纪律所表示的愤怒行为：它只是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本身可能具有令人不快的形式的具体事实。于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没有头脑的新闻记者的渲染，“装卸工人的雨衣”事件竟象“俄国的妇女公有化”的故事一样广为流传。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纪律只可能对资本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使委员会服从工会的任何企图只可能被看作是反动的企图。

鉴于共产党人希望革命行动尽可能是有意识的和负责任的，从而希望对工人转入决定性进攻的时机的选择权（如果谈得上选择的话）属于工人阶级中组织成为社会党、积极参加组织生活的最有觉悟和最负责任的部分。因此，共产党人不可能希望工会丧失其纪律性和集中性。

共产党人在工会和企业中组织成经常行动的小组，必然要把第三国际的思想、提纲、策略带到工会和企业中去，必然要对工会纪律的性质发生影响并确定它的目标，必然要对工厂委员会的决定发生影响并把由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处的地位而产生的自发的愤怒冲动变成为自觉的和创造性的革命行动。鉴于参加社会党的共产党人肩负着最重大的历史责任，他们将比其他所有人更加关心，以便使他们的坚持不懈的活动引导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去确立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将使它们的

纪律和组织工作具有革命精神。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20年6月12日第
5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176—181页

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

(1920年7月送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不久前从苏维埃俄国回来的意大利代表团的成员向都灵工人报告说，在喀琅施塔特，他在为欢迎代表团而准备的讲台上看到一副标语：“1920年4月都灵总罢工万岁！”

这个报告使工人感到很高兴，很满意。到过俄国的代表团的多数成员是反对四月总罢工的。他们在反对这次罢工的文章中认为，都灵工人在这种场合成了“幻想”的牺牲品，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罢工的意义。

因此，都灵工人了解到喀琅施塔特同志们对他们表示同情，感到很高兴，他们对自己说：“我们俄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比意大利机会主义者更了解四月罢工的意义，做出了确切的估计，他们给意大利机会主义者上了很好的一课。”

四 月 罢 工

都灵的四月运动不仅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历史上，而且在整个欧洲无产阶级历史上，也许甚至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历史上，都确实是个巨大的事件。

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为监督生产而斗争，但不是迫于饥饿和失业而进行这种斗争；此外，参加斗争的不仅仅是少数人，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所有都灵工人都来进行斗争了。

他们坚韧不拔地忍受了各种艰难困苦，把这次斗争进行到底。

金属加工工人罢工1个月，其他各种工人罢工10天。

在最后的10天，总罢工席卷皮埃蒙特全境，就是说，约有50万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参加，这样就把约400万居民卷进自己的直接活动范围。

意大利资本家的一切力量都用来镇压都灵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手段都交归他们支配。工人不得不孤军作战，因为不论是社会党的领导，还是劳工总同盟都没有给以支持。不仅如此，该党和总同盟的领导人还嘲笑都灵工人，尽一切可能制止意大利工人和农民群众采取任何革命行动，即制止他们想通过革命行动表现同自己的都灵兄弟团结一致并给以有效支援等活动。

虽然如此，都灵工人并没有气馁。他们顶住了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一切压力，一直到最后仍然遵守纪律，甚至在失败以后也忠于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旗帜。

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在工人中间宣传反对党的纪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在罢工由于领袖的叛变而以失败告终后也没有取得成效。况且都灵工人发誓要加强革命斗争，现在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这种斗争：既反对资产阶级胜利者，又反对叛徒领袖。

都灵无产阶级群众表现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纪律来源于都灵阶级斗争赖以发展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

都灵是典型的工业中心。其50万居民中几乎有3/4是工人，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微不足道。此外，在都灵有着密集的一批组织在工会中，参加劳动协会的职员和专家。他们同工人一起参加了一

切大罢工，因而具有了（即使不是所有人，至少也是多数人）反对资本、为革命和共产主义而战斗的真正无产者的道德品质。

工 业 生 产

都灵工业高度集中，非常单一。在各工业部门占首要地位的是金属加工工业，该部门就业工人达5万，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达1万。单是在各“菲亚特”工厂就有工人、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3.5万，该公司的主要企业拥有用最新和最完善的生产方法生产各种类型汽车的工人1.6万。

汽车生产是都灵金属加工工业的主要部门。该部门的大部分职工是熟练工人和专家，但是他们没有其他国家例如英国的熟练工人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

在金属加工工业中占第一位的汽车生产，使得其他生产部门，诸如木材加工工业和橡胶工业都从属于自己。

金属加工工人是都灵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于这个生产部门具有这种特点，在金属加工工人中间发生的任何运动都遍及所有群众，即令它最初提出的只是工会的、经济的要求，也具有政治的和革命的性质。

在都灵只存在着一个拥有9万会员的大工会组织——劳动协会。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团体对于群众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群众都坚定不移地支持其成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工人的社会党支部。

共产主义运动拥有下列一些战斗组织：有1500党员的党支部，有1万成员的28个小组，有2000成员的23个青年组织。

在每一个企业都存在着有自己的领导核心的常设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团体按照企业所在地点联合为由社会党城市支部委员会

领导的区小组，该委员会掌握着整个有组织的城市共产主义运动并且领导着工人群众。

都灵——意大利的首都

在产生现时意大利资产阶级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前，都灵是包括皮埃蒙特、利古里亚、撒丁的小国家的首都。当时，在这个国家中，小工业和商业占统治地位。

在意大利恢复统一和迁都罗马之后，看来，都灵有失去自己过去的地位的危险，但是，它很快克服了经济危机，成为意大利的重要工业中心之一。可以说，在意大利有3个首都：罗马——资产阶级国家的行政中心，米兰——国内商业和财政活动中心（所有银行、商业公司和财政机关都集中在这里），都灵——工厂工业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的工业中心。迁都罗马以后，向新资产阶级国家提供了为完成任务所必需的行政干部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离开了都灵；而大工业的发展则把整个意大利工人阶级的精华吸引到了都灵。这个城市的发展过程在意大利和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这样，都灵无产阶级便成为同都灵有千丝万缕联系，如家庭的、传统的、历史的和精神的联系的工人群众（每个意大利工人都想在都灵工作）的精神领导。

上述一切可以说明，为什么全意大利的工人群众甚至违背自己领袖们的愿望都竭力表示支持都灵总罢工；他们都把这个城市看作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首都，看作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彼得格勒。

两次武装起义

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都灵有过两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发生在1915年5月，其目的是阻止意大利参加反对德国的战争（当时，人民宫被警察破坏）；第二次起义爆发在1917年8月，具有大规模武装革命斗争的性质。

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在都灵令人感到难以形容的喜悦。工人知道沙皇政权被彼得堡劳动人民推翻以后，高兴得热泪盈眶。但是，都灵工人没有轻信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蛊惑人心的空话而上当受骗。当1917年7月彼得格勒苏维埃派往西欧的代表团到达都灵的时候，代表团团员孟什维克斯米尔诺夫和戈尔登贝尔格在5万名工人群众面前受到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列宁万岁！布尔什维克万岁！”

戈尔登贝尔格不很喜欢这样的欢迎；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列宁同志怎么能在都灵工人中有这么大的威望。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七月起义被镇压之后，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报刊上充满了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恶毒攻击，把他们称为强盗、阴谋家、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and 暗探。

从意大利参加战争（1915年5月24日）时起，都灵无产阶级再没有举行任何游行示威。

街垒、堑壕、铁丝网

欢迎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的群众大会开创了群众运动发展的新时期。还没有过1个月，都灵工人就手持武器起义反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起义爆发在1917年8月23日。工

人们在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上战斗了5天。弄到步枪、手榴弹、甚至机枪的起义者占领了几个区，有三、四次还试图夺取市政大厦和军事指挥大厦所在地的市中心。

但是，两年的战争和反动已经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坚强组织，武装比对手差的工人被打败了。想得到士兵支持的指望落空了，因为士兵相信了下述诽谤：仿佛起义是德国人策划的。

人民构筑了街垒、挖了堑壕、用通电流的铁丝网把几个区圈了起来，在5天当中反击了军队和警察的一切进攻。有500多工人在战斗中死亡，有2000多工人受重伤。在失败之后，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遭到逮捕和被驱逐出都灵，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削弱了，但是，群众的思想情绪象过去一样，仍是共产主义的。

下述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在8月起义以后很快就规定重新选举都灵合作社联合会行政委员会——供应都灵1/4居民的食品的巨大组织。

合作社联合会

都灵合作社联合会包括铁路职工合作社和劳工总同盟。许多年来，在其行政委员会中占优势的是社会党支部的代表，但是目前，后者已没有能力在工人群众中开展积极的宣传工作。

联合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为铁路职工及其家属所有的铁路职工合作社股票。这个组织的顺利发展使得股票的价值从50里拉升到700里拉。但是，党使得股东们相信，工人合作社的宗旨不是使个别人致富，而是帮助革命斗争事业，因此，股票持有人便满足于股票票面价值50里拉、而不是其实际价值700里拉的3.5%的红利。八月起义以后，在警察当局以及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报刊的帮助下，成立了铁路职工委员会，其宗旨是使社会党在行政委员会中失

去领导作用。股东得到了一个诺言：将立即付给他们股票票面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的差额650里拉，将在分配食品时给予铁路职工以各种优待。改良主义者叛徒和资产阶级报刊动用了一切宣传和鼓动手段，以便把合作社从工人组织变为小资产阶级类型的商业企业。工人阶级开始遭到各种迫害。书报检查机关压制了社会党支部的声音。可是，社会党人时刻也没有放弃他们的下述观点，即工人合作社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尽管受到各种迫害和压制，但仍然又争得了都灵合作社联合会的多数的拥护。

社会党在总共800选票之中得了700票，虽然多数选民是铁路职员；人们对他们担心，八月起义失败以后，在他们之中会出现某些动摇，甚至反动倾向。

战 后 时 期

当帝国主义战争宣告结束的时候，无产阶级运动有了迅速的进展。都灵工人群众了解到，由战争开创的历史时期同战前时期有巨大的区别。都灵工人群众迅速了解到，第三国际是为了领导国内战争，为了夺取政权，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确立新型经济和社会关系而创立的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

在所有的工人会议上都讨论了革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工人先锋队的优秀分子为了出版和推销名称为《新秩序》的共产主义派周刊而联合起来了。在这个周刊上面讨论了各种革命问题，如应当把工会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群众的革命组织问题，把工会斗争从狭隘行会和改良主义活动方面转移到革命斗争方面的问题，监督生产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关于工厂委员会的问题也已提到日程上。

在都灵各企业，先前就存在着资本家所承认的微小的工人委

员会,其中有一些已开始进行反对工会官僚主义,反对工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改良主义精神和合法主义倾向的斗争。

但是,这些委员会的大部分只不过是上述那些工会的产儿:委员会(内部工厂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是由工会拟定的,而工会宁愿指定有机会主义思想情绪的工人,因为这种工人不会给主人增添麻烦,而会把任何群众运动扼杀在摇篮之中。工人、《新秩序》周刊的拥护者在自己的宣传中要求首先改革内部工厂委员会并确定如下的选举原则:候选人名单由工人群众自己拟定,而不是由上层工会官僚拟定。《新秩序》周刊的拥护者向工厂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监督生产,武装群众,对群众进行军事训练,进行政治和职业教育。委员会既不应起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看家狗的作用,也不应阻挠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对工厂委员会的热情支持

为创建工厂委员会而进行的宣传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半年来,在各金属加工工厂都选举了这种委员会,共产党员在金属加工工人工会中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工厂委员会和监督生产的思想得到普遍的赞扬并且为劳动协会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多数参加者所接受,为所属工会的多数人所接受。

工厂委员会组织建立在下述原则之上:每一个工厂都按选派代表的原则(而不是在旧日的官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选出机构;这个机构得成为无产阶级力量的体现,得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或实现对生产的监督,得以准备进行革命斗争和建立工人国家的精神教育全体工人群众。工厂委员会是按照生产原则建立的,它应当在工人阶级的眼中成为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来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范例;在这个社会中将不会有阶级的划分,一切人的关系将在

生产的技术需要和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工作的基础上得到调整，将不从属于全国政权组织。工人群众应当了解到，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理想是雄伟壮丽的，他们应当认识到，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境地必须经过几个阶段，他们应当承认，革命的纪律和专政是必须的。

每一个工厂都分成若干车间，每一个车间都分成若干生产班组；每一个生产班组都完成一部分固定的工作；每一个班组的工人可以选举拥有受制约的、特别委任书的代表。全工厂的代表会议组成工厂委员会，由工厂委员会在自己成员中产生执行委员会。各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的会议组成工厂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在自己成员中任命全市委员会来组织宣传工作、制定工作计划、批准各个工厂，甚至各个工人的方案和建议以及对整个运动进行日常的领导。

罢工期间的工厂委员会和内部委员会

工厂委员会的某些任务，例如监督工程技术人员、解雇表明是工人阶级敌人的工人和职员、为争取工人的权利和自由同行政当局作斗争，监督生产和企业的财政工作，具有纯技术的，甚至生产的性质。

工厂委员会很快风行起来。团结在执行委员会周围并在反对资本主义专制的斗争中坚决支持执行委员会的群众立即接受了这种共产主义类型的组织形式。既得不到工厂主的承认，又得不到工会官僚的承认的工厂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它们把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密探驱逐出了工厂；它们同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取得财政和生产的资料；它们把工厂的行政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并且使得闭塞和分散的工人

群众觉察到了工人自己管理生产的意义。

工厂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在罢工期间尤为显著；罢工由于这种活动而失去了以前的偶然和自发的性质，成为革命群众自觉主动精神的表现。工厂委员会和内部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大有进展，它们的活动能力大有提高，只要5分钟就可以使分散在“菲亚特”企业的42个车间的1.6万名群众停止工作。1919年12月3日，工厂委员会明显地证明，自己有能力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根据掌握全部工人群众运动领导机关的社会党支部的指示，它们事先毫无准备，就在1小时之内动员了各工厂有组织的工人12万人，经过1小时，无产阶级军队就象海潮一样涌到整个城市，直到市中心，清除了各街道和广场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坏蛋。

反对工厂委员会的斗争

参加社会党支部和工会组织的共产党员领导了工人群众争取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斗争。同时企图以自己的夸夸其谈来对抗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的明确语言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个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遭到了工会的官僚、社会党和《前进报》的领导的疯狂攻击。这些人所进行的争论是以“工厂委员会”概念同“苏维埃政权”概念不同为基础的。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议论都具有纯“理论的”、抽象的、官僚主义的性质。他们的响亮空话掩盖了公然要制止群众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愿望，掩盖了要保持工会组织对群众的监护的愿望。党领导的成员始终拒绝在实现全国统一行动计划之前采取主动行动，但是他们从来又不进行任何工作来准备和制定这种计划。

这样，都灵运动就没有能冲出地方运动的框框，因为工会的整

个官僚主义机体都被利用来阻止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工人群众仿效都灵的榜样。都灵运动受到了诽谤，受到了肆意的嘲笑和辱骂。

工会机关和社会党领导的猛烈攻击鼓舞了资本家，使得他们现在毫无顾忌地攻击都灵无产阶级和工厂委员会。1920年3月在米兰召开的工业家代表会议制定了一个进攻计划，而直接的“工人阶级监护人”，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完全没有重视这一事实。被人遗弃而听天由命的都灵无产阶级不得不单独地、靠自己的力量来反对本国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都灵布满了大批警察部队；在城市周围的战略据点安置了大炮和机枪。当这种镇压机器都准备停当，资本家便开始竭力挑拨工人群众采取行动。诚然，无产阶级鉴于所形成的斗争条件十分艰苦，起初没有下决心应战，但是，当知道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它便勇敢地投入了激烈的斗争，准备斗争到最后胜利。

米兰的社会党全国委员会

金属加工工人罢工持续了整整1星期，其他各类工人罢工了10天；全省的工业活动停止了；交通运输停顿了。但是，都灵无产阶级与意大利的其他地方缺乏联系，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它，甚至没有发表告意大利人民书来解释都灵工人斗争的意义；《前进报》拒绝刊登都灵党支部的宣言。到处都把都灵的同志称作无政府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就在这个时候，本应在都灵召开党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但是改到米兰去举行了，因为“总罢工席卷的”城市看来是不大适合进行“社会党”争辩的地方。

这些事件的进程表明，肩负着领导党的任务的人十分软弱无力；在都灵，工人群众为保卫工厂委员会，保卫第一个以工人民主

为基础,体现无产阶级政权的组织而英勇奋战,而在米兰却高谈阔论关于创立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应当争取的政权形式的理论计划和方法。争论的是如何巩固还没有争得的东西,同时却使都灵无产阶级听任命运的摆布,让资产阶级有可能消灭已经争得的工人政权。

可是,意大利无产阶级群众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表示自己同都灵同志团结一致:比萨、里窝那、佛罗伦萨的铁路职工拒绝运送派往都灵的军队;里窝那和热那亚的码头工人和海员停止了工作;在许多城市,无产阶级不顾工会的指令,举行了罢工。

都灵和皮埃蒙特的总罢工遭受了工会和党内的官僚的消极抵制和反抗。然而,它对整个意大利无产阶级则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它证明,工人和农民有可能实际上联合起来,它表明,反对工会组织的整个官僚机器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个机器是机会主义者——议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领袖——扼杀一切革命群众运动的最大靠山。

这个报告最初以俄文、德文、法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1920年第14期。以意大利文载于《新秩序》1921年3月14日第73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230—243页

两 种 革 命

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权只能作为现实经济权力的法律机构来历史地加以理解和解释，只能作为维护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一定秩序的组织它的发展条件来加以理解和解释。从这个基本的(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可以得出一系列论点，我们曾经试图在讨论工厂委员会时加以有机地发挥；这个原理是我们在讨论有关工人阶级的现实问题时依据的基础，我们认为它的主要之点和中心之点是工人群众的最广泛的运动在建立委员会以及发展和协调委员会的活动过程中所取得的正面经验。根据这个原理，我们认为：(1)革命不是(不一定非得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尽管它提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2)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即使它提出的目标是消灭中央机关所赖以行使资产阶级政权的代议制机构和行政机关；(3)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即使由于人民起义的浪潮使执掌政权的是自称为(也是真心诚意地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们。只有当革命解放在资本家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部所形成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生产力时，它才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只有当革命得以帮助和促进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力量发展并组织起来，使它能够从事耐心的和有系统的工作，以便建立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的新秩序，建立使划分为阶级的社会无以生存的秩序，并使这一秩序的系统发展与国家政权的消亡，与保卫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的逐渐消亡相适应，而那时无产阶级本身作为一个阶级消

亡,并成为与全体人类相同的社会成员,只有到那时革命才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革命。

旨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和建立新的国家机构的革命十分关心把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一切阶级吸引到斗争中来。革命是由以下不容置疑的事实引起的,即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物价日益高涨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居民(手工业者、小土地占有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贫苦农民群众以及落后的无产阶级群众)日常生活中的起码需求根本得不到满足。这种革命具有多半带有无政府主义和破坏性质的倾向,并表现为盲目愤怒的自发冲动和毫无目的的野蛮破坏,所有这些东西导致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只是由于疲惫、失望和饥饿最终迫使人们承认建立牢固秩序和确实令人尊敬的政权的必要性。

这种革命可能最后以召开试图医治人民的愤怒给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带来的创伤的立宪会议而告终;结果可能成立苏维埃,成立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独立政治组织,然而这些阶级除了有组织的建设以外不敢走得更远,不敢触动经济关系,而在私有者阶级进行反击时将会退缩。这种革命可能完全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形成长期混乱的局面,因此,物质财富和居民将因不可能建立某种独立的组织而分散和受到损失:它可能建立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将在试图通过强迫手段创造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经济条件的重复的和无望的尝试中耗竭,并最终被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所推翻。

在德国、奥地利、巴伐利亚、乌克兰和匈牙利已经可以看到这类历史过程。随着作为破坏行为的革命而来的不是作为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创造过程的革命。单是外部条件(共产党,资产阶级国家被摧毁,强大的工会组织,无产阶级武装)还不能弥补以下条件的不足:具有不断增长和日益发展势头的生产力,试图以经济权力来

加强政治权力的无产阶级群众的自觉运动，希望在企业中建立无产阶级秩序并把企业变成新型国家支部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意志，以及建立新型国家作为在工厂体制条件下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的反映的愿望。

正因为这样，我们始终认为社会党内存在的共产主义支部的义务不是迷恋于宗派主义的幻想（如拒绝参加议会选举，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而是在群众中进行工作，以便创造条件有可能来解决作为共产主义革命有机发展问题的一切局部问题。的确，如果群众没有理应在共产党身上得到反映和集中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性和生产独立的愿望，那么共产党（作为行动的党，而不是作为对共产主义问题具有“正确”思想和持有“正确”见解的学究和政客们的学院）是否能够存在呢？由于政党和政党所代表的现实历史力量不是突然地、无形之中地，而是与一定的辩证过程相适应地形成的，所以共产党人的极重要任务难道不是使生产领域中出现的那些按实质说是共产主义的力量成为自觉的和有组织的力量吗，因为它们应当得到发展，并在得到加强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牢固的和经常的经济基础？

同样，如果党的任务是把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在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周围，使它们从政治上组织起来，为此目的必须使党成为这些阶级的民主意义上的“执政党”，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成为革命政党，那么党难道可以放弃资产阶级代议机关的选举吗？

既然共产党是享有一切被压迫阶级“民主”信任的党，既然党与所有劳动者阶层经常保持联系，那么它就必须引导各人民阶层承认共产党是应当代替资本主义阶级执掌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它必须创造条件，使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同剥夺剥夺者、在生产和分配领域为新秩序奠定基础的革命等量

齐观。

由此可见，既然共产党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特殊政党，既然它致力于意识的武装和指导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生产领域内形成的那些力量走上一定的轨道，因此它也为国家政权转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手里创造着经济条件，创造着使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民起义等量齐观，使人民起义成为解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积累起来的现实生产力的行动的条件。

这些不同的历史事件不是分散的和互不依赖的；它们是因果互相交错、位置互相变换、处于复杂相互影响之下的同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单独因素。然而，革命的经验表明，在俄国革命以后发生的、用两种不同方式进行的其余一切革命都遭到了失败，而革命第二阶段的失败使工人群众处于意志消沉的状态，并使资产阶级扎实地重新组织起来，开始有条不紊地来镇压试图恢复自己力量的共产主义先锋队。

对于那些不满足于单调地重复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而关心现实斗争和能够正确理解现实的共产党人来说，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来看，革命即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只是作为这样一个辩证过程才能加以接受，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可能成为经济权力，而经济权力可能成为政治权力。苏维埃是为从工厂委员会起到制定生产和分配计划从而取消资本主义竞争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止的共产主义经济组织独立发展创造可能的革命斗争的工具。工厂委员会作为工业领域中生产者的独立组织和共产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致命的斗争工具，因为它创造着使划分为阶级的社会得以消灭，使任何重新划分阶级的现象“在物质上”不可能出现的条件。

对于关心斗争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概念并不是某种抽象的东西；它是斗争的出发点，是加强组织和宣传的刺激因素。

工业的发展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精神独立性、主动性和从事积极历史活动的愿望；必须给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些因素提供组织和形式，创造心理条件来在全体劳动群众之间在争取监督生产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和推广这些因素。

必须着手进行有机地建设共产党的工作，使它不至于成为学究们或者小马基雅维利^①的场所，而是成为明确意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善于领导无产阶级去完成它的使命的革命共产主义行动的党，成为愿意用自己的力量通过组织社会经济的途径独立地摆脱政治和经济奴役的群众的党，而不是利用群众来英雄地仿效法国雅各宾派的党。必须在通过党的行动可能达到的范围内，创造不再存在两种革命的条件，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民起义可以找到有组织的力量，以便能够开始把全国的生产机构从寡头压迫的工具改造成共产主义解放的工具。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20年7月3日第
8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181—186页

^① 尼古洛·马基雅维利(1469—1519)，是意大利思想家，1498年当选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首长”的秘书，主持外交军事业务。他的著作有《君主论》(1513年)等，政治思想是建议佛罗伦萨和罗马的梅迪奇家族进行合作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君主论》的糟粕是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如残暴、奸诈、背信、谎言等都是“正当”手段。——编者

共产主义小组

我们常常提出以下的一般原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时期内，一切形式的协会（包括工人阶级为了在斗争中有所依靠而创立的协会），既然是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也就不可能不同资产阶级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发生联系。由于这些协会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也将随着它们所赖以存在的制度的退化和腐败而退化和腐败。当代工人运动史上的许多事件（群众不服从组织，个别企业起来维护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意志消沉和漠不关心的态度，麇集街头和广场上的形形色色马尚埃罗^①分子的哄动一时的成就），如果脱离传统政府机构解体的总的情景来看就不可理解，但是如果估计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困难，即被压迫阶级试图挣脱奴役的枷锁并为使它获得解放的新秩序奠定基础的困难，那就容易理解了。我们是从这个一般原理出发，对始终被看作工人阶级组织的原始形式和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独立形式的工会组织进行批评。相反，我们也始终坚持工厂委员会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机构的“独特性”，因为它正是在市民与市民之间不存在政治关系、工人阶级没有自由和民主，而只有以最露骨的形式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经济关系的地方才出现的，它体现着工人阶级想要独立

^① 汤马索·马尚埃罗(1620—1647)是个文盲鱼贩子。1647年那不勒斯抗税暴动中一举成为暴动领袖。在释放同狱犯人后，他夺取了该城的政权，但此后不到6周，他显然发狂了，终于被他的一些朋友杀害。

地，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不通过中间人，不通过将政权交给官员和职业政客的途径获得解放的永恒愿望。社会党也没有避免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存在的传统的领导机构普遍解体和崩溃的过程，但是由于它有较大的灵活性（因为它没有被传统利益的重负所压倒），它能够迅速地对事变作出反应，特别是在革命气氛比较紧张的地方（如在都灵）。社会党正经历着内部有机改造的危机时期，而工厂中的共产主义小组则是它的新结构的因素。

社会党的传统组织形式同在自由民主基础上产生的其他政党没有什么差别。这种形式就是全体党员大会，并由它选举享有多数信任的执行机关和监督委员会。在社会党的组织内部，实行民主政治协会所固有的一切原则：把权力分为立法、执行和司法以及党内竞争（革命派和改良派互相争权并利用机会主义的“马”）；在党内可以找到表示主权民主形式的一切本质特点：不负责任、不够资格、不稳定、秩序混乱。这些特点自然被执行机关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专横所“纠正着”。

在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环境中产生的一切协会所固有的这种形式反映了这些协会的历史本质：要想在人民协会（市政和省的委员会，代表议院）中争取多数的愿望，并采用这种民主所固有的方法来争取多数，即在选民面前广泛宣传极为一般的和极其混乱的纲领并发誓无论如何都要加以贯彻。

全体大会是符合建立在地方分部原则基础上的国家的、政治团体的形式。它是不文明民族组织程序的继续，那里主权被践踏在地，并表现为野蛮的嚎叫。体现着民主制度下主权的政治会议的心理是：“群氓的心理”，即无个性群众的动物本能和无责任心压倒理智和高尚精神；在非高尚感情占上风的情况下这种心理就导致私刑杀害，而当感情过度激动时则导致彼此之间的角逐，以便有可能不是跨上马，而是登上享有盛名的芭蕾舞女演员的凯旋行进

的马车。因此，意大利国民议会的最明智的和最“卖力的”议员道出了一句箴言：议会对于委员会来说，就象城市对于野蛮的匪徒一样。

由于工人国家只是人类社会试图将政治共存关系适应于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它不是建立在地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有机的生产部门（企业、建筑工地、军械库、矿井、农场）的基础上。社会党直接在生产地点建立自己的组织基础，起着在工人阶级所建立的新的机构中领导党的作用，以便争取达到本身的独立，成为统治的阶级。无产阶级政治团体的历史本质目前不仅表现为在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民团体中争取多数的愿望，而且表现为对工人阶级在其艰苦的创造性工作中给予帮助的愿望。可以预见，政党的组织形式将会得到根本的改造。那些只对自己的良心，即只对已经失去平衡和被蛊惑人心的叫嚣所麻痹并担心不能胜任无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任务的人们组成的全体大会，将被握有必须绝对执行的委任书的代表们的大会所取代。一般的和毫无秩序的讨论将被工厂工人们所关心的具体问题的讨论所取代，这些工人们估计到企业中宣传和斗争的要求，希望党的大会最终成为无产阶级群众准备实际地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学校。可以预见，社会党将从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团体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文明的新型的组织。

一旦号召在都灵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那么这样的小组就会迅速建立起来并开展积极的活动，在四月大规模发动前金属加工工人进行局部罢工的时候，由于车间代表委员会无所事事而在某些工厂里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不得不承担起领导工人的工作，防止革命纪律的破坏，并立即消除不守秩序的现象。迄今在主要企业中积累的经验已经成为宝贵的财富，在即将召开的小组代表会议上将得到应有的重视，并通报支部的所有成员，只有这样的会议才

能扼要地制定不可或缺的统一的工作纲领，它将是每个对制定这一共同纲领作出贡献的小组所取得的具体经验的综合。现在已经可以确认，社会党历史地形成的面貌正在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而改变；俄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质已变成可以理解的了。既然党是由革命工人组成的，它就必须同群众一起进行斗争，处在革命斗争的火焰笼罩着的社会生活的中心。但是，党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体现，因此，对于工人党员来说，斗争是自觉的，是为了争取达到明确的目标，是明确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志，是经受意识和意志考验的纪律。这样，在工人国家中，工人党员成为工业先锋队，就象他们在为争取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的时期里成为革命先锋队一样；革命热情现在已转向生产领域。

共产主义作为新的社会关系体制只有在物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个体制不可能通过立法的或行政的途径来实行。共产党在工人国家中履行着心理反应剂的职能，激励广大群众自觉自愿地去建立由于新的条件而可能建立的新的关系。俄国无产阶级群众实行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工人们、共产党员们富有纪律性的结果，他们首先通过工厂支部实行了新的工作方法和生产方法；而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最终地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它是以夺取政权和建立对生产的监督开始的革命阶级斗争的最高阶段。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20年7月17日第
10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186—191页

《新秩序》周刊的纲领

1919年4月，我们——三、四个或者五个（记不确切）年轻的社会党人——决定（关于我们这些讨论和决定的记载应当还存在，因为这些记载曾经以记录形式，完全以记录的形式誊清过一遍……作为历史资料！）着手出版这个《新秩序》周刊，这时，我们之中没有人（大概是谁也没有……）打算改变世界的面貌，革新人类的思想和田，开辟历史的新时期。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对我们创办的事业的成功抱有美妙的幻想（尽管也有人妄想，经过6个月以后，周刊会有6000订户）。我们是谁？我们代表谁？我们讲了什么新东西？唉！在这些会议上唯一能使我们联合起来的东，就是由于模模糊糊地追求认识不清的无产阶级文化而产生的感情；我们想干点事情；我们十分不满意和非常担忧，我们苦于还看不到正确的道路，我们感到在停战后的几个月，看来整个意大利社会即将必然崩溃的时候，紧张生活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唉！如果说在这些会议上讲过新的意见，那么，唯一的新意见被扼杀了。当时，我们之中有一个研究过技术问题的人说：“应当研究作为生产工具的企业组织；我们必须十分关心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组织方法，做到使工人阶级和党注意这个问题。”另外有一个对于人的组织、人的历史、工人阶级的心理感到兴趣的人主张：“需要研究工人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在意大利是否存在同苏维埃相似的、本质上与之相近的工人群众组织？存在这种类似的组织，就可以

断言，苏维埃是普遍适用的形式，而不是俄国特有的制度；苏维埃是在存在着为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而斗争的无产者的一切地方工人阶级赖以表现自己争取解放的决心的形式；苏维埃是工人群众自治的形式。在意大利，在都灵，是否存在着哪怕是萌芽的，哪怕是小心翼翼地尝试的一种甚至稍微相象的苏维埃政权？”一位波兰同志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意大利一次也没有召开过内部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的影响下，那个人在会议上回答说：“是的，在意大利，在都灵，存在着工人政府的萌芽，苏维埃的萌芽——内部工厂委员会。我们要研究这个工人机构，要分析它，也要研究资本主义企业，但不是把它作为物质生产组织来研究，因为要作为物质生产组织来研究，就需要有专门知识，而我们还不具备，我们要把它作为工人阶级生存所必需的形式，作为政治机构，作为‘民族领域’的工人自治来研究。”这是新的说法，这个说法受到了塔斯卡同志的驳斥。

塔斯卡同志打算怎样呢？他不打算在工人群众中直接进行什么宣传，他想同党的联合会和工会的书记达成协议，他想召开会议，与这些书记进行商谈，希望制定正式行动计划。《新秩序》周刊的那批人在这种场合降低到了不负责任的、认为自己“也没吃闲饭”的一小伙高傲知识分子的水平。《新秩序》周刊最初几期的纲领是怎样的？缺乏具体的纲领，代之以模糊渺茫地企求讨论具体的问题，这就是它的纲领。《新秩序》周刊最初几期的思想是怎样的？没有任何中心思想，没有任何系统化的公开发表的文字材料。塔斯卡同志是怎样理解“文化”的，我是想说，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说，他是怎样理解“文化”的？他的理解是“提示”，而不是“思考”，是“提示”人们注意陈旧迂腐的事物，注意工人思想的平庸产物；他认为需要让意大利工人阶级知道，需要向善良的意大利工人阶级（要知道，它是很落后、不文明和粗鲁的）“提示”：路易·勃朗

唠唠叨叨地宣扬了有关劳动组织问题的一些“启示”，这些“启示”导致了一些具体的结果：“提示”注意，欧仁·富尼埃象一个学生那样认真编纂了关于如何热心地（或者冷静地）制定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作品；“提示”注意米什勒关于巴黎公社问题的判断（或者卢易吉·莫利纳里的永久思念）。同时却只字没有提到俄国共产党人遵照马克思的学说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即苏维埃制度对巴黎公社的继承性，甚至没有料想到马克思关于公社的“生产”性质的指示帮助俄国共产党人理解了苏维埃，确立了苏维埃的思想，拟定了成为执政党的党的行动路线。《新秩序》周刊最初几期是怎样的？是个文选，只不过是文选。这是一种在那不勒斯、卡尔塔尼塞塔、布林迪西出版也可以得到成功的杂志。这是一种抽象文化的杂志，是一种偏重于公布可怕的往事并且以实例来作善意说明的、进行中立报道的杂志。《新秩序》周刊最初几期就是这样的。这是个无组织的整体，是探索思想归宿和实际活动道路的平庸知识分子们的产物。1919年4月召开会议以后问世的《新秩序》周刊，就是这样的；关于这次会议已有适当的记录，在会议期间，塔斯卡同志批驳了关于尽我们的力量“发现”意大利工人阶级中的苏维埃趋向，显示现实的意大利革命精神（其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它符合工人国际的普遍精神，是因为它是现实历史情况的产物，是工人阶级本身创造性活动的结果）的建议，认为这个建议不适合文雅恬静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小家庭的优良传统。

当时我曾同陶里亚蒂一起想搞“编辑革命”。周刊第7期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内部工厂委员会的问题。我在文章写好的前几天，曾向特拉契尼^①同志阐明了文章的思想，特拉契尼表示完全同意

^① 乌姆贝尔托·特拉契尼（1895— ），是著名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意共领导人之一。1919年协助葛兰西创办《新秩序》周刊，积极参加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的领导工作。1926年被墨索里尼政权逮捕，判刑23年，1943年出狱。

文章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方针。在陶里亚蒂合作下写好的、经特拉契尼赞同的这篇文章发表了^②。于是发生了我们预料的情况：我们——我、陶里亚蒂和特拉契尼——被邀请到工人自学小组、工厂集会、内部工厂委员会进行座谈，我们被邀请参加车间代表和召集人秘密会议进行的讨论会。我们继续进行了我们的工作；内部工厂委员会的发展问题成了中心问题，成了《新秩序》周刊的主旨。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作为工人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新秩序》周刊在我们看来，在追随我们的人看来，已成为“工厂委员会的周刊”。工人们喜爱《新秩序》周刊（我们可以十分满意地肯定这一点）。为什么工人们喜爱它？因为他们在周刊的文章中多多少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善良意志和愿望，因为他们感到，《新秩序》周刊上的文章充分表达了他们对于使他们伤脑筋的心中问题要寻求答案的夙愿，即对于“我们如何成为自由人？怎样成为我们应当成为的人？”这样问题寻求答案的夙愿。因为《新秩序》周刊的文章不是平淡的、抽象的理论作品，这些文章是经过我们同先进工人一起讨论而产生的，是我们所揭示和尽力支持的都灵工人阶级的感情、意志、真实意向的反映；因为《新秩序》周刊的文章非常准确地“记录”了现实的事件，把这些事件看作国内工人阶级解放、显示其力量和可能性的过程的环节。工人喜爱《新秩序》周刊的原因就在于此，《新秩序》周刊的主旨就是这样“形成”的。塔斯卡同志完全没有参加这个形成和制定杂志思想原则的过程。《新秩序》周刊在不顾他的意志，没有他对革命作出贡献的情况下，阐明了自己的主旨。我认为，他之所以采取现在的立场，使用这样的争论“腔调”，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不大热心于锻造

1946年当选众议员，1947年当选众议院议长。1948年起被任命为共和国参议员。——编者

② 指《工人民主》一文，见本书第37页。

“自己的观念”；由于观念是缺乏感情的情况下创造的，结果得出的观念是非常荒谬的，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研究问题非常粗浅，处理问题十分轻率，内在精神毫不集中，却尽力使问题具有在一年以前就加以维护的官方性质，奉之为教条，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

二

我在上一节试图说明，为什么塔斯卡同志那样对待《新秩序》周刊的纲领，对待这个经过我们结合着中心问题即工厂委员会问题而弄清工人阶级的现实精神需要和实际需要以后所制定的纲领。既然塔斯卡同志没有参加这件事，而且对之表示坚决反对，那么他就忽略了工厂委员会问题的现实历史内容和实质性发展，就是说，他忽略了那些尽管有些没有把握，有些十分明显的错误，但是经过我、陶里亚蒂同志以及其他来帮忙的同志作出说明以后便弄清楚了的观点。在塔斯卡同志看来，工厂委员会问题是纯数学性质的问题，是如何立即把整个意大利工人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的问题。塔斯卡在他的一篇争论性短文中写道，在他看来，共产党、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应当从同样的方面来进行研究；他在另一个地方表示，《新秩序》周刊认为党组织和工会是“自愿的”组织，它们与工厂委员会不同，后者被看作按其类型目前只能与资产阶级国家相提并论的团体的“历史”形式，可是他不明白这里“自愿的”这个形容词是什么含义。《新秩序》周刊所表述的观念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是因为它是以主旨即以自由的主旨为基础的（说得具体些，从现代历史创造活动的角度来看，是以对工人阶级的独立革命活动的假设为基础的），根据这个观念，工厂委员会是“国家性质的”制度，而党和工会是“局部性质的”团体。工人是作为生产者参加工厂委员会的，就是说，由于他们万能的性质，由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

作用，而完全就象公民“参加”民主议会国家一样。工人参加党或者工会是“自愿的”，是签订义务的，是签订他们随时可以推翻的“协议”的。党和工会由于有自愿的性质和协议的性质而绝对不能与委员会（代表机关）混为一谈，委员会的发展不是数学上的，而是结构上的。委员会在其高级形式上会竭力在资本主义为了追逐利润而创立的生产和分配机关上面打上无产阶级的印记。因此，在《新秩序》周刊上没有采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所特有的政治术语，而是引用生产组织来描述高级形式委员会组织的发展。照《新秩序》周刊发展的概念，委员会制度不可能用“联合会”或者与此类似的术语来说明，而只有通过使企业中一个生产组与另一个生产组、一个车间与另一个车间相互联系起来的全盘生产关系推广到整个工业中心的途径才能说清楚。在我们看来，都灵是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在一篇文章中，都灵被称为意大利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策源地。在工厂中，工人是生产者，因为他们是根据工业技术的要求，不受（在一定意义上）获取生产价值的方式的制约，而在生产过程中互相合作，以一定的方式严密地组织起来的。汽车制造厂的全体工人，不论是金属加工工人、瓦工，还是电工、木工等等，都是生产者，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同样是汽车生产所必需的，因为他们都按照生产的特点组织起来，而构成历史上必需的、完全不可分割的一个机体。都灵在历史上是这样形成城市的：由于迁都佛罗伦萨和罗马，另外也由于通过皮埃蒙特国家的扩大而形成意大利国家，都灵丧失了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而新的意大利国家机关则是由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迁都和都灵减少现代城市典型因素（小资产阶级官吏），没有引起城市衰落，相反，却在继续发展，城市的新发展随着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随着“菲亚特”工厂总公司的出现而日益明显。都灵为新的国家提供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各地都使得小工业和手工业遭到了破

产,把紧密的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了城市,这些群众使得城市具有了现在的面貌,这可能是全欧洲最奇特的面貌之一。该城市具有了集中的性质,现在还保留着这种性质。它自然是围绕着可以“支配”城市的一切运动和控制城市的各条出口的一个工业部门而组织起来的;都灵是汽车城市,就象维切利是以生产大米为其特点的经济机体,高加索以生产石油为其特点的经济机体,南威尔士以产煤为其特点的经济机体等等一样。正象一个工厂的工人所具有的面貌是与把五金工、木工、瓦工、电工等等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某种产品生产的性质相适应的那样,该城市的工人所具有的面貌是与控制整个城市、使之为自己服务的占居优势的工业的性质相适应的。在全国范围也完全如此;人民所具有的面貌是与他们的出口的性质、他们对世界经济生活的实际贡献相适应的。

塔斯卡同志是《新秩序》周刊的十分粗心的读者,他完全不了解,这个理论论断实质上只不过是在这个《新秩序》周刊上发表的列宁同志的几篇文章中所阐发的观点在意大利实际中的运用,只不过是美国革命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丹尼尔·德莱昂^①的观点在意大利实际中的运用。其实,塔斯卡同志在他的报告中的一个地方以纯粹“商业的”和会计的精神,用“大米”、“木材”、“硫磺”等等字眼说明了生产经济综合体的定义;他在另一个地方提出一个问题:在委员会之间应当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另外他还在一个地方认为,蒲鲁东关于消灭政府的企业观点是《新秩序》周刊所阐发的思想来源,尽管在6月5日那一期刊载了《工厂委员会》一文和关于劳动协会代表会议的论述

^① 丹尼尔·德莱昂(1852—1914),是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90年代起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和思想家,政论家。1895年,他创建并领导了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社会主义同盟;1905年,成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工人运动有很大贡献,但也犯过宗派主义的错误,宣传过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
——编者

的周刊上，又登载了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中的摘录，在这段摘录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明生产者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业性质。德莱昂和列宁都从马克思这篇著作中找到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基本论据；《新秩序》周刊的文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准备和定稿的。塔斯卡同志（又一次表明）完全是走马观花地阅读了这些文章（其中包括导致开始争论的那一期周刊所刊载的一篇文章），完全不了解其理论实质和历史实质。

对于那些熟悉这个争论的人，我不想重复所有可以用来证明工人自由的思想实际上在工厂委员会方面得到初步体现的那些论据。我只想粗略地提一下某些主要论据，以说明塔斯卡同志是如何忽略《新秩序》周刊纲领的内部制定过程的。我在这两篇短文发表之后紧接着登载的附录^①中，分析了塔斯卡的某些论据，因为我需要弄清楚这些论据，证明它们是站不住脚的。有一个地方，即塔斯卡谈到金融资本的地方，应当立即弄清楚；这个地方写道：资本在“起飞”，脱离生产，翱翔于空中……所有这些关于起飞和翱翔于空中……关于纸币的胡说八道，都与工厂委员会的理论的发展没有任何联系。我们曾指出，脱离生产的是资本家个人，而不是资本，哪怕是金融资本。我们曾指出，对企业的控制正在从资本家手中转到银行手中，银行是通过工业官僚进行控制的，而工业官僚对于生产则日益失去兴趣，正象国家官吏对于国家管理失去兴趣一样。我们之所以需要指出这些，是为了对企业产生的新等级关系进行历史的分析，是为了强调工人阶级（它的工厂组织尽力掌握生产的领导权）在生产上独立自主的最重要历史条件之一已经出现。

关于“起飞”和“翱翔”的论断是塔斯卡同志十分不成功的想

^① 没有任何材料证明，这个附录曾经发表或者撰写过。

象。塔斯卡援引他所写的、发表在《大学信使报》上的对阿尔托罗·拉布里奥拉的著作《资本主义》的评论，证明他“研究了”金融资本问题（顺便说一下，拉布里奥拉所维护的观点恰恰同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希法亭观点相反）。塔斯卡实际上证明，他根本上什么也没有懂，他把自己的论据建立在模糊不清的回忆和毫无意义的词句这种不稳固的基础之上。

争论有助于我们看清，我对塔斯卡的报告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塔斯卡对委员会问题的看法是肤浅而混乱的，他只有一个不可遏止的意愿即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始“独立”行动、开创工会运动的新纪元。

评论劳动协会代表会议，塔斯卡同志提出关于力争做出必须执行的决议的目标，是由于想完全维护住周刊的纲领的意向而引起的。工厂委员会自己为自己制定法规；它们不能，也不应当采用工会机关（它们有任务去彻底改造这些机关）中现行的准则。工厂委员会运动还要争取工人代表直接由群众选派并且通过权威性的委托而与群众进行联系。塔斯卡同志在工人代表会议上作为报告人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委托就对全体工人群众都关心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通过必须执行的决议会把全体群众联系起来）发表的意见，与《新秩序》周刊的思想趋向发生了很大矛盾，因此尖锐的评论是完全有理由的，是绝对必需的。

署名：安东尼奥·葛兰西

载于《新秩序》1920年8月14日第12期
和1920年8月28日第14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194—203页

共 产 党

一

在索列尔之后，每当人们想提出关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概念的时候，引证原始基督教会都成为一种时髦。不过应当马上说明一点，即索列尔对其意大利的崇拜者的眼光狭隘和思想简单没有任何责任，正象卡尔·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荒谬的思想上的自命不凡没有责任一样。索列尔是历史研究方面的“发明家”，对他是不能效法的，他没有向想当他的学生的人提供一种随时随地都可以机械地运用并能取得优异效果的万能方法。对于索列尔，也象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基督教的主张是达到全面发展的思想领域中的革命，即达到极限的、使得新颖而独特的道德、法、哲学、美学关系体系得以建立的革命。把这些结论当作一切革命的思想公式接受下来，这也就是粗鲁而愚笨地背离索列尔的直觉历史观点；这种历史观点只允许对无产阶级文明的“萌芽”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历史研究，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是现代工业社会内部固有的，这一点（象索列尔认为的那样）是无疑的，如果说由此会产生新生活准则和革命阶级所特有的崭新关系体系，这一点是无疑的，那么无产阶级文明的“萌芽”就必定存在。那么，认为工人与最初的基督教徒不同，工人的生活方式是纯洁的，有节制的、独具一格的，这个主张能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抛开根据一知半解得出的总结——按照这种总结，“都灵金属加工工人”是一群愚笨的人，他们每天都吃烤鸡，每夜都在妓院饮酒，他们不爱家庭，他们在电影中，

在象猴子一般地模仿资产阶级习惯当中寻求美和道德理想的满足，——再说一遍，即令抛开这种根据一知半解得出的幼稚总结，那么上面所援引的主张也不能成为判断历史过程的根据。这个主张按其对于历史过程的理解程度，可以相当于下述判断：当代的基督教徒经常吃鸡、淫荡、酗酒、作假证、不保持夫妻的忠诚，如此等等；因此，任何使人相信存在苦修教徒、殉难圣徒、圣者的话，都是谎言。换句话说，任何历史事件都需要当作自由的发展，在现实的实际情况范围内，在其特殊的表现上来加以研究，而自由所表现的目标、制度和形式完全不可能与过去的历史现象的目标、制度和形式相混淆和相类比（除非是借喻）。任何革命，无论是基督教革命，还是共产主义革命（这些革命都是通过使人民群众参加深入而广泛的运动而发生的，也只有经过这个途径才能发生）都只能破坏和摧毁一切现存的社会组织制度。谁能想象得到目前既无意志又无权力的无数群众参加破坏活动和历史性创造活动所导致的直接后果？这些从来没有“意志和权力”的群众要把每一次社会活动和局部活动视为自己的意志和他们夺取的政权的体现。他们将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他们暗中反对的，他们要彻底地加以破坏。正是由于革命的波澜壮阔，由于不可能预见到革命的发展以及由于革命特有的无限自由，谁能对于在如此火热的熔炉中锻炼出来的感情、激情、主动性和美德说出绝对的判断？撇开我们特有的意志和力量不谈，目前存在的、今天我们观察到的一切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难道每一天如此紧张的生活不都会是一场革命吗？难道不会有甚至想象不到的创造成果，不会由于变化同时遍及全体人民群众而在各个人的思想中发生任何变化？

从今天、当前存在的事物出发，在精神生活和感情方面是什么也预见不到的。我们现在可以指出的只有一种目前已成为工人阶级固定的、特有的感情；这个感情就是团结一致。这是支持反抗的

意志和准备牺牲的决心的感情，它的强度和力量可能只适用于人民群众，虽然历史预见能力不强，但是能够哪怕大概地推测事件进程的时期。也就是说，不能指望团结一致的程度和力量会成为在革命和创立新社会基础的整个时期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意志的支柱，在这个时期，不可能准确地断定，需要多长的时间进行战斗和作出牺牲。因为必须与之战斗并且应当战而胜之的敌人不再在无产阶级之外，不再是受限制的、被控制的外在力量，而是将在无产阶级本身之中，在它的愚昧、懒惰之中，在它迟钝笨拙和缺乏敏捷的直觉能力之中，在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会进入个人之中，新的人在其思想的每一个表现中，在其每一个行动里，都必须反对埋伏起来的“资产者”。因此，工人的工会（是实现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并且使之具有组织性的组织）不可能是确定未来文明的特点的起点和本源。工会中没有为发展自由所必要的因素；它本身必定由于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它是被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

在目前阶段，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是在组织物质现象和力量这方面实现革命。支持群众意志的群众感情和情绪不可能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特点。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只能在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去寻求，只能在共产党（目前它正存在和发展并成为力争建立国家、力争按无产阶级方式组织现有物力和奠定人民自由的基础的纪律严明的组织）中去寻求。

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在共产党已在国际范围内存在这个限度内，可以进行一下类比并且在把争取天堂的战士与争取人间幸福的战士进行这样类比方面做出一系列结论。共产党人当然不亚于地下经堂时期的基督教徒。正好相反！基督教向其信徒提出的崇高抽象目标由于有神秘的魅力而似乎成为一种对英勇、殉教、苦行的奖赏。为了

使迷信苍天赏赐和永世享乐的人产生自我牺牲的心境，没有必要让他们具有意志和倔强的巨大力量。工人共产党员好多星期、好多个月、好多年在工厂每天工作 8 小时，另外又无偿地为党、工会、合作社工作 8 小时。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比不顾任何危险去参加秘密祈祷会的奴隶或者手工业者应当得到更高的评价。同样，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是比最伟大的基督教圣徒还要伟大的人物。正是由于他们创业的目标是具体的、人道的、有限的，工人阶级的战士比为信仰上帝而斗争的勇士更伟大：向他们的意志提出的目标愈明确，支持他们的道义力量就愈无限。当工人成为“主宰”的时候，当他们成为社会价值的尺度的时候，工人（每天 8 小时在机器旁边弯着腰重复单调的、次序明确的同一动作）的感情会获得多么巨大的力量？工人尽管被迫劳动，而不知道怎样和为什么劳动，还能进行思考，单是这件事情难道不是个奇迹吗？这个奇迹在于工人每天都重新争取获得独立精神生活和理论创造自由的权利，反对疲劳、枯燥而单调的令人感到机械因而扼杀精神生活的动作，——这个奇迹体现在共产党中，体现在通过共产党表现出来的从事斗争和革命创造的意志上面。

在企业中，工人只完成执行任务的职能。他们不监视整个工作和生产过程；他们不是活动的、构成线的点；他们是插入一定的地方的钉针和按他人的意志安排在自己的目标上的点所联成的线。工人力图把自己这种生活形式搬到自己的一切生活领域；他们到处都很容易适应于物质执行者的角色，适应于服从他人意志的“群众”的角色；他们是智力上的懒惰者，不会和不愿意看到比鼻子尖更远的地方，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用以选择自己的领导者的标准，很容易让人家用诺言蒙蔽住；他们乐于相信，不经自己的巨大努力，不经特别紧张的思想就能达到目标。共产党是国内解放的历史过程的工具和形式，通过这种解放，工人从执行者变为倡导者，从群

众变为领袖和领导者，从手变为头脑和意志；共产党的成立可以视为当工人国家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时会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和普及的那种自由的胚胎。古典社会的奴隶和手工业者参加了教会，在教会中由于成为同一个父亲的儿子而具体地感到自己是平等的，是兄弟，于是便“认识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工人参加了共产党，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在共产党内，同其他人一起致力于“发现”和“发明”新的生活方式，“自愿地”参加全世界的活动，他们思考、预见、承担责任，他们不仅是被组织者，而且是组织者，他们意识到自己成为吸引全体人民群众跟自己走的先锋。

共产党即使纯粹作为一个组织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形式。以往的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没有政党；它们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产生的，是在议会民主制的基础上瓦解的。在这方面也证实了下述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本主义创造着它以后无法对付的力量。民主党的目的是发现宝贵的政治活动家，使他们在政治竞争的形势中获取胜利；现在的当政者是银行、大型报纸、工业家联合组织安置的；政党分解为许多聚集在个别人周围的集团。共产党是从社会党的灰烬中产生的，它抛弃与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议会主义根源相联系的一切，显示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根本特点：俄国革命是组成为共产党的人们，变为党的队伍，获得了新的感情，创造了新道德的人们所完成的革命；这种道德正在获得普遍的性质，成为一切人的理想。

二

我国的政党是国内现有各阶级的反映。

政党的产生、发展、瓦解和复兴是与战斗着的社会阶级的各阶层随着它们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根本变化，随着它们的自觉、对切身

利益的认识的提高而相应地发生的具有现实历史意义的变动相适应的。在议会民主制基础上产生的传统政党的迅速瓦解和新的政治组织的产生，成为当前历史时期的特点（这是使得国内和国际生产和交换机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这个普遍过程有其确定不移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是由于旧的阶级和阶层发生分化以及在个别国家整个国土上，往往是资本统治下的整个国土上的各居民阶层的状况发生惊人变化而产生的。

在历史上甚至最消极的分化过程很迟才开始的社会阶级，例如农民，也没有在瓦解社会机体的力量的强有力的影响下不被触动；甚至可以说，过去这些阶级愈是消极和落后，它们今天力争取得极大（从阶级斗争的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成果即发生国内战争和破坏经济关系的愿望就愈强烈。两年来我们看到，是如何在意大利似乎无根无源地产生强大的农民政党——“人民党”的，这个政党在诞生的时候就希图代表农村一切社会阶层（从贵族大地主到中等地主，从小私有主到佃农，从对分制佃农到贫农）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愿望。我们看到，在已经占据了议会中近100席的“人民党”的当选名单上，绝大多数是贵族大地主、大林场主、大中地主的代表，即极少数农村居民的代表。我们看到，在“人民党”内，反映大量选民分化的各派之间内部斗争是怎样产生的，是怎样很快具有了十分紧张的性质的；广大的小地主和贫农群众再也不想充当被利用来维护大中私有主利益的消极普通群众；“人民党”在他们的强大压力下分裂为右派、中派和左派。我们还看到，“人民党”的极左派是怎样在贫农的压力下开始穿上革命的外衣并且同也变为广大农民群众代表的社会党进行竞争的。现在我们看到，“人民党”发生瓦解，它的议会党团和中央委员会已经不反映广大选民以及组织在白色[天主教]工会中的劳动者的利益和自觉。现在极端主义分子开始成为这些力量的代表，他们不愿意取消对这些群众的

控制，他们由于不能通过议会中的合法活动来欺骗这些群众而想采取压制手段和要求建立新的国家政治机构。这种迅速组织起来又很迅速瓦解的过程也发生在其他妄图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派别——退伍军人联合会——之中；这个过程是可怕的国内危机的反映，国内危机使意大利农村感到震惊，它表现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大罢工，表现为夺取和瓜分阿普利亚的大地产，表现为进攻封建城堡，表现为西西里各城市出现成千上万的武装农民。

农民群众中的这种深刻的风潮彻底动摇着议会民主制国家大厦。今天只是工业家联合组织代表着作为政治力量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经没有这样的政党：它的思想也可以为城乡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所接受，从而使合法的国家可以在广泛的基础上保存下来。资本主义正衰落到这样的地步：它只有在大型报纸（发行份数40万，而选民总共有1000）和不受广大人民群众活动所影响、在全国丧失威信和声望的上议院中才能找到政治代表；因此，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逐渐与高级军阶系统、国王近卫军，与停战后到处出现的力图（每一个人在斗争中都反对所有其他人）成为意大利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或波拿巴分子的各式各样冒险家结帮成伙。因此，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今天只能在国家军事政变和试图建立钢铁般民族专政以迫使被愚弄的意大利群众通过武装劫掠邻国来恢复经济的行动中表现自己。

既然由于资本主义作为生产和交换方式已经完结，资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已经完结和衰朽，既然农民不是同样能够创立国家的一种政治力量，那么工人阶级由于受不可违抗的历史必然性的驱使而必须起领导阶级的作用。

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能力建立强有力的威严的国家，因为它有经济改造的纲领——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资本主义于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所达到的发展阶段

已经成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关即苏维埃制度以后给人民群众的汹涌力量指出明确的方向，重新安排经受灾难性动荡的国家生产机关的正常活动。在目前我们所处的这样的时期提出成立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有明确认识的共产党，成立将会创造新制度并成为十分特殊的新历史时期的倡导者和主要动力的共产党，这是自然的，是有历史根据的。

即使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社会党——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我们所处的时期所特有的一切组织形式的瓦解过程。从世界大战爆发起一直到今天领导着我们组织的那些人的巨大历史错误是：他们深信他们能够拯救旧结构的政党，使之避免内部瓦解。实际上，政党的传统、组成政党的各种派别的历史根源、政党公开或者悄悄地与劳工总同盟结成的联盟（这种联盟在党的一切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使工会活动家们得到他们受之有愧的权力和威望）、使议会党团得到的无限自治权（使参加重要的党代表大会和各种会议的代表得到的权力和威望象工会活动家得到的权力和威望一样，也是受之有愧的），——所有这一切使得意大利社会党与英国工党处于同一行列。由于上述的一切，它仅仅在其一般的纲领性宣言上才是革命的。

它是党派的堆积，它的行动毫无生气和迟钝缓慢（它的行动也不可能不这样），它往往成为那些不严肃对待政治和没有能力从事政治活动的冒险家、野心家、沽名钓誉者容易捕获的俘虏；由于其成分复杂，由于磨损得无法使用的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不断磨擦，由于党的领袖（它的变为其主宰的公仆）的行为，它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重任：事件的发展不断地迫切要求它表现革命主动精神和采取革命行动。因此便产生这样一种反常的历史现象：在意大利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和教育群众，而是群众推动和“教育”

政党。

社会党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体现者；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说本应成为它的罗盘，帮助它在复杂的事件中确定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它本应具有历史预见的能力，可以识别有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信徒；它本应有一个以这种历史预见为依据的共同行动计划，能够向战斗着的工人阶级提出明确的口号。然而，社会党，这个宣称自己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现者的党，则象意大利居民中最落后的阶级的政党（“人民党”）一样，受到群众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只有当群众行动起来和发生分化的时候它才采取行动和发生分化。这个宣布自己是群众的领袖和导师的社会党实际上只是记录群众自发活动的可怜公证人；这个宣布自己是工人阶级领袖的可怜社会党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大军的辎重队。

如果说社会党的这种奇怪行为和工人阶级政党的这种反常状况直到现在还没有招致灾难，其原因就在于：在工人阶级中，在党的城市支部中，在工会中，在企业中，在农村中，已经存在着一批批坚韧不拔的共产党员，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坚韧不拔而富于远见卓识地进行活动，能够引导和教育各地方的无产阶级群众，问题在于：在社会党内部已经有潜在的共产党，要能迅速发展，要能恢复和革新工人阶级政党的原来结构，要能给劳工总同盟和合作社运动提出新的活动方针，只是还需要严密的组织、高度的集中和本身的纪律。

目前这个时期取代了金属加工工人斗争时期，这是个即将召开党代表大会的时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将要对共产国际采取认真周密思考过的十分明确的立场，这个时期的迫切问题就是把现有的起作用的共产主义力量组织和集中起来。社会党异常迅速地日益瓦解，正陷于衰败；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它的各派就已经具有了新的面貌；党内的人们和团体面对着在参加共产国际时所

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义务,感到慌乱不安,开始改变自己的立场;含糊不清的中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立场在一部分党的领导中间得到了拥护者,在党的各支部中引起了焦虑和惊慌。在这种普遍的没有原则性、没有信仰、缺乏意志的情况中,在这种卑鄙下流、失败主义的汹涌海洋之中,共产党人的职责就是团结成为强有力的团体,联合起来,准备去实现将来提出的口号。诚实无私的共产党人应当依据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的提纲,依据使共产党人必须服从世界工人运动最高权威的严格纪律,来开展必要的工作,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意大利社会党的共产主义派;这一派为了挽救意大利无产阶级的荣誉,应当在佛罗伦萨代表大会上^①,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意大利共产党——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党人应当进行工作,以使共产主义派形成为这样的党:它具有步调一致和高度集中的领导机关,它在工人阶级进行活动、联合和战斗的一切地方都有其纪律严明的团体,它有一整套的办法来实现监督、活动和宣传,从而使它有可能今后作为名副其实的政党发挥作用和发展壮大。

共产党人在金属加工工人进行斗争时期,依靠自己的坚韧不拔和积极主动拯救了工人阶级,使之免遭灾难。现在,他们应当使自己的行动和立场贯彻始终。他们应当拯救(通过改造)原始结构的工人阶级政党,向意大利无产阶级提供一个能够组织工人国家并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的共产党。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20年9月4日第15
期和1920年9月9日第17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203—214页

^① 出于安全的考虑,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后来改在里窝那;在佛罗伦萨,法西斯分子已经猖狂肆虐,而在里窝那,劳动者还是局势的主宰。

国际的纪律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不同于第二国际,它要求参加国际的各党都遵守最高的纪律和集中;这是绝对的历史必要性,意大利革命者——考虑到我国的情况——特别应当理解到这一点。在意大利也象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工人国家将需要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在我们看来,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建立铁的纪律和集中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当力争使共产国际成为一个强大的战斗组织;它有能力要求每一个参加国际的党在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方面所能要求的一切,争取它们在这方面做到所能做到的一切。不言而喻,我们有权要求的完全是我们自己也乐于为别人去做的事情,是由于我们认为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有绝对的必要而去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是从整个世界局势出发来观察和解释的,因为我们的活动和我们的追求是总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总的历史进程是通过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努力而实现的,它会使世界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得到改造。

意大利早在革命开始之前就已处于封锁之中。这种封锁与其说是反动派施展阴谋的结果,不如说是意大利没有相当多的国民财富这种现象的结果。意大利之所以被封锁,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国家没有资金来支付进口其工业开工和居民生活所必需的商品的费用;意大利在银行没有黄金储备,它既无矿场、大森林,也无矿藏;意大利象一只挤干了的柠檬一样,强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使得它落得的处境就象(或者说几乎象)加强开发沥青产地时蒸发

的有毒气体使得巴勒斯坦落得的处境一样。如果资产者或者改良主义者说：“意大利爆发工人革命，那就会被封锁并由于饥饿而灭亡”，那么他就是象个蒙住眼睛的骡子一样发议论；实际上意大利已被封锁，也象俄国一样，封锁是从战争爆发之日开始的，是随着拨款的告罄、随着国家境内原有的商品和消费储备的耗尽而加强的。这种事实上的封锁是很厉害的，它同一般的经济因素、同国家的极度贫困的联系愈密切，就愈无法忍耐，这种封锁的严重性由于改良主义者着手采取革命行动、而又不使这种行动得到革命结局的这种策略而加剧；据统计，金属加工工人的发动，招致为数达300亿里拉可供流通使用的资本流到了国外；斗争由于害怕封锁而中止了；这种“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风险导致意大利又缺少了300亿里拉，事实上的封锁的严重性也相应地增加了。

指责革命者把俄国看作值得仿效的历史榜样的那些改良主义者和资产者在封锁问题上拿意大利和俄国所做的比拟，是十分不明智的。实际上，意大利所处的条件与俄国完全不同，如果从意大利所拥有的作为私人财产或者全国财产财富出发来评价那些条件，那么它所处的条件更糟糕得多。俄国有黄金和白金（人所共知，俄国银行在世界上是拥有黄金储备最多的），它有一些粮食和皮毛储备，它有巨大的森林和矿藏资源。所有这些，俄国可以出售；但是封锁实际上对此有阻碍，因为各国资本家都认为，俄国所有的财富是资产阶级的财产，而不是工人的财产，他们不愿意让俄国工人进行国际贸易。如果苏维埃俄国不是必须防止国际反动派的进攻，那么俄国人民就可以把自己全部创造精力用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东西，用来生产新的劳动工具，用来创造新的经济制度；俄国人民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俄国的土地和矿藏很富有，因为俄国的领土辽阔，而人口密度很小。

意大利作为单独一个国家来看待，是很贫困的；意大利工人、

意大利人民只有在共产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时，只有在不仅私人所有制、而且民族所有制被取消的条件下，只有在各国经济都加入使意大利生产者象英国、美国、俄国、印度等等国家的生产者一样自立的统一国际体系的条件下，才会找到自己的生路。在战争时期，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目的曾经使得某种与之类似的情况得到了实现；但是，当胜利已经取得的时候，供给意大利人民以面包、大米、铁、煤，以使他们战斗到最后胜利的经济组织便不再存在了，每个国家的人民又重新陷于只能支配自己国家的财产和条件的范围之内，所给予的支援在达到目的之后便变成了债务，成为压在脖子上的一块石头。谈论这些，是为了恢复这种组织，但是，恢复工作不是为了暂时的、无关大局的目的，而是要符合一贯存在的必然性（它与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完全分不开的）的要求。如果共产国际能够争取各国无产阶级为历史做出他们所能做出的贡献，那么它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由于意大利无产阶级在居民中占的比重很大，由于它蕴藏的革命精力很充沛，它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成为能够把世界反动派的最后堡垒炸毁的火山般的力量。意大利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这个充满着困难、充满着无数牺牲和苦难的使命，在国内和在国际上都应该服从铁的纪律。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意大利人民才能摆脱资产阶级统治者（他们盲目、无知，爱虚荣，直到今天还说什么世界大战在情绪和政治方面之外没有任何痕迹）把他们拖入的绝境。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20年10月16—23
口第18期“一周政治生活”栏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455—458页

阴谋和党

资产阶级报纸(《新闻报》除外)不得不承认,社会党人对于军国主义者叛乱的威胁所发出的警报是有“十分有力的根据”的。依然对罗马政府保持忠诚的里雅斯特政权预见到阜姆的叛乱者的进攻,从星期六到星期日的一夜之间就派军队占领了城市的战略要地。在米兰,政变的总排演曾定于星期日进行;为了“迷惑人民”,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所必需的因素一样也不缺了,发出悲伤号叫的姑娘有了,成为殉难和信仰的体现的瞎子也有了;政权不得不禁止游行示威并往广场派去了……两辆消防车(反动分子的暴动没有用机枪来镇压,资产阶级政府只准备把反对他们的斗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进行到……使用水龙为止)。可是,法西斯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则继续积极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知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惩罚是有保障的,他们最多只能是冒点洗冷水浴的风险;他们在加紧培育冒险精神、对新感受的贪求、不服从任何由议会制机关规定的纪律的行为;军国主义者必定试图干冒险勾当,他们当然不是《晚邮报》的说教所能遏制的。

《新闻报》甚至不提的里雅斯特和米兰的事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新闻报》自己关于焦利蒂执政前那个时期的声明和它在当时所开展的运动使得它在同共产党人争论时手脚受到束缚。《新闻报》不可能主张,粗鲁的革命首领对阜姆事件有责任,它不可能把自由主义民主派关于反动是革命者积极主动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样一种理论重新

拿出来问世。《新闻报》由于它的过去，由于自己在战争方面的乐观主义立场，由于自己在关于如何解决因为战争而产生的问题这样一个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不可能不受惩罚地试行欺骗自己的忠实读者了；它回避答话，假装什么也没有听到和看到，只限于单调无味和喋喋不休地反复痛斥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党人。

资产阶级已不能控制国家，第一，这表现在它的经济活动上，既表现在工业活动上，也表现在农业活动上；第二，表现在它的政治活动上，表现在正常的立法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国家中应当存在于各个阶级、阶层、集团之间以及各个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方面的调整上；人身的不受侵犯和自由，集会和出版自由，都已变成了旧日美好时期的童话；第三，表现在它的国际政策上。

资本家再也不能利用简单的经济推动和各种私人利益的冲突，使用平常的手段来迫使人们劳动了。企业主自己通过自己的行动开始证明，破坏和浪费生产力的现象正在发生；他们在联合成为大公司之后，试图靠垄断、靠保护关税、靠政治压力来增加自己的利润；以前企业主所特有的品质和职能目前已不存在了。积累呢？资本家的“积蓄”在战争时期就开始汇到国外；目前在资本家看来可以称之为“积累”的东西也就是侵吞的国家财产。主动性呢？在由银行垄断和控制工业这样的制度的条件下，“主动性”不再存在，只存在“官僚政治”。任何资产阶级政府都不可能使这种实际情况“合法化”，因为不能使瓦解和衰落合法化。资产阶级政府也不可能消除这种实际情况：变成银行家和投机者的资本家拥有巨额金钱，可以收买官吏，收买议员，收买军队首脑，收买法官，使整个国家机器陷于瘫痪。衰落开始于工业，而后扩展到农业，通过银行与农业机器和肥料生产销售垄断联合组织的作用，农业变为资本主义工业的附庸。农民在暴动、夺取地主的地产、在他们自己之间分配土地。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使这种强制重新分配财产

的情况合法化，不可能使这样出现的形成新的小私有者阶层的现象合法化；另一方面，它也不可能给予农民夺取土地的行为以有效反抗，因为否则它必须发动一场可怕的国内战争，两个西西里的王国并入皮埃蒙特以后立即开展的反匪斗争如果与之相比也只不过是场儿戏。同样，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反抗城市工人日益向往对工业直接监督和直接控制的现象。两种运动（工人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农民为把土地作为私产转归自己而斗争）在齐头并进，这个情况使得资产阶级政府陷于瘫痪，使得它必定软弱无力。这种同时发生两种运动的现象不是偶然的；这证明共产党人关于建立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础之上的当前生产制度正在彻底破产的论点是正确的，这使得另外一个观点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这个观点就是：只有工人国家使得对工业的直接控制合法化，即组织好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才能也使农业革命合法化，长久可靠地巩固农民取得的成果，使得这些成果（由于在技术上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归工人掌握）成为向比小私有制和中私有制要高级的经济形式前进的出发点。

立宪国家没有能力保持对日益发展的新生产力的控制，这间接地表现在：在各阶级、集团之间、在各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盛行暴虐和违法现象。在这里，任何办法都不能用作固定不变的措施，在这里，得势的是专横、任性、偶然；如果国家的执行机关很容易沾染营私舞弊作风，那么专横、任性、偶然就开始服务于自私和狭隘的目的；国家在瓦解，瓦解的过程甚至发生在它最小的粒子内部。

政府不能进行统治了；它甚至弄不清被统治者想要什么，至于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它是不能设想的。在自己的活动中以抽象的和一般的思想为出发点的民主党要存在，客观上变得不可能了。政府在失去力量，阴谋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因素。

反动的阴谋在意大利得到的土壤比在其他国家得到的更适

宜，这是因为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调节者已丧失任何权威。邓南遮^①的冒险如果从检验资产阶级国家活动能力的角度来观察，真是具有可怕的意义，愈是想夸大它的作用，把它描绘为纯“文学情节”，使它看起来令人可笑，就愈是明显地承认国家软弱无力、国家制度衰败。其实，对于让一个追求强烈的体验的诗人能够蔑视它并使它顺从的国家，能谈得上什么主权呢？由于个别人依靠他自己拥有的手段进行反抗而不能争得和平的国家能有什么权力呢？

《新闻报》应当告诉我们，救世主焦利蒂为了扭转这种局势可以怎么办。它应当回答我们一个问题：难道在意大利不象在俄国那样，建立共产主义（就实现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历史过程的第一阶段而言，就建立工人国家而言）是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难道在俄国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什么社会力量能够夺取政权和恢复秩序、即使得由于战争而蓬勃兴起的经济力量合法化并把它们纳入正常的轨道？难道目前在俄国存在着一种力量能够代替共产党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再产生政党，即使得日常的、触及广大人士的利益具有有组织的形式；它只是产生阴谋和政变。未来是属于依然还有能力组成为坚如磐石的、团结的政党的那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和贫农；它们的政党就是共产党。正因为如此，避而不谈阴谋的《新闻报》一听到组成共产主义派时就惊慌失措了，它正在使理智、危机的心情、健全的理性都牺牲于自己的狂怒之中；《新闻报》的蹩脚作家象一切耶稣会会员一样，都有某些实际的锻炼，都被描绘得有某种历史的嗅觉和心理的直

① 加布里埃莱·邓南遮(1863—1938)，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作家。提倡享乐主义和肉欲主义的诗人，代表作有《欢乐》(1889年)等，1897年当选众议员；1919年，他组织一支志愿队占领阜姆，后被迫退出。1924年，意大利同南斯拉夫缔结和约，把阜姆归为意大利后，他被授爵位为“雪山王子”。1937年，他被任命为王家研究院院长。1938年3月1日在加尔多内—里维埃拉逝世。——编者

觉；幽灵的出现使他们惊慌失措了，诚然，他们作为博学的人已预见到了幽灵的出现，但是仍然使得他们这些属于注定灭亡的阶级的人怕得手脚冰凉，使得他们惊恐万状。

未署名

载于《前进报》皮埃蒙特版 1920 年
10月26日第275期

译自《葛兰西文选》1957年俄文版
第1卷第458—463页

工 人 国 家

一个团体只有在它具有自己的宪章性学说，能够把自己关于国家的概念具体化和公布出来，并在广大群众中能够把自己的政府纲领具体化和公布出来——这个纲领能使它在实践中真正组织一个国家，即在具体的环境中，用真正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幻想的人类来组织一个国家——只有这样，这个团体才能被称之为“政党”。

意大利社会党经常宣称自己是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政党”。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要求把某些实际的任务和迫切的义务加之于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应该已经认识到它的最高的、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工人的国家——包含创造和组织为建立一个新国家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在国内和国际这两个方面，它也应该对自己的任务的界限和形式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正是历史的发展对社会党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要求提出了批判；党的目前状况提供了这种批判性和破坏性工作的背景，这种工作不是靠别人，而是靠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来完成的。

紧接着波洛尼亚代表大会，社会党作为一个革命政府的政党出现在意大利人民面前。1919年11月议会选举的结果，展现了一种政治倾向，这种政治倾向应该给予党以它所需要的活力和热情来实现从宣传迅速转变为行动。11月选举在意大利制造了这样一种政治局势，它可以概括为几个字，这里存在着两个政府。整个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农民阶层已经宣布他们拥护社会党。他们明确地宣称，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这个政党在寻求

把意大利民族、意大利的劳动人民带进共产国际的体系，即世界工人国家的体系。现在围绕着第一个民族工人国家即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围绕着世界工人政府的第一个萌芽即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这个世界工人国家正在被顽强地组织起来。意大利所有其他群众性政党——人民党和退伍军人团体——所开展的那种类型的选举运动表明，甚至劳动人民中最落后的阶层也拥护政权的根本改变，以致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给自己披上红色伪装，大事蛊惑人心的宣传，并且提出了表面上是革命的纲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威尔逊式的神话的企图已经失败了；它想在资产阶级国家强加的界限之内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战争引起的问题进行国际性解决，这一企图已经失败了。那种不恰当的“威尔逊，各国人民的皇帝”的神话已被“列宁，共产国际的首脑”这种政治热情所代替。意大利社会党，通过它的宣传和它在战争时期所获得的威望，实际上已经成功地创造了为建立工人的国家所需的总的政治条件；它已经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得到最广大的人民同意的建立革命政府的结构。对政治心理学的最起码的了解能够使人预见到，在最初的暴力接管国家机器之后建立的这样一个政府，将会使大多数人站在它一边，而且在实际上会是一个多数派政府。

党却未能成功地组织好它所创造的形势，它未能在持久的基础上使波洛尼亚代表大会之后立即组成的政府机构巩固起来、活跃起来，这个政府机构是世界战争爆发以来在与意大利人民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中组成的。从1919年12月2—3日直至现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是这样的历史，它不断地证明，党没有能力去组织意大利人民的政治生活，给它指出方向，引导人民革命的先锋队，使它对自己的具体任务和特殊责任具有明确的认识。社会党已表明，它对于国家没有任何自己的看法，对于革命政府没有自己的纲领。

总之，社会党已表明它不是一个能担当行动的责任，能使几千万意大利人民获得食物和住所的“政党”，而只不过是一些本意良好的善良人的团体，他们集合在一起讨论着（尽管没有什么创见却有充分的无知）他们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们无休止的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政治术语——专政、苏维埃、监督、工厂委员会、半无产者、恐怖等等——应该赋予何种字面上的意义。

社会党一贯忽视和不顾人民群众——无论他们是产业工人还是政治上落后的贫苦农民——的每一次运动。它没有任何“统治”的概念，它听任都灵的拥护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管理的运动在1920年4月被压垮；9月份，它听任规模巨大的金属加工工人运动以焦利蒂的妥协和工会管理的明显骗局而可悲地告终，同样，它使得那些为接管土地而斗争的农业工人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既然不能形成自己的民族工人国家的学说，或者说，不能精心制定出一个适合于达到它自身生存的直接目标——即建立这样一个工人国家——的行动计划，这个党又怎么能理解世界工人国家和共产国际的学说呢？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党的多数派与党的执委会之间的冲突无疑地迟早会发生。事件的这一转折，是这个党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的一个最近的危急的例证。它暴露了社会党的真实性质并且提供了了解它过去的态度和过去的错误的钥匙。意大利社会党从来不懂得它必须以城市工人阶级作为自己行动的全部基础。它应该是“所有工人”的党，然而它不是，它原来“不是任何人”的党。结果它只不过是一个议会党。它可以把“纠正”或破坏资产阶级国家规定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却不能为自己规定建立一个新国家的目标。自从它以多数通过的决议（看来似乎是多数人的决定）确定它将拒绝服从世界工人运动的最高权力——国际代表大会及其合法的表达和统治机构即执行委员会——以来，它已经实际上显示出自己不能理解革命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对于全国范

国内劳动人民更广泛的阶层而言应当占统治地位。社会党对世界工人国家缺乏“热心公益的精神”和“忠诚态度”，表明它怎样生来就没有能力哪怕有机地构想出一个民族的工人国家来。

在意大利，“邓南遮式”的人物多得不可胜数（“邓南遮”是企图在铁路上行骗的旅客、隐瞒自己利润的工业家、制造假帐欺骗税务当局的商人），资产阶级对自己的机构缺乏热心公益的精神和忠诚态度，这就一贯阻碍着井然有序的议会国家的发展（例如象在英国那样）。资产阶级的这些习惯已经流传给了工人运动，并使它以焦利蒂之流的妥协的可悲结局而告终：显然，他们已表明他们自己能够分裂共产国际并且成功地使得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力量几乎有一年时间处于瘫痪状态。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清晰而明确的政治立场和坚决的不妥协态度，设法保护世界工人国家的虚弱的身躯，使它不受意大利的腐败、意大利的怀疑主义和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坏习惯的影响——因为共产党人相信，他们保卫共产国际，就是有效地保卫着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意大利劳动人民的未来。因为他们从内心深信，这样他们就开始了具体的政治指导和教育的工作，这个工作今天是建立意大利工人国家的基本先决条件。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日报版1921年1月

1日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1920）》1977年英文版第1卷第368—371页

里窝那代表大会

里窝那代表大会注定要成为当代意大利生活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①。在里窝那大会上，意大利工人阶级是否有能力从自己的队伍中形成一个自治的阶级政党的问题将要得到最后解决。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 and 全世界生产力所遭受的两年苦难是否能使意大利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问题也将得到解决。

工人阶级既是一个民族的也是国际的阶级，它必须领导劳动人民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为争取从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斗争。工人阶级的民族任务是由意大利资本主义及其官方表现方式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过程决定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是遵循这样一条发展路线而掌握政权的：它使农村服从工业城市；使中部和南部意大利服从北部。意大利资产阶级国家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问题表现为不仅是大工业城市和紧挨着它们周围的农村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是国家一部分领土同另一部分有非常明显特点的领土之间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是用下列方式进行统治和剥削的：在工厂内部直接统治工人阶级，而在国家内部则是统治由贫苦农民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意大利劳动人民的更

^① 这篇文章写于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夕，这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1月15—21日在里窝那召开，并使得共产主义者脱离了最高纲领派和改良主义的潮流。

广泛阶层。无可置疑的是，只有工人阶级，通过从银行家和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才能够解决意大利国家生活中的中心问题，即南方问题。无可置疑的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由复兴运动开始的棘手的统一任务得到圆满的结果。从领土方面说，资产阶级已经统一了意大利民族。工人阶级的任务是结束资产阶级的这一工作，在经济方面和精神方面使意大利民族统一起来。这只能依靠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实现，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由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国家的其他生产力实行有层次的控制所构成的。这种事件只能通过直接隶属于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努力才能发生。它只能发生在米兰、都灵、波洛尼亚。在一些大工业城市，这些大城市产生出千丝万缕，编织成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对国家的其他生产力进行统治的网络。意大利由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特殊构造，不仅这一点是真实的，即工人阶级由于解放了自己也将解放所有其他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而且同样也是事实的是，所有那些其他的阶级要想解放自己的唯一道路是同工人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并且经受住甚至最严重的苦难和最残酷的考验来坚持这一联盟。

将要在里窝那发生的共产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之间的决裂将具有以下特殊意义：革命的工人阶级将与那些已经蜕化成为国家寄生状态的堕落的社会党潮流相决裂，它将与那些力图利用北方对南方享有的优越地位以制造无产阶级贵族的潮流相决裂，与那些建立了一种与资产阶级关税保护制度并列的合作社保护贸易制（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对国家的其他生产力占有优势的合法表现形式）的潮流相决裂，它们相信它们能够背着劳动人民的大多数来解放工人阶级。

改良主义者把勒佐艾米利亚的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榜样”；他们希望我们相信，整个意大利和整个世界都能变成一个大的勒佐

艾米利亚。革命的工人阶级坚持它对这种假的社会主义形式进行批判。工人们不能通过接管少数特权，通过工人贵族或议会妥协与行政讹诈来获得解放。工人们要得到解放，只有通过北部的产业工人与南部的贫苦农民之间的联盟，建立这个联盟的目的是要粉碎资产阶级国家，缔造工人和农民的国家，建设工业生产的新设备，用来为农业的需要服务，为意大利落后农业的工业化服务，从而提高国民的生产水平以有利于劳动群众。

意大利的工人革命和意大利劳动人民参与世界事务都只能在世界革命的过程中才能发生。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产生的执行委员会中，已经存在着一个世界工人政府的萌芽。在里窝那，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社会党的一小部分共产主义者——将要强调，对工人阶级的第一个世界政府的有纪律的忠诚是必须的和不可避免的，它一定要使这个问题成为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承认最大限度的纪律，因为它想要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同样地承认并遵守最大限度的纪律。

意大利的工人阶级知道，它自身解放的条件，它能够解放所有受到意大利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其他阶级的条件，是存在着一个为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的世界革命力量的体系。意大利工人阶级愿意帮助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求得解放，但它也希望得到一些保证，即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将帮助它自己求得解放。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际权力机构才能给予这种保证，这个机构得到它所有成员的真心实意的信任，并且能够迅速地、精确地施展自己的力量，就象资本主义的世界权力机构为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做的那样。

因此显而易见，当前使社会党感到苦恼并将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解决的问题，不单纯是党内问题或个别人之间的私人冲突。在里窝那，意大利劳动人民的命运将在被讨论之列，在里窝那，意

大利民族的历史新纪元将要开始。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日报版1921年1月
13日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10—
1920）》1977年英文版第1卷第375
—377页

对代表大会的干预

一

葛兰西论证说，劳工联合会的创建，大大地改善了意大利工会的处境。因此，必须在提纲中包括进一些新的纲领性的论点^①。这些论点将包含在现有的第10条提纲以后补充的3条提纲中，并且将会受到下列原则的影响。

劳工联合会的创建是试图用一种纯官僚主义的形式来解决意大利工会运动的行动统一问题。有一段时间，由于最近几次罢工的不幸结局和实际上不可能指望其他的罢工有成功的希望，有组织的群众一直在要求着手处理并解决统一工会行动的问题。一些群众组织的领导者，和劳工联合会一起，已经提议并实行了一种纯官僚主义的统一形式，以便在群众面前推卸掉他们应负的责任。到明天，这些领导者会对群众说：“你瞧，我们已经统一了，我们创建了劳工联合会，但是就连这个组织也没有带来任何好处。”

最初，似乎在形成一种倾向：要建立一个劳工党，使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都依附于一个名称和一个有机体。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作为共产党少数派的批判和行动的结果，这一企图失败了——尽管人们作了一切努力以便避开这种批判和行动。现在，工会范围内已经实现了统一，但完全是通过官僚主义的形式。

^① 由葛兰西和塔斯卡（主要是后者）为罗马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工会策略的提纲》于1922年1月31日至2月9日分成9部分发表，共有30条。劳工联合会于1922年2月20日正式组成。

在回忆了劳工联合会的有机构成后，葛兰西同志说共产党的态度现在当然出于双重考虑。首先，出现了下列问题：我们能不能说在劳工联合会里存在着解决意大利无产阶级组织统一问题的基础呢？不能排除这一点，而且在这方面有一些有趣的迹象。在《新人性》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安吉洛·法奇写的，另一篇是卢易吉·法布里写的。这两篇文章中表达的意见似乎赞同这个提纲。确实，在现时，直到昨天还在和劳工总同盟竞争着的小型工会组织可以看到，它们的竞争取胜的前景很渺茫。不能排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阿芒多·博尔吉声称，他对达拉贡纳比对共产主义者更加接近，而且很可能已经有了私人的来往。这些都是形势改变的征兆，这种改变可能在明天造成一种新的局面，即意大利无产阶级工会统一的组织基础可能不再是总同盟，而是劳工联合会自身了。

其次，共产党人必须探索，用什么方法使得当前的官僚主义的统一可能成为具有革命性的发展过程的出发点。如果政治局势恶化，意大利国家再次回到1919年的分裂状况，那么类似劳工联合会式的、由无产阶级直接选举的统一委员会的策略，也许可能会比工厂委员会的策略更为适合，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现在发现自己不可能继续为工厂委员会作宣传，而且也由于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已经不止一次地受到挫折。共产党已经要求劳工联合会的地方委员会应该有更广泛的组织，并且和群众有更密切的联系。这里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可能产生导致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也参加到这些委员会去的问题。确实，今天有组织的工人人数正在下降，但是这种情况的产生部分是由于交会费或集会而使群众失去了对组织形式的信任，然而一种由选举产生的组织会重新唤起群众的兴趣。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群众踊跃参加了现有的由选举产生的组织（诸如失业基金会、合作储蓄信贷所等）的领导委员会的提名。

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为劳工联合会的选举委员会作宣

传是合乎时宜的，这些委员会就会变成一种准苏维埃型的机构，在这个组织内部，工人阶级目前还是萌芽形式的倾向就能够统一起来。

关于劳工联合会的提纲将要阐述这些基本的指导思想。然而，没有立即认为有必要改变第10条提纲的内容，这条提纲说，共产党人认为意大利无产阶级组织上统一的基础是劳工总同盟，因为目前这只是一个尚未得到澄清的一些倾向的问题。同样，据认为，即使在即将召开的巴黎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工团主义工会决定从红色工会国际中明确地分离出去，我们的同志们在工会组织内部的地位也应该照旧不变。

载于《新秩序》1922年3月25日

二

葛兰西声称他同意博尔迪加同志和特拉契尼同志提出的提纲，并且希望向大会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接受了一些与党的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提纲相矛盾、并承认有可能建立政治统一战线的一般的方案，这会使人相信我们的想法与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想法是一致的，根据这种想法，这种政治统一战线将要扩展到人民党。这将是一个好主意，尽管对这一点还要展开一些讨论。我确信，根据扩大执委会批准的提纲的观点，不仅人民党，而且社会党的一部分必须被排除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之外，因为同它们达成协议就意味着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人民党基本上是以农民阶级为基础的。现在农民确实准备进行反对国家的斗争，但是他们决心要为保卫他们的财产，而不是为保卫他们的工资和工时而斗争。他们进行的斗争是受属于资产阶级民法范围内的动机所影响的。

我们也经常把工人和农民混同起来。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阶级。社会党自身是以这两个阶级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两种精神同时存在于社会党内的原因。工人阶级和农民能够以一种有机的形式达成协议，就象共产党在它关于土地问题的提纲中所建议的那样；但是，决不能认为农民能够变成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必须保持它作为工人政党的特征，这个政党在农村有行动中心。

因此，必须牢记意大利的政治局势。在德国，趋向于要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运动是以工人阶级群众为基础的；但是，统一战线的策略除了对于那样的工业国家之外毫无价值，在那里，落后的工人能够指望靠赢得议会的多数来进行防御行动。在这里，形势却不同。如果我们提出一个工人政府的口号而且试图去贯彻它，我们将返回到社会党的矛盾心理，当时那个党曾被谴责为无用，因为它既不能决定成为纯粹的工人的政党，也不能决定成为纯粹的农民的政党。如果我们提出一个政治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将会遭到社会党左翼即马菲分子的反对，后者是以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城市和农业工人占优势的地区为基础的。因此，必须使得代表大会不要作出一般性的论断，以免这种论断在黑暗的意大利局势和我国贫乏的政治文化的特定情况下，能够引起极其严重的模棱两可的解释。对比之下，工会统一战线则有着一个对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十分重要的目标。

某些发言的人声称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改良主义的了。我认为必须抗议这种说法。工人们今天是分散的，缺乏领导人，缺少一个能使他们利用自己力量的组织。他们因而必然有机会主义；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工人阶级恢复一个能重新构成自己力量的组织。这个组织是种种因素和结合力的综合体的成果，这种综合体已被破坏，共产党人必须重新创造它。

关于我们同社会党人的激烈论战，我想，由于我是对此负责的

人之一，我有必要作某种声明。我相信，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进行一场如此严厉的论战是工人阶级利益所必需的事情。当反击落到工人身上，打破了他们所有的希望时，至少有必要设法说服群众，相信失败的过失不在他们身上，这样，他们就不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尤其在大城市必须这样做，在那里人们对工人们的需要能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此外，说群众已经抛弃了共产党是不正确的。他们拥护共产党，而且知道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够领导他们。我们的党在他们的意识中赢得了牢固的地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如何重新建立一个组织，通过它群众能够重新成为政治形势中的统治力量。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22年3月28日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21—1926）》1978年英文版第2卷第118—122页

意大利共产党与共产国际 应当保持什么关系

迄今为止，我们对共产国际采取了一种显然是不明朗的态度。我们虽然宣布了非常正规的纪律，使用了不是平级相待，而是更适合于下级对上级的语言，我们在行动上给人的印象却是在想方设法回避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各项指示。每个地区的态度必然产生国际反应，而且可能引起一种国际性的组织进程，或者至少在共产国际内部引起一种产生各种派别的运动，这个确定方针的原则现在成了一个基本原则。执行委员会无疑将会对这样一种态度的任何表现进行尖锐的斗争。执行委员会认为最重要的一种传统做法是经常保持一致的投票。这不光是一个形式问题。显然，从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来看，在重要的公开表决中不一致，在广大群众中就会产生各种异常的态度；各种政敌倾向少数派，宣扬和推广它的主张；他们秘密发表宣言和纲领，等等；有时甚至有各种反对派或他们的一帮支持者在上面签字；他们进行一系列在关键时刻可能变得非常危险的鼓动活动。对付这样一种花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表决时保持一致。这种一致在公众心目中就是达成协议，就是证明实现了最公开的团结。就共产主义政党必须从明天着眼来确定今天的立场而言，这条原则成了他们的基本原则，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与我们的态度也有关系；例如，关于我们将遵守甚至自己也不相信的纪律的主张，辞职的威胁，等等。其实，这种态度现在或将来可能引起流言蜚语，可能在幕后假表态而

在国际舞台上引起一种非常严重的影响，这就更加危险了。因此，最好在私下讨论中充分地提出问题，自豪地坚持个人的观点，并且表示自己也准备进行斗争。自然，这类问题只能在章程范围和历届代表大会和会议通过的决议范围内发生。

从国际形势来看，我们现在处在一种可疑的地位。俄国同志制定的统一战线策略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实际运用的一般方法上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它未能在任何一个国家找到能够使它具体化的党和人。德国似乎一直是值得仿效的范例，但它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德国党的大多数党员不理解这种策略，少数党员流露的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情。派到阿姆斯特丹去的法兰克福代表团只能遵行一种官僚主义的做法，因而被召回了。显然，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现象，有些工作在整个国际范围内未能进行，领导软弱，不能胜任。意大利问题必须在这个范围内来考虑，不能看成取决于某些个人恶意的事情，也不能靠决心成为马切勒斯^①的头等粗人的善意来改变它。我们必须表明：如果拒绝承认我们的善意和正确行动，我们就要用这种方式向其他党提出这个问题，并且一定利用适合我们的一切因素。

共产党现在的多数派要坚决维护它在意大利的地位和历史作用。在意大利，必须组成有思想中心的统一的共产党，这种中心既不是传统的社会党人的中心，也不是同它妥协的产物。我们正在捍卫意大利革命的未来。社会党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党领导集团采取类似的态度。他们现在和将来都要用各种手段坚决捍卫他们的政治形象和他们的未来。我们也许犯了错误，但我们愿意纠正。不过，我们不愿意让一个吸引和吸收新成员加入共产国际

^① 马切勒斯(马尔库斯·克劳狄斯，公元前268—208)，是古罗马同迦太基的几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将军，也是罗马第一个将军证明迦太基大将汉尼拔不是不可战胜的。他经常被推崇为意大利共和国的武德和救世主的象征。——编者

意大利支部的中心变成一个由同社会党人在根本问题上谋求妥协的人们所代表的新基础。共产国际的态度及其代表所进行的活动正在瓦解和腐蚀共产党人的队伍。我们决心对那些想要消灭我们党的分子进行斗争，并且反对一切腐化分子。由于处在非法和流亡的地位，这是应尽的责任。我们决不让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发生的事在意大利重演。如果共产国际在我们回击时也受到一点打击，那就休要为此指责我们，说我们同不能信赖的人联合是犯了错误。

手稿

可能是1923年6月写于莫斯科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21—1926）》1978年英文版第2卷第154—156页

《新秩序》的纲领

让我们从一个重要的观察开始：《新秩序》已出版的头两期的发行量（实际发行量）比 1919—1920 年达到的最高发行量还要大。从这个观察中可得出几点结论，我们只谈两点：1.《新秩序》这种类型的杂志代表了意大利革命群众在目前形势下强烈感觉到的需要；2.可以保证《新秩序》的生存条件，使它在财政上独立，不靠我们党的总预算。为此，只要这样来组织自发地发表的赞成意见：即使反动派（很可能）竭力进行干预来扼杀《新秩序》，阻挠它同它的读者发生任何联系，甚至在某个时刻不准这个杂志再在意大利出版，它也能够继续表达自己的意见。

头两期所达到的发行量只能归功于《新秩序》在它头几年出版工作中所采取的立场，其主要内容如下：1.能将共产国际的学说和策略的主要原理译成意大利的历史语言，这在 1919—1920 年意味着提出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即组织所有生产者群众去剥夺剥夺者，并由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去管理工业，从而管理国家。2.在社会党内部——这个党当时是无产阶级的多数派——支持共产国际的完整纲领，而不是其中的某个部分。正因如此，列宁同志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说过，《新秩序》派是社会党中在意大利忠实地代表共产国际的唯一派别。由于同样的原因，《新秩序》报编辑部拟订的提纲经都灵支部提交给 1920 年 4 月召开的米兰全国委员会会议，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明确地定为在意大利实行革命改组的基础。

在意大利今天的形势下，我们现在的纲领必须重申 1919—1920 年所采取的立场。它必须反映今天的客观形势以及向无产阶级这个独立阶级提供自主活动的可能性。用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它必须继承忠实地和完整地解释共产国际纲领的传统。今天的紧迫问题即必须提出的口号是工农政府的口号。这是一个普及口号的问题，是一个使它适合意大利具体条件的问题。要说明它如何从我们国家生活的每个事件中产生出来，它如何重新提出来，并且包含了各种党派的一切要求，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瓦解工人阶级，首先是瓦解农民群众的政治意志的各种倾向。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应当忽略纯属工人阶级和工业的各种问题，而是正好相反。经验（包括意大利的经验）表明，工厂组织在目前阶段（从党的基层组织到内部委员会，即到全体工人群众的代表制）非常重要。例如，我们相信，今天甚至不存在一个这样争辩的改良主义者，他们会说，在工厂选举中只有参加了工会的工人才有权投票。任何一个记得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必要斗争的人，都有一把尺子来衡量哪怕是对改良主义者出于经验所迫而取得的进步。因此，工厂组织的一切问题都得送回来由我们讨论，因为只有通过在反动统治下用尽一切办法建立的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建立工农政府的运动才不会重蹈……占领工厂事件的覆辙。

在上期发表的《反对悲观主义》一文中，我们谈到了我们党在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所应遵循的方针。这篇文章不是表达某个个人的意见，而是《新秩序》过去的编辑和朋友交换意见和达成协议的整个过程的结果。因此，在它开始以前，它就是一群同志思考的最终结果，这些同志无疑都被公认为通过实际工作的直接经验和长期实践而熟谙我们运动的需要的人。这篇文章引起了某些反响，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无法避免的是，3 年的恐怖主义和由此而来的缺乏重大争论的情况，甚至在优秀同志当中也会形成

某种宗派和派别精神。从这篇短评可以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必须进行大量工作，使我们党员群众的政治水平提高到共产国际各主要政党已经达到的水平。我们今天相对地说来仍是一个小党，这是由于白色恐怖的环境造成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的组织必然会成为一种为伟大的群众性政党准备结构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用这种观点来观察我们的全部问题，甚至评价个别同志。

法西斯时期常被用来与战争时期作比较。社会党的弱点之一，是它在战时没有关注始终忠贞不渝的2万至2.5万名社会党人这个核心，没有将他们看成是停战以后蜂拥而来的广大群众的组织要素。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个核心在1919—1920年被淹没在新成员的浪潮之中。工人阶级在最黑暗和最困难的年代所取得的组织实践与经验也随它一起付诸东流了。如果我们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就会成为罪人。现有的每一个党员都经历过抉择的过程，表现了忍受牺牲的力量，因此，每一个人对我们都是可贵的。中央领导必须帮助他们提高自己，帮助他们从切身感受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及其所包含的一切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秩序》的目的是在党的整个活动范围内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

因此，要实现上述的协议，这是《新秩序》老朋友的特殊任务。我们说过，要在下半年募集5万里拉，这是保证这个周报独立生存所必需的金额。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组织500位同志进行活动，其中每个同志务必在下半年向他的亲友募集100里拉。我们要保存一个愿意同我们的活动合作的人的详细名单，这些人将成为我们的理事。募捐额可分下列几种：1. 一般认捐额，金额可以是几个苏尔德^①或许多里拉；2. 支持性认捐额；3. 党的组织者和宣传员函

^① 意大利货币，币值为1/20的里拉。

授课程的初期费用，金额不少于 10 里拉，捐款人有权听课，次数按印刷和邮寄的全部费用而定。

我们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够重建一个机构去取代在 1919—1920 年的民主组织之下《新秩序》用来同工厂和工人俱乐部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机构。这种函授课程必须成为创立小型党校活动的第一个阶段。这种党校是用来培养布尔什维克式的，而不是最高纲领主义者式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换句话说，他们应当有头脑、肺腑和喉舌。因此，我们应当同最优秀的同志保持经常的通信，告诉他们俄国和其他国家在这个领域进行试验的情况，要他们认清形势，向他们建议读什么书和用什么方法读书。我们认为，特别是流亡国外的同志应当大量做这一类的工作。凡是在外国有 10 位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的地方，就应该成立一个党校。老一些的和比较干练的同志应当成为这些党校的教员。他们应当让年轻同志分享他们的经验，从而为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水平做出贡献。

当然，采用这些教学方法并不能解决工人阶级精神解放的伟大历史课题。但是，我们不是空想地来解决我们想要实现的这个任务。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党——只就入党而言——由在精神解放上已经表明达到相当水平的同志组成。我们的任务是要提高我们的干部；使他们能够对付即将来临的斗争。此外，这些斗争实际上将表现为：工人阶级由于处在血腥的反动势力之下而变得小心谨慎，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不信任革命分子。它要看他们从事实际工作的情况，并考验他们的严肃性和工作能力。我们在这方面也必须使自己能够击败改良主义者，因为毫无疑问他们这一伙今天拥有最多的优秀干部。我们如果不竭力去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就永远不能继续前进。

《新秩序》的老朋友，特别是 1919—1920 年在都灵工作的那些

朋友都深知这个问题的全部重要意义，因为他们记得，在都灵我们是如何象做实际工作而不光喊“革命万岁”的工人同志那样，成功地撤销了改良主义者的组织职务，按照工厂委员会运动的要求组织起来。他们还记得1921年是怎样未能从机会主义者手中夺取象亚历山大里亚、比埃拉和维切利等某些重要阵地，因为我们没有称职的组织人员。我们在这些中心丧失了多数，是我们在组织上存在弱点的结果。但相形之下，在某些中心，例如在威尼斯，一个能干的同志在工厂和基层工会进行了热情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后，却能使我们获得多数。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下面这个真理：革命政党的干部如果软弱，最有利的形势也无济于事。各种口号只能推动广大群众参加运动，并向他们指明总的方向。但是，如果党没有想到在实践中将他们组织起来，没有想到建立一个机构来训练他们，使他们成为永远坚强的人，党就应当受到谴责。我们应当从占领工厂的事件中吸取许多教训。

为了帮助党校进行工作，我们建议出版一系列小册子和书籍。我们提出的小册子有：1. 马克思主义基础说明；2. 论工农政府口号在意大利的应用；3. 宣传员手册，包括关于意大利经济和政治生活、意大利政党等最主要的材料。换句话说，这是通过集体阅读资产阶级报刊专为进行宣传而收集的不可缺少的材料。我们要出版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另附上梁赞诺夫^①同志的注释。这些注释汇集起来就是用通俗形式全面解释我们的学说。我们还要出版一本历史唯物主义文选，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最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集，它介绍了我们两位伟大导师的著作概况。

^① 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戈尔登达赫)(1870—1938)，90年代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敖德萨和基什尼奥夫开展工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工会运动部门工作；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组织者之一，1931年前任该院院长。——编者

迄今取得的一切成就使我们充满希望，满怀信心，这项工作一定能够顺利地继续进行下去。努力工作吧！我们的优秀同志必须相信，这里所谈的是一项政治声明，是我们运动发展的活力和能力的表现，因而是反法西斯的革命示威。

安东尼奥·葛兰西代表编辑部写的

载于《新秩序》1921年4月1日、15日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21—1926）》1978年英文版第2卷第224—228页

意大利危机

意大利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危机正如在全世界一样开始于世界大战，它没有被法西斯主义治愈。法西斯主义由于采用政府压制方法，使资本主义总危机很难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实际上几乎完全不可能表现出来。不过，它未能制止这种危机，至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更无能为力了。一般说来，我们共产党人甚至也习惯于这样认为，意大利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中产阶级的覆灭。这是事实，但是，必须理解它的全部意义。中产阶级的覆灭是破坏性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在发展，而是与此相反，正在日趋没落。这种现象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经济总形势而进行孤立的考察，它的后果是无法预防的。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不再能，而且将来也不再能满足意大利人民的生活需求；它不能保证意大利广大群众的面包和住房。中产阶级的危机今天处在突出地位，这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政治现象。这只不过是一种时代的形式。正因如此，我们称它为“法西斯主义”形式。为什么？因为法西斯主义的最初阶段是在这种危机基础上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因为法西斯主义是靠利用缺乏觉悟和缺乏志气的小资产阶级，并组织它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掌握政权的。它极端仇视工人阶级，因为后者通过自己的组织力量，正在减少资本主义危机对它的影响。

法西斯主义正日暮途穷，奄奄一息。这正是因为它没有信守自己的任何诺言，没有满足任何希望，没有减轻任何痛苦。它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力，解散了阶级工会，降低了工资，增加了工

时，但是，这一切仍不足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即使很有限的一点生命力。为此就还要降低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掠夺小资产阶级经济，因而不仅要扼杀无产阶级的自由，而且要扼杀一切自由；不但要反对各工人阶级政党，而且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还要大肆反对所有的非法法西斯政党，反对所有不是由正式的法西斯主义直接控制的团体。

为什么中产阶级的危机在意大利产生的后果比其他国家更加严重？为什么它引起了法西斯主义，并且使后者掌握了政权？这是由于我们国家的工业不发达，而现有的工业又具有地区性质，因此，小资产阶级不但人数众多，而且从“地域”上讲是唯一的全国性阶级。战后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还具有整个国家崩溃的尖锐形式，从而促使混乱的爱国主义思想重新抬头，因此，一旦工人阶级在1920年未能用自己手段实现建立一个能满足意大利社会整个民族需要的国家的任务，除了采取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以外就别无他法了。

法西斯政权正日暮途穷，因为它不仅未能制止战后开始的中产阶级的危机，而且实际上帮助加速了这个危机。这个危机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是中小商号的倒闭，破产数字在最近两年猛增。信贷垄断，财政制度和租金立法摧毁了小工商企业，财富从中小资产阶级手中真正转移到大资产阶级手中，生产设备则没有任何增加。小生产者甚至还未变成无产者就经常挨饿，成了前途绝望的人。使用法西斯暴力强迫储蓄者将他们的资金投入特定的范围，也不会给小实业家带来多大的好处。当它取得成功的时候，它只是使危机的后果从一个阶层转嫁给另一个阶层，从而增加了储蓄者当中本来就很不强烈的不满和不信任，这是由银行界现存的垄断制所引起的，并且被大企业主在普遍贫困中为取得贷款而不得不采取的突然袭击策略所加重了。

在农村，危机的发展同法西斯国家的财政政策联系更加密切。从1920年到今天，一个佃农或小农家庭的平均收支预算由于增税和订契约条件的恶化等等而减少了约7000里拉。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小农场的危机现在是典型的危机。在南方，加进了新的因素，其中主要的是不能移民和由此而引起的人口压力。由于耕地面积缩减，收成也就减少。意大利全国去年的谷物收成为6800万公担，即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低于南方的平均水平。今年整个意大利的收成低于平均水平，而在南方则是完全歉收。这种情况的后果还没有强烈地显示出来，因为在南方存在着落后的经济条件，这使得危机不可能象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立即充分地暴露出来。不过，在撒丁岛已经发生了由经济困难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的一些严重事件。

因此，法西斯政权没有制止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意大利人民在法西斯统治下生存的可能性减少了。正当人口压力由于迁居海外困难而增加的时候，采取了限制生产机构的措施。这些受到限制的工业机构只有通过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用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高的生活费用来压榨他们，才能挽救自己免于完全崩溃，结果是引起熟练工人外流。换句话说，它使人类生产力——国民财富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日益贫困化。中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法西斯政权身上，他们被总危机压倒了。实际上，他们自己正是资本主义危机在这个时期的表现。

这里简单提到的这些要素，只是有助于回顾当前形势的全部意义，在当前形势下没有任何经济复苏的可能性。意大利的经济危机只能由无产阶级来解决。意大利人民只有通过参加欧洲和世界革命才能恢复充分利用人类生产力的能力，并使国民生产机构重新得到发展。法西斯主义只是推迟了无产阶级革命，但没有使它成为不可能。其实，它帮助扩大和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范围，

而在法西斯主义的试验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将成为真正的人民大众的革命。

法西斯政权的社会和政治分裂在4月6日选举中第一次大规模地表现出来。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工业区明显地变成了少数派。换句话说，在意大利工业区存在着支配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4月6日的选举说明这个政权的稳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次选举使群众再一次受到鼓舞，推动了他们之间的某种活动，标志着紧接在马特奥提^①被刺以后的日子里已经成熟的民主运动的开端，它仍是今天形势的特点。反对派力量在选举以后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地位。他们在报刊上和议会中进行鼓动，批驳和否认法西斯政府的合法性，在解散法西斯主义控制和支配的全部国家机构的活动中起了强有力的作用。这在民族法西斯党内部引起了反响，并且使议会多数派发生了分裂。这就是发动空前未有的反对反对派的威胁运动和刺杀统一社会党议员的原因。这种罪行所激起的愤怒的风暴使法西斯党大吃一惊，惶恐万状，不知所措，芬齐^②、费利帕里和切萨里诺·罗西在那个痛苦的时刻所草拟的3项文件（反对派都知道）说明了这个党的最高层丧失了一切信心并且错上加错。从那以后，法西斯政权就处在垂死挣扎的痛苦时刻。它仍然得到它的所谓同路人力量的支持，但是，它所得到的只是绞索吊死鬼那样的支持。

① 齐阿柯莫·马特奥提(1885—1924)，曾任统一社会党书记，被称为屠拉梯的“精神之子”。1919年当选众议员，不久成为法西斯的最头疼的敌人，因为他用种种数据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和四月大选中的违法行为，1924年6月10日被法西斯暴徒绑架，惨遭杀害。——编者

② 阿尔多·芬齐(1891—1944)，墨索里尼的亲信之一。1919年以后在波河流域积极参加法西斯主义运动；1921年当选众议员；1922年任内政部副部长；1924年因与马特奥提被暗杀事件有关，被迫解职。1943年由于进行反法西斯活动被捕；1944年被纳粹处决。——编者

马特奥提谋杀案提供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说明法西斯党决不可能变成一个正规的执政党，而墨索里尼除了卖弄一种动人的姿态和装腔作势以外，毫无政治家或执政者的气派，他不是国家生活的要人，而是乡下民间传说中的奇才。与其说他像克伦威尔、波利瓦尔或加里波第那样的人物，不如说他象来自意大利各省的戴假面具的角色，他们只有在故事中才会被人们想起。

马特奥提被刺所引起的人民大众反法西斯高潮，表现为各反对派退出议会这种政治形式。反对派议会实际上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围绕它组成了一个全国多数派。在感情和道德领域爆发的这场危机就这样具有了明显的机构性质。成立国中之国，成立反法西斯政府来反对法西斯政府。法西斯党无力制止这种局势。这场危机完全压倒了它，并且正在瓦解它的组织队伍。动员全国民兵的最初尝试彻底失败了，只有20%的人响应号召。在罗马只有800名民兵去兵营报到。这次动员只在格罗塞托和佩鲁贾等少数农业省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从而能往罗马派遣少数几个军团去准备对付流血斗争。

反对派势力仍然是人民大众反法西斯运动的支柱。它们在政治上代表民主高潮，这是意大利社会危机目前阶段的特征。起初，大多数无产者的主张也适应这些反对派力量。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是要设法防止这种事态长期固定不变。因此，我们的议会党团参加了反对派委员会，承认并强调这场政治危机由于存在两个政权和两个议会而具有的主要特征。如果他们想要实现群众在运动中指派给他们的任务，反对派势力就不得不赋予客观存在的事态以一种明确的政治形式，但是，他们拒绝了。这就要向无产阶级发出呼吁，因为只有它才能使民主制度具有真正的意义。这就要加强刚刚出现的自发性罢工运动。反对派势力害怕会被可能发生的工人阶级起义所压倒。因此，他们不想离开纯粹的议会领域来开始

讨论政治问题。他们不想离开为马特奥提被刺案进行审讯的范围来着手发动一场使宣传鼓动在全国范围活跃起来的运动。共产党人接受反对派势力为这个委员会规定的党派集团的形式，就统统受到排斥。

我们在初期参加这个委员会和我们在后期退出委员会产生了下列后果：1. 它使我们在危机的最严峻的阶段幸存下来而没有失去同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如果广大工人群众依然孤立，我们党就会被民主高潮淹没。2. 我们打破了反对派势力威胁要建立的舆论垄断。愈来愈多的工人日益深信：反对派势力的集团代表半法西斯主义。这种半法西斯主义要改良法西斯专政，使它变得温和一些，而不使资本主义制度丧失近年来用恐怖和非法手段降低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取得的任何利益。

这种客观形势在两个月以后没有发生变化。国内实际上仍然存在两个政府，彼此为争夺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实际力量而进行斗争。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总危机在国家法西斯党内引起的反响，取决于结成反对派集团的各党派的明确态度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活动。

法西斯主义危机究竟在哪里？有人说，要了解这一点，首先要给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下一个定义。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在1922年至1923年是由意大利社会中所存在的一种力量对比的特殊方式所决定的。今天，这种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消失。法西斯主义的特征表现在它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现象。法西斯主义的独创性是在于它为一个社会阶级找到了合适的组织形式，而这个阶级向来没有任何结合的能力或统一的思想。这种组织形式就是战场上的军队。党卫队于是成了国家法西斯党的支柱：人们如果不能

取消整个党，就不能取消党卫队。不存在一个能使量变转化为质变的法西斯党。那是一种为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进行政治选择的机构。从智力和政治能力来看，只存在一个一致的、无法区分的机械的集合体，它只是由于在内战中获得了同民族意识形态大致相同的特别强烈的无畏军团的精神才生存下来。法西斯主义在军事组织的范围之外没有起什么作用，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甚至就在这个领域它能起的作用也是相对的。

作为这种环境产物的法西斯主义无法实现它的任何一个思想前提。法西斯主义今天说它的目标是夺取国家，同时又说它要成为一种盛行的农村现象，这两种说法怎样协调一致，令人难以理解。要夺取国家，就必须有能力在那些对管理社会具有根本意义的各种职能方面取代统治阶级。在意大利正如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夺取国家意味着首先夺取工厂，意味着具有从资本家手中接管管理国家生产力的能力。工人阶级能够做到这一点，小资产阶级则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在生产领域不起主要作用，它在作为一种工业范畴的工厂中主要是起警察性质的作用，而不是生产性质的作用。小资产阶级只有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只有接受工人阶级的纲领才能夺取国家，即在国家组织中用苏维埃制度取代议会，用共产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去组织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

“夺取国家”在法西斯分子口中是含义空洞的公式，或者只有一个意思：不惜任何代价，发明一种能使法西斯分子永远占有议会多数的选举机器。其实，法西斯党的整个思想体系像是国家幼儿园中的一个玩具；浅薄的即兴之作，它过去在顺利环境下能够欺骗它的追随者，但在今天却注定甚至在法西斯分子自己中间也成了讽刺的对象。法西斯主义仅存的一点活跃的残余力量是由害怕爆发人民复仇的危险而加强的无畏军团的精神。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危机，在反对派力量的旗帜下通过这个阶级的压倒多数，法西斯

头目所宣布的全部措施的失败，能够很大大地削弱法西斯主义的军事实力，但是，它们不能消灭法西斯主义。

反法西斯民主力量的体系从议会反对派委员会的存在中吸取它的主要力量，这个委员会已经成功地将某种纪律强加在最高纲领派和人民党等党派的身上。最高纲领派和人民党遵守同样的纪律，并在同一个纲领计划范围内工作，这是这种局势最显著的特点。这使事件的发展成为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并且决定了整个反对派势力的策略，即对法西斯政府的一切阵地采取待机而动、逐渐包围和坚持耐心战斗的策略。最高纲领派由于是反对派委员会的成员，并接受了委员会的共同纪律，因而保证使无产阶级处于消极状态。他们向仍在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之间犹豫不决的资产阶级保证：工人阶级将不可能再进行自主的活动，除非在很久以后，那时新政府已经建立和得到加强，并且已经能够镇压对法西斯主义和民主派反法西斯主义失去幻想的群众举行的任何起义。人民党的出现是反对法西斯—人民党中间解决方案（象1922年10月的解决方案一样的保证。）这样一种解决方案，由于是教廷强加的，如果最高纲领派离开这个集团并同我们结成联盟，它就会成为一种很吸引人的方案。

中间党派（改良派和立宪派）在左倾人民党的协助下所进行的主要努力，迄今为止一直朝着下列目标：使两个极端派在同一个集团内团结起来。最高纲领派的奴隶精神使它自己适宜于扮演舞台上的傻瓜角色，最高纲领派同意将自己看成反对派集团内部的农民党或自由革命党一样的党派。

在城市和农村拥有大批追随者的人民党和改良派已经为反对派提供了主要力量。这两个党派的势力还有阿门多拉^①立宪主义

^① 乔万尼·阿门多拉(1882—1923)，意大利民主主义者。1923至1926年，意大利立宪派领导人；1925年，他创建全国自由民主联盟，这个组织吸引了为数不

派作为补充力量。后者使军队、退伍军人和法庭等广泛阶层依附于这个集团。各党派之间是按照它们的传统和社会作用来确定鼓动工作的分工。由于这个集团的策略目的是孤立法西斯主义，立宪主义派承担了这个运动的政治领导。人民党则根据这次审讯及其与法西斯政权和围绕这个政权而滋生的腐化与犯罪行为的相互联系，开展一次道德运动。改良派则把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使他们自己显得微不足道，从而使每个人忘记他们蛊惑人心的过去，使每个人相信他们已经改过自新，变成了同尊敬的阿门多拉或艾尔伯蒂尼^② 参议员一样的人。

反对派势力坚定一致的态度已经取得了某些相当大的成就。它煽动了“同路人”危机。换句话说，它迫使自由派主动从法西斯主义分化出来，并向它提出各种条件。这无疑是一次成功。它已经在法西斯主义内部引起了反响，甚至还会引起更大的反响。它已经在法西斯党和退伍军人中央组织之间造成了两重性政权。但是，它已经把反对派集团的重心甚至进一步推向右转了。换句话说，它突出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保守性。最高纲领派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已准备好不仅为阿门多拉和艾尔伯蒂尼，而且为萨朗德腊和卡多纳^③ 提供有色人种的军队。

多但能量很大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献身于议会民主的理想。由于他在议会中仗义执言，谴责法西斯政府犯下的累累罪行，遭到法西斯党徒的仇恨，两次遭到毒打，第二次受伤致死，1926年4月7日在法国戛纳逝世。——编者

② 卢易吉·艾尔伯蒂尼(1871—1941)，意大利参议员，历史学家，米兰《晚邮报》的社长和股东。1923年以前曾支持过墨索里尼，后转而参加反法西斯运动。1925年，他被迫出让《晚邮报》，使它成为法西斯化报纸。他作为参议员，反对法西斯的极端行为，但在1929至1941年他隐退写书，著作有《1914年大战的起源》和5卷回忆录《政治生涯20年》等，1941年12月29日在罗马逝世。——编者

③ 卢易吉·卡多纳(1850—1928)，卡波雷托战役失败时期的意军总司令。在服役时期功过参半，1924年，法西斯政府把他提升为意大利陆军元帅。1928年12月31日在博迪盖拉逝世。——编者

这种两重性政权怎样才能解决？在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派集团之间会实现妥协吗？如果不可能妥协，我们要进行武装斗争吗？妥协是不能完全排除的，但未必一定如此。全国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决不是采取微不足道的措施或略施权宜之计就能治愈的表面现象。这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的危机，这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已经表明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所有的关系都已恶化。广大人民群众所期待的决不是微不足道的妥协，而是某种与此不同的东西。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主要的民主党派的自杀。为实现最激进目的的武装起义就会立即摆在国家生活的议事日程上。法西斯主义按照它的组织性质是不能容忍合作者享有平等权利的。它只需要带上锁链的奴隶。在法西斯政权下不可能存在代表会议，每一个会议立即会变成“军团的”营地，或者变成喝醉酒的低级军官的妓院接待室。因此，每日大事记只是记录了一系列表明法西斯制度瓦解的政治事件——周围所有各种力量缓慢而不可抗拒地脱离法西斯制度的过程。

那么，会发生武装冲突吗？反对派势力和法西斯主义同样都将避免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斗争。将要发生的情况同1922年10月的现象相反。当时向罗马进军是一次舞蹈式的游行。通过这个细微的过程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实力（军队、地方行政长官、警察、报刊、梵蒂冈、自由共济会会员、法庭，等等）都转到法西斯主义方面去了。如果法西斯主义企图抵抗，它就会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一定会参加的长期内战中毁灭，反对派集团和法西斯主义都不希望爆发一场全力以赴的战斗，并将经常避免它。与此相反，法西斯主义将试图保存武装组织的基础，以便新的革命高潮一旦出现在地平线上就能将它重新投入战场，这是这个世界上的阿门多拉和艾尔伯特尼之流，也许甚至还有屠拉梯和特雷维斯之流非常欢迎的事情。

这出戏很可能定期上演。这是为重开国民议会这一天安排的

节目。1922年10月的军事舞蹈将被一个更出色的民主舞蹈所取代。如果反对派势力不回到议会，而由法西斯党——正如他们所说——来召开多数派会议作为法西斯党的立宪会议，那么，我们就要召开反对派集团的会议，上演两个会议的斗争。

不过，有可能在议院本身找到解决方案，反对派势力在多数派很可能发生分裂的情况下，将回到议院中去，以便使墨索里尼政府变成明显的少数派。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组织一个由将军、议员和前总理组成的临时政府，解散议会并宣布紧急状态。

危机发展的领域将继续是对马特奥提凶杀案的审讯。而当芬齐、费利帕里和罗西的3个文件公开发表和这个政权的最高人物被公愤所扫除时，我们将看到这次审讯更加高度戏剧性的阶段。国家的全部实力，特别是已经开始成为讨论主题的武装力量，将不得明确地同这边或者那边结成同盟，强行实施已经制定和同意的解决方案。

我们党在目前局势下应当抱什么政治态度和采取什么策略？这种局势是“民主的”，因为广大工人群众已经成为分崩离析的乌合之众。因此，不管危机马上会怎样演变，我们所能预见的只是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而不是胜利的夺取政权的斗争。我们党的重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与其说是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直接斗争的阶段，毋宁说是向夺取政权过渡的准备阶段。总之，是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的阶段。当然，这并不排除发生猛烈冲突的可能性，而且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党不必立即进行训练，并作好对付这些冲突的准备，而是刚刚相反。但是，这些冲突也必须看成是进行争取多数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组成部分而同过渡阶段联系起来。如果在我们党内存在着想要强使这种局势出现的各种狂热集团和狂热倾向，那就需要用全党的名义，用同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生死攸关的长远利益的名义，同他们进

行斗争。

马特奥提危机在这方面使我们获得了许多教训。它教育了我们，群众在遭受3年恐怖和压制以后已经变得非常谨慎，并且要求量力而行。这种谨慎态度被称为改良主义，最高纲领主义，“反对派集团”。当然，它是注定要消失的，而且就在不太远的将来。但是，目前它还存在，尽管我们在向前迈进，我们只有经常随时随地保持同工人阶级整体的联系才能克服它。因此，我们必须反对每一种右的倾向，因为它企图同反对派集团妥协，企图阻挡我们策略的革命发展和我们为下一个阶段所进行的准备工作。

我们党的首要任务是作好准备以适应党的历史使命。在每个工厂和每个村庄都必须有一个代表党和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它懂得如何在政治上进行工作；它有首创精神，因此，必须反对在我们的同志当中仍然存在着的某种消极状态，反对那种使党的队伍保持在狭小范围的倾向。相反，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大党，我们必须设法吸收尽可能多的革命工人和农民加入我们的组织，以便教育他们去进行斗争，培养他们成为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且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工农国家只有当革命拥有许多可以由它支配的政治上胜任的成员时，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当所有地方机构的广大群众是由可靠的、有才能的同志们加以组织和领导时，革命斗争才能胜利地进行。否则，我们就会象反动派叫喊的那样，实际上退回到1919—1920年，换句话说，退回到无产阶级无所作为的年代，退回到由最高纲领派蛊惑人心的年代，退回到工人阶级失败的年代。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要退回到1919—1920年的年代。

党必须在工会领域进行大量的工作。没有大的工会组织，就没有脱离议会民主的办法。改良主义者可能只要小的工会，也可能只试图建立熟练工人的行会。我们共产党人所要的恰恰与改良

主义者相反，我们必须使广大群众重新加入工会。当然，必须具体地而不只是从形式上提出问题。群众已经抛弃了工会，因为劳工总同盟尽管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它只不过是统一社会党），它对群众的切身利益却漠不关心。我们不能建议成立一个新机构来弥补总同盟玩忽职守的缺点。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向自己提出通过工厂和农村的基层组织来开展实际活动的问题。

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抱负。我们不只是一个议会党派。因此，我们党继续进行真正的工会活动。在为工资、工时、产业纪律、供应和面包等日常进行的小斗争中，我们党也站在群众的前面。我们的基层组织必须促使内部委员会在其行动中把无产阶级的所有活动包括进去。因此，必须开展广泛的工厂运动，使它能够一直发展到产生一个由群众直接选举的全市无产阶级委员会的组织为止。这样一些委员会在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中能够成为保卫全体劳动人民普遍利益的堡垒。如果先锋队分子都能同时回到组织中去进行反对改良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派的领袖们的斗争，那么，在工厂和农村进行的这种实际活动就将使工会复兴起来，恢复它的某些内容和效能。谁在今天同工会保持距离，谁就是改良主义派的同盟者，而不是革命战士。他能编造许多无政府主义词句，但是，他丝毫不能改变正在进行真正斗争的严酷的条件。

整个党，换句话说，全体党员群众在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争取工人多数并以一种微小渐进的方式改造民主国家基础的根本任务方面所达到的程度，也是我们沿着革命道路前进时所将达到程度，它将允许我们过渡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全党必须通过它的所有机构，特别是通过它的报刊，团结一致地工作，以便从每个同志的工作中得到最大的利益。今天，我们正在组织起来进行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总斗争。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真正决心：不仅要推翻墨

索里尼和法林纳契^①的法西斯主义，而且要推翻阿门多拉、斯图佐^②和屠拉梯的半法西斯主义。我们以此来答复反对派报刊的愚蠢的运动。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重新组织广大群众，并且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党：劳动人民把它看成是表达他们政治意志的唯一政党，是捍卫他们的眼前的和长远的历史利益的堡垒。

署名：安·葛兰西

载于《新秩序》1924年9月1日。曾以《中产阶级的危机》为题发表于《团结报》1924年8月26日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21—1926）》1978年英文版第2卷第253—266页

-
- ① 罗贝尔托·法林纳契(1892—1945)，法西斯分子。1919年参加法西斯运动；1921年进入议会并参加3月进军罗马。1940年他主张站在德国一边参战；1945年4月被抵抗运动部队抓获予以处决。——编者
- ② 卢易吉·斯图佐(1871—1959)，意大利人民党创建人之一。1905年当选省议会议员；1919年，创建意大利人民党，当选政治书记；1923年辞职。1923年，流亡英国、法国，以写作和支援受法西斯迫害的流亡者为其事业；1946年回意大利，1952年他被任命为终身参议员；1959年8月8日在罗马逝世。——编者

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如果人们说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同一现实的两个方面，是同一活动（即资产阶级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而进行的活动）的两种不同方式，那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共产国际的理论肯定了这一真理，但只是意大利近几年的历史才对此作了毫不含糊的证明。在意大利，近几年来在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有一个完善的分工。

世界大战后，事情愈来愈清楚，意大利的资产阶级要以民主制度来继续它的统治是不可能了。然而，在战前，意大利的民主就已经成了完全独一无二的制度。这是一种既不存在经济自由也不存在实质上的政治自由的制度；这个制度力求通过腐蚀和暴力来阻止新生力量的任何自由发展，不管这些新生力量是否预先对现存的国家机构承担了义务；这个制度使统治阶级处于少数地位，而如果没有警察和卡宾枪手的拚命支撑，这个阶级便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战前，在意大利的民主制度下，每年都有几十个工人在街头牺牲；农民们被送到一些地方去摘葡萄都要戴上口络，因为害怕他们可能去尝尝果实，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说，民主事实只在于他们有了可能在基层建立一个组织网，并且一部分一部分地使之发展，直到这些组织把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中坚分子包括进来。甚至这一非常简单的事实也意味着对民主制度判处了死刑。战后危机使得这一事实变得十分清楚。

工人的阶级组织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了无法挽救的局面，无论

是通过一切民主制度本身能够允许的国家暴力，还是系统地运用从政治上腐蚀领导人的办法都行不通了。这一点在意大利第一次按照普选和比例代表制进行选举以后就可以看出来。在选举之后，民主的资产阶级对于解决如何防止他们掌握的政权易手的问题感到无能为力。不论领袖们有怎样的愿望，尽管缺乏有意识的指导，工人运动仍一往无前并取得了决定性的发展。对菲力浦·屠拉梯鼓掌，向达拉贡纳使眼色，对合作运动的达官贵人们偷偷地施以恩惠，都再也不是足以抑制一场由千百万工人的压力所推动的运动，不管这些人是以怎样一种不合逻辑和初级的方式结合在一个组织里的：这千百万人由于基本需求已经增长却得不到满足的刺激而行动起来。在这个时刻，那些想要保持一致的民主主义者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使群众忠于国家？只要这里并不存在一个与群众血肉相关的国家，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样一个国家是经过有机的产生过程从群众中形成的，并对他们负有义务。实际上，在这个时刻，民主主义懂得，它必须退居一旁，把地方留给一种不同的势力，同时，法西斯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

法西斯主义对于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作出了哪些贡献呢？它甚至开始破坏已经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意大利民主制度——即在基层工人之间建立一种组织联系并使之逐步扩大到把行动中的广大群众包括进来的实际可能性。它也开始消灭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借助于为此目的而精心策划的行动，法西斯主义已经达到了这两个目的。当它面对大街上大规模的运动时，法西斯主义从不像反动国家在1919年和1920年那样采取行动。更确切些说，它等到工人阶级组织进入消极时期才行动起来，向它们进攻，把它们作为工人阶级组织予以打击，不是由于它们过去“做过”什么，而是由于它们过去“是”什么——换句话说，由于它们是能够向群众提供一种形式和特征的联系环节的源泉。工人斗争的力量和

能力大部分来自这些联系环节,尽管它们本身并不明显。这里包含了种种可能性,诸如举行集会,进行讨论,使这些集会和讨论能经常举行并通过它们选择领导人,为一种初步的有机结构,为一个联合会、为一个合作社或党支部打下基础。这里包括的是给予这些有机结构一种连续的功能,使它们成为有组织运动的基本框架等等的可能性。法西斯主义则已在有计划地活动,以便破坏这些可能性。

因此,法西斯主义最有效的活动是在各地、在工人阶级组织大厦的底层、在各省、在农村中心、在车间和工厂进行的。解雇起破坏作用的工人、流放或暗杀工人和农民的“领导人”、禁止集会、不许下班后在户外逗留;还有给工人人们的任何“社会”活动制造的障碍,以及破坏劳动协会和所有其他工人阶级和农民组织联合的中心,在群众中散布恐怖气氛——所有这一切在剥夺宪法从文字上保证给予工人阶级的“权利”方面,要比政治斗争的意义大得多。这类行动进行了3年以后,工人阶级丧失了所有的形式和建制;他们已变成四分五裂的、涣散的群众。宪法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国家的政治条件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变得非常软弱无力了。

当工人阶级处于这种条件的时候,政治局势却是“民主的”,事实上,在这种条件下,所谓自由资产阶级集团,毫不担心国家和社会的内聚力会受到毁灭性的影响而能够:1. 把他们的责任同法西斯主义的责任区别开来,他们武装了法西斯主义,并鼓励和煽动它去同工人进行斗争;2. 恢复“法律的统治”,即不否认工人组织有可能存在的情况。他们能够做这两件事中的第一件事,因为分散的和无组织的工人没有任何可能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去,直到足以把这种矛盾转化为社会的总危机,即革命的序幕。他们能做到第二件事,因为法西斯主义破坏了30年组织工作

的成果，从而为此创造了条件。资产阶级只有在确信工人们除了恢复初步的组织工作外不再能利用组织的自由时，才勉强承认工人有组织的自由，同时，他们希望这种初步的组织工作除非长期进行，将不会具有政治后果。

总之，“民主主义”感到甚至在只有形式上自由的条件下自己也抵挡不住工人阶级的压力时，它就组织了法西斯主义。由于搞垮了工人阶级，法西斯已经使“民主主义”恢复了存在的可能性。按资产阶级的意图，分工应该进行得十全十美，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交替使用应该有利于永远排除工人阶级恢复活动的任何可能性。但不仅是资产阶级这样看待问题，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改良主义者，最高纲领派，以及所有那些认为意大利工人当前的条件与30年前的条件（即1890年和这以前工人阶级运动在我们中间还正在起步时的条件）相类似的人，所有那些认为应该采取与当时相同的口号和相同的方式来恢复活动的人，因而还有那些如同当年看待激进的和保守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一样来看待“民主”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之间的冲突的人，以及所有那些现在还以工人运动开始时人们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来谈论“宪法自由”或“劳动自由”的人。

采取这种观点意味着毫不留情地把工人阶级固定在恶性循环之中，资产阶级是希望它禁锢其中的。如果听从改良主义者，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今天就别无指望，他们只能期待资产阶级会归还他们重新建立组织并使之存在下去的自由；让他们有重新建立工会、农民同盟、党支部、劳动协会，然后就是联合会、合作社、劳工介绍所、工人管理办公室、工厂内部限制老板自由的各种委员会等等的自由——直到被组织重新唤醒的群众以及组织本身要求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界限的压力变得非常强烈，竟使“民主主义”既无法抵抗它也无法容忍它，而要再次武装一支黑衫党党徒的军队去消

除这种威胁。

怎样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意味着解决革命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正是要在资产阶级政治危机发展的时候去把广大的工人群众重新组织起来，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让步，而是通过处于少数的革命者和他们周围人的主动精神。从法西斯政权进入危机的那天起，共产党除此之外没有给自己提出别的任务。这是一种狭义字面上的“组织”性质的任务还是“政治”任务呢？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有助于说明，只有在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它才能使实际状况的关系得到缓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组织”工人阶级就实际上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力量并促使它在政治舞台上进行干预：这是一种今天尚未受到重视的力量，就好象它已不再存在似的。组织与政治就是这样相互转换的。

共产党的工作得到进展依靠两种基本条件：1. 依靠这一事实，即在法西斯对工人阶级的破坏中，共产党作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分，作为革命的少数派的组织和广大群众性政党的干部的组织得以幸存下来。共产党人在党的最初几年所遵循的路线的价值即在于此，正如同政变后一年里纯技术性组织的活动的价值那样。2. 依靠这一事实，即从法西斯主义到民主主义的交替和从民主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交替并不是从其他经济和政治事实中抽象出来的过程，而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总危机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暴力关系的扩大和加剧同时发生的。因而这里存在着一种促使群众回到阶级斗争战场上来的强大的客观刺激因素。这两种条件对于其他所谓的工人政党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不仅在否定有觉悟的党组织的价值方面，而且在接受资产阶级关于在战争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加强的稳定性的理论方面，他们都是一致的。

但是，共产党的政治职能愈益明显而有效地展现出来并得以发展，因为实际上，只有它能号召建立起一种组织，这种组织同时超越了狭隘的政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限制，并实现了工人阶级在更大范围的团结，即实现了对政治斗争的准备，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将回到战场上自动地严阵以待，既反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也反对民主的和自由的资产阶级。这种组织是由“工农委员会”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准备的。

在意大利运动史上要发现与“工农委员会”类似的组织，就必须回溯到1919年和1920年的工厂委员会和由此而产生的运动。在工厂委员会中，阶级团结的问题以及它的推翻资产阶级秩序的革命活动的问题，都是同时考虑和同时解决的。工厂委员会实现了所有工人的组织上的团结，同时使阶级斗争加剧，以致无法避免最大的冲突。不仅关于合作的寓言和社会和平的空想，而且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获得资产阶级准许的组织发展，直到这种组织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并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容的这种愚蠢的无稽之谈，都在工厂委员会中得到了彻底的否定。工人阶级的团结是在革命领域中，自下而上地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而实现的。

一度由工厂委员会履行的革命职能，今天能够由工人和农民委员会贯彻到怎样的程度呢？《新秩序》在它存在的初期曾特别致力于发展有关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提纲，并促进这类有机体的自发的建立和发展，现在则正在把自己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放在共产党今天为之献身的这另一问题的基础上。无论在工厂委员会和工农委员会之间有着怎样相同和不同之点，这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在于努力引导广大群众的复苏运动以一种有机形式使它表现出来，并在其中找到我们要建立的事物新秩序的萌芽。只有在这种努力产生了结果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可憎的交替和

卑鄙的分工才能告终。

未署名

载于《新秩序》1924年11月1日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21—1926）》1978年英文版第2卷第267—272页

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①

这些评论最初是由“乌林斯比埃吉尔”在9月18日《国家季刊》杂志上发表一篇论南方问题的文章和编者在它前面加的滑稽可笑的按语引起来的。“乌林斯比埃吉尔”向他的读者介绍了吉多·道尔索最近出版的《南方革命》一书（皮埃罗·戈贝提出版社，都灵1925年版），并且提到了作者对我们党在南方问题上的立场所作的评价。《国家季刊》的编辑（自称是“完全熟悉南方问题全貌〔原文如此〕的一帮年轻人”）在按语中对赞扬共产党任何“功绩”的观点提出了集体抗议。果然不错：《国家季刊》一类的年轻人总是到处在报上发表偏激的见解和强烈的抗议而未遭到反驳。于是，这帮“年轻人”又说了下面这段话：“我们没有忘记都灵共产党人的迷人方案总是将大庄园分给农村无产阶级。这种方案同关于南方问题的任何正确的现实主义的远见是背道而驰的。”既然《国家季刊》“年轻”作者唯一“迷人”的东西是冒失、轻浮和浅薄，这里就有必要澄清事实。

“迷人方案”完全是捏造。《国家季刊》的“年轻人”胆敢如此放肆，唠叨不休，歪曲真相，确实低估了很有知识的读者。实际上，

^① 这是葛兰西1926年11月被捕后，在他罗马寓所发现的一篇未写完的论文。他认为历来解决南方问题的方法是把土地分配给小农，这是不现实的。农民问题在意大利既是南方问题，又是梵蒂冈问题，因此要使农民摆脱传统的影响，必须在农民中先发展革命分子，在农村中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还要取代资产阶级和教士对农民的知识领导，只有这样才能说服农民跟着党走，使他们具有同党一致的共同目标。——编者

1920年1月在《新秩序》第3期上有一段话已经概述了都灵共产党人的观点：

北方资产阶级征服了意大利南方和各个岛屿，使它们沦为受剥削的殖民地；北方无产阶级在摆脱资本主义奴役以后，将解放受北方银行和寄生性工业奴役的南方农民群众。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新生不应当寄托在生荒地或贫瘠地的分配上，而应寄托在同工业无产阶级的团结上。至于农民，也需要团结，并且“注意”保证土地所有权不从经济上再产生资本主义；保证意大利南方和这些岛屿不变成资本主义反革命军事基地。无产阶级通过实行工人对工业的监督，将使工业为农民生产农业机器、衣服鞋袜和电气照明设备，并且防止工业和银行剥削农民，不使他们沦为保险金库的奴隶。通过推翻工厂贵族、粉碎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机器和建立工人国家（它迫使资本家服从有效的劳动法），工人们将砸碎使农民禁锢在贫穷和失望之中的一切锁链。通过建立工人专政和接管工业和银行，无产阶级将运用国家官吏的巨大权力来支持农民反对地主、抗御天灾和克服贫穷的斗争。无产阶级将为农民提供贷款，成立合作社，保证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并且完成开垦和灌溉的公共工程。无产阶级要做这一切，因为增加农业生产对它有利；争取和保持同农民的团结对它有利；工业生产顺利进行符合它的利益，这将促进城市和乡村、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和睦友爱关系。

那段话是1920年1月写的。7年过去了，我们在政治上也增长了7岁。今天，某些概念可能会表述得更好一些。紧接在夺取国家权力之后的这个时期，是以纯粹的工人监督工业为特征的，可以而且应当同以后的各个时期有更明显的区别。但在这里要指出的重要问题是：都灵共产党人的基本概念不在于分配大庄园这个“迷人方案”，而是（更确切地说）北方工人和南方农民的政治联盟，将资产阶级从国家政权中驱逐出去。而且，正是都灵共产党人（虽然他们支持分配土地，服从两个阶级的团结行动）对机械地分配大庄园的“神奇”幻想提出过警告。我们在1月3日的同一篇文章中看到：“贫农占有生荒地或贫瘠地能获得什么呢？没有机器、劳动

场所，没有膳宿设备，没有信贷帮助农民渡过收割前的难关，没有合作社机构收购农产品（要是这个农民早在收获季节以前未在他这块生荒地的壮实灌木上，或者在野生无花果病树上上吊的话！）和帮他摆脱高利贷者的魔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贫农占有土地能获得什么呢？”

我们仍然赞成很现实的办法，决不同意给农民土地的“迷人”方案。但是，我们要使农民在工业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两个联盟阶级总的革命行动。《国家季刊》作者说这个“迷人方案”是都灵共产党人的发明，完全是捏造。这说明他们对新闻缺乏严肃态度，甚至缺乏农村药房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审慎态度（这也是重要的政治因素，它们会产生相应的后果）。

在无产阶级阵营中，都灵共产党人有一个无可否认的“功绩”：他们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南方问题，要工人先锋队注意，并且确定它是革命无产阶级全国政策基本问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实际上有助于阐明南方问题，使它摆脱模糊的和唯理智论者的所谓“最具体的”阶段，促使它进入一个新阶段。都灵和米兰的革命工人取代吉斯蒂诺·弗尔土纳托^①、加埃唐诺·萨耳韦米尼^②、欧

① 吉斯蒂诺·弗尔土纳托(1848—1932)，作家，讨论意大利南方问题的先驱者之一。1880年，当选众议员；他几次拒绝参加政府工作。他对社会问题有浓厚兴趣，尤其是南方问题。他认为南方问题既是地域和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他在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南方和意大利国家》(1911年)等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1932年7月23日，他在那不勒斯逝世。——编者

② 加埃唐诺·萨耳韦米尼(1873—1957)，意大利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和南方主义者。早年参加社会党，1911年因不满于社会党改良主义领导人不重视南方问题而脱离社会党，自办《团结》报鼓吹自己的主张。他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知名人士之一，1925年，他流亡国外；1934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并支持当时在波士顿反法西斯组织办的评论刊物《逆流》，为它撰写关于反法西斯的文章，并写了许多关于意大利中世纪的历史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意大利；1957年9月6日在索伦托逝世。——编者

仁尼奥·阿齐蒙蒂和阿尔托罗·拉布里奥拉^①之流(这里只提《国家季刊》“年轻人”敬爱的最初几个倡导人的名字)而变成了南方问题的拥护者。

都灵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当无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一个能动员劳动群众大多数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制度时,它能够成为实行领导和统治的阶级。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意大利现存的实际阶级关系中要成功地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但是,意大利的农民问题是由历史决定的;它不是“一般的农民和土地问题”。在意大利,由于特殊的传统和历史的特殊发展,农民问题有南方问题和教廷问题这两种典型的特殊形式。因此,争取农民群众大多数,从社会观点来看,对无产阶级就意味着把这两个问题都看作自己的问题,了解它们所提出的种种阶级要求,并将这些要求写入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时期的纲领,使它们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

都灵共产党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改变无产阶级本身的政治立场和一般思想,因为无产阶级在全部国家生活中是一种全国性要素,它不自觉地受到资产阶级的教育及其报纸和传统的影响。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宣传家在北方群众中想方设法传播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南方是锁链,它阻挠着意大利的社会发展,使它不能获得更快的进步;南方人从生物学上看,生来就注定是劣等人,

① 阿尔托罗·拉布里奥拉(1873—1959),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早期革命工团主义派的领袖。1913年,当选众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焦利蒂政府中一度担任劳动部长,参加改良主义统一社会党。他参加过反墨索里尼的亚文丁议会;1927年,他流亡法国;1937年,在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时,他回意大利,他赞成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但不参与法西斯的政治;1946年,他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并被任命为共和国参议员。1959年6月21日,他在那不勒斯逝世。——编者

半野蛮人或纯野蛮人；南方落后，错误不在资本主义制度或任何其他历史原因，而在于使南方人懒惰、低能、犯罪和野蛮的自然环境。只有偶然诞生的几个伟大的天才，象在干燥不毛的沙漠中长出的几棵孤零零的棕榈树那样，才缓和一下这种残酷的命运。社会党是在北方无产阶级中大量传播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社会党对形成所谓实证学派作家集团——费里^①、塞尔吉、尼塞福罗、奥兰诺^②及其少数追随者——的“南方主义”作品都加以赞美。这些作家采用论文、故事、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随感录和回忆录等多种形式反复宣扬单纯的克制思想。“科学”又一次被用来欺压不幸者和被剥削者，不过，这次它披上了社会主义外衣，自称为无产阶级科学。

都灵共产党人坚决反对这种思想。正是在都灵本地，许多退伍军人回忆和描写南方和各岛屿的“土匪”的作品对人民大众的传统和观点产生了最强大的影响。他们采用许多切实有效的形式坚决加以反对，取得了具有最伟大历史意义的具体成果。他们正是在都灵发现了将来解决南方问题的最初形式。

此外，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都灵发生的一个事件就可

① 恩里科·费里(1856—1929)，意大利社会党人。1884至1925年，在波洛尼亚、比萨、罗马的大学的大学中担任过刑法学教授；1884至1885年，由于替200名被拘捕的农民进行诉讼上的辩护而声名大振；1886年，当选众议员；1919年和1921年两度当选众议员；1903至1908年，主编《前进报》；1908年，他辞去编辑职务，去拉丁美洲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任政府刑法改革委员会主席；1921年，他主编的新刑法典问世；1926年，他投靠墨索里尼政权，为马特奥提事件辩护，谴责社会主义；1929年4月12日，他被任命为参议员不久，在罗马逝世。——编者

② 保罗·奥兰诺(1875—1945)，法西斯主义新闻记者和学者，1903年为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撰稿；1919年以后，他加入法西斯党；1921年和1924年，当选众议员；1924年和1925年任意大利法西斯党机关报《意大利人民报》编辑；后来曾任佩鲁贾大学新闻学教授和校长；1938年，他是反犹太人运动的主将；1939年，被任命为参议员；1945年，他在帕杜拉集中营逝世。——编者

能相当于共产党人在战后时期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和宣传。1914年，皮拉尔·盖伊逝世，都灵第四区空缺，当时提出了补选一个新候选人的问题。社会党支部的一个小组——其中包括后来《新秩序》杂志的几名编辑——想推选加埃唐诺·萨耳韦米尼。当时，萨耳韦米尼是南方农民群众最激进的发言人。他在社会党外确实正在发动一个强大的反对社会党的运动。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因为他的主张和指责在南方劳动群众中不但引起了对屠拉梯、特雷维斯和达拉贡纳等个人的敌视，而且引起了对整个工业无产阶级的敌视。（皇家卫队在1919、1920、1921和1922年枪击工人的许多子弹就是用排印萨耳韦米尼文章的铅字铸造的。）尽管这样，都灵小组还要提名萨耳韦米尼，曾由奥塔费奥·帕斯托里同志去佛罗伦萨争取他同意当候选人，并向他本人说明意义。

“都灵工人要为阿普利亚农民选一名代表。他们知道，莫尔费塔和比通托的农民绝大多数在1913年大选中都赞成萨耳韦米尼。但是焦利蒂政府施加行政压力，并且雇佣打手和使用警察暴力，使阿普利亚农民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都灵工人并不要求萨耳韦米尼作任何保证。既不要求他对社会党和纲领作出保证，也不要求他对社会党议会党团的纪律作出保证。一旦当选，萨耳韦米尼将对阿普利亚农民而不是对都灵工人负责，后者将按照他们自己的原则进行竞选宣传，决不受萨耳韦米尼政治活动的约束。”

萨耳韦米尼尽管对这个提议动心，甚至感动（在那些日子里还没有一个人说共产党“背信弃义”，因为它的态度诚恳而又真实），但是，他表示不同意。他提议应由墨索里尼当候选人，并且答应在选举运动中来都灵支持社会党。事实上他主持过两次盛大集会，一次是在劳动协会，另一次是在宪法广场。他在那里向广大听众讲话。他们将他看成南方农民的代表，热烈鼓掌欢迎，因为南方农民比北方无产阶级遭受了更可恨和更野蛮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

事件中可能采用的方法，当时由于只能取决于萨耳韦米尼，所以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它被共产党人在战后时期继承下来，并且加以应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最有意义和有代表性的事实。

1919年，“新撒丁”协会成立，这是后来成为撒丁行动党的前身。“新撒丁”的宗旨是将所有撒丁人（本岛和大陆的撒丁岛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能对政府施加有效压力的地区集团，要它保证履行大战期间对士兵许下的诺言。大陆的“新撒丁”组织者是一位教授，叫比埃特罗·纽尔拉，社会党党员，现在可能是“年轻人”集团的一个成员，每周在《国家季刊》杂志上提出一些新颖的见解来进行探讨。这个协会的参加者有律师、教员和公务员（他们的热情是由获得徽章、头衔和小奖章的每一个新机会引起的）。对于生活在皮埃蒙特的撒丁人来说，在都灵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名单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参加者的地位很低微，没有明显的资格。有的是非熟练工人，有的是领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有的在过去当过卡宾枪手、狱警和边防战士而现在做着各种小买卖。所有这些人想起他们会见乡亲和听到乡音的情景就非常激动。亲友的情谊，往事的回忆，痛苦和希望，千丝万缕，紧连着他们同家乡的关系。他们渴望回归故乡，但想回到一个更加富裕、兴旺的故乡，能够谋生活命，哪怕苦一点也愿意。

撒丁共产党人（准确地说，是8名党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向会议主席提出了自己的决议案，并且要求允许他们作一个副报告。但是，官方的报告词藻动人，象是各地小教堂中精雕细刻的维纳斯和丘比特；而那些参加争论的人在回顾过去的忧患和缅怀浴血战斗的撒丁团时则声泪俱下，热衷于宣扬撒丁全体健儿结成一个统一集团的思想，荒谬绝伦，狂热无比。在所有这一切以后，要顺利地“抛出”这个副报告是非常困难的。最乐观的估计是，即使不受私刑拷打，但在“群众义愤”的救助以后，至少也要到警察总署去走一

趣。可是，这个副报告尽管令人异常震惊，大家实际上都在聚精会神细听。话音一停，马上就得出了很鲜明的革命结论。你们来自撒丁的穷人究竟是赞成同这个岛上害得你们倾家荡产和充当本地资本剥削的监工的豪绅结成集团？还是赞成同大陆上想要消灭一切剥削形式和解放所有被压迫者的革命工人结成集团？两者必居其一。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面临着这个困难的抉择。大会通过分组表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边是一小撮衣冠楚楚的豪绅、戴大礼帽的官吏和有专门职业的人，他们又气又怕，脸色铁青，还有一队装束整齐的40多名警察。另一边全是穷人，其中有些妇女穿着赴宴的盛装，围聚在共产党人的小房间四周。一小时以后，在劳动协会里成立了“撒丁社会主义教育社”，共有256名会员。“新撒丁”的成立则无限延期，它实际上再也没有召开过成立大会。

这就是在萨萨里旅（几乎全是本地人组成）士兵中从事活动的政治基础。萨萨里旅曾参与镇压都灵1917年8月的起义运动。人们深信，这个旅永远不会对工人亲善，因为每一次镇压行动积下了深仇。群众方面的仇恨也会转向镇压他们的重要工具，士兵方面则怀念被起义者打死的士兵。这个旅受到一群贵妇和豪绅的欢迎。他们向士兵献花，送雪茄烟和水果。在第一批宣传文章中收入了萨萨里皮革工人写的一篇报道，它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士兵的心理状态：“我走近第10街区的一个营地（在最初几天，撒丁士兵在这些街区宿营，就象是在一个被占领的城市），同一个年轻农民谈话。由于我同他一样，是萨萨里人，他热情地欢迎我。‘你到都灵来干什么？’‘我们来镇压那些罢工的豪绅。’‘但那些罢工的不是豪绅，而是工人，他们是穷人。’‘这里的人都是绅士：穿硬领衬衫，打着领带，每天挣30里拉。穷人我熟悉，我知道他们怎样穿戴。真的，在萨萨里有许多穷人；我们种地人都是穷人，每天只挣一个半里拉。’‘但是我也是工人，同样是穷人。’‘你是穷人，因为你是撒丁人。’”

‘那么，如果我同别人一起参加罢工，你也向我开枪吗？’这个士兵想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说：‘喂，要是你同别人一起罢工，你就留在家里吧！’”

这就是这个旅的绝大多数士兵的态度。这个旅只有几个伊格莱西亚斯矿区的矿工。可是，几个月以后，在7月20—21日大罢工前夕，这个旅还是调离了都灵。老兵退役，部队分成三部分： $\frac{1}{3}$ 调到奥斯塔， $\frac{1}{3}$ 调到的里雅斯特，另外 $\frac{1}{3}$ 调到罗马。这个旅是在晚上开拔的，事先没有通知。在车站上没有穿漂亮衣服的人群欢送他们。他们唱歌，虽然仍唱战歌，但不再象他们到达时那样纵情高歌了。

这些事件没有结果吗？恰恰相反，已经有了成果，今天仍然存在人民群众心中并且在继续起作用。它们使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的头脑一下子明白过来，记忆犹新，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档案资料已经散佚，由于怕可能遭到逮捕和招来麻烦，我们自己也销毁了许多文件。但是我们能回想几十封，实际上是几百封从撒丁寄到都灵《前进报》编辑部的信件。信经常是集体写的，由萨萨里旅全体退伍军人在一个特定的村子里签名。我们坚持的政治观念通过各种不受控制和难于控制的渠道广泛地传播开去。撒丁行动党的成立从一开始就受了这种政治观念的强烈影响，关于这些具有丰富内容和重要意义的事件是不难回想起来的。这种活动有据可查的最后一次反响出现在1922年。当时，卡利阿里军团的300名卡宾枪手被派往都灵，抱着同萨萨里旅一样的目的。我们在《新秩序》编辑部收到了一份由大多数卡宾枪手签名的原则声明。它全面地响应了我们在南方问题上的立场，这是我们的主张正确的铁证。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自己应当采取这种对它具有政治效果的主张。如果群众自己对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和采取的办法不深信

无疑，就不可能有群众的行动。无产阶级为了使自已成为一个有能力实行统治的阶级，必须肃清所有残存在自己身上的行会主义的影响和工团主义的偏见与成见。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除了需要克服行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别以外，为了赢得农民和城市各行业中一些半无产阶级的信任和同意，甚至在行业排他主义消失以后，还必须克服仍能存在于工人阶级内部的某些偏见和战胜利己主义的某些表现形式。金属加工工人、细木工人和建筑工人等必须作为无产者，而不再作为金属加工工人、细木工人和建筑工人等进行思考；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再进一步。他们作为工人，必须作为阶级的成员进行思考。这个阶级的目标是领导农民和知识分子。只有在这些社会阶层的大多数支持它和跟它走的时候，它才能成为一个争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阶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领导阶级。而这些阶层（它们在意大利代表人口的大多数）仍然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能够使这个国家抵抗无产阶级的进攻，削弱它的力量。

关于南方问题的内容所发生的争论，说明无产阶级已经理解了这些任务。有两件事应该回想一下：一件发生在都灵；另一件发生在勒佐艾米利亚。后者是改良主义、行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保护主义的著名堡垒，“南方主义者”曾将它作为主要范例在南方农民中进行宣传。

在占领工厂以后，菲亚特董事会建议工人应当把公司当合作社来经营。当然，改良主义者是赞成的。工业危机正在逼近；失业的幽灵折磨着工人的家庭。如果菲亚特成为一个合作社，熟练工人，特别是那些确信自己会被解雇的政治上最积极的工人，他们的工作可能得到某种保证。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党支部有力地干预了这个问题，他们对工人说：

“一个象菲亚特这样的大公司，工人不能把它象一个合作社那

样来接管，除非他们决定加入今日统治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体制。菲亚特董事会的这项提议是焦利蒂政治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目的何在呢？资产阶级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不再能进行和平的统治了。1894年西西里农民暴动和1898年米兰起义是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决定性实验。在1890年至1900年血腥的10年以后，资产阶级被迫放弃那种过分排他、过分暴虐和直接的专政，因为南方农民和北方工人已同时举行反对它的起义，尽管还没有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

“在新的世纪中，统治阶级开始推行一种阶级联盟（阶级政治集团）的新政策，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它必须选择：要么实行一种农村民主，即同南方农民结成联盟，执行自由贸易、普选权、行政分权和廉价工业品的政策；要么组成资本家—工人的工业集团，没有普选权，设立海关关卡，保持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农民，特别是统治南方和这些岛屿上的农民的体现），而对工资和工会自由则采取改良主义的政策。它选择了后者，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焦利蒂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化身，社会党成了焦利蒂政策的工具。

“如果你们仔细观察，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中最严重的危机是发生在1900年至1910年的10年期间。群众自发地反抗改良主义领袖的政策。工团主义产生了：这是工人阶级表示反对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主张同农民，首先是同南方农民结成联盟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是本能的，初步的，原始的，但是是很健康的。准确地说，工团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代表南方农民领导无产阶级的一种软弱的尝试。谁构成意大利工团主义的领导核心？它的思想实质是什么？工团主义的领导核心几乎是清一色的南方人：拉布里奥拉、莱奥尼、龙戈巴尔迪和奥兰诺。工团主义的思想实质是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比传统的自由主义更有活力、

更有进取心和战斗性。如果你们仔细观察，工团主义的一系列危机和工团主义的领袖们逐渐走向资产阶级阵营是围绕着两个主题发生的。这两个主题是移民出境和自由贸易，它们同南方主义都有紧密联系。移民出境现象使恩里科·科拉迪尼^①产生了‘无产阶级民族’的思想；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看来，利比亚的战争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本家和富豪统治的世界进攻的开始。整个工团主义者集团转向民族主义。的确，民族主义政党本来就是由准工团主义知识分子（莫尼切利、福尔吉斯-达万扎蒂^②和马拉维利亚^③）组成的。拉布里奥拉写的《10年历史》（从1900到1910年的10年）一书是反对焦利蒂和主张南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最典型的特殊表现。

“在这10年中，资本主义得到了加强和发展，它的一部分活动进入了波河流域的农业。

“这10年的最大特征是波河流域农业工人的群众性罢工。在北方农民中发生了大动荡，出现了深刻的阶级分化（根据1911年人口

① 恩里科·科拉迪尼（1865—1931），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1910年，他是意大利民族主义联盟的创建人之一；1923年3月，该组织同法西斯党合并后，他成为众议员和制定国家计划的18人委员会的委员，后来被任命为参议员。1931年12月11日在佛罗伦萨逝世。——编者

② 罗贝尔托·福尔吉斯-达万扎蒂（1880—1936），法西斯主义政客和宣传家。1910年协助创建意大利民族主义联盟以前是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1907至1914年，任米兰《晚邮报》驻罗马记者；1911年以后，他是《国家思想报》编辑之一；1919年以后，他在促使“意大利民族主义联盟”同法西斯党结盟起了主要作用。1923年3月，两党合并后，他一度担任法西斯党书记之一；1933至1936年，他推出的一套无线电节目“政权大事录”，使他在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期赢得最有成果的宣传家之一的名声。——编者

③ 莫里齐奥·马拉维利亚（1878—1955），法西斯官员。他起先是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民族主义者。意大利民族主义联盟成立后，当选中央委员；1923年，该组织同法西斯党合并，他是公约的签署者之一。他担任过《国家思想报》社长和《论坛报》副社长。1939至1955年，他被任命为参议员。1955年，在罗马逝世。——编者

普查数字,农场工人〔无地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50%)。与此相适应,各种政治派别和精神观念都重新实行改造。基督教民主和墨索里尼主义是这个时期两个最明显的产物。罗马尼亚是这两种新活动的地区性熔炉;农场工人似乎成了社会上政治斗争的主角。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机关报(如在切泽纳出版的《行动报》)和墨索里尼主义很快就受到‘南方主义者’的控制。切泽纳的《行动报》是加埃唐诺·萨耳韦米尼的《团结》报的地方版。墨索里尼主编的《前进报》缓慢地但无疑地变成了工团主义和南方主义作者的讲坛。象范切洛、兰齐洛^①、潘南乔^②和契科提这些人则成了该报经常的撰稿人。萨耳韦米尼本人并不隐讳他对墨索里尼的同情,后者还成了普雷佐里尼《呼声》报的宠儿。大家记得,当墨索里尼离开《前进报》和社会党时,这帮工团主义者和南方主义者实际上团结在他周围。

“在革命阵营中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反应是1914年6月的‘红色周’:罗马尼亚和马尔凯两地是‘红色周’的震源。而在资产阶级政治领域,最值得注意的反应则是金蒂洛尼协定^③。社会党由于波河流域农村运动的缘故,在1910年以后已恢复不妥协的策

① 阿戈斯蒂洛·兰齐洛(1886—1952),法西斯主义时事评论家。1918至1922年法西斯主义形成时期,他分析大战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和需要新的政治形式,颇有号召力。他担任过法西斯最高权力机构18人委员会委员,但他主要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发表较开放性的多元合作主义的理论。1952年3月13日,他在米兰逝世。——编者

② 塞尔吉奥·潘南乔(1886—1944),法西斯主义理论家。1927年,担任罗马大学政治系教授、法西斯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对于法西斯理论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他的主要理论是关于极权主义、民粹主义、分散行政权等概念。他的理论不同于艾尔弗雷多·罗柯关于法西斯合作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和采用强制手段的观点。1944年10月8日,他在罗马逝世。——编者

③ 1913年,焦利蒂同金蒂洛尼伯爵(“天主教选举联盟”的主席)缔结了金蒂洛尼协定,规定在那年大选中,天主教的选票支持政府的候选人,以制止社会党人的进展。

略。由焦利蒂支持和代表的工业集团已经失去了号召力。焦利蒂改弦易辙，用资产阶级同天主教的联盟来代替资产阶级同工人的联盟，因为天主教代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农民群众。作为这个联盟的结局，索尼诺的保守党完全垮台了，只在南意大利剩下一个追随安东尼奥·萨朗德腊的小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在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一系列最重要的演变过程。萨朗德腊和尼提是政府中最早的两个南方领袖（当然，暂且不提克里斯比^①这种西西里人，他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专政最有力的代表）。他们企图实现工业资产阶级—南方地主的计划。萨朗德腊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而尼提则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政府中的这两个领袖都受到《晚邮报》即受到伦巴第纺织工业的有力支持。）萨朗德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试图用国家组织的技术力量来支持南方，即用体现资产阶级新政治方针的新人员来代替焦利蒂国家的全体人员。你们记得《新闻报》发起（特别是在1917—1918年）焦利蒂分子和社会党人紧密合作防止国家‘阿普利亚化’的运动。《新闻报》进行的这个运动是由弗朗切斯科·契科提领导的，它实际上表明焦利蒂同改良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协议。这不是一个小问题。焦利蒂分子在他们的顽抗中竟超过了大资产阶级对一个政党所允许的限度，甚至举行反对爱国主义和失败主义的示威运动，这是大家记忆犹新的。

“今天，焦利蒂再一次执政，大资产阶级再一次对他表示信任，这是由于它在人民群众的激烈运动面前惊慌失措的结果。焦利蒂

^① 弗朗切斯科·克里斯比（1819—1901），19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1837年毕业于巴勒莫大学法律系；1861年，他当选众议员；1876年，当选众议院议长；他两度组阁，第一次是1887至1891年，第二次是1893至1896年。他在执政期间提出不少改革措施，如扩大普选，改革公共保健，整顿监狱和警察局，实行较大的城镇由当地民众选举市长和镇长，组织大量慈善机关等。1901年8月12日，他在那不勒斯逝世。——编者

要制服都灵工人。他在劳工总同盟，即在社团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支持下打败过他们两次：一次是在去年4月罢工的时候，另一次是在占领工厂期间。他现在认为他能将都灵工人束缚在资产阶级国家体制内。如果菲亚特公司的技术工人接受董事会的提议，实际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目前的工业股票会变成债券。换句话说，不管证券交易额怎样，合作社必须按规定的债息付给债券持有人。菲亚特公司将被割断同仍由资产阶级掌握的信贷机构的各种联系，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趣只是由它任意摆布工人。技术工人将不得不受国家的约束，因为它将通过工人阶级代表的活动，即通过工人阶级政党对政府各项政策的服从来“帮助工人”。这就是焦利蒂全力实施的计划。都灵无产阶级将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只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附属品存在下去。社团主义将取得胜利，而无产阶级将失去作为领导者和指导者的地位和作用。它将作为特权者出现在穷苦工人群众面前。它将作为象资产阶级一样的剥削者出现在农民面前，因为资产阶级（照它一贯的所作所为）将对农民群众把工人阶级的特权核心描述为他们不幸和穷困的唯一原因。”

菲亚特公司的技术工人几乎一致接受了我们的观点，拒绝了董事会的提议。但是光有这种实验是不够的。都灵无产阶级在自己一系列行动中表明，它的政治成熟程度和能力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工厂中的技术人员和白领工人在1919年能改善自己的条件，只是由于有工人支持他们。厂主为了抑制技术人员的战斗性，建议工人应当由自己通过选举来确定班组和车间的新领工。工人拒绝了这项建议，尽管他们同作为老板经常镇压和迫害工人的工具的技术人员有许多分歧。当时报界正在进行一个狂热的孤立技术人员的运动，突出他们每月高达7000里拉的高工资。技术工人也支持壮工的鼓动。正因如此，后者实现了他们的要求。在工厂

内部取消了技术程度较高工种的工人对技术程度较低工种的工人的一切特权和剥削形式。无产阶级先锋队通过这些活动赢得了作为社会先锋队的地位。这就是共产党在都灵获得发展的基础。但在都灵以外呢？我们特别想了解都灵以外的问题，确切地说，是想了解勒佐艾米利亚，那里是改良主义和社团主义最集中的地方。

勒佐艾米利亚经常是“南方主义者”的目标。卡米洛·普拉姆波利尼^①有一句话：“意大利是由北方佬和南方脏人组成的”。这可以看成是在南方人中散布极端仇恨北方工人的思想的露骨表现。在勒佐艾米利亚产生了一个象菲亚特公司一样的问题：一个大工厂作为合作企业转入工人手中。勒佐改良主义者非常热衷于这个方案，并在他们的报刊上和会议上大事吹嘘。一个都灵共产党人^②到了勒佐，在一个工厂会议上发言，将北方和南方之间的问题作了全面归纳，因而出现了“奇迹”：绝大多数工人反对改良主义的共同立场。这说明改良主义者并不代表勒佐工人的意志，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的消极情绪和其他反面观点。他们由于在自己的队伍中明显地集中了具有某种专业才能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成功地确立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从而阻碍了发展和组织革命潮流的工作。但是，有了能干的革命者，就足以挫败他们，表明勒佐工人是勇敢的战士，而不是政府豢养的猪猡。

1921年4月，5000革命工人被菲亚特公司暂时解雇，工人委员会被取消，实际工资减少。勒佐的情况可能也大致相同。换句话说，工人被击败了。但是，他们作出的牺牲毫无价值吗？我们不这样认为。其实，我们肯定它决不会毫无价值，尽管很难列举许多大

① 卡米洛·普拉姆波利尼(1859—1930)，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之一，曾任该党机关报《正义》报主编，一直到1925年该报被查封为止。——编者

② 指乌姆贝尔托·特拉契尼。

的群众事件来证明这些行动有立杆见影的效果。无论如何，就农民而论，这种例证通常是难找的，几乎就不可能找到。至于南方农民，那就更难了。

南方，可以说是一个发生社会分化的地方。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本身没有内聚力（当然，也有例外，如阿普利亚、撒丁岛、西西里岛，就是一副具有南方结构特征的大油画）。南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农业集团，由3个社会阶层构成：一盘散沙的广大农民群众；农村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地主和大知识分子。南方农民处在长期的骚乱中。但是，他们不能作为一个整体集中表达自己的意向和要求。中层知识分子是从农民地区吸收推动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的力量。归根到底，政治领域的大地主和思想领域的大知识分子成了支配全部复杂现象的中心。当然，正是在思想领域，集中制最有效和最明确。因此，吉斯蒂诺·弗尔土纳托和贝奈戴托·柯罗齐是南方制度的两名卫道士，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意大利反动派的两个主要人物。

南方知识分子在意大利国民生活中是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社会阶层之一。人们只要想到国家官吏的^{3/5}强是南方人，就会对此深信不疑。现在，为了了解南方知识分子的特殊心理状态，必须记住某些真实材料。

1.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式知识分子在主要以农民和手工艺工人为基础的社会里是组织因素。为了组织国家，组织贸易，统治阶级培养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分子。工业需要的是新型知识分子：技术组织者和实用科学专家。在经济力量已经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并且达到了囊括大部分国民活动的程度的社会里，第二类知识分子占了优势，他们具有遵守秩序和知识修养的一切特征。另一方面，在农业还起相当作用，甚至占优势的国家里，老式知识分子仍占统治地位，他

们向国家提供大批工作人员。在地方上，乡村和农村小镇也是这样，他们在农民和行政机关之间通常是起着调剂的作用。在意大利南部，这类知识分子也占支配地位，显出了他们的一切特征。他们在农民面前是民主派。摇身一变，就成了逢迎大地主和政府的反动派，玩弄政治，贪污腐化，老奸巨滑。人们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阶层的特征，就不能了解南方各政党的传统特色。

2. 南方的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在南方仍很重要的农业资产阶级阶层。换句话说，中小地主不是农民，他们不种地，以当农民为耻。但是，他们想从自己占有的一小块土地上——通过出租或对分制——榨取钱财来过体面的生活，送儿子上大学或神学院，并为女儿筹办嫁妆，因为她们要嫁给国家的军官或文职官员。出身于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生来就极端鄙视劳动农民，把他们看成劳动机器，榨干以后就用过剩的劳动力取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还承袭了一种祖传的本能感觉：对农民及其破坏性的暴力行为怕得发狂。因此，他们极端伪善，对欺骗和摆布农民群众的权术非常精通。

3. 教士属于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集团，因此，必须注意整个南方教士同北方教士的区别。北方神父一般是手艺人或农民的儿子，有平民的同情感，同农民群众有更多的联系。他在道德上比南方神父更正确，后者经常半明半暗同女人姘居。因此，从社会观点来看，他起着更完满的精神作用，因为他在指导家庭的全部活动。北方教会同国家分离，教会财产被没收的情况比南方更严重，因为那里的教区和修道院拥有或者重新积聚了大量的不动产和动产。南方农民眼中的神父是：1. 土地行政官，农民在地租问题上同他发生冲突；2. 高利贷者，他索取最高的利息并且运用宗教手段来确保收租或取息；3. 一种凡欲（女人和金钱）俱全的人，因此，从宗教观点来看，无人相信他能秉公处事。忏悔只能起最小的指导作用。可见，南方农民不是神父的农民，虽然从不信异教的意义上说，他

们常常是很迷信的。总之，这一切说明为什么人民党（除了西西里岛某些地区以外）在南方没有多大地位或者控制任何系统的机构和群众组织。“神父是圣坛上的神父，他在外面同任何凡人一模一样”，这种流行的俗语概述了农民对神父的态度。

大地主束缚南方农民是通过知识分子实现的。农民运动甚至在形式意义上（即能选出农民出身的农民干部，能记述和积累运动内部分化和进展的资料），只要不采取独立自主的群众组织形式，就总是以在国家的普通联系机构——公社、省、国民议会——中得到一个席位而告终。这个过程是通过各个地方党派的组成和分裂而实现的，而这些党派的全体成员都是受大地主及其代理人萨朗德腊、奥兰多和迪契萨罗之流操纵的知识分子。

这次大战看来造成了退伍军人运动，把一种新因素引入了这类组织。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官吏在这类组织中形成了一个更紧密团结的、在某种程度上同大地主对抗的互助集团。它存在的时间不长，阿门多拉设想的“全国工会”只是它的最后的残余。它由于反对过法西斯主义，所以还能有点象幻影似地存在下来。可是，在南方缺乏民主知识分子有形组织的任何传统，甚至连这种集团也必须加以强调和注意。因为，它在整个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可能由涓涓细流而变成浊浪滚滚的急流。

撒丁是退伍军人运动显出更鲜明的形象的唯一地区，它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更健全的社会机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撒丁，大地主阶级的人数很少，不起作用，他们没有大陆南方的古代文化传统和行政管理传统。农民和牧民从下层施加的压力，不会遇到更高的大地主社会阶层的拼命反抗。充当领导的知识分子现在感觉到这种压力的全部分量，于是采取比“全国工会”更有力的进一步措施。

西西里岛的形势有异常的特征，它同撒丁和南方都不一样。那

里的大地主比大陆南方的要坚强和果断得多。此外，那里的工业和商业有一定的发展（西西里岛是整个南方最富饶的地区，也是意大利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上层阶级非常敏锐地感到自己在国家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且使人们感觉到它的势力。西西里岛和皮埃蒙特是从1870年以来起过卓越作用的两个地区。西西里岛的人民群众比南方的进步，但是，他们的进步采取了一种典型的西西里方式。那里存在着群众性的西西里的社会主义，它继承了西西里特有的全部传统，并有所发展。在1922年国民议会的52名代表中，差不多有20名是从该岛选出来的。

我们已经说过，大地主束缚南方农民是通过知识分子实现的。这种类型的团体在大陆南方和西西里岛分布最广。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农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它所起的作用是作为北方资本主义和大银行的中间人和监督者。它的唯一目的是保持现状。它没有知识分子头面人物，没有纲领，没有改良和进步的动力。如果说，有人提出过一种什么主张或纲领，它们也是起源于南方以外的地方，是出自保守的农业政治家（特别是在托斯卡纳），而他们在议会中是同南方农业集团的保守派勾结一起的。不多的几个明智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中包括索尼诺和弗兰凯蒂，将南方问题作为全国性问题的提出来，并且拟订了一个解决它的国家计划。

索尼诺和弗兰凯蒂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强调要在南意大利造成一个经济上独立和发挥“舆论”作用（当时的说法）的中间阶层。它一方面要限制地主的残酷和横行霸道的行为，另一方面要缓和贫农的暴动主义。索尼诺和弗兰凯蒂对南方流行第一国际时期的巴枯宁主义的思想怕得要死。这种恐惧使他们犯了许多往往是荒唐的错误。例如，在他们出版的一本书中，曾举出卡拉布里亚一个村子里的一家普通酒店或餐馆^①（我凭记忆引用），招牌叫做

^① 意大利文是trattoria。

“罢工者”(Scioperanti),用这件事来证明国际主义的思想流传很广,根深蒂固。如果真是这样(作者是正直的知识分子,事情一定是真的),人们只要回想一下在南方有无数阿尔巴尼亚侨民,skip-etari (阿尔巴尼亚语)一词已被多种方言歪曲,说得希奇古怪,(例如,威尼斯共和国的某些文件把“S'ciopetà”^①说成军事队形),这件事就能作出更明确的解释。事实上,不是巴枯宁理论在南方流传很广,而是那里的局势可能为巴枯宁提供了他的理论。显然,穷苦的南方农民在巴枯宁的大脑中构思“彻底破坏”论以前,早就在考虑发动一次“大叛乱”了。

索尼诺和弗兰凯蒂甚至从来没有着手实行过他们的政府计划,而且也无法实行。由于北方和南方在国民经济和国家组织中的这种关系,几乎不可能产生一个经济性的广泛的中等阶级(指产生一个广泛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现行的财政和关税制度,使拥有股份的资本家不愿将他们的利润变成当地的新资本。因为他们不是当地人,从而使当地不能实现任何资本积累和储蓄积累。在20世纪向国外大规模移民和从美国寄回第一笔巨额外汇的时候,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洋洋得意地高呼:索尼诺的梦想要实现了!南方在进行一场悄悄的革命。它将逐渐稳妥地改变国家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但是国家进行了干预,这场悄悄的革命刚刚开始就被扼杀了。政府发行了一种保证付息的公债。于是,侨民及其家庭从悄悄革命的代理人变成了为国家资助北方寄生工业提供财政手段的代理人。民主界人士的弗朗切斯科·尼提形式上处在南方农业集团之外,看起来是索尼诺纲领的有力实现者;但事实上他是北方资本主义迅速取得南方最后一笔储金的最优秀的代理人。贴现银行^②吸收的千百万里拉几乎全部来自南方,因为意大利贴

^① 阿尔巴尼亚文 S'ciopetà的原意是“协同攻击”。

^② 意大利文是 Banca di sconto。

现银行的40万债权人绝大多数是南方储户。

除了农业集团以外，在南方还有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在进行活动。它实际上一直在弥补农业集团发生的裂痕，以免变得太危险，从而引起大分裂。吉斯蒂诺·弗尔土纳托和贝奈戴托·柯罗齐是这个知识分子集团的代表人物，因此他们可以算是全半岛最活跃的反动分子。

我们已经说过，南意大利正在发生社会大分化。这种说法不仅对农民适用，对知识分子也适用。在南方，少数人或一些大知识分子集团除了拥有巨额财产以外，还掌握着积累起来的大量文化知识，但是，那里却不存在任何中等文化团体。这种情况过去存在，并且还将继续存在，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南方有拉特尔泽出版社和一种《批判》杂志，还有几所专科院校和若干学者文化团体，但是没有中小型的杂志。南方中等知识分子集团也不可能在各地组织各种出版社。那些试图离开农业集团和用激进方式提出南方问题的南方人——在各地聚集起来——受到了在南方外地出版的许多评论刊物的欢迎。的确，人们可以说，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中等知识分子在本世纪所表现的一切文化上的首创精神都具有南方主义特征，因为南方知识分子的各种报刊，如佛罗伦萨知识分子集团的《呼声》和《团结》等报刊、基督教民主党人在切泽纳创办的《行动报》、由博雷利出版并由艾米利亚和米兰的青年自由主义者在波洛尼亚创办的《祖国》或在米兰创办的《行动报》、最后还有戈贝提^①主办的《自由主义革命》，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① 皮埃罗·戈贝提(1901—1926)，意大利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反法西斯主义者。他曾为葛兰西办的《新秩序》写文学批评。他受葛兰西的思想影响，持坚定反法西斯主义立场。马特奥提事件后，戈贝提要求墨索里尼辞职，并支持亚文丁派，于是戈贝提成了法西斯党徒的攻击目标，1925年9月，他遭到法西斯党徒野蛮殴打，1926年2月15日在巴黎医治无效逝世。——编者

具有首创精神的最高的政治文化统治者是吉斯蒂诺·弗尔土纳托和贝奈戴托·柯罗齐。他们比固执的农业集团看得更广，主张南方问题的提出，不能超越某种限度，不能变成革命问题。一些文化知识最高的人是在南方传统领域中出现的，但是他们同欧洲文化，从而同世界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们才华出众，足以满足南方知识青年最真诚的代表的知识需要，安抚他们反抗现状的强烈冲动；指导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沿着一条传统平静的中间道路前进。所谓新基督教徒或喀尔文派教徒不懂得，由于现代文化条件而不可能进行任何群众性的宗教改革，在意大利历史上唯一可能的一次改革是由于贝奈戴托·柯罗齐哲学而发生的。思想的方向和方法已经发生变化，一个新的世界观已经形成，它超越了天主教和其他任何一种神秘的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奈戴托·柯罗齐履行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民族”职能。他使南方激进的知识分子离开农民群众，不得不接受民族的和欧洲的文化；并且通过这种文化使民族资产阶级，因而使农业集团同他们联合起来。

《新秩序》和都灵共产党人，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同我们上面提到的知识形成有关系，因而也受到吉斯蒂诺·弗尔土纳托或贝奈戴托·柯罗齐的知识的影响，可是，他们同时标志着同传统的彻底决裂和新发展的开始，这一发展已经取得成果，并将继续取得成果。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提出城市无产阶级是现代意大利历史的领导者，也就提出了南方问题。他们在无产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某些阶层之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因而能够改变（即使不是全部改变，至少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它们的精神面貌。

如果仔细考虑一下，皮埃罗·戈贝提算是一位主要人物。戈贝提不是共产党人，他也许永远不会成为共产党人。但是他已经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决不会再从这方面进行抽象的思考。我们在同戈贝提一起办报的工作中，曾使他接触一个他

过去只从书本公式中才了解的现存世界。他的最显著特征是非常理智和忠实，没有任何虚夸和庸俗的习气。因此，他深信用一套传统方法来观察和思考无产阶级，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

同无产阶级世界进行这些接触对戈贝提产生了什么结果呢？这些接触是我们不愿讨论或发挥的一种观念的源泉和促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观念同工团主义和知识分子工团主义者的思想方法有关。自由主义原则在这个观念中由个别现象被说成大量现象，个别人一生的美德和威望变成了阶级的品质，被设想为近似集体的个人特征。这种概念往往使同意它的知识分子光好想入非非，评头论足；使他们好象比赛中的裁判员或主持奖惩的裁决者，陷入令人讨厌的愚蠢境地。事实上，戈贝提避免了这种命运。他表现为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文化组织者。他在上一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工人一定不要忽视或者估计不足。他挖了一条堑壕，使那些在1919年、1920年和1921年认为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会胜过资产阶级的正直诚挚的知识分子集团没有从那里退却。

人们到处都说：戈贝提是一个伪装的共产党人，即使不是共产党党员，至少也是《新秩序》共产党人集团的代理人，在这样说的人当中，有些人诚实可靠，有些人则非常狡诈，不能相信。这种笨拙的谣言甚至不屑一驳。戈贝提这个人物和以他为代表的运动是意大利新的历史潮流自发的产物。它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在于此。党内同志有时指责我们没有对《自由主义革命》这种思潮进行斗争。的确，这种无冲突的状态似乎证明在我们同戈贝提之间存在一种马基雅维利式（正如人们经常说的）的有机关系。我们不能反对戈贝提，因为，他发展和代表了一种运动，至少就其主要原则来说，它不应当受到反对。

不懂这一点，就是不懂知识分子问题及其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戈贝提为我们起着联系人的作用：1. 联系在资

本主义各技术领域产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1919年至1920年采取左的立场，拥护无产阶级专政；2. 联系许多南方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更复杂的联系，将北方无产阶级引入南方问题（吉多·道尔索是这些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从而提出了内涵与传统领域不同的南方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自由主义革命》运动呢？也许由于它不是由彻底接受我们的纲领和思想的纯粹共产党人组成的？对他们不能这样要求，因为如果这样做，在政治上和历史上就是荒谬的。

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本性和所起的历史作用，发展很慢，比其他任何社会集团慢得多。他们代表民族的整个文化传统，力求重新综述整个民族历史的一切成就。特别是对出身于农民阶层的老式知识分子更可以这样说。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可能全体同整个过去决裂而使自己完全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意识范畴，那是荒谬的。这对大批知识分子来讲是荒谬的，也许对很多知识分子个人来讲也是荒谬的，尽管他们在作出或者想要作出一切令人敬佩的努力。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大批知识分子，而不是个别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某些知识分子个别地接受它的纲领和思想，同无产阶级融为一体，自觉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非常重要，很有益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组织方面现在很软弱。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只能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非常缓慢而艰苦地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在大批知识分子中发生分裂，发生一种具有历史特征的组织上的分裂，同样是很重要和很有益的。因为要建立一个左倾的群众机构，照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来说，就是建立一个倾向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机构。

无产阶级同农民群众的联盟需要这个机构。无产阶级同南方农民群众的联盟更需要这个机构。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不断地使大批贫农群众加入这种独立的自治机构，就能消灭南方的农业

集团。但是，它在完成这个必要任务时取得成就的大小，还要取决于它摧毁这个善于灵活而又顽强抵抗的知识分子集团的能力，即取决于它摧毁这个农业集团武器库的能力。无产阶级的这项任务在皮埃罗·戈贝提的帮助下已经接近完成。同时，我们认为，死者的朋友即使没有他的领导，也将继续他所从事的工作。这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但很值得南方和北方的知识分子（出人意外，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多）作出各种牺牲（甚至象戈贝提那样牺牲生命），因为他们已经懂得，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全国需要的和代表将来的两种社会力量。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21—1926）》1978年英文版第2卷第441—462页

文 件

意大利的形势和意共的任务

（《里昂提纲》）

——葛兰西；陶里亚蒂

1. 把汇集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些共产党改造成为布尔什维克党，这在目前阶段可以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根本任务。这个任务必须联系到国际工人运动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要联系到国际工人运动中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同那些代表着背离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原则和实践的潮流之间的斗争。

在意大利，只要我们牢记工人运动产生以来的历次盛衰，以及从中暴露出来的根本缺点，那么，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就能在各方面充分体现出来。

2. 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诞生形式各不相同，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自发起义则是所有地方的共有形式。可是，这种起义在每个国家都采取它特有的形式，这是来源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成员所具有的特殊民族特征的一种反映和结果，这些成员形成工业无产阶级的主干。

马克思主义代表自觉的科学因素，它比民族性质和民族血统的种种倾向的排他性要优越；而且，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领域和组织领域对这些倾向进行了斗争。第一国际的整个形成过程是以这个斗争为转移的，它以巴枯宁主义被驱除出共产国际而告结束。当第一国际解散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取得了胜利。实际上，第二国际是由那些统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在所有主要

问题上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它们的策略基础的政党组成的。

马克思主义胜利以后，被它战胜的民族性质的种种倾向力图采取别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们以修正主义的一些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重新出现。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对这个过程起了促进作用。下面3个事实同这种现象是紧密联系的：在工人阶级运动的队伍中对国家的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主要成分）已经销声匿迹，而由民主主义的乌托邦取而代之；一个工人贵族的形成；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重新大规模地转入工人阶级里来，因而民族性质的种种思潮在无产阶级内部得到了新的传播，同马克思主义起了冲突。第二国际的衰落过程因此采取了在马克思主义本身展开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的方式。它以世界大战引起的崩溃而告终。

幸免于衰退的唯一政党是布尔什维克党，它在本国成功地保持了自己领导工人运动的地位，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倾向从自己的队伍中排除出去，并通过了3次革命的经验发展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布尔什维克党所处的建立和领导第三国际的地位是历史决定的，而且为各国党改造成布尔什维克党的问题规定了条件：这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召唤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实践上来，克服和完全肃清每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的问题。

3. 意大利工人运动的起源和变迁是这样的：在世界大战以前从来没有组成过一个永久的和具有持续性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潮流。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的最早特征是很混乱的。在运动的内部集中了种种倾向，从马志尼的唯心主义到合作社信徒和互助论的支持者的一般的人道主义；到巴枯宁主义，巴枯宁认为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在意大利也存在着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工

业制度起源晚，也薄弱，这就意味着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存在所提供的净化因素消失了。一个后果就是，在延迟 20 年之后（1892 年热那亚代表大会）甚至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从社会党人中分裂出去的事情。

从热那亚代表大会出现的意大利社会党有两个主要流派。一方面有一个至多是代表倾向于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集团；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唤起和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使之为建设民主制度服务，别无其他目标（屠拉梯、比索拉蒂等）。另一方面有一个比较直接同无产阶级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集团，它代表一种工人阶级的倾向，但缺乏任何足够的理论意识（拉查理^①）。一直到 1900 年，党只给自己规定了一些民主性质的目标。1900 年以后，一旦赢得了结社自由并开始了民主阶段，组成这个党的所有集团就暴露了它们没有能力足以使这个党具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征。

的确，这些知识分子愈来愈脱离工人阶级了，而且，知识分子的另一阶层和小资产阶级想要以工团主义的形式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左派的企图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作为对后一企图的反应，党被统一派征服了。这种空洞的调和主义的废话是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根本特点的表现，工业制度的弱点和无产阶级的批判意识的不足，也说明了这一点。世界大战前这几年的革命论原封不动地保持了这种特点，从来没有设法超越一般的民粹主义的框框，或者去建设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应用阶级斗争的方法。

① 康斯坦丁诺·拉查理（1857—1927），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1882 年参加创建意大利工人党；1892 年是意大利社会党创建人之一；同年起为该党中央委员；1912 至 1919 年，任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1919 年，当选众议员；1923 年，他领导社会党把改良主义者开除出党；1926 年，他在议会遭到法西斯暴徒殴打受伤；1927 年，他被捕入狱数月，出狱后由于贫病交迫，于 1927 年 12 月 29 日在罗马逝世。——编者

甚至在世界大战以前,在这一革命潮流内部,一个“极左的”集团开始自行分离出来;这个集团拥护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提纲,但态度忽冷忽热,没有设法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真正的影响。

这说明社会党在反对世界大战时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性和暧昧性;也说明在大战以后,社会党是怎样发觉自己面临着一个直接革命的形势,但它既没有解决甚至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所必须解决的任何一个根本问题:首先是“阶级的抉择”问题和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其次是党的纲领和意识形态问题;最后是战略和策略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本来可以把那些反对国家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的力量集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从而可以导致夺取政权。

只是在大战以后,意大利才开始有系统地积累可以有助于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只是随着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才打下了无产阶级组织阶级政党的基础,这个政党如果要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充分发挥它的职能的话,就必须肃清一切作为工人阶级运动传统特征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

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

4. 资本主义是意大利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因素,也是决定其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基本事实意味着意大利的革命不可能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能够完成一个真正的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唯一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我们国家的力量将有充分的自由和发展的可能,那么,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把必需的经济和政治性质的改变转化为行动。工人阶级在完成这项革命职能时所采取的方式同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以及同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都有关系。

5. 在意大利，作为资本主义主要部分的工业制度是非常虚弱的。由于地理位置和缺乏原料，它的发展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因此，它没有能够吸引意大利的大多数居民（400万产业工人同350万农业工人以及400万农民一起生活着）。与工业抗衡的是必然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可是，极其相异的地域条件，以及随之而来的耕作和租佃制度上的差别，引起了农业阶层的高度分化，贫苦阶层十分普遍，这个阶层比较接近无产阶级的状况，比较容易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接受它的领导。在工业和农业阶级之间存在着相当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非常重要，它主要由手工业工人、专门家和国家雇员组成。

6. 资本主义的固有弱点迫使工业阶级采取权宜之计以保证它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这些权宜之计基本上无非是一部分实业家同一部分农业阶级，特别是大地主之间的一种经济妥协的制度。因此，人们在这里找不到实业家同地主之间的传统的经济斗争，也找不到这种斗争在别的国家所产生的统治集团的轮流坐庄。不管怎样，实业家不需要一种保证劳动力从农村源源不断地流向工厂的经济政策，以提防地主的作梗，因为，这种劳力流动是由意大利特有的众多的贫苦农村人口来保证的。工业—农业协议以某些特权集团间的利益休戚相关为基础，它损害生产和大多数劳动者的总利益。协议使得大实业家手中积累了财富，这是有计划地掠夺各行各业居民和全国所有地区的结果。这种经济政策的结果实际是这样：在经济预算中造成赤字，使整个地区（南方、岛屿）的经济停止发展；阻碍了更适合于国家结构和资源的一种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劳动人口的不断贫困化；存在着向国外移民的持续热流，结果造成人口枯竭。

7. 工业阶级没有能自然地控制整个经济，它同样也没有能单枪匹马地把整个社会和国家组织起来。工业阶级只有利用国际政

治的因素(所谓的复兴运动时期),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民族国家。国家的加强和防卫需要同服从工业有限领导权的那些阶级进行妥协;特别是地主和小资产阶级,由此就派生出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国家的多相性和脆弱性。

7. (又)社会结构的这种脆弱性在大战前的军队中有着典型的反映。一个缺乏领袖人物(旧的农村统治阶级和新的工业阶级)威望的有限范围的军官集团,在它的下面有着下级军官(小资产阶级)的官僚化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无法起到同无纪律和行为放纵的士兵群众的连系作用。大战期间,在淘汰上级军官和改造与新型下级军官的出现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之后,军队被迫从上到下重新改组。这种现象预示着一场类似法西斯主义曾经在更大规模上对国家造成的大变动。

8. 对于国家的经济生活和决定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必不可少的工农业关系,在意大利有一个区域性的基础。北方的农业生产和农村人口集中在几个大的中心,由于这样,国家社会结构中固有的一切冲突内部包含有影响国家统一和使它处于危险状态的因素。这个问题是由资产阶级和农业统治集团通过妥协来设法解决的。当然,这些集团中没有一个自然而然地具有单一的性质或单一的职能。此外,靠妥协维持的统一只有使形势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使得南方的劳动群众处于类似殖民地居民的那种地位,北方的大工业对它们执行着相当于资本主义大城市的职能。至于南方的大地主、甚至中产阶级,则起着同大城市结成同盟的殖民地类型的作用,以使劳动人民群众俯首贴耳。因此,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双管齐下,促使南方劳动人民成为一支不断被动员起来的反对国家的力量。

9. 无产阶级在意大利比在其他甚至欧洲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重要的意义。它只同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存在的无产阶级相

类似。这首先由于原料短缺、工业偏重于以劳动力（有专业的熟练工人阶层）为基础。同时也同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多相性和利益冲突有关。面对这种多相性，无产阶级似乎是本性上具有统一职能、能协调整个社会的唯一因素。它的阶级纲领是唯一的“一元化”纲领：换句话说，这是在实现后不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各种因素之间冲突，或者破坏国家团结的唯一纲领。同工业无产阶级同时存在的还有主要以波河流域为中心的大量农业无产阶级：这些人容易受到产业工人的影响，因此容易动员起来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而斗争。

在意大利，肯定了这样的论点：对无产阶级革命最有利的条件并不一定总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和工业制度已经发展到最高水平的那些国家，而相反可能出现在那些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薄弱，只能对革命阶级及其同盟者的进攻给予最微弱抵抗的国家。

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政策

10. 意大利统治阶级从统一的国家产生以来为自己规定的目标是：使大量的劳动人民处于屈从的状态，并且防止他们在工农业无产阶级周围组织起来，成为一支能够进行社会、政治的彻底改革和创建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革命力量。可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弱点迫使它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支配权摆在同非同质集团的妥协而达成的统一的基础上面。从广阔的历史远景来看，这个体制显然不符合它的目的。统治意大利社会的不同集团之间的每一种妥协形式，事实上成了摆在国家经济的这部分或那部分的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因此，产生了新的冲突和大多数居民的新的反抗；必须对群众施加更大的压力；结果使他们愈来愈坚决地倾向于动员起来进行反对国家的起义。

11. 意大利国家生活的第一个时期(1870—1890)是它最脆弱的时期。组成统治阶级的两部分——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资本家——在维护团结的目标下联合起来了,但是赋予单一国家什么形式两者有分歧。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相同之处。国家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这些问题与其说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实质有关,还不如说同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有关。一切事情受平衡预算所支配,这是一个纯粹保守措施。对需要扩大统治国家的阶级基础的认识只是随着“演化论”^①的起源才开始的。

国家在这个时期最大的弱点在于:在国家之外,罗马教廷把由地主和大量落后农民组成、并由富裕的地主和牧师控制和领导的反动的反国家集团拉拢到自己的周围。教廷的纲领有两部分:它企图同单一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它的目的是把农民组成一支后备军,来反对由于工业发展而激起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增长。对于教廷进行的破坏活动,国家作出的反应是用一整套以反对教士为内容和目的的立法来损害教廷的利益。

12. 在1890到1900年期间,资产阶级大胆地抓住了组织它自己专政的问题,并通过一系列决定意大利随后历史的政治和经济措施,解决了这个问题。

首先,有知识的资产阶级同实业家之间的冲突解决了:克里斯比的兴起执政就是这种迹象。就这样资产阶级得到了加强,并解决了它的对外关系(3国同盟)问题,从而赢得了试图进入殖民主义市场的国际竞争领域所必需的安全保障。在国内,资产阶级依靠限制选举权,把全体选民减少到3000万居民只有100万多一点

^① “演化论”这个词从1880年代起最初使用,用以描述所谓“历史上的”左派和右派从复兴运动时期起趋向于根据纲领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当时左派人士被陆续吸收到保守领导阶层里去了。

的选民，以此从政治上建立了自己的专政。在经济领域内，采取了同资本主义要控制全国财富的目的相适应的工农业保护贸易制。通过这种制度，实业家同地主之间结成了同盟。这个同盟夺走了教廷聚集在自己周围的一部分力量，特别是南方地主的力量，并且把这些力量纳入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中。此外，教廷本身认识到需要更加强调它的反动纲领中有关抵制工人阶级运动方面的部分，于是在教皇通谕 *Rerum Novarum*① 中采取了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可是，各统治阶级通过共济会的形式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具有反对教士纲领的统一组织，以此作为对教廷继续对国家表现出来的危险的反应。

工人阶级运动的第一次真正的进展，实际上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工农业专政的建立提出了真正的革命问题，并决定了它的历史条件。在北方，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出现了，而在南方，受“殖民地的”剥削制度支配的农村居民不得不遭到变本加厉的政治镇压。在这一时期，明确地规定了“南方问题”的条件。而且在这一时期第一次自发地——没有任何自觉因素的干预，社会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甚至没有从这个事实中对制定自己的战略得到任何启发——发生了北方无产阶级试图起义和南方农民（西西里联盟）叛乱的结合。

13. 一旦无产阶级和农民起来反对国家的初步尝试被镇压下去以后，得到加强的意大利资产阶级就能够采取表面上的一些民主方法去阻止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为了使劳动居民中的最高层（工人贵族）成为它继续实行反动专政的帮凶，以及防止他们成为反对国家（焦利蒂主义）的人民大众起义的中心，还对他

① 这是教皇关于“工人阶级条件”的通谕，颁布于1891年3月。实际上是对早些时候的反社会主义通谕作了某些修改，主张承认工会和雇主与雇工合办的公司，它宣称私有财产是天经地义的权利，谴责“社会主义”侵犯了这种权利。这一通谕奠定了现代基督教民主的基础。

们的政治上的腐败加以利用。可是，在1900年到1910年之间，有一个工业和农业集中的阶段。农业无产阶级增长中的50%来自破产的雇佣工人、佃农、佃户这类农民。

其结果是出现了一股农业鼓动的高潮，以及一个迫使教廷本身作出反应的农民的新倾向，教廷成立了天主教行动党、举行了一个“社会的”运动，这个运动就其最先进的方式而言，实际上是以一种宗教改革（现代主义）的面貌出现的。教廷的这一反应目的在于保持对群众的控制，而与之配合的是：天主教同统治阶级之间关于使国家有一个更安全的基础的协议（取消了“非权宜之计”^①的金梯洛尼公约）。而且，在这个第三时期末（1914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各种局部运动以一种新的不自觉的尝试告终，这就是：把不同的群众性反国家力量团结起来，形成反对反动国家的起义。这个尝试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战后充分表现出来的问题，即无产阶级需要在其自身内部组织一个阶级政党的问题，这个政党将使无产阶级自身有能力居于起义领导者的地位，并对起义加以领导。

14. 在战后时期，工业领域中发生了最大的经济集中。无产阶级在组织方面达到了最高水平；而这是同统治阶级和国家的最大限度的分裂相适应的。意大利社会机体中固有的一切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这是由于大战及其直接后果使得甚至最落后的群众也被唤起去参加政治生活的缘故。同往常一样，在南方和其他地区，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前进同农民群众的大规模鼓动总是伴随在一起的。大罢工和占领工厂与占据土地同时发生。

反动势力再一次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抵抗。教廷容许组织一个真正的政党，同天主教行动党并存，目的是通过明显满足农民群众对经济赎买和政治民主的渴望，把他们结合到资产阶级国家的

^① “非权宜之计”(non expedit)是天主教在1871年为了反对政府，对天主教选民所作的不得选举国家候选人的规定。该规定在1919年才被取消。

结构中去。为了用拟议中的改良主义方式解决国家(左派政府)问题,统治阶级也用堂皇的手法实现了他们腐蚀工人阶级运动和从内部对它进行破坏的计划,他们在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眼前炫耀工人贵族可以在政府中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在象意大利这样一个贫穷和不统一的国家里,采取“改良主义方式”解决国家问题必然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内聚力的崩溃;因为这种做法无法防止对统治阶级本身和中间阶级分裂造成的为数众多的集团的打击。每一个集团有它自己对经济保护和政治自主的需要;在缺乏一个同质的阶级核心(这种核心有能力通过它的专政将一种工作和生产的纪律强加于整个国家,同时打垮并肃清资本家和地主剥削者)的情况下,就不可能组成政府,权力危机也继续得不到解决。

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这个决定性时期的失败,是由于工人政党在政治、组织、策略和战略上的缺陷造成的。这些缺陷的一个后果是:无产阶级没有能把自己摆在绝大多数居民起义的领导地位上,并引导起义得以建立工人国家。相反,正是它自己受到其他社会阶级的影响,这些阶级使它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1922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决不应当看成是战胜了革命的胜利,而应当看成是革命力量由于自身固有的弱点遭到的失败。

法西斯主义和它的政策

15. 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武装的反动运动,它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分裂和瓦解工人阶级,使之丧失活动能力,它使自己适应传统的意大利统治阶级政策的结构和资本主义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因此,它的起源、它的组织和它的发展无一例外地受到旧的统治集团的欢迎,特别是受到那些对农村平民的压力最感到威胁的地主们的欢迎。然而,在社会上,法西斯主义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

新的农业资产阶级那里找到了基础。这个新的农业资产阶级是由于某些地区农村财产的转变(埃米利亚的农业资本主义的现象;农业经纪人类型的由来;“土地转让”;财产的新分配)而产生出来的。

这种环境,连同它在军事组织中找到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再度复活了战时传统(无畏主义),并用来进行游击活动以反对工人,这种环境使得法西斯主义构想出一个夺取国家、反对旧的统治阶层的计划,并予以贯彻。把这称之为一次革命是荒谬的。可是,在法西斯主义周围重新聚合起来的那些新类型的人,从他们的起源中得出一种“新生资本主义”的共同观念和共同心理。这说明他们如何有了可能同过去的政客进行斗争,如何能用一种思想体系来为此辩护,这种思想体系同关于国家及其与公民的关系的传统理论是相违背的。实质上,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通过对始终统治意大利政治的保守和反动的纲领作了一些修改而已。它用一种计划来代替协议和妥协的策略,这种计划是要把全部资产阶级力量有机地统一在一个单一的中心控制下的单一的政治组织中;这个中心同时指导党、政府和国家。这个计划符合于同任何革命的进攻对抗到底的决心;因此,它使法西斯主义赢得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地主中最死心塌地的那部分反革命的支持。

16. 法西斯主义维护秩序、财产和国家的方法,甚至比妥协的传统方式和左的政策更加有助于破坏社会的内聚力和同内聚力一起起作用的政治上层建筑。对这种方法所引起的反应必须从经济和政治领域对它的运用中去进行检验。

在政治领域中,首先,资产阶级在刚刚赢得政权之后没有立即实现法西斯主义下的有机统一。资产阶级反对政权的中心仍然留在法西斯主义的外面。一方面,仍然忠于焦利蒂治国方针的那个集团没有被吸收进去。这个集团同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有联系,

并且以它的“工党原则的”改良主义纲领，对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一些阶层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以南方的农村民主政治和北方工业（《晚邮报》、自由贸易主义者、尼提）的“健康”部分作为国家基础的纲领，正在趋于成为一个在南方（全国工会）有群众基础的反法西斯主义政治组织的纲领。

法西斯主义不得不同这些幸存下来的集团进行殊死的斗争，而且要同共济会进行甚至更为凶猛的斗争，法西斯主义有理由认为它们是所有支持国家的传统力量的组织中心。标志着保守和反无产阶级力量集团的破裂的这场斗争，不论是什么动机，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有利于无产阶级作为政治形势中第三种决定性因素的发展和要求。

在经济领域，法西斯主义充当工业和农业寡头政治的工具，把国家的全部财富集中控制在资本主义的手中。这必然使小资产阶级不满，他们认为，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到来，他们统治的时刻就告结束了。

法西斯主义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新的工业集中（取消遗产税；金融财政政策；加强保护贸易制），还采取了与此相应的有利于地主并针对中小农民的其他措施（税；谷物税；“谷物战”）。这些措施得到的总的后果不是增加国家财富，而是掠夺一个阶级，有利于另一个阶级；换句话说，掠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有利于财阀统治。在新的商业法规中使优先股制度合法化的办法无耻地暴露了偏袒财阀统治的意图；通过这种办法，一小撮金融家将能够无所约束地处理来源于中、小资产阶级的大量储蓄，而这几类人则将被剥夺处理自己财富的权利。

必须将统一流通银行的计划看成是同样的问题，但它具有更大的政治后果，这个计划实际上是要淘汰两家南方大银行。目前，这两家银行执行吸收南方地区的储蓄和侨汇（6亿）的职能；换句

话说,在过去,这个职能是由国家通过发行国库公债和为北方一部分重工业的利益而开设的殖民银行执行的。直到现在,这些南方银行一直由南方自己的统治阶级所控制,他们已经发现这种控制是他们的政治统治的真正基础。取消作为流通银行的南方银行,将把它们的这一职能转交给经由商业银行控制意大利银行的北方大工业。因此,我们将要看到“殖民地的”经济剥削和南方贫困的增长,南方小资产阶级脱离国家的缓慢过程将要加速。

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由旨在提高里拉币值、稳定贸易平衡、支付战争债款和鼓励英美在意大利进行投资这些措施来实现的。在所有这些领域中,法西斯主义正在执行财阀(尼提)和少数工业土地拥有者的纲领,牺牲生活条件正在日趋恶化的绝大多数居民的利益。

法西斯主义的一切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政治、经济活动,都充满着“帝国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明,意大利的工业和拥有土地的统治阶级需要在本国领土之外找到解决意大利社会危机的因素。这种倾向包含着战争的萌芽,在表面上,战争是为了意大利的扩张,但实际上,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在战争中将是正在争夺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集团之一的手中工具。

17. 法西斯政策推行的结果,在群众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应。最严重的现象是:南方和岛屿的农村居民愈来愈急剧地同统治国家的力量体系相脱离。旧的地方统治阶级(奥兰多、迪契萨罗、德尼古拉^①等)不再以系统的方式执行作为一个同国家联系的环节的职

^① 恩里科·德尼古拉(1877—1959),意大利国务活动家,著名律师之一。1909年,当选众议员;1920至1923年,任众议院议长。在新任首相墨索里尼表示蔑视议会机构时,他没有提出抗议。因此1924年大选,他当选法西斯圈定的议员。1929年,他被任命为参议员。1946年,立宪会议选他为临时国家首脑;1948至1953年,任参议院议长;1956至1957年,任立宪法院(意大利最高法院)院长。1959年10月1日在托雷-德尔格雷科逝世。——编者

能。因此，小资产阶级同农民日趋靠拢。对南方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制度正在被法西斯主义引向极端；这就促使中间的类型也激化了，并且如实地把南方问题作为将来只有通过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的农民起义、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提出来。

意大利其他部分的中农和贫农，尽管采取较慢的方式，也具有革命的作用。罗马教廷（它的反动职能已被法西斯主义接过去了）已不再能通过传教士、天主教行动党和人民党完全控制农村居民了。一部分农民正是被教会当局授权和指导的组织重新唤起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目前，在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下，这部分人正在加强他们自己的阶级方针，并开始感到他们的命运同工人阶级的命运息息相关。这种倾向的一个迹象就是米格列奥利^①现象。它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征兆也在于这件事：白色组织（因为它们是天主教行动党的一部分，所以直接受罗马教廷的控制）不得不同红色农民同盟一起参加相互团结委员会；天主教从1870年起指出的无产阶级时期的那种表现已逼近意大利社会。

至于无产阶级，破坏它的力量的活动在革命先锋队的积极抵抗和广大群众的消极抵抗中正在受到限制，这些群众基本上保持着阶级意识，并且表现出这样的迹象：只要法西斯主义的人身迫害一松弛，同时激励他们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将重新开始行动。可以认为，通过法西斯工会分裂他们队伍的企图已经失败了。法西斯工会通过改变它们的纲领，现在已成为为国家效劳的反动镇压的直接工具。

^① 吉依多·米格列奥利，是南方伦巴第奶制品农场天主教工会的领导人，天主教左派众议员。1921年5月大选中，他同共产党议长提出共同纲领后，被法西斯暴徒殴打受重伤。1922年3月法西斯发起一场捣毁天主教工会的运动，他又成了法西斯暴徒攻击的对象，他的家被烧毁。1925年6月，他作为人民党左翼领袖被开除出党。——编者

18. 法西斯主义对它的政策所引起的危险转变和新力量的补充作出的反应是通过军事力量和镇压体制的压力支配整个社会，这种力量和制度把居民集中到呆板的生理事务中去，使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生活、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志、或者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所谓法西斯主义的立法，除了巩固这种制度并使之永存之外没有其他目的。新的政治上的选举法、通过把法西斯行政官引进农村公社来修改行政结构等等。这是打算用来表明群众参加任何国家政治生活和管理生活的结束。对社团的控制是不使群众组织有任何永久的“合法”形式。新的工会政策剥夺了劳工总同盟和阶级的工会任何谈判协定的可能性，这是为了不使它们同已经被组织起来的向它们靠拢的群众进行接触。无产阶级的报刊被查禁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纯粹非法的实体。特别是在农村，为了制造恐怖气氛，保持一种紧张局势，法西斯交替使用了肉体的暴行和警察镇压。

这种反动和镇压的复杂活动的结果是社会力量的真正关系和有组织的力量的关系之间的不平衡。以至于表面上虽恢复到正常和稳定，而实际上却是矛盾激化，随时会以新的方式爆发出来。

18. (重复) 随着马特奥提被暗杀而产生的危机，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事例，即法西斯政权的表面稳定可能会由于在不知不觉中愈来愈尖锐的经济和政治冲突的突然爆发而从下面发生动摇。同时，它证明在当前历史时期中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在领导反对工业和拥有土地的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任何成果。

革命的动力和前景

19. 现在从我们的分析中已经清楚，意大利革命的动力按其重

要性可排列如下：

(1) 工人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

(2) 南方和各岛屿的农民以及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农民。

没有对主观因素的估价，就不能预见革命过程的发展和速度，这些主观因素也就是：工人阶级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造就它自己的政治形象、获得正确的阶级意识和独立于所有其他的阶级；工人阶级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组织自己的力量，即事实上对其他部分执行领导权，而首先是从政治上把它同农民的联盟具体化。

而且，人们根据对意大利的经验，可以大体上肯定，当北方的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已经能够重新达到（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和通过一系列特有的直接斗争）高度的组织水平和旺盛的斗志时，人们就将从革命准备时期转变到“直接”革命时期。

至于农民，南方和各岛屿的农民，尽管人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具有头等的重要性（除非他们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可是必须把他们包括在反对工业和拥有土地者专政而举行起义所必须依靠的第一线力量里面。他们同工人的联盟是一个自然的和深刻的历史过程的结果，是意大利国家过去的一切经验促成的。对于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农民来说，确定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方针的过程比较缓慢，对此无产阶级政党还必须进行细致的政治活动予以促进。此外，意大利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表明，西欧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提出打破农民同反革命力量结成联盟的问题，就象提出消除天主教组织对农村群众的影响的问题一样。

20. 革命发展的障碍不仅仅来自法西斯的压力，而且也同资产阶级划分为形形色色的集团有关系。其中每一个集团都力图对一部分劳动居民施加影响，以防止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使它失去作为一个革命阶级的形象和自主的地位。就这样，建立了一条反革命力量的锁链，这条锁链起自法西斯主义并包括：没有广大群众基础

的反法西斯主义集团（自由党人）；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有基础的那些集团（民主党人、退伍军人、人民党和共和党人），还有工人中的一部分人（改良主义政党）以及有无产阶级基础，倾向于把工人阶级群众维持在消极被动的地位、引诱他们去遵循其他阶级（最高纲领派政党）政策的集团。对领导劳工总同盟的那个集团也应当从这个观点来看，即把它看成是其他阶级对工人施加分裂影响的媒介物。我们已经提到的上述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控制了一部分意大利劳动居民。只有通过组织在共产党内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不断的系统政治活动，才能设想改变这种局面。

对于在南方和一些岛屿上（全国工会；撒丁行动党；莫利斯和伊尔比尼亚的一些行动党，等等）的农业人口中有群众基础的集团和政党（或者设法建立一个既民主又是地方性的政党）必须更为注意。这些政党对无产阶级并不施加任何直接影响；但它们是实现工农联盟的障碍。它们把南方的农业阶级引向农村民主主义和地区民主的解决办法，从而破坏了意大利劳动人民解放过程的统一性；使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经济和政治剥削的斗争得不到结果；还打算把他们改造成反动的白卫军。工人阶级在这个领域里的政治成就也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

21. 只有在所谓的民主反法西斯主义集团能够抵销无产阶级的活动，并且能够控制一种可以制止无产阶级发展的群众性运动的时候，它也许会有打倒法西斯政权的可能性。民主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职能更确切地说是勾结法西斯主义，防止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和实现它的阶级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反对派之间的妥协已准备妥当，还将影响从亚文丁派^①废墟中

^① 亚文丁派，是指1924年6月27日，为了抗议墨索里尼政权杀害社会党议员齐阿柯莫·马特奥提，在亚文丁山自行组织议会的150名议员，他们大多是社会党、人民党、共和党的党员，少数是共产党员。领导亚文丁派的是乔万尼·阿门

产生的每一个“中间派”组织的政策。当法西斯的镇压本身不再能制止阶级冲突的发生,以及同农民战争连成整体的无产阶级起义的危险看来很严重和迫在眉睫的时候,反对派才能再度成为资本主义政权捍卫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因此,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本身求助于披着一个“左派政府”外衣的反动制度的可能性,在我们看来,必然会长期出现(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在职能上的分工,《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纲》)。

22. 从这种对于革命因素及其前景的分析中,就可以推断出共产党的任务。党的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准则必须同这个分析联系起来,党纲的基本调子就是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的。

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23. 党已经胜利地顶住了企图吞没它的反革命浪潮(1923年);它在制止驱散工人阶级力量的过程中第一次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贡献(1924年的选举);它利用了马特奥提危机重新组织了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支先锋队在企图让小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斗争中获得显著成功(亚文丁);并为意大利无产阶级的真正农民政策奠定了基础。今天,党发现自己是处于革命的政治准备阶段。

党的基本任务可以用以下三点加以说明:

- (1) 为了革命,把工农业无产阶级组织和统一起来;
- (2) 把取得革命胜利和建立工人国家所必需的一切力量在无产阶级周围组织和动员起来;

多拉,安东尼奥·葛兰西等。他们提出要墨索里尼政府辞职,并试图说服维克多·伊曼纽尔三世罢免墨索里尼,但国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此此举宣告失败。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剥夺了他们的议员资格,并宣布反对党为非法。——编者

(3)把对资产阶级国家举行起义和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问题摆在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面前,并通过一系列局部斗争,从政治上和物质上指导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党”

24.在共产党内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起来是我们组织活动的主要特征。意大利工人已经从他们的经验(1919—1920年)中认识到:哪里缺少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和革命政党建立起来的)的领导,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斗争就不可能得到胜利的成果。建设一个真正是工人阶级政党和革命政党的共产党(换句话说,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同以下几个基本条件有直接关系:

- (1)党的意识形态;
- (2)党的组织形式和内聚力的程度;
- (3)党在联系群众方面的活动能力;
- (4)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能力。

其中每一个条件同其他条件都是紧密联系的,在逻辑上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事实上,每一个条件都表明和包含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相互有内在的联系,而且交叠在一起。只有牢记住,不同时处理并解决所有这些条件问题,任何条件都无从谈起,只有这样,分别研究它们才是有益的。

党的意识形态

25.共产党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一致,以便能够在任何时刻完成它作为工人阶级领袖的职能。意识形态的一致是党的力量和政治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使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可

缺少的。意识形态一致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学说，列宁主义被理解为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期的问题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1925年4月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第4和第6条）。

意大利共产党在反对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者）和反对以最高纲领派为代表的政治上的中派的斗争中形成了它的意识形态。可是意大利共产党在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并没有发现可以指望的朝气蓬勃的或者持续不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潮流。而且，它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队伍缺乏深广的知识。因此，就可能出现偏向。必须通过系统的内部活动来提高党的思想意识水平。这种内部活动旨在保证所有党员对革命运动的直接目标有彻底的理解、具有对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定能力及具有相应的把握政治方向（党校）的能力。任何硬说构成意识形态的革命觉悟和革命意识的因素可以为全党所认识，而不需要同时为组成党的广大党员个人所认识的这种想法，必须加以批驳。

26. 尽管对工人运动中的右派和中派的堕落开始进行了斗争，但是目前在意大利共产党内存在着右倾危险。在理论领域中，这种危险以格拉齐亚德伊^①同志为代表，他借口要对马克思学说的某些基本概念作“科学”的提纯，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格拉齐亚德伊的企图的确不可能导致建立一个派别，并由此建立一个危及党在思想上的团结一致的宗派。可是，这些企图含有支持右倾派别和右倾政治偏向的意思。无论如何，这些企图表明，党需要深入研

^① 安东尼奥·格拉齐亚德伊（1873—1953），意大利共产党人，经济学家，巴勒莫大学教授。1893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0年起为众议员。1920年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团成员。1921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格拉齐亚德伊犯过一系列严重错误，用修正主义观点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1928年由于追随右派被开除出共产党，后来承认错误，被重新吸收入党。——编者

究马克思主义并具备更高的和更扎实的理论觉悟。

可能产生右翼倾向的危险是同国内总的形势有联系的。正是法西斯主义实行的这种镇压有助于滋长这种观点：既然无产阶级不能很快推翻政权，那么，最好的策略就是，即使其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从宪法上排除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集团，那至少也要使革命先锋队处于一种消极状态并使共产党不介入直接的政治斗争，这样就能使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作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选举大军。这个纲领是通过这样一个公式表达出来的，即共产党必须是一切策划推翻法西斯政权的势力所结成的反对派的“左翼”。这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力深为悲观的表现。

就是这种悲观失望和这种偏向导致对当前社会民主政党的性质和历史职能的不正确的解释。它们使人们忘记，尽管社会民主党很大程度上仍然在无产阶级中保持其社会基础，但是，就其意识形态和所履行的政治职能而论，必须认为社会民主党不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的左翼，因此，就必须在群众的眼前撕下它的假面具。

必须通过思想意识的宣传来同右翼的危险进行战斗，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纲领来对抗右翼纲领，必要时用常规的纪律手段。

27. 一方面是党的渊源同国家总的形势，另一方面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左倾偏向的危险，在这二者之间有着同样的联系，以博尔迪加同志为首的极左倾向代表这方面的问题。这种倾向是从大战末到里窝那代表大会意大利社会党所处的分裂状态和它在纲领、组织、战略和战术上的无能这种特殊形势下形成的。此外，它的渊源和命运同以下事实有关：因为工人阶级在意大利劳动居民中占少数，它的政党经常碰到的腐蚀危险是来自其他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渗透。极左的倾向对工人阶级的

这种状况和意大利社会党的情况，用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作出了反应，也就是用一种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相抵触的关于党的性质及其职能和策略的概念作出了反应。

(1)极左派忽视或低估党的社会内容，把党解释为工人阶级的一个“机构”，是由异质成分的综合而构成的。实际上，在解释党的时候，必须首先强调它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党解释上的错误导致对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处理上的错误。

(2)对于极左派来说，党的职能不是在所有时刻都领导工人阶级，并在客观形势的千变万化中努力保持同这个阶级的联系，而是造就和准备干部，这些干部能在形势的发展促使群众站到党的一边来并接受党确定的纲领和原则立场的时候领导他们。

(3)至于策略，极左派认为，这些策略必须不受客观形势和群众的立场所左右，不是象通常那样同现实相符合并同劳动居民的最广泛阶层有永久的联系。相反，策略必须根据形式主义所关切的事务来决定。极左主义的思想特征是：建立“布尔什维克”政党(这些政党有能力不出偏差地进行任何需要动员群众和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行动)也不能避免同共产党政治原则相背离的偏向；而只有对党的策略施加一种外部的严格形式的限制，才能避免出现偏向。(在组织领域：“个别吸收”，也就是反对“联合”；如果始终是顺利的条件，这种做法实际上对于扩大党的影响可能是个很有效的手段。在政治领域：曲解了赢得大多数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工会统一战线，而不是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没有根据群众支持反革命民主组织的程度，或者反动危险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在反对民主的方式上有所区别；摒弃工农政府的口号。)其结果是，只是为了检验出于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考虑得出的路线，才去研究群众运动的形势。这样，在决定党的政策时，总是看不到特殊因素；作为我们政治探讨方法(辩证法)的特征的统一和完整的远见被破坏了；党的活动

和口号失去了它们的效力和价值，只不过是单纯的宣传活动和宣传口号。

由于这些立场，党在政治上的被动是必然的。过去，“弃权主义”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就使我们把极左主义同最高纲领派和右倾偏向连接在一起。而且，象右翼的倾向性一样，这是对工人阶级群众在他们本身内部组织一个阶级政党，这个阶级政党能领导广大群众、同时在任何时候争取群众同党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一种表现。必须以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概念来抵制极左主义，对极左主义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且要证明极左主义需要使它的策略适应形势，以便能够改变形势，不脱离群众，并继续获得新的影响地区。

极左主义是意大利共产党存在初期的正式意识形态。它是由党的创始人当中的一些同志所提倡的，这些同志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以后对党的建设有极大的贡献。因此，有一些因素说明了这种概念之所以长期在大多数同志心中深深扎根的原因。由于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他们对这种概念并没有作过任何彻底的批判性的估价。这样，很明显，必须把极左的危险看作是眼前的现实；它不仅是党的思想统一和提高的障碍，而且也是它的政治发展及其有效活动的障碍。必须对它进行扎实的斗争，不仅通过宣传，而且通过政治行动，必要时还要通过组织措施。

28. 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贯穿在它的队伍中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程度。它作为国际团结的精神在我们中间是很强烈的，但是要意识到它属于一个世界的党，这就不是那么强烈了。对这个缺点起作用的一件事是把极左派的概念作为民族概念（“意大利左派”立场的“创见”和“历史”价值）的这种倾向，这是同马列主义关于共产国际的概念相对立的，并且力图取而代之。因此，根据那个组织固有的原则（拒绝承担责任、国际的宗派斗争等等），这

就是从结合成为一个世界组织的立场缩回来的一种“党的爱国主义”的起源。在国际主义精神上的这个缺点为资产阶级从事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把它描述成是俄国的一个机构)在党内提供了共鸣的领域。极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某些提纲同反革命党派的通常提纲是吻合的。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去同这些提纲进行斗争,通过说明俄国党如何在建立共产国际中历史地起着支配的和指导的作用,并说明俄国工人国家(这是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第一个和唯一真正夺取到的国家)对于国际工人运动采取了怎样的立场(《论国际形势的提纲》)的宣传来同它们进行斗争。

党组织的基础

29. 组织的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使党能够实现它的基本任务:保证无产阶级获得完全的政治独立;给无产阶级一个形象、人格和一种严格的革命意识;以及防止来自一些阶级和分子的任何渗透或促使分裂的影响,因为这些阶级和分子即使有同资本主义对抗的利益,也不愿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首先,有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组织的基础。党组织必须建立在生产、因而是劳动场所(基层组织)的基础上。这个原则对于创建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党必须武装起来以便领导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而然把这个运动统一起来。党把组织基础放在生产场所上,因而选择这个阶级作为自己的基础。它宣布自己是一个阶级的政党和单一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政党。

所有对于党组织以生产为基础的原则加以反对的意见,即使是由那些自称为“极左的”同志们和集团提出来的,也都来自与无

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一些阶级有关的概念。这些反对意见都是对工人和共产党员工人的革命能力抱悲观的看法，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无产阶级精神的一种表现，这些人认为自己是社会中坚，他们把工人看作社会改革的物质工具，而不是自觉的、有才智的革命主人公。

关于基层组织问题，意大利党内正在重演过去在俄国引起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的那种讨论和冲突，当时的讨论和冲突涉及到选择阶级的同一问题，即关于党的阶级性以及非无产阶级分子怎样才能加入党的问题。而且，这一事实对意大利的形势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在意大利，正是社会结构本身以及政治斗争的条件和传统，使得党有建立在一种异质成分的“综合物”的基础上的危险（也就是由于这些成分有为其他阶级的破坏影响鸣锣开道的危险）要比其他地方严重得多。而且，正是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将使这种危险变得更加严重，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将驱使小资产阶级的整个阶层走向革命的领域。

的确，共产党可以纯粹是工人的政党。但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行，它们也不能忽视所有那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迫背叛资本主义的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和给予指导的问题。因此，共产党不能对农民关门，它的确必须容纳农民，并利用他们去加紧无产阶级和农村阶级的政治结合。但是，对于任何使党成为异质成分的“综合物”的概念，都必须作为反革命的概念加以强烈反对；这种概念不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不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把党作为自己的组织而标下印记，不认为必须保证无产阶级在党本身内部的领导职能；这种概念在这些方面不能有丝毫让步。

30. 实际上，反对以生产（基层组织）为基础建立组织的意见是前后不一的，根据这种意见，这样的组织结构不会使我们摆脱不同

工种工人之间的竞争,还会使党陷于机关事务性的工作。工厂运动(1919—1920)的实践已经表明,只有一个同生产的地点和体制相适应的组织才有可能建立工人群众上下阶层(熟练工人、不熟练工人和苦力)联系并团结一致消除任何“工人贵族”现象的基础。

把组织建立在基层,使党内形成一个广大的领导干部阶层(基层组织的书记、基层组织委员会的委员等),尽管他们执行领导职能,他们是群众的一部分并且处在群众之中,不象地区支部书记那样,必然是脱离工人群众的分子。党必须特别注意教育这些同志,他们是基层组织的连接结构和基层组织同群众的联结工具。不论从什么观点来考虑,在目前时期,改造它的生产基础上的结构仍然是党的根本任务和解决党的最重要问题的手段。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并加强与此有关的一切思想工作和实际工作。

党组织的完整性。派性

31. 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在党的生活的所有时刻必须是一个集中的组织,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由中央委员会领导。在党的队伍中必须有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这不是说党必须由上面用独断独行的方法来统治。中央委员会和隶属的领导机构都是在选举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通过工作的考验和通过运动的经验选拔有才干分子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第二个因素保证组成地方领导集团和中央领导集团的标准不是机械的,表面上的和“议会式的”,而是符合于一个联系群众的思想一致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真正形成过程的。

领导机构的选举原则(内部民主)不是绝对的,而是同政治斗争的条件有关系。即使是在受限制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机构也必须经常考虑到它们的权力不是从上面强加的,而是从党的意志

中产生的，而且必须力求强调它们的无产阶级性质并加强同广大同志们以及工人阶级的联系。意大利对后一种需要尤为迫切，因为在那里，反对派一直对内部民主实行严格的限制。

内部民主也同地方机构和地方工作同志个人具有的政治能力的水平有关系。由于中央进行的提高这种能力的活动，便有可能扩大“民主”方法，逐步缩减“指派”制度和从上面干预去清理地方组织上的问题。

32. 党的中央集权和内聚力要求党内不得存在具有宗派性质有组织的集团。在这方面，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同社会民主党有明显区别，社会民主党包括许多形形色色的集团，在那里宗派斗争是制定政治方针和遴选领导集团的正常方法。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是在第二国际内部进行一场宗派斗争之后出现的。它们确定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世界组织，并选择了通过参加领导机构使一切倾向得到有机的合作，作为它们内部生活和发展的准则，以代替宗派斗争。

宗派的存在和宗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同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质不相容的，因为它们破坏了党的团结，并为其他阶级的影响开辟了道路。这并不是说党内不可能出现一些倾向，也不是说这些倾向不可能偶尔设法把自己组织成宗派；但是为了防止后一种情况的发生，就确实意味着必须进行一场有力的斗争，即通过减少这些倾向性的冲突、进行理论上的讨论和以适合于共产党的方式来遴选领导人，即适合于真正取得一致的（辩证的）演变过程而不是“议会”式的辩论或斗争。

33. 工人阶级运动由于社会党的无能而失败了。这种失败是宗派斗争和独立于党之外的每个宗派执行自己的政策，从而瘫痪了其他宗派和整个党的活动这一事实造成的。在为创造和维持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必要特征的内聚力和集中制方面，这个经验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意大利共产党起源于不同的集团，在这些集团中存在着一些差别，当共有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更深地扎根时，这些差别必然消失。只有在极左派的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中间才长期存在着一种宗派性质的同质和团结一致。的确，由于成立了所谓协议委员会，曾经有人试图使隐藏的宗派主义转为公开的宗派斗争。党对于分裂它的力量的这种疯狂的尝试反应强烈，这就可靠地保证了我们对任何企图把我们拉回到社会民主党习惯中去的这方面做法不会去响应。

宗派主义危险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同社会党的第三国际派的联合而造成的。第三国际派成员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本质上是社团性质的联系，这些联系是他们在社会党内形成一个宗派的两年中建立起来的，现在已日趋削弱，而且不难被统统消除干净。

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必须首先包括对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宣传。但是，在意大利党没有能够重新认为它自己的和共产国际的当前问题的讨论是一种正常的作法并根据这些问题来确立自己的立场之前，这种斗争是不会成功的。

党组织的活动

34. 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必须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即它能够在任何条件下起到联系群众的作用。这个原则在我们中间变得最为重要，因为法西斯主义进行镇压的目的，是要防止各种力量的真正关系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关系。只有用最集中和最剧烈的党的活动，才能至少使这种消极因素部分地中立化起来，并防止它对革命进程有很大的阻碍。因此，有必要考虑到以下问题：

(1)党员的人数和他们的政治能力；他们必须足以使我们的影响不断扩大。必须同人为地限制党员人数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倾向会造成被动和衰退。无论如何，每个党员必须是一个政治上的积极分子，他有能力传播党的影响，把党的指示化为日常的行动并能领导一部分工人群众。

(2)在一些实践工作中使所有的同志都能发挥作用。

(3)通过把全党联合成为群众工作机构的那些委员会，使各种活动协调一致起来。

(4)党的中央机构所起的集体领导作用，这被看作是建立一个同质的和有内聚力的“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的条件。

(5)在群众中工作的同志们们的能力，应该表现在不断地联系群众中，表现在处身于每一个斗争的最前列，并且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采取和保持同无产阶级先锋队相称的立场。要强调这一点，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和不正确的“极左”的意识形态，已经使我们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和同群众一起工作的能力受到了限制。

(6)地方组织和同志们们的个人能力，表现在应付预料不到的环境和甚至在接到领导机关的命令以前也能采取正确立场。需要同被动的方式(这又是极左派的错误的组织概念的一种残余)进行斗争，这种方式在于只能“等待上级命令”行事。党必须以基层的“主动精神”作为特征；换句话说，基层机构必须能够对每一个预料不到的突变形势立即作出反应。

(7)开展“地下”(非法)活动和保护党不受任何反动派损害的能力，同时又不失去同群众的联系——的确，同工人阶级最广泛的阶层保持这种联系是一种防护措施。在目前的形势下，把自身限制在仅仅从事“内部组织”活动以保护党及其机构，这必须被认为是抛弃革命事业。

必须用心考虑以上各点，因为每一点都表明它既是党的弱点，

也是党必须达到的进步。由于人们将预见到，反动派的打击将进一步削弱联结中央和地方组织的机构（不管用了多么大的力量去使这种机构保持完好无损），这几点就更加重要了。

党的战略和策略

35. 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能力，也就是把革命胜利所需的一切力量组织和统一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工人阶级周围的能力；也就是利用客观环境和这些环境造成的不但是劳动居民中的，也是工人阶级敌人中的力量对比的转变，以便切实把这些力量引向革命的能力。在主要的历史运动中，同样在日常斗争中，党用它的战略和策略“领导工人阶级”。一种领导方式同另外一种方式相联系，并受后者的制约。

36. 对于党领导工人阶级的原则决不能作机械的解释。认为党能够通过外部强加的权力来领导工人阶级，这是不必要的。不论赢得政权以前时期，还是以后时期，这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在意大利党内，必须把机械地解释这个原则的这一错误作为极左派思想偏向的一个可能结果，加以反对。因为就党作为阶级领袖的职能而论，这些偏向导致任意的和形式上的对党作过高的估计。我们坚信领导阶级的能力不在于党“宣告”自己是阶级的革命机构，而在于它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真正”能够把自己同那个阶级的所有阶层联结起来，真正能够在群众中开展一场按照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方向发展的运动。党只有靠它在群众中活动的结果，才能使群众承认它是“他们的”党（赢得大多数）；也只有在实现这种条件时，它才能认为自己能使工人阶级跟随在它后面。党在群众中进行这种活动的需要，超过了它的任何“爱国主义”。

37. 党通过深入到工人聚集的所有组织中去领导阶级，并根据

阶级斗争的纲领在这些组织中和经由这些组织进行有组织的力量动员,以及进行一项旨在赢得大多数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活动。

党在其中进行工作的这些组织,本质上倾向于把整个工人群众结合起来,但永远不能取代共产党,因为党是革命者的政治组织,换句话说,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组织。这排除了这些群众组织和党之间的任何从属关系,或者“平等”关系(斯图加特工会公约;意大利社会党和劳工总同盟之间的联盟公约)。工会和党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领导关系,这种领导关系是通过共产党员在工会内部进行活动实现的。共产党员在工会和在一切群众组织中把自己组织成支部,在这些组织的生活中和他们进行的斗争中参加到最前列,并坚持党的纲领和口号。要同使自己和那些组织(有可能同工人群众进行接触的任何组织)的生活脱离的每一种倾向进行斗争,要把这种倾向作为一种表明悲观主义和产生消极情绪的危险偏向来同它进行斗争。

38.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是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的特殊机构。必须把工会中的活动看作是完成党的目标所不可或缺的。如果党放弃在工会中施加影响和赢得对它们的领导权的斗争,那事实上就是放弃赢得工人群众和放弃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

在意大利,在工会中进行活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这种活动在重新组织工农业无产阶级(它必须恢复无产阶级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支配地位)方面有可能使工作更强有力地进行并取得更好的效果。可是,法西斯的镇压,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新工会政策,正是造成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势。劳工总同盟和阶级工会正在被剥夺按照传统方式从事组织活动和维护经济的任何可能性。它们正在趋向于被降格成为单纯的宣传办公室。但同时,工人阶级正在被客观形势所迫,在新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重新部署它自己的力量。因此,党必须设法进行保护阶级工会的活动,并为阶级工会争取自

由；同时，党必须对建立与生产制度相适应的有代表性的群众组织的趋势加以鼓励和促进。随着阶级工会活动的瘫痪，保卫工人的直接利益是通过工厂、工种、劳动场所等的零散反抗和斗争进行的。共产党必须能够注视所有这些斗争，并对它们进行真正的领导：保证阶级冲突的一致性和革命性在斗争中不会消失，并确实利用这些斗争在战斗的前线来帮助动员整个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工会提纲》）。

39. 党通过参加一切局部性的斗争和制定一个关于工人阶级直接利益的要求的纲领并围绕这个纲领进行鼓动，来领导和统一工人阶级。党认为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行动，都是实现工人阶级所有力量的逐步动员和统一所必需的步骤。

有一种概念认为，人们必须放弃支持或参加局部行动，因为引起工人阶级兴趣的问题只能靠推翻资本主义秩序和通过所有反资本主义力量的一个总的行动才能解决，党反对这种概念。它认识到，在帝国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秩序被推翻以前，工人们的条件不可能得到认真或持久的改善。可是，围绕着直接要求的纲领进行鼓动和支持局部斗争是争取广大群众和动员他们反对资本的唯一方法。而且，在直接要求的领域中各工种的工人所进行的任何鼓动或赢得的胜利，由于改变了作为今天资本主义权力基础的那种不稳定的经济平衡，就会使资本主义危机更加激化，并且也会在主观上加速它的垮台。

共产党把每一个直接要求同一个革命目标联系起来；利用每一个局部斗争去教育群众，使他们知道需要有总的行动和反抗资本反动统治的起义；并设法保证准备和领导每一个有限性质的斗争使之能把无产阶级力量动员和统一起来，而不是使它们分散。共产党在那些领导局部运动的群众组织内部，或者在反对发动这些运动的政党时坚持这些概念。不然，党通过它自己在群众组织内

部或者对其他政党(统一战线策略)主动提出局部行动来给这些群众运动提供力量。在每一种情况下,党利用所提到的这个运动的经验以及它自己的倡导所取得的结果的经验,来增加自己的影响(通过事实证明党的行动纲领是唯一符合群众利益和客观形势的纲领),并使工人阶级中的落后部分转变得比较先进。

如果党通过群众组织掌握了工人阶级的相当一部分人,或者党确信它的直接口号之一同样为工人阶级的相当一部分人所遵循,它就能够在直接采取主动来提出局部行动。可是,除非按照客观形势,这种主动会导致力量平衡的转变有利于党并体现出阶级的统一和动员朝着革命领域前进了一步,否则,党将不会采取这种主动行动。

如果党与工人阶级群众不能紧密联系起来,那么,那种认为某些个人或集团的暴力行动可以使工人阶级群众摆脱被动状态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特别是武装集团的活动,甚至是作为法西斯分子人身暴行的一种反应,只有同群众的反应连结在一起,或者能够引起或准备作出反应,这才会有效益。这样,在动员物质力量方面,就同罢工和特殊经济斗争为维护工人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力量总动员一样,具有同等的效益。

39.(重复)认为直接要求和局部行动单单有经济的性质,这是个错误。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资产阶级和地方统治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政权,不得不限止和压制无产阶级的组织自由和政治自由。因此,对这些自由的要求,就为可能把劳动居民的广大阶层动员起来的鼓动和局部斗争提供一个极好的领域。这样一来,法西斯主义分子在意大利用来禁止工人阶级的最起码自由的全部立法,就必然为共产党提供鼓动并动员群众的主题。把党在这方面提出的每一个口号同它活动的总的指示联系起来,将是共产党的任务,特别要同下面一个为实践证明了的事实联系起来:法西斯主

义建立的政权不可能容忍根本的限制和被改造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趋向的政权，不发动群众性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要以发动一场内战告终。只要我们把政治性的局部要求同经济性的局部要求联系在一起，并把“革命民主”运动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个信念必然会在群众中传播。

必须做到这一点，特别是这关系到反对君主制度的鼓动工作。君主制度是法西斯政权的支柱之一；它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形式。动员意大利居民群众反对君主制度是共产党必须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之一。这将有效地揭露已经在亚文丁携手联合起来的某些所谓反法西斯集团的本来面目。然而，必须经常以反对法西斯政权的其他主要支柱（工业财阀和地主）作为配合的鼓动和斗争。而且，在反对君主制度的鼓动工作中，共产党将始终把国家形式的问题提出来，并且同共产党人打算赋予这个国家的阶级内容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不久以前（1925年6月），党通过以下列口号为其政治活动的基础而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这些口号是：“实行工农委员会为基础的共和议会；工人管理工业；土地归农民所有。”

40. 在斗争领域中把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任务，是统一战线策略的“积极”部分，在意大利目前的环境下，这是党的根本任务。共产党员必须把工人阶级的团结看作是务必要实现的具体的真正结果，以便防止资本主义企图永远分裂无产阶级并使一切革命斗争落空的计划得逞。他们必须有能力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工作以达到这个目的。首先，他们必须变得有能力接近其他党派或无党派的工人，克服毫无根据的敌意和隔阂，并在任何情况下使自己表现出是在保卫和解放本阶级的斗争中实行阶级团结的鼓吹者。

共产党人正在努力创建的反法西斯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统一战线”，其目的必须是产生一个有组织的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是

以一些团体为基础，围绕着这些团体，整个群众能够重新聚合和找到一个形式。这些团体就是今天群众自身在工厂和每一个斗争中想要建立的代表机构，因为各种工会正常行使职能的可能性开始受到了限制。共产党人必须考虑到群众中的这种倾向，并有能力促进它，发展其中的积极因素，同时反对它可能产生的排他主义的偏向，必须考虑到对任何特殊的组织形式都不能盲目崇拜，要牢记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达到不断增长的动员和力量上的有机团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能够使我们自己适应于现实给我们提供的每一个领域；利用每一条鼓动性的提纲；要根据需要和每一种组织的发展可能性，来强调这种或那种组织形式（《工会提纲》：关于内部委员会、鼓动委员会和工厂会议的各章节）。

41. 工农委员会的口号，由于主张建立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统一战线，就必须认为它是党的全部活动的综合准则。不管是为进行一个直接要求性质的斗争而动员起来，还是为了范围更广的政治行动而动员起来，工农委员会都是团结工人阶级的机构。因此，号召建立工农委员会的口号，就是一个凡是党能够通过它的活动动员工人阶级中的相当广泛阶层（不止是单独一个工厂或者一个地方的单独一个工种）的情况下，立即要付诸实现的口号。但同时，这个口号是适应于党的整个存在和活动时期的一个政治解决和鼓动口号。它使得工人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的这一需要变得明显和具体化，并在实践中同起源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所有集团的力量进行抗衡，以便在政治形势中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和占优势的因素。

42. 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为旨在揭露有群众基础的所谓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政党和团体的政治活动（策略），是同共产党如何去领导群众和如何去赢得大多数人的问题有密切联系的。由于我们与之斗争的那些集团有群众支持，以世界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形式

出现的这种策略，在我们这些集团进行正面斗争还不足以使我们取得立竿见影的深远结果的所有情况下，都是适用的。这种策略的成功，同先前实现或配合进行的对群众的联合和动员的有效程度有关系，党通过来自下面的行动实现这种联合和动员。

在意大利，只要党仍然远没有赢得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居民的大多数的决定性影响，党就必须继续利用统一战线策略。意大利的特殊条件保证中间政治组织得以生存，这些组织以模棱两可的策略为基础并受到大部分群众（最高纲领派、共和派以及统一社会党人）的消极支持。从亚文丁派垮台中很可能形成的中心集团将成为这类组织。若不是通过统一战线策略，要同这些组织代表的危险进行充分的斗争是不可能的。但是，除非同时进行这项把群众从他们的消极状态中拉回来的工作作为基础，人们不应该指望取得成功。

42.（重复）必须把最高纲领派的党的问题，放在所有其他中间组织的问题的前后关系上加以考虑；共产党是把这些中间组织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准备的绊脚石进行斗争的，并对它们采取（按情况而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毫无疑问，在某些地区，赢得大多数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同消除意大利社会党及其报纸的影响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社会党的领导人愈来愈明显地使他们自己处于充当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争取美国资本干预的运动；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实际上的团结一致）的反革命力量的地位。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完全排除他们同改良主义者结成同盟，随后融成一体的可能性，共产党必须记住这种可能性，并且必须为自己规定这样的目标，即保证（万一发生这种情况）那些仍然在最高纲领派控制下但却保有一种阶级观点的群众果断地脱离最高纲领派，并使自己同聚集在共产党先锋队周围的群众尽可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同第三国际派联合所取得的良好结

果已经教育了意大利党，在特定的条件下，运用灵活的政策，怎样可以取得在正常宣传活动和组织活动下不可能获得的结果。

43. 党在提出它的直接阶级需要的纲领和把它的活动集中在动员和联合工人阶级的力量时，为了开展它自己的活动，可以对总的政治问题提出直接解决的办法，并且把这些直接解决的办法提交给仍然支持反革命政党和组织的群众。提出这些中间解决的办法，以及围绕它们所进行的鼓动——这些都既远离党自己的口号，也远离我们想与之斗争的那些集团的因循守旧和被动消极的纲领——使我们能集合更广泛的力量作为党的后盾；使反革命的群众性政党领导人的言词同他们的真正意图对立起来，把群众推向革命解决的办法；并扩大我们的影响（例如：“反对议会”）。这些中间解决的办法不可能全部被预见到，因为它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从现实出发。但是，它们必须能够成为通往党的口号的桥梁，而且必须经常使群众懂得，如果这些解决办法能得到实现，就会加速革命进程和开始更广泛的斗争。

当所谓的民主政党同劳动居民中相当大一部分起决定性作用的阶层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如在意大利，马特奥提危机的头几个月里），以及当一个严重的反革命危险迫近的时候（在科尔尼洛夫政变中，布尔什维克对克伦斯基所采取的策略），提出这样的中间解决办法并为此进行斗争，是用来反对所谓民主政党的一种特殊斗争的必要形式，这些所谓民主政党实际上是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强的支柱之一，并同反动集团交替执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谓的民主政党实际上能够用为形势所需的一切手段进行不懈的斗争以争取民主，那么，共产党通过提出那种应当属于所谓民主政党的实际解决办法，将会取得最好的结果。这样，受到行为考验的这些政党，将在群众面前显露原形并失去对群众的影响。

44. 党领导的所有特殊斗争以及它在每一条战线上为动员和

团结工人阶级力量所进行的活动，必须汇集在一起并综合成一个容易被群众理解，而对他们又有最大可能的鼓动价值的政治公式。这个政治公式“工农政府”。它甚至向最落后的群众表明，为了解决那些使他们感兴趣的极为重要的问题，有必要赢得政权。它为把他们输送到更先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域（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提供了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鼓动的口号，但只是在象前一段论述的中间解决办法的同样意义上，同真正的历史发展阶段相符合的一个鼓动口号。除非这个口号是作为直接革命斗争的开始，即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旨在赢得政权的国内战争的开始，党就不可能设想实现这个口号。如果党把工农政府说成是同夺取政权斗争的一个真正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的话，换句话说，如果它认为这个口号表明除了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以外，有可能采取任何其他形式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解决国家问题的话，那么，党就可能使自己严重地偏离作为革命领袖的任务。

里昂，1926年1月。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21—1926)》

1978年英文版第2卷第340—375页

由中央委员会提名最后审定里昂 代表大会文件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

(出席者：葛兰西、博尔迪加、埃尔科利〔陶里亚蒂〕、里恩齐〔塔斯卡〕、莫雷利〔斯科奇马罗〕、马西莫、那不勒斯 F. (不是代表大会的代表)、卡拉布里亚、都灵1、都灵2、米兰、艾米利亚、罗马、西西里、那不勒斯、威尼托。)

主席：米兰；会议记录：埃尔科利。

在简单地交换一下关于议事日程的意见之后，决定首先总地讨论这些提纲所依据的原则，然后开始审议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提纲草案。

葛兰西。扼要地重述了作为党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草案基础的总原则。对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和1925年4月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后开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的价值提出了历史见证。今天正在进行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同卡尔·马克思在工人运动内部的活动基本上相同。今天同那时一样，这是对革命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实践中的每一个偏向进行斗争的问题。这场斗争是在意识形态、组织以及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和战略的领域内进行的。可是，在我们党内进行最充分讨论的是组织问题。这一点由下面的事实得到了说明：今天，正是在这个领域内，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策略立场的结果，对所有的同志——甚至那些极少打算作纯粹理论上的辩论的同志——看来都会感到一目了然。

党中央领导同极左派的一切意见分歧点可以归纳为3个基本

问题：1. 党中央领导同被吸收入党的大批同志之间的关系问题；2. 中央领导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3. 工人阶级同其他反资本主义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

如果想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目标的话，就必须正确地建立所有这些关系。事实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工人阶级必须成为领导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阶级；共产党必须在这场斗争中领导工人阶级；党必须按照能够完成它的这一基本职能的方式，从内部组织起来。因此，上述3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同要完成共产党的革命任务这一基本问题有联系。

头两个问题同党及其领导机构的性质问题有关。我们认为，在给党下定义时，今天必须强调这个事实，即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极左派却忽视和低估党这方面的定义，反而从根本上重视党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机构”这种看法。我们的立场来源于我们认为，人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强调党在事实上不仅通过意识形态的结合，而且通过一种“物质”性的结合同工人阶级联合在一起。而这是同党对工人阶级必须承担的任务有密切关系的。

按照极左派的看法，党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而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紧密关联的历史性和政治性的过程。不同的概念导致以不同方式确定党的职能和任务。由于党与工人阶级之间一开始就产生了裂痕，极左派的错误概念终于使党在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说服并领导他们走向革命的阶级斗争领域方面所必须完成的全部工作，都得不到重视并受到阻碍。

极左派在党的性质问题上的错误概念不可否认地具有一种阶级性。这不是说，这里存在任何倾向能促使其他阶级的影响在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内部畅通无阻，就像在社会党内部出现的情况那样；而是指对于组成党的各种成分在党内应该具有的分量，极左派

作出了不正确的评价。极左派的概念把工人和来自其他社会阶级的分子相提并论，它不关心维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极左派的概念，与认为知识分子是政治上和社会上最先进的分子，因而注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今天，在我们看来，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必须是工人自己。因此在给党下定义时，对于突出党同它从中产生的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的那部分定义，必须特别强调。

这样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关于按“基层单位”进行组织（换句话说，在生产基础上进行组织）的讨论。的确，这是代表会议之前的讨论中绝大多数同志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因此，一切对基层单位的基础上改造党组织有利的具有实效的必要论点，都已经阐述无遗，同志们对这些都是了解的。极左派提出种种反对理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克服不同行业工人之间的竞争问题夸大了；换句话说，就是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问题。的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把它作为一个党决定自己的组织形式的根本问题，则是一个错误。而且这个问题在意大利工会领域中早就解决了，经验已经表明：以工厂作为基础来进行组织，就可能最有效地反对行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切残余。实际上，如果极左派看来要作为根本问题提出并且使它担心的问题确实是意大利当前历史时期的主要问题，那么，知识分子在组织上就的确会是革命运动的先锋队。可是，情况不是这样。

第二个根本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其他反资本主义阶级之间应当建立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通过它的政策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因此，它必须获得同盟军：换句话说，它必须遵循一种政策，这种政策能使它在具有反资本主义利益的其他阶级中居于领导地位，并且在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中

对它们进行指导。这个问题对意大利特别重要，无产阶级在这里的劳动居民中是少数，而且在地理分布上，除非它预先十分正确地解决了同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不然就不能设想它能领导胜利夺取政权的斗争。我们的党必须在不久的将来特别致力于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此外，工农联盟问题同工人阶级组织及其政党的问题之间存在着相互的作用。如果前者已经接近于解决，后者就更可迎刃而解了。

工农联盟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领导面前；但是谁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同志都已完全懂得它的含义，或者都有能力去进行工作解决这个问题，而在那些最需要做好大量工作的地区，例如南方，尤其如此。极左派就是因此对人民党内的农民左派代表米格列奥利领导的整个活动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表明：极左派并没有领会无产阶级同其他反资本主义阶级之间关系问题的含义和重要性。党对米格列奥利进行工作，其目的恰恰在于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中为组成工农联盟开辟道路。罗马教廷作为反革命政治力量的问题在同样的程度上被提出来。罗马教廷的社会基础正是由农民提供的，教会势力总是把农民看作反动的后备军，总是千方百计把他们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结成的工农联盟就是摧毁罗马教廷对农民，特别是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农民施加影响的先决条件。党对米格列奥利实行的策略，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无产阶级和其他反资本主义阶级的关系问题仅仅是有关党的策略和战略的问题之一。在其他论点上也这样，党的领导同极左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领导认为，党的策略必须取决于形势，取决于旨在赢得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产生决定性影响，以便在实际上引导工人阶级走向革命。而极左派则认为，策略必须取决于形式方面的考虑，他们认为党不应当在任何时刻都提出赢

得大多数的问题，而是在长时期中应当只限于对总的政治原则作宣传活动。

党在马特奥提遭暗杀以后实行的策略以及极左派对此提出的种种批评，为意见分歧的性质和程度提供了最好的例证。的确，起初，也就是在紧接着马特奥提被谋杀以后，宪法反对派是这个形势中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它的势力主要是由工人阶级和农民提供的。因此，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发现自己站错了立场，而且在行动中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用，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冲突势力的范围中应该采取的恰当的政治立场。必须注意使工人阶级具备对于这种作用和立场的自觉性。

我们党为此目的到底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散发宣传口号，开展一场对法西斯主义和宪法反对派（亚文丁派）的思想和政治批判的运动就够了吗？不，这是不够的。在党的机构中进行的宣传和政治批判所能起到的影响范围非常有限；一般不能超出党员以外很远的范围。当时必须开展一场政治活动，而且对于法西斯主义和对于反对派又必须区别对待。事实上，极左派也说当时的形势中有3个因素：法西斯主义、反对派和无产阶级。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区别前两者，并向自己提出问题（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即如何在社会上，从而在政治上瓦解反对派，以便剥夺它在群众中的基础。党的有关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就是为了赢得这一目标。

确实，在当时，对于我们和无产阶级都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推翻法西斯主义。正是因为他们想用不论什么手段去推翻法西斯主义，群众在很大程度上跟随了反对派。而且，实际上决不能否认：如果墨索里尼政府垮台了（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手段造成它垮台的），在意大利就一定会出现一次非常深刻的政治危机，它的发展谁也不能预料，谁也阻挡不了。但是反对派势力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一开始就排除了推翻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方式，一种唯一

可能的方式，即动员群众起来进行群众性的斗争。由于排除了采取使法西斯主义垮台的这种唯一可能的方式，反对派实际上是使法西斯主义继续存在下去，而且是这个日趋瓦解的政权的最有效的支柱。好哇，由于我们开展了有关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从议会中退出来，参加反对派的代表大会；从大会中退出来）我们使这一事实真相大白于群众；而仅仅通过宣传或批判活动等等，我们的确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们认为党的策略必须经常具有我们当时策略的特征。如果党要获得成果，它就必须通过实际的政治方法把问题交给群众。

赢得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起决定性影响的问题以及工农联盟的问题，两者都同革命的军事问题有紧密联系。今天这个问题是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即在已知武装力量是在受到意大利资产阶级控制的情况下向我们提出来的。首先，有一支全国性的军队；可是，它的规模已大大缩减，其中控制士兵群众的军官百分比很高。因此，很不容易对军队施加任何影响，使它在革命时期作为同盟者。充其量（就今天可能的预见的程度来说）使军队能够保持中立。但是，除了军队以外，还有人数极为众多的武装部队（警察、卡宾枪手，国民军），无产阶级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影响他们。总之，在60多万为资产阶级服役的武装人员中，至少有40万人不会为工人阶级政策所吸引过来。因此，只有工人阶级政党进行政治斗争的结果，才能改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力量关系，这种斗争已经使党能够控制和领导劳动居民的大多数。左派的策略概念是完成这项任务的一个障碍。

在党的领导同极左派的辩论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同国际形势、同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即共产国际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极左派在这个领域里采取了一种奇怪的态度，就它认为共产国际是个事实上的组织，而与之相对立的“真正的”共产国际尚待建立这一点

来看，它部分地同最高纲领派的态度相类似。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潜伏着出现分裂的问题。而且，意大利极左派在代表大会以前的讨论（派别活动）之前和讨论期间所采取的态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审查一下我们党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处于什么地位，是有必要的。1921年，我们在共产国际的头两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和决议指示的范围内成立了党。是谁背离了这些提纲，采取了同共产国际提纲相抵触的立场呢？不是党的领导（这个领导基本上还是里窝那和罗马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而是那些拼凑成极左倾向的一伙党的领导人。这个集团的立场是错误的，而反对和谴责这个集团的党只是在继续它自己的政治传统。

在代表大会上同极左派的同志们已经进行而且将来还必须进行的广泛讨论，这是因为这些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在党内是一个派别，感到需要在一切可能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同时，他们还进行了可能导致党的基础崩溃的活动。代表大会必须谴责他们的这种活动，并且必须排除其将来重演的可能性。

这次代表大会上将要进行讨论的问题极为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意大利革命的所有问题，从而深刻地关系到我们党的发展。这次代表大会将要作出的决定要成为党在整个历史时期中活动的特征。因此，每个同志都必须认识到自己身上所担负的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职责。

博尔迪加：葛兰西对党中央领导同极左派之间意见分歧的基本点的阐述使我确信需要有一个彻底的分化。因此，极左派将提出它自己与领导上的提纲草案完全相反的提纲草案，而且极左派的提纲将使已经在党报上发表过的这部分提纲完整起来。

基本上，我们同领导上以及共产国际之间只存在一个根本的意见分歧，而且所有冲突的论点可以归结为这一点。在保留有权在全体大会上作充分

阐述的同时，我在这里将仅限于指出这些分歧的要点。

首先，关于意识形态，我们认为，我们是遵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而背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同共产国际本身谴责的唯心主义哲学观联结在一起的正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们。

关于党的性质，我们坚持认为它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机构”。关于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机构”的主张，表明了一种用统计的方法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的想法，这是机会主义偏向的一种表现。用统计方法识别党和阶级始终是机会主义的工党原则的特征之一。

我们否定关于按基层单位进行组织有助于给党提供无产阶级精神的说法。确实，我们断定这将使行会精神盛行，从而丧失党的无产阶级精神。说什么在意大利同行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已不再存在了，这是不正确的。问题就是存在着，只有作为工人阶级统一机构的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辩论这个问题时，我们看到了方法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这就是把左派的立场说成是右翼的立场。据说我们对无产阶级没有信心。嘿，这使我们回想起改良主义者正是提出这个论点来反对革命者的。今天，正如在进行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的那些日子里一样，我们反对蛊惑人心的工人主义者的乐观主义，并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偏向。

就策略而论，换句话说，就是党在特殊形势下的活动，我们认为，党的领导提出的公式非常危险。例如，现在据说为了对群众施加显著的影响，党必须“在一切形势下”同群众保持接触。这甚至已不再是列宁的论点了。列宁曾提出了关于在被看作是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个时期中争取大多数的论点。列宁把这个论点同“进攻性的”论点对立起来，换句话说，同这样一种论点对立起来，即共产党甚至在它未能控制起决定作用的一部分群众时也有可能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我们接受列宁制定的，即他为夺取政权之前的时期制定的提纲。但是，我们反对现在正在提出的这个纲领的延伸，并确实认为这种延伸是迈向机会主义的一步。而且，它是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矛盾的。这段历史已经表明，在某些时期里少比多更好些。我们对这种分歧感到惊讶。

关于国际问题，我们有意把它摆在前面，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内存在着危机。这种危机来源于：在建设共产主义政党时，并非总是遵循正确的道路。人们忘记了，有时他们必须更多地关心赢得即使在将来也不会丧失的稳定的地

位，而不是更加关心眼前的成功。在初期，人们唯一关心的是聚集力量，也不考虑它们是否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力量。随后，就必须发动一系列的清洗，而所有的共产党都必须通过深重的危机。这种状况对共产国际的当前形势也产生了反响。

策略的问题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解决的，即不是按照清楚的、准确的和不变的路线，而是按照可悲的“折衷主义”（人们用它考虑客观形势的变化来证明折衷主义是正确的）来解决的。最明显的例子涉及政治运动同工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在初期，一些具有工会性质的组织被接纳加入共产国际的行列，这样就藐视了根本的组织原则（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西班牙的工团主义者，等等）。然后成立了红色工会国际，制定了一整套行动计划，以使单个国家的工会运动加入红色工会国际；自然，有人声称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是更严重的），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或讨论，就通过了第三个时期，即为国际工会运动的有机的团结而斗争的时期。正是这种只顾眼前成功的偏见所支配的折衷主义的方法和“政治活动的”分析，把我们引向了失败。我们曾指望获得一切，但没有一件事是搞对头的，今天，我们比以往更加虚弱。

对政治问题和总的策略的这种错误的看法，同共产国际内部工作方法的基本缺点是同时并存的。在建立单个党的领导时所遵循的方法，就象依靠强制和引导的方法来进行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一样，都是错误的。在这方面，我们同意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提出的批评意见。

现在的打算是要通过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来补救共产国际中存在的危机。由于这意味着把俄国党特有的方法人为地和机械地搬到西方党里去，我们反对这个口号。通过布尔什维克化，有人正在企图以一种组织性质的公式来解决政治性的问题。例如在派别活动方面，就正在发生这种情况。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立场和我们党的中央领导的立场之间有直接相对立的立场吗？领导上已经发动了一场反对派别活动的运动，那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分裂运动。工人们已经被这种推行纯粹唯一神教派的运动排斥在外，这是一种错误的立场。派别活动的问题不能从组织和纪律方面来解决，而只能从政治和历史方面来解决。如果共产国际没有被领导好，派别活动势必会出现，因为它的根源正是在于国际组织无能解决当前无产阶级的历史问题。要不是我们

已经下定决心去避免影响党的完整的一切危险的话。那么，用我们党中央领导的那些方法去进行反对派别活动的运动就会已经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另一个根本的方面涉及到通过基层组织进行组织改造。我们反对把依靠基层建立组织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对待。而且，我们认为，就非俄国而论，组织的基础必须是地域性的，而基层组织则必须是党为了在工厂中进行工作而建立的机构。

就策略而论，我们坚持我们长期以来对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口号的批评。此外，我们还增加了对新的策略立场所作的新的批评，我们从意大利党的领导在亚文丁派问题上所遵循的策略，从德国党建议的关于总统选举的策略以及从法国党在市政选举（克利希市）所遵循的策略中，已经看到了这些新策略立场的第一批例子。这些新的策略观念同对客观形势的估计有关。就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基本上同意这个估计（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但是提议必须从中引出的策略结论和政治结论却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认为，即使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个应该被遵循的革命政策。对比之下，在支配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潮流方面，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是根据资产阶级两小部分人人为的和非马克思主义对立立场来确定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二元论被过高估计了。它乞求一部分要破坏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幽灵的帮助，并且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应当设法保护这些进步。我们认为，在这个方向所造成的错误要比相反的方向所造成的错误更为严重，这种相反的方向就是低估了资产阶级各个部分之间的矛盾。

葛兰西：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这样容易地掌握政权，部分地是因为我们党犯了上面这样一种错误。

博尔迪加：你们的错误正是过高估计了右翼资产阶级集团胜利的危险。在民主时期资产阶级左派所遵循的向工人运动让步的政策，使法西斯主义得以取胜。那些让步阻碍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形成。因此，在民主时期无产阶级的行动自由是一种反革命的条件，我们必须从这个时刻起对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左派这一幻想进行斗争，以防止类似局势的重返。你们并没有为破除那种幻想作出贡献，而是让无产阶级在其他阶级的影响下垮台。

千真万确，党不能使自己局限于仅仅改变政治信仰的工作，正象它不能

使自己局限于领导局部行动一样。无论如何，它今天必须提出明天的问题，增强自身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两种政策的反革命影响。这样，你们用来反对亚文丁派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你们在建议成立一个反对派的议会时，把自由的问题等等作为有害的问题提出来，换句话说，你们承认了反对派的领域。这意味着也在有关可能的革命发展的问题上有害于我们的处境。我们认为，事实上，如果群众从来没有看到我们同反对派之间的接触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即使反对派对法西斯主义展开了一场斗争，我们也只能有效地干预这场斗争，并使它转向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同反对派之间的任何接触，或者表面上的接触，实际上都会有助于使工人们继续处于反对派的控制之下。

就党的传统而论，左派认为，它代表反对机会主义偏向和反对中派主义斗争的传统和连续性。

我们认为，如果这些问题不首先在“国际”一级上来解决，就不能够提出行动的建议，也不能够解决意大利党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根本问题就是共产国际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把俄国共产党的经验理论化的方法是绝对不够的。相反，我们的意见是，不是根据其他国家中展开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所得出的原理，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问题本身也不能得到解决。

最近在俄国党内举行的讨论证明了这一意见的正确性。关于这一讨论我们只了解很少一点情况，但可以确定这一讨论涉及有关整个国际形势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中进行讨论，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读到俄国共产党一封表示希望不要把最近在俄共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那些问题作为其他党讨论的题目的信件时感到极为惊讶。除此以外，最近举行的讨论方式表明，允许我们作为解决目前历史时期（列宁主义）中各个党面临的一切问题的讲台是个非常不牢靠的讲台，因为甚至在人们坚持这种讨论方式的时候，他们也能象俄国的讨论中出现的那样表现出剧烈的动摇。

最后，我们认为，解决我们的危机和共产国际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发动一场对国际本身的问题的严肃的、详尽的讨论。

里恩齐（塔斯卡）。同意必须进行一次充分的、严肃的讨论。

关于博尔迪加提到的哲学问题，（里恩齐）断言，极左派关于党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机构的概念，远远不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的。而且，极左派关于党的性质的概念同它关于党必须同群众具有的关系的概念之间有

一个明显的裂缝。

毫无疑问，如果党提出在每时每刻和所有形势下“始终是”一个群众性的党，那么，“情况论”就代表一种危险。但是，赢得大多数的问题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必须考虑到，在每一种形势下，必然存在着党可能赢得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条件，而且不存在不可能赢得大多数的形势。当群众已经失去了自救的能力时，我们就赢得了群众；但是即使是在这些时刻，我们也只能在没有一刻抛弃过群众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成果。群众和党之间有着同样的命运。例如，在意大利，如果反对派的力量已经推翻了法西斯主义，难道他们能够用民主幻想去哄骗群众吗？相反，会发生恰恰相反的事情。

对形势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党的策略决定，决不能同时间的考虑分离开来。人们绝不能从时间中抽象出来。共产国际解决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提供了范例。的确，在第19条和第20条中，竭尽全力使尽可能最广泛的群众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这是对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是工会组织，也欢迎它们加入“国际”；但是，这种态度在形势被认为已经变化时也就改变了。如果脱离了总的形势，共产国际在这方面所遵循的政策也是无法理解的。

博尔迪加要求我们讨论国际的问题，这是正确的；但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必须利用共产国际各个单个支部在最近经历过的经验去加速各个党的政治经验的节奏。为了对国际经验的形成过程作出贡献，发言人迅速地回顾一下在最近时期各国党面临的一些问题。

就法国而论，我们党在提出和进行反对摩洛哥战争的运动方面犯了错误。党把自己局限于在反对战争和赞成失败主义的明显的共产党口号的基础上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党没有费心思去寻找同共产党口号没有抵触、有可能把群众重新组织在我们周围的中间口号。这是极左的错误，它对处于非常有利形势下的法国党在群众中增加的影响不大或者没有取得它应有的成功这一事实应该负责。

法国党犯的另一个错误是机械地坚持把法西斯主义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把资产阶级同社会民主党等同起来。这些错误产生了错误的策略立场。里恩齐同志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且必须对我们党内现在通用的某些措词加以修改。我不同意政治纲领中否认社会民主党是工人

阶级运动的右翼，而且反而把它转变为资产阶级左翼的这样一个论点。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统一战线的策略就会是荒谬可笑的，因为它将会是一种同一个敌对阶级联合的策略。人们坚持这种主张，实际上就认为极左派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批评是正确的。诚然，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运动影响的一种反映。确实，在领导人身上起着强烈作用的这种影响，也影响到群众的广大阶层。但即使工人运动追随社会民主党，这也并没有剥夺工人运动的阶级性或社会结构。当社会民主主义构成一个作为整个工人阶级的第二步的历史阶段时（就象英国的“工党”那样）这尤其是真实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共产党人加入工党就会是荒唐的行为。因此，我提出应当重新制定提纲中的这个论点，以避免党的基础可能把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的统一战线策略解释为是同资产阶级左翼的统一战线策略。

里恩齐同志在继续谈到德国形势和工人、农民政府时，注意到对萨克森事件的批评没有针对共产党人参加有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政府（共产国际授权参加），而是针对随后并没有在基层进行任何适当的政治或军事准备，或者为革命斗争进行任何认真的动员。他认为，参加一个外表是议会形式的政府，是内战的一个可能的插曲——一个暂时的很短的却是可能的插曲，工农政府的策略和发展就在这整个的插曲中。关于这方面，他说，如果在保加利亚实现了工农政府以阻止赞可夫掌权，那么工农政府就必须是在议会的领域内实现的。

概括地讲，发言人认为，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不能单单归结为在运用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策略中犯的错误。这些原因远为深刻和复杂，而且不能否认，一部分责任也在共产国际中央领导身上。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没有分析这些原因，对于这种用心，我是不赞成的。据说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不可能作这样一个充分的分析，因为最必要的是避免在群众中散布低落情绪。这些考虑无疑有某些价值，但除此之外，人们还必须关心向群众本身澄清无产阶级的党的策略是什么。不应当由于内部性质的问题而把这种关心置于毫不重要的位置。

至于俄国和已经在俄国党内部举行的讨论，发言人认为，俄共给西方各党的信中的措词是正确的，俄共渴望在最后这次讨论中避免发生如同第1次和第2次托洛茨基问题讨论时产生的类似事件，避免把这种冲突机械地搬到

西方党内去。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是必然使得整个无产阶级关心的问题。而且，这在斯大林向俄共代表大会的讲演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所有工人都必然会把俄国问题当作他们自己的问题。

发言人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说法被应用在俄国的目前形势，这是意义含糊的。当前俄国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于：这种经济体制使得俄国革命保证创造一些有可能使革命在欧洲和世界规模上得到扩大的条件。的确，给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以有机的基础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这种基础将使它能够抵抗一直到其他国家革命的爆发。工人们必须懂得，俄国在当前历史阶段不得不作出的让步，把俄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联系起来。在这个等待时期，需要资源，而这些是通过国家对于外贸的垄断作出的一种原始积累的方式来创造的。

关于共产国际的总形势，发言人说，博尔迪加对这个问题的表述肤浅平庸已极。必须从更广阔的观点看问题，牢记当前历史时期的特征和资本主义制度部分恢复时的特征。更需要从世界的观点来研究革命形势，也更需要认识到，如果人们考虑到革命已经取得的进步（东方人民的运动）和它通过共产国际的工作已经保持的阵地（苏维埃俄国），那么，共产国际本身的资产负债表上必然出现正数。毫无疑问，党的建设困难很大，并且受到劳动群众自身所处条件的影响。根本的问题是建立一个领导中心，以及使得各国党在外围也能够很好完成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组织的一切任务。不能否认，共产国际多少忽视了某些党内的这些问题。

在我们党内，已经开始了政治上的发展。这种发展必须是彻底的和完满的，在这里已经提出了派别的问题。派别的存在可能意味着，在最严重的时刻，在极左派立场上变得僵化了的党的一部分就不可能进行活动。如果这事发生，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危险。

那不勒斯F.（不是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他说，为筹备党代表大会而举行的讨论是一次声名狼藉的讨论，而不是一次思想讨论。极左派正是想要通过它的坚定不移的策略来赢得群众。在马特奥提时期，党的核心不知道该怎样做，只是由于从外围施加的压力它才勉强取得些微的成果。由于在《团结报》上发表的讨论内容中，左派的思想受到编辑部在文章前后所加按语的歪曲，他提出抗议。

莫雷利(斯科奇马罗):极左派和党的领导人之间进行辩论的主要问题无疑是那些关系到党的性质和为了对群众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而应该遵循的对群众的策略问题。可是,博尔迪加同志在他的干预意见中并没有回答领导上主张的那些事情,而是对从来没有人想要提出的主张和观点进行批评。也许他以为用这种方法就会使自己更好办事。

我们谁都不认为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统计上的巧合,以及每一个工人由于他是一个工人就应当成为一个党员。因此,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挨不着我们的事,博尔迪加本来可以省去这些批评。我们已经给党下了一个定义,即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清楚地解释了所指的是哪一部分,即先锋队,并且说到了这一部分必须具有怎样的品质。而在另一方面,博尔迪加同志则把自己局限于给党下了这么一个定义,即党是接受那种特殊纲领的“那些人的联合会”。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完全低估了党的群众性。按照博尔迪加那种方式的定义可以适用于任何政党。

说我们说过党“在任何形势”下都必须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这也是不真实的。可是,我们的确是说党在任何形势下必须以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作为“目标”。这两件事很不相同,博尔迪加正是应该针对后一种意见进行论战,而不应该针对他为了便于论战而归咎于我们的前一种意见。

另一个意见分歧点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去估价和利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的内部斗争和冲突。我们党内不存在这种策略,也从来没有予以应用。确实无疑的倒是我们没有接受博尔迪加的公式,根据这个公式,不管是墨索里尼还是阿门多拉掌权都无关紧要。

同样,关于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和“新策略”,从来没有人象博尔迪加所说的那样主张共产党应当实行同左翼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策略。为了从各种形势中为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利益赢得最大可能的好处,我们对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要加以区别,并且根据这些差异规定和修改我们的策略。在这方面,列宁写的和他说服党在科尔尼洛夫政变时代遵循的策略,都十分重要。必须经常考虑到党的口号和政治主张在群众中所引起的反响。例如,当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反对派的议会时,我们立刻感觉到工人们懂得这是一个革命的口号。事实上,那个口号曾使群众前进了一步,并使他们脱离自己曾经信任的亚文丁派。

从党的领导和极左派之间讨论的所有论点中看，很清楚，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分歧。在导致分歧上牵涉到两种意识形态。只要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党内并存，就不可能统一党并使党有内聚力。党必须在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基础上，也就是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那么，我们是否必须着手把不具有这一意识形态的那些同志开除出党呢？我们认为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仍然希望他们会被说服，站到我们这边来。

里恩齐同志所谈的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农政府的性质，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而完全不是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里恩齐同志基本上是重复了格拉齐亚德伊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工人政府以及在议会领域中实现工人政府的可能性的意见。我认为里恩齐的主张是错误的。而且，这一主张曾受到共产国际的一些代表大会本身的谴责。保加利亚的工农政府，如果已经建立起来了，就会成为一个领导内战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议会联盟的政府。

米兰：这个第三次代表大会必须在党内创造一种新的形势。一方面，它必须结束派别活动和标志着派别的死亡；而另一方面，它必须促使党在获得更大的政治能力方面更进一步。极左派，由于它的活动和采取的立场，对于达到这两个目标有制造障碍的趋势。但是对于极左派也同样必须有纪律。

关于自从马特奥提被暗杀以来党所遵循的策略是正确的这一事实，可以用在群众中取得的实际效果来说明。我们的影响加强了，而且仍在加强。我们可以很好地在群众中进行工作来扩大这种影响。这说明党的策略是正确的。

关于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性质，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以确切的措词提出了这些问题，而极左派则断言：如果党的策略照这些提纲确定下来，我们的组织就一定会受到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就会停止发展。

卡拉布里亚。他说，既然大家说极左派同志有一个错误的意识形态，并且坚持那些将会损害党的提纲，我们就应当不再要求他们进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我们应当要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外面。

在马特奥提危机期间，南方的农民同我们站在一起，而党的核心方面，由于不了解这个形势，就一点也没有能利用这种倾向。

葛兰西：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极左派之间正在进行的讨论不是纯粹的学术讨论。例如，极左派给党下的定义导致它犯策略性的错误。在它领导党的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它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和政党的分析也同样如此。以法西斯主义为例，当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出现并得到发展时，它是被怎样看待的呢？它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呢，还是它也是一个社会运动？当时领导党的极左派只考虑了前一种情况；这个错误的后果便是：我们本来也许可能堵住法西斯主义的前进，但没能做到。没有采取政治行动去阻止法西斯主义执政。当时的领导犯了这样的错误，即认为1921—1922年的形势可能继续下去并得到巩固，认为一个军事专政政权的出现既不需要也无可能。这一错误的估计是错误的政治分析的体系的后果（这个体系也就是博尔迪加今天用来同中央坚持的体系唱对台戏的体系），而中央委员会坚持的体系则是列宁主义的体系。

意大利形势的特点在于：资产阶级在组织上比其他国家都弱，只有在它能控制和统治农民的情况下，它才能维持政权。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斗争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使他们处于自己的政治指导之下。这是党在最近的将来必须解决的政治问题的中心点。

的确，也需要仔细研究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当然，需要研究法西斯主义本身的阶层；因为如果法西斯主义倾向于建立极权主义制度，不能用其他方式表现的一些冲突就会在法西斯主义内部趋于重新出现。党在马特奥提时期的策略始终致力于重视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我们建议建立反对派议会的目的是设法同落后群众接触，因为直到那时他们仍然处于大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控制之下。的确，南方的许多农民群众只是在我们建议成立反对派议会时才开始知道有一个共产党的存在。

关于基层组织的问题，博尔迪加同志把不同行业工人之间的

行会竞争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分歧混淆起来了。今天，主要是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分歧，而法西斯主义正是力图使政治分歧在无产阶级内部悬而未决；至于反对行会竞争的斗争，尽管必须进行，但不是主要问题。

象博尔迪加那样断言的，党组织问题对我们是以本质上不同于俄国党的方式提出来的（俄国党组织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这种说法当然不正确。博尔迪加宣称沙皇制度是一种反动的形式，而不是一种资本主义势力。这不对。只要了解1905年革命的历史以及战前和大战期间俄国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的历史，就足以否定博尔迪加的说法。

今天对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基本上同反动统治下对俄国党提出来的问题相同，这就是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一致和统一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必须在工厂基层组织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极左派鼓吹的仅仅把基层组织作为党的工作机构的解决办法是绝对不行的。今天，在党内存在着两个工作机构（工会委员会和议会党团），而它们正是党的两个最薄弱环节。不可能有任何不同时是政治机构的工作机构。如果我们使用极左派鼓吹的对基层组织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么，唯一的结果就会是：或者基层组织不再从事它们必须做的政治工作，或者将成为党出偏差的媒介物。

那么，如博尔迪加所说的，基层组织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也不对。在组织领域中，这就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的党是一个阶级的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是领导全体工人阶级去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正是需要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生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至于策略，博尔迪加同志在被迫提出他的批评的具体意见时，只限于说在运用列宁主义策略时存在着“危险”。但是运用他提出的策略，其结果同样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险。确实，我们必须考虑

党的策略对工人阶级群众产生的结果；而导致群众处于消极被动的策略必须受到谴责，这也是确实的。但是，由于党的领导对待《人民无畏》军团^①的态度的结果，在1921—1922年正是发生了这种事。那种策略尽管在一方面符合于不使党员受非党的领导所控制的需要，另一方面，却被用来使已经从下面开始了的群众运动不能进行下去，而我们本来是可以在政治上利用这个群众运动的。

断言民主形势和反动形势之间没有区别，这是荒谬的。确实，在民主形势中赢得群众的任务更为艰巨，实际情况是：今天，在反动形势中，我们正在为把党组织起来而奋斗，而在民主形势中，我们就要去为组织一次起义而奋斗。

博尔迪加：但是群众也需要准备才能进入阵地。

葛兰西：关于这一点，需要打破中间组织，而你提倡的策略办不到这件事。

博尔迪加已经说过，他赞成在革命前夕的时期去争取群众。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处在这个时期呢？不管这个时期是否开始，这恰恰有赖于我们能够在群众中进行的工作。只有在我们进行工作并在争取群众的工作中获得成功时，革命前的形势才会到来。

那不勒斯同志对开展反对极左派派别活动的运动方式提出了抗议。我认为，这个运动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正是我曾经写过，在我们目前的形势下，在共产党内制造一个派别，这是扮演内奸的角色，今天我仍然坚持这种说法。如果容忍了一些派别活动，那就必然会容忍全部派别活动。而警察局能够用来破坏革命政党的方法之一正是那种引起在它们内部出现人为的反对运动的方法。

那不勒斯同志也说过，如果领导做过一点好事的话，这是由于

^① 《人民无畏》运动是在1921年夏反抗法西斯冲锋队而兴起的。尽管它是左翼政党以外的组织，但是大批地方领导人和成员都是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当时社会党却同法西斯党人签订“和解公约”，主张不抵抗政策，谴责了这个组织。

来自地方的压力。非常奇怪的是，既然在地方上有这样强大的“左的”压力，所有这些左的力量后来竟然象争论文章的按语所说的那样，化为乌有。实际情况是，在基层并不存在一个庞大的左的运动，成立派别完全是某种人为的东西。至于马特奥提时期党在基层的政治方向则远不是左倾的。党的领导不得不作出努力把党拉向既反对法西斯主义又反对亚文丁派的立场上去。顺便说说，这是党在1923年发现自己所处的形势的一种结果，在这种形势中，党没有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因此，党在脱离群众的同时，又受到群众自身的影响，而群众则又处于其他政党的影响之下。

关于党的目前形势，我们不能抱悲观情绪。我们的党是处在比共产国际其他党更先进的发展阶段。它有一个基本稳定的无产阶级核心，它正在建立一个思想一致的巩固的中央领导。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我们党的要求必须比对共产国际其他党的要求更多一些，而且在我们党内能够和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来进行反对宗派活动的斗争。

* * *

在葛兰西的总结以后，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政治提纲草案被交付表决。专门委员会决定通过这个草案，把它作为详细讨论的基础，有3票反对（其中1票是那不勒斯F.同志投的，他不是代表大会的代表），专门委员会还否决了极左派提出的草案。

然后，专门委员会着手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提纲草案的各部分进行审议。

第一部分 前言，提纲1—3

博尔迪加。认为这几部分没有对极左派倾向给以充分的评价，这一倾向

甚至在战前就已在社会党内出现,而且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左派”。

葛兰西:社会党内不存在一个永久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倾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纲中所说的是正确的。

第二部分 分析意大利结构——提纲4—9

博尔迪加:在这部分,工业阶级的重要性被低估了,而对意大利工业制度的软弱性则过高估计了。此外,在北方,农业也已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性。

威尼托。也认为意大利工业制度的力量被低估了。

里恩齐。认为应当更加强调波河流域农业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性。农业无产阶级是一支必须加入到建设工人国家的过程中去的力量,而且是一支在意大利社会斗争各个时期内举足轻重的力量。

葛兰西:工业制度的软弱性既同它在其他国家的力量有关,又同其他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意大利的重要性有关。

博尔迪加:在提纲9中,最好提一下移民的现象。许多农民移居出去当工人。当他们回来后,就成为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一种联系。

第三部分 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政策——提纲10—14

博尔迪加:在这一部分,也许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政党总参谋部的危机。这种危机并不总是同资产阶级政治集团的内部瓦解相一致的。

埃尔科利:要紧的是,要强调由资产阶级的内部冲突和在冲突中不同集团(每一集团追逐它自己的利益)之间的力量均衡所引起的国家机构的瓦解。这个概念在罗马提纲中已经表明了。

博尔迪加:罗马提纲中的那个论点不是我写的,而是葛兰西写的。

里恩齐：必须弄清楚，使革命失败的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掌权，而恰巧相反，是革命的失败使得法西斯主义胜利了。关于由冲突中的不同集团之间的力量均衡所造成的国家瓦解的问题，必须对国家下更为准确的定义。国家除了是一个阶级统治的工具外，也是用来保证满足基本的和普遍的需要 的机器。现在，意大利 1919—1920 年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在它的活动中利用了下面这一事实：它通过国家也垄断了满足社会生活某种基本需要的物资（不管怎样，这点是做到了），这可以被称为生理上的需要物资。在革命危机时期，必须考虑到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进攻也会打乱某些社会生活方式。因此，革命斗争不能被降格为社会生活本身的反复的中止，除非人们意识到这种活动如果不导向夺取政权，可能会把广大居民阶层从可能的同盟军或中立者变为革命衰退的因素。

葛兰西：里恩齐所阐述的这个绝对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不能接受的。至于意大利国家在 1920 年时期经历的危机，它具有国家机器的领导成分之间真正分裂的性质。法西斯主义执行的是旨在防止将来再度出现这种形势的政策。在说明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以后的形势特征时，必须考虑到，尽管无产阶级从前几年的立场上退却下来，但无产阶级同武装的法西斯主义连续斗争了两年。

第四部分

法西斯主义及其政策——提纲15—18

博尔迪加：在陈述法西斯主义的镇压活动可能产生的结果时，决不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由于这个原因，形势能够立即取得某种进展。

米兰：党的思想从来没有认为形势可以立即取得进展。可是，必须坚持宣布法西斯主义镇压群众的政策 的真实后果，因为这是一个有助于抵消沮丧情绪的因素。

博尔迪加：在我看来，这些段落造成的错误在于：把作为一支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放在与中间社会阶层同样的水平和地位上。

埃尔科利：在这一点上，没有低估无产阶级对改变目前政治形势所起的作用。

葛兰西：当法西斯主义企图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施加同样的压力时，它实际上在镇压工人方面有更多的困难，无产阶级的杰出作用正是从这个事实显示出来的。因此，的确是这样，如果农民对法西斯主义孤军作战，他们就会被击败。他们只有在工人的领导之下进行战斗，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第五部分 革命的动力和前景——提纲19—22

博尔迪加：从政治和组织观点来看，必须强调农业无产阶级的的重要性。把农业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工作，应该由党的工会部而不是农村部来负责。

葛兰西：从政治观点来看，的确存在着象一串连锁环节似的某种东西，农业无产阶级依靠它成为无产阶级对农民施加影响的媒介物。

埃尔科利、莫雷利和马西莫解释说，在讨论的提纲中和党在过去的实践中，都始终以正确的态度考虑到农业无产阶级。一直由工会委员会去处理农业雇佣劳动者的组织和需要。

第六部分 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提纲23

埃尔科利。他询问博尔迪加是否接受关于党的任务的这个提法。

博尔迪加：我接受这个提法。

第七部分 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 “布尔什维克党”——提纲24

第八部分 党的意识形态——提纲25—28

里恩齐。他要求按照他在一般讨论时的意见，关于断言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左翼的这一节应当加以更改。

葛兰西。认为不能接受里恩齐提出的修改要求。如果他所主张的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有时就不能同甚至拿起武器的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了。

克里斯托弗(安贝尔-德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的确，社会民主党有时在无产阶级中有社会基础，但是由于它所履行的政治职能，它是资产阶级的左翼。

博尔迪加：里恩齐说得对。如果有人说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左翼，那么，他就必须承认统一战线策略是同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搞联合的策略。然而里恩齐说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同他说的党的性质之间有矛盾。如果人们从社会基础来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是正确的话，那么，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党。

* * *

在短暂地讨论了关于党的概念之后，里恩齐的提议被否决了。

第九、十、十一部分 ——提纲29—35

威尼托。要求博尔迪加同志详细说明极左派对党内集中制的看法。

博尔迪加：在我们看来，集中制不是起点，而是终点；换句话说，是党执行的全部政策的结果。发言人承认“大多数制度”不能作为一个准则接受下来。在特定形势下，党的领导即使在大多数人不同意的情况下也可领导党。因此，最好用“有组织的集中制”的公式代替“民主集中制”的公式。运用集中制的必要条件是：全党的组织标准必须一致。在我们党的最近时期的生活中，情况却不是这样。

莫雷利：博尔迪加的话意思很清楚。对他来说，只有在党遵循他赞成的政治路线时集中制才存在。发言人解释了党内集中制和民主的界限是什么。

第十二部分

党的战略和策略——提纲36—44

威尼托。要求对工农政府的口号和策略应当作出更好的解释。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21—1926）》1978年英文版第2卷第313—339页

《狱中札记》

现代君主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的札记

《君主论》的基本特点在于它以“神话”的戏剧形式把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学融为一体，它不是长篇大论的说理文章，而是一部“生动形象”之作。在马基雅维利以前，有关政治学的论著或以想象丰富著称，或以学识渊博见长。马基雅维利则两者兼而有之，他采取了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把理论的、理性的原理体现在作为“集体意志”的形象化和“拟人”化象征的统帅形象之中。对于追求一定政治目标的一定集体意志的形成过程，马基雅维利并不采用冗长的议论或对行动方式的原则和标准细加分类的方式加以说明，而是通过一个具体个人的品质、特征、职责和需求来加以描述的。这种手法激励那些需要加以说服的人去运用艺术想象力，并赋予政治热情以一种更为具体的形式。*

我们可以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作为索列尔的“神话”³的一个历史实例即作为一个政治思想体系的实例来加以研究，这种政治思想体系既不是一种冷冰冰的乌托邦，也不是一种高深的理

* 应该查一查在马基雅维利之前的政治学著作，是否有人在《君主论》之前采用过这种拟人化手法的其他例子。我之所以说《君主论》具有“神话”性质，也同这本书的结尾有关；因为马基雅维利在描述了理想的统帅之后，紧接着在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中向一位现实中的统帅呼吁，希望这位统帅能成为历史上理想统帅的化身¹。这种热情的呼吁贯串全书，因而使这部书具有戏剧性。卢梭在其《马基雅维利论》的序言中²把马基雅维利称作政治学艺术家，而且在某一处也曾用过“神话”一词，但这个词与上述意义并不确切吻合。

论,而是一种对于分散的人民起作用的、使他们产生并组织集体意志的具体幻想的产物。《君主论》的空想性质在于这位君主并不存在于历史现实之中,他本人并没有直接地和客观地出现在意大利人民面前,而纯粹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是领袖和理想统帅的象征;但通过非常强烈的戏剧性变化,那贯穿全书的激情与神话成分融为一体,在结尾一章向“实际存在的”大公的呼吁中简直呼之欲出了。通观全书,马基雅维利所探讨的是,一位想要领导人民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这部书立论严谨,逻辑上无懈可击,识见超脱,学术上独树一帜,临到结尾,马基雅维利同人民结合在一起,自己成了人民,但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马基雅维利通过在前面的叙述予以说服了的人民;这种人民的意识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得到表现,对此他本人是意识到的,他感觉到自己与人民的同一性。看来,整个“逻辑上”的结构无非是人民本身的反映,在人民的意识中所进行的内部说理,最后,则以发自肺腑的热情呼吁而告终。从叙述本身所产生的热情又成了“激动”、狂热、对行动的迫不及待的渴望。正因为这样,《君主论》的结尾就不是什么硬加上去的“蛇足”,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必须把它看作是这部作品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实际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而使这部著作成为一种“政治宣言”。

不妨研究一下,索列尔的神话意识形态观为什么始终只停留在工会的概念上,而不能更进一步成为对政党的认识。当然,对索列尔来说,“神话”的最充分的表现形式并非作为集体意志组织的工会本身,而是标志着集体意志已经在起作用的工会的实际行动。这种实际行动的最高成就应该是总罢工,也就是所谓“消极行动”,它具有消极的和前奏的性质(只有在各种不同意志之间的协调一致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它才具有积极的性质),对这种行动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阶段是无法预先设想的。因而在索列尔的学说中存

在着两种必要性——神话的必要性和批判神话的必要性——的冲突，“因为任何一种预先制定的计划都是乌托邦的和反动的”。这种行动最后如何收场，那只有听凭非理性的干涉，偶然性（即柏格森所称的“生命冲动”⁴）或“自发性”^{*}去发挥作用了。

但神话会是“非建设性”的吗？假如按照索列尔的设想，利用分化（“分裂”）——哪怕这种分化是暴力的，也就是说，摧毁现存的道德关系和法律关系——来使集体意志停留在其最初形成时的那种原始低级阶段上，那么这种手段又怎么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的呢？这种发育不良的集体意志会不会就此夭折而分散成无数个在当时的积极阶段上各奔前程、倾轧冲突的个体意志呢？没有破除就没有创新，对于这个问题，姑且存而不论——因为这不是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而是从实践上，也就是从政治上，作为党的纲领而说的。至于索列尔的观点，那显然是：在自发性背后有纯粹机械论的设想，在自由（意志——生命力）背后有最大的宿命论，在唯心主义背后有绝对的唯物主义。

现代君主，神话君主，不可能真有其人，也不可能具体指哪个人；他只能是集体意志已在社会上被承认，或多或少以行动表现了自己的存在，并开始采取具体形式时所出现的成分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历史已经提供了这种有机体，它就是政党。这是一种基本细胞，其中包含着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集体意志的种种胚

* 这里必须指出，柯罗齐对历史与反历史问题的提法，⁵同他在其他问题上某些思想方式之间包含着矛盾：如，他对“政党”的厌恶，以及他关于社会事件“可以预见”问题的提法等。（参见《批判谈》第1辑第150—152页，对路陀维科·利门塔尼的《社会事件的预见》一书的评论，都灵，波卡书店，1907年版）。如果社会事件不能预见，预见概念本身就是无聊，那么非理性的东西势必会占上风，人的任何组织就必然都成反历史的了，也就是说，都成了“偏见”。于是只好本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准则去个别解决历史运动所提出的每一个实际问题，舍此别无良法；这样一来，机会主义也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政治路线。（参见《文化与精神生活》上刊载的柯罗齐的文章《党是明智也是偏见》）。

芽。在现代世界中，只有那些间不容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当机立断的历史政治行动，才能由具体的个人以神话方式加以体现；之所以需要当机立断，是因为情势危急，千钧一发；同时，正是这种紧急状态使激情和狂热一下子白热化，从而把凡是足以损害统帅“天纵英明”观念的批评意见和冷嘲热讽统统消灭（在布朗热的冒险行动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⁶）。但是这种应急的权宜行动按其性质来说不可能维持长久，也不可能是有机的。一般说来，这种行动只有在复辟和改组的情况下才采取，至于建立新的国家或建立新的民族结构与社会结构则不宜采用这种手段（这一点正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有待讨论的问题，至于书中谈到复辟问题，那无非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文学笔法，借以说明意大利人是古罗马人的后裔，所以恢复罗马帝国秩序，重振国威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这种行动不可能有独创性的建树，只是“消极守成”。它的思想基础是认为现存的集体意志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陷入了一种岌岌可危但还不是最后毁灭性崩溃的境地，因而只需要把它重新加以集中和加强，——但绝不是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集体意志并把它导向具体和合理的目标，而这种目标的具体性和合理性尚未受到现实的和人所共知的历史经验的批判性检验。

* 毫无疑问，马基雅维利关于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政治观一方面受到法兰西和西班牙专制君主制大帝国的榜样和范例的启迪，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古罗马帝国的缅怀。但应该强调指出，决不能因此而把马基雅维利同文学传统混为一谈。因为建立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的必要性并不能依据文学传统来论证，它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因素；同时，这种思念古罗马之幽情是在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的背景下抒发的，所以看上去不是那么空洞，而是恰如其分。在第7章《论军事艺术》里可以看到这番话：“这块土地（意大利）看来有天生的起死回生之力，正如我们在诗歌、绘画和雕塑方面所看到的那样”，——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在军事艺术方面就不可以有再发现呢？等等。必须把这类有关的论述全部收集在一起，才能确切判明其性质。

索列尔对雅各宾派深恶痛绝，这表现了他的“神话”观念的“抽象”性（这种反感表现为一种强烈的道德上的憎恶），而雅各宾派无疑是马基亚维利所宣扬的君主的“绝对化身”。一部《现代君主论》应该有一定的篇幅专门探讨雅各宾主义（指这一概念在历史上已经取得的完全意义而言，并且从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来说也应该具有这种意义）。雅各宾主义是集体意志具体形成和起作用的实例，这种集体意志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崭新的独创性的产物。应该对集体意志以及一般政治意志下一个现代的定义：它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真知灼见，并在富有实际效果的历史剧中担任主角。

在开头的几节里，应该有一节专门探讨“集体意志”，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说，一种民族一大众的集体意志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因此必须对该国的社会结构作历史的（经济的）分析，并对多少世纪以来为了唤起这种意志作了哪些尝试以及这些尝试相继失败的原因，作出“戏剧性的”描述。为什么在马基雅维利时代，意大利没有建成专制君主国？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罗马帝国（联系语言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并了解中世纪地方自治行政区的职能、天主教的意义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对意大利的整个历史加以概述——这种概述是综合的，但必须十分确切。

为创建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而作的各种尝试之所以不断地遭到失败，其原因要从由于地方自治行政区资产阶级解体而产生的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存在中寻找，要从另外一些反映意大利国际职能（即作为教廷所在地和神圣罗马帝国嫡传苗裔）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质中寻找，等等。这种职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地位就决定了可以称之为“经济-团体”的国内局面，——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一切封建社会中最坏的、最少进步和最为停滞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始终看不到有强大的雅各宾力量的存在，始终无法形

成这样一股力量，而在其他国家里正是这种雅各宾力量唤起并组织了民族一大众的集体意志并导致现代国家的建立。形成这种意志的必要条件到底存在不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条件同与之相敌对的力量之间目前的关系究竟如何？传统的敌对力量是土地贵族，更广泛地说，是整个土地所有权。意大利所固有的特点就是特殊的“农村资产阶级”——由于地方自治行政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解体而遗留给近代的寄生者（“百市”，“沉默的都市”）。应该把那些在工业生产方面得到相应发展并具有一定政治历史文化水平的城市社会集团的存在，视为积极条件。与此同时，还必须广大农民群众踊跃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否则，民族一大众的集体意志就根本不可能形成。马基雅维利想要通过建立一支新的民兵来做到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也正是采取了这个办法；马基雅维利的这种认识，反映了一种早熟的雅各宾主义，而这也正是他的民族革命观的最早来源（或多或少是有成效的）。1815年以后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传统阶级在千方百计地防止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在以保持消极均衡为特点的国际体系中维护着“经济一团体”的权势。

《现代君主论》所必须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精神和道德的改革问题，即宗教问题或世界观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也感到，现存的传统缺乏雅各宾主义并对这种主义抱有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在哲学上的最新表现，就是贝·柯罗齐对宗教所采取的马尔萨斯主义的态度⁸）。现代君主应该是而且也不能不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宣扬者和组织者，这也就是为民族一大众的集体意志的今后发展，以全面达到现代文明的高级形态奠定基础。

这两个基本要点——一个是民族一大众的集体意志的形成，而这种意志的组织者及其积极而有效的体现便是现代君主；另一个是精神和道德的改革——，应该构成全书的骨架。必须把具体

的、各项纲领性的条目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它们应该以讨论的方式“戏剧性地”表达出来，而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学究式说教。

如果不先从经济上进行改革，不先改变社会被压迫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能不能进行文化改革？能不能改善社会被压迫阶层的文化地位？精神和道德的改革不可能不同经济改革的纲领相联系，不仅如此，正是这种纲领才是实行一切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具体形式。现代君主在自身的发展中，将彻底改革整个精神和道德关系的体系，因为这种发展恰好就等于：判断任何行动的利弊好坏，完全是以现代君主本身作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要看这种行动是有助于加强它还是反对它。在人们的意识中，君主会取代上帝或无上命令的地位，成为建立现代世俗政治并使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一切风俗习惯彻底世俗化的基础。〔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1—1932年〕

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⁹

实践哲学对政治学和历史学所作出的最基本的新贡献就是证明，永恒不变的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至于相反的概念当然是从宗教观念和先验论那里产生的），人性是历史上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也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过文献学和批判的方法予以查明的历史事实。所以，无论从具体内容上或逻辑表述上，都必须把政治学看作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有机体。但必须指出，马基雅维利对什么是政治的提法（即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下列观点：政治是一种自主的能动性，它具有与道德和宗教截然不同的自己的原则和规律，——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哲学意义的命题，因为它悄悄地引入了一种新的道德观和宗教观，也就是一种新的世界观），至今还很成问题，始终受到驳斥而未能成为“常识”。这种情况意

味着什么呢？是否只意味着精神和道德革命尚未实际发生，而只是马基雅维利头脑中略具雏形的初步设想，还没有成为公开的明显的民族文化形式？或者仅仅具有通常的政治意义，即有助于揭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鸿沟，揭示存在着两种文化即统治者的文化与被统治者的文化，揭示统治阶级同教会一样对待普通老百姓有它自己的态度，即一方面必须不脱离他们，另一方面必须使他们相信马基雅维利无非是魔鬼的化身呢？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马基雅维利在他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他本人著书立说尤其是撰写《君主论》所追求的目的又是什么？当时，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并非十足的“书生意气”，也不是与世隔绝的思想家的专利品，或知音者中间所流传的秘密备忘录。马基雅维利的风格，不是中世纪所盛行的或人道主义所习用的系统化论文写作者的风格；正好相反，这是一种行动的人的风格，这是一个致力于唤起行动的人的风格，这是党的宣言的风格。福斯科罗¹⁰所作的道德说教的解释，当然是错误的。诚然，马基雅维利揭露了一些问题，不只使现实理论化而已。可是他所揭露的目的何在呢？是道德上的呢？还是政治上的呢？一般都认为，马基雅维利所提出的政治行为准则尽管在实践中被运用着，却不为人所公开承认；据说，伟大的政治家都是以咒骂马基雅维利起家的，都自称是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其目的却恰恰是为了可以“恭恭敬敬地”把他的准则付诸实践。马基雅维利本人是不是一个倒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就是说“在道理上很精通”，一上场就稀里糊涂败阵的那种人，以至被庸俗理解的马基雅维利学说反倒教人走运呢？柯罗齐断言：马基雅维利学说是一门科学，既可以为反动派服务，也可以为民主主义者服务；就好象高超的剑术一样，正派人用以自卫，盗匪则用来杀人；正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福斯科罗的评价。这个论断从抽象上讲是可以成立的。马基雅维利自

己讲过，他所写的其实都是自古以来历代伟人所一直在实践中运用的东西，因此，他的书看来不是写给那些精于此道的内行们看的；他的风格也不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学术活动的风格；也不能认为，通过哲学思辨，他已经在政治学领域里提出了自己的论点，——这在当时就在那个领域里被认为是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以致直到今天他还遇到这种敌视和反对。

因而可以设想，马基雅维利所着眼的是“那些不谙此道的人”，他想要从政治上加以训练的正是这些人。并不象福斯科罗所理解的那样，消极地从政治上训练痛恨暴君的人，而是积极地训练那些不得不认为采取某些手段是必要的人，哪怕这些手段为暴君们所使用过，因为这些手段可以达到一定的目的。凡是出身于传统统治阶层的人，几乎自动地具有现实政治家的气质，因为他在王朝或世袭利益占支配地位的家庭环境中接受了那一套教育。因此，到底谁是“不谙此道的人”呢？是当时的革命阶级即意大利“人民”或“民族”，是从中产生出象萨沃纳罗拉和皮埃尔·索德里尼而不是象卡斯特鲁卓和瓦伦廷诺那样的城市民主派。¹¹很明显，马基雅维利竭力要使这些力量相信，必须有一位知道自己之所需、又知道如何去获得这种需要的领袖，必须热情地拥护这位领袖，哪怕这位领袖的行为与当时流行的思想——宗教相抵触或者似乎抵触。

马基雅维利本人在政治上所持的这种态度，今天又在实践哲学的场合下重演，又产生了当“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必要性，从而发展一种政治理论和技术，尽管有人坚决认为这种政治理论和技术归根到底主要是为“不谙此道的”那一方服务，因为它体现着历史的进步力量，其实还是为斗争的双方服务的。从实际情况看，立竿见影的效果是有的，就是打破建立在传统思想体系基础上的统一，不打破便无法使新生力量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也象实践哲学的政治一样，促使保守的统治集团改进传统

的政治技术。不能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而抹杀其实质上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甚至在今天也不难感觉到，为什么形形色色的人物——从耶稣会到虔信派的帕斯库阿利·威拉里¹²都反对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其缘故就在于此。〔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1—1932年〕

政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研究马基雅维利首先必须提出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政治是一门独立科学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政治学在系统的（有条理和有逻辑的）世界观中，在实践哲学中所占有的或应占有的地位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柯罗齐在研究马基雅维利和政治学中所取得的进步主要在于（柯罗齐在其他领域中的批判活动也是这样）弄清了许多虚假的、不存在的或提法不对的问题。¹³柯罗齐是以精神阶段差别说为其出发点的，强调实践阶段、实践精神阶段是自主的和独立的，但通过差别的辩证法又同整个现实有循环的联系。在实践哲学中，当然不存在什么绝对精神的各个阶段的差别，但是有上层建筑各个层次之间的差别。因此问题是要确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特定层次的政治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科学）的辩证地位。概括起来大致可以这样说，政治活动正是第一阶段或第一层次；在这个阶段上，上层建筑仍然处于纯粹是任意确定的直接状态，处于混乱的原始状态。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政治和历史，从而把存在（整个生活）和政治等同起来呢？又怎样才可以把整个上层建筑体系看成是政治范围内的各种差别，从而证明把差别论概念引入实践哲学是正确的呢？差别论辩证法，这个提法能不能成立？说上层建筑各个层次之间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对此应如何理解？应该理解为“厉

史联合体”，即自然与精神（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统一、对立（或矛盾）的统一以及差别的统一。

差别论的准则是否也可用于基础？应该怎样理解基础？在社会关系的体系中，怎样才能从历史的意义上，而不是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区分“技术”、“劳动”、“阶级”等要素？柯罗齐的立场必须批判：他为了辩论的目的而硬说基础是一种“隐蔽之神”，是一种“本体”，以与作为“现象”的上层建筑相对。至于“现象”（译者按：英语Appearances一词还有“外表，外观”等义），既指隐喻的意义，也指字面的意义。再说从表达本身来看，“现象”这个概念又是如何“历史地”得出来的呢？

柯罗齐究竟怎样从上述一般观念出发而发展了自己的关于错误和错误的实践根源的独特理论，对这个问题作一番考证是颇有意义的。柯罗齐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直接的“热情”也就是说具有个人或集团的性质。但是具有较为广泛历史意义的“热情”，作为范畴的“热情”，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成为错误根源的直接热情——兴趣乃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称为卑污的犹太人的那种要素。但是，正如卑污的犹太人的热情——兴趣导致直接的错误一样，规模较大的社会集团的热情也要招致哲学上的错误，而介乎这两者之间，则是思想意识错误，柯罗齐对此单独加以探讨。在“利己主义（直接的错误）——思想意识——哲学”这一序列中，重要的是“错误”的一般概念。这个概念同各种不同层次的热情相联系，并且不能从道德说教或烦琐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在纯粹历史的和辩证的意义上理解——即在“历史上过时并且该当灭亡”的意义上，在全部哲学都是非最后性的意义上，在“生—死”，“存在—不存在”都是非最后性的意义上，也就是后者在其前进运动中必然会超越的那个辩证概念的意义上理解。

这正是“表现”和“现象”概念的含义之所在，此外别无他义，尽

管这些概念遭到教条主义的反对,但却是言之成理的,因为它们肯定一切体系的历史必然性和合法性的同时,也肯定一切思想体系的腐朽性。(“人们是通过意识形态认识社会关系的”¹⁴——这难道不是对“现象”的必然性和合法性的肯定吗?)〔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2—1933年〕

柯罗齐的政治—热情观是排斥党的,因为他无法设想“热情”可以被组织起来并保持下去。热情总是高涨,就会造成机能亢进和痉挛,这种状态意味着不能行动。这种理论不仅不要党,而且也不要每一个事先拟定的行动“计划”。然而,党存在着,行动计划一个又一个地被制定出来付诸实践,并且常常取得极大的成功。由此可见,柯罗齐的理论是有毛病的。下列说法也是不充分的:就算党存在着,本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论意义,因为在行动时刻起作用的党同原先存在着的“党”是有所不同的。这个说法也许有部分的道理,但是,在这两个“党”之间毕竟一致之点甚多,所以可以认为,说是“两个党”,其实指的是同一个有机体。

但是柯罗齐的理论也只在应用于战争并进而说明常备军、军事学院、军官团之所以存在这一事实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要知道,正在进行中的战争也是一种“热情”,而且是最强烈最急剧的热情,是政治生活的要素,是一定政策在另一种形式中的继续。因此,有必要说明,热情怎么能变成道德上的“义务”——不是政治道德意义上的义务,而是伦理意义上的义务。

谈到同作为永久性组织的党有关的政治计划时,应该回忆一下毛奇¹⁵关于军事计划的说法。他说,制定军事计划时,只能对总的方案和核心内容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详细的部署,至于细节则无法在事先一一具体规定,因为行动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要以敌情的变化为转移。而热情恰好表现在细节之中,但这并不等于说毛奇的原则正好证明柯罗齐的理论的正确。无论如何,还应该说明

负责清醒而“冷静地”制定计划的总参谋部的“热情”是属于哪种热情。〔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1—1932年〕

如果说柯罗齐关于热情是一种政治要素的理论难以说明，也无力论证党乃至国家军队和总参谋部为永久性政治组织，那么，只有使政治同经济保持一致，才能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因为不能设想，热情可以不首先变成一种理性的和深思熟虑的见解而成为永久性的有组织的，要是那样，它也就不成其为热情了。只有同经济保持一致，政治才能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并产生经常性的组织。但是，政治同经济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要分开来谈，然后才能谈到作为行动的直接刺激因素的“政治热情”。它是在“经常性的和有机的”经济生活的基础上产生而又超越这一基础，使情感和愿望发挥作用，在这些情感和愿望达到白热化时，一切同个人生产有关的打算将统统服从一种有别于保障个人利益法则的法则，等等。〔1931—1932年〕

柯罗齐所开创的现代马基雅维利学，除了功绩以外，也必须指出它所造成的夸大和歪曲。例如，夸大马基雅维利的作用已经成了风气，把他看作是一位抽象的政治家，看作是对每个时代都有关的“政治学者”。

必须把马基雅维利看作主要是他那个时代的必然表现，并同他那个时代的条件和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确定这些条件和需要的首先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内部斗争和国家的特殊结构，它本身未能摆脱地方行政区与市政当局的残余，也就是未能摆脱成为障碍的那种封建形式。其次是意大利各国之间为了建立全意大利的均势而进行的斗争，而阻碍建立这种均势的是教皇统治和其他封建市政残余的存在，这些残余是当时具有城市国家形式而非领土国家形式的国家所固有的。第三是或多或少彼此团结一致的意大利各国为了建立欧洲的均势而进行的斗争，或者换一种说法，是

意大利境内的均势的要求与欧洲国家争取领导权的需要之间的矛盾。

法兰西和西班牙作为国家已经取得强大的领土统一的实例对马基雅维利产生了影响。用柯罗齐的话来说，马基雅维利作了一个“椭圆形的对比”，并且为建立一般的强大国家、特别是强大的意大利国家而制定了准则。马基雅维利充分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政治学体现了时代的哲学，倾向于建立民族的君主专制政体——那种能促进资产阶级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政治形式。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可以发现处于萌芽状态的分权思想和议会制度（代议制度）思想。他的“残酷”¹⁶是针对封建世界的残余，而不是反对进步阶级。君主应该结束封建的无政府状态，而瓦伦廷诺在罗马尼亚依靠生产阶级、商人和农民所做的正是这一点。假如国家元首具有军事独裁的性格（这种性格在为确立和巩固新式政权而斗争的时期是必要的），那么应该把《论军事艺术》中所提到的阶级保证看作也同样适用于一般的国家结构，因为如果城市阶级想要结束内部混乱状态和外部无政府状态，它们就应该依靠农民群众，建立一支绝对不同于雇佣军的、可靠而忠实的武装力量。可以说，这种基本的政治主张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占了主导地位，以致使他在军事方面犯了一些错误。他所考虑的主要是步兵，步兵可以通过政治活动大批征募，因此他低估了炮兵的意义。（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29—1930年）

卢索（在其《〈马基雅维利论〉序言》中）认为《论军事艺术》本身包括了《君主论》的内容，这样说固然没有错，但是他没有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就是根据《论军事艺术》这部著作，也应该把马基雅维利看成是一个不得不研究军事理论的政治家。他的片面性（还有其他一些象方阵理论之类的奇谈，给那些象班代洛所搬弄的最流行的廉价的俏皮话提供借口¹⁷）之所以产生，是因为

他的思想和兴趣并没有集中在军事艺术问题上。他只是根据他的政治大厦之所需去探讨这一问题。因此，不仅需要把《论军事艺术》一文同《君主论》联系起来，而且也要把《佛罗伦萨史》同《君主论》联系起来。这部历史著作恰恰可以用来分析在意大利和欧洲的现实条件，而《君主论》里所提到的那些直接要求正是根据这些条件才提出来的。〔1933—1934年〕

由于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同他所处的时代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这种理论附带的结果就是对所谓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或至少对其中最“坦率的”人物作出合乎历史的评价。实际上，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是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反映了他们时代的要求或反映了不同于影响过马基雅维利的条件的政治家；那种论战方式无非是在文字上以防万一的策略手腕。据我看，这些“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之中的典型人物是让·博丹（1530—1596）。1576年他是布卢瓦等级会议的代表，在会上，他说服第三等级拒绝提供内战所需的追加经费。*

在法兰西内战时期，博丹是第三党即所谓政治家的党的代表人物，这个党捍卫民族利益的观点，也就是捍卫国内阶级均衡的观点，因为在这种均衡中，领导权是通过君主制度才属于第三等级的。在我看来，把博丹列为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极端肤浅，非常轻率的。博丹为法国的政治学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所处的环境比在意大利的环境远为先进，也远为复杂。在博丹看来，问题不在于建立领土上统一的（民族）国家——即回到路

* 博丹的著作有：《历史简易研究法》，该书出版于1566年，其中有关于气候对国家形式的影响的论述，也隐约地提到了进步思想等等；《共和国》，出版于1576年，其中阐明了第三等级对专制君主制的看法，以及专制君主制同人民的关系；《七人党》（晚近才出版），书中对各种宗教都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唯一明智的自然宗教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的存在是合理的，同样值得尊重，应该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它们。

易十一的时代——，而在于必须使这个已经强大和大为巩固的国家内部彼此斗争着的社会力量取得均衡。博丹所关心的是协商一致，而不是力量问题。在博丹身上有一种发展专制君主制的倾向，因为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力量和自己身价的第三等级非常清楚地了解专制君主制的命运是同它本身的命运以及它本身的发展相联系的，因此它对它的忠诚提出了条件，它提出要求，尽力去限制专制制度。在法兰西，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已经在为反动派服务了，因为他的学说，用伯特兰多·斯帕文塔¹⁸的话来说，可以用来为“让世界永远处于‘摇篮’之中”这个说法辩护。因此，在论战时，就必须采取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立场。

必须指出，在马基雅维利所研究的意大利并不存在象法国等级会议那样已经发展并在国家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代议机构。在现代，有人倾向于认为意大利的议会制度是从国外输入的¹⁹，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只反映了15世纪至17世纪意大利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落后与停滞状况，而这种状况的造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关系压倒了已经麻痹和僵化了的国内关系。一个民族的“创造力”真的被国外输入的议会形式消灭了吗，即在半封建时期，意大利的国家结构由于外国的控制就成为外国宗主权的对象了吗？事实上，议会制度给民族解放进程以及一个现代化的（独立的和民族的）领土完整的国家过渡提供了一种形式。不仅如此，意大利确实有过代议机构，特别是在南部和西西里，但其作用远远不如法国，因为这些地区的第三等级发展不大，所以这种议会就成了贵族鼓励无政府状态以反对君主国试行改革的一种工具；在缺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君主国就不得不依靠群氓²⁰。* 这说明，如果

* 应该再读一读安东尼奥·帕内拉对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研究，一共有11篇文章，发表在1927年（也许是1926年？）的《佛罗伦萨之狮》上，注意作者是怎样通过同马基雅维利的对比来评价博丹的，以及怎样一般地提出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问题。

考虑到,在法国,要不是先有表明自耕农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要性的重农主义文化的出现,就无法说明雅各宾主义之由来;那么对于马基雅维利为什么只能用军事术语来表达他的纲领和他把城市与农村联系起来的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吉诺·阿赖斯研究了马基雅维利的经济理论(载于米兰的波科尼大学《经济年鉴》)。但是试问,马基雅维利真有什么经济理论吗?人们不得不这样想:会不会是马基雅维利的实质上是政治的语言被译成了具有经济概念的语言,并把它归结为经济体系。是否应该这样考虑:生活在重商主义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方面超越了自己的时代,预先想到了某些后来为重农学派所正式提出来的要求。*(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1—1932年)

政治要素

必须强调指出,正是第一位的要素即最基本的东西首先被人所遗忘。另一方面,它们却无数次地被重复,成为政治与任何集体行动的支柱。

第一个要素是,确确实实存在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整个政治学和全部政治艺术都建立在这个基本的并且(在某些特定的一般条件下²¹)不能缩小的事实上。关于这一事

* 同样,如果没有重农主义文化,会不会有卢梭?我以为,如果认定重农主义者只代表农业利益,城市资本主义的利益只有在古典经济学问世后才被发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重农主义学说是同重商主义及行会制度的决裂,标志着走向古典经济学道路上一个阶段。我还以为,正因为这一点,重农学派才代表了一个比他们所反对的现实社会以及所直接描绘的未来社会要复杂得多的未来社会。重农学派的语言受到极大的时代限制,反映了城市与乡村的直接对立,尽管如此,这种学说还是包含着资本主义将向农业发展的预见。“放任自由”的公式只是说要求有办工厂办企业的自由,当然同农业利益没有关涉。

实的起源，是一个需要个别研究的特殊问题（至少是可以而且必须研究怎样把这个事实减少到最小限度，并且通过改变可以认为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某些条件来把它消除掉）。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存在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从这一事实出发，必须考虑，怎样才能实行最有效的领导（假设目标是明确的），又怎样才能最好地培养领导者（这正是政治艺术和政治学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要使被领导者或被支配者俯首听命，就必须懂得怎样寻求抗拒最小或最合理的办法。培养领导者的基本前提是：人们是否认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会始终存在，还是客观会创造条件使这种划分不再成为必要？换句话说，基本前提究竟是哪个：是认为人类的这种划分是永存的，还是认为这种划分只不过是与一定条件相适应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必须认清，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划分——尽管这种划分归根到底产生于社会集团的划分——，照目前情况看，实际上在同一个集团内部也是存在的，即使该集团成员的社会成分是清一色的，也概莫能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讲：这种划分是分工的结果，完全是技术造成的事实；而那些只从“技术”角度看问题，把一切都归结为“技术上的”必要性等等的人，就会利用这种不同原因的同时存在进行投机，以便回避根本问题。

既然在同一个集团中也有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划分，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些原则确定下来，严格遵循，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最严重的“错误”，暴露了最要不得也最难于纠正的弱点。人们通常认为，既然是同一个集团，就一定会自动地服从，因此不仅认为没有必要证明服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还认为这必然是绝对的服从。（有的人确信这一点，而且更糟糕的是根据这种信念去行动，认为毋需提出要求，用不着指明前进的道路，人们也“将会”服从。）例如，很难彻底纠正领导者的“卡多纳主义”²²或下面一种

认识，即事情之所以这样进行，是因为领导者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和明智的。如果不照此办理，就“归罪于”那些“当事者……”以及诸如此类的做法。同样也很难根除那种由于疏忽大意而造成无谓牺牲的恶劣作风。而常识表明，集体（政治）行动的失败大部分是由于不设法避免无谓的牺牲或者对别人的牺牲无动于衷，甚至公然拿他人的生命去冒险。每个人都从前线归来的军官口中听说过，在很必要的时候士兵们确实不怕牺牲，相反地，当士兵们看到他们的生命不受重视的时候，就起来反抗。例如，一个连队能够忍饥挨饿好几天，但要是由于疏忽或官僚主义等原因，哪怕耽误一顿饭，他们就要进行反抗。

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一切要求牺牲的行动。因此，在每一次失败之后，首先必须追究领导者的责任，这是指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者而言。（例如，一条战线由好几个防区组成，每一个防区有自己的领导者。可能一个防区的领导者对个别失败所负的责任比另一个防区的领导者要大些。但是这决不能开脱其他领导者的责任——问题只在责任的大小。）

既然提出了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有支配者与被支配者这一原则，那么，毫无疑问，到现在为止党是培养领导者和发挥领导能力的最有效的方式。（党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名称下出现，甚至在反党的和“否认党”的招牌下出现。甚至所谓的“个人主义者”实际上也是在拉帮结党，不过他们是想凭借神的恩典或利用他们的追随者的愚昧而成为“党的领袖”。²³）

需要发展包含在“国家精神”这个名词中的一般概念。²⁴这一措词具有十分精确的、在历史上已被确定的意义。但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任何一次重大运动中，也就是说，在并非是个人的任意表现、而是表现了多少是正当的个人主义的那种运动中，有没有某种同被称为“国家精神”相类似的东西？同时“国家精神”的概

念无论对过去、对传统或对将来,都含有“连续性”,也就是说,是假定任何行动都是那个开始于过去并继续于将来的复杂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对这一过程负责,对参加这一过程的人负责,对那些在物质上虽然“看不到”、但仍然感觉到在活动和起作用的——被认为似乎物质上是“实体的”和现存的——力量共同一致负责,这才是在一定场合下称之为“国家精神”的东西。很明显,对“持续性”的这种理解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不应该超越一定的界限。我们假定最狭小的界限是上一代和下一代。而这段时期不算短了,因为不能只以30年,即分别地以前30年和后30年来计算各代,应该有机地来加以计算,至少就过去而论是容易理解的;我们感到自己同现在年事已高的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对我们来说,他们代表着过去,而这种过去在我们中间还活着,我们必须知道这种过去,必须对这种过去进行清算,这种过去是现在的要素之一,也是未来的前提之一。我们也感到自己同儿童,同正在出生、成长的一代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他们,我们是负有责任的。(对具有倾向性意义的传统的崇拜则是另一回事,它含有一种选择和一个明确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但假如可以说人人都具有这样的“国家精神”,那就必须时时反对对它的曲解或违背。

有“为行动而行动”,为斗争而斗争诸如此类的情况,而且特别有一种自私而小气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管怎样说只是不择手段地满足一时的冲动等等。(事实上,问题仍然是那些采取各种美妙和奇异形式的意大利“非政治倾向”。)个人主义只是一种没有人味的非政治倾向;宗派主义也是一种非政治倾向,如果仔细地加以考察,它是一种只知追随个人〔随从〕、缺乏作为“国家精神”基本组成部分的党的精神的非政治倾向。证明党的精神是国家精神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是应予坚持的最迫切的重要任务之一。另

一方面，个人主义是一种非人性的成分，它“招外国人喜欢”就象动物园里的动物招人喜欢一样。〔1933年〕

政 党

上面已经说过，如果在现代写一部新的《君主论》，其主人公不会是一位英雄人物，而只能是一个政党。具体点说，是在各个不同时期，在各个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内部关系中，致力于建立一个新型国家的那样一个党（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政党，这是历史的要求，理智的要求）。

应该注意的是：在那些自称为极权主义²⁵制度的地方，王权机构的传统职能事实上是由该特定的党来执掌的。这个党之所以是极权的，正因为它执行了这种职能。虽然每一个政党都代表社会集团而且仅仅是代表着一个社会集团，可是某些政党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之所以只代表一个社会集团，是因为它们在本集团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之间履行着一种平衡的和仲裁的职能，并确保它们所代表的那个集团在同盟集团的赞助下得到发展，如果这些社会集团不明目张胆地同该集团对敌的话。规定国王或共和国总统“统而不治”的宪法准则是这种仲裁职能的法律表现，也是立宪党派希望不要“触动”国王或总统地位的表现。规定政府行动不由国家元首而由他的部长们来负责的这个宪法准则是一种诡辩，其中包藏着这样一个总的原则：维护国家统一，不问由谁来主持政府，也不问由哪个党执政，被统治者必须赞同国家的活动。

对于极权的政党，这些准则就失去意义，而根据这种准则履行职责的机构就不那么重要了。但党本身却体现了这个职能，它赞扬抽象的“国家”概念，并且用种种办法让人感到，它作为一种“不偏不倚的力量”正在主动而有效地行使着这种职能。〔1933—1934

年；最初叙述于1930—1932年）

对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来说，狭义的政治行动是不是一种必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世界上，在好多国家里，有机的、主要的政党出于斗争的需要或别的原因而不得分成几派，每一派都自称是一个“党”，甚至是一个独立的党。而有机的党的精神总参谋部不属于这些派别中的任何一派，好象是一个站在各党之上的独立存在的领导力量而活动着，连公众也是这样看待的。假使从下列观点出发，即认为一种报纸（或几种报纸）、一种刊物（或几种刊物）也是一个“党”或一个“党内的派别”，或起着一种“特殊政党的作用”，那么对于以上所说的精神总参谋部的作用问题就值得认真研究。因此需要考虑一下英国《泰晤士报》所起的作用，以及意大利《晚邮报》²⁶ 所曾起过的作用。同样需要考虑一下自称为“非政治性的”所谓“通报”²⁷ 甚至体育报刊和专业性报刊所起的作用。同时，在那些极权政党独占统治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展示了一些很耐人寻味的特点，因为这种政党不再直接地履行政治职能而只执行宣传和社会秩序专门性职能，在道德与文化教育方面有影响。政治职能是以间接方式来履行的，因为如果没有别的合法政党，那么事实上总会有另外一些用合法手段压制不了的政党和派别存在。要想对它们进行论战和斗争，那就会象捉迷藏一样。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这种党派控制着文化职能，这意味着政治语言变成了行话。换句话说，把政治问题打扮成文化问题，因此是无法解决的。

但是也有一个传统的政党在实质上具有“间接的”性质，换句话说，它明显地仅仅以“有教育”（“木材不发光”之类²⁸）、有道德、有文化的（原文如此）面目出现。这里所讲的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同时，甚至所谓直接行动（恐怖手段）也被看作是用实例进行的“宣传”。这种情况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支持那种意见，即无政府主义

运动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于其他党派的外围的，“目的是教育它们”。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每一个有机的党所固有的。（有智力或有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大党的这种“外围活动”的一个方面吗？）“经济主义者流派”²⁹本身就是这种现象的历史表现。

因此，似乎存在着否定这种直接政治行动的两形式的党。第一种形式的党，它可以由一部分有文化的杰出人物组成，他们的职能是为彼此相近的党（这些党在实际上是同一个有机的党的派别）的巨大运动提供文化的和一般思想意识性质的指导。第二种形式的党，晚近以来，这种党可不是由一部分杰出人物而是由群众组成了，而群众的政治作用不是别的，正是象军队一样一般地忠于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中心（公开的政治中心往往是受那些不愿意在公开场合露面，而只是通过代理人和“代理意识形态”而间接活动的力量所控制的机构）。³⁰至于信徒群众，无非是一种供“摆布”的对象，利用道德说教，感化他们，利用救世主的神话告诉他们，他们盼望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到那时候，现在的一切矛盾和痛苦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圆满解决，使他们皆大欢喜。（1933年）

写一部党的历史，实际上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比起罗伯特·米歇尔所设想的要复杂的多，尽管他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党史应该有哪些内容？是否只是单纯地叙述一下政治组织的内部生活，政治组织的产生情况，建党以前出现的第一批小组的情况，在党的纲领、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意识形态论战呢？当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只会写成一部关于某些知识分子集团的历史，有时甚至会写成一部个别人物的政治传记。因此，内容的范围应该是更广泛和更丰富。

党史应该写成特定群众的历史，因为这些群众追随过党的创始人，以自己的信赖、忠诚和恪守纪律支持过他们，或者在他们对

某种首创精神表现出消极或被动的时候，“现实地”对他们进行过批评。但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群众看成只是党员组成的群众呢？是不是只注意代表大会、选举等等，也就是说只注意党的群众表现自己意志的一系列活动和生活方式就够了呢？十分明显，也应该考虑党是其表现并且是其最先进部分的那个社会集团。换句话说，党史只能是特定社会集团的历史，但是这个集团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有朋友，有与它相近似的集团、对手和敌人。不管哪一个党的历史，只有通过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往往还有国际上）的复杂场景的描述，才能得到清晰的反映。因此，可以这样说：写一部党史就等于以专题性的观点去写一部整个国家的历史，以便突出这个国家的某一具体侧面。衡量一个党的重要性的影响有多大，完全要看它本身的具体活动在决定一个国家的历史方面究竟起多大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党史写作方法本身就表明它的作者对于党是什么和党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问题的看法。宗派主义者对党内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实会感到激动，因为这些事实对他具有秘密的意义并且使他满怀神秘的热情。一个历史学家固然在整个情景范围内给每一个事件以应有的评价，但他总是把重点放在党的全部实际能力上，放在党的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的决定性力量上，由于这种力量，党才能左右局势，使某些事件得以实现并防止另一些事件发生。（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2年）

关于什么时候可以认为党真正定型，也就是说有了明确而固定的目标，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遗憾的是甚至往往产生一种自满，其可笑和危险程度不亚于维科所谈到的“民族自满”³¹。我们固然可以这样说：党永远也不会彻底定型和完成，但这是指每次进展都提出新的任务和责任而言，而在某些党看来，也是指下面这种怪论可以成立：到了这些党不再存在，也就是到了它们的存在

在历史上成为多余的时候，这些党才算彻底定型和完成。这样看来，每一个党既然只是阶级的专门名词，那么，不言而喻，一个提出消灭阶级划分的党只有到它停止生存的时候，它才达到了彻底的自我完成，因为阶级不再存在了，从而阶级的体现者也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这里我想要指出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刻，这一时刻随着下面的情况而到来：在那时，某些事物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这是指它的存在尚未成为“迫切”需要而言，但它的存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有非凡意志力和忘我干劲的个人的存在。

在什么时候党才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呢？是它的“胜利”条件，即它必然发展为国家权力的条件至少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并且使人能够预见到这些条件尔后的发展——一切正常——的时候。但什么时候可以说，在这些条件下一个党不会被人以普通手段消灭掉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发挥下面这个论题：为了使党存在，必须同时具备3个基本要素（也就是3组要素）。

（1）由平凡的普通人所组成的群众要素。他们的参加并不在于表现出什么创造精神或组织能力，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诚。没有他们，党固然不能存在，但如果仅仅由他们组成，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必须有人去把他们集中起来，组织起来，训练他们遵守纪律，只有这样他们才成为一支力量：假如没有这种内聚力，他们就会分散成不起作用的一盘散沙，从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能否认，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种内聚力。不过我在这里所谈的只是他们不是这种力量而且情况也不允许他们成为这种力量时的情形，以及即使他们是这种力量，那也只是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还不足以在政治上发挥重大影响时的情况。

（2）主要的内聚性要素，它把各种各样原来被认为是无足轻重或毫无价值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起来并使之成为有效的和

强大的力量。这一要素具有强大的内聚的、集中的和纪律的力量，除此以外——实际上，这也许是其他力量的基础——这一要素还具有革新的力量（不言而喻，这种革新具有一定的方向，依照力量的一定路线，依照一定的前景，甚至一定的前提进行的）。当然，党也不能单靠这一要素而形成起来，可是它对党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却大于上述第一个要素。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建立一支军队确实要比造就将领容易。一支已经存在的军队，如果失去将领，就要垮台。反过来说，如果有一批彼此了解，互相配合，目标一致，同舟共济的将领，那么即使原来没有军队，也会很快地建立起一支军队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3）中间要素，它会把第一个要素同第二个要素结合起来，它会使它们彼此之间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道德和精神方面建立联系。实际上，每一个党都存在着这3个要素之间的“固定比例”。当这些“固定比例”实现的时候，就达到最大的效果。

从这些考虑出发，可以说，在下述场合下，就不可能以普通手段把一个党消灭掉：存在着第二个要素作为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第二个要素，任何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的产生是由于存在着客观的物质条件，哪怕这些条件还不巩固，还不稳定，但如果其他两个要素无法形成，那么一个党可能被人以普通手段消灭的时刻就会到来，也就是说，第一个要素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第三个要素作为自己的继续和本身表现的手段。

要想使这一切都实现，应该具有坚定的信念：对生死攸关的问题作断然处理是必要的。没有这种信念，就不能形成第二个要素，而这个要素，由于为数不多最易被消灭，但必须使这个要素甚至在被消灭的时候，也能留下酵素作为继承物，以便使它复生。但是这种酵素除了在第一个要素和第三个要素里面之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更好地依存和更好地形成呢？因为它们同第二个要素在

性质上显然是最相近的。因此，第二个要素的主要活动应该放在制造这种酵素上面。衡量第二个要素的标准应该是：第一，它的实际活动；第二，它为对付有可能被消灭而作的以防万一的准备。很难说这两个标准哪一个更为重要。因为，在斗争中可能遭到失败是必须时刻正视的现实，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其意义之重大，也就不亚于为迎接胜利而作好准备了。

谈到党的“自满”，可以说它比维科所说的“民族自满”更为危险。为什么？因为一个民族不能不存在，而且在它存在的事实本身中经常可能（也许是由于天良不泯和诵经祈祷）发现它的存在是命中注定的，是有深刻意义的。而一个党则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停止其存在。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的是：在民族之间的斗争中，每一个民族都希望另一个民族因内部斗争而削弱，而政党恰好就是这种内部斗争的因素。这样一来，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党究竟是由于本身的力量，由于本身的必要性而存在着，或者，相反地，只是为别人的利益服务而存在着（的确，这一点在论战中从来没有被人忽略过。相反地，它甚至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老问题，特别是在作出不容置疑的答复的时候。而这也正表明这个问题曾引起怀疑而且仍然受到怀疑）。谁要因为这种怀疑而苦恼，当然是蠢才。这个问题在政治方面仅仅具有短时间的意义。在所谓民族原则的历史上，外国干涉有利于国内党派扰乱敌对国家内部制度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就拿加富尔的“东方”政策³²来说吧，就很难确定，这个所谓的“政策”，究竟是指一个永久性的行动方针，还是指1859和1866年以前那个时期为了削弱奥地利而玩弄的策略。同样地，人们从18世纪70年代初的马志尼运动中（例如，在巴尔桑蒂的事件³³中也能够看出俾斯麦的干涉。当时，俾斯麦密切注视着对法国的战争，警惕着法意同盟的危险，希望借助内部冲突来削弱意大利。对于1914年6月发生的一些事件，有些人也是这样联系到即

将爆发的战争而认为是奥地利总参谋部的干涉。可见，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观点。假设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始终在让他人得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对自己有利，换句话说，就是要果断地去争取胜利。无论如何，必须鄙弃党的“自满”，而代之以依靠具体事实。凡是愈来愈“自满”或者宁愿自满而不顾具体事实的人，肯定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不屑多说，党应该避免做出使别人得利的事，哪怕这样做“证明是正当的”也罢，尤其假如这个“别人”是指一个外国的话。至于有人要进行投机，那是谁也无法预防的。

很难否认，所有的政党（无论是代表统治集团的或代表从属集团的）无不同时执行着一种警察职能，即保卫某种政治法律秩序的职能。如果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话，那么就应该按另一种措词来提出问题了，换句话说，这应该同借以实现这种职能的方法和步骤有关。这种职能的目的是镇压还是说服，换句话说，它具有反动的性质还是进步的性质？该政党执行自己的警察职能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那个表面的、外来的、限制历史生命力的秩序呢，还是在其政治与法律制度中以纲领形式反映出来，努力把人民提高到新的文明阶段呢？事实上，法律可以找到这样一些破坏它的人，首先在被法律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反动的社会分子中间有人破坏法律，其次，在受到法律压制的进步分子中间有人破坏法律，第三，在那些没有达到法律所能代表的文明水平的分子中间有人破坏法律。因此，党所执行的警察职能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退步的；当旨在把已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动力量约束在合法性范围内，并把落后群众提高到新的合法性的水平上时，它是进步的；当尽力压制历史的生命力并且维持已经过时的、反历史的、成了外来的合法性时，它就是退步的。此外，衡量一个党的标准是它的行使职权的方式：如果党是进步的，它就会“民主地”（在民主集中制的意义上）

行使职权；如果党是退步的，它就会“官僚主义地”（在官僚集中制的意义上）行使职权。在第二种场合下，党就成了简单的、缺乏判断能力的执行者，从而成为一个专门性的警察组织，而它的“政党”名称只不过是一个具有神话性质的隐喻而已。〔1933年〕

有一个问题：大工业家有没有自己固定的政党？据我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工业家在轮流利用现有的一切政党，但是他们本身却没有自己的政党。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是“不可知论者”或“不关心政治者”。他们关心的是保持一定的力量对比，他们完全根据政治棋局的变化，用自己的资金去轮流支持这个或那个政党，以造成这种力量对比（不用说，只是敌对的政党除外，因为即使从策略上考虑，他们也不能促使这种政党得到加强）。当然，这都是在“正常”时期发生的情况，但如果在非常时期（这是指国家生活中的重大变故，例如战争），那么地主的党也就成了大工业家的党，地主是有自己固定的党的。在英国可以找到证实这种说法的例子：那里的保守党吞没了自由党，尽管后者从传统上来说一直是以工业家的党的面目出现的。

拥有庞大工会的英国情况能说明这一事实。的确，在形式上英国并不存在反对工业家的大型政党³⁴，但是那里却有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而且必须注意到在一定的紧要关头他们是如何打破官僚主义的甲壳，对他们的宪法彻底地进行改革的（如在1919年和1926年）。另一方面，地主和工业家有着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经常性利益（特别是现在保护主义盛行，已经普及到农业和工业的今天）。还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即地主在“政治”上组织得比工业家要好得多，他们吸收的知识分子更多，他们所发布的指令更富有“经常性”，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象英国的“自由激进党”³⁵、（完全不同的）法国的“激进党”甚至寿终正寝不久的意大利的“激进党”³⁶这些传统的“工业”党是什么样的政党，它们的命运又是怎样

的呢？这些政党不是由单独一个大阶级而是由各个大小阶级联结而成。这就是它们之所以具有不同经历和不同结局的原因。它们的战斗部队是由小资产阶级提供的，而这些小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在这种联结关系没有完全转化以前处于经常改变的条件之中。今天它们为什么会成为“蛊惑性政党”³⁷的部队，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一般地可以这样说：在这样的政党史中，把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进行对比，对于查明这些政党所以发生转向的原因，是很有启发性的，并且可以由此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也适用于对“传统主义”国家的政党论战的研究——可以从这些国家的整个历史“目录”里找到这种“遗迹”。

世界观和实际态度：全局的和局部的

评价任何世界观，特别是评价任何实际态度，一条最基本的标准是：能不能把某种世界观或某个实际行动设想为“孤立的”、“不受制约的”，单独地肩负集体生活的全部责任？还是说不能这样设想，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对另一种世界观或实际态度的“吸收”或完善——或抵销？细想一下就可以看出，这条标准对于合理评价思想和实践方面的变化是决定性的，同时也可看出，这条标准实践起来有不少具体困难。

最流行的图腾之一，就是对一切存在的事物抱这样的看法：认为万物是“天生”的，所以不能不这样存在，不管人们作出多大努力锐意改革，也无法阻挡生活的正常运行，因为传统势力总是在不断地起作用，一心想要维持生活的正常运行。当然，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否则就糟了。但是，如果超出一定的范围，这种思想方法就会变成危险的（有某些“最有害的政策”为例证³⁸），幸亏还有前面

提到的那条标准,可以作为进行哲学的、政治的和历史的评价的标准。仔细观察一下便可看出,某些运动只把自己看作是外围的;也就是说,这些运动是以一个主要运动的存在为前提的;它们配合这个中心共同来对某些预想的或实际的弊端进行改革。换句话说,这些运动纯粹是改良主义的。

这一原理在政治上十分重要,因为每当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原先以“独立的”党的面目出现的各个政治集团就会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联盟,这一事实证明每个阶级都有一个代表自己的党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原来存在的那许多集团在性质上完全是“改良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们所关心的只是局部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分工(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益的)。但每个集团都以另一个集团的存在为前提,因此,一到紧急关头,也就是真正触及根本问题的时刻,这些集团就能实行联合,结成联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建立政党必须使之“坚如磐石”;而不要在一些次要问题上打圈子,力求上下级之间、领袖与群众之间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假如领袖在关键时刻对自己的“真正的党”弃置不顾,那么群众就会惊惶失措,失去斗志。可以这样说,现实中的任何运动对全局的认识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通过经验逐步取得的,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下列事实,领悟到这个道理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天生的”(不要从这个词通常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其所以存在是由于某些条件的存在,这些条件一旦消失,不可能不(对该事物的存在)带来影响。于是运动就会失去“随波逐流、与世沉浮”的特点而不断改进,那就是说,它在为某些结果的产生创造必要的前提,而且真正地把全部精力用于创造这些前提。〔1933年〕

关于“经济主义”在理论和 实践上的几个问题

经济主义——自由贸易主义的理论运动——理论的工团主义。³⁹ 必须研究理论的工团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导源于实践哲学，又在多大程度上导源于自由贸易主义的经济学说——归根到底也就是自由主义。因此必须研究，经济主义，在其最发达的形态上，究竟是不是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产物，就其起源而论，同实践哲学根本没有什么渊源——即使有点联系，那也只是外表上的、纯粹术语方面的联系。

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去研究伊诺迪同柯罗齐就柯罗齐所写的《历史唯物主义》(1917年)新版序言而进行的论战。⁴⁰ 对于伊诺迪所提出的必须重视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哺育下所产生的经济史文献的要求，可以这样来满足：指出这种文献由于在外表上易于同实践哲学相混，于是产生了经济主义；因此，当伊诺迪批评(老实说，很不中肯)某些经济主义的蜕化变质现象时，他忘记了一条古老的格言：切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由贸易主义同理论的工团主义在思想体系上的联系在意大利表现得特别明显，兰齐洛之流的工团主义者对帕雷托的吹捧是人所共知的。⁴¹ 不过这两股思潮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属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后者属于目前仍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集团，这个社会集团至今也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可能性以及自身发展的途径，因而不知道如何来摆脱这种原始状态。

自由贸易主义运动是以错误的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这种错误理论的实践根源是不难弄清楚的；它是以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划分为出发点的，把这种划分看作是并且表述为有机的划分，其实

这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划分。因此硬说经济活动属于市民社会，国家不应干预对经济活动的调节。然而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市民社会同国家并不能彼此分家，必须认清自由放任也是一种以立法和强制手段加以推行和保护的国家“调节”。这是一种目的明确、深思熟虑的政策，而不是什么经济事实的自发的、自动的表现。因此，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乃是一个政治纲领，目的在于——如果一帆风顺的话——改变国家领导人员的人选，改变国家本身的经济纲领——换句话说，就是要改变对国民收入的分配。

理论的工团主义情况不同，这里面所涉及的是一个从属的社会集团。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这个从属集团不可能在未来变成统治集团，也就是说，它在自身的发展中无法越出经济一团体阶段而进入取得市民社会的伦理—政治领导权阶段，从而上升为国家的统治集团。至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它所涉及的是统治阶级中的某个派系，他们所希望改变的并不是国家的结构，而只是政府的政策；他们希望改革贸易立法，但对工业立法希望只通过间接方式实行改革（不能否认，保护贸易制度，特别对那些市场狭窄的国家来说，会限制创办工业的自由，而且有助长垄断组织产生的副作用）。他们最根本的要求，说到底还是统治阶级各党派轮流组阁执政，而不是建立和组织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更谈不上建立和组织一个新型的市民社会了。至于说到理论的工团主义运动，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尽管它声称代表从属集团的利益，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就在这个运动中，从属集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成了统治阶级精神领导权的牺牲品，因为理论的工团主义本身就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方面——而有人还断章取义地从实践哲学寻找理论根据（实际上成了陈词滥调）来为之辩护。为什么说成了“牺牲品”？又怎么样成了“牺牲品”？从属集团之所以被排除成为统治集团，有以下种种原因：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费边主义，德·曼⁴²，

大部分工党党员),或者提法不当,不起作用(一般说来,各种社会民主党流派都这样),或者认为阶级社会可以直接向工团主义经济的、完全平等的社会飞跃。

经济主义对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各种意志表现、行动表现或首创性表现所抱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很奇怪的,——仿佛这些表现并不是经济必然性的有机产物,而且也不是经济的最有影响的的表现似的。因此,一具体提到领导权问题,就把它说成是谋求领导权的集团必须作出让步的问题,那样的看法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对各个未来的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必须予以考虑,必须达成某种妥协以求得均势,——换句话说,领导集团要作出经济一团体性质的牺牲;这些固然都是领导权问题所包含的前提,但同样无可置辩的是,这种牺牲和妥协决不可触动根本;要知道,领导权虽说是伦理一政治的,但也必然是经济的,它的基础必定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核心决策方面所起的决定性职能。

除了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和理论的工团主义以外,经济主义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形式,各种形式的选举弃权主义即是其中之一(典型的实例为意大利教权派自1870年以后奉行弃权主义,该派从1900年以后直到1919年以及人民党成立前的这段时期内势力日见衰微;教权派所说的现实意大利与法制意大利之间的有机区分,其实是经济领域与政治一法律领域之区分的翻版);此外还有可以称作半弃权主义、1/4弃权主义等等的形式。同这种弃权主义有联系的,是“愈糟愈好”的说法以及某些议会党团的所谓议会“不妥协”原则。⁴³经济主义并非总是反对政治行动和政党,但只把政党看作是同工会性质差不多的教育组织。在《哲学的贫困》里有这样一段话:社会阶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每个工会会员不再只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而且也为捍卫和发展该组织本身而斗争;*这段话可以作为研究经济主义、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

重要参考。在这个问题上还应该重温一下恩格斯的表述（见他论述实践哲学的两封信，这两封信已译成意大利文公开发表）：经济只是“归根到底”的历史的主要动力，应该把这个说法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那段话直接联系起来：人们是借助于意识联想来认识经济领域里的冲突的。

在这些札记中从各种角度论述了实践哲学的传布范围远比一般所承认的要广泛得多。这一论断如果是指历史经济主义（洛里亚教授如今就是这样来称呼他那多少有点欠条理的理论的）得到了广泛的传布，以及自实践哲学开始斗争以来文化局面为之彻底改观而言，那么它是正确的。可以借用柯罗齐的术语这样说，这个在“自由之宗教”的胎胞里成长起来的最伟大的异端，本身也象正统的宗教一样，蜕化变质了，变成了广泛流传的“迷信”，也就是说，同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相结合而产生了经济主义。但是还应该考察一下——对照那如今已经完全衰朽的正统的宗教——，这种异端迷信是不是始终真正保存着酵素，使它有可能以高级宗教的形式而再生，换句话说，迷信的渣滓是否真正易于清除。

关于历史经济主义的几个特点：1. 在探索历史联系时，对“相对地经常的”事物与暂时的起伏不加区分，把经济现实看作是个人或小组的私利，而且是直接意义上的和“卑污的犹太人的”意义

* 请参阅原著的确切表述。⁴⁴《哲学的贫困》代表着实践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可以把它看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发展，而《神圣家族》——一部有感之作——则代表着两者之间依稀可辨的过渡阶段；这一点从论述蒲鲁东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的章节中看得很清楚。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那一章实际上完全是在论述文化史——不要像一般所解释的那样，把它看作理论探讨——，应把它看作文化史，这样较妥。记得有人说过，《哲学的贫困》里对蒲鲁东以及他的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所作的批评，一般说来，也可移作对焦贝蒂以及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黑格尔主义的批评。虽然蒲鲁东和焦贝蒂事实上分别代表着两个非同质的政治—历史阶段，但出于上述理由，把他们相提并论进行比较也许是意味深长而颇能说明问题的。

上的私利。换句话说，它不重视经济的阶级构成及其固有的关系，而满足于推究卑鄙的高利贷式的私利的动机，特别是当这种私利表现为构成法律上确认的犯罪形式的时候；2. 关于经济发展可以归结为劳动工具的技术变革过程的学说。洛里亚教授于1912年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那篇论述飞机的社会影响的文章，提供了运用这种学说的绝妙范例；3. 关于经济发展和历史发展直接取决于某个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变革的学说，而所谓生产要素的变革是指发现某种新原料或新燃料等，因而必须采用新方法来说明机器的结构。近年来研究石油问题的论著大批问世：在1929年5月16日的《新文选》上发表安东尼奥·拉维奥扎的文章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可供加工的新原料的发现，或是新燃料新能源的发现，当然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可以改变个别国家的状况，却决定不了历史的进程，等等。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人们在反对历史经济主义，却自以为是在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例如1930年10月10日的巴黎《展望》报上（转载于1930年10月21日的《外国报刊每周评论》上，第2303—2304页）的一篇文章就是如此，可以作为典型引述如下：“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战后，我们一直听到这样的论调，说私利统治着各个民族并推动世界前进。这个论调的发明者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还给它起了颇有点学说味道的名称‘历史唯物主义’。按照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群众的人所服从的是经济的必然性，而不是人们自己的激情。政治是激情；爱国也是激情；这两种至德（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他们说，多少世纪以来的各国人民的历史实际上要用变动不居的、不断更新的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加以说明。他们说，经济就是一切。许多‘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替他们帮腔。他们自称能根据粮食、石油或橡胶的行情来向我们说明最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

他们煞费苦心要证明外交完全受关税和成本价格问题的节制。这套说明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它们是以一种沽名钓誉、目空一切的怀疑论为出发点的，看上去有点象科学。什么外交政策的荣誉感？什么国内事务的责任感？得了吧！那套废话只能对付普通老百姓。伟人，内行人都懂得，一切都受借方和贷方的支配。现在看来这一切全是冒牌真理。把人民说成蝇营狗苟，唯私利是图，那是十足的谎言。人民最主要的动力是对威望的强烈向往和热烈信仰，这才是全部的真实。谁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什么也不懂。”这篇文章（标题是《向往威望》）接着提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说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是优先考虑威望而不受物质利益支配的例子。总之，这篇文章对实践哲学百般嘲弄，竭尽庸俗论战之能事，但实质上这种论战的锋芒却是指向洛里亚那一套十分粗糙的经济主义的。然而作者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论证也并不十分有力。他不理解“感情”可能只是经济利益的同义语，而且也很难使政治活动经常处于激昂慷慨的狂热状态。事实上作者本人就把法国政治描绘成严谨而一贯的“理性”政治，也就是清除了一切感情因素等等的政治。

实践哲学，在其最流行的经济主义迷信的形态上，固然可以在人民群众以及那些不肯多动脑子而又好出风头的第二流知识分子中间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但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却大大丧失了这种能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有不少人一厢情愿地以为，他们可以不付任何代价，轻而易举通晓全部历史，掌握全部政治的和哲学的智慧，只要把它们变成几条简短的公式就可以了。他们忘记了，人们是通过意识联想的形式而意识到根本冲突的那个论题，其性质不是心理的或道德的，而是结构方面的（指经济基础——译者）和认识论的；他们还养成了一种习惯，把政治从而也把历史看作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欺骗市场，一场戏法和魔术的竞赛，因此，“批

判”活动无非是揭穿骗局，制造丑闻，打听头面人物腰包里有多少钱。

这样看来，有的人忘记了，既然“经济主义”也是说明问题的一条客观原理（客观—科学的），那么探索直接的私利就应该适用于历史的一切方面，既适用于代表“反命题”的人物，也适用于代表“正命题”的人物。除此以外，有的人还忘记另一条实践哲学的原理：“民众信仰”以及类似这样的思想本身就是物质力量。探索“卑污的犹太人的”利益有时会使解释上的谬误达到惊人和荒唐可笑的地步，从而给独创性思想主体（指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译者）的威望带来不良影响。因此，不仅必须在历史编纂学的理论方面，而且尤其必须在政治活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反对经济主义。这条战线上的斗争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发展领导权的思想来进行——其实在发展政党学说的过程中，⁴⁵以及在某些政党的实际经历中已经进行过这种斗争（如反对所谓“不断革命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⁴⁶对各种立宪主义思想的支持，到何种程度为适宜，⁴⁷等等）。不妨研究一下，在某些政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它们的评价情况。可以作为典型例子的有布朗热运动（大致从1886年起到1890年为止），或德雷福斯案件，甚而12月2日的政变（要分析研究，在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著作⁴⁸中，对直接的经济因素赋予多大的相对重要性，对“意识形态”的具体研究又赋予多大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义在考察这些事件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发动这些事件使谁直接得到好处？”随即以既简单化又错误的推理方式作出了回答：直接得利者是统治阶级中的某个派系。为了万无一失起见，又进一步说明，指的是那个控制着全部经济力量并明显地具有进步作用的派系。这样说当然很保险，因为，该运动一旦得势，那么统治集团中的进步派系迟早会控制新政府，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使国家机器最终成为他们谋求私利的手

段。

所以说这种“绝对正确”的论调是毫无价值的，不但没有理论意义——就是从政治影响或实践效验来看也是微不足道的。一般说来，这种论调只是提供了一些道德说教和无穷无尽的人事问题。如果出现布朗热式的运动，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现实的分析：1. 加入运动的群众的社会成分；2. 这些群众对改变力量对比起了什么作用？（新运动的发生本身就是一个改变力量对比的过程）；3. 运动的领导者所提出的并得到广泛支持的要求（口号）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这些要求符合哪些实际需要？4. 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所提出的目的？5. 只有归根到底，从政治方面而不是道德方面，才能提出这样的假设：这种运动必然会蜕化变质而为另一种目的服务，这种目的根本不是参加运动的群众所追求的目的。经济主义者却不是这样，他们在还缺乏具体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就预先提出了这一假设（也就是说这些依据本身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玄奥的“科学”分析的产物）。因而，这种假设看上去就象是对口是心非和三心两意等不道德行径的谴责，或者（就参加运动的群众而言），则是指责他们幼稚愚蠢。于是就把政治斗争化为一连串的私人冲突——一方是拥有无所不知的神灯的智慧者，另一方则是死心塌地甘受自己首领摆布的愚不可及的群众。同时，在这种运动取得政权以前，总不免会猜测它们肯定成不了气候——而且事实上有些运动也的确以失败告终（布朗热运动本身已经破产，尔后又被如火如荼的德雷福斯案件运动所彻底粉碎；乔治·瓦卢瓦的运动，盖达将军的运动也统统遭到失败）。⁴⁹ 因此，研究的方向应该是弄清楚这些运动的力量之所在和弱点之所在。“经济主义”的假设断言，有一种直接表现出来的力量因素——即获得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援（一家大报纸对运动的声援也是一种间接的财政支援）——并且自以为说得很透彻了。其实这样说还不够，

因为分析力量对比，不论在哪个方面，最终不能不归结到领导权和伦理—政治关系问题。（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0—1932年）

对于所谓的（议会党团）不妥协理论，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即对所称的妥协⁵⁰原则上—律加以敌视，这种态度，要是从另一面看不妨称之为“怕担风险”。很明显，这种对妥协一概敌视的态度同经济主义有紧密的联系。因为这种敌视的思想基础不能不是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其性质与自然规律相似；同时也不能不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命定的目的论：既然有利条件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出现，并且会神秘地发生历史的循环重演，那么，不言而喻，任何旨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创造这些条件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主动行动就非但是无益的，甚而是有害的。不仅如此，伴随着这种宿命论的信念还有一种“由此而来的”倾向：盲目地和不加区别地依赖武装冲突的调整效能。诚然，这种倾向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和逻辑性，因为它认为对意志的干预只是对破坏而不是对建设起作用（在破坏的同时也就是在进行建设）。他们对破坏的理解是机械的，不是从破坏—建设的关系上加以理解，抱着这样的思考方式，自然不会去考虑“时间”因素，归根到底也就不会去考虑“经济”因素了。因为他们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因素总是落后于群众的经济现象，因而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因素的自发作用会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因素而延缓、受阻、甚至暂时中断，——因此必须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斗争，借以唤起人们去理解群众在经济方面的迫切要求，这种要求有可能同传统领导的政策相抵触。必须始终掌握政治上恰如其分的主动权，使经济的自发进程得以冲破传统政策的重重束缚——也就是要改变某些力量的政治方向；这些力量必须加以吸收，如果想要成功地建立一个新的、团结一致、没有内部矛盾的、政治—经济的历史联合体的话，要想把两股“相近的”

力量合并为一个新的有机体，办法只有两种：不是通过一系列的妥协使彼此结成联盟，便是凭借军事力量强迫一方服从另一方；既然是这样，那么问题就在于一方是否拥有必要的力量，以及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这种力量。如果为了战胜第三者而使双方必须结盟，那么采取武力强制的可能性（哪怕真的具备这种力量）就纯粹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假设；而唯一实际的可能性是通过妥协。强制可以用来对付敌人，却不可以用在属于同一营垒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我们盼望能早日吸收到自己方面来，携手合作，精诚团结。（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2年）

预见和前途

需要说明和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政治活动和国家生活中的“双重前途”问题。⁵¹ 双重前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最简单到最复杂；但在理论上却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两种基本形式，即相当于马基雅维利的半人半马怪物⁵²——一半是兽性，一半是人性。具体表现形式则有：强制与协商，威望与领导权，暴力与文明，个别与全体（“教会”与“国家”），鼓动与宣传，战术与战略等等。有的人把“双重前途”理论说成是无聊的老生常谈，无非是两种“邻接的”形式机械地在时间上轮番交替，只是“邻接”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其实情况往往是这样：第一种“前途”愈“直接”，愈基本，第二种“前途”就不能不愈“遥远”（不是在时间上，而是作为辩证关系）、愈复杂、愈宏大。换句话说，可以用人类生活中的情形作比拟，任何个人，愈是想要保护本人直接的物质存在，就愈应该拥护和尊重文明和人性在其全部复杂形态中的最高准则。（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1—1932年）

所谓预见，无非是说要从运动变化中去把握现在和过去，而所

谓“把握”，也就是要精确地识别过程中的根本因素和经常性因素。要是以为会有完全“客观的”预见，那是荒谬的设想。因为预见者实际上总是有其一定的“纲领”，他力求自己的纲领胜利实现，而他的预见正是使纲领得以实现的一个促进因素。这当然并不是说，预见永远不免带有臆断妄测的性质，甚至干脆就是一种倾向性。然而可以这样说，只有在预见的客观方面同纲领有联系时，预见才有其客观性，这是因为：1. 只有强烈的热情才能使智力敏锐，并且使直观更清晰；2. 现实乃是人的意志作用于物的社会（机器操纵者的意志作用于机器）的产物；所以说，要是主观意志的因素一概排斥（否定），或者只把他人意志的干预看作是力量之间一般相互作用的客观因素，那都是对现实本身的歪曲。唯有具有某种强烈意志的人才能识别哪些因素是实现其本人意志所必需的。

因此，认为某一世界观（一般说来也是人生观）本身就包含着高级预见能力的看法是极其荒谬的，是十足的无知和浅薄。毫无疑问，任何预见都包含有世界观，因此，所说的预见究竟是一套有条有理深思熟虑的看法还是漫无边际随便想到的见解，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恰恰相反，在倾注全部意志力以求预见变成现实的预见者心目中，这却是至关紧要的问题。这一点，从那些自称是“不偏不倚”的人所作出的预见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琐碎无聊，废话连篇，捕风捉影，异想天开。只有在需要实现某种具体的纲领时，发表“预见”的人才会认真考虑纲领的根本要求，也就是那些“可以组织起来的”因素以及曲直是非有待分辨的因素，事实上也只有涉及到这些因素时才有预见可言。而一般人看问题的方法却与此相反，他们通常设想，任何预见活动都是从寻找出象自然科学规律那样经常起作用的规律入手的，可是这些规律并不在他们所想象的那种绝对或机械的意义上存在，既不考虑别人的意志，也没有“预见”到本身的用途。因此，这一切都是从随意的假设出发，而不是从现

实出发的。〔1933年〕

“过度的”(因而也是肤浅的和机械的)政治现实主义往往强调,政治家应该把眼光和精力放在“现实状况”上,要从“目前是”(现实局面)出发,而不必考虑“应该是”(理想局面)。也就是说,政治家不必高瞻远瞩,只要看到自己鼻子底下那点地方就行了。正是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帕奥洛·特雷维斯才说“真正的政治家”是盖沙迪尼而不是马基雅维利。⁵³

不但要懂得“外交家”同“政治家”的区别,而且也不可把政治学者同政治活动家混为一谈。外交家只能根据现实情况行事,这是必然的,因为外交活动的目的不是要创造新的均势,而是设法在一定法律范围内维持现有的均势。同理,政治学者也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因为他的任务只是研究学问。但马基雅维利不只是位学者,他还是党人,是个具有强烈热情的人,是位渴望建立新均势的政治活动家,因此他不能不关心“应该是”(当然不是指道德说教意义上的“应该是”)。这样一来,问题的提法就比较复杂,不能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了。也就是说,要看这种“应该是”究竟是随意的还是必要的;是具体的意志还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政治活动家是创造者和带头人,但他总不能凭空去创造,总不能凭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在虚无缥缈中行动。他得从现实情况出发,然而,这现实情况指的是什么呢?是指某种静止不变的东西呢,还是指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以保持平衡的力量对比?如果利用意志去开创一种使各种实际存在并起作用的力量保持平衡的新局面——依靠那种被认为是进步的力量,加强这种力量以使它取得胜利——,那也还是在现实情况范围内行动,不过这种行动的目的是要控制并超越现实情况(或促成这一点)。可见“应该是”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事实上它是对现实的唯一现实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解释,只有它才是行动中的历史和行动中的哲学,才是真正的政治学。

萨沃纳罗拉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对立并非“目前是”与“应该是”之间的对立（卢索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大段论述纯粹是舞文弄墨，华而不实）⁵⁴，而是两种“应该是”观念之间的对立：一种是萨沃纳罗拉的抽象的、变幻莫测的观念，一种是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的观念，——即使它在事实上不能变成直接的现实，我们还说它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不能指望个人或本本能改变现实，个人或本本只能解释现实并指出可能的行动路线。马基雅维利的局限性或狭隘性仅仅在于他是一位摇笔杆子的“布衣”，而不是国家或军队的首脑；后者虽然也是个人，却掌握国家或军队的力量，并不是光握笔杆子当武器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马基雅维利本人也是一位“赤手空拳的预言家”：这种说法未免太损了。马基雅维利本人根本没有说过他想要改变现实，或打算亲自去改变现实，他只是想具体地表明历史的力量应该怎样行动才能卓有成效。〔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1—1932年〕

国家的经济—团体阶段

同马基雅维利相比，盖沙迪尼代表着政治学方面的一种倒退，这也就是他那较为浓厚的“悲观主义”的全部含义。马基雅维利已经达到了欧洲思想，盖沙迪尼却使之倒退到纯粹意大利的政治思想。要是不考虑下列事实，即马基雅维利已把意大利经验纳入欧洲经验（在他那个时代“欧洲的”与“国际的”是同义语）：要不是由于欧洲经验，他的“意志”就是乌托邦式的；那么，就不可能正确理解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于是“人性”论便一分为二。马基雅维利的“人性”包括“欧洲人”，在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成功地超越了利用君主专制制度打破封建主义的阶段；因此，在意大利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制度，其障碍不在“人性”，而在于条件暂时不成熟，这一点可以由

意志来克服。马基雅维利对人以及人的行为动机的看法是“悲观主义的”(或者不如说是现实主义的);盖沙迪尼虽不抱悲观主义的看法,然而却抱怀疑论的心胸偏狭的看法。帕奥洛·特雷维斯*在对盖沙迪尼和马基雅维利的评价上犯了许多错误;他没有闹清楚“政治”与“外交”的区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他作出了错误的评价。事实上,意志在政治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在外交上重大得多。外交只是认可并力求维持不同国家的政策冲突所造成的现状;外交活动是创造性的,那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或者是套用了哲学上的说法(“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创造性的”)。所谓国际关系,就是处理力量对比问题,每个成员国在其中所占的分量是极其有限的。就拿佛罗伦萨来说吧,要是它能比现在更强大,那或许会有一些的影响;然而,即使它得以在意大利的以及欧洲的力量对比中改善自己的地位,那也绝对不能把它的这种力量增强看作会对整个均势变化本身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说,外交出于本身的职业性习惯,总难免倾向于怀疑论,倾向于目光狭隘的保守思想。

就一国的国内关系来看,形势无疑大大有利于发挥核心的(意即自上而下的——译者)首创精神,有利于发挥马基雅维利所谓的统帅意志。德·森克蒂斯对盖沙迪尼的评价要比特雷维斯的看法现实主义得多。⁵⁵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德·森克蒂斯比特雷维斯看得准,提出这种在历史上和科学上都比较确切的评价?德·森克蒂斯亲身经历了意大利政治史上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意志致力于唤起新的独创性力量,而不是单纯把希望寄托在传统力量身上,认为传统力量没有发展前途,也无法使之重整旗鼓(盖沙迪尼式的政治怀疑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意志的潜在威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仅表现在本国建立新国家的政治艺

* 参看《弗朗切斯科·盖沙迪尼的政治现实主义》一文,载《新历史评论》1930年第11—12月号。

术上，而且（由于加富尔）使职业的和惯例的外交方法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而显示了掌握国际关系的高超技巧。当时的文化环境也比较有利于对政治学和政治艺术作较为全面的现实主义的阐述。但要是假设当时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难道德·森克蒂斯就不能正确理解马基雅维利了吗？这个历史时代所提供的文化环境固然使德·森克蒂斯的文章增添了丰富的感情色彩，使论证铿锵有力，扣人心弦，对科学原理的阐述也委婉得体，娓娓动听；但其逻辑的、政治—科学的内容，即使处于最反动的黑暗时代，也照样会考虑到的。难道反动不是一种有预谋的意志行动？保守不也是一种蓄意的行动？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基雅维利的意志就应该是“空想的”？为什么那些一心想维护现有的一切不受触动、对于要打破和改变传统均势的新生力量则竭力阻止其形成和组织起来的人的意志，反倒不是空想的而成了革命的呢？政治学只对“意志”要素进行抽象概括，并不具体考虑把意志运用于什么目的。“空想的”这个定语不能加到一般的政治意志上，只能用于那种不能把手段同目的联系起来有特殊意义，因而它也根本不是什么意志，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梦想，愿望……如此而已。

盖沙迪尼的怀疑论（不是对智力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在积极行事和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身上可以同意志的乐观主义相结合⁵⁶）还有下列来源：1. 外交习惯，也就是凡事请示、服从命令的（执行的和官僚机构的）习惯，外交人员必须秉承某种意志（本国政府或君主的政治意志）办事，这种意志同外交人员个人的信念无关（如果这种意志符合他本人的信念，他固然可以有“如同己出”的感觉；但他也可以不这样去考虑。外交必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这种要求使得外交人员不卷入由于政府更迭等等引起的政策改变）。其结果便是怀疑论，用科学术语来说，叫做超科学的成见；2. 盖沙迪尼本人的真实信念，从意大利总的政治背景来看，他是保守派，因此

把自己的见解、政治立场等概括而形成这种理论。

按照德·森克蒂斯的看法，盖沙迪尼的著述只是应景之作，不是政治学，正如帕奥洛·特雷维斯的著作也是应景之作而不能在政治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一样。〔1930—1932年〕

对形势的分析。力量的对比

研究怎样分析“形势”，也就是研究怎样确定各种各样的力量对比，这种研究有助于对政治学和政治艺术作一初步的说明——一般认为，这是指一套研究和深入观察的实际准则，这种准则对于唤起人们对现实情况的关心，养成比较精确比较活跃的政治眼光是十分有用的。同时还必须说明，政治上所说的战略战术，策略“方案”，宣传鼓动，指挥结构⁵⁷或政治组织与行政机构的科学等，是什么意思。

一些从经验观察得来的原理通常散见于政治学著作中（盖·莫斯卡的《政治学原理》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这些原理并不是抽象虚幻的，所以应该根据各种力量对比关系加以整理归纳，使之各得其所。这些力量对比关系包括：国际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应该把有关大国、霸权制度下的国家结盟、以及中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概念等条目统统归纳到这里），社会内部的客观关系，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政治力量的关系，党派之间的关系（国家内部的领导权体制），以及直接的（或潜在军事的）政治关系。

国际关系与社会的根本关系（从逻辑上讲）究竟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毫无疑问是后者在先。社会结构（指经济基础——译者）的任何有机革新（反映在技术上和军事上）都会有机地引起国际舞台上绝对的和相对的力量对比的改变。甚至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位置的变迁（在逻辑上）也不能先于而只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尽

管前者对后者有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其程度正如上层建筑对基础,政治对经济等的反作用一样)。然而,国际关系对政治关系(党派之间争夺领导权)的反作用,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一个国家的直接经济生活对国际关系的依赖性愈大,那么体现着这种局面的政党就愈发会利用这一点来防止敌对政党占上风(可以回忆一下尼提关于意大利革命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那篇有名的讲话)。从这一系列的事实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外国人的党”⁵⁸其实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卑劣,而往往正是最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党——事实上,与其说它代表着本国的生命力,不如说它反映了这个国家受几个霸权国家*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奴役的真实面貌。〔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1—1932年〕

要想正确分析那些在一定历史时期起作用的力量,认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进行这种探讨时有两条原理必须遵循:1.任何一个社会在解决任务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尚不存在或者至少还没有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是决不会给自己提出这些任务的;2.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内部关系所蕴含的一切生活形式得到充分发展以前是决不会解体的,也决不会被取代。**从这两条原理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历史方法论的其他原理。同时,在研究经济基础时必须区分哪些是有机的运动(比较经常的),哪些是可以称作“迸发

* 乔·沃尔培在1932年3月22日和23日《晚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曾指出这种“压制”别国内部力量的国际因素。

**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的”运动(偶然的,几乎是突如其来来的)。⁵⁹诚然,“迸发的”运动也要以有机的运动为转移,但它们却不具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些运动只是对一些日常的枝节的政治问题提出批评,批评的对象是政治上层领导以及直接担任政府职务的人物。而有机的运动则不然,它们所提出的批评带有社会—历史意义,批评的对象是广泛的社会集团——超出了政府要员和上层领导的范围。只要一着手研究某一历史时期,马上就会清楚地看出这种区分多么重要。有些危机发生后往往持续好几十年之久。这样不寻常的长期持续意味着经济基础方面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达到成熟),而成了不治之症;同时也意味着,尽管如此,力求维护现存的经济基础本身的政治力量正千方百计设法补救,争取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克服。这种坚持不懈的顽强努力(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决不会承认自己已经过时)构成“迸发的”运动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组织起对抗的力量。这些对抗的力量极力证明,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已经存在,因此有可能,而且迫切需要,使一定的历史任务得到解决(之所以迫切需要解决,是因为,面对应尽的历史义务而不去履行,只会加剧必不可免的混乱,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灾难)。(这种证明归根到底只有在它变成了新的现实、对抗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是成功的和“真实的”;在初期,它通过一系列意识形态的、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论战而不断发展,这些论战的具体意义可以根据其令人信服的程度以及在原有的社会力量配置中所引起的变化来估计。)

在进行历史—政治的分析时,一个常见的错误是不能找出有机的与迸发的之间的正确关系。因此,不是把实际上只是间接起作用的原因当作直接起作用的原因,就是把直接原因说成是唯一的原因。前者是一种“经济主义”的极端,或者叫做教条主义的空谈;后者则是“观念论”的极端。前者过高估计了机械的原因,后

者则夸大了唯意志论的和个人的因素。对于任何局势，无论是发生倒退或出现严重危机，还是繁荣进步或生产力停滞，都必须区别哪些是有机的运动和现象，哪些是“迸发的”或偶然的运动和现象。要准确地判别这两种运动之间的辩证联系并通过研究加以证实，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说在历史编纂学中出错误是严重的话，那么在政治艺术上出错误就更为严重，因为问题不是要重建过去的历史，而是要建设现在的和将来的历史。*风格欠高的欲望和缺乏克制的热情是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因为它们代替了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分析——而且这种做法并非是为了鼓励行动而有意采取的“手段”，它只是一种自我欺骗。在这种情况下，蛇也会反噬要蛇者，——换句话说，蛊惑家会成为自己蛊惑行为的第一个受害者。

如果把这些方法论准则用于考察具体历史事实，那么这些准则的教学法意义就会明显而充分地被揭示出来。对于1789—1870年期间法国所发生的事件也这样来考察，会是有益的。我以为，要使叙述更清楚，必须对这一段时期从总体上进行考察。事实上，正是到了1870—1871年，由于公社的尝试，滥觞于1789年的一切才最终地历史地得到了详细的说明。当时，为了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新兴资产阶级不仅击败了不肯承认自己是已经完全过时的旧社会

-
- * 不去考察“力量对比”的直接阶段（即指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译者），这一点同庸俗自由观的残余有关——工团主义也是庸俗自由观的一种表现，尽管它自以为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理论，其实却是一步倒退。的确，庸俗自由观对通过各种形式的结社立党（读报会，议会和地方选举，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工会等群众团体）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是十分重视的，就这一点而论，它比工团主义先进，因为工团主义只重视主要的社会—经济关系。但庸俗自由观对于这种社会—经济关系也同样是重视的，只是不公开宣扬（有许多迹象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而且同时还注重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反映，而且在事实上包含着前者。庸俗自由观的这些残余，在许许多多据说同实践哲学有渊源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因而产生了形形色色愚蠢幼稚的乐观论调。

的代表,而且也击败了坚决认为1789年革命所产生的新结构本身也已经过时的最新社会集团;资产阶级以这一胜利同时向旧的和最新的(阶级)证明了自身的生命力。

此外,在1789年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于1848年前后在理论上加以发展的那一套政治战略战术原则,也正是在1870—1871年宣告失效的。(我指的是那些可以归结为“不断革命论”的原则;考察一下这一理论有多少变成了马志尼的战略——例如在1853年的米兰暴动中——以及马志尼利用这一理论是不是有意识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一点可以证明上面所说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历史学家们在确定法国革命应包括哪些历史事件的问题上看法很不一致(也不可能一致)。有的人(如萨耳韦米尼)认为革命完成于瓦尔米战役:法兰西建立了自己的新国家,表明了它能够组织起必要的政治—军事力量,以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也有人认为革命一直延续到热月政变为止——有的人甚至说有好几次革命(如8月10日⁶⁰是一次独立的革命,等等)。*对热月政变及拿破仑活动的解释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竟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还有的人认为革命一直延续到1830年、1848年、1870年,甚至到1914年世界大战。所有这些看法都有一部分道理。事实上,1789年以后在法国社会结构中不断发展的内部矛盾要到第三共和国的建立才获得相对的解决;只是在经过了1789年、1794年、1799年、1804年、1815年、1830年、1848年、1870年各次、历时80年之久的大动荡(其中每次动荡的间隔愈来愈长,法国才享有今天这60年的政局稳定。只有对动荡发生的间隔时间为什么有长有短这个问题进行考察,才能清楚地再现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比关系以及在基础内部发生有机的运动与迸发的运动之间的对比关系。同时也可以说,

* 见阿·马西埃《法兰西革命》,收入A·科林编的丛书。

在“不断革命”的历史—政治公式中，包含着本文开头所说的两个方法论上的原则之间的辩证联系。

所谓力量对比问题乃是上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历史著作中常常会看到一种很笼统的说法：“有利于(或不利于)某种趋向的力量对比”。象这样笼统的说法并不说明或几乎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它只是把有待于说明的事实重复两次，一次作为事实，一次作为抽象的规律，作为说明的本身。因而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就在于把进行研究和说明的原理变成了“历史上的原因”。

同时，在考察“力量对比”时必须分清其中的不同阶段或层次，主要有：

1. 第一个层次，与基础紧密联系着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这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可以精确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体系来计量的。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集团存在的基础，这些集团之中的每个集团都在生产中执行一定的职能并占据一定的地位。这种关系是固有的，是一种不能轻易改变的现实：没有哪一个人能随便改变企业的数目和企业里的雇员的数目，城市的数目和城市居民的数目，等等。通过对这些基本情况的考察，就可以看出在某个社会中是否存在着改造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可以确定社会中所出现的，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各种思想体系能够真正实现的程度。

2. 下一个层次是政治力量的对比，也就是对于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在内部团结、自觉性和组织性方面所达到的水平的估计。对于这些问题，也可以根据集体政治意识在过去历史上的不同表现，划分相应的阶段进行分析。其中第一个也是最初的阶段是经济—团体阶段：商人感到自己应该同其他的商人团结一致，工厂主感到自己应该同其他的工厂主团结一致，等等；但商人还没有感觉

到有同工厂主团结一致的必要,也就是说,同业集团的成员们已经认识到本身内部团结以及组织同业团体的必要性,至于就范围更大的社会集团来看,则还没有具备这种认识。到了第二阶段就确立了要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团结一致的认识——但仍然局限在纯经济的范围内。在这个阶段,关于国家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只着眼于争取在政治—法律上同统治集团享有同等的权利;要求有参与立法和行政的权利,甚而对立法和行政实行改革的权利——但是不逾越现存根本制度的范围。进入第三阶段就认识到,团体利益将随着自身在目前和将来的发展而超出纯经济阶级的团体范围,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其他各种从属集团的共同利益。这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阶段,标志着从基础向复杂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明显过渡;在这一阶段上,以前产生的一些意识形态变成了“党”,开始彼此冲突,互相斗争,直到其中的一个或至少是其中的一组占了上风,竭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求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力量——不仅力求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标一致,而且要实现精神和道德上的一致,要在“全社会的”、而不是团体的范围内提出一切成为斗争焦点的问题,从而形成主导社会集团对许多从属社会集团的领导权。在这一阶段上,国家虽然被看作是某一集团所掌握的机构,其使命是为这个集团的最大限度的扩张创造有利条件;但是这个集团的发展和扩张却被认为是,并且象征着,普遍发展的动力,一切“民族”潜力得以发展的动力。换句话说,就是把主导集团同各从属集团的一般利益具体地等同起来,把国家生活看作是主导集团利益同各从属集团利益之间不稳定的平衡不断形成又不断被打破的过程——这是一种主导集团利益占优势的平衡,但以不完全变成狭隘的团体经济利益为限。

在历史现实中,这些阶段可以说是纵横交叉地相互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根据社会—经济活动(横的)和区域(纵的)以不同方式

结合或分离。每一个这样的结合都可以有自己的有组织的经济政治表现形式。同时必须考虑下列情况，国际关系同民族国家内部的这些关系交织在一起，会产生新的、独特的、历史意义上的具体的结合。例如，发达国家里所产生的某种意识形态在不发达国家里传布时，会对当地的各种结合的相互影响产生冲击。*由于每个国家内部都存在着许多经济结构异常特殊、力量对比多种多样的地区，使国际力量同民族力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例如旺代⁶¹就同国际反动势力相勾结并且充当了这些势力打进法国统一领土内部的代理人，里昂在法国革命期间也同样代表了一种十分棘手的关系，等等）。

3. 第三个层次是军事力量的对比，这种对比不时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不断地摇摆于第一个和第三个层次之间，第二个层次则是中间环节。）这个问题同样没有什么直接的固定的公式可套，也得分成几个方面来考察。这里面可以分作两层意思来谈：一是狭义的军事方面或者叫做军事的技术方面，一是可以称为军事的政治方面。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形式是千变万化的。可以作为为数不多的典型事例是：一个国家对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施加军事镇压，这种关系不是纯军事的，而是政治—军事的；事实上，要不是由于被压迫人民处于四分五裂的社会状态，多数人抱着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那么这种压迫就会令

* 比方说宗教历来就是这种民族同国际间的在思想—政治上结合的源泉，此外，共济会、扶轮社、犹太人协会、职业外交工作者协会等国际组织也是这类源泉。它们起着国际政党的作用，它们在每个国家中的活动都有整个国际上的力量作后盾，它们根据各自的国际背景提出形形色色的政治解决方案，调动全部力量促进这些方案在各该国家里赢得胜利。宗教、共济会、扶轮社、犹太人协会等等都可以归结为“知识界”这个社会范畴，它们的职能就是在国际范围内调停各种极端，使一切促进领导活动的技术发明“社会化”，谋求极端方案之间的妥协，以及避免采取极端方案的出路。

人感到不可理解；因此单靠军事力量是无法赢得独立的，需要从军事和政治—军事两方面同时去争取。要是被压迫民族必须等待霸主国的许可，建立一支本民族的正规意义上的军队后，才开始争取独立的斗争，那就得等待很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霸主国承认该民族有权建立自己的军队时，无非表明这场斗争已经进入尾声，并且在政治—军事方面取得了胜利。）由此可知，被压迫民族一开始只是以“政治—军事的”力量来反对霸主国的军事力量，换句话说，就是以政治行动的方式来对抗，这种政治行动之所以能收到军事骚扰性反响之功效，是因为：（1）它能从内部瓦解霸主国的军事实力；（2）它使霸主国不得不在广阔的土地上分散兵力处处设防，从而大大削弱其军事实力。不妨指出，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由于不抓政治—军事领导，曾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在行动党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它那先天性的无能）；皮埃蒙特的温和派党人在1848年前后的表现也是如此。当然，温和派党人之所以不抓并不是因为无能，而是由于“政治—经济的马尔萨斯主义”，换句话说，是由于他们极力讳言实行土地改革的可能性，是由于他们不愿看到国家立宪会议的召开；他们只盼望能排除民众方面的任何条件和限制，仅仅根据各地公民投票的拥护，把皮埃蒙特的君主制度推广到全意大利。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与上面所说的问题有联系：一些重大的历史危机是否直接为经济危机所决定？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包含在前文的一些段落里，前面所探讨的一些问题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此刻所提出的问题。然而出于教学法上的考虑，即考虑到部分读者的需要，对于同一个问题还是有必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不过这样一来就好象变成一个新的独立的问题了。可以肯定，经济危机本身会直接造成重大的历史危机这个论点是不能成立的；经济危机只能造成一种较为有利的环境，使一

定的思想方式得以传播，对于涉及到整个国家生活今后发展的问
题，提供一定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任何关于危
机时期或繁荣时期的论断都会带来片面的估计。庸俗传统史总是
先验地“发现”，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同时发生社会平衡体系遭到重
大破坏的现象，马西埃则相反，他在关于法国革命的历史概述中
断言，截至1789年的国内经济形势确实相当好，因此，不能说什么
法国专制王朝的崩溃是贫穷危机造成的。必须指出，当时的法国
正处于致命的财政危机重压之下，正在考虑应由哪个特权社会等
级挑起重担作出必要的牺牲，以使国家财政和王室财政恢复正常。
再说，即使资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欣欣向荣，城市和乡村的人民群众
的经济状况的确很不妙，普遍地陷于贫困的境地，尤以乡村为甚。
不管怎么说，力量平衡体系的被打破并不是由直接的机械的原因
造成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某个社会集团贫困化的直接结果，尽
管这个社会集团对打破这种平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并且在事实
上把它打破了。它是比直接的经济高一级的领域里所发生的冲突
的结果；这种冲突同阶级“威望”（未来的经济利益）有关，同要求独
立、自主、权力的激情爆发有关。经济的盛衰是产生新的历史现实
的一个根源，这个具体问题只是表现在不同级别和层次上的力量
对比问题的一部分和一个方面。新的历史现实既可以因为繁荣的
局面受到某个敌对阶级的狭隘私利的威胁而产生，也可以因为经
济衰败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原有的社会力量中又找不出
一种力量能够利用立法手段使之缓和和恢复正常而产生。因此可
以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整个社会力量对比的总和中突变性波动
的具体表现，就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着力量对比从经济阶段向政治
阶段、最终向决定性的军事阶段的过渡。

要是不经过这种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的过程——这
基本上是人，人的意志和能力发挥作用的过程——，局面并不可

取,而且可能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要么是旧社会从肉体上消灭敌对阶级的杰出人物并对其广大的后备力量采取恐怖手段以保全自己并获得一段喘息的时间;要么是两股敌对的力量同归于尽而形成一种死气沉沉的局面,这种局面也许得靠外国人的监督来维持。〔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0—1932年〕

在对力量对比作任何具体分析时,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应该是:这种分析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成为目的本身(除非单纯以写过去历史为目的),只有这种分析可用以说明一定的实践活动或意志的创举是正当的,它才具有意义。这样的分析可以揭示出阻力最小之点,使意志的力量在运用时可以收到最大的效果;可以为当前的行动提供直接策略性的建议,并对怎样开展宣传鼓动才最有成效,什么样的语言群众最容易理解等问题指明方向。在任何形势中,决定性的因素总是那种长期积聚起来的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力量,一旦看清形势有利,就可以把这支力量投入战场(形势之所以有利,可能就因为有这种力量的存在以及它的富于战斗精神)。因此,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耐心细致地建立和发展这种力量,使它成为一支日益巩固、日益团结、日益自觉的力量。一部军事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养兵千日用于一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重视军队的平时训练的。大国之所以是大国,就因为它们时刻准备着对有利的国际事件进行有效的干预,而这些国际事件之所以对它们有利,也正因为它们有实际的可能去进行有效的干预。〔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1—1932年〕

论官僚制度

1. 随着历史上政治经济形态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官员——姑且称之为“职业”官员,他们受过在官僚机构里当差的

专门训练(民事的和军事的)。对于政治学以及国家形态史来说,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这种过程是一种必然性呢,还是象“纯粹”自由派所声称的那样,同自治⁶²相比是一种退化?当然,每一种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都有它自己的官员问题,都有它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官员选拔制度和培训方式。把所有这些因素的发展过程解释清楚是十分重要的。官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知识分子问题。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固然会产生一批新型的官员,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新的统治集团,至少在初期,决不能无视传统和既得利益,——也就是不能无视在他们掌权以前就已经存在、已经任命的各级官员(特别在宗教界和军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以及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使选出的官员不仅要关心对国家事务的监督,也要关心其执行)可以成为一种推动力,从而产生解决官员问题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新途径。

2. 同官僚制度及其“最优”组织形式问题有联系的是关于所谓“有机的集中制”与“民主的集中制”的辩论(尽管叫民主的集中制,但与抽象的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正如专制君主制和拿破仑一世对法国革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所发展的有机的集中制一窍不通一样)。⁶³ 必须考察和研究有机的和民主的集中制在所有领域里的各种表现,这些领域包括:国家生活(中央集权制,联邦制,邦联制,各国联邦制或联邦制国家等);国际生活(同盟,各种形式的国际政治“星群”);政治文化组织生活(共济会,扶轮社,天主教会);工会和经济组织生活(卡特尔,托拉斯);在同一个国家里,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等等。因为这些表现就是实在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组织形式,结合形式和功能形式。

从过去(1914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的、关于德国在高级文化以及一定国际政治力量方面的优势问题的论战:这种优势是实在的

吗？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⁶⁴可以指出的是：（1）并不存在任何有机的或约束性的保证来确认这种优势，因此，它只是一种抽象的文化影响和很不稳定的威望；（2）这种文化影响丝毫也没能对现实活动起作用，相反地，现实活动依然是分散的，地方性的，没有共同的方向。因此，集中制问题——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民主的，其他类型的或混合形式的——也就无从谈起。真正感受到这种文化影响的只是人数很少、同人民群众没有联系的一些知识分子集团；而正因为不联系群众，所以才形成这种局面。然而这种局面还是值得研究，因为它有助于说明有机的集中制理论的形成过程。这些理论完全是针对力量分散和混乱现象而提出的批评，但是带有书生气和片面性。

但对有机的集中制的这些理论必须加以区分：有一类理论实质上是变相鼓吹部分对整体的真正支配的明确纲领（不问这种“部分”是指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还是一个地域性的“特权”集团）；另一类理论无非是一种宗派主义者和狂热信徒们的片面观点，这类理论虽然也可能掩饰其“优越论”的面目（一般是鼓吹个人优越，例如一贯正确的教皇——从而使天主教变成一种对教皇的个人崇拜），但在一开始却不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把它们称作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倒是最为贴切的。只有民主集中制才是“有机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运动中的“集中制”——也就是说，它使组织不断适应实在的运动，使上面的指令符合下面的进展，不断吸收普通群众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充实领导机构的框架，确保其稳定性和连续性，长期积累经验。民主集中制之所以是“有机的”，一方面是因为它重视运动，这种运动是历史现实本身的有机表现形式，它不会僵化而机械地变为官僚制度；同时还因为它重视那些相对稳定的和经常性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其方向不难预测的、运动着的东西，等等。领导集团核心的有机发展是国家稳定的具体体现，对于政党来说亦然

如此，只是所涉及的范围略小一点罢了。如果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在国内盛行，那就表明领导集团已经达到饱和点而变成了一个狭隘的小集团，他们一心只想永远保持他们那些自私的特权，对反对派实行控制甚至扼杀——即使这些反对派在统治的根本利益上（同他们）是同质的（例如保护贸易主义极端派反对经济自由主义派的斗争）。对代表从属社会集团的政党来说，党内稳定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可以确保领导权不致落到特权集团手里，而由进步分子来掌握——从组织上看，所谓进步，是同那些虽是关系密切的盟友、却总是非我族类的动摇分子比较，相对而言的。

无论如何，必须强调指出，之所以会产生官僚主义集中制这种不良现象，是因为下层缺乏主动性和责任心，或者说，是由于外围力量在政治上不成熟，尽管它们在性质上跟那个已经在一定地盘上掌握着领导权的集团（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头 10 年所出现的皮埃蒙特主义⁶⁵）完全是同类的。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对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极端有害和危险。

民主集中制提供一套富有伸缩性的公式，其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在得到说明并不断适应需要的情况下它才存在。它就是要批判地研究那种形式上不同实质上相同、以及表面上一致实质上有区别甚或对立的東西，以便把相同的東西组织起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组织工作和联系工作又必须是出于一种实践的和“归纳的”必需，是经验的，而不是一种唯理论的、演绎的、抽象的过程的结果——即不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或典型的书呆子）的活动的结果。这样孜孜不倦地从国内的现实中分析出“国际性的”因素，从地方的现实中分析出“统一的”因素，乃是一种真正具体的政治活动，是历史进步的唯一富有成果的活动。它要求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有机统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有机统一。从这个观点来看，统一和联邦的

公式失掉了自己大部分的意义，而同时却在官僚主义的概念里保存着自己的刺，因为官僚主义的概念最后不是导致统一，而是导致表面上平静、“哑巴似的”一潭死水，不是导致联邦，而是导致“一袋马铃薯”，⁶⁶也就是一个个彼此没有联系的“单位”的机械凑合。
〔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2年〕

定 比 定 律

这一定律可以有益地用来分析研究——并从而揭示其普遍适用性——组织学中的（对行政管理机构、人口构成等等的研究）以及关于一般政治（对形势或力量对比的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等等）中的许多比例关系。当然，必须时刻牢记，求助于定比定律只具有图解的和比喻的意义，换句话说，不能把它生搬硬套，因为在人的集体中（或者在个别成员的智力和技巧方面）质的因素是主要的，而且是无法用数学方法来计量的。因此可以说，任何一个人的集体都有其独特的、最适用的定比定律。

定比定律对组织学的研究特别有用，这一点从对军队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自己类型的军队，任何一种类型的军队又各有其自己的定比原则，但同时也可以从这一军兵种变成另一军、兵种。在列兵、军士、部属、低级军官、高级军官、总参谋部、联合总参谋部等等之间存在着特定的比例关系，在各军种和兵种等等之间也有一定的比例，在任何局部上发生的每一个变化都必然会影响到整体，需要重新调整部署，等等。

可以看到，这一定律也能在政治上运用于政党、工会和工厂。也可以看到，一切社会集团都有其自己的定比定律，并根据这些集团在文化、独立思考、首创精神、责任感以及它们的最落后的外围成员的纪律性等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而有所变化有所不同。

潘特列奥尼在其《纯粹经济学原理》⁶⁷中对这种定比定律作了如下说明：“任何物质的化合都只能按完全确定的组成比例进行，如果某种元素的量超过了同别的元素化合所需要的量（假设别的元素的现有量为一定），那么（超过的部分）就会游离；如果某种元素的量少于别的元素的现有量，那么化合反应只能进行到某种元素的量用尽为止。”用这个定律作比喻，就可以了解某种“运动”或某种思潮变成政党——即一种从行使政府权力的角度看是有效的政治力量的过程：完全取决于这个党所拥有的（在党内培养出来的）各级干部的量以及这些干部能力的大小。某些前提（某些存在着的客观条件）的历史“自动性”是靠政党靠有能力的人而变成政治潜力的，如果没有这些政党或人才，或者（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是，就会使这种“自动性”本身中和失效（所谓“自动性”其实也非真正自动的），这些前提是抽象地存在着的，但由于缺少了人的因素，结果就无法实现。这样看来，应该说政党有培养有能力的领导者的任务。总起来说，政党的职责就是选拔、培养和扩大必要的领导人员的队伍。如果某个社会集团（它是一个“确定”的量，因为它只能根据一切社会集团成员的总量来建立）要想有发言权，要从乌合之众变成一支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政治大军的话。如果一个党在历次的（不管是同一级的还是各级的）选举中的得票总数忽高忽低，相差十分悬殊（例如在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从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州议会、市政议会直到工厂委员会等等的选举），那就可以推论，这个政党的干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嫌不足，或者是有质无量（相对而言），或者是有量无质。如果一个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得票很多，而在比较重要的政治选举中得票较少，那么可以肯定，该党的中央领导的质量差劲：它拥有大批的，或者至少是足够的中下层干部，但是缺少一个胜任的总参谋部，所以不能在本国乃至世界上取得一席之地，等等。（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2年）

代议制政府的数量和质量

反对通过选举组织国家机关的人有一种经常挂在嘴边的老生常谈，他们说选举就是以多制胜（直译是数量决定一切——译者）⁶⁸，还说，在决定国家政治方针问题上，任何白痴，只要多少识几个字（在有些国家里，甚至是文盲），他们的意见同那些把全部精力和智慧贡献给国家和民族的人具有完全同等的分量，等等。^{*}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多制胜以及所有选民的意見具有完全同等的分量的说法统统不符合事实。在这种场合下，多数也只是评价的工具，提供一种尺度、一种对比关系，仅此而已。那么所评价的究竟是什么呢？所评价的正是少数个人——最活跃最杰出的少数先进人物——的意见的可取性和说服力，也就是这些意见的合理性、历史性或实用价值。可见任何个人意见具有“完全”同等分量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任何想法或意见并不是在每个人的头脑里“自发产生”的，它们的形成、阐发、传播、宣扬都有一个中心——一批人甚至只是一个人，经过他们的发挥，这些想法或意见才变成当前现实中的政治见解。计算“得票数”乃是一个长过程的终结仪式，在这种时刻，正是那些把全部精力和智慧贡献给国家（如果当真如此的话）的人才具有最大的分量。这批假定的杰出人物尽管拥有无限的物质力量，要是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拥护，那评价必然是：或者说他们名不符实，或者说他们不能代表“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民心所向必然会发生无可挽回的变化。“不幸的”是人人都极力把一己之“私利”⁶⁹混充国家利益，并认为它是“神圣的”，应

* 这类说法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其中尤以马里奥·德·西尔瓦在1932年8月15日的《法西斯的批判》发表的高论最为突出，比本文所援引的说法更巧妙。然而说法尽可以花样翻新，内容还是雷同的老一套。

由“多数的法则”来决定；当然，最好是成为法定的杰出人物。如此说来，问题不是“有头脑的”人感到他们被贬低到文盲的最低水平，而是其中有人认为，他们有头脑的人应该把“普通人”手中仅有的一丁点微不足道的对国家生活进程的决定权夺走。

这套陈腐的主张已经从批判（来自寡头政治论者而不是来自杰出人物统治论者⁷⁰）代议制政府（这样批判毫不奇怪，因为多数协商一致的历史合理性已被金钱的影响证明是假的），扩大到批判一切代表制度，连不是议会式的、并非根据形式民主的原则形成的⁷¹都无一幸免。这种批判更是离格。因为在这种另辟蹊径的政府制度中，人民的拥护与否并不是到投票时刻就算终结，恰恰相反，这种拥护被认为是长期起作用的；所以，凡是投赞成票的人都可以看作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一切选举都可以看作是一定类型的国家工作人员自动报到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同自治思想有关（但不是在同一高度上）。由于选举不是根据模糊的一般性纲领，而是根据直接的具体的工作纲领进行的，所以，凡是投赞成票的人要比普通公民对纲领的实现负有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要积极负责，在工作中起带头作用。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他们“自觉自愿”地去承担全部任务；只有当广大群众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熟练的生产要素时，才能理解这种选举所可能具有的重大意义。*〔1933—1934年〕

关于社会决不给自己提出其解决的物质条件尚不存在的任务，这一命题直接提出了集体意志的形成问题。要想批判地分析这个命题的含义，完全有必要研究经常起作用的集体意志的形成过程，以及这种意志具体确定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也就是确定

* 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发挥，作详尽系统的探讨，可以根据一般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变化，着重分析各种不同类型选举制度之间的其他不同点，如民选官员与职业官员之对比，等等。

集体行动方针的过程。这大体上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不大可能是突然的“综合”爆发。综合“爆发”固然也有，但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这种爆发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它们所清除的是本能的自发的道路上的各种机械论的外部障碍。“西西里岛晚祷”大起义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实例。

对于一个集体的历史运动的形成，从其一切分子阶段上——具体分析，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这样进行研究是很少见的，因为这会造成论述上的顾此失彼。相反地，通常总把各种思想倾向看作是以某个集团或某位主要人物为核心而实际形成的。这正是当代在关于党或有关的党结盟方面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某个党最初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它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影响又是怎么发展的，等等。这需要对过程中的每一细节作面面俱到详尽无遗的分析，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包括专著、小册子、报纸期刊上的文章、谈话以及辩论等等。浩如烟海，反复论述，不厌其详；这些资料加在一起反映出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是同质的集体意志产生的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所谓一定程度，是指为实现一种在时间空间上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协调和同步的行动所必要的和充分的程度。

关于在集体意志借以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初期，乌托邦以及各理性主义的混乱思想的意义问题。乌托邦或抽象的理性主义，同根据不断积累的经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旧世界观，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重要的是新历史时期的初期代表人物对这一复杂的意识形态所作的批评。通过这种批评就有可能逐步鉴别和改变旧意识形态成分原来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先前是次要的从属的甚至附带的东西，如今被认为是主要的，成为一种新的综合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核心。由于从属成分的社会地位的发展，旧的集体意志要分解为与自身相对立的成分，等等。

在党的体系形成以后——这是一个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统一

(交通工具、报纸、大城市等)有联系的历史时期——分子过程比过去发生得更迅速了,等等。(1931—1932年)

连续性和传统

在《浅薄与纪律》某处所提到的问题的一个方面,从一个集团的核心组织的角度来看,是“连续性”问题,即力图形成一种“传统”,当然是积极意义上的,而不是消极意义上的:是不断发展而且是“有机的发展”的连续性。这个问题概括地包含着全部“法律问题”,即要使整个集团同化于它那最先进的小部分的问题,这是一个教育群众的问题,使他们按照要求同所要实现的目标“保持一致”的问题。这正是国家和社会中的法律的作用:国家凭借“法律”使统治集团“同质化”,并力求形成一种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发展方向的一体遵守的社会准则。一般的法律活动(它比纯粹的国家 and 政府活动的范围更广,把涉及到市民社会的管理活动、法律专家们所称的法律上的中立区,即通常所称的道德和风俗习惯的领域,也包括在内)有助于更好地也就是具体地了解伦理问题。实际上,这就是要使每个人“自发地和自由地接受”行为与许可的一致,使每个人的行为同社会本身所规定的必要目标相一致,这种一致在专家们所称的成文法的领域里是带有强制性的,这种强制在不归国家管辖而受舆论、道德风气等影响的领域里则是自发的和自由的。核心组织在“法律上的”连续性(法统)不应该是拜占庭—拿破仑式的(即有所谓永恒的法典为依据),而应该是罗马—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也就是说,这种法统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并且始终同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的实际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有机的连续性要求有完整的档案,资料丰富而又便于利用,根据这种档案资料可以对一切过去活动进行稽核和“批判”。

这种过去活动的最重要的表现与其说是“有机的决定”，不如说是解释性和推理性的（教诲性的）循环论证。

的确有形成“官僚化”的危险，但任何一种有机的连续性都有这种危险，这一点必须警惕。不连续性、临时凑合的危险更大。喉舌：“公报”，有3个主要方面：1. 指导性文章；2. 决定和循环论证；3. 对过去的批判，即从今天出发不断回顾过去，详细说明演变过程，用分析的眼光论证其必然性。〔1930—1932年〕

自发性和自觉领导

“自发性”这个词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因为它所指的现象是多方面的。但必须强调指出，“纯粹的”自发性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它会得出与“纯粹的”机械性同样的结果。所谓“完全自发的”运动无非是指“自觉领导”的因素由于找不到可靠的文献而无法核实。因此，自发性可以说是从属阶级尤其是其最外围部分的历史的特点；他们还没有达到“自为的”阶级的意识，所以决计不会想到他们的历史还会有什么重要意义，也从来不去考虑留下证明这种历史的文献资料会有什么价值。

看来在这种运动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自觉领导”的因素，不过没有哪一种能成为主导因素，或能超越一定社会阶层的“通俗科学”——它的“常识”或传统世界观——的水平。这正是德·曼在经验上使之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东西，不过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一步步滑到这样一种人的立场上，他们在对民间习俗、巫术等作了一番描述、并说明这些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根源、在一定的民众阶层的心理上牢固地交织在一起等情形之后，就自以为已经“超越”了现代科学——他们把通俗科学期刊上的每一篇小文章都看作是“现代科学”。这是精神畸形学中的一个现实病

例，此外还有这样的病例，如民俗赞美派，同马特林克有联系的“巫术论者”，前者主张保存民间习俗，后者主张必须把被暴力折断的炼金术和巫术的线头重新连结起来，以使科学回到可以产生更丰富的发明创造成果的轨道上云云。不过德·曼倒有一件附带性的功劳：他论证了需要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和阐明民众的心理因素，需要本着积极的态度（即抱着通过教育手段把它们改造成现代心理的目的）象他所做的那样去描述。德·曼哪里知晓，这种必要性在伊里奇〔·列宁〕的学说里至少已经含蓄地提到过（甚至可能公开论述过）。任何一种“自发”运动都包含着“自觉领导”的、受纪律约束的基本因素，这一点已为下列事实所间接证明：存在着把自发性当作方法来吹捧的各种流派和集团。在这里必须把纯“意识形态”领域同实践活动领域区别开来，必须把那种认为自发性是历史过程的内在的客观的“方法”的学者，同把自发性看作是一种“党派政治的”方法的政治冒险家区别开来。前者是一个认识错误问题，而后者所涉及的却是一种直接的庸俗的矛盾，其实践根源是十分清楚的——想要用另一种领导来直接取代现有的领导。就拿学者的错误来说，也有其实践根源，不过同政治冒险家的情况不一样，不抱有任何直接的目的。战前法国工团主义者所抱的非政治倾向包含着上述两种因素：既有理论上的错误，也有矛盾（有“索列尔”因素，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政治倾向同社会主义倾向之间对立的因素）。这种非政治倾向是可怕的1871年巴黎事件所造成的后遗症：法国工人阶级在30年间（1870—1900年）一直保持消极，只是方法有所翻新，还有一套十分漂亮的理论。纯“经济”斗争并非不合统治阶级口味，正好相反。可以说，卡塔兰的运动⁷²的情况也是一样，西班牙统治集团之所以对它“大为恼火”无非是因为它在客观上加强了卡塔兰的共和分离主义，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反对大领主、小资产者和皇家军队的共和主义工业集团。有人

曾对都灵的运动同时扣了两顶帽子：“自发论”和“唯意志论”或柏格森主义⁷³。只要一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自相矛盾的指责恰好证明当时对运动的领导是正确的，创造性的。这种领导并不是“抽象的”，它既没有生搬硬套某些科学公式或理论公式，也没有把政治、实际行动同理论研究混为一谈。它的出发点是在一定历史关系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情感、观点以及不成体系的世界观等的现实的人，这是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状况同“偶然地”凝聚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因素“自发地”结合的产物。这种“自发性”因素是不容忽视的，更不能加以鄙视，而是要进行教育、引导、清除外来的污染，使它符合“现代理论”⁷⁴，不过在方式方法上要生动活泼，从历史实际出发。不错，领导者自己也谈到过运动的自发性，但说的是一种振奋人心的鼓励，一种内部团结一致的因素；它根本不承认运动是一种可以任意炮制的冒险，而是要强调指出其历史必然性。这样说是为了使群众能够“从理论上”认识到他们是历史的和制度的价值观的创造者，是国家的奠基人。这种“自发性”同“自觉领导”或“纪律”的统一恰恰就是从属阶级的实际政治行动，因为这是群众性的政治活动，根本不是那些自称代表群众的集团的冒险和投机。

说到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现代理论”会反对群众的“自发”感情吗？——所谓“自发”，是指这种感情并不是通过一个已经自觉的领导集团的系统的教育活动而产生的，而是通过“常识”（即传统的流行的世界观）所阐明的日常经验而形成的，传统的流行的世界观本是一种原始的质朴的历史产物，却被称作“直觉”，实在令人费解——答曰不会。这两者之间只有程度上的“量”的不同，而无质的差别。可以说，它们之间的“互变”，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必然是可能的。（回忆一下伊曼努尔·康德的观点，他认为努力使自己的哲学理论符合常识很重要，柯罗齐也持这样的见解。同时也回忆一下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论断，法国

革命的政治公式可以归结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原理。⁷⁵⁾ 忽视或更有甚者鄙视所谓的“自发”运动，换句话说，就是不对运动实行“自觉领导”，或者硬把它们卷入政治而使运动升级，常常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事情几乎总是这样：在出现从属阶级的“自发”运动的同时也出现一个统治阶级右翼的反动运动，它们是形影相随的。例如一场经济危机既使从属阶级中出现不满情绪，从而产生自发运动，同时也使反动集团中出现种种阴谋，想利用政府在客观上受到削弱之机发动政变。在引起政变的客观原因中必然有这样一条：领导集团对自发骚乱不采取“自觉领导”，或者使它们变成正面的政治因素。注意“西西里岛晚祷”大起义的实例⁷⁶⁾，以及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究竟是自发运动还是预谋的运动。在我看来，这两种因素是兼而有之的。一方面，这本是西西里岛人民自发起来反对普罗旺斯统治者的起义，由于来势迅猛，顷刻席卷全岛，就给人以同时举事也就是有预谋的印象；这次起义是压迫太甚的结果，使全岛人民忍无可忍。另一方面，其中也有有意识的因素，尽管实际起作用的程度各有不同，这是乔万尼·德·普罗西达联合阿拉贡人密谋策划的成功。从一切以往的革命中还可以举出若干这类例子：参加革命的有好几个从属阶级，根据经济地位和内部团结程度形成等级制度。广泛的各民众阶层的“自发”运动使最进步的从属阶级有可能取得政权，这是国家在客观上受到削弱的结果。这还是一种“进步的”例子；但在当代，则退步的例子较为常见。

存在着一种学究式的历史政治观，认为只有百分之百自觉的起义运动，也就是有事先详细制定的计划指导的或符合抽象理论的（两者实质上是一回事）运动，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运动。但现实中所出现的却大量是异乎寻常的“不纯”，这些现象有待于理论家们加以解释，以便从中找出其理论的新证据，把历史生活的因素

“译成”理论语言。不能指望现实会符合抽象的先验图式。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出现，因此这种观念只是消极的表现，如此而已。（莱奥纳多能从宇宙生活的一切表现中看出本质，然而即使在那里，凡夫俗子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片模模糊糊的偶然性和混乱。）〔1930年〕

反对拜占庭主义

有人认为，似乎理论的价值就在于本身，与任何具体实践无关，对于这种倒退的所谓理论观不妨称之为“拜占庭主义”或“烦琐哲学”。如果要举出一个典型的“拜占庭主义”的例子，那就是所谓的《罗马提纲》⁷⁷，它象纯粹经济学那样对每个问题都运用一种数学方法。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理论上所发现的与一定实践相适应的真理能不能推而广之看作某个历史时代普遍适用的真理？要想证明它是否普遍适用完全得看：1. 它是否成了一种动力，促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与从中发现了这一真理的具体现实不同的其他具体现实情况（这是衡量其生命力的主要尺度）；2. 如果它确实有助于对具体现实有很好的了解，那么还得看它能不能同那个现实相结合，就象它本来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一样。如果能这样结合，那才证明它是真正普遍适用的，并非仅仅出于逻辑上或形式上一贯的推论，或者仅仅由于它是对付论敌的有用工具。总之，必须永远掌握这个原理：思想或哲学不是另外的思想或哲学的产物，而是现实历史发展的不断更新的反映。历史的统一（即唯心主义者所说的精神的统一）不是一种事先规定的假设，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具体现实的同一决定着思想的同一，而不是相反。同时还可以说，任何一种真理，即使是普遍适用的，即使（看在理论家面上）可以用抽象的数学公式来表示，也还得用适合于一定具体情

况的语言来表达它的实际效用。如果它不能用具体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是一种拜占庭式的烦琐哲学的抽象,只能供清谈家们把玩欣赏。〔1932年〕

总 体 工 人

对战后事件以及对力图从规章(组织)入手摆脱当时流行的力量混乱分散的状态的批判描述,通过同行会的对照(或者确切地说是独立于行会⁷⁸)说明运动如何维持工厂,这一切完全符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里⁷⁹对工厂制度发展过程所作的分析。分工的日益完善在客观上使工厂工人的地位变成日益“分解的”零件运动,集体劳动的复杂性缩小了个体劳动者的综合性;在个人劳动者的意识中,他个人的贡献已经渺小到随时可以被取代的程度。与此同时,有组织的协作劳动使生产更加“社会化”,因此工厂的全体劳动力被看作总体工人。以上这些就是工厂运动的前提,其目的是要使本来是“主观的”变成“客观”赋予的。在这里客观的究竟指何而言?对于单个的劳动者来说,技术发展的要求同统治阶级利益相结合是“客观的”。但这种结合,这种技术与统治阶级利益的统一,只是工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必须看作是暂时的。这种结合是可以分解的,从具体方面看,可以认为,技术要求不仅仅单纯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同眼下还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有关。关于这种“分解”和重新结合是历史地成熟的论点,下列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不由得你不信服的证明:这一过程已为从属阶级所理解,正因为如此,这个阶级才不再是从属的,或者至少有即将摆脱其从属地位的显著迹象。“总体工人”懂得,这才是他们的英雄本色,不仅在每个工厂里是如此,而且在国内和国际分工的广阔领域里也是如此。“总体工人”要使工厂成为生产实物而不是

生产利润的有机体，只有这样，他们才从政治上正式证明他们已经具备了这种认识。〔1932年〕

唯意志论和社会群众

在一系列问题中——无论是为解释过去的历史或对目前形势作历史—政治分析时所提出的问题——没有人注意下列因素：必须把“有志者”⁸⁰的行动和组织跟同质的社会集团的行动和组织区别开来，按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很明显，如果指的是社会群众的有机表现，那么就不应把“有志者”的含义看作是杰出人物，而是指那些孤芳自赏、置身群众之外的人，他们往往对群众抱对立的或中立的态度。）

在意大利，这个因素之所以特别突出，是由于：1. 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抱冷淡和消极的态度，“招募有志者”比较容易是针对这种现象的自然而然的反应；2. 意大利的社会构成的特点之一是乡村（或乡村型）中小资产者的数目反常，从中产生出大批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从而涌现出一批批准备从事任何（哪怕是最离奇的）冒险事业的“有志者”，这（对右翼或左翼来说）是一种带有破坏性的隐患；3. 乡村地区的工资劳动者和游民无产者（在意大利这种人有个浑名叫“饿汉”⁸¹）人数很多。只要分析一下意大利的各种政党就可以看出，这些党一向是“有志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失意者”）组成的党；它们从来或几乎从来不代表同质的社会集团。只有历史上著名的加富尔的右翼党人是个例外，他们总是对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所谓行动党保持着有机的经常的优势。后者成了意大利后来的各种“群众性”政党的原型——其实它们根本不是什么群众性政党（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同质的社会集团的组织），而是政治上的吉卜赛乐队或游民。只有一位作者作过这样的分析（而且还是

那么笼统而不中肯，完全是从“统计—社会学的”观点出发的)，那就是罗伯特·米歇尔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灵，波卡书局1908年版）。

戈特利布的立场同行动党如出一辙，就是说，也是吉卜赛游民式的。⁸² 他对工会的关心是极其表面的，实质上是论战式的——不是系统的、有机的、一贯的，也不是以社会同质性为出发点的，而是家长式的和形式主义的。

必须区分两种唯意志论，或者两种加里波第主义。一种自封为解释有机的历史—政治活动的理论，完全以个别超人的语言代替“整体超人”的语言，自吹自擂（对少数风云人物歌功颂德等等）。另一种则被认为是某个历史时代初期的唯意志论或加里波第主义，必须作好准备迎接发展；在这种历史时代，将为参加作为社会联合体的这种有机的集合体（意指共产党——译者）提供充分的机会。没有大军作后援的“先锋队”，没有步兵或炮兵支援的“突击队”，凡此种种也是变相的光唱高调的英雄主义——当然，作为综合的正规有机体里职有所司的先锋队和突击队则又当别论。同样也必须区分什么是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杰出人物，什么是自觉地同民族—人民的群众保持有机联系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必须同上述种种蜕化变质、虚假英雄主义和冒牌贵族等现象作斗争，促进同质的巩固的社会联合体的形成，这样就能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自己的突击队，自己的先锋队——他们反过来也会对这种联合体起作用，使它们得到发展，而不是使它们永远保持吉卜赛式的支配地位。要知道，浪漫主义时代的巴黎放浪派，也是许多当代思潮的精神根源，如果加以嘲笑，岂非数典忘祖。〔1933—1934年〕

译自葛兰西《狱中札记》1978年英文版第125—205页

国家和市民社会

略论政党发生内部危机时 在结构方面的几个问题

社会阶级在其历史存在的一定时刻会同自己的传统政党决裂。换言之，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传统政党，以及组成、代表并领导这一政党的一定人物，不再被那个阶级（或那个阶级的一部分）承认为自身的代表和体现。一旦发生这样的危机，局势立刻变得微妙而危险，因为这就给暴力解决大开方便之门，神通广大的“拿破仑式”的势力就会乘虚而入。

这种“被代表者与代表者”之间的冲突从政党的领域（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组织，议会选举，报刊团体）扩散而波及到整个国家机体，从而相对地加强了官僚（文职的和军职的）、财阀、教会以及所有一般说来不大受舆论影响的机构的权力，这种情况最初是怎样产生的？这个过程在每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尽管其内容是一样的，即统治阶级的领导权危机。这种危机之所以产生，或者是由于统治阶级原先取得广大民众拥护或强迫他们支持的某项重大政治任务（如战争）遭到了失败；或者是由于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突然从政治消极状态转入一定的积极状态，提出种种要求，这些要求虽然不是有系统有纲领的，总起来却等于一场革命。通常所说的“权威的危机”正是指这种领导权的危机或整个国家的总危机。

这种危机造成一触即发的紧急局面，因为国民中的各个阶层

并不都具备迅速认清形势、立即调整部署的应变能力。传统的统治阶级由于拥有大批训练有素的干部，就可以抢在从属阶级之前撤换人员，改变纲领，把眼看着就要失去控制的局势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甚至可以有所牺牲，作出种种承诺，这些诺言说得天花乱坠，可就是要到渺茫的未来才能兑现；然而他们却得以暂时保住政权、加强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去摧毁自己的对手，逼得对方的人数本来就不太多而且又缺乏足够训练的领导干部四处躲藏，不敢露面。在这种情况下，好多党派的大批党员投奔到一个能够更好代表和体现整个阶级的要求的党的旗帜下，哪怕这种转向的来势异常迅猛，同平静时期相比简直是闪电式的，也是一种有机的正常现象。它标志着某个社会阶级在一个统一的领导之下联合起来，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个领导才有能力解决有关他们生死存亡、转危为安的头等大事。如果危机不是由这种有机的办法来解决，而是靠一位天纵英明的领袖人物的旨意，那么这说明存在着一种静止的平衡（这种平衡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进步力量还不成熟）；同时也说明，无论是保守的集团还是进步的集团都没有力量赢得胜利，保守的集团甚至还需要一个主子。

〔1932—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0—1932年〕参阅《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类现象同政党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有关，即政党能不能顶住习惯势力的侵袭，能不能避免自身僵化，不致变成时代错误。政党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团体，其使命就是要在对它们的阶级来说是历史关键时刻去影响局势；然而它们并非总能适应新的任务，新的时代，随同本国或国际上总的力量对比（以及由此而来的它们的阶级的相对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在分析政党的发展时，必须区分：它们的社会集团；它们的群众成员；它们的官僚和总参谋部。党内官僚是最危险最死气沉沉的保守力量，如果他们抱成一团，自以为是独立存在于党员群众以外的集团，那么党

本身最终会落后于时代，在危机的紧要关头就会被抽掉本身的社会内容，成为浮在上面的空架子。试看德国的许多政党由于希特勒主义泛滥而变成了什么样子。法国有一些政党也成了研究这个问题的丰富土壤：它们都成了落后于时代的木乃伊，都成了法国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政治文件，它们继续重复着这些文件上已经过时的老调子；它们的危机可能要比德国的政党更为可悲。〔1932—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0—1932年〕

在考察这类现象的时候，人们总是忽略官僚因素（政界的和军界的）而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此外，也没有考虑到，不但担任实职的文职官僚和军职官僚应该是这类分析的对象，而且在一定国家结构中历来是官僚后备军的那些社会阶层，也应该被包括在这类分析中。政治运动可以带有军事性质，即使军队本身不公开参与政治运动；政府可以带有军事性质，即使军队本身并没有派代表参加政府。在一定情况下，不使军队“露面”，不使军队超出宪法规定的界限，正如俗话所说，军人不干政，以便在表面的守中立超党派的基础上维护官兵之间的团结一致，可能更为适当；然而决定新局面、控制新局面的还是军队，也就是总参谋部和军官们。所谓按照宪法规定，禁止军队干政，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军队的职责恰恰就是保卫宪法——也就是国家及其有关机构的法律形式。因此，所谓中立只能是对反动势力的支持；但是在这种场合，对问题的提法必须掌握分寸，以免国内发生的动乱波及到军队内部，从而避免总参谋部因军事机器解体而失却决定权。当然，以上的看法都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它们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

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不论在哪个国家，有没有一个广大的社会阶层专门以做官为业，不论在政界或军界，来维持其经济地位并谋求政治上的进取（实际参加政权，哪怕是间接地，采取“讹诈”手

段)? 在现代欧洲,可以认为乡村地区的中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层,他们的人数在每个国家里多寡不等,完全取决于各国本身的工业发展以及农业改革的程度。当然,(在政界和军界)当官并非这个阶层的专利,然而这个阶层却最适合于当官,一方面由于他们所执行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也由于这种职能所产生或促成的心理趋向。这两种因素使这个阶层在整体上有某种齐心协力的奋斗目标,从而形成了他们在整个社会机体内部的政治价值,并且常常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阶层的成员习惯于对心腹(尽管人数极少)直接发号施令,而且这种指挥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指挥艺术不包括管理“物”的才能,不包括象管理工业生产那样“连人带物”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处理的才能,因为这个阶层本身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职能。他们有收入,因为法律规定他们是部分国家土地的所有者,他们的职能是从“政治”上阻止农民提出改善其生存条件的要求,因为农民地位的任何改善都是对他们的社会地位的灾难性的打击。农民的长期贫困和辛劳,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民的愚昧落后,乃是这个阶层得以存在的最必要条件。他们之所以极力反对和拚命压制农民劳动者建立最起码的自治组织,不许有任何越出官方宗教范围的农民文化运动,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个社会阶层的局限性,也是其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地域上的分散以及与这种分散有密切联系的“成分复杂”。这也可以说明他们的另外一些特点:他们健谈善辩,所信奉的思想体系是多种多样的,有时甚至是稀奇古怪的。他们的意志是有具体目标的,不过这种意志十分迟缓,通常需要经历相当长期的过程才能成为政治上和组织上集中的意志。如果这个阶层的具体“意志”同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当前利益相吻合,那么这一过程就会加速;不但如此,那时这个阶层的“军事力量”也会突然出现,这种军事力量组织起来之后,有时会迫使统治阶级接受即使不涉及解决问题的实质、至少也

涉及解决问题的“形式”的法律。如果就从属阶级而论，可以认为，还是前面论述城乡关系时所指出的那些法律在起作用。城市政权自动地成为乡村政权。由于在乡村地区缺乏经济自由活动的余地以及一贯的自上而下的沉重压迫，一有冲突就十分激烈，而且总是以“私人冲突”的形式出现，所以“反击”必须更为果断和坚决。这个阶层深深懂得，给他们制造麻烦的根子是城市，是城市的政权；因此他们“必须”迫使城市的统治阶级给解决问题，以消灭捣乱的主要温床，——哪怕城市的统治阶级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或者是由于代价太高，或者是认为这样做从长期来看是危险的（城市的统治阶级的眼光放得比较远，他们并不光顾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是考虑比较长期的发展趋势，相机施展手腕）。正是应该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在绝对意义上，去认识这个阶层的指挥职能；⁸³即使这样，这个问题也决非区区小事。*必须指出，这个社会阶层的“军事”性质——过去，一向是他们对自身的特定生存条件的自发反应——如今是有预谋有意识地加以培养，使之有机地形成。一贯地致力于建立和加强各军种兵种的预备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特别是军官的团体，就是这种有意识过程的表现。这些团体分别同有关的参谋总部有联系，一旦需要就可立即动员，而不必进行征召新兵入伍的动员。这样一来就可使应征的兵员保持其后备军的性质；而这些“私人”军队不可能不对后备军的道德有影响，在他们的支持、扶植和预先教育下，这支后备军巩固了，不至于在政治上解体。可以说，其结果就是一种“哥萨克”式的运动，不过这种部队并

* 通过右翼党人的保守派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活动，可以看到这个阶层的写照。盖泰诺·莫斯卡⁸⁴的《统治理论与议会统治》（1925年第2版，1883年初版）就是这方面的一例。早在1883年，莫斯卡就因看到城乡之间有可能接触而深感惊恐。莫斯卡出于防守的立场（反攻的防御），在1883年就对从属阶级的政治艺术有所了解，他的了解比几十年后那些从属阶级的代表人物，哪怕是城市里的从属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了解还要深刻。

不是象沙皇的哥萨克那样部署在国境线上，而是部署在社会阶级的“边境线”上。

因此，在许多国家里，军队对国家生活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职业军人的影响，而且也表现为作为职业军人（尤其是下级军官）主要来源的那个社会阶层的影响。以上所谈的一系列看法，对于通常称作凯撒主义或波拿巴主义的一定政治形式作认真深刻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使之有别于职业军人本身在其中的支配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彻底的其他形式。

西班牙和希腊是两个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的典型例子。必须注意西班牙的某些特点：国土辽阔，农民人口密度小。在贵族大地主与农民之间没有人数众多的乡村资产阶级；因此，下级军官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的作用很小。（相反，技术兵种——炮兵和工兵——的军官却在军队内部拥有一定的势力；这些军官都是城市资产阶级出身，他们同将军们闹对立，企图实行他们自己的政策。）因此，西班牙的军政府是“伟大”将领们的政府。广大农民群众的态度，也同市民和士兵一样，是消极的。如果由于上层派系斗争而使军队发生政治瓦解，那么这种瓦解是“纵向的”而非“横向的”：士兵们也随着彼此斗争的上级领导而分裂。军政府是两届宪法政府之间的插曲。军队是维护现行制度和秩序的常规后备力量，也是“法制”处于危险境地时“公开”行动的政治力量。希腊的情况亦然如此，所不同的是，希腊的领土是由许多岛屿组成的，一部分比较积极能干的居民经常出海远航，因而容易发生军事叛乱。希腊的农民也象西班牙的农民一样消极，但联系全体居民的情况来看——最积极能干的希腊人是水手，差不多常年远离政治生活的中心——对这种普遍的消极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两国的国情出发，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可能都一样。几年前希腊发生了一批下台政府的成员被处决的事件⁸⁵，这件事大概只能用上面所说的积

极能干分子的强烈冲动来说明，其意图是要给点血的教训。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希腊和西班牙的军事统治经验都没有能够产生一种稳定的有机的政治社会思想体系，相反，在那些所谓潜在的波拿巴主义国家里倒是产生了。这两类国家的一般历史条件是相同的：彼此斗争着的各城市阶级的均势，这种均势阻碍着“正常”民主即议会制度的进程。但乡村对这种均势的影响在这两类国家里却是不一样的。在西班牙这类国家，乡村是绝对消极的，因此贵族地主出身的将军们就可以利用军队干政，来重新稳定那岌岌可危的均势，换句话说，就是保牢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力。在另一类国家，乡村不是消极的，然而农民的运动并没有同城市的运动在政治上互相配合；这样一来，军队不得不保持中立（当然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守中立），因为如果不守中立，军队就可能发生横向的分裂；于是军事官僚阶级开始行动。他们动用军事手段镇压乡村的（比较有直接威胁的）运动。通过这种斗争，他们达到了某种政治的和思想的一致，也在城市中等阶级里获得了同盟者（这里所谓中等是按意大利的标准）⁸⁶，——由于乡村出身的大学生变成城市居民，中等阶级的队伍壮大了，——从而迫使上层阶级不得不接受他们的一套施政办法，作出种种让步，批准某些立法以保障他们的利益。总之，他们让别人统统放下武器，而自己却继续保持武装，如果统治阶级态度强硬，不肯就范，那就不惜诉诸武力，准备同国家常备军开仗打内战，因此，他们得以在一定时期内使整个国家服从于他们的利益，并且排挤掉一部分掌权人物取而代之。不应把这些看法当作一定不易的公式，只能作为进行历史和政治分析的实用指南。在对现实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时，其历史形态总是各具特色，而且可以说差不多都是“独特的”。凯撒代表着一种现实情况的组合，拿破仑一世也代表着一种现实情况的组合，这两者是迥然不同的，正如普里莫·德·里维拉与日夫科维奇⁸⁷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一样，

等等。(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0—1932年)

分析在一定形势下存在的力量对比的第三个层次或阶段时,使用军事学中称为“战略形势”,或者更确切地说,叫做战区的战略准备程度的概念,也许是有益的。这种“战略形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领导人员的素质以及所谓“火线”(和突击)力量的战斗力。如果战略准备充分,那么即使“表面上”(即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力量也能克敌制胜。可以这样说,战略准备的目的是要消除所谓“估计不到的因素”,也就是说,要把一向处于消极无为状态的力量在一定时刻突然反动的可能性消灭于未然。要为有利的战略形势作准备,除了上述因素,还必须考虑前文已经探讨过的一些因素,即除了国家正规军,还存在着有组织的军人社会阶层。*

1932年5月19日陆军部长盖泽尔将军在参议院的讲话(载5月20日《晚邮报》),其中有一段话可能是对上述因素的进一步发挥:“我们军队里所实行的那套纪律,由于有了法西斯主义,今天已成了全国遵守的指导准则。别国的军队过去就有正规的严格的纪律,而且至今仍然保持着这样的纪律。我们始终奉行的一项原则就是军队的使命是作战,因此必须作好战争的准备;平时的纪律应该同战时的纪律一样,必须在平时就为战时纪律奠定精神基础。我们的纪律是建立在官兵一致的基础上的,这种一致乃是我们所奉行的制度的自然而然的产物。这个制度出色地经受住了一场长

* 汤·蒂托尼在《内政见闻录》(载1929年4月1—16日《新文选》)中有关“军人阶层”的论述是耐人寻味的。他谈到他曾考虑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了平息某一地区发生的骚乱,必须从其他地区抽调治安部队。在1914年6月“红色周”时期,为了镇压安科纳地方的骚乱,便从拉文纳地方调兵;结果,由于治安部队被调走,拉文纳的警察局长只好躲在自己的官邸里,听任暴动者在全市为所欲为。“我曾多次反问过自己,如果整个半岛同时发生暴动,政府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蒂托尼建议政府把过去打过仗的军人召集起来,编成“社会治安志愿队”,由退役军官统率。他的建议看来是值得考虑的,只是当时未被采纳。

期的艰苦卓绝的战争的考验，取得了最后胜利；法西斯制度的功绩就在于它把遵守纪律的卓越传统全面推广到了全体意大利人民中间。战略意图及战术行动之成功，关键在于个人能否恪守纪律。战争使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也使我们看到了平时准备与战时实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当然，不论准备得多么充分，战争一打响，总会出现一些使交战双方都感到意外的新问题。但决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事先制定计划毫无用处，从过去的战争中吸取不到有益的教训。事实上，研究以往战争的经验可以制定出一套军事理论，必须通过理智的纪律来认识这种理论，它是统一思考方式的手段，而由于语言本身的统一，使大家可以理解并表达清楚这些观点。如果军事理论的统一有时有蜕变为公式主义的危险，那么马上就会引起迅速的反映，使战术也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然，军事技术的进步也会引起战术上的改变。可见条例并非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传统。对传统只是作为一种力量来考察，条例之所以经常修改，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使条例切合实际。”（邱吉尔在《回忆录》里所谈关于日德兰半岛战役的情况，可以看作“战略形势准备”的一个实例。）〔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2年〕

凯撒主义⁸⁸

对于凯撒、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克伦威尔等人，应该编一部时势造“英雄”的历史大事记。

可以这样说，凯撒主义反映了一种彼此斗争的力量处于势均力敌的危急状态的局面，换句话说，继续斗争下去只能形成使双方同归于尽的难分难解的局面。进步力量甲与反动力量乙进行斗争时，不仅会出现不是甲战胜乙便是乙战胜甲的局面，而且会产生另

一种形势，即甲、乙都不能取胜，正当双方精疲力尽之际，突然闯进来第三种力量丙，征服了甲乙双方的残余力量。高贵的洛伦佐死后的意大利局势就属于这种情况。⁸⁹

凯撒主义经常是各种力量相持不下而有崩溃之势的历史—政治局势的特殊解决办法，即听命于一位伟大人物的“仲裁”。但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下凯撒主义的历史意义都相同。凯撒主义可以有两种形式：进步的 and 反动的；每一种形式的确切意义归根到底只能依靠具体的史实而不能根据什么社会学的公式来说明，如果凯撒主义的干预有助于进步力量取得胜利（即使这胜利里面包含着某种妥协和限制条件），那么它就是进步的。如果它的干预有助于反动力量取得胜利，那么它就是反动的。尽管这种胜利同样包含着一定的妥协和限制条件，但和前一种情况相比，这些妥协和限制条件却具有不同的范围、意义和作用。凯撒和拿破仑一世是进步的凯撒主义的实例，而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则是反动的凯撒主义的实例。

问题是要判明，在“革命或复辟”的辩证过程中，究竟哪种因素起主导作用，是革命呢还是复辟？历史运动决不能开倒车，也决不存在绝对的复辟，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凯撒主义只是一种论战——意识形态的提法，并非解释历史的准则。即使没有凯撒，没有伟大的“英雄”和代表人物，照样可以有凯撒主义的解决。议会制度也就是搞这种妥协解决的机构，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搞这类妥协，当麦克唐纳担任政府首脑并且获得保守党多数支持时⁹⁰，凯撒主义的程度增加了。同样，在意大利，从1922年10月到“人民党”变节，尔后在1925年1月3日以前又经历了好几个阶段，最后到1926年11月8日⁹¹，这一切也无非是程度不等的凯撒主义竞相取代的政治—历史运动，直到一种比较纯粹比较稳定的形式被确立为止，但即使这样，也决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

任何一届联合政府都是凯撒主义的最初阶段，它可以发展也可以不发展到比较突出的阶段（当然，在一般人看来，联合政府反倒是反对凯撒主义的“最坚固堡垒”）。在现代世界上，凯撒主义机构，由于存在着经济—工会的和政治—政党的广泛联合，其情况同拿破仑三世以前相比是大不一样了。在拿破仑三世以前的时代，正规军是凯撒主义得以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通过政变、军事行动等而产生。而在现代世界，由于工会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存在，也由于少数公民集团掌握着无限的财政资金，问题就复杂起来了。可以用利诱和威胁的手段来收买政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不必象凯撒时代或雾月十八日那样诉诸大规模军事行动。在这方面就会出现前文所考察过的1848年雅各宾派的所谓“不断革命”的局势。1848年以后，由于议会制度以及工会联合和政党联合制度的发展，由于国家的和“非官方的”官僚阶层的广泛形成（从政治上说的“非官方”，即政党和工会的官僚阶层），同时也由于治安组织方面所发生的改变——也就是说，它成了广义的治安组织，不仅指镇压犯罪行为的机构，而且指由国家和私人所组织的、一切旨在保卫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力量的总和——，由于这一切，现代政治艺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全部“政党”和各类团体，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其他性质的，看作是带有调查和预防性质的政治治安机构。关于力量甲与乙在斗争中两败俱伤，从而造成（重新造成）凯撒主义得以产生（可能产生）的有机平衡的一般公式，完全是一种（对政治艺术方便的）一般假设，社会学的公式。有可能使这种假设变得更具体，更接近具体的历史现实，办法是对某些最重要的因素作进一步的说明。

例如，关于力量甲与乙，过去只是笼统地说哪个进步哪个反动，不妨具体说明是哪种类型的进步和反动，这样就可以更加接近（历史现实）。比如谈到凯撒和拿破仑一世时，可以这样分析，力量

甲与乙虽然彼此有别而且互相对抗,但还没有到“绝对”不可能(通过暗中进行的过程)互相结合和同化的程度。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但对实现一定的历史—政治目标而言却是充分的程度,即足以基本上终止有组织的斗争,从而渡过难关避免崩溃)。这是(使认识)比较接近(历史现实)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崩溃形势之造成是出于传统统治力量“一时的”政治上软弱,而不是无法克服的先天不足的必然结果。这可以通过拿破仑三世的例子得到证实。从1815年到1848年,法国的统治力量在政治上(党派上)分为4个阵营: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和雅各宾—共和派。由于(统治力量)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使(进步的)敌对力量乙过早地出头成为可能;然而当时存在着的社会形态本身的发展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一点已为尔后的历史进程所充分证明。拿破仑三世(以其特有的、与他那根本不是什么伟大人物的身分相称的方式)体现了这种内在的潜力,因而他的凯撒主义是另有特色的。凯撒和拿破仑一世的凯撒主义是所谓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即它代表了一个从一种国家型式向另一种国家型式过渡的历史时代,在这种过渡中涌现出无数的革新和创举,总起来就是一场彻底的革命。拿破仑三世的凯撒主义只有数量,而且十分有限;其中没有国家型式的转变,只有同一类型国家按老套子“演变”。

在当代世界上,凯撒主义现象五花八门,既有别于凯撒—拿破仑一世的进步型,又不同于拿破仑三世型,尽管在性质上同后者相近。在当今之世,在最终能够统一的力量之间(哪怕要经历艰苦的流血的过程)不会出现有可能导致崩溃的僵持局面,这种局面只能出现在历史地不调和的对立力量之间,而且任何凯撒主义现象的出现只能加剧这种对立。但凯撒主义在当今之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余地的,其活动范围之大小取决于这个国家本身以及它在世界

上的相对地位。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总是”有继续发展和改善结构的潜在可能和余地，特别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与之对立的进步力量由于本身的特点和生活方式而处于相对软弱的地位上。这个社会的统治者必然要设法使〔进步力量的〕这种软弱地位保持不变，因此人们才说，现代凯撒主义与其说是军事制度，不如说是警察制度。〔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2年〕

如果认为凯撒主义（无论进步的、反动的、还是过渡插曲性质的）中的一切新的历史现象完全是由“最主要的”力量所决定的，那就会犯方法论上的错误（社会学的机械论观点之一）。除了最主要的力量，还必须看到代表最主要阶级的各种集团（社会—经济的和技术—经济的）同受它们领导或受它们影响的辅助力量之间的关系的具体表现。比如说，如果不研究法国军事集团和农民的作用，就无法理解12月2日的政变。⁹²

从这一观点看，法国的所谓德雷福斯案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插曲。把这个问题放到这里来考察，并不是因为它导致了“凯撒主义”，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它阻止了酝酿中的凯撒主义以明显的反动形式出现。营救德雷福斯运动的突出特点在于，统治集团本身有一部分人参加了这一运动，他们挫败了统治集团中最反动的部分想建立凯撒主义的图谋，同时他们在斗争中并没有依靠农民和乡村地区，而是依靠了城市中在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领导下的从属阶层（其实他们也争取了一部分最先进的农民的支持）。同德雷福斯案件相类似的现代历史—政治运动还时有出现，它们当然不是革命，但也不完全是反动的——至少它们在统治集团阵营内部摧毁了那些令人感到窒息的、已经僵化了的国家机构，使一批人数较多的新人物进入国家生活，投身社会活动。⁹³ 这些运动也可以有相对的“进步”内容，因为它们证明在旧社会里潜藏着旧的统治者不知如何加以利用的富于战斗性的力量，哪怕是“外围的”

力量。这种力量不可能是绝对进步的，因为它们不是一种“开创新纪元”的力量。它们之所以在历史上起作用，并不是由于本身内部的力量，而是由于它们的对手在组织上的无能。这样看来，这些运动同对抗力量之间相持不下的特定局势有关——即其中哪一种力量也不能在各自的阵营里独立代表一种重新振兴的意志。（1933年）

关于海狸的传说

（猎人追捕海狸是为了取它的睾丸制药，受追捕的海狸为了保命就把自己的睾丸撕下甩掉。）为什么不进行防御？是因为党缺乏人类的或政治的正义感吗？但这种因素并非自然现象，而是在一个民族身上作为经常特征而存在的弱点；这是“历史事实”，要从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社会条件中去寻求解释。明显的矛盾：宿命论的和机械论的历史观居于支配地位（佛罗伦萨，1917年，对柏格森主义的指责）⁹⁴，而所采取的立场却是形式主义的、肤浅的和原始的唯意志论。例如，1920年关于在波洛尼亚建立一个只限于有组织的成员参加的城市委员会的方案。⁹⁵那样只能产生一个无用的复制品，用纯粹抽象的和照搬本本的组织来取代象劳动协会那样同群众有根深蒂固的历史联系的组织。至少，这个方案是否有把领导权交给城市分子〔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这个委员会建立以后，城市分子应该获得一个自己的中心——假设这种劳动协会是在省一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根本没有这种意图，而且方案本身也无论如何难以实现。

特雷维斯的“赎罪”演说⁹⁶：这篇演说对于了解领袖们在政治上的混乱和论战上的浅薄是极为重要的。透过这些无聊的争论正好可以看出这些领袖们怕负具体责任，而透过这种怕负责任的心

理又可看出他们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根本不是一条心，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阶级的基本要求、愿望和潜力。家长式统治的党，妄自尊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党。⁹⁷为什么不进行防御？对战争的病态观念，认为文明国家不能“允许”发生某种暴力行动。

在这种泛泛之论的背后也隐藏着另外的埋得更深的动机（此外，这些论调也同每次发生大屠杀后所反复声明的表态相矛盾：我们早就说过，对于我们，统治阶级是反动的！），这些动机的核心还是脱离这个阶级即分裂成“两个阶级”而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不去了解，如果反动派获胜会出现什么情况，因为并没有进行真正实践的斗争，只是进行理论“原则”的斗争。关于唯意志论还有一个矛盾：谁反对唯意志论，谁就应该赞成“自发性”。然而实际情形却相反：凡是“自发的”东西都是低级的，不值得考虑，甚至不值得分析。其实“自发的”东西正好是最有力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党的无能，因为它表明在漂亮动听的纲领与讨厌的下等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鸿沟。同时，（1919—1920年）所发生的“自发”事件损害了利益，打乱了既定的地位，甚至在安分守己的人们中间挑动仇恨，制造不和，使那些一直无声无息地沉沦的社会阶层也大肆活跃起来。⁹⁸正因为这些事件是“自发的”和不被承认的，这才“惊恐万状”，不得不把镇压的力量联合起来对它们进行无情的镇压。

总同盟与党之间的所谓盟约⁹⁹（可以比作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契约）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反映被代表者与代表者之间这种鸿沟的奇特文献。党好比一个国家结构的雏型，根本不允许分散自身的政治权力。党不能允许一部分党员要求有与党平起平坐的权利，来提出同“整体”结盟，正如一个国家不能允许本国的一部分国民（通过某个外国政府）在一般法律之外，另行签订契约，专门对他们与他们所属的本国之间的关系作出规定。如果允许这种情况，那就等于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国家以及党要服从所谓的被代表者的大

多数：实际上就是服从一个以反国家和反党为己任的、以最终能间接地行使权力为目的的集团。从盟约的情况来看，权力显然并没有掌握在党的手里。

党与议会党团之间所存在的奇怪关系同盟约的情况一样，也采取了按平等的权利结盟的形式。这样的关系等于说，党不是一个独立有机体的具体存在，而是某个比较复杂的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有机体具有工党的一切特征——没有中心，没有统一意志，等等。如此说来应该是工会服从党咯？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来说，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任何党员，不论其地位高低，也不论其职务大小，总归是党的一员，应该服从党的领导。工会与党之间不能是服从的关系：如果工会自发地推举一名党员担任工会的领导人，那意味着工会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指导，从而自觉自愿地接受（也确实希望）党对工会工作人员的监督。虽然有过1914年6月那样教训深刻的先例¹⁰⁰，1919年对问题的提法还是不对头。因为实际情况是：各派组织根本没有一定的方针，所以党也就拿不出具体的方针。〔1930年〕

鼓 动 和 宣 传

通观自复兴运动时期以来意大利各政党（民族主义党在某种程度上例外）的全部活动，始终包含着一种缺点，不妨称之为鼓动和宣传之间的不平衡，但也可以称作没有原则，机会主义，缺乏有机的连续性，战术与战略之间的不平衡，等等。这些党为什么会这样，主要的原因应从各经济阶级的软弱、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停滞中寻找——不过这种解释不免有点宿命论的味道。如果党只是阶级的称谓这个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事实上下列说法也就可以成立，即党不仅仅是这些阶级的机械的消极的反映，而

且会对这些阶级有强大的反作用，使它们发展、巩固和普遍化。这种反作用在意大利却根本没有发生，因而就产生了鼓动和宣传之间的不平衡——或者你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吧。

国家或政府对这种局势负有一定的责任：之所以称之为责任，是因为这样提可以防止国家本身膨胀，即避免造成国家或政府不是一种国家因素的误解。政府事实上发挥“党”的作用。按规定，政府本身是超党派的，这样规定的目的，不是要在民族和国家利益及国家生活的固定范围内协调各党派的利益和活动，而是为了分化瓦解它们，使它们脱离广大群众，从而形成“一支以波拿巴—凯撒主义的家长式纽带同政府保持联系的无党派人士的力量”。对德普雷蒂斯、克里斯比和焦利蒂等人所谓的专政，以及进化论议会现象¹⁰¹，都应从这一角度出发加以分析。阶级产生党派，从党派中产生国家和政府的组成人员，产生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领导人员。在这些表现形式和职能中必定有一种有用的富有成果的比例关系。如果没有各党派的理论宣传活动，如果不进行系统的努力去发现和研究决定被代表阶级性质的各种因素及其发展方式，领袖人物也就无从形成。因此，合格的国家和政府人才稀缺；议会生活卑鄙龌龊；只要贿赂收买几名重要人物就可轻而易举地分化瓦解各党派。也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文化界一派乌烟瘴气，哪有什么高级文化可言。没有政治史，只有毫无生气的故纸堆；没有宗教，只有迷信；没有象样的巨著和评论，只有日报和宣传品，没有严肃的政治学，只有过眼云烟的争吵和意气用事的个人冲突。大学以及各种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由于不卷入党派生活的漩涡，也只不过问国家生活的实际情况，培养了一批不关心政治的国家干部，他们的智力构成完全是一派高调，毫无民族观念。这样一来，官僚们便不受国家的节制，利用他们的行政职务而形成事实上的政党，尤其糟糕的是因为官僚等级制度取代了文化政治等级制度，官僚

们完全变成国家一波拿巴主义的党。*[1930年]

“时代的哲学”

在论述强制和协商一致的那一节里已经说过，意大利的政治学是比较先进的，并对此作了相当直率的探讨——甚至有些担任国家要职的人物也是这样说的。本节所要论述的问题是关于“时代的哲学”的论战，关于战后时期各国生活中的中心题目的论战。世界各国如何恢复由于战争而瓦解的统治阶级的领导权机构？还有，这种机构瓦解的原因何在？可能是因为某种强大的对抗性的¹⁰²集体政治意志的发展吗？如果是那样，问题的解决似乎应该有利于对抗的一方。实际上它却在纯粹机械的因素的冲击下分化瓦解了，这些因素有：（1）原来消极的广大群众参加了运动，但这是一个无组织无领导的混乱的运动，也就是说，没有明确的集体政治意志；（2）在战争时期占据指挥和负责职务的中等阶级，和平以后被解除这些职务并失业——而这种情况正好是在他们学会怎样指挥以后发生的，等等；（3）事实证明这些对抗力量未能把这种混乱局面加以组织以对自己有利。问题是要重新建立一套为原来消极的不关心政治的分子服务的领导权机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不采取强制手段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强制也不可能是“合法的”，等等。由于每个国家的社会关系总和的情况不同，使用强制的政治方法以及合法与非法强制相结合的方式也必然不一样。不关心政治的群众愈多，使用非法强制的成分势必愈大。政治上有组织

* 参看那些在1919年以后批评德意志帝国时期所存在的“类似”情况（从“市民社会”生活的角度看是更为五花八门的情况）的著作，如马克斯·维贝尔的《德国新秩序中的议会和政府，对官僚制度和政党生活的政治批判》一书，由恩里科·鲁塔译成意文并作序，全书共14章200页，但这个译本很不完全，也不十分确切。

和有教养的力量愈大,就愈发需要对合法国家加以“掩护”,等等。

〔1930—1932年〕

政治斗争和战争

在战争中,只要摧毁敌军和占领敌方领土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那么和平也就降临。同时必须指出,只要战略目标能潜在地实现,也就足以使战争结束;换言之,只要能造成一种敌军再也无力作战、打胜仗的军队“有力量”占领敌方领土的无可怀疑的局面就行了。政治斗争却是大大复杂得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比作殖民战争或古代的征服战争,在那些战争中,战胜的军队要长期占领或打算长期占领被征服的领土的全部或局部,而战败的军队被解除武装并彻底解散,但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政治和军事“准备”的领域里继续着。

例如印度反对英国人的政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德国反对法国、匈牙利反对小协约国的政治斗争也这样)采取下列3种战争形式:运动战,阵地战和地下战。甘地的消极抵抗运动是一种阵地战,它在某种时期变成运动战,在另一种时刻又变成地下战。抵制(敌货)是一种阵地战,罢工是一种运动战,秘密制造武器和训练作战部队则是地下战。突击队战术¹⁰³固然不失为一种手段,但运用时得特别小心。如果英国人相信有一场大规模的暴动正在酝酿之中,这场暴动企图用密集窒息的办法,即迫使英国人在一个遍地战火的广阔战场上分散兵力,来消灭英国人目前的战略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英国人凭借他们所控制的境内交通线;可以随意机动,把兵力集中用于“临时出现的”最危急的地点);那么对英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引逗印度人的战斗力量过早出动,以便摸清它们的情况,并使总的运动失却为首的主力。同样的道理,如果德

国的右翼民族主义党派卷入冒险主义分子所策划的政变，那么情况反倒对法国有利，因为这样会迫使早就怀疑其存在的秘密军事组织过早暴露，于是就可以进行从法国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适时的干预。由此不难理解，在这种混合形式的斗争中——基本上是军事性质的，但主要在政治领域里进行（其实一切政治斗争总是有一个军事基础）——使用突击队需要发展独创性的战术，对于这种独创战术来说，战争的经验只能提供一种刺激，但不是一种典范。

关于巴尔干的“科米塔治”游击队¹⁰⁴，这是一个需要单独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些游击队，要联系这个地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条件、乡村阶级的特殊构成、以及当地政府的实际力量来考察。对爱尔兰的游击队¹⁰⁵也应这样看待，它们的战斗形式和组织形式同爱尔兰的社会结构有联系。必须把“科米塔治”的、爱尔兰的以及其他的游击战形式同突击队的问题区别开来，尽管骤然看来它们之间似乎有相同之点。游击战的斗争形式专门适用于以弱小的然而十分顽强的少数对付组织得很好的多数；而现代的突击队则是以巨大的后备力量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些后备力量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动员利用，但却是实际存在的潜力，并以个人支援的方式为突击队提供资助和支持。

在1917—1918年间所存在的突击队与全体大军之间的关系可以使，而且在实际上已经使政治领导者提出错误的开展运动的计划。他们忘记了：（1）突击队只是一支战术部队，而且它本身的存在是以大军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这支大军尽管实力不大但毕竟有一定的活力。要知道，即使纪律和士气松懈到非采取新的战术部署不可的地步，无论如何也还存在着一定的纪律的士气，而新的战术安排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作出的。否则就会被击溃，只能仓皇遁逃，舍此别无他法；（2）不能把突击队看作整个军队总的战斗力

的象征，相反，它是这支军队消极和军心相对涣散的象征。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一切，还必须牢记这样一条总的准则，即如果要对军事艺术和政治作比较，必须始终抱着不可全信的清醒态度，换句话说，这种比较只能作为思考问题的推动力，或者说，只能作为归谬法的条件。事实上，在政治的“民兵组织”中，对犯错误或拒不服从命令的人，既不能给予严厉的刑事处罚，也不存在军法审判，更不必说政治力量在组织结构上是根本无法和军事力量相比的。

在政治斗争中，除了运动战和包围战或阵地战外，还有其他的战斗形式。真正的即现代的突击队运动，1914—1918年期间在其形式上是属于阵地战的范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以往时代的运动战和包围战中也有突击队：轻骑兵和重骑兵，神枪狙击兵团¹⁰⁶，等等，事实上一般的机动兵力都部分地执行着突击队的职能。在组织斥候的军事艺术中同样包含着现代突击队的萌芽。这种萌芽多半包含在包围战中，在运动战中则次之；更广泛地使用侦察部队，尤其要选拔精兵组织突然出击、突围或出其不意的奇袭。

另外，必须记住，在政治斗争中千万不要照搬统治阶级的那套方法，否则就容易上当落套。从目前的斗争来看，这种现象极为常见。受到削弱的国家机构就象一支萎靡不振的军队；突击队——即私人武装组织——开上战场，它有两个任务：一方面使国家机构继续保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同时采取非法手段对国家机构本身进行改组。要是以为在面临非法私人行动时，也可用同样的行动来回敬，换言之，就是以突击队战术来反对突击队战术，那就未免太愚蠢了。那就等于认为国家永远处于惰性状态，但实际情形决非如此，何况还有其他各种不同情况。阶级因素可以造成的重大差别：每天必须劳动若干小时的阶级不可能有常备的专门的突击队组织，至于掌握着大量财源、其全体成员又不受必须劳动若干小时

束缚的阶级，就有这种可能。这些现在已经成为职业性的突击队组织不分昼夜随时可以出动，进行坚决而突然的打击。这样看来，突击队战术有的阶级能用，有的阶级却用不上。某些阶级必须采取运动战和机动战，因为这种战术对他们适用；这种战术要是用于政治斗争，其中也可能包含着突击队战术的配合使用，这样做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要是一味仿照军事方式，那是十足的愚蠢，因为在这里，政治也必须优先于军事，只有政治才能造成机动和运动的可能性。

根据以上所讲的可知，对于军事上的突击队，必须区分其两种不同职能：一种是与现代阵地战有联系的特种部队的职能，一种是它的政治—军事职能。作为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各国军队在世界大战中都使用过。至于突击队的政治—军事职能，只有在那些政治上软弱而又四分五裂的国家里才能有所表现，这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军队的战斗力不强，总参谋部官僚主义化，反应迟钝，行动失灵。〔1929—1930年〕

这里应该提一提罗莎〔·卢森堡〕所写的、专门论述军事学上的运动战和阵地战概念同政治学上的相应概念作比较的那本小册子，这本书已由 C·亚历山大（根据法文）译成意大利文于 1919 年出版。¹⁰⁷

罗莎的这本书试图从理论上总结 1905 年的历史经验，不过做得有点仓促，甚至有点肤浅。她在事实上忽略了“志愿”和组织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事件进程中流传之广、作用之大远远超出了罗莎本人——由于某种“经济主义”和自发论偏见——所作的估计。虽然如此，这本小册子（如同作者的其他文章一样）仍不失为从理论上探讨有关政治学中的运动战问题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之一。她把直接的经济因素（如危机等等）比作野战炮兵，作战时把敌人的防御阵地打开一道缺口，从而使我军得以突入，取得（战略上的）最

后胜利,或者至少取得战略上的重大胜利。当然,按历史学的观点,直接经济因素的作用比运动战中重炮的作用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些因素具有三重作用:(1)把敌人的防御阵地打开一个缺口,造成敌人内部的混乱,从而使敌人对自己,对自己的力量,以及自己的前途丧失信心;(2)能无比迅速地组织自己的军队,造就必要的干部,或者至少能无比迅速地使现有的干部(在此以前的总的历史进程所培养出来的)立即各就各位,把我方分散的力量集合在他们的周围;(3)能无比迅速地形成必要的思想一致,对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有统一的认识。

这种观点是一种十足的经济决定论,不仅如此,它还认为经济因素起作用的速度在时间空间方面都是无比迅速的,这样就愈发变本加厉,成了等待出现奇迹的、彻头彻尾的历史神秘论了。

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其长篇小说¹⁰⁸里)硬说协约国不愿帝俄战胜(唯恐东方问题的彻底解决会对沙皇俄国有利),因而迫使俄国总参谋部进行堑壕战(的确荒谬,因为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是一条漫长的战线,地域辽阔,满布沼泽和森林),而唯一可能的战略是运动战。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俄国军队的确试图打一场运动战,特别是在奥地利(以及东普鲁士)战区发动突击,也取得过辉煌的战果,可惜好景不常。其实呢,谁也不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作战方式,除非一开始就以压倒优势摧毁敌方。大家知道,由于双方的总参谋部拒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阵地战是由双方总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这种顽固态度在当时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从实际情况来看,阵地战并不只是堑壕战,它还包括作战军队后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和工业系统。它明显地取决于大炮、机枪和步枪的射速,在一定地区所能集结的兵力,以及充足的军需供应,以便在遭到敌人突破或实行撤退时所蒙受的物质损失能得到迅速的补充。另外一个因素是拿武器的人即广大的士兵,他们本人的能力虽各

有不同,但作战时只能作为一支集体力量来行动。如所周知,在东线突破奥军阵地是一回事,攻打德军阵地则是另一回事;就是在奥地利战区,在得到德军精锐部队的增援并归德国人统一指挥后,进攻战术最终还是遭到惨败。1920年的波兰战役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看上去锐不可挡的攻势却被魏冈将军阻遏在华沙城下,在法国军官所指挥的战线上被击退了。¹⁰⁹原来对运动战异常热心、如今又悉心研究阵地战的军事专家丝毫无意于要把运动战从军事科学中一笔勾销,他们只是强调指出,在工业与社会发展先进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运动战的作用只能看作是战术的,而不应看作战略的,同时必须看到运动战的地位正如当初包围战在研究运动战中所占的位置一样。

在政治艺术和政治学领域里也应作出同样的改变,至少就最先进的国家而论应该这样。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因素的灾难性“袭击”(危机、萧条,等等)。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象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一样。在现代战争中往往有这种情况,猛烈的炮击似乎已经摧毁了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但实际上只是摧毁了外线工事,在发动总攻冲锋时,进攻部队会发现他们依然面临着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时期,政治上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危机不可能使进攻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以闪电般的速度组织起来,更不可能使进攻力量士气振奋,斗志昂扬。同样的道理,采取守势的一方决不会一下子士气低落,就此放弃阵地,哪怕是一片废墟,也要负隅顽抗;他们决不会因此而对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前途失掉信心。当然,情况决不会不起变化,但这种变化肯定不会象政治独裁战略家们所希望的那样进展神速,一往无前。

1917年事变是政治史上这类现象的最近表现,它标志了政治艺术与政治学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因此,有必要“深入”研

究市民社会中有哪些因素符合阵地战中的防御体系。之所以强调“深入”，是因为1917年事变虽然早就有人研究，但这种研究，不是象某些社会史家研究妇女装束的变迁那样失之肤浅和庸俗，便是从“唯理论”观点出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某些现象只要用“唯理论”的观点一解释就会消灭，仿佛这些现象就象民间的迷信一样（其实，就是民间的迷信，也并非一经解释就能消灭的）。

关于工会运动中的新倾向所取得的不足挂齿的成功，应该联系以上所谈的一系列问题来考察。¹¹⁰ 勃朗施坦〔即托洛茨基〕在第四次大会上对东西两条战线所作的比较，也许就是想要修改现行策略方法的一个开端。¹¹¹ 在东线，突破一举成功，但接踵而来的是空前激烈的斗争；在西线，这些斗争将“提前”发生。因此问题在于，市民社会的抵抗究竟是在图谋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夺取政权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等等。但他对问题只是从理论上作了冠冕堂皇的概述，并没有具体提出什么实践性质的指示。（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0—1932年）

应该研究一下，勃朗施坦那著名的关于运动的不断性质的理论¹¹²是不是运动战理论在政治上的反映（回忆一下那位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的观点），即归根到底是不是下面这样的国家的一般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的反映：在这样的国家里，国家生活的结构是松散而不发达的，不能成为“堡垒或堡垒”。对此可以这样说，勃朗施坦从表面上看是个“西欧主义者”，实际上却是个世界主义者，也就是说他的民族主义，西欧主义或欧洲主义都是表面的。而伊里奇〔·列宁〕才是深刻地民族的和深刻地欧洲的。

勃朗施坦在回忆录里提到有人说他的理论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在时间上弄错了15年，并且紧接着提出了另一套机敏的说法来回敬这套机敏的说法。¹¹³其实他那套理论无论在15年前或15年后都不是正确的。正如盖沙迪尼所说的那种顽固人物一

样，¹¹⁴是或多或少地猜对了；也就是说，他对问题只作笼而统之的预言，因此就说对了。这正如有人预言某个才4岁的女孩将来会当母亲，而到她20岁真当了母亲时他就说：“我早就说过她会当母亲的”，——可是他对下面这个事实却避而不谈，即在女孩4岁的那年他就想强奸她，想让她那时就当上母亲。我以为伊里奇很理解：1917年在东方胜利地运用过的运动战，在西方必须改为阵地战——这是唯一可能的形式。在西方，正如克拉斯诺夫所说的那样，军队能够迅速地积聚起无数的弹药，而且这里的社会结构能够自动变成坚固设防的工事。在我看来，这正是“统一战线”公式命意之所在，而这也与在福煦统一指挥下的协约国统一战线的观点相吻合。

然而伊里奇没有时间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公式——应该估计到他也只能从理论上加以发挥，而主要任务却是国家性质的，也就是说，需要侦察地形（意即了解国情——译者），查明市民社会中有哪些因素可以起塹壕和堡垒作用，等等。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在西方，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国家只是外围的壕沟，后面屹立着一个强大的碉堡工事网；不用说，这类工事哪个国家也有，只是多寡不一，但这一点正是需要在每个国家里侦察清楚。

可以把勃朗施坦的理论同一些法国工团主义者关于总罢工的理论，以及亚历山大所译的罗莎〔·卢森堡〕的那本小册子里的理论进行比较。罗莎的小册子和理论对法国工团主义者无论如何是有影响的，这一点从罗斯默¹¹⁵在《工人生活周刊》上发表的几篇探讨德国问题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出来（第一组文章已印成单行本），另外，也部分地同自发性理论有关。〔1930—1932年〕

从运动战(正面进攻)变为阵地战

——在政治领域里亦然

据我看,这是战后时期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得到正确解决的问题。这同勃朗施坦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认为,勃朗施坦是在只能导致失败的时期提倡正面进攻的政治理论家。政治学中的这一改变只是间接地(介于中间地)同军事领域里所发生的改变有关,尽管其中肯定存在着联系,而且是本质的联系。阵地战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承担巨大的牺牲。所以领导权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是十分必要的,从而需要一个更为“干预主义的”政府来更加公开地反对机会主义者,采取政治的行政的等一切控制手段,巩固统治集团的领导权“阵地”等,不断地进行组织工作,使内部瓦解成为“不可能”。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已经进入政治—历史形势中的高潮阶段,因为在政治方面,实行各个击破的“阵地战”具有最后的决定意义。换句话说,在政治中,只有一个个地夺取阵地,这些阵地虽非决定性的,却足以使国家无法充分调动其全部领导权手段,只有到那时运动战才能奏效。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这些阵地失掉了它们的价值,决定性的阵地反而处在危急中,那么就得转向包围战;这是一种收缩而困难的局面,要求有高度的克制和非常的创造才能。在政治中,包围显然是相互的犬牙交错的,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切手段这个事实只是表明,他们对自己的敌手决不等闲视之。〔1930—1932年〕

“在一个长期被围的营垒里进行抵抗,本身就会造成士气低落。这意味着吃苦受累,不得安宁,患病,长期经受慢性危险的煎熬而精神沮丧,它不是那种令人振奋的急性危险。”卡尔·马克思:东方问题,1855年9月14日。

政治和军事学

广大群众战术以及各小集团的直接战术。这也属于有关阵地战和运动战的探讨范围。因为这既反映了伟大的领导者们（战略家们）的心理，也反映了他们的部下们的心理。这也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战略与战术的连结点，无论在政治中或军事学中都这样。个人（即使作为广大群众的一员）总是本能地把战争想象为“游击战”或“加里波第战”（这是一种高级形式的“游击战”）。在政治中犯错误是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国家究竟是什么（指它的整体含义：专政加上领导权）。在战争中出现倒戈投敌的错误也是这个原因（不但不了解自己的国家，而且也不了解敌方的国家）。无论在政治中或战争中，这种错误同个人的独立发展观念——效忠某个城市或某种宗教——有关；这导致对敌方及其战斗组织的估计不足。
〔1930—1932年〕

国际主义和国家政策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于1927年9月所发表的文章（问答式的），论述了政治学与政治艺术的某些关键问题。¹¹⁶ 我认为需要进一步发挥的问题是：按照实践哲学的观点（就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不是由奠基人〔马克思〕所阐述，便是为最近的伟大理论家〔列宁〕所特别重申——应该怎样考虑国际局势中的民族方面。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关系都是“独创的”和（在某种意义上说）特有的组合的产物；如果想要控制和支配这些关系，那就必须把它们理解为并看作是独创的和特有的。发展的方向固然是国际主义，但出发点是“民族的”——必须从这个出发点开始。

然而观点还得是国际的，决不可能是别的。因此有必要按照国际的〔即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指示，精确地研究国际阶级〔无产阶级〕日后必须领导和发展的民族力量的组合。如果领导阶级要对这种组合作出确切的说明，就只能这样做，因为它本身实际上就是这种组合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以正确的观点为运动指明一定的方向。据我看，这一点正是列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和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在解释多数派运动〔布尔什维主义〕时存在根本分歧的症结所在。对民族主义的指责如果是指这个问题的核心，那是很不合适的。只要研究一下多数派〔布尔什维克〕从1902年到1917年的斗争，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独创性在于清除一切模糊的和纯意识形态的（贬义）因素，赋予国际主义以现实的政治内容。那些民族性质的事变正是在领导权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派别对这个问题不是避而不谈，便是一笔带过。带有国际性质的阶级，如果要领导狭隘民族性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以及往往谈不上民族性的而只能称作狭隘地方性的社会阶层（农民），在某种意义上说，本身必须“民族化”。同时，这根本不是什么很狭隘的提法，因为在对经济实行世界统一规划的条件能够被创造出来以前，必须经历多样化的阶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地区性组合（各民族集团的组合）。此外，必须永远牢记，在那些向往按照和平团结的分工计划进行建设的力量〔即社会主义力量〕最后掌握主动权之前，历史的发展总是遵循必然性规律前进的。非国家理论（即不能提任何一国的理论）是错误的，可说是荒唐的谬论；这种理论已经在下列两个不同时期造成消极和无所作为：第一个时期，谁也不认为自己应该首先发难，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首先发难者是孤立无援的；他们等待全体一齐动手，与此同时则无人开始行动或组织运动；第二个时期情况也许更糟，因为所等待的却是一种弄错了时代的和反常的“拿破仑主义”（因为并非所有的历史阶段

都会以相同的形式重演)。¹¹⁷ 陈旧的机械论的这种现代翻版在理论上的缺陷被一般的不断革命论所掩盖，这种理论只是一种空泛预报的教条，由于在事实上无法实现，最终也就不攻自破而宣告破产。〔1933年〕

关于“总体的人”或“社会一致”¹¹⁸的问题

国家的教育作用和形成作用。其目的始终是建设一种新型的更高级的文明，使广大人民群众“文明”和道德规范符合经济的生产结构不断发展的需要，从而也在体质上形成一代新人。但每个人怎样才能加入总体的人并融为一体呢？又怎样对每个人不断进行教育，使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步调一致，变必然与强制为“自由”呢？要考虑“法律”的问题：应该把法律的概念范围扩大，把今天“不归法律管”而属于市民社会范围的那些活动也包括进去；市民社会的这些活动虽然不受“法令”的约束，也没有强制的“义务”，但仍通过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等方面的演变，施加一种集体的压力而获得客观上的效果。

关于在1848年以前出现的、作为从1789年到热月雅各宾经验的科学总结的所谓“不断革命”的政治概念问题。这个公式属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里，既没有大规模的群众性政党、也没有庞大的经济主义的工会，从许多方面来看社会还处于所谓动荡状态：乡村十分落后，国家政权和政治活动几乎完全由少数城市甚至一个城市（拿法国来说则是巴黎）所垄断；国家机器相对来说还不完备，市民社会享有较多的自主权，不受国家活动的影响；军队和国家军事机构有一定的系统；国家的经济有较大的独立性，不受世界市场经济关系的束缚，等等。在1870年以后的时期，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所有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国家的内部关

系和国际关系在组织上更加庞大复杂,政治学对1848年的“不断革命”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且用“公民领导权”的公式取而代之。军事艺术中所发生的改变同样也发生在政治艺术中:运动战日益变为阵地战,而且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平时就注意备战,严格要求,一丝不苟,那么打起仗来就会赢得胜利。从政治艺术的角度来看,现代民主国家的坚固结构,无论作为国家组织还是作为市民社会中各种组织的复合体,仿佛是阵地战中的前沿“堑壕”和永久性工事网:它们只是运动的“局部”因素,而在过去却是战争的“全部”,等等。

以上所谈是就现代国家而论,至于落后国家或殖民地则并不适用,因为那些在其他地方早已过时并成为时代错误的形式,在落后国家或殖民地那里却仍然保持着生命力。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应该有一篇政治学的专论来加以探讨。(1933—1934年)

社会学和政治学

社会学的崛起同19世纪出现的政治学和政治艺术观念的没落有联系(更确切地说,是在19世纪后半期,进化论和实证论取得胜利以后)。社会学里面真正重要的东西就是政治学。“政治”成了议会政治或者私人小集团政治的同义语。深信宪法和议会已经开创了一个“自然的”“进化”的纪元,社会已经发现了自身的合理的、因而也是最后的基础,等等。而且,嘛,你瞧,据说如今已经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啦!这些看法造成了国家观念的贫困。如果说政治学就是国家学,而所谓国家,就是指统治阶级赖以维护其统治并赢得被统治者积极支持的那一整套实践和理论活动的话,那么社会学的全部基本问题显然都成了政治学的问题了。除此而外,如果还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那只能是些临时的即无关紧

要的问题。因此布哈林在编写《通俗读本》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确定，政治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两者是同一的呢（除了按照最拙劣的实证论观点来解释，此外是无法说得通的），还是说政治学是从一种范围较广的世界观或者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中派生出来的一套经验的或实践的原理，或者相反，说这种哲学只是一门从政治学派生的关于概念或一般范畴的科学，等等。

如果下列说法可以成立，即人不能是其他，只能是历史地决定的人，也就是说，人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生存发展的，那么，可不可以把社会学看作只是研究这些条件、研究调节这些条件发展的规律的科学呢？由于人们自身的意志和首创精神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因此这个说法必然站不住脚。应该问一问，“科学”本身是什么。如果科学能使人发生改变，变得和过去不一样，那么，就此而论，科学本身不就成了“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了吗？如果说一切都是“政治”，那么，为不至于重复令人腻烦的老生常谈起见，有必要根据新概念区别两种不同的政治，一种是相当于历来称作“哲学”的那门科学的政治，一种是被称作狭义的政治学的政治。如果科学意味着“发现”以前所未知的现实，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现实岂不是超验的吗？这岂不是认为某种“未知的”从而也是“超验的”东西终究是存在的？如果那样，岂不是等于说，科学是“创造”这个概念本身也成了“政治”咯？关键在于所谓“创造”究竟是指“任意的”还是指合理的，即对人们“有益”而言，因为它可以扩大人们关于生活的概念，把生活本身提高（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 关于《通俗读本》及其附录《理论与实践》，阿尔曼多·卡利尼（在1933年3月16日《新文选》上发表）的哲学评论值得参考；有一位英国人（我想是威塔克吧）¹¹⁹似乎就是据此而提出了那个等式：“理论：实际=纯数学：应用数学”。

领导权(市民社会)和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说¹²⁰ 以及有关其实施和确定相应法规方面所引起的全部辩论，都是一定历史时期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斗争的产物。在这一历史时期，存在着各阶级之间的某种不稳定的平衡，之所以说不稳定，是因为某些知识分子（直接担任国家职务的，特别是在政界和军界任职的官僚）依然同旧的统治阶级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在社会内部有着柯罗齐所说的那种“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经常性冲突”。一般认为，在这种冲突中，教会代表整个市民社会（虽然它在事实上只是其中的一个作用日见削弱的组成部分），国家则代表要求使一定发展阶段稳定下来形成既定局面的一切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教会本身就可以变成国家，从而形成以世俗的（而且日益世俗化的）市民社会为一方、以国家及教会为另一方的冲突（如果教会变成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变成一定特权集团所把持的政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特权集团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争取教会所代表的“市民社会”中那一部分力量的支持，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

对政治的和经济的自由主义来说，三权分立说的基本意义在于：所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利弊得失，都可以在三权分立说中得到反映，同时也暴露了自由主义的弱点的根源之所在：官僚主义，即形成一批专搞强迫命令并到一定时期变成特权阶层的领导人员。由此便产生了一切职务实行民选的要求。这种要求既是自由主义的激进表现，又是其解体的表现（常设立宪会议的原则，以及在共和制国家里所实行的国家元首定期选举制等等，造成了满足人民这种基本要求的假象）。

分权制度下的国家的统一：议会同市民社会的联系较为密

切,处于政府和议会之间的司法权,则代表成文法(哪怕是针对政府的)的连续性。当然,这三权都是政治领导权机构,但层次有所不同:(1)立法;(2)司法;(3)行政。必须指出,一旦司法部门出现偏差,将在公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领导权机构中的这一部门特别敏感,其中也包括治安和政治部门的滥用职权。〔1930—1932年〕

法 的 概 念

法的概念必须从根本上更新,不应完全袭用任何一种既存学说(包括所谓实证学派、尤其是费里的学说在内¹²¹)。任何国家,如果想要创立与维护一定型式的文明和公民(从而创立与维护一定型式的集体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要根除一定的习惯和看法,传播另外的习惯和看法,那么(除了教育机构以及其他机构的活动),法律就是它赖以达到目的的工具。因此法律的制定必须符合这一要求,以便收到最大限度的正面效果。

法的概念应力求摆脱任何超验论和绝对论的渣滓,在实践上应该摆脱任何道德化的狂信。但是据我看,似乎不能以下列观点作为出发点:国家只是反对社会上的“祸害”而不施“惩罚”(假设这一用语只限于对人的意义上)。事实上必须把国家看作是“教育者”,如果它真的想要创造一种新型的或新水平的文明的话。我们固然总是根据经济力量来行动,致力于组织和发展经济的生产机构,创造新的结构,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上层建筑因素可以放任自流,听任它们自生自灭、时断时续地去发展。在这方面国家也是一种实行“合理化”、实行加速和实行泰罗制的工具,国家必须有计划地采取各种赏罚分明的奖惩措施;因为,既然为一定生活方式创造了“得以实现”的条件,那么对于“犯罪行为或失职行为”就必

须加以惩处，包括感化措施在内，而不能只是一般地判定其“有害”而已。法律乃是与国家所从事的全部积极的、教育的活动同时并存的镇压的消极的一面。在法的概念中也应该包括对个人和集团等“给予奖励”¹²²的部分；凡是值得赞扬和嘉奖的活动都应受赏，正如犯罪活动必须予以惩处一样（就是惩处，在方法上也可以有独创，如“舆论”制裁）。

〔1933—1934年；最初叙述于1931—1932年〕

政治和宪法

1929年12月16日的《新文选》上刊登了一位阿扎利尼先生所写的短论《国家的政治、科学与艺术》，要是从七折八凑语无伦次的角度来欣赏，倒是一篇绝妙的奇文。

阿扎利尼在文章的开头就肯定马基雅维利给政治划定了在国家里的界限；这是“光辉灿烂的”业绩。阿扎利尼这话何所指，是令人难以捉摸的，他引述了《君主论》第3章这样一段话：“当鲁昂的红衣主教对我说意大利人根本不懂战争时，我答曰法国人根本不懂国家”，紧接着就断言，“由此可知”，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必须把政治理解为一门科学，国家学，而这正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云云。”（关于“政治学”即“国家学”的说法，在马基雅维利以前似乎只有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¹²³使用过，而且符合现代意义）。阿扎利尼之说非常浅薄无聊。关于鲁昂红衣主教的趣谈，这样断章取义来引述，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从上下文来看，并不能就此作出科学上的推论：它显然只是一句机敏的俏皮话，一种脱口而出的反驳。鲁昂的红衣主教硬说意大利人不懂战争，对此，马基雅维利当场顶了一句法国人不懂国家，理由是，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允许教皇在意大利扩张自己的权力，这违反法兰西国家的利益。其实马基雅维利丝

毫无意于认为法国人不懂国家，相反，他对法王（路易十一世）统一法国的方式大为赞赏，并且把法兰西的国家活动作为同意大利进行对比的一项标志。他同鲁昂红衣主教的谈话是“政治活动”而非“政治学”；因为按照他的观点，如果说教皇势力的强大对法国“外交政策”十分不利的话，那么这对意大利的国内事务就更加不利。

令人奇怪的是，阿扎利尼一方面驴唇不对马嘴地用这段引文来暗示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又接着说“虽说这门科学是研究国家的，但是却给它下了一个完全不精密的（1）定义（1？），因为没有明确指出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研究这个对象。确实是不精密，事实上一切法学、尤其是宪法，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国家。”

以上这一切对马基雅维利的解释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思路紊乱。马基雅维利写了一些关于“直接政治活动”的著作，但不是乌托邦，这些著作反映了对既有国家连同其一切既有的职能和要素的渴望。他通过自己的论述，通过对现状的批判，表达了若干一般概念，只是在表述上是格言式的，并没有形成一套体系，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并不承认超验的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内在的因素，而完全是以人的具体活动、即为历史必然性所驱使而致力于改变现实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就此而论，也可以称之为“实践哲学”或“新人道主义”。事实并不象阿扎利尼所认为那样，似乎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不重视“宪法”，因为关于宪法的一般原则实际上散见于全书各处。他明确指出国家必须受法律的支配，必须确立一定的原则，使正直的公民有章可循而不致遭受飞来横祸的无情打击。但马基雅维利的实际目的是要使一切都回到政治，即恢复治人之术，使人们俯首听命，从而建立“伟大的国家”。（应该记住，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地方行政区、城邦共和国和地方士绅议会¹²⁴都不能算是国家，因为它们既没有相当大的领土，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口足

以维持一支为在国际上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所必需的军队。在他看来,由于教皇统治的存在,意大利仍然处于无国家状态,只有宗教也变成国家的“政策”,而不再是教皇的政策,这种状态才会结束,因为教皇的政策就是要防止意大利形成强大的国家,就是要干涉不在他的世俗统治下的各国人民的内部事务,他所追求的利益并不符合各个国家的利益,只能制造麻烦和分裂。)

我在别的地方指出过:中世纪式的意大利资产阶级不可能从团体阶段过渡到政治阶段,因为他们不能完全摆脱以教皇、僧侣以及世俗知识分子(人道主义者)为代表的中世纪式的世界观,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的,即封建的和世界主义的框架范围内。我的这一看法可以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得到印证。

阿扎利尼写道:“乌尔皮恩¹²⁵别出心裁的解释,或者更妙的是,他在《文汇》中所举的例子,都足以揭示这两门学科的对象的外表同一性(说些什么呀?)。‘政府法令关系到罗马共和国的尊严。政府法令存在于礼仪、教士及地方官吏之中’!由此可知,宪法和政治学在对象方面有同一性,但又不是实质上的同一性;因为对同一材料,这两门学科处理的标准却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法律秩序的领域和政治秩序的领域是不一样的。在现实中,法律秩序是从静止的角度出发来观察社会有机体的,把它看作是一定历史演变的自然产物;而政治秩序对同一个有机体却是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加以考察,把它看作是这样的产物:可以对其优缺点进行评价,并且必须根据尔后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作出相应的改变。”因此可以说,“法律秩序是本体论的和分析的,因为它所分析研究的是各种社会组织机构的实质”,而“政治秩序则是道义论的和批判的,因为它所研究的不是各种组织机构的现状,而是它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换句话说,评价的标准以及怎样才为得策的考虑是不同于

法律的，也不可能相同”。

这位自作聪明的先生自以为在颂扬马基雅维利，是马氏的信徒，甚至自命为阐发完善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

“由此可知，尽管如上所述有形式上的同一性，但还是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既明显又深刻，以致使一位当代最伟大的国际法专家的下列看法似乎难以成立：要想建立一种完全有别于法学的政治学，即使不说是不可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认为，要是法律对政治问题的分析只停留在那一点上，这种看法是可以成立的，要是想进一步说明哪些领域属于政治学的独占领域，那么这种看法就不能成立。事实上政治学并不完全局限于以道义论的和批判的标准研究国家的组织，如果完全用那种标准，那倒容易同法学有所区别了；相反，它把研究的领域扩大，把那些对国家的形成、发展和衰亡起调节作用的法律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不能说，这种研究属于一般所认为的(!)历史学(!)的范围。因为，即使承认，探索因果关系，探索对国家的性质和发展起支配作用的各种自然规律之间相互依存的联系，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但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在实际上控制政治战略全局的问题，始终是政治学的独占领域，它既不是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也不是法学的研究范围。马基雅维利再一次答应要履行的、并且归结为‘我会证明用什么办法可以控制和掌握诸侯小国’这样一句话的职责是这样的：既根据问题的内在重要性，又根据定义，使政治自主合法化，同时，至少按照最后提出的观点，也要允许其本身同宪法之间有哪怕是形式上的差别。”所谓政治自主原来是这么回事！

然而，据阿扎利尼说，不但有政治学，而且还有政治艺术。“有的人，可能或者已经，全凭个人的直觉来设想他们所治理的国家的需要和利益；他们通过本身的从政活动来使这种个人直觉的设想在外部世界得到实现。我们这样说当然不等于主张：直觉的、从

而也是艺术的活动是政治家唯一的或最主要的活动；我们只是说，除了实践的、经济的和道德的活动，政治家还必须维护前面提到的理论活动——不问它是主观的直觉形式还是客观的（！）反映形式——；而且，如果缺少了这样的需要，非但吃政治饭的人混不下去，就连真正的政治家也同样无法生存，要知道政治家之所以异于常人，就全在于这种才干，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得到的（？）。这样看来，在政治领域里，除了专门从事认识的理论活动的学者，也有专门从事直觉的理论活动的艺术家。这样也还不能把政治艺术的活动范围完全说透彻，因为这不仅要根据政治家的情况来认识，而且也要根据著作家的情况来估计。政治家通过政府的实际职能，使直觉内在地产生的设想外部化；著作家则把他凭直觉了解的政治真理在外部世界实现，但不是通过政治活动，而是通过表现了作者直觉的著作和文章来实现。印度人卡曼达卡（公元3世纪）、皮特拉奇的《老生常谈》、波泰罗的《国家的权力》就是如此。从某种观点来看，马基雅维利和马志尼也是这样。”

这真是地地道道乱七八糟的大杂烩，与其说是阐述马基雅维利，不如说是不折不扣地宣扬《新文选》的主编蒂托尼的观点。阿扎利尼无论在哲学或政治学方面都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笔记，是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想要解开他的哑谜，为我自己理出一些清晰的概念。

比方说，有必要弄清“直觉”在政治中究竟是什么含义，政治“艺术”之说又如何理解，等等。为此有必要回忆一下柏格森的某些观点：“关于生命（运动中的实在），理性只给我们提供一种惯性的平移（或译“绵延”），理性的流传产生着对客观的大量看法，这些看法并没能深入认识‘绵延’，而只是逐渐接近。但直觉却可以使我們深入认识生命的真谛：我指的是忘我的境界。”“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生物的特征，只是一些分散罗列着而非有机地联系着的特

征，看不到生命的目的，即看不到在这些特征中间贯穿着的、并使之发生联系和赋予某种意义的绝对运动的目的；而艺术家所追求的正是认识这一目的，通过某种共鸣置身于客观之中，力求以直觉打破空间在艺术家与原型之间所设置的障碍。诚然，美学直觉所捕捉的只是个人的印象。”“理性是对生命的蒙昧而难以捉摸的认识，因为它显然只代表不连续的和静止的东西。”¹²⁶

同时，政治的直觉同美学的、抒情的或艺术的直觉之间是有区别的，平常所说的政治艺术无非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政治的直觉不是体现在艺术家身上，而是体现在“领袖人物”身上；不应把“直觉”理解为“人们的认识”，它指的是在一霎那之间把表面看来完全不同的事实联系起来，立刻想出解决办法的判断，从而发现其中的利害关系，唤起人们的热情，指导人们采取一定的行动。所谓“体现”在“领袖人物”身上，是指他的“行动”（从正反两方面讲，或发动某一行动，或防止某一行动的发生，视该行动是否符合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定）。政治“领袖”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人数可多可少的政治团体；如果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也得有一个人来统一目标（或有一个核心集团，但在核心集团内部还得有一个人来统一目标），这个人可以随时更换，但这个集团仍然保持统一，照常进行自己的活动。

如果想把马基雅维利著作中所使用的“君主”概念转译成现代政治语言，那就必须作出一系列的区别：“君主”可以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但也可以指有征服一个国家或建立一个新型国家的抱负的某种政治领袖；在这个意义上，“君主”可以译成现代术语“政党”。在某些国家里，“国家元首”，即在领导利益（未必是完全排它的）与其他各种利益之间进行调整平衡的要素，就是由“政党”来担任的。但区别在于，按照传统的宪法观念，它既非依法统治，又非依法支配；它拥有“实际上的权力”，行使着领导权职能，从而也行

使着调节“市民社会”的各种利益使之保持平衡的职能；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实际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全体公民都有相反的感觉，即党既在统治又在支配。要想依据这样的现实来建立一种传统型的宪法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实本身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只能建立一套原则，宣布国家的目标是自身的消亡，换句话说，使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合二为一。（1930年）

议会和国家¹²⁷

罗马匈牙利学院院长尤利乌斯·米斯科尔奇教授在《马扎尔评论》中写道，在意大利，“原来所谓外在于国家的议会，如今，尽管还继续作出宝贵贡献，却已纳入国家之内，其构成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关于议会可以“纳入”国家之内的论点，乃是政治学与政治艺术上的一大发现，称得上是当代哥伦布们的功绩。这个论点无论如何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它说明了好多政治家对国家的实际看法。人们不禁要问：即使在议会明显地握有大部分实权的国家里，议会是否确实是国家结构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议会的实际职能是什么？还有，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们以什么方式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以及如何履行它们的特定职能？另外，即使议会并不是国家的有机构成部分，那么是否它们的存在对国家来说就毫无意义？对议会制度以及与之形影相随的政党制度的指责究竟有哪些理由？（不言而喻是指客观的理由，即能说明议会的存在本身就会妨碍和耽误政府行使专门职能。）

代议制对职业官僚来说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绊脚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能不能证明，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非但不能通过选举产生一批民选官员来补充和抵销委

任文官,防止这些官员的僵化,反而成了起相反作用的绊脚石,如果是这样的话,原因何在?再者,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即使是正面的肯定,问题也还没有彻底解决。因为,即使(必须把这一点考虑在内)议会制度变得无益甚而有害,未必就可得出结论说官僚制度应该复兴而且值得提倡。必须考虑议会制度和代议制度是不是同义,能不能有别的解决办法,就是说以一种新型的代表制度来代替议会制度及官僚制度。〔1933年〕

自我批评和虚伪的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显然已经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字眼。¹²⁸ 据称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批判的手段,即通过代议制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这种手段如果严肃地运用,实际上比原有手段更加卓有成效。但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新手段必须严肃地运用,自我批评必须是认真的、“毫不留情的”,因为自我批评的力量就全在于“毫不留情”。然而实际情况表明,自我批评只是为夸夸其谈的演说、空洞无物的声明提供机会,仅此而已;自我批评已经变成一种“议会官腔”。还不能说,议会制度似乎是不那么容易被破坏的,“隐蔽的”和“缄默的”议会制度的危害远比各种公开的为大,因为它有百弊而无一利。往往存在一种“缄默的”政党制度,也就是几乎意想不到的“缄默的”和“隐蔽的”议会制度。很明显,如不彻底废除其内容——个人主义,就无法取消其“纯粹的”形式,如议会制度;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完全是指为了资本家的和个人的利益而“个人占有”利润,掌握经济主动权。虚伪的自我批评正是这种局面的一个特征。与此同时,统计数字提供了真实立场的标志。除非宣布犯罪现象已经消失,然而其他统计数字终于无法加以证实(试问又如何来证实!),

对整个问题的需要重新加以考察,特别是有关“隐蔽的”政党制

度和议会制度，即类似于当官方市场或国家彩票因故封闭时所发生的“黑市交易”或“非法彩票”那样的活动。从理论上讲，必须说明已经失败的合法政权的旧专制主义，同新专制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也就是说，它根本不是什么倒退；另外还必须说明，这类“黑市议会制度”活动是出于当前历史的必然，本身就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进步”，回到传统的“议会制度”反倒是一种反历史的倒退，因为即使在传统的议会制度中，尽管有公开的“活动”，但实际起作用的还是“黑市”议会制度。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在理论上可以用“领导权”概念加以说明，可以用回到“社团主义”——不是指旧秩序时期（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译者），而是在现代意义上，这种“社团”不能象过去那样具有封闭的和排它的限制。（今天，这是“社会职能”的社团主义，没有世袭制或任何其他限制，这类限制都是历史的陈迹，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法定特权”。）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一定要注意，对于“专制主义”倾向绝对不能表示支持，由于坚持认为这一现象的“过渡”性质很可能出现这样的倾向（所谓过渡性质是说它不能构成一个时代，而不是指它的“时间很短”¹²⁹）。（这里顺便指出，“不能构成一个时代”往往总是同时间“短暂”混为一谈：有可能“延续”一个很长时期，相对而言，而尚未“构成一个时代”，因为粘附于一定制度的各种力量往往是难以逆料的，特别是当它们由于另外一些力量的削弱而变得“强大”时（包括这种局面已经出现的地方）；说到这里，应该提一下切萨里诺·罗西的观点¹³⁰；这些观点“归根到底”当然是错误的，但其中确实包含着一定的切实的现实主义）。看来“黑市”议会制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题目；这样就有可能对构成“议会政治”理论的政治概念作出明确的说明。（在这方面同其他国家的情况作一番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例如，清算列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是否“也”算作对“合法”议会被废除后曾存在过的“黑市”议会制度进行清算中的一个插曲？）

事实真相与合法的事实。在议会政治领域里即“不仅仅是经济”平衡的“合法”领域里出现的、处于不稳定平衡中的力量体系；取缔这一合法领域，因为它变成了组织和唤起潜伏的沉睡的社会力量的源泉。因此，这种取缔乃斗争加剧而非相反的征候（和预兆）。如果斗争可以依法解决，当然就不会发生什么危险；情况之所以相反正是由于认为合法平衡成为不可能。（这决不等于说，取缔晴雨表就可以取缔坏天气。）〔1933年〕

国 家

作为批判的出发点，必须指出，在以沃尔皮切利和斯皮里托的《新研究》为代表的新的“法律”观点中，把阶级—国家的概念同被调整了的社会¹³¹的概念混淆了。这一混淆，在斯皮里托1930年9月在波尔萨诺举行的科学进步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论经济自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篇论文发表在《新研究》1930年9—10月合刊上。

只要有阶级—国家的存在，被调整了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除非是用于比喻的说法，也就是说，只能指阶级—国家本身也是一种被调整了的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进行过批判，从这种批判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懂得，阶级国家不等于被调整了的社会。同样，在他们所描绘的各种理想社会中，经济平等只是实现改良计划的必要基础。就此而论，空想社会主义者显然并不空想，而是务实的政治科学家和头脑清醒的批评家。说他们空想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经济平等可以靠颁布合意的法律，靠意志的行动等等来实现。但没有经济平等便不可能有完全彻底的政治平等这一思想，无疑还是正确的。（其他政治著作家，哪怕是右翼的，也就是说对民主政治持批判态度的作者也抱有

同样的见地，只要看一看他们利用瑞士或丹麦作为例子，声称这种制度对一切国家都适合，就足以证明。）这一思想也可以在一些17世纪作者的著述中见到，如在鲁多维科·朱科洛及其《完美》一书中，而且我以为马基雅维利也有这种思想。毛拉斯认为那种特定的民主政治形式之所以在瑞士成为可能，正是因为人们的经济收入和财产一般说来比较平均，等等。

把阶级—国家同被调整了的社会混为一谈，在中等阶级和小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流行，他们乐于循规蹈矩保持正常，以免发生剧烈的冲突和动荡。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动和倒退的观念。（1930—1932年）

在我看来，对道德国家，¹³²文化国家所能作的最贴切具体的说明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文化水平，使之达到符合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水平，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之一，那么它就是一个道德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积极的教育职能的学校，以及作为压制性的和消极的教育职能的法院，就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然而在现实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所谓民间首创性活动也趋向于同一个目的，这些首创性活动形成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文化领导权机构。黑格尔的理论产生于资产阶级似乎可以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的时期，所以声称其道德或普遍认识是：全人类将是资产阶级的。但实际上只有提出以国家的消亡以及它本身的消亡为奋斗目标的那个社会集团，才能创造一个道德国家，就是说，致力于消灭被统治者的内部分化等等，建立一个法律上道德上一致的社会有机体。（1931—1932年）

黑格尔关于党派社团是国家的“民间”经纬的学说，历史地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经验，目的在于更加具体地说明立宪政体的性质。这是一种得到治于人者拥护的政府，不过这种拥护是有组织的，并不象在选举时刻所表现的那样笼统和不明确。国家确

实要求获得这种拥护，而且它还通过政治团体和工联主义团体“教育”人们对它拥护，但这些团体在性质上是民间的，有待于统治阶级发挥民间的主动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已经超出了纯粹立宪政体的范围，而对代议制国家及其政党制度进行理论总结。但他的社团观仍不免是模糊的，原始的，介乎政治的与经济的之间；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经验，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只提供了一种完整的组织样版，即“法人社团”（一种直接移植在经济上的政治）。就历史经验而论，马克思不可能超过（或者大大超过）黑格尔；但由于从事新闻报导和宣传鼓动活动，马克思获得了群众观点。马克思关于组织的概念还受下列因素的干扰：行会组织，雅各宾俱乐部，秘密阴谋小集团，新闻组织。

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两种流行的型式，一种是“俱乐部”，以个别的政治人物为中心的“民众集会”型的松散组织。每个俱乐部都有自己的报纸，通过报纸吸引那些没有一定主见的追随者们的注意和关切。然后这批追随者就把报纸所宣扬的题目带到俱乐部的集会上去。当然，在俱乐部的常客中间必定有一个严密的有选择的集团，他们彼此熟悉，经常碰头，为集会的气氛作准备，以便确定支持这一种或那一种倾向——既取决于环境形势，也取决于所要争取的实际利益。

另一种是秘密阴谋集团，大概是在法国热月政变后在第二等级的雅各宾主义信奉者中间发展起来的，后来传到意大利，在1848年以前盛行一时；这种集团的发展，在拿破仑时期由于警察控制十分严密，是极为困难的；在1815到1830年的王政复辟时期，由于在底层比较自由，不受某种偏见的束缚，它的发展就方便得多。在1815到1830年期间，人民的政治营垒即将发生分化，这一点在1830年的“光荣日”¹³³期间就已经相当明显，过去15年中所形成的队伍一下子公开露面了。1830年后直至1848年，这一分化过程逐渐完

成，并且产生了象布朗基和菲利浦·波纳罗蒂那样高度发展的样版。

对于这些历史经验，黑格尔不可能获得第一手认识，但马克思却有比较生动的认识。*

资产阶级在法律观以及国家职能方面所引起的变革特别表现为适应环境的意志（从而表现为法律和国家的伦理）。先前的统治阶级基本上是保守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打算建立一种使其他阶级可以进入统治阶级的有机过渡，就是说，不打算在“法律上”和意识形态上扩大统治阶级的范围；他们的观念是封闭的特权等级观念。资产阶级把自身看作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的有机体，能够吸收整个社会，使之被同化而达到他们的文化和经济水平。国家的职能已经在总体上发生改变；国家已经变成“教育者”，等等。

关于这一进程是如何停止的，又怎样复归于国家是纯粹暴力的观念，等问题。资产阶级处于“饱和”状态时，不但不发展，而且开始分解；即不但不吸收新的分子，而且失去原有的一部分（或者至少失去的要比吸收的多得多）。一个声称能吸收整个社会的阶级，同时也确实一度表现了这一过程，想要完成这样的国家观和法律观以设想国家和法律的极顶，这个阶级已经变得毫无价值，因为他们的作用已经到头而必将被市民社会所吸收。（1931—1932年）

关于一般人对国家概念所抱的片面看法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荒唐的谬误，只要举出丹尼尔·海莱维的新作《自由之衰微》就足以说明。我在《新书讯》上看到了一篇介绍此书的评论文章。对于

* 关于这方面的事实，可以参看保罗·路易的著作及莫里斯·布洛克的《政治词典》作为原始材料；关于法国大革命，详细参阅奥拉尔德的著作，同时参看安德勒对《宣言》加的注释。关于意大利，参看卢齐奥论述共济会及复兴运动时期的著作，一部带有高度倾向性的著作。

海莱维来说，“国家”就是代表机构；他发现，从1870年一直到今天，法国历史上的最重大事件都不是由普选产生的政治组织所发动，而是或者由民间组织（资本主义的厂商，参谋部，等等）、或者由原来默默无闻的伟大文职人员等所发动。这种情况是否说明对于“国家”，不仅应理解为政府机构，而且应理解为“民间的”“领导权”机构或市民社会，否则，那又意味着什么呢？必须指出，从批评国家不干预、落后于事态发展等等的过程中，产生了右翼的独裁思潮，要求加强行政部门等等。但海莱维的这本书还是应该谈一谈，以判明他是否也走前人的老路，在原则上这也未必不可能（对索列尔、毛拉斯等人抱同感，有共鸣）。〔1930—1932年〕

克齐奥·马拉帕特在其《论政变技法》一书的导言中说过“一切均在国家之中，决不会独立于国家之外，反对国家”，他似乎把这个公式当作“哪里有自由，哪里无国家”这个命题的等值同义来强调。在这一命题中，“自由”一词不能按“政治自由、新闻自由等”普通意义来理解，而应看作是“必然”的对应词；这同恩格斯关于从必然法则向自由法则过渡的命题¹³⁴有联系的。马拉帕特对这个命题的意义根本一无所知。〔1931—1932年〕

在关于国家的职能问题（这里所说的国家是指狭义的政治—法律组织）的辩论中（这种辩论说到底是很粗略的），“国家是守夜人”的说法就等于意大利人说“国家是警察”一样¹³⁵，意思是说国家的职能只限于维护公共秩序，保障法律尊严。但这种说法掩盖了下列事实：在这种政体中（除了在理论上作为一种限制性前提外，它无论如何从未实际存在过），对其历史发展的领导权属于民间力量，属于市民社会——它也就是“国家”，而且是事实上的国家本身。

“守夜人”之说似乎出自拉萨尔，其讽刺意味比“国家是警察”更浓。它的对立面一般说来应该是“道德国家”或“干预国家”，但

这两个词语是有区别的。道德国家的概念出自哲学和知识分子(属于知识分子:黑格尔),事实上同“国家是守夜人”的概念可以有连带关系,因为它指的是世俗国家的自主的、教育的和道德的活动,以同作为中世纪残余的宗教僧侣组织的世界主义和干预形成对照。干预国家的概念来自经济学,一方面同支持保护贸易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各种倾向有关,另一方面也指一种意图,即竭力迫使一部分地主贵族出身的国务活动家对劳动阶级采取“保护政策”免受过度的资本主义压迫(俾斯麦的以及迪斯雷利的政策)。¹³⁶

这些性质不同的倾向可以按各种方式相结合,而且实际上已经这样结合了。自由主义者(“经济主义者”)当然是主张“国家是守夜人”的,要求把历史的创制权交给市民社会,交给从市民社会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力量,同时让国家成为“公正比赛”和遵守比赛规则的监护人。在知识分子中间,自由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的界线极为分明(也可能在经济问题上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问题上干预主义者,等等)。天主教徒希望国家成为百分之百地对他们有利的“干预国家”;如果做不到,或者他们处于少数地位,则要求“国家守中立”而不至于支持他们的对手。(1935年:最初叙述于1930年)

下列论点值得深思:关于国家是宪兵和守夜人的概念(撇开出于论战需要而对宪兵、守夜人等所赋予的引喻意义不谈)事实上不就是关于超越纯粹“经济一团体”阶段的国家概念吗?

我们始终没有越出识别国家和政府的区分的范围,这种区分完全是经济一团体形态的表现,换句话说,它把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混为一谈了。应该指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必然包含着原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中的一些成分(因为可以这样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国家是受强制盔甲保护的领导权)。这一论点,对于认为国家将逐步走向消亡并纳入被调整了的社会的国家

学说,具有根本意义。可以设想,国家的强制因素将随着被调整了的社会(或道德国家,或市民社会)的因素的日趋明显而逐渐消亡。

由此可知,所谓“道德国家”或“市民社会”,指的是政治法律方面最伟大的思想家在纯学术领域中所“设想”的一种没有国家的国家(由于这种设想是从人人真正平等从而也在理智和道德上平等的前提出发,就是说,能够自觉自愿地不必通过强制来接受法律,不把法律看作是另一个阶级强加于人的不合大家心意的东西,因此是一种纯粹的空想)。

应当记住,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国家是“守夜人”这个说法来自拉萨尔,也就是说来自一位教条主义的非辩证的国家主义者(请对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仔细考察拉萨尔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关于一般国家问题的理论)。按照国家即被调整了的社会理论,必将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即“国家”等于“政府”、“国家”等同于“市民社会”的阶段,而达到国家是守夜人的阶段,即国家变成保护被调整了的社会因素不断增长发展的强制组织并从而逐渐缩减自身权力主义的和暴力的干预。但这也不能使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思想凭空出现,即使一个有机自由的时代即将开始。〔1930—1932年〕

如果说任何型式的国家都无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经济—团体的原始主义阶段,那么就可以由此得出推论:缔造这种新型国家的新社会集团的政治领导权的主要内容是经济秩序,即涉及到基础的重新组织以及人与经济世界或生产领域之间的现实关系的重新组织。上层建筑的因素必然在数量上是不多的,而且具有预见和奋斗的性质,到那时为止还几乎不是“有计划的”因素。文化政策将首先是消极的,即对过去的批判;目的在于摧毁和清除旧思想的影响。有关建设的设计还只是“粗线条的”草图,这种设计可以(而且必须)随时加以修改,以同新基础的实际状况相适应。这种情况

正是在中世纪式的地方自治时期所没有发生过的；因为当时的文化还属于教会的职能，在性质上完全是反经济的（即反对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它的目的不是要把领导权交给新阶级，而是相反，要阻止新阶级取得领导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是反动的，因为它们暗示了新阶级要失败，并对这个阶级所特有的经济世界持否定态度，等等。（1931—1932年）

要考察的另一个因素是，国家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之间的有机关系。是国内政策决定对外政策，还是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必要区分：具有相对的国际自主权的大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政府形式之间的关系（象拿破仑三世的政府就明显地实行两种政策，对内是反动的，对外是自由主义的）。

关于一个国家在战争之前与之后的情况。很明显，在结盟时值得考虑的是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所处的环境。因此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战争时期掌握领导权的人由于在斗争过程中受到削弱而最终失去领导权，只好眼看着原来的“从属者”由于手腕比较高明或者“比较走运”而执掌领导权。在“世界大战”中往往可以见到，某个国家由于地理情况被迫全力以赴投入一场严酷的战斗，虽然依靠同盟国的力量打赢了这场战争，本身却也拖得精疲力竭，从此一蹶不振了，等等。因此，关于“大国”的概念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经常性的”因素，就是说，“经济和财政潜力”及人口因素。（1930—1932年）

关于全国性团体的组织

我在别处曾经说过，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没有哪一个人不在组织之中，没有哪一个人不在党派之中，如果对组织和党派作广义的而不是正式意义的理解的话。在这众多的民间团体（分两类：自然

的,及契约的或志愿的)之中,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团体,相对地或绝对地起主导作用,即构成某个社会集团对国民(或市民社会)的其余部分的领导权机构,也就是构成狭义的国家即政府—强制机构的基础。

往往有这种情形,一个人同时属于几个民间团体,而这些团体在客观上又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一种包罗万象的政策的目的正在于:(1)确保某一政党的成员对这个党感到十分满意,就如同在他们原来所在的各种组织那样能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就是说,要切断他们同各外部文化组织的一切联系;(2)摧毁其他一切组织,或者把它们并入一个统一的、以这个党为唯一调节者的体系。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条件是:(1)如果这个党成为某种新文化的旗手,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进步时期;(2)如果这个党想要阻挠另一种力量,即某种新文化的旗手,成为“大一统”,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客观上是倒退反动的时期,即使这种反动(总是会发生的)自己并不承认,而且力求以某种新文化的旗手自居。

卢易吉·伊诺迪在《社会改革》1931年5—6月合刊上撰文评论了一本法国著作《国家的社团,法兰西国家构成要素之研究》(作者伊蒂恩·马丁·圣列昂,全书415页,斯佩斯编辑。巴黎,1930年版)。该书对这些组织中的一部分进行了研究,但只是对正式存在的那些组织。(例如,某种报纸的读者是否可以形成某种组织?等等。)如果要探讨这个问题,那么无论如何既要看伊诺迪的评论也要读一读原书。〔1930—1932年〕

谁是立法者?

必须把“立法者”的概念同“从政者”的概念区别开来。既然人人都是“政治的人”,所以人人也是“立法者”。但是还必须加以区

分。“立法者”有着精确的法律的和正式的含义，即指得到法律授权制定法律的人。但此外还有别的含义。

任何一个人，只要有活动能力、能发挥作用，都能在改变他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方面起一份作用（或改变其某些特点，或保持其另一些特点）；换句话说，他力求确立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和规定。一个人的活动圈子可大可小，一个人对自己行动和目标的认识程度不一；此外，代表者的权限也可大可小，这种权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被代表者”对它的规范的一贯的反映如何。对于子女来说，父亲就是立法者，但对父亲的权威的认识和服从程度却是不一样的，可深可浅，或大或小，诸如此类。

一般可以这样说，普通人同较为专门的立法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后者不仅制定了将成为其他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的法令，同时还建立了种种工具，使这些法令带有“强制性”，并可借以核查这些指令的执行情况。在这批立法者中间，最大的立法权属于国务活动家（民选的和职业的官员），他们手中掌握着国家的合法强制权力。但这不等于说“民间”团体和组织的领袖不掌握包括宣判死刑在内的各种强迫制裁手段。如果在制定完善的法令的同时，能够安排完善的执行和监察机构，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训练，使他们“自觉”拥护他们所必须“履行”的法令，以此来约束他们的习惯、意志和信念，使之符合法令的要求，符合他们所要求实现的目标，如果能这样，那就表明立法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如果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考虑人人都是立法者这个概念，那么，任何一个人，即使在接受别人的法令时，也还是立法者，就是说，只要他在执行这些法令时确实了解别人也同样在执行；只要他在认识了这些法令的精神之后加以宣传，仿佛要使这些法令变成生活准则，专门适用于各种受限制的生活领域。（1933年）

宗教、国家、政党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创立或毁灭一种宗教是一种比创立或毁灭一个国家不知重要多少倍的行动；更不必说政党了……”浅薄之见，没有说到点子上。这3种因素——宗教（或“积极的”世界观）、国家和政党——是长期存在的，在历史—政治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从一种到另一种的过渡。

从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这3种因素的必要同质和相互联系是理解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使用了那个时代的语言。牺牲性命保家卫国，是一种彻底的政权归还俗人主义的因素，是一种实证的和消极的世界观（反对宗教或主要观念）的因素。在现代世界上，党，从整体上讲，就是这样，并非恰好是某个大党的一部分；从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到领导方法，出发点都是要使它在整体上发展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完整的国家，而不是法律上所理解的政府），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观。党发展成国家后反过来作用于这个党，要求它不断地重新组织和发展，正如党和国家发展成一种世界观后，即对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实行整体的和分子的（个人的）改造，也反过来作用于党和国家，迫使它们不断进行重新组织，在它们面前提出了种种有待解决的极为特殊的新问题。如果光凭盲目的片面的“党”的狂热（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大党中的宗派狂热，就会出现内部派系斗争），也就是说，由于历史的必然还没有制定出某种国家观和世界观，那么就会妨碍这种世界观在实践中的发展。

关于这些智力上的局限和缺陷，当代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同时，也由于这些局限和缺陷，产生了种种戏剧性的斗争，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发展借以在实践中出现的工具。自马基雅维利时代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我们最为关注的意大利历史，有着同

样丰富的经验；因为整个历史都在为今天作证。〔1933年〕

国家和政党

从政党本身的内部生活的变化，就可对政党所行使的领导权职能或政治领导职能作出估价。如果说国家代表着对全国实行法治的强制力量和惩罚力量，那么，政党就代表着优秀分子对这种法治的自觉拥护，而且把这种法治看作是必须教育全体群众加以拥护的一种集体社会型式，为此，政党必须在其内部生活中具体地表明，它们已经把国家作为法律义务明文规定的准则变成道德行为的准则。在政党内，必然已经变成自由，从而使政党的内部纪律产生了巨大的政治价值（即对政治领导的价值），可以把这种纪律作为估价各个政党发展潜力的标准。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把政党看作国家生活的大学校。政党生活的要素是：性质（顶得住过时文化的压力），荣誉（有维护新型文化和新型生活的大无畏意志），尊严（懂得为更高的目标而奋斗），等等。〔1930—1932年〕

中央集权论

关于每个特定社会集团对自己的国家所持的态度问题。如果不考察国家借以表现它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时代特色的两种形式，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那就不可能作出精确的分析。“中央集权论”这一术语用来指对“官员管理机构”或政治社会的某种特定的看法，用普通的语言来说，就是对国家生活的形式的看法，这里所说的国家一般理解为全国。作为一种积极文化的因素（即作为一种创造新文明、新型的人及新型公民的运动），可以使国家和个人（某个社会集团的个人）保持一致，这一论断必须有助于下定

决心在政治社会的外壳里建立一个既复杂又井然有序的市民社会，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个人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而又并不因此而同政治社会相抵触，相反地，倒是其正常的延续，有机的补充。有的社会集团在上升到自治的国家生活之前，并没有经历长期的独立自主的文化和道德发展阶段（在中世纪社会以及在专制制度下，由于特权等级或阶级是合法存在的，¹³⁷ 这种独立自主的发展就成为可能），对于这些集团来说，中央集权阶段是很有必要而且十分适时的。这种“中央集权”正是“国家生活”的正常形态，或者至少是开创独立自主的国家生活以及建立“市民社会”的正常形态，因为从历史上看，在上升到独立自主的国家以前，要想建立市民社会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应该使这种“中央集权”过度泛滥，尤其不应该变成狂热盲从的理论，或者把它看作是“永恒的”。对它恰恰应该抱批判的态度，以便发展和产生新的国家生活形态。在新形态下，个人与集团的首创精神将具有“国家”的性质，即使不靠“官员的管理机构”也能使国家生活成为“自发的”。〔1931—1932年〕

统治阶级的“功过”

由于国家一阶级的一致性很难令人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来解释政府（国家）是怎样反映它所代表的阶级的，而作为其功绩和威望的依据则是它终于把50多年来应办而未办的事情办成了，——50多年来未办难道不是一种过失和耻辱吗？¹³⁸ 让一个人50年来一直忍饥挨饿，要到他50岁时才终于发觉。在私人生活中，这种行为一定会引起强烈的抗议。这种问题出在国家身上，似乎反倒成了一件“功绩”。更妙的是，似乎到50岁才“开始洗澡”的人反倒成了比50年来一贯洗澡的人更体面的标志。在有关下水道、公共工程、公路建设等方面，即有关一个国家的基

本社会设施问题上，可以听到这一类论调。某一个国家为自己提供了这类设施，其实这类设施在其他国家里早就有了，对于这样一件事情居然大肆吹嘘，高声喝采，而且还对其他国家说，如果你们有能耐，不妨照此办理。但其他国家无法照办，因为它们当年早就这样办了，而这就居然被说成是它们“无能”的标志。

被认为是自主力量的国家—政府，其威望要在作为其基础的那个阶级身上反映出来，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有其实践和理论上的极大重要性，如果想要对国家本身有一个更为实际的概念的话，就必须对这个事实作详细的分析。另外，这一现象并不是什么特殊例外，仅仅为某类国家所特有。看来，就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而论，这一现象可以是优秀分子或先锋队，也就是党的职能的体现。这个阶级，作为一个经济事实（任何阶级在本质上都是经济事实），一般不可能享有任何精神或道德上的威望，就是说，没有能力确立自己的领导权，从而也就没有能力建立国家。正因为如此，君主制度，即便在现代，还发挥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才存在下列现象（以英国和德国最为明显），即在组成国家（意即政府——译者）的资产阶级领导人员中可以有旧的封建阶级出身的人物，这些人虽已不拥有那种传统的经济统治（容克和勋爵），但却掌握了新的经济权力形式即工业和银行，同时，这些人并没有同资产阶级融为一体，而是同他们那传统的社会集团依然保持一致。（1933年）

历史的文学

柯罗齐在实践中所采取的立场，乃是对他的哲学观点进行分析或批判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最主要的出发点。在柯罗齐那里，哲学同“思想体系”最终合而为一，按照他的解释，哲学无非是进行组织采取行动的“实用工具”，也就是说，是为了组织一个党，而且是

国际性的党，是为了使实践有一个行动方针。柯罗齐在牛津哲学大会¹³⁹上的讲话实际上是一篇政治宣言，呼吁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大知识分子实行国际团结。这，毫无疑问，有可能形成一个重要的党，发挥相当重大的作用。

广义地讲，在当代世界上已经可以看出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同中世纪的“教权”与“俗权”之间的裂痕十分相似，但由于现代生活本身极为复杂，这种现象比中世纪的现象就远为复杂。一方面保守落后的社会团体正在一步步退回到他们原来的经济一团体阶段，另一方面进步革新的社会团体也还处于他们原来的、即经济一团体的阶段。传统的知识分子正日益脱离他们过去一直使之具有最高度最全面形态的社会团体，从而对现代国家有了极为深刻而完整的认识。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就是在完成一项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的行动；他们的行动等于承认国家危机处于决定性状态。但是这种知识分子既没有象教会所拥有的那种机构，也没有任何类似的组织，因而今天的危机比中世纪时更加尖锐。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这种危机虽然延续了若干个世纪，但当时那个在一千年间始终是欧洲经济动力的社会团体，还能够以完整的“国家”的面目出现，掌握着为组织一个完整的社会所必需的全部精神和道德力量。今天，“教权”正在同“俗权”分家，各自独立，“教权”就呈现无机状态，没有一个中心，“没有教皇”也没有领土，伟大的文化人士四处飘零。至于现代国家的解体过程则决没有象中世纪那个历史过程那样惊心动魄，中世纪是一个分合纷呈、治乱并存的过程，有一定的团体作为这个历史过程的动力，有一定的国家型式，从这欧洲的一千年伊始就存在；这种国家当然不会象今天这样集中统一，它不是单一统治阶级的国家，只能称之为“各统治阶级的邦联”。

应该考察一下，金蒂雷的“纯粹行动主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符合国家的积极阶段，柯罗齐又为何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行动中的统一”这一概念使金蒂雷把柯罗齐所认为的反历史的东西看作“历史”。在金蒂雷看来，所谓历史无非是国家的历史；柯罗齐则认为，这指的是“伦理—政治的”历史。换句话说，柯罗齐极力主张把市民社会同政治社会，领导权与专政区别开来，由大知识分子行使领导权，其前提是某种合作，亦即积极自愿（自由）的协商一致，也就是实行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金蒂雷认为经济—团体阶段是历史行动范围内的伦理阶段；领导权与专政是无法区分的，强制与协商一致就是一回事；不可能把政治社会同市民社会截然分开；只有国家，当然是指作为政府的国家，才是存在的，等等。

在哲学领域里出现的柯罗齐同金蒂雷之间的观点分歧，又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重演，表现为伊诺迪同金蒂雷的门徒们之间的争鸣。^{*}斯皮里托关于市民就是国家官员的概念，其直接根源就是对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不加区别，把政治领导权同国家—政治管理机构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它来源于斯皮里托观点里所包含的反历史或非历史的国家观，不管他多么能言善辩，也是否认不了的。斯皮里托拒绝承认这种说法，他的理由是，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都同国家有联系，甚至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在经济生活的任何阶段，国家随时可以进行干预，而经济生活则是一种永不间断的财产转移网。斯皮里托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回到他用以指责对手的那种纯经济观点上去了。颇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包含着“美国方式”的实质，因为美国还没有脱离欧洲在中世纪所经历的那种经济—团体阶段，就是说，还没有创立一种世界观或培养出一批大知识分子来领导市民社会里的人民。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美国是受欧洲以及欧洲历史的影响的。（关于美国的基本国家形式，是一个

* 参看1930年在《新研究》上进行的伊诺迪、贝尼尼及斯皮里托之间的论战。

极为复杂的问题,但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1930—1932年]

“颠覆分子”

在纯粹的意大利语中,关于“颠覆分子”的¹⁴⁰概念可以作如下的释义:一种消极的而非积极的阶级地位,“这些人”知道有仇敌,但只是从经验上把仇敌同所谓“上等人”¹⁴¹等同起来。在这“上等人”的概念中,大量包含着乡村敌视城市的成分,服装也成了一种主要的识别标志。还有反官情绪,因为官吏就是识别国家的唯一形式。农民,甚至小农场主都仇视官吏,他们并不仇视国家,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何谓国家。他们把官吏看作“上等人”,即使他们自己的家境实际上是比较富裕的;于是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对于农民来说,“上等人”往往也是“一条饿狼”。¹⁴²这种“普遍的”敌意从性质上来说还是“半封建的”,而不是现代的,所以不能把它当作阶级意识的证明,只能看作是这种意识初露端倪,换句话说,只能看作是基本消极的抗争态度。这些人既闹不清楚自己的历史身分,也不知道对手的历史身分或明确的界限。历史地采取守势的底层阶级只有通过一系列否定,通过对自己的敌人的身分和阶级界限的认识,才能达到自我认识;然而这一过程目前还处于潜伏状态,至少还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爆发。

考察一下通称“饿汉”的那个阶层,可以进一步了解“颠覆分子”的概念。“饿汉”并不是一个同质的阶层,要是对他们作抽象的划分,那就大错特错。在乡村以及某些农业地区的小集镇上,有两种不同的“饿汉”阶层:打短工的和小知识分子。打短工的基本特征不在于他们的经济状况,而在于他们的知识和道德状况。这些地区的农民多半是小自耕农或较为原始的佃农(根据租田的肥沃

程度和所在位置，分别按三七开、对半开或倒三七交纳租子），他们有少量的农具，一两头耕牛，还有一所茅屋，一般是利用歇工的日子自己动手盖的；此外，他们手头也有必要的资金，都是靠过去“找门路”，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或者到外码头去闯荡几年，或者“下几年煤窑”，或者在宪兵队¹⁴³里当几年差，或者给一位大地主当仆役，诸如此类。至于打短工的，一方面工作没有保障，三天两头找不到活干，另一方面又不能或者不肯“找门路”，一无所有，所以就成了“饿汉”。

小资产阶级“饿汉”原来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原有家产因食口众多坐吃山空，终至荡然无剩，而这个阶级的成员又不打算干卖力气的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衣食不周而又一心想在当地谋个办事员、信差之类小差使干干的阶层。这个阶层构成乡村生活中的破坏性因素，总是盼望发生变化（选举等等），从而造成地方上的“颠覆分子”；由于人数相当多，就形成了一股相当大的势力。他们勾结农村地区的资产阶级专门跟农民作对，把“饿汉”组织起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种阶层哪个地区也有，就是在城市里也有这种人。他们不是加入犯罪分子的黑社会，便是加入形形色色的黑社会的外围组织。城市里有许多小职员都出身这些阶层，他们在内心深处还隐藏着没落贵族、破落地主的傲气。他们屈尊于这份差使也是出于无奈。这些阶层的“颠覆行动”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左的，一副是右的，但左的面孔只是一种讹诈的手段；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就向右转，他们那种不顾一切的“胆量”总是使宪兵队宁可同他们合作。

要考察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意大利人民的所谓“国际主义”，它同“颠覆行动”的概念有联系。实际上，这是一种模糊的“世界主义”，同某些不难识别的历史现象有联系，即同中世纪天主教的世界大同主义有联系，这种世界大同主义是以意大利为中心，并且不

靠任何意大利的“政治的和民族的历史”而流传下来了。几乎没有一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意识。我在别处指出过，过去有，现在仍然有某种形式的意大利沙文主义，其流传之广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在意大利，政治、领土和民族的统一并没有很丰富的传统（或者不如说根本缺乏传统，因为在1870年以前，意大利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而且就是意大利这一名称，在古罗马时代只指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到马格拉河和鲁比肯河为止，在中世纪改称朗戈巴迪亚。参看 C·西波拉关于“意大利”名称的研究一文，发表在《都灵大学学报》上）。然而，意大利确实有过而且至今还保存着一种文化传统，要回到13—17世纪，但不是回到远古，尽管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都声称是古典时代的延续。这种文化统一就成为复兴运动时期以及民族统一的基础，但只是一种很薄弱的基础：它有助于把人民中间最积极和最聪明的阶层聚集在资产阶级周围，而且它还是大众民族主义的基础。由于在这种感情里面缺乏政治—军事或政治—经济因素，就是说，缺乏那种构成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民族主义心理的因素，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所谓“颠覆分子”和“国际主义分子”成了“沙文主义分子”而并不令人感到有什么矛盾之处。如果想要了解这种文化沙文主义有时所表现出来的毒性，那么必须指出：意大利的科学、艺术和文学繁荣时期正是它的政治、军事和国家没落时期。（发生在16及17世纪。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贵族、宫廷文化，就是说，当时地方自治的资产阶级已经没落，由于追求“豪华”，穷奢极欲，财富已变成重利盘剥的手段，而不是生产性的，这一切预兆着整个经济的衰落。）按照现代的字面意义来看，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概念同国家和阶级的确切概念是密切相关的；不理解什么是国家也就不会懂得什么是阶级意识（对国家的理解不仅存在于保卫它的时候，而且存在于为了推翻它而对它进行攻击的时候）；党之所以效力不

高，原因在此，等等。吉卜赛乐队或政治流浪生涯不是危险的现象，同样的道理，意大利的颠覆行动和国际主义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民众的“颠覆行动”同上层的“颠覆行动”有关联，就是说，事实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什么“法治”，有的只是以专制权力和少数人的小集团的派系斗争为特征的政治活动。

当然，以上所谈的一切看法，不能看作绝对正确，无非是想从几个侧面来说明某种局面。首先是为了能更好评价为改变这种局面所已经采取的活动（或不活动，即不理解自身的使命）。其次是为了突出某些已经涌现出来的集团，它们对这种局面已经有了理解并且在内部进行了改革。（1930年）

“唯物主义浪潮”和“权威危机”

在当代的危机中，有人悲叹为“唯物主义浪潮”的那种危机，同所谓的“权威危机”有关联。如果统治阶级失去了舆论的拥护，就是说，它不再是“引导”而只是“控制”，只靠行使暴力强制，这就充分说明广大群众已经同他们传统的意识形态决裂，对于他们过去曾经相信过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再相信，等等。这种危机就在于旧的垂死而新的还未能诞生；就在这种新旧交替之际，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病态现象纷纷冒出来了。请注意，在这一节里我要用我对所谓“下一代人的问题”所谈的几点看法来结束本文。而这个问题是由执政的老一辈人的“权威危机”引起的，同时也由于机械论作祟，强加在那些本来能够行使领导权的人身上，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无法执行自己的使命。

问题是这样的：大战以后所出现的人民群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严重分裂，能不能单纯使用强制手段不让新的意识形态发挥影响来加以“弭合”？如果用这种办法来阻塞对危机对新旧交替

的历史的正常解决，这样解决问题是否一定有利于旧的复辟？由于这种新意识形态的性质，尽管可加以取缔，但却绝对做不到完全消灭。同时，有形的压制只能使怀疑论得到长期的传播，而且会出现一种新的“安排”，比方说，天主教就会日益变成十足的耶稣会（意即变得更加阴险虚伪——译者），等等。

由此也就可以得出结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前大发展极为有利的条件正在逐步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理论，一开始必然是贫困的，但正是这种贫困推动了它的传播。旧的意识形态在临终以前总是表现为怀疑论，对一切理论和普遍公式表示怀疑；总是要利用纯经济事实（收入等等），总是要玩弄一套政治，这套政治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但其直接表现形式却是玩世不恭的。（回忆一下关于《马基雅维利文集小引¹⁴⁴》的轶闻，这篇文章也许是在伦西教授的影响下撰写的，有一个时期，1921或1922年，被那班卖身投靠文人吹捧为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工具。）

但是这样把问题归结到经济和政治上，恰恰意味着把最高级的上层建筑归结到与基础本身关系更密切的那些问题上去，就是说，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1930年）

译自葛兰西《狱中札记》1978年英文版第206—276页

马克思主义问题

实践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问题的提法

给一定历史时代的文化灌溉施肥的新世界观的产生，并根据原来的世界观从哲学上指导其产生。马克思是一种世界观的创造者。但伊里奇〔·列宁〕的地位如何？是否只是亦步亦趋祖述其说呢？说明就在既是科学又是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本身。

从空想到科学及从科学到行动。建立领导阶级〔classe dirigeante〕（即国家）同创造世界观有同等价值。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个提法该如何理解？马克思¹⁴⁵真是想用这个说法指出他的哲学一旦变成国家领导阶级的理论后的历史作用吗？对伊里奇来说，这确实在一定的疆域里发生了。我在另一处¹⁴⁶已经提到过由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领导权这一概念和事实本身的哲学意义。实现了的领导权意味着对哲学的实在的评论，意味着它的实在的辩证法。试比较格拉齐亚德伊*在《价格与超价格》¹⁴⁸绪论里的提法，他把马克思说成是集一系列伟大学者之大成。一种根本错误的看法：（除了马克思）没有哪一个伟大学者产

* 格拉齐亚德伊的提法同奥尔查蒂主教¹⁴⁷相比还差得远，后者在其所撰的论马克思的书中，把马克思比作基督，认为除此而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比拟，——这种比拟出自一位高级教士之口，实在是莫大的让步，因为奥尔查蒂主教是相信基督具有神的本质的。

生过一种独创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在精神上开创了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很可能要延续几个世纪,也就是说要延续到政治社会消失和调整了的社会到来为止。只有到那个时候他的世界观才会被超越,到那时,必然观念被自由观念所超越。

硬要把马克思同伊里奇加以对比,以分轩轻,这是毫无意义的蠢举。他们代表着两个阶段:科学与行动,这两者是同类的,同时又不是同质的。

从历史上看,把基督和圣保罗进行比较也是荒谬的。基督好比世界观,而圣保罗则是组织者,行动,传播这种世界观,这两者都是不可缺的,因而他们的历史形象是难分高低的。在历史上基督教本可以称为“基督—保罗教”,事实上这个名称更为贴切(只是由于相信基督是神,这种叫法才未能形成,但这种信仰本身也只是一种历史的、而非理论的因素)。

有关方法的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研究一种世界观的产生经过而其创始人对此又从未作过系统的说明(而且其实质上的一贯性不能从创始人的个别著作或一组著作中寻找,而是要从包含着这种世界观的各种要素的各式各样的智力劳动的总体发展中去寻找),那就必须先文献学方面下一番功夫。这一工作来不得半点先入为主的成见、先验论或者说不能事先带着框框。必须抱着严肃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去做。首先必须重视该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过程,以确定其中有哪些要素成了稳定的和“经常的”——即已吸收体现为他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同他先前研究过并受其启发的“素材”有所不同,而且青出于蓝。只有这些要素才是发展过程的基本方面。进行这种筛选所取的时期可长可短,但筛选的依据是内在因素,而不是表面迹象(但也可以利用),最后筛掉若干“废物”,即该思想家

可能在一定时期表示过同情，甚至一度承认过并在分析批判方面以及历史的和科学的创造方面利用过的零星的学说和理论。

通观所有的学者的个人经历，下列现象极为常见：任何一种新理论在某个时期被人“发愤”¹⁴⁹地研究时（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并非出于表面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对它发生深刻的兴趣），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吸引力，能把研究者的整个身心牢牢地吸引住，特别是研究者是青年的话；只有下一个新理论被研究，才能煞住这股劲头，而到（这两者之间的）批判均衡确立以后，对理论的研究开始深入，但这时对所研究的体系或其作者已不再会产生那样强烈的冲动了。所说的这位思想家越是好冲动好辩论而又缺乏系统性；或者，如果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位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人物，或是一位处于不断创造和经常运动过程中的、富于强烈的严格要求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有识之士；那么上述观察的正确性就越大。

从以上这些前提出发，我们的工作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 重写这位作者的传记，不仅在实践活动方面，而且首先是其思想活动方面。

2. 把他所有的著作，哪怕是最不重要的著作按照年代先后编制目录，并按照内在的标准，即智力形成、成熟程度、掌握和应用新的思想方式及新的认识生活和世界的方式等，对这些著作划分时期。研究思想发展的基调¹⁵⁰和节奏比研究个别偶然的论断和零星的格言重要。

有了这种预备工作，下一步的研究才能进行。此外，对于这位思想家的著作，还必须区别哪些是他亲手完成并发表了，哪些因没有完成而尚未发表，哪些是由他的朋友或学生替他发表的，但有修改删节之处，或者换个说法，有出版者或编辑者的积极参与。对于死后发表的著作的内容要特别审慎，因为不能把它看作定稿，只能看作是有待于加工的草稿。我们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

些著作，特别是撰写过程拖得很长而又下不了决心定稿的著作，不是部分或全部地被作者本人推翻过，便是感到还不太满意。

至于具体说到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则其文字著作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1. 在作者直接负责下发表的著作：其中，一般地说，不仅应该包括他本人交稿付印的著作，而且包括作者以各种方式“发表”或使之流传的东西，诸如信札，通告等（典型的例子是《哥达纲领眉批》和信札）。

2. 不是作者直接负责出版的，而是死后由别人刊行的著作：最好能有毫不走样的仿真本¹⁵¹（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在做），或者至少要根据科学标准详细说明原文。

要按照编年一批判时期把这两部分重新整理，以便能作出正确的比较，而不是纯粹机械的和随意的比较。

对于作者后来亲自审定发表的著作，要仔细研究和分析作者对材料的提炼加工。这种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标准和依据，以便批判地估价别人整理出版的作者遗稿的可信程度。原始材料同作者本人亲自修改后发表的定稿之间的出入愈大，则经他人之手对同类型材料的校订其可信程度就愈小。任何著作永远不可能同撰稿时所搜集的原始材料一模一样。对准备阶段所收集的材料进行剪裁、编排、定稿，这一切才恰好构成一部著作的成品。

就是信札，也得相当仔细地加以研究；信里所提到的某种十分肯定的论断，可能在书里见不到。书信体行文活泼，从艺术性来看固然要比书本里字斟句酌的文字有力，但有时会导致论证上的缺陷。在信札里，也象在演讲和谈话中一样，往往发生逻辑上的错误；反应快，难免要影响思路的严密完整，前后一贯。

在研究独创和革新的思想时，对于其他人对这一思想的文献所作的贡献的考虑只能是第二位的。应该本着这个精神，至少作

为一般原则和方法，来谈实践哲学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同质关系问题。当这一位或那一位经过彼此协商一致而作出某一论断时，这个论断也只是对该问题有效。即使这一位为那一位的著作写了几章，这也不能成为一种绝对的理由，说必须把这本书看作是见解完全一致的产物。没有必要低估第二位〔恩格斯〕的贡献，但也不必把第二位与第一位等同〔把恩格斯与马克思等同〕起来，也不应该设想第二位归诸第一位的东西都是绝对真实，没有混入任何杂质。当然，像（恩格斯）那样不计个人名利的无私表现在著作史上还找不出第二个，然而问题不在这里；也不是说对〔恩格斯的〕绝对忠实于科学的态度还有什么怀疑。问题在于：〔恩格斯〕毕竟不是〔马克思〕，如果我们想要认识〔马克思〕，那么首先要从他直接负责发表的原作中去寻找。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得出若干在方法论上值得注意的问题，并为有关的研究指出了某些方向。例如，1912年福尔马吉尼出版的罗多尔福·芒多尔福所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¹⁵²其价值如何？索列尔在一封致柯罗齐的信里对研究这样的课题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恩格（斯）作为独创性思想家的能力尚嫌不足，他不止一次地反复强调，不要把这两位作者（指实践哲学的创始人——译者）混为一谈。对于索列尔所提出的问题姑且存而不论，但我认为，既然有人（明白无误地）断言两个朋友中的第二位作为理论家的能力不足（或至少比第一位是略逊一筹的），因此，弄清楚独创的思想究竟是属于谁的，实在非常必要。事实上，除了芒多尔福的那本书，文化界始终还没有人系统地做过这样的研究。实际情况是，〔恩格斯的〕说明，其中有些阐述是相对的自成体系的，直到今天还是被看作首屈一指的真本，而且是唯一的真本。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以为芒多尔福那部论著是很有启发性的，至少是就这部书所探索的研究方向而论。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¹⁵³

把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论述实践哲学的所有文章汇集起来编写一个客观的系统的提要以取代坊间已经绝版的论文集，倒是一件颇为有益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任何旨在使拉布里奥拉的哲学观点重新得到传播的创议，都是不可或缺的开端，因为他的观点，除了圈子里的少数人，极少为人所知。令人惊奇的是，列甫·勃朗施坦〔托洛茨基〕在回忆录¹⁵⁴里居然说拉布里奥拉是“一知半解”。这种看法实在令人莫名其妙（除非指拉布里奥拉本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只能是德国知识分子集团不自觉地表现出故弄伪科学的玄虚在俄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其实，拉布里奥拉认为实践哲学是不受任何别的哲学潮流控制而卓然独立的，他是一位想要科学地建立实践哲学的理想人物。

目前占优势的主要有两大流派：

1. 所谓的正统派，其代表人物是普列汉诺夫¹⁵⁵（参阅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尽管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还是陷入了庸俗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对马克思的哲学文化（以及对他思想的成长定型直接间接地有影响的整个哲学气氛）进行仔细的研究当然很有必要，但这只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即对他的独创性的哲学进行研究的前提，只研究几条“来源”或他本人的“文化”，是不可能对这一哲学作出全面详尽的论述的。首先必须着重研究他的创造性的和建设性的活动。普列汉诺夫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明他的思辨能力和编史能力相当薄弱。

2. 正统派决定了它的对立面的崛起：一种把实践哲学同康德主义以及其他非实证主义的和非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潮拉扯在一起的派别。这样，这一派的奥托·鲍威尔¹⁵⁶便得出了“不可知论的”

结论,他在一本论宗教的书里写道,马克思主义可以为任何哲学所支持,并与之相结合,即使是托马斯主义¹⁵⁷。这第二派严格地说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流派,而是包括德·曼的弗洛伊德主义在内的、所有不承认迂腐的德国学究是所谓“正统”的流派大杂烩。

拉布里奥拉及其提出哲学问题的方式的命运,何以如此背时?在此不妨重述一下罗莎〔·卢森堡〕关于批判经济学〔《资本论》〕及其精粹问题所说过的一段话:在斗争的罗曼蒂克时期,即民众的狂飙突进¹⁵⁸时期,在政治领域里,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最直接的武器和策略问题上,在哲学领域里则集中在一些较次要的文化问题上。但是,从一个从属的社会集团变成真正自治的和领导的,并从而产生一个新型国家之日起,我们便具体感受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精神道德秩序,即一个新型的社会,从而有必要发展更为普遍的概念和更为精炼、更加明确的思想武器。唯其如此,才必须传播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并使他提出哲学问题的方式占主导地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为自治的和更高级的文化而斗争,这是斗争的正面提法,这个斗争的带有论战性质的反面提法便叫做“无”和“反”——无神论、反教权主义,等等。这样,我们就给予了传统的非宗教的人本主义一种现代的和当代的形式,它必定是新型国家的伦理基础。*

实践哲学和现代文化

实践哲学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方面”¹⁵⁹,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丰富了一定的文化思潮。研究这一实际问题是件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对此,所谓的正统派却一直漠不关心,甚或

* 要是对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哲学观进行分析整理,就可以成为普通期刊不可缺少的哲学组成部分。也应该编一本研究拉布里奥拉的国际文献目录。

根本无动于衷；原因是，哲学上业已发生的最重大的结合是实践哲学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潮之间的结合，这一事实如果不是欺人之谈的话，在所谓的正统派看来，纯属荒唐，因为他们在实质上是与上世纪最后 25 年来的一股特别的文化思潮（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主义）一脉相通的。（在普列汉诺夫的《基本问题》一文中固然对这个事实有所提及，但也只是一笔带过，根本不打算作批判性的说明。）因此有必要像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试图做的那样，对问题的提法重新作出估价。

实际情况如下：实践哲学的确受到了双重的修正，也就是说，它已经被纳入双重哲学结合之中。一方面，它的某些要素已或明或暗地为许多唯心主义思潮所吸收（指出柯罗齐、金蒂雷、索列尔、与柏格森一致者实用主义就足够了）。¹⁶⁰ 另一方面，所谓的正统派一心想要找到一种哲学，能够按照他们极狭隘的观点看来是全面地而不是“简单地”解释历史，因此，他们所自命为正统的，就是把实践哲学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基本上等同起来。还有一派则回到康德主义去了（除了维也纳的教授马克斯·阿德勒¹⁶¹，在这里还可以举出两位意大利教授阿尔弗雷多·波吉和阿德尔基·巴拉托诺¹⁶²）。可以指出，一般说来，凡是试图把实践哲学同各种唯心主义思潮结合起来的流派基本上是由“纯粹的”知识分子构成的，而正统派，则是由这样一些知识分子构成的，他们比较明显地致力于实践活动，因而同广大民众的联系（或多或少的表面联系）就比较紧密（然而这种情况并未防止广大民众中的大多数人做出具有不小的历史—政治意义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这种划分十分重要。“纯粹的”知识分子作为传播最广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炮制者，作为本国知识分子团体的首领¹⁶³，不得不多少利用一些实践哲学的成分，以加强自己的思想体系，用新理论的历史现实主义来缓和那过分露骨的思辨伪哲学，并为他们与

之有联系的那个社会集团的武库提供新的武器。而正统派却不由自主地置身于反对人民大众中流传甚广的意识形态，反对宗教先验论的斗争之中，他们认为，只消祭起一种平凡而庸俗的唯物主义这个法宝，便可战而胜之。然而这种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常识的一个不可小看的层次，它是靠宗教本身才得以维持生存的，其依赖程度要比当时或今天所想象的大得多，而在人民中间，宗教表现为一种充满着迷信和巫术的低级无聊的东西，在这方面，物质起着不小的作用。

拉布里奥拉和这二派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说实话，也并非总是表示得那么毫不含糊）实践哲学是独立的、独创的哲学，本身就包含着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以便从解释历史发展成普遍适用的哲学。我们必须从这个方向努力来发展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观点，而罗多尔福·芒多尔福的那本书（根据我的记忆）似乎并没有前后一贯地发展这一观点。*

为什么实践哲学竟会有这样的遭遇，它的基本要素会被利用去造成或同唯心主义或同哲理唯物主义的结合呢？要弄清这个问题，不能说不是一件复杂而微妙的工作，要求有巧妙的分析能力和清醒的头脑。否则，就容易为外表的相似之处所蒙蔽而看不到隐蔽的相似之处，就不能洞察必然的，但被遮掩起来的联系。必须以极其谨慎的批判眼光来确定有哪些概念，实践哲学“让给”了传统哲学，使后者得以有一个短暂时期的恢复青春，这不多不少地意味着要编写一部实践哲学创始人〔马恩〕逝世以来的现代文化史。

很明显，公开的吸收是不难寻踪觅迹的，不过那也得批判地加

* 芒多尔福似乎从未放弃过作为罗伯托·阿尔迪戈的门生标志的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观点。芒多尔福的弟子迪亚姆布里尼·帕拉齐论述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那本书¹⁶⁴（芒多尔福为之作序）则是芒多尔福本人在大学执教中概念和准则贫乏的证明。

以分析。柯罗齐把实践哲学归结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经验的准则，便是一个典型的公开吸收的例子。这种看法甚至渗透到天主教徒中间（参阅奥尔查蒂主教的著作），它促成了意大利史学界的经济—法律学派的建立¹⁶⁵，这个学派如今已跨越意大利国界，发展到了国外。但要查明表面上不承认的暗中吸收，则是个最棘手最微妙的问题，因为这种吸收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实践哲学业已变成现代文化的一个要求，一种扩散着的气氛，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与反作用，改变了旧的思想方式。从这一观点出发，研究索列尔倒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通过对索列尔及其成功的研究，可以获得不少有关的说明。研究柯罗齐，其意义亦然如此。不过我以为最重要的莫过于研究柏格森的哲学，研究实用主义，以查明，假如抽掉了同实践哲学的历史联系，它们的某些观点会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无法理解。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实践哲学对那些在原则问题上同自己进行激烈交锋的人，也给他们上了政治学的实践课，这情况犹如耶稣会在理论上同马基雅维利争得不可开交，而在实践上却仍然是马基雅维利的优秀弟子一样。马里奥·米西罗利¹⁶⁶担任《新闻报》驻罗马记者期间（大约在1925年），在该报上发表的一条《评述》中大致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能够了解较明智的实业家在内心深处，是否不相信《批判经济学》〔即《资本论》〕对他们的情况分析得十分透彻，以及他们是否不打算利用从中所得出的教训，这倒是满有意思的。这丝毫也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因为，如果说〔马克思〕对那个时代的现实情况摸得很准，分析到了家，那也无非只是把这种现实的历史代理人一向本能地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的、由于敌对的批评而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的东西，从理性上加以整理而使之系统而已。

问题的又一方面更加耐人寻味。连所谓的正统派也把实践哲学同其他哲学结合起来，而且主要是同某一特定的而不是所有的

哲学相结合,这是什么缘故?事实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同传统唯物主义的结合;至于同康德主义的结合,只取得了极有限的成功,而且仅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知识分子团体中间。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看一看罗莎(·卢森堡)的《论实践哲学发展中的停滞和进步》一文¹⁶⁷,她在这篇论文里强调指出这种哲学的各种组成部分有所发展,尽管程度不等,但总是注意跟上实践活动的需要。她的意思是说,新哲学的创始人大大地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乃至后来时代的需要,他们建立了一个武库,其中的武器由于超越时代而不便动用,这些武器要在将来某个时候才能投入使用。这种说法多少有点诡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个抽象的阐述,即把有待说明的事实当作对事实本身的说明。尽管如此,其中还是包含着真理的明珠,值得深入探索。据我看,产生这些结合的历史原因之一不妨从下列事实中寻求:实践哲学之所以不能不同异己的思潮结成同盟,是为了战胜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残余,而这种残余,尤其是宗教领域里的残余,依然在民众中间存在。

实践哲学担负着两项任务:战胜各种冠冕堂皇、天衣无缝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使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得以组成;对那些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状态的民众进行教育。这第二项任务,从实践哲学的性质看,是项根本任务,实践哲学为此倾注了自己的全力,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也在质量上,出于“教学法”上的考虑,把新哲学组成一种略高于民众平均文化的(那是十分低的)文化,不过这种文化是绝对不足以战胜有教养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然而新哲学之所以产生,正是为了超越当时文化的最高表现——德国古典哲学,并造就一大批属于新的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而这种哲学乃是这个新社会集团的世界观。至于现代文化,特别是打着唯心主义烙印的文化,根本不能研究创造出民众文化,也不能以道德的和科学的内容来充实自己的学校教育大纲,它们的教育大纲

始终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体系上¹⁶⁸。它只是一小撮精神贵族的文化，只有当它变成直接的（也是暂时的¹⁶⁹）政策时，才对青年人有影响，否则就很难办到。

此外，还必须看一看各力量的这种文化组合是否有可能未必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在以往的历史上，根据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是否找不到类似的组合。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新教国家里的宗教改革，毫无疑问，都是在现代以前的这方面的典型实例。柯罗齐在《意大利巴罗克式时代史》¹⁷⁰第11页上写道：

“文艺复兴运动仍不免是一种贵族的和社会尖子的运动，即使在作为这个运动的母亲和乳母的意大利本土，也概莫能外。它没有跳出宫廷小圈子，没有深入民间或成为习俗和‘成见’，换句话说，没有成为集体的信念和信仰。至于宗教改革，倒是真正收到了深入民间的功效，然而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即造成自身内涵发展的停滞，它的生命胚胎的成熟十分缓慢，而且往往发生波折。”

另外，在第8页上这样写道：

“路德也和那些人文主义者一样，为天下之忧而忧，为天下之乐而乐，指斥怠惰，号召劳动；可是，在另一方面，这却使他对文学和科学抱着犹豫甚至敌视的态度，以致使埃拉斯默说出了这样的话：‘路德教所到之处文学灭绝’。可以肯定，要不是由于创始人所抱的这种反感，除此而外再找不出第二个原因，德国新教绝对不至于好几个世纪以来在科学、批判和哲学方面始终是一片空白。然而，意大利的宗教改革家，特别是胡安·德·瓦尔德斯小团体里的宗教改革家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却毫不费力地把人文主义同神秘主义结合起来，把崇尚科学同道德戒律结合起来。加尔文教，由于它有一套严格的感恩敬神的教义和戒律，固然不利于求知的自由和对美的崇

拜，但通过把对神的感恩观解释、发展并承认为安居乐业的天职观，它就起到了有力地促进经济生活，促进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积累的作用。”

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加尔文教引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众运动，并借助于这种运动扩大自己的影响；只是在尔后的时期才陆续产生出较高的文化。至于意大利的宗教改革家的活动，则并无重大历史成就可言。的确，就是宗教改革本身，在其高级阶段也必然采取文艺复兴的格式，而在非新教国家中传布开来，尽管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些国家的民众中尚未酝酿成熟。但正是由于进入了在民众中发展的阶段，新教国家才得以顽强地胜利地抵抗天主教十字军的讨伐。现代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之一，日耳曼民族就是这样产生的。法兰西屡次遭到宗教战争的蹂躏，表面上是天主教取得了胜利，但也经历了18世纪的民众改革，包括启蒙运动、伏尔泰主义以及“百科全书派”等。这种改革或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张本，或与之同时发生。这确实是法国人民所发动的一场伟大的精神和道德改革，它比德国的路德派改革更为全面，因为它把乡村地区的广大农民群众也卷了进去因而拥有明显的世俗基础，因为它曾企图用以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为号召的完全世俗的思想体系来取代宗教。然而就连这种改革也没有能使高级文化直接繁荣起来，但由实证法学所体现的政治学领域除外。*

实践哲学是现代的民众改革，这种认识或许若尔日·索列尔在以詹森主义式的愤怒猛烈攻讦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卑劣勾当时有所流露，不过他的认识是支离破碎的，纯粹是从唯理智论出

* 在这里重温一下黑格尔对同一种文化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和德国所采取的具体民族形式所提出的比拟：黑格尔的这一观点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以后，最终使诗人卡杜奇写下了这样的名句：“……抱着对立的信念，康德切掉了上帝的头颅，罗伯斯庇尔砍去了国王的脑袋”。¹⁷¹

发的(至于那些希望意大利发生宗教改革,希望意大利出现加尔文教的新翻版的人,如米西罗利之流,则是一批完全脱离实际的清谈家)。索列尔接受了勒南*关于必须实行精神和道德改革的观点;勒南(在致米西罗利的信中)宣称伟大的历史运动总是表现为一种现代文化,等等。不过我以为,索列尔在采用原始基督教作为检验标准时就隐隐约约地流露出这种观点;他的主张,尽管书卷气太浓,还是言之成理的;尽管引证太多过于死板,甚至出于杜撰,但毕竟也不时迸发出深刻的直觉火花。

实践哲学的前提是以下这一切过去的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大革命,加尔文教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以及植根于整个现代生活观的历史主义。实践哲学则是以上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得以圆满成功的顶点,成为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对立中的辩证法。实践哲学符合由新教改革加上法国大革命而成的结合:它既是一种政治的哲学,也是一种哲学的政治。实践哲学仍处于民众¹⁷²阶段:造就一批独立的知识分子可不是一件易事;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包含着行动与反行动,聚合和分裂,以及许许多多复杂的新结构的产生。实践哲学乃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概念,这个集团被剥夺了历史首创精神,虽不断扩大,但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未能超越某一质的标准,不足以掌握国家、实现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而只有这种领导权才允许在知识分子集团的发展中保持一定的有机的平衡。这样,实践哲学本身就成了“偏见”和“迷信”。其实,这是现代历史主义的民众方面,不过它本身又包含着可以取代这种历史主义的原则。在文化史上(其范围要比哲学史广得多),民众文化由于(社会)正处

* 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折衷派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他利用冒充科学的论断,企图保卫宗教和唯心主义。

于一场变革之中、由于从人民矿石中正在炼出新兴阶级之钢而大放异彩之日，也是“唯物主义”繁花似锦之时；与此同时，各传统阶级却死抱住唯灵论不放。黑格尔在法国革命和复辟之间折衷，对思想生活中的二元——唯物主义和唯灵论赋予辩证的形式，不过这种综合是“一个倒立着的人”。¹⁷³黑格尔的后继者们破坏了这种统一，有的回到唯物主义体系，有的回到唯灵论体系。实践哲学通过自己的创始人更生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以及法国唯物主义的整个这一套经验，以便恢复辩证统一的综合，即把它“倒过来”。黑格尔主义被割裂的遭遇，如今也在实践哲学身上重演，也就是说，一方面产生了从辩证统一向哲学的唯物主义复归，另一方面，现代唯心主义的高级文化出于寻求新的万应灵药之需要，竭力要把实践哲学的某个组成部分，即为其配方所必需的部分拉过去据为己有。

唯物主义观念“在政治上”是接近人民的，是接近“常识”的。它同许多信念和偏见，而且几乎同一切民间的迷信（巫术、幽灵等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可以在民间的天主教中看出来，而在拜占庭的东正教中尤为显著。民间的宗教是粗糙的唯物主义的，但知识分子的正式宗教却竭力阻挠形成两种各自独立的宗教，两个互相分离的阶层，以免在外表上（尽管实际情况是如此）正式变成一种狭隘集团的意识形态。不过从这个观点出发，千万不可把实践哲学的态度同天主教的态度混为一谈。前者同民众中的新阶层保持着动态的联系，并一贯致力于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生活（水平），后者则竭力维持一种纯粹机械的联系，注重表面的统一，这种表面统一的基础首先是庄严隆重的宗教仪式，要群众肃然起敬，顶礼膜拜。许多宗教异端运动都是民众力量想要改革教会、想要通过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而使教会接近人民的表现。对此，教会所作出的反应往往是十分粗暴的：它成立了“耶稣会”，它拉起特兰托宗

教会议的大旗作虎皮，裹藏着自己；它组织了出色的“民主”选拔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机构，但是被选拔的对象都是作为单独的个人，而不是反映民众集团意愿的代表。

在文化发展史中，要特别注意文化活动的组织和使这种组织采取具体形式的人物。从盖·德·鲁吉埃罗论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著作¹⁷⁴中可以看出以埃拉斯默¹⁷⁵为首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抱的态度：他们都向火刑和迫害屈膝。因此，宗教改革的体现者并非知识分子，而是全体德国人民，是不可分割的人民整体。宗教改革在高级文化的直接领域中所以“毫无建树”，其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在敌人面前的临阵脱逃，要到始终忠于宗教改革事业的人民经过逐渐的筛选，才产生出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在古典哲学领域里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

迄今为止，实践哲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实践哲学领域内所形成的大知识分子，除了人数不多以外，还不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并不出身于人民，而是传统的中间阶级的代表，一到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就回到中间阶级那里去了。另有一些人留下来，但不是为了促进实践哲学的自主发展，而是要对它作系统的修正。说实践哲学尽管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要素，但毕竟是一种新的、独立的、独创的理论，这等于肯定一种新的、正在成熟的文化的独立性和独创性，这种文化将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在任何一定时期所存在的，都是新与旧的可变结合，都是与社会关系的均衡相适应的文化关系的暂时均衡。只有建立国家以后，文化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才被提出来，并要求得到全面系统的解决。无论如何，在这种新国家成立以前，只能采取一种批判—论战的态度，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势必是浪漫主义的，不过这种浪漫主义是自觉地力求集古典浪漫主义之大成。

附注一，必须把复辟时期¹⁷⁶当作各种现代历史学说百花

齐放的时期来研究，其中也包括作为这些学说的顶峰的实践哲学。不管怎么说，对实践哲学的详细阐述恰好是在1848年前夕，正是王政复辟面临崩溃，神圣同盟趋于瓦解的时期。所谓复辟，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明白。事实上，旧秩序的真正复辟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力量组合的新变化，通过这一改组，中等阶级的革命成果有了明确的规定并受到法律的确认。法国国王和罗马教皇分别成了各自的党的领袖，而不再是法国或基督教的当然代表。教皇的地位特别不稳定。在这个时期，开始成立永久性的“黥武的天主教徒”团体，这些团体，经过种种中间阶段——1848—1849年，1861年（教皇国家第一次解体和艾米利亚省的归并），1870年以及战后时期——终于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天主教行动”，虽说强大，却处于防御地位。复辟时期的各种历史主义学说都是同各种抽象和空想的18世纪思想体系相对立的，这些学说还作为无产阶级的哲学、伦理学和政治而继续存在，直到1870年在法国特别流行。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群众哲学，是同形形色色的18世纪民间观念，从最幼稚的观点到蒲鲁东的观点，相对立的。（蒲鲁东的观点受到某种保守的历史主义的嫁接，因而或许可以称他为法国的焦贝蒂¹⁷⁷，不过倒是一位出身于民众阶级的焦贝蒂——意大利历史同法国相比是落后的，这一点从1848年时期中就可发现。）如果说保守的历史学家，旧的理论家在批判僵化了的雅各宾思想体系的空想性质方面是好手的话，那么，实践哲学家无论在估价雅各宾主义的实在意义而非抽象意义方面（这指的是在一定情况下有节制活动的事实真相，而不是某种空泛的高调），或是在估价保守派本身的历史作用方面都更为高明。雅各宾主义是新法兰西民族的开创因素。保守派实际上是雅各宾党人的问心有愧的后代。保守派

一方面遣责雅各宾党人过火，一方面却又很仔细地接管他们的遗产。实践哲学正式宣布：不仅要对过去的一切加以说明并证明为正当，同样也要对自身加以历史地说明并证明为正当，换句话说，它是最伟大的“历史主义”，完全摆脱任何一种抽象的“观念论”，它是历史界的实在的成果，新文明的开始。

思辨的内在性及历史主义的或实在论的内在性

有人论证，说实践哲学是在19世纪前半期文化最高度发展的环境中产生的，而这种文化是由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政治著作和实践所代表的，也就是说这三种文化运动是实践哲学的来源。¹⁷⁸对于这个论断应该怎样去认识？是说这三者分别对实践哲学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呢？还是说实践哲学是这三者即这一时期全部文化的综合，因而不论考察新综合中的哪一个“要素”——理论的、经济的或政治的，都能发现三者中的每一种都是其兼备“要素”？我看应该是后者，而且我以为应该把这种综合中的兼备“要素”确定为内在性的新概念，内在性本是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思辨形式，后来借助于法国政治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而转化为历史主义的形式。

关于德国哲学语言与法国政治语言在实质上的同一性，参见前面的札记。在我看来，研究德国哲学、法国政治学及英国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是一项最有意思最能有收获的研究工作。我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¹⁷⁹关于这个问题，一开始的提法应该是：李嘉图在经济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论上的新准则，是否只应看作纯粹工具性的准则（或看作是形式逻辑的新的一章），还是具有哲学革新的意义？形式逻辑“趋向律”原理¹⁸⁰的发现使“人的家政”*和“一定的市场”等

* 原文为拉丁文homo oeconomicus.

经济学基本概念得到了科学的定义，这不也是一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发现吗？难道新的“内在性”关于“必然”和自由的新观念等等不正是包含在它里面吗？在我看来，转化成这些术语正是实践哲学的功劳，它把李嘉图的发现普遍化，以恰如其分的方式推广到全部历史中去，并以独树一帜的方式从中引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

有整整一系列的问题有待于研究：

1. 把李嘉图的原理从经验的准则提炼为正式的科学原则。

2. 探索李嘉图的这些原理的历史来源，这与经济科学本身的产生有着不可分的渊源，也就是说同资产阶级作为“具体的世界阶级”的发展，从而也同世界市场的形成相联系。这个市场上的复杂运动的“密度”之大，已足以使从中离析出一些必然的规律性并加以研究成为可能。（必须指出，这些规律是趋向律；趋向律不是博物学意义上的规律或思辨决定论的规律，而是“历史主义”意义上的规律。也就是说只有存在着“一定的市场”或换个说法，只有存在着一种活跃的、在其发展的运动中有机地相互联系的环境，这些规律才起作用。经济学是把这些趋向律看作是现象的量的表现加以研究的；在从经济学向普遍的历史的转化过程中，量的概念同质的概念、同〔量〕变成质的辩证的质的概念合二而一*）。

3. 把李嘉图同黑格尔和罗伯斯庇尔联系起来。

4. 考察实践哲学是怎样从这三种活生生的思潮的综合，上升为清除了一切先验论和神学痕迹的新的内在论观念的。

除了上述研究课题，还应该提出一项有关实践哲学对以柯罗齐和金蒂雷的现代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代延续的看发的研究。恩格斯关于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那句话¹⁸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是理解为一个已经大功告成的历史领

* 量——必然；质——自由，质—量辩证法（辩证联合）和必然—自由辩证法是一一的。

域，已经一劳永逸地把黑格尔主义中富有生命力的精华全部吸收干净，还是理解为一种仍在运动着的历史过程，正在重现哲学文化综合的必要性？我看还是第二个答案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节里所批判过的那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观点¹⁸²，正在现实中重演，今天，虽说处于历史的更高阶段，还和当时一样，仍然需要综合，需要一种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阶段上的综合。

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统一

人与物质（自然—物质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通过辩证的发展达到统一。在经济学中，统一的中心是价值，换个说法就是工作人员与工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否认价值论的人陷入极端庸俗的唯物主义，他们只把机器本身——作为不变的技术资本——提出来，并把它们看成不受操纵它们的人控制的生产者）。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即人的意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在政治中〔统一的中心〕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国家（经过集中的意志）进行干预以使教育者受教育，一般的社会环境（需要深入研究并用确切的术语加以表述的问题）。

哲学——政治学——经济学

假如这三种活动领域是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那么，按照它们的理论原则，一种要素就可以变为其他两种要素，并且彼此可用每种组成要素特有的专用语互相表述出来。任何一种要素都蕴含在其他要素之中，三者一起形成同类的循环论证。

根据以上这些前提（还需要进一步提炼），文化史家和思想史家推导出不少意义重大的研究标准和批评准则。一位伟人，有可能不在那照理是、或从外部分类观点来看显然是最合乎逻辑的地方，

而在其他可能被认为显然不相干的地方，表现其思想的更成熟更丰富的方面。政治家也写文章谈哲学：他的“真正的”哲学很可能要从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每个人都有一种基本的和主要的活动：他的思想正应该从这方面去寻找，这种思想往往是隐蔽的，有时甚至同他公开发表的思想相矛盾。不消说，以此作为历史判断的标准，不免有流于肤浅的种种危险，运用时必须十分谨慎，尽管如此，这一标准并不因此而失去生成真理的能力。

事实上，“客串的哲学家”是不容易摆脱在他那个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潮的，很难不接受对某种已经变成教条主义的世界观的解释(等等)。而作为政治科学家，他感到自己是不受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集团的偶像的束缚而独立的，因而能够更加直接地、完全独创地来研究这同一个世界观；他可以洞察到它的核心深处并加以发展，使之生气勃勃。在这方面，〔罗莎·〕卢森堡的看法还是有益的，发人深思的。她写道，实践哲学的某些问题，由于尚未成为普遍的历史进程中的当务之急或某个社会集团的迫切要求，所以是无法探讨的。在经济—团体阶段、争取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阶段、以及国家权力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既不能灵机一动召之即来，也不能时机未到提前安排。在争取领导权的阶段，就是要发展政治科学；而在国家的阶段，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都应该得到发展，否则国家就有解体的危险。

实践哲学的历史性

实践哲学对自身抱历史主义态度，也就是把自己看成是哲学思想的一个暂时阶段，这个态度不仅贯串于它的整个体系，而且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把它说得很清楚，即一定时期的历史发展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从前的一切哲学(哲学体系)都是使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的表现。但就每一种哲学体系本身而言，它并

不是有意识去表现这种矛盾，因为只有各种彼此冲突的体系的总和才能产生这种表现。每个哲学家都坚信，而且也不能不坚信他是在表现人类精神的统一，也就是历史与自然的统一。的确，要是不存在这种信念，人们就不会行动起来，就不会创造新的历史，哲学就不会成为“思想体系”，就不会在实践中表现为狂热的坚如磐石的“民众信仰”，这种信仰表现出和“物质力量”一样的能量。¹⁶³

在哲学思想史上，黑格尔是一位有专门的一章加以论述的人物，因为他的体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甚至以“哲学传奇”的方式，使我们得以理解什么是实在。也就是说，我们会在一个哲学体系中和一位哲学家身上看到对矛盾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在以前我们只能从哲学体系的总和中，从彼此争论互相矛盾的哲学家的总和中获得。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是摆脱了（或正在设法摆脱）一切片面的和狂热的意识形态成分的哲学；是对矛盾的充分认识，通过这种认识，哲学家本身（既可理解为个人，也可理解为整个社会集团）不仅掌握矛盾，而且也把自己看成是矛盾的因素，并把这个因素提高到认识的从而行动的原则。〔实践哲学〕否认“一般的人”，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摒弃和摧毁一切教条式“统一”的概念，因为它们反映了“一般的人”或每个人内在的“人的本性”这一概念。

如果说实践哲学也是历史矛盾的反映，并且是十分自觉的因而也是最全面的反映；那么，这意味着它也是与“必然”而不是与自由相联系着，因为自由是不存在的，而且从历史上看，还不能存在。这样看来，假如已经证明矛盾一定会消亡，那么从而也就证明实践哲学一定会消亡或被取代。在“自由”的王国里，思想和观念可以不再在矛盾以及斗争必要性的土地上产生。目前，哲学家——实践哲学家——只能提出这种一般的说法，无法作进一步的论证；他

无法回避目前的矛盾领域，他无法做到在不直接制造乌托邦的情况下论证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因而只能笼统地说说。

这当然不等于说，乌托邦不可能有哲学价值，因为它有政治价值，而一切政治都包含着哲学，哪怕是不完整的和仅具雏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是最庞大的乌托邦，也就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形而上学”，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无边的宏愿，想用神话来调和历史生活中实在的矛盾。事实上，宗教所宣扬的是：人类都具有同样的“本性”，凡是存在的，因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都是上帝的儿女，人与人是兄弟，彼此平等，人与人自由相处，彼此一样；在代表着人类“自我意识”的上帝这面镜子面前，人人都可对自己作如是观；但是它又宣扬，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为今世，而是修来世（乌托邦）。这样一来，平等、友爱、自由的观念就在人们的心中沸腾起来，就在既看不出自己可以同其他人一律平等，亲如手足，也看不出自己可以同其他人自由相处的那些阶层的人们心中沸腾起来。正因为这样，所以每逢发生民众骚乱，总要提出这些要求，尽管方式不同，形态各异，思想体系也不一致。

在这里不妨顺便提一下符·伊里奇〔·列宁〕所提出的一条重要意见。1917年四月纲领¹⁸⁴，即专门论述公费学校¹⁸⁵的那一条，确切地说，是这一条（参阅1918年日内瓦版）的补充说明，其中提到在雅各宾恐怖时期被送上断头台的化学家兼教育家拉瓦西¹⁸⁶曾经提出过公费学校的概念，并根据当时的民意一度实行过，当时的民众认为1789年的民主运动是一种发展中的现实，并非只是一种被当作政府工具使用的思想体系，他们据此得出了平均主义的具体结论。在拉瓦西那里，这还是一种乌托邦的因素（凡是专门以人的“本性”作前提的文化思潮都程度不等地会出现这种因素），但对列宁来说，却具有能从理论上证实的政治原则的意义。

如果实践哲学从理论上证实，任何一种被认为是永恒和绝对

的“真理”都有实践的来源，都代表一种“暂时的”价值（一切世界观和生活观的各自的历史性），也还很难使人“从实践上”了解：既然这种解释对实践哲学本身也有效，又如何能使为行动所必需的信念不致发生动摇。这也是一切历史主义哲学经常遇到的难题：那批恶劣的论战对手（特别是天主教徒）总是乘机借题发挥，硬在同一个人身上搞什么“科学家”与“煽动家”的对立，哲学家与行动者的对立，从而下结论：历史主义必然导致道德上的怀疑论和堕落。这个难题使小人物产生许多良心上的冲突（戏剧性事件），而使大人物抱着哥德式的“超然出世”的态度。为什么必须对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这个命题进行周密细致的分析和阐述，道理就在于此。

因此，实践哲学本身也不免有变成糟糕透顶的思想体系，即变成一种教条主义的永恒真理和绝对真理的体系的趋向。如果照《通俗读本》那样把实践哲学同庸俗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同后者关于“物质”的形而上学扯在一起（因为“物质”必然是永恒的和绝对的），这种趋向就特别明显。

还应指出的是，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发生于人类社会，而不是指自然界（尽管这种过渡也会影响到我们对自然的感受、影响科学观点等等）。甚至可以断言，当整个实践哲学体系有可能在大同世界里消失时，许多在必然王国时期是乌托邦的唯心主义观念，或至少是其中的某些方面反倒有可能在过渡〔到自由王国〕之后变成“真理”。当社会还分成各个集团的时候，要是不加必要的下结论说：这“精神”就是指“集团的精神”，那“精神”一词就无从谈起。（金蒂雷在其论现代主义的那本书*里，学着叔本华的口气说过：宗教是群众的哲学，而哲学则是社会尖子即大知识分子的宗教；当他这

* 乔·金蒂雷：《现代主义及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关系》，巴里，拉特尔泽出版社1969年版。

样说时,实际上是默认上面的说法。)但在统一实现以后,那就可以使用“社会精神”这个术语了(等等)。

经济学和思想体系(意识形态)

有人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任何一次波动都可以当作基础的直接反映来加以描述和说明,并把这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对于这种主张,必须当作一种原始的幼稚病从理论上加以驳斥,同时还要用具体的政治和历史著作的作者马克思提供的真凭实据在实践中大力反对。从这一角度来看,特别重要的著作有《雾月十八日》和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以及其他的论著(《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法兰西内战》)和一些短文。研究这些著作,把散见于各处的理论观点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和诠释,就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论。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在其具体研究中所提出的预先警告,这种预先警告在他论述一般问题的著作*里大概是见不到的。下面举几个这方面例子:

1. 要想静止地(就象摄影时擦一下那样)确定某个特定时期的基础是很困难的。政治实际上是每个一定时期的基础的发展趋势的反映,这些趋势未必一定能实现。要想对基础的某个阶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只有在它的发展过程结束之后才能进行,而要想在这一过程之中进行研究那只有靠假设了,还得加上一个明确的限制短语:本文所述均系假设。

2. 由此可知,某个政治行动可能是统治阶级的领袖们(dirige-

* 这类预先警告只有在象伯恩海姆所作的¹⁸⁷那种系统的方法论的阐述中才能见到,伯恩海姆的著作可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校教科书或“通俗读本”的典范提出来,书中除去哲学的和学者式的方法外(伯恩海姆把这看作是一个原则问题,尽管在他的论述中隐含着某种世界观),居然公开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anti)由于考虑不周而造成的失误,这种失误会由历史的发展加以纠正,通过统治(dirigenti)阶级的议会危机和政府危机予以摆脱。至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那是不承认发生失误的可能性的,它把每一个政治行动都看成是直接由基础决定的,从而也是基础的实在的和经常的(指已完成而言)变化。“失误”的本质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既可以认为是错估形势产生的个人冲动,也可说是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倾轧争夺领导权而又图谋未遂的反映。

3. 许多政治行动是由组织性质的内部需要决定的,换句话说,这些行动同使某个党、集团、社会具有内聚力的需要有关。对此,人们还认识不足。这个问题,只要以天主教会的历史为例,便可一目了然。假如我们对于教会内部的每一次思想斗争都想在基础中找到直接的根的解释,那我们就会授人以柄而自讨没趣:在这方面已经写出了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传奇。相反,这些争论大部分显然同宗派的和组织的需要有关。如果在罗马和拜占庭为圣灵起源的问题而发生的争论¹⁸⁸中,想为圣灵仅仅起源于天父的说法在东欧的基础中寻找依据,而为圣灵起源于天父和天子的说法在西方寻找依据,那就未免迹近荒唐了。两大教会的存在和冲突固然取决于基础和全部历史,但其所提出问题对双方来说都是分庭抗礼和团结内部的本原,但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所论证的正是对方实际上已经肯定了的的东西。一方面,分裂和冲突的本原照样存在,另一方面,构成历史上的问题的正是这种分裂和冲突,而不是某一方任意竖起的旗帜。

附注二:在《劳动问题》杂志上发表哲理性系列小说的撰稿人(准是那位声名狼藉的弗朗斯·惠斯)在一篇题为《俄国的倾销及其历史意义》的引人发笑的虚构故事里描写的正是早期基督教的这些争论,他说这些争论同时代的物质条件有直接的联系,又说,如果我们找不出这种直接的联系,那是由

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离我们太遥远，或是由于某些智力上的缺陷。这是一种信口开河的说法，缺乏科学上的意义。事实上，每一个实在的历史阶段都要在尔后的阶段留下自己的痕迹，到后来这些痕迹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了存在过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最好不过的证明。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时间上的统一，现在本身包含着全部过去，而过去的“本质的”东西又在现在之中实现着——丝毫没有代表真正“本质”的不可认识的东西的残余。——销声匿迹的部分，即没有在历史过程中辩证地流传下来的东西，本身就说明是无足轻重的，偶然的，伴随而来的“杂质”，是记事而非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表面的不必注意的小插曲。

道德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的科学基础应该在下面的论断中寻找：“社会永远不给自己提出解决问题的条件尚不具备的任务”。¹⁸⁹一旦条件具备，“任务的解决就成了‘责任’，而‘意志’则化为自由”¹⁹⁰。所以道德应该是对在一定意义上有一定目的的、实现意志化为自由所必备的条件探索，同时也应该是这些条件具备的证明。这不是要把目的划分主次的问题，而是确定达到目的的顺序先后问题，假如我们想要使之“道德化”的不仅是每个单独的个人，而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整体的话。

规律性和必然性

关于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概念，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是怎样得出来的？我看不能把它看作是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过来的，相反，应看作是对政治经济学领域里所产生的概念，特别是根据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经济学的形式和方法论而产生的那些概

念的提炼发挥。“一定市场”这一概念和事实就是一种科学发现，即一定的起决定作用和经常作用的力量历史地出现了，而且这些力量起作用时表现出某种“自动性”，根据这种自动性“可以预测”和判明某种个人创举的前途，这种个人创举是在判明和科学论证这些力量的性质并承认这些力量后产生的。因此，“一定的市场”等于说“一定基础的生产机构中社会力量的一定关系”，即得到一定的政治、道德、法律等上层建筑保障（使其永世长存）的关系。学者在确定了这些起决定作用和经常作用的力量性质及其自发的自动性（即它们不受个人选择和政府随便干预的相对独立性）之后，便以假设的方式把这种自动性绝对化；他把纯粹的经济事实从各种结合中分离出来，不问它们在这些结合中的实际意义究竟多大；他进而确定因果关系、前提与结论的关系；这样，他就抽象出一个一定经济形态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现实的和具体的科学体系上，后来又硬加上一个新的更为概括的抽象，即关于“历史的”和一般的“人本身”的抽象，而且正是这种抽象最终被看作是“真正的”经济科学。¹⁹¹）

既然古典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那么，要想探讨新的经济科学或其新观点（这两者是一回事），就必须证明新的力量对比关系、新条件和新前提业已确立，换句话说，一种新的市场连同其新的“自动性”和特有现象已经“确定”，而这种新的“自动性”和特有现象乃是可以和自然现象的自动性相比的“客观”事物。古典经济学促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产生，不过在我看来，直到今天还不可能有一种新的科学或科学问题的新观点。政治经济学“批判”¹⁹²是以“一定市场”及其“自动性”具有历史性的概念为出发点的，而“纯粹的”经济学家则把这些因素看作是“永存的”和“天生的”；《批判》是对决定市场的力量对比关系进行现实的分析，深入揭示它们之间的矛盾，估计随着新因素的出现和加强所可能产

生的变化，指出被批判的这门科学的“暂时性”和“可取代性”；《批判》把这门科学当作活生生的同时又是已经死去的科学来加以研究，从中找出那些使之必然解体和被取代的因素，从而提出一位“继承者”，这位假定继承人一定会提供表现其生命力的充分证据（等等）。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任意的”因素，不问其来自个人、大伙或国家，的确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并对传统的自动性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干扰；但这个事实本身还不足以证明新的科学问题的观念是正确的，理由就在于这些干预是任意的，规模不等，而且无法预测。它能够证实以下的论断：经济生活起了变化，其中孕育着“危机”，不过这都是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另外，旧的“自动性”并没有宣告消失，只是要在比以前更大的规模上，在重大经济现象上才表现出来，至于个别事实则已“失去控制”。

要想确定“规律性”、“规律”、“自动性”在历史事实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就必须从以上的考虑出发。问题不是要“发现”“决定论”的形而上学规律，甚至也不是要确定“普遍的”因果律，而是要弄明白，以某种规律性和自动性发挥相对经常作用的力量是怎样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数法¹⁹³作为比较模型固然十分有用，然而也不能用作历史事实的“规律”。为了确定实践哲学的历史来源（这无非是实践哲学对“内在性”的特定设想），必须研究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经济规律观。必须认识到，李嘉图对于实践哲学的形成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他在经济学中提出了“价值”概念，同时也由于他“在哲学上”提出了一种思考及感受历史与生活的方法。我认为应该把“假定……”的方法，也就是能推导出某种结论的前提的方法，确定为实践哲学创始人的哲学经验的出发点（智力刺激物）之一。值得查考一下，过去是否有人用这个观点研究过李嘉图。*

看来历史的“必然性”的概念同“规律性”和“合理性”的概念有紧密的联系。“必然性”既可以从“思辨—抽象”的意义上理解，也可以从“历史—具体”的意义上理解。只有存在着一种有效的积极的前提，人们在思想上一旦认识到这种前提就会化为行动，向集体意识提出具体的目标，形成一整套的信念和信仰，以“民众信仰”的形式发挥强大的威力，只有这样，必然性才存在。这个前提应该包括，已经发展起来的或正在发展中的、为实现集体意志冲力所需的必要和充分物质条件；但是很明显，不能把一定的文化水平从这种“物质的”可以计量的前提中抽掉。所谓一定的文化，是指某种智力行为的总和，以及（作为这种智力行为的产物和结果）具有支配力量的热情和情感的某种总和，所谓具有支配力量，是说这种热情和情感能使人们“不惜任何代价”去行动。

如上所述，这是唯一的途径，只有通过它，才能达到历史主义地，而不是思辨—抽象地，理解历史中的“合理性”（从而“非合理性”）。

关于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特别是柯罗齐所（思辨地）使用的“天意”和“运气”的概念，应该看一看柯罗齐论贾姆巴蒂斯塔·维科一书¹⁹⁵，在这本书里“天意”的概念译成思辨哲学的语言，并可找出对维科哲学作唯心主义解释的开端。关于“运气”在马基雅维利著作中的含义，应该看一看卢索的著作¹⁹⁶。根据卢索的说法，马基雅维利的“运气”有双重含义：客观的和主观的。“运气”是环境的自然力量（即因果联系），各种情况的有利凑合，维科著作中所说的天意，它也可能是中世纪的古老教义加以神话化了的那种超然的力量（即上帝），不过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不外是个人的“美德”，¹⁹⁷

* 也应该用这个观点去研究“偶然性”和“规律性”的哲学概念，研究导致最终者不是超验的也是先验的目的论的“合理性”或“天意”的概念，以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提出的“把世界交付给偶然”¹⁹⁴的“偶然”的概念。

它的力量根源于人本身的意志。据卢梭说,马基雅维利所指的“美德”,不再是经院哲学家们的道德说教和借助于上天之力的美德,也不是李维所认为的美德,因为后者通常是指军人的英勇;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美德,即才干,本领,勤劳,体魄强健,感觉敏锐,随机应变,量力而行等等。

卢梭在进一步的分析里却开始动摇了。在他看来,作为环境的力量“运气”的概念,在马基雅维利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那里依旧保留着自然主义和机械论的性质,只有在维科和黑格尔的合理的天意中才成为真理和深化了的历史观念。但必须指出,在真正的人文主义哲学家那里,这类概念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而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则否,而只表现为朴素而深刻的生活感(从而表现出哲学来!),只应作为〔他的〕感觉的象征来理解和说明。*

实践哲学百科全书

把围绕实践哲学所提出和探讨的全部问题汇编成一部批判文集,并附上全部批判书目,乃是一件极为有益的工作。要编写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由于资料十分浩瀚,涉及的面异常广泛,在内容上各不相同,在文字上涉及多国语言,非得成立一个专门的编辑委员会,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但是这项汇编工作无论对学术界还是教育界乃至从事独立研究的学者都会带来无限巨大的好处。它会成为扩大实践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工具,有助于实践哲学的科学地位得到巩固。它将成为划分两个时代的明确分界线:现代和在此以前的初步摸索、鹦鹉学舌和新闻记者式业余

* 关于这些概念在马基雅维利以前时期的形而上学性质是怎样逐步形成的问题,卢梭引用了金蒂雷的《乔尔丹诺·布鲁诺和文艺复兴的思想》一书(《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观念》一章及附录),佛罗伦萨,瓦列基出版社。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这些概念,参阅弗·埃尔科利的《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罗马,1920年版)。

活动时代。

在拟定计划时，应该研究各国天主教徒所公布的有关圣经、福音、早期基督教著作家、礼拜仪式、教义辩护等同一问题的全部资料，这都是些分门别类的专题百科全书，虽价值各有不同，却经常不断地发表，借以维系构成天主教会骨架和力量的数十万神父和其他干部〔dirigenti〕的思想一致。（关于德国实践哲学书目问题，应该看一看欧内斯特·德兰所编的资料，德兰本人在《宣传万有文库》第6068—6069期的导言里提到了这些书目。）

要象伯恩海姆为历史方法所做的那样，也给实践哲学编写一本教科书。^{*} 伯恩海姆的那本书虽然不是论述历史主义哲学的，但毕竟跟它有内在的联系。一种所谓的“实践哲学社会学”，它对实践哲学本身所抱的态度，就应该象伯恩海姆那本书对一般历史主义的态度那样。换句话说，它应该系统地揭示研究和解释历史以及政治的实践准则；它应该根据实践哲学的观点归纳出一套直接的标准，一套批判的预先警告等等，成为符合实践哲学观点的历史和政治的文献学。准备在某些方面对实践哲学内部的一些倾向进行批判也是值得提倡的，这些倾向极为粗糙因而在民间甚为流行。批判的办法最好采取现代历史主义对待旧的历史方法和旧的文献学那样。这种旧方法和旧文献学使得幼稚的教条主义风气蔓延滋长，它们不是说明和解释历史，而只是描述表象，罗列未经研究整理的资料，往往只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这种文章多半是靠当时已经形成并十分流行的教条主义的神秘主义撑腰，即大吹大擂地自称是历史方法和科学的信徒。^{**}

* E·伯恩海姆《历史方法教科书》第6版，1903年，莱比锡，顿克与亨布洛特书店出版。此书有意文译本（节译本）由巴勒莫的撒德朗书店出版

**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杂志类型》丛书里有关《批评字典》的评论和丛书别处所提出的一些看法。

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和意大利

要系统地收集〔马克思和恩格斯〕涉及意大利或研究意大利问题的全部著述(包括书信)。但是作这种有选择的专题收集必然缺乏有机联系,而且极不完整。作者有些文章虽未必是专谈意大利,却对意大利有重大意义(不消说,这不是指普遍意义而言,否则,他们的所有著作都可以说和意大利有关)。收集计划应按照下列标准来拟订:

1. 专门论述意大利的文章;

2. 历史批评和政治批评的“专论”文章,并非论述意大利但同意大利的问题有关。例如:论西班牙 1812 年宪法的文章就同意大利有关,因为这部宪法的政治作用对 1848 年以前的意大利政治运动有影响。再如,《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篡改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样和意大利有关,因为这种篡改在相应的意大利知识分子运动中也有反映(焦贝蒂,温和派的黑格尔主义,消极革命的概念,革命—复辟的辩证法)。恩格斯关于 1873 年(萨瓦的阿马杜退位后)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的文章,同样也跟意大利有关,余此类推。对于这第二类文章也许无需搞汇编,只要加一点评论、分析的注释就可以了。组织得最得当的计划或许可以包括以下 3 部分:

1. 历史的、评论性的导言;

2. 论意大利的文章;

3. 对与意大利间接有关的文章——即为解决那些对意大利来说同样是根本的和具体的问题而写的文章——的分析。

西方文化对整个世界文化的领导权

1. 即使我们承认其他各种文化在世界文明“分等级地”统一的进程中有其重要意义(这是毫无疑问应予肯定的),也只有它们在

成为唯一历史的和具体的普遍文化——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时，也就是只有在它们对欧洲思想的进程作出了贡献并为后者所同化时，它们才具有一种普遍的价值。

2. 然而，就是欧洲文化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统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我们十分重视的那个历史阶段，到了黑格尔及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就已经终结。

3. 从以上两点可知，我们所论述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体现者的文化过程，在这里不要涉及民间文化，因为这种文化根本没有什么批判阐述和发展过程可言。

4. 在这里也不涉及在现实活动中已经达到顶点的那类文化过程，譬如在 18 世纪的法国所发生的那种过程；更确切地说，只有问题涉及那个在黑格尔及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已告终结的过程时，才应该提到这类过程，利用它们作为“实践的”证据（在与其他地方有关的意义上），说明这两种过程可以相互转化，一种是法国的，政治和法律的；一种是德国的，理论的和思辨的。

5. 黑格尔主义的分裂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过程的开始，这种过程同先前的那些过程有质的区别，是实践运动与理论思想相统一的过程（或者说，致力于同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行斗争借以达到统一）。

6. 这种运动的根源出自平庸的哲学著作，或至多出自名气不大的哲学著作，这并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产生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这种观念不再为大知识分子、职业哲学家们所垄断，而是趋向于变成一种人民大众的、带有全世界意义的现象，能够改变（即使其结果包含混杂的结合）民众的思想，保存民众的文化免于腐败。

7. 如果这种开始来自各种不同的、显然是异己的成分的聚合，那也不必大惊小怪。例如，费尔巴哈之批判黑格尔，图宾根学派之

主张从历史上和哲学上对宗教进行批判，等等。其实，光在宗教方面实行这种彻底改变，并无多大意思。

8. 实践哲学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和顶点。在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中产生了现代唯心主义和实践哲学。黑格尔的内在论变成了历史主义，不过那只是实践哲学的绝对历史主义——绝对历史主义或绝对人道主义。（不少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关于无神论和自然神论的模棱两可的说法：无神论显然是一种一味否定毫无建树的形态，除非把它看作是一个纯粹民众的文字论战阶段。）

从认识到理解到感受以及反过来

从感受到理解到认识也成立

普通人能“感受”，但并不总能认识或理解；知识分子能“认识”，但并不总能理解，尤其是并不总能感受。因此出现了两种极端：一方面是书生意气和市侩习气，另一方面是盲目的狂热和宗派主义。这倒不是因为书生不会感情激动，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感情用事的书生意气，其可笑和危险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狂热的宗派主义和蛊惑。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他认为认识可以不必理解，甚至可以不必去感受，不必充满激情（不仅对认识本身，而且也包括对认识的对象），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只要能有别于平民百姓、显得与众不同，就成其为知识分子了（而且还不是十足的书呆子），就是说，对人民的基本感情不去感受，不求理解，既不打算从一定的历史形势出发加以理解并为之辩护，也不准备把它们同历史的规律以及经过科学地系统地阐述的更高的世界观（即认识）辩证地联系起来。没有这种感情，没有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之间的这种感情联系，就不能搞政治——历史。而缺少这种联系，知识分子同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就是或等于是一种十足官僚主义的正式的等级关系；知识分子就成了特权阶级或教士（所谓组织集中制）。

如果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由组织聚合力规定的，通过这种聚合，感受—激情变成理解并进而变成认识（不是机械地而是生动活泼地），那样，只有那样，这种关系才有代表性。只有那样，才能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导者〔dirigenti〕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个人交流，共有共享的生活才得以实现，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力量——创造“历史联合体”。

德·曼只是“研究”民众情感：他并不想以民众情感为自己感受，而是要指引它们净化现代文明。他本着研究民俗学的学者立场，唯恐现代精神会毁灭他所研究的对象。不过他的著作学究式地反映出一种现实的需要，因为他是根据民众感情的客观表现去认识和研究民众情感，而没有把它看作是历史运动内部某种无足轻重可以忽略的现象。

关于建立通俗社会学的一种尝试的批评札记

一部像《通俗读本》*那样以非专业知识分子为基本读者对象的著作，应该以批判地分析常识哲学为出发点：哪一种“非哲学家的哲学”，或者换句话说，哪一种世界观是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都不加批判地吸收的，而在这些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普通人形成各自的道德。常识并不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同一的、单一的、唯一的观念。它是哲学的“民俗学”，而且也象民俗学那样有许许多多的表现形式。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是，这种观念就是同一个人的脑子里也是零碎的、不一致的和缺乏逻辑性的，随着信奉它为自己的哲学的群众的社会文化地位的不同而不同。当历

* 即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一书。葛兰西为了对付书报检查制度，把书名简称为《通俗读本》或《读本》，对作者未提名道姓。

史上产生一个由同类分子构成的社会集团时，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也相应产生一种与常识相对立的同质的——亦即系统一贯的——哲学。

《通俗读本》的第一个错误是，它的出发点是假定，至少是含蓄地假定，阐明一种民众原始的哲学是同传统哲学的庞大体系以及教士领袖们的信仰，即同知识分子的及高度文化的世界观相对立的。其实这些体系根本不为群众所知，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方式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当然这绝不是说毫无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式有所不同。这些体系是作为外部的政治力量而对民众施加影响，是统治阶级行使内聚力的一种因素，因而也是使之服从外部领导权的一种因素。这对民众本来的思想只起限制的消极作用，不会产生使民众对世界和生活的朦胧和不成熟的想法发生活跃的内在变化的积极作用。常识的主要因素是由宗教提供的，因此，常识与宗教的关系要比常识与知识分子哲学体系的关系密切得多。然而，对于宗教也要批判地区别对待。任何一种宗教，哪怕是天主教（天主教的情况之所以确乎比别的宗教好些，完全是由于它力求维持一种“表面的”统一，避免分裂成民族的和社会阶层的教会），实际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往往是矛盾的宗教（派别）的混合体：有农民的天主教，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工人的天主教，妇女的天主教，以及各立门户、互不来往的知识分子的天主教。但是，不仅迄今犹存的上述形形色色极为鄙陋原始的天主教对常识有影响，先前的一些宗教也对它有影响，而且直到今天依然是它的组成部分；现行天主教的一些过去形式——民众的异教运动、与崇古有关的科学迷信等等，情况亦然如此。在常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的”和唯物主义的成分，都是天然感觉的直接产物。这同宗教成分一点也不矛盾，绝对不矛盾。不过这些成分是“迷信的”，非批判性的。所以，这就是《通俗读本》的一种危害之所在，它不是科学的批判，而

往往是加强这些非批判的成分，这样，这些成分就使常识始终停留在托勒密时代、拟人说和人类中心说的水平上。

以上对《通俗读本》没有从批判常识入手来批判各种有体系的哲学所谈的意见，只应作为一个方法论问题来理解，而且是在一定范围内。这当然不是说，对知识分子的有体系的哲学的批判可以不必重视。如果群众之中的某一个人能够批判并超越常识，那么他这样做本身就是接受一种新的哲学。于是必然要用实践哲学的观点同传统哲学进行论战。事实上，实践哲学的本质就是要成为群众的哲学，因此，只能通过论战、通过不断的斗争来理解。而其出发点始终应该是作为群众自发哲学而有待于统一认识的那种常识。

法国哲学著作中关于“常识”的论述，比任何别国的著作中为多：这是由于法国文化具有较严格的“民族—大众”¹⁹⁸性所致。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具体的传统情况，法国的知识分子比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更愿意接近人民，以便从思想上给予指导，并使之同领导集团保持联系。在法国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可供利用和进一步研究的资料，法国哲学著作对常识的见解确实可以为领导权思想结构提供某种典范。美国和英国著作也能提供某些观点，但总不如法国著作那么系统完整。对“常识”有过种种不同的论述。有时甚至被说成是哲学本身的基础。或者根据另一种哲学的观点加以批判。不管是哪一种做法，其结果实际上都是超越某种具体的常识而形成另一种同领导集团的世界观十分接近的常识。亨利·古耶在1931年10月17日的《新文学》上发表的研究莱昂·布伦什维格¹⁹⁹的论文中在具体谈到布伦什维格的哲学问题时写道“只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化运动，不论是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中还是在哲学或伦理学中，那就是努力使精神摆脱常识、摆脱本身自发的形而上学，即设想世界是由各种实在的感性事物构成的，而人，则是这

个世界的中心”。*

柯罗齐对“常识”的看法似乎不太明朗。在柯罗齐那里，人人都是哲学家的论点对于他对常识的判断影响极大。柯罗齐似乎常常倾向于认为有些哲学命题同时也是常识的命题。但具体所指是什么？常识本是一堆毫无联系的观念凑合而成的大杂烩，人人可以从中各取所需。可是柯罗齐对常识所抱的这一见解并未导致一种从民族—大众观点来看是有益的文化观，亦即更为具体的历史主义哲学观——不过那无论如何要随着实践哲学的问世才能产生。

至于金蒂雷，应该看一下他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观》一文（载1931年6月1日《新文选》）。金蒂雷写道：“对哲学可以下定义为：为了使常识和朴素意识中的真理、也可以说是人人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并构成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智力的坚实结构的真理，得到批判确定，而由反思完成的一种巨大努力。”看来，这正是金蒂雷思想混乱不堪的又一例证。金蒂雷的主张似乎是“朴素地”来自柯罗齐关于流行的思想方式是某些哲学命题合乎真理的证明的说法。金蒂雷接着写道：“健康人信仰上帝，也相信自己的精神是自由的”。因此，我们就在金蒂雷的这两个命题里发现：1. 一种无法看清其真面目的超历史的“人性”；2. 健康人的人性；3. 健康人的常识，从而也是非健康人的常识。可是，健康人的含义是什么？身体健康？或者不疯？²⁰⁰ 还是指人的头脑健全，思路正常，思想庸俗，等等？“常识中的真理”又是什么意思？比方说，金蒂雷的哲学同常识是完全对立的，是否就可以因此而理解反对一切主观唯心主义的人民的朴素哲学，或是否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良知，理解为对某些形式的科学和哲学说明的深奥、独创和晦涩抱满不在乎的态度？金蒂雷对常识这样陶醉是相当滑稽的。

* 布伦什维格的著作如下：《哲学数学之各阶段》，《人类经验与因果物理学》，《对西方哲学认识之进步》，《对自我之认识》。

以上所述不等于说常识之中不包含任何真理的成分，而只是说常识是一种解释不一致、形式多样化的矛盾的概念，求助于常识作为真理的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为了说某种真理已经传播到知识界的范围以外，它已经成为常识的一部分，这可能是正确的；但这种说法也无非是对历史的合理性作出历史的观察和结论罢了。只要在这个意义上谨慎使用，这个论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正因为常识是保守的，最讨厌新事物，所以，能够被迫接受一种新的真理，这件事本身就表明该真理有特殊根据和传播能力。

不妨回忆一下朱斯蒂²⁰¹的短诗：

“良知，想当初何等流行，
如今在我们学派里已不时兴。
科学，它一度宠爱的骄子，
却把它解剖，观察原形。”

这段引文可用来说明良知与常识这两个名词怎样被混用在一起：既作“哲学”解，又作具有一定信念观点的特殊思想方式解，也作对一切深奥独创的事物抱我行我素、满不在乎的态度解。因此科学必须解剖某种具体的传统良知，以创造一种“新的”良知。

马克思的著作经常提到常识及其信念的可靠性问题。不过马克思并不是指这些信念的内容的可靠性，而是指它们形式上的可靠性以及从这些信念中产生出行为准则时随之而来的强制性。另外，这些论述中还包含着关于新的通俗信念的必然性的结论，也就是说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常识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文化和新哲学，这些新事物将具有和传统信念同样的可靠性和强制性而扎根于通俗的意识之中。

附注一：关于金蒂雷对常识的看法问题还应补上一句：他是出于不光彩的机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故意含糊其辞的。当金蒂雷提出“健康人相信上帝也相信自己的精神

是自由的”，作为常识中的真理是靠反思来求得批判性确定这一说法的例证时，一心想让人相信；他的哲学就是一举而使天主教中的真理得到批判性确定的成果，谁知天主教徒们并没有上钩，还是坚持认为金蒂雷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异教信仰，等等。尽管如此，金蒂雷还是死抱住这套暧昧的主张不放，因为这种主张并非毫无用处，它可以造成一种半时髦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宗教同无神论拥抱，内在性跟超验性调情，连安东尼奥·布鲁埃斯也突然红得发紫起来，因为：线头愈乱，思想愈晦涩，他就愈感到他那含糊其辞的“信仰调和论”满有道理。如果金蒂雷的话真的可以照字面去理解，那行为唯心主义²⁰²也就成了事实上的“神学的仆役”。

附注二：如果哲学教学的目的不在于使学生对过去哲学的发展有一个历史的了解，而是要赋予学生某种文化素养，帮助他批判地发挥自己的见解，以便有资格参加某个思想文化团体，那么就必须以学生现有的知识和亲身的哲学经验为出发点（首先向学生证明，他确有这类经验，他本人就是一位“哲学家”，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同时，考虑到这些学生的现状大概只具有零星片断的知识，没有受过方法论和批判的训练，只好给他们假定一个平均的文化知识水平，既然如此，第一步就只好从常识开始，然后第二步是宗教，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能进入传统知识分子集团所制定的各种哲学体系。

一 般 问 题

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

首先要谈的一点意见是：标题与书的内容不符。²⁰³“实践哲学

的理论”应该意味着对统称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哲学概念进行合乎逻辑的、有条理的系统论述(其中有不少概念是谬误的,是从其他来源产生的,应予批判消除)。开头几章应当论述下列问题:何谓哲学?在哪种意义上可以把某种世界观称作哲学?人们对哲学一向抱什么看法?实践哲学是否更新了这种看法?“思辨哲学”的含义是什么?实践哲学到底能不能有思辨形式?意识形态、世界观及哲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理论与实践之间是或应该是什么关系?传统哲学对这种关系抱什么看法?等等。对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实践哲学的“理论”。

《通俗读本》里有这样一个前提:真正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实践哲学纯粹是一种“社会学”;这个前提或者暗含在阐述里,或者随随便便在别处公开提出来,可就是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由加以说明和证实。这个论断的实际含义是什么?要是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实践哲学的理论就会是哲学唯物主义咯。既然如此,说实践哲学是一种社会学,这又是什么意思?这种社会学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是政治学和历史编纂学?或是,对政治艺术的纯粹经验的观察以反对历史研究的外部准则作系统的汇集并按一定的格式分类编排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书中是找不到的。而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算得上是一种理论。这样看来,总标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同副标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通俗读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证明。副标题倒是比较确切的,只要对“社会学”这个术语的含义严加限定的话。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由什么是“社会学”引起的。难道社会学不就是企图产生一种所谓的精确(即实证主义的)的社会现象学,即政治和历史的科学——或者叫做处于萌芽状态的哲学?难道社会学没有试图搞出点跟实践哲学相仿佛的名堂吗?²⁰⁴然而我们必须搞清楚:实践哲学是以格言和实践标准的形式产生的,这纯粹出于偶然的原因;它的创始人把全

部精力投入对其他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研究（他对经济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但在这些实践标准和格言中暗含着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即一种哲学。

社会学一直致力于按照以前制定的哲学体系，即进化论的实证主义体系的形式，创造历史政治科学的方法，这种体系，社会学起过反作用，但只是在局部问题上的反作用。因而它就独树一帜，成了非哲学家的哲学，力图根据仿照自然科学模式建立的准则，对历史政治事实提供一套系统的叙述和分类，力图总结出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从而“以一斑窥全豹”，作出“屡试不爽”的预言。社会学的基础是庸俗进化论，所以社会学无法认识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原理。可是这种转化打乱了庸俗进化论者所理解的一切进化形态和一切一致性规律。任何一种社会学归根到底都必须先有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作为前提，而它只是这种哲学和世界观的一个附属部分。也不应该把各种形态的社会学的特殊的内在“逻辑”同总的理论即哲学混为一谈，因为这只能使其本身具有一种形式上的一贯性。当然，这不等于说，探索一致性的“规律”是一种毫无用处的研究，或一篇关于政治艺术的直接观察的论文毫无意义。不过应该是啥说啥，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类论文的本来面目。

所有这些都是“理论问题”，至于《读本》作者所认为的那些则并非“理论”问题。他所提出的问题都直接属于政治思想体系的范围（把思想体系看作是哲学与日常实践之间的中间状态），仅仅是毫无联系的、偶然的个别历史政治现象的反映。作者一开始就谈到，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可能建立实践哲学的社会学并主张这种哲学只能通过具体的历史著作反映出来，这样，作者就面临着一个理论问题。这一极为重要的反对论点，决非光凭作者的三寸不烂之舌所能解决。实践哲学固然要靠对过去的历史的具体研究以及创造新历史的当前活动来实现，但关于历史和政治还是可以提出某

种理论,因为,即使事实从来不重演,总是随着历史运动的不断变化而改变,也可以从概念中推导出理论来。要不然,我们就根本闹不清什么是运动或什么叫辩证法,从而陷入一种新的唯名论里。*

把实践哲学归结为一种社会学,是恩格斯已经批判过的一种堕落倾向的具体表现(见在《社会主义大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致两名大学生的信²⁰⁵),它把世界观归结为一套机械的公式,仿佛凭借这套公式就可以把握住全部历史。这对那班头脑灵活善于舞文弄墨的“袖珍天才”们倒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实践哲学所依据的经验是无法用公式来表达的;只有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历史进行研究,才能产生作为确定具体史实的学术研究方法的“文献学”²⁰⁶,才能产生被认为是研究历史的一般方法论的哲学。《读本》第1章相当概括地提到的那些作者之所以认为不可能建立实践哲学的社会学,而相反地主张这种哲学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历史著述之中(这个论断过于冒失,当然不足为训,而且大有难以理解的新唯名论和哲学怀疑论的味道),其道理大概就在于此。

不承认可以建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即研究历史和政治的科学,不承认社会学可以是实践哲学的别称,这不等于说,对于扩大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领域的实践观察,不可能作出经验的汇集。如果说文献学从方法论上表现了确定具体事实的独特性和不重复性具有重大意义,可是却不能排除在政治领域里,采用促进了各种自然科学发展的统计规律或大数法规律分离出某种较为一般的“趋向律”也有其实用价值。但是,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所关心的问题仍然(或至少被认为仍然)基本上抱消极态度时,才能在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方面采用统计规

* 这是因为作者没有确切地提出究竟是什么样的理论,使作者可以不进一步提什么是宗教的问题,可以不对过去的种种哲学作出现实的历史的评价,而把这一切统统作为胡说八道而一笔勾销。

律,这一点,一直没有被严格强调。另外,假如把统计规律,推广到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中,用以制定未来的远景计划和行动纲领,就可能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统计学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充其量只是出现错误或舍本逐末,这些毛病,通过进一步研究,不难纠正,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是采用这种方法的个别科学家出点洋相而已。可是在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领域里却可以产生真正灾难性的后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事实上,在政治领域里,把统计规律当作必然性起作用的基本规律,不仅在科学上造成谬误,而且会在行动上导致错误的实践。更有甚者,它助长智力上的怠惰,使政治纲领流于浅薄。必须指出,政治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唤起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打破大数法规律。既然如此,又怎能把这种规律看成是一种社会学的规律呢?要是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即使出于计划经济即有指导的经济的需要,也势必要打破机械意义上的统计规律,也就是把无数任意的个别行动凑合而成的统计资料。这类计划性固然应建立在统计资料的基础上,但这是不同的两回事。人的自觉性取代了自然主义的“自发性”。而政治团体(党派)取代个别的个人和个别的(或照米歇尔的说法,叫具有非凡魅力的²⁰⁷)领袖人物,则是导致推翻政治艺术方面的自然主义旧结构的进一步因素。随着群众政党的发展以及它们同群众本身的(经济—生产)生活的组织联系日益密切,统一民心的过程便不再是机械的和偶然的(那是受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而形成的),而变成自觉的和必须的了。领袖们对民心所向的了解和判断,不再取决于根据统计规律而形成的预感,以及凭这种预感而产生的思想和语言的力量。(这固然不失为合乎理智的方法,只是往往靠不住。)相反,只有集体组织,通过“积极自觉的共同参与”,通过“同情心理”、通过对具体情况的亲身体会,通过堪称“活的文献学”的体系,才能了解和批判民心之所向。这样,就形成了广大

群众、党及领导集团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样联合起来的复杂集体就可以象“集体的人”那样行动。

亨利·德·曼的书，如果说它还有点什么价值的话，那就完全在于他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各个集团和个人的真实感情，而不是去了解按照社会学规律假设的那些情况。但德·曼并没有什么独创性的发现，也没有找到什么独创性的原理，足以超越实践哲学或从科学上证明实践哲学是无益的，错误的。他把政治艺术方面人所共知的、早就使用的、但大概尚未得到充分说明和发展的经验主义标准，抬上了科学原理的宝座；但他始终未能给自己的标准规定确切的界限，只是提出一种新的统计规律就算完事，不过用了另外一个名称：社会数学和外部分类的新方法，殊不知这乃是一种新的抽象的社会学。

附注一：所谓的社会学规律虽被设想为因果律（如此这般的事实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如此这般的规律之故，等等），其实并无因果意义；几乎尽是一些翻来覆去不合逻辑的推论。这些所谓的规律往往只是所观察的事实本身的拷贝，只是根据一套抽象概括的刻板程序，对某件事实或一系列事实描述一番，然后从中抽出某种相似关系，贴上规律的标签，于是就认为该规律具有因果意义。试问，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新颖之处？唯一独出心裁之处就是给一系列事实按上了一套新名词，可是贴标签不等于创新。（在米歇尔的论文里²⁰⁸可以发现一整套类似的同义重复的概括，其中最后的也是最出名的一条便是所谓“具有非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再越雷池一步，就滑到柏拉图唯心主义的光怪陆离之境，因为这些抽象的规律同柏拉图所主张的作为宇宙万物之本的纯粹观念何其相似乃尔！

实践哲学的组成部分

要对实践哲学作系统的阐述，那么凡是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学说中的组成部分都不容忽视。不过这该怎么理解？首先应该从总的方面对哲学组成部分作全面的论述，然后条分缕析地探讨有关历史、政治、以及艺术、经济 and 伦理的方法论的所有一般概念，使之像自然科学那样在一个理论结构的整体中各得其所。有一种观念流传甚广，即认为实践哲学是一门纯粹的哲学，是辩证法的科学，其余的组成部分是经济和政治，因此主张这一学说有三个组成部分，这三者都是对 1848 年前后欧洲最先进国家的科学：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科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总结和超越。这一观念只是反映了对这个学说的历史来源所作的全面探索，而不是要对学说本身的内部结构进行分类，因此不能把它作为定论，与这一学说的更加切合实际的另一种定义对立起来。如果有人要问：实践哲学是不是一种纯粹的专门的历史的理论；答案肯定是：一点不错，正是这样；不过你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同历史截然分开，即便是涉及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方面以及经济科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种种专门问题，也不例外。这就是说，在完成了对总的哲学部分进行阐述这一首要任务，即对实践哲学本身——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科学加以说明之后；以通俗读本的形式，分别对每一个要素或组成部分，哪怕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一番概述，是件十分有益的工作。经过仔细分析，《通俗读本》对这些问题至少都提到了，只是显得凌乱而不系统，分散而不突出，因为这本书对实践哲学本身究为何物尚缺乏清晰明确的概念。

基础和历史运动

历史运动是怎样在结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

人探讨过。普列汉诺夫的《基本问题》²⁰⁹虽提到过，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挥。在围绕实践哲学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中，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与之相应的问题，即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无法解决；对此，《读本》里专门有一章加以论述。有必要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以下两个命题的全部含义和重要性加以分析，这两个命题大意是：1.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消灭一切机械论和迷信式的“奇迹”的种种痕迹，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积极政治集团的构成问题，归根到底，也就是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问题。

知 识 分 子

我看有必要编一个“供参考的”学者人名录，把书中大量引证其观点的人物或对其观点有争议的人物都收录进去，每个人名条目之下都加评注，说明他们的观点在学术上的意义和作用（对于拥护实践哲学的学者也应照此办理，他们的观点肯定不会作为独创的意義重大的观点被援引）。事实上，这本书对伟大知识分子的介绍往往只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对于敌对方面的知识分子，只介绍重要人物，对那些寻章摘句、述而不作的第二流人物一概从略，这样岂不更好？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作者专捡最软弱的对手和最易攻破的论点（或者选择最软弱论敌的最不堪一击的观点）开刀，以便轻而易举地取得字面上的胜利——这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胜利；从而造成一种错觉：把思想战线看作

与政治军事战线完全一样，不只是在形式上和比喻上有某种相似之处。把突破口选择在抵抗最薄弱的地方，以便在肃清力量较弱的次要之敌以后，集中优势兵力围攻最强大之敌，这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上，不失为一种正确的策略。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持久和普遍的意义，战略目的可以十分明确地达到，对每个人普遍产生影响。可是在思想战线上，击败次要之敌和摇旗呐喊的小喽罗，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倒是应该同最出名的劲敌进行拚搏。否则，我们便把报纸同著作等量齐观，把琐碎的笔墨官司跟严肃的科学研究混为一谈了。次要人物应由报刊讨论的资料汇编去收集。

任何一门新的科学，只有当它能证明自己有力量同反对学派中的第一流论敌进行较量，能够设法解决对方所提出的极为重要的问题，或者能够证明这些问题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它才能证明自己的功效和生命力。

某个历史时代和一定社会形态的特征固然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平均状况，并从而通过一般人的状况而表现出来的，但必须把流行的群众的思想意识同科学著作及伟大的哲学综合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前者真正的基石。而需要克服的正是后者，或者从反面论证它们是没有根据的，或者从正面提出意义更为重大的哲学综合与之相抗衡。读了《读本》以后，不禁令人想起这样一个故事：某君因月光皎洁不能入睡，于是拚命捕杀萤火虫，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使月光减弱甚或消失。

科学和体系

当一种学说尚处于探讨、争论和有待制定的阶段，是否有可能编一部入门书、手册或《通俗读本》加以论述呢？通俗读本只能对某一学科作提纲挈领的介绍，行文要平顺，学术上要稳健，它只能

是一种为科研作准备的入门读物，而不能是对独创性科学研究的解释发挥，须知这是为青年人写的，或者说是为公众写的，而从科学训练的角度看，公众的情况跟青年人差不多，因而迫切要求“肯定的东西”，要求提供至少在形式上是真实可靠、无庸置疑的见解。如果该学说尚未达到自身发展的“经典”阶段，那么任何想使之“通俗化”的企图都注定要遭到失败，对它所作的逻辑编排也纯粹是表面的空中楼阁，只能象《通俗读本》那样，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各种缺乏联系的因素的罗列堆砌，不管在文字上怎样苦心经营巧妙编织，始终捏合不到一块儿。既然如此，何不用准确的理论和历史的语言提出问题，安排书的内容，使学说的每一个根本问题都能得到专题性的论述？这样做岂不更严肃更“科学”？不过有一个庸俗的论点是，凡科学必定有“体系”，于是各种体系纷纷出笼，这类体系只是徒有其表，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

辩 证 法

《读本》对任何一种辩证法都没有加以论述，只是以十分肤浅的方式，未加说明就把辩证法假设为一种前提，这种做法简直荒唐；作为一本读本，理应包括该学说的基本原理，开列参考书目，目的应该是有助于深入研究，以利于扩大视野，加深对本专题的了解，而不是代替读本本身。其所以对辩证法不加论述，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实践哲学被设想为分成两大部分：一是被看作社会学的关于历史和政治的理论，即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指最原始意义上的实证主义的实验方法）去建立理论结构；二是哲学本身，其实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或机械（庸俗）唯物主义的别称。

即使在反对机械论的大论战以后，《读本》作者提出哲学问题的方式看来并无多大改变。这一点，从他向伦敦科学史会议提交

的论文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论文中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实践哲学一直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关于历史和政治的学说，一是哲学，只是他如今把后者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了。不过要是这样来考虑问题，我们就再也无法了解辩证法的重要意义了；因为这样一来，辩证法就从原来的认识论、历史编纂学和政治科学的精髓地位，下降为形式逻辑和初步经院哲学的亚种了。只有把实践哲学看作是开创了历史新时期和世界思潮发展新阶段的、完整的和独创的哲学，才能真正了解辩证法的根本作用和意义。实践哲学已经做到，既超越传统的唯心主义和传统的唯物主义，这些都是反映过去社会形态的哲学；同时又保留了其中有生命力的成分。如果只把实践哲学看作是另一种哲学的附属品，就不可能掌握新辩证法，而超越旧的哲学正是通过对新辩证法的掌握而实现和体现出来的。

第二个原因似乎是心理上的。有人认为，辩证法是一门艰深难懂的学问，因为辩证地思考就会同庸俗的常识相抵触，常识是些教条，要求绝对的肯定，并由形式逻辑加以表达。为了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了解，不妨设想，要是在小学和中学里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讲授自然和物理，又是“自然规律”的传统观念，又是统计规律或大数法规律的观念，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学生根本听不懂，学校教学与家庭生活及一般人生活大相径庭，学校就会成为洋相百出的讽刺对象。

在我看来，上述考虑对《读本》作者起了心理上的阻碍作用；他实际上是向常识和庸俗思想低头，因为他并没有用确切的理论语言来提出问题，因而在事实上被解除了武装，软弱无力。那没有受过教育的原始的环境势力支配了教育者，庸俗的常识对科学产生了影响，而不是相反的影响，如果说环境势力成了教育者，那么它也必须反过来受教育²¹⁰，然而《读本》并不懂得这一革命的辩证法。《读本》及其作者全部错误的根源恰恰就在于他主张把实践哲学分

为两部分：“社会学”和自成体系的哲学（看来他本人在大论战之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或许可以从他提交给伦敦会议的论文中看出，但是很明显，这场大论战使他表面上放弃了这本书）。同历史和政治的理论相脱离的哲学只能是形而上学，而由实践哲学所体现的、现代思想史上的伟大成就恰恰就是哲学的具体历史化以及它和历史的同一化。

关于形而上学

能不能从《通俗读本》中找出对形而上学和思辨哲学的批判？我们不得不认为，作者并不真正了解形而上学的概念，正如他不了解关于历史运动、形成、从而辩证法本身的概念一样。把某种哲学论断看作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真实（即看作是一定历史行动、一定实践的必然的和不可分的表现），但到以后的历史时期会被淘汰成为“无用之物”，同时又不陷入怀疑论和道德、思想上的相对主义，换句话说，就是把哲学看作是历史的真实，那真是一项十分伤脑筋的智力活动。然而作者却一头栽进了教条主义并从而陷入了某种朴素的形而上学。这，从一开始处理问题的方式，从想要建立实践哲学的“社会学”体系的打算，就可一目了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恰好意味着朴素的形而上学。在导论的最后一节里，作者对那些主张实践哲学只能存在于具体历史著作中的批评者，根本无力回击。他未能详细地阐明，实践哲学就是“历史方法论”的概念，反过来，“历史方法论”就是“哲学”，就是唯一的具体的哲学的概念。也就是说，他未能按照真正辩证法的观点，提出并解决柯罗齐按照思辨的观点已经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那些问题。他不是创立一种历史方法论即一种哲学，而是在编一部具体问题参考资料，这些问题，是他所设想并要加以解决的，不过他的解决办法却是教条主义的，有时纯系纸上谈兵，谬误百出，既幼稚又自以为是。如果老老

实实在编一部对直接实践有用的经验的概要汇集，那倒不失为一部有益而令人感兴趣的书籍。可是由于在《通俗读本》里，实践哲学不是一种独立的和独创的哲学，而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部书所以一定会写成这个样子。就该书而论，所谓形而上学也只是指它对哲学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是思辨唯心主义的，但还不是那种完整的体系，即没有提出什么超历史的、不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包罗万象的抽象真理。

《通俗读本》里所包含的哲学，不妨称作实证论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即让形式逻辑适应于物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因果律以及对规律性、规范性和一致性的探索取代历史辩证法。但我们怎能根据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推导出实践的得胜和实践的“失败”呢？从机械论的观点来看，结论永远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的体系，因而发展绝对只能是庸俗的进化论的发展。

如果说“思辨唯心主义”是关于范畴和精神先验的综合的科学，即一种反历史的抽象，那么《通俗读本》里所包含的哲学就是一种倒立的唯心主义，就是说，用同样是抽象的和反历史的经验概念和分类法来代替思辨范畴。

《通俗读本》里的旧式形而上学，其最显眼的痕迹之一是企图把每一件事情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最后或最终原因。我们可以再现单一的最终原因论的历史，从而证明它就是“寻找上帝”的一种表现。为反对这种教条主义，应该重温一下恩格斯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上发表的那两封信。

“科学”的概念

探索规律，探索经常的、固定的和一致的方式方法，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同一种不成熟而有点天真的设想有关，即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实践问题：历史事变是可以预测的。根据一种奇怪

的逆观点,情况“似乎”是这样:既然自然科学使我们能够预见各种自然过程的演变,那么只要历史方法论允许我们“抽象地”预见社会的未来,它也就“科学地”表达出来了。因此就需要探索根本原因,其实也就是探索“初始”原因,探索“原因之原因”。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观点已有所批判。在现实中,我们所能“科学地”预见的只是斗争,而不是斗争的具体阶段。因为这种具体阶段乃是对立力量不断运动的结果,决不可分解为固定的量,因为在每个阶段内,量都是不断地变成质。在现实中,我们只能“预见”到自己的行动,在为创造“已预见到的”结果而自觉努力,作出具体的贡献。因此,预见并不是科学的认识行为的表现,而是对创造某种集体意志所付出的实践努力的抽象反映。

那么,预见怎样才能成为一种认识行为呢?我们所认识的是过去的情况和目前的情况,而不是未来的情况,未来是一种“尚不存在的”东西,因而当然是不可知的。所以预见仅仅是一种实践行为,除了以上所述,不能有任何别的解释,否则便是枉费心机糟塌时间。对于历史事变可以预见的问题,在提法上必须措辞严谨,只有这样才能对机械论的因果观进行深入细致的批判,剥掉它欺世盗名的科学外衣,揭露其本来面目:它是一种纯粹的神话,在历史上,当一定的从属社会集团尚处于发展的落后时期,它也许是有益的。

至于象《通俗读本》里所出现的那种“科学”概念,本身就应予彻底批判。它从头到尾模仿自然科学,俨然以唯一的科学自居,或者象实证论所声称的那样,自封为典范的科学。但在《通俗读本》里所使用的科学这一术语,有好几种含义,有些是明提的,有些只是暗指的,甚或几乎不大提及。那明提的“科学”的含义是指研究自然,不过有时似乎也指方法论。但是否存在某种一般的方法论,

如果确实存在，那么它是不是就指哲学？有时它仅仅是指形式逻辑：但能不能把它称作方法论和科学？必须确定，任何一种研究都有其一定的方法论，并形成各自的一定的学科，方法论是随着这种一定的研究和科学的发展完善而发展完善，并与之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以为借用别的研究领域中十分得力卓有成效的方法作为标准方法，就可以促进某项科学研究的发展，这种想法乃是一种与科学根本沾不上边的离奇幻想。然而确实存在某些一般准则，可以构成每个人，不管是搞“哪一行”的，对科学的批判认识，这些准则总是自然地在每个人的工作中警觉地跃跃欲试。因此，假如某个人把握不住一定的准则，对自己所使用的概念缺乏充分理解，对自己所论述的问题的历史状况一知半解，立论不够严谨，做法不是必要的而是任意的没有条理的，对于既得认识中所存在的缺陷不是认真考虑而是加以掩盖，满足于纸上谈兵的解决和联系而不敢承认我们今天所陈述的观点带有暂时性，可能需要重新研究和发展，等等，那么，可以说这样的人算不得什么科学家。

对于《读本》里所提到的许多争论，可以提出这样的意见，即它一贯不承认被引证的个别作者也可能有失误，于是某个社会集团——其中搞科学的人总被认为是其代表人物——就会发现，一些大相径庭的观点和无法调和的意图都被说成是这个集团所固有。这完全同下列更为普遍的方法论准则有关：专捡最拙笨最平庸的对手开刀，或者专门选择这些对手的最不重要和最偶然的观点加以攻击，然后因为攻破了对方的某个次要和偶然的观点，就以为已经“击败”了所有的“论敌”，或者由于证明三四流对手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就认为已经摧毁了某种思想体系或学说；凡此种种，都不是很“科学”，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都不是很“严肃”的做法。此外，还有一条准则：“应该公正地对待自己的对手”，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对手们的论点的真正含义，而不应故意对他们的

话作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抱着提高我们的拥护者的学风和知识水平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不择手段地在我们周围造成一片荒凉的话，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我们的拥护者应该同有才华的聪明的对手辩论，通过辩论来探讨和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应同那些迷信“权威”或“感情用事的”、缺乏训练的笨伯去辩论。关于有失误的可能性，必须加以肯定和证明，但不可违背我们自己的观点，因为重要的不是张三、李四、王五各自的看法，而是各种看法的总和，即变成集体的看法，成为一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批判的矛头必须对准这样一些理论对手的观点，他们最有代表性，他们本身高度的思想修养和“与世无争”的态度确实令人敬重。也不可抱这样的想法：批判了这样的论敌就等于摧毁了相应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那样就是纯粹的启蒙唯理论）；而应抱这样的想法：这样做有助于1.长自己一方的志气，坚持和增强分庭抗礼的精神；2.为自己一方准备条件，以便根据自身的生活状况吸收一种属于自己的独创学说并赋予生命力。

有必要指出，《通俗读本》的缺陷有好多是同该书的“演说味”有关的。作者在前言里似乎颇为得意地谈到这本书原来是个“讲稿”。但正如麦考莱早先在谈到希腊的口头辩论时所指出的那样，雄辩家的“口才”和机智总是在逻辑和论证上流于浅薄而最不可信。无论如何，这倒不是要减轻那些不加修改就把讲稿付印的作者的责任，因为讲演时往往即席发挥，其中难免喧宾夺主，使一些机械论的和因果论的联想取代了中心议题。最糟糕的是，演说家的这种即席发挥助长了随机应变的风气，而严谨的批判则不再起作用。《通俗读本》里“歪曲对方论点”、“偷换主题”和“反驳论证”之处²¹¹可以一一列举，其原因在于演说时的“热情奔放”。在我看来，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论述斯泰姆勒教授的那一节，那真是异乎寻常的浅薄和诡辩。

所谓“外部世界的现实”

用“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这样“吓人”的题目来反对主观主义的概念的辩论，通篇结构很成问题，论述则更糟，基本上是可有可无之作。（在这里，我也指那篇提交给1931年6、7月间在伦敦召开的科学史会议的论文。）从通俗读本的角度来看，整个论述完全是故弄玄虚，一股知识分子学究腔，而不是逻辑必然性的反映。民众根本不会想到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外部世界是否客观地存在着，要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能让人笑痛肚皮。民众“相信”，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不过这里面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信念”从何而来，它“在客观上”具有什么批判意义？这一信念实际上来自宗教、即使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人，也概莫能外。因为一切宗教过去和现在一贯宣扬，上帝创造了世界，自然，宇宙万物，然后才创造人，所以人才认为世界万物都有一定，而且永远如此，于是这一信念就成为颠扑不破的“常识”流传下来历久不衰，即使宗教感情已经消失或淡薄。由此可知，立足于这一常识之经验而想要以“嘲弄”的办法来摧毁主观主义的概念，倒有相当“反动的”意义，即不知不觉地回到宗教感情上去。天主教的作者和演说家们实际上正是如法炮制，竭尽冷讽热嘲之能事，而收潜移默化之功效。*

在提交给伦敦代表大会的论文里，《通俗读本》的作者用暗示的手法答复这种意见（这固然有它的意义，但是浅薄），他先是指出我们公认的首要公开宣扬主观主义概念的贝克莱是一位大主教²¹²（从这里似乎可以推导出这个信念来自宗教的理论），接着又

* 教会（通过耶稣会，特别是新经院哲学：卢万大学和米兰的圣心大学）企图吸收实证主义，并在事实上利用了这种论证，在群众的面前嘲弄唯心主义者：“唯心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认为，这座或那座塔，只有在你想到它的时候它才存在；假如你不想到它，那么就不复存在。”

说，只有“亚当”第一次发现自己置身于世界上时才会想到，世界只是因为他感知到才存在（这里又一次暗示了来自宗教的理论，但把握不是太大，甚至毫无把握）。

据我看，这问题的另一面是：这样一种观念当然并非完全无用，即使对实践哲学来说也是如此，何以时至今日，只要在民众面前一提到这个问题就会引起一片嘲笑之声，对此，我们又怎么来解释？我认为，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科学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在高级文化中处于发号施令中心地位的某些知识分子集团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大；另一原因则是哲学语言的表达方式已经变成一套行话，就象小丑的插科打诨那样令人忍俊不禁。但是，即使常识认为它可笑，实践哲学家还是应该设法解释：这种观念的真正含义，它产生的原因，为什么会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传播，以及常识认为它可笑的道理何在。毫无疑问，主观主义概念是现代哲学所特有的现象，现代哲学的高级和先进的形态产生了一种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超越了前者，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用现实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语言提出了传统哲学以思辨形式所表达的问题。设法证明这一点（那本书对此根本没有涉及）具有莫大的文化意义，因为它可以结束那一整套徒劳无功、毫不相干的争论，使实践哲学得以有机地发展，甚至一跃而变成高级文化的独占代表。令人惊奇的是，对于以下两种论点，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现实世界是人的精神的造物；另一种是实践哲学的论点，认为意识形态既是历史性的又是暂时性的，理由是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的反映，并随着结构的改变而改变。对于这两种论点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作出适当的论断和阐发。

这个问题，由于明显的原因，同所谓精确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价值以及自然科学在实践哲学内所取得的地位密切有关，这是一种近似拜物教的地位，把自然科学实际上看做唯一真正的哲学或对

世界的认识。

但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主观主义的现实概念呢？对于整整一长串哲学家和教授所想出来的，一引伸就变成唯我论的、数不清的主观主义理论，我们能不能一一都加以研究呢？很明显，这里面还是只有黑格尔主义才能同实践哲学进行比较，因为黑格尔主义乃是这种观念的最光辉最有成就的形式，至于后来的那些理论，只需考察一下其中的某些部分及其有益价值就可以了。另外，对于这种观念在不论才能大小的拥护者和批判者中具有的比较古怪的形式，我们还需要加以调查研究。因此，有必要回忆一下托尔斯泰在《童年、少年、青年》的回忆录中的那番描写。他写道，他变得对主观主义的现实概念异常热衷，常常突然猛烈旋转使自己发晕，他相信这样一来就能捕获那什么也看不见的瞬间，因为他的精神腾不出功夫去“创造”现实（或诸如此类的说法：托尔斯泰的这一段描述很有代表性而且文学趣味很浓）。*

伯纳迪诺·瓦里斯科在其《批判的哲学大纲》²¹³里（第159页）也这样写道：“我翻开报纸看看新闻：你怎么能硬说我一翻开报纸自己就创造了新闻呢？”托尔斯泰给主观主义的概念赋予这样直接

* 列·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童年》部分之第19章。

“但是，在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再也没有比怀疑主义更使我神往的了，有一个时期，怀疑主义使我濒于疯狂的境地。我曾经想像：在整个宇宙中，除了我而外，什么人和什么东西都不存在，物体并非物体，只是当我加以注意时才出现的形象，我一不想它们，这些形象马上就消失了。总而言之，我的思想同谢林不谋而合：物体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我同物体的关系。在这种固定观念的支配下，我曾经达到非常疯狂的地步，有时飞快地转过头去，朝对面张望，希望出其不意地、在我不曾存在的地方找到空虚（néant）。”（《童年、少年、青年》，谢素台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83页。）

除了托尔斯泰的例子，还可以回忆一下，有一位记者以诙谐的笔法所描述的那种“职业或传统”哲学家（体现在柯罗齐的《哲学家》一章里）：多少年来一直坐在书桌旁，呆呆地望着墨水池问自己，“这墨水池究竟是在我之为还是我之外？”。

的和机械论的意义是可以理解的。但瓦里斯科也这样写，这是否不可信呢？尽管他如今已转向宗教和先验的二元论，毕竟不失为一位严肃的学者，对于自己的研究课题应该是了解的。瓦里斯科的说法是一种凭常识的批评，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批评，虽然在阻挠某种思想方式和文化方式的传播方面有极重要的作用，却一直为人所忽视。不妨回忆一下马里奥·米西罗利在《意大利文学》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他写道，假如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同一位新经院哲学家辩论，来捍卫比方说主观主义观点的话，他会感到十分狼狈。他还指出，天主教在同唯心主义哲学竞争中想把自然科学拉到自己一边来。米西罗利在别处写道，他预见会有一个思辨哲学衰落、实验的和“现实”科学的传播日益广泛的时期。（不过，就在这篇由《开拓者》*刊载的文章里，他也预见到会出现一个反教权主义的浪潮。换句话说，他显然不再相信天主教能够把科学据为己有。）值得一提的还有出现在罗伯托·阿尔迪戈文集（《杂论集》**，G·马尔凯西尼辑录，莱蒙尼埃出版，1922年）中的《葫芦论战》²¹⁴。在一张地方的宗教小报上，有位撰稿人（主教派教区的一名牧师）为了贬低阿尔迪戈在民众中的声望，说他或多或少是“一位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硬说（曼图亚的或随便什么地方的大教堂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想到了它，要是他们不想到它，那么它也就化为乌有了”（等等），对于这种指责，阿尔迪戈十分恼火，因为他是一位实证主义者，而且赞成天主教徒对客观现实的看法。

必须说明，“主观主义”概念作为对先验哲学的批评，作为常识和哲学唯物主义的朴素形而上学，是有其用处的，但又只能在上层建筑的概念中找到它的真理和作出历史主义的解释。至于它的思

* 意大利文是：IL Saggiatore。

* * 意大利文是Scritti vari。

辨形式，那无非是一种哲学虚构。*

关于《通俗读本》，有一个要害问题必须提出来：它只是从常识批评的观点来描述主观主义的概念，它只是在最琐碎的非批判的意义上采纳了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性的观念，根本不怀疑它会遇上以神秘主义为理由的反对意见，事实上它已经遇上了。**

但如果对这种观点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要对这种按机械论方式去理解的外部客观精神观点进行辩护是很不容易的。似乎有可能存在一种超历史和超人类的客观精神。可是这种客观精神的判断者是谁？谁能够把自己置于这种“自在的宇宙观”中呢？这种“自在宇宙观”又能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只能被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正是上帝概念的残余，不折不扣是不可知的上帝观念的一种神秘形式。“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²¹⁷恩格斯的这一论点包含着下列正确观念的起源：要想证实客观现实，必须求助于历史和人。所谓客观，总是指“人的客观态度”，可以把它看作同“历史的主观”恰好一致；换句话说，客观将意味着“普遍的主观”。²¹⁸对于历史地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文化体系里的全体人类来说，认识是实在的，就此而论，人是客观地去认识的。不过这种历史统一的过程要通过内在矛盾的消失才能实现，因为内在矛盾使人类社会分裂，这些矛盾本身就是形成集团和产生意识形态的条件；从其本质的实践起源来看，这些思想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暂时的过渡的。因此存在着争取客观性的斗争（使我们从局部的和谬误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这种斗

*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对主观主义作大体上比较现实主义的解释的文献可能是 G·德·鲁吉埃罗对本·康斯坦特死后发表的著作（我想是书简吧）所写的书评，此文于数年前刊载在《批判》上。²¹⁵

** 在提交伦敦代表大会的论文里，《通俗读本》的作者对神秘主义提出谴责，把它归诸桑巴特，并嗤之以鼻。桑巴特当然是从柯罗齐那里接受过来的。²¹⁶

争同时也是争取实现人类文化统一的斗争。唯心主义者所说的“精神”，并不是起点，而是终点，它是朝着具体地和客观普遍地统一前进的上层建筑的总和，它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决假设。

到目前为止，实验科学已为这种文化统一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使它获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一直是使认识尽量有助于统一“精神”并使之更带有普遍性的一个要素。它是最客观化的和具体普遍化的主观。

至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客观”概念，似乎是指一种脱离人而存在的客观；可是当我们断言，即使人不存在，现实也会存在时，如果不是形象地打比喻，便会陷入一种神秘主义。我们认识现实仅仅是就对人的关系来说的，既然人是一种历史的形成，认识和现实就也是一种形成，客观性也一样，如此等等。

对于恩格斯所说的“世界的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这句话，应加以分析并使之更精确。科学，究竟是指科学家的理论活动呢还是实践—实验活动，或兼指两者？不妨说，在科学家的实验活动里，就有现实的典型的统一过程，它是人与自然之间辩证调停的第一个模式，人通过基本的历史因素，借助于技术同自然发生联系，认识和支配自然。毫无疑问，实验方法的出现开创了两个历史世界，两个时代的划分，发动了使神学和形而上学解体的过程以及现代思想发展的过程，实践哲学则是这一发展的顶点。科学实验是新的生产方法，人与自然积极统一的新形式的最初细胞。实验科学家也是工人，而不是纯粹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不断地受实践的支配，反过来也一样，直到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统一为止。

新经院哲学家卡索蒂写道：“自然主义者和生物学家的研究，

* 马里奥·卡索蒂《教师与学生》(Maestro e scolaro)〔米兰，1930年版〕第49页。

以生命和真正有机体已经存在为前提”，这种说法同恩格斯《反杜林论》里的说法有关。天主教同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实在的客观性问题上默契的。

为了确切了解外部世界的现实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含义起见，不妨举出“东”和“西”这两个概念为例，即使分析表明它们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即“历史—文化的”说法，也不再是“客观实在的”。（“人为的”和“约定俗成的”这两个词往往表示作为文明发展产物的“历史的”事实，而不完全是唯理论的任意的或个人设想的意思。）也可以回忆一下伯特兰·罗素那本小册子²¹⁹里举的例子，大意如下：“如果地球上没有人存在，我们就不能设想伦敦和爱丁堡会存在，不过我们可以设想空间中两点的存在，一北一南，即今伦敦和爱丁堡之所在。”对此，可以反驳说，既然不存在人，也就无法想象“思维”，根本不可能设想任何事实和关系，因为它们只是有人存在才存在。如果没有人，还有什么南北或东西可言呢？它们是实在的关系，可是如果没有人，没有文明的发展，它们也就不会存在。很明显，东和西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亦即历史的说法，因为如果脱离了实在的历史，地球上的每一个点既可以是东又可以是西。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这些词的形成不是根据假设患忧郁症的一般老百姓的观点，而是根据欧洲有文化阶级的观点，由于他们称霸世界，遂使这些词到处被接受。日本是远东，不仅对欧洲来说是如此，就是加利福尼亚的美国人甚至日本人自己，恐怕也是这样看待的，所以，他们根据英国政治文化，可能也把埃及称为近东。如此说来，由于这些地理名词上附加的历史内容，东和西的说法最终表示不同文化综合体之间的一定关系。正因为如此，意大利人提到摩洛哥时就称它为“东方”国家，就是指它的穆斯林和阿拉伯文明。可是这种关系是实在的，符合确凿的事实，你可以从陆路和海路去旅行，到你打算要去的任何地方，去“预见”未来，把

现实客观化，去认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合理的和现实的是一回事。

要是对这种关系不理解，那么就不可能通过同唯心主义及机械唯物主义的对比来理解实践哲学及其立场，就不可能认识上层建筑学说的重大意义。这绝不等于说（如同柯罗齐所认为的那样），实践哲学把黑格尔的“观念”换成了关于基础的“概念”。黑格尔的“观念”，无论在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方面，都已得到解决，对哲学的整个看法已经“历史化”了，也就是说，一种比先前更具体更历史地搞哲学的新方法已经开始变成存在。

附注：必须研究卢卡奇教授对实践哲学的立场。看来卢卡奇坚持认为，我们只能对人的历史谈辩证法，而不是对自然界谈辩证法。他的看法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如果他的论断的前提是自然与人之间的二元论，那么他就错了，因为他滑到了宗教的、希腊基督教哲学的以及唯心主义所特有的自然观方面去了，这种自然观只是在口头上，而在实际上却不能把人和自然彼此统一和联系起来。但如果人类的历史也应被看作自然史（也依靠科学史来理解），那怎么能把辩证法同自然分离呢？也许卢卡奇在反击《通俗读本》的奇谈怪论时走向另一极端而陷入了一种唯心主义。²²⁰

对过去哲学的评价

《通俗读本》对主观主义所作的肤浅的批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带有较大普遍性的问题，即对过去的哲学和哲学家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把全部过去的哲学都看作胡言乱语，一无是处，这不仅是一种反历史的谬论，也是事实上的形而上学残余；因为我们既不能要求古人的思想与今人完全一样，否则便是时代错误；也不能设想，在思想方面可以有一种古今通用，四海皆准

的教条模式，可以按照这个模式来评价过去。方法上的反历史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有些哲学体系固然已被超越，但这并不排斥它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必不可少的作用。对于这些体系的衰微，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要从现实辩证法的角度去认识。说它们的衰微是有价值的，这并非从客观的角度所作出的道义上的或精神卫生学的评价，而是辩证—历史的评价。应该对照一下恩格斯所引述的黑格尔的命题：“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²²¹这句名言对于评价过去同样管用。

《读本》把过去说成是“非理性的”和“荒谬的”，于是哲学史变成了奇谈怪论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形而上学的。（与此相反，《〔共产党〕宣言》里却包含着对垂死世界的高度评价。）如果说，这种评价过去的方法是从实践哲学产生的一种理论错误，那么它能否具有任何教育意义，或能否对奋发昂扬的活动起鼓舞作用？我看是不能的，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假设某位古人并非出生于过去某个世纪，而是出生于当今之世。然而每一个时代都有过去和现在，所以，严格地说，“当代”这个头衔属于海外奇谈的人物所有。*

内在性和实践哲学

《读本》提出的论点是，“内在性”和“内在的”这两个词在实践哲学中固然被使用，不过显而易见，纯粹是比喻的用法。说得好。但，是否说明一下，内在性和内在的这两个词的“比喻用法”究竟是什么含义？为什么这两个词继续被使用而没有被取代？是否仅仅出于对创造新词的反感？一般说来，当一种新概念取代先前的概

*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法国的小有产者，他把“当代”这个词印在自己的名片上。他本来自认为是小人物，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发现自己是位大人物，因为他是一位当代人。

念后,先前的语言还继续被使用,不过完全是比喻的用法。总起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地打比喻的过程,语义学史乃是文化史的一个方面;语言既是一种活的事物,又是陈列生活和文明的化石的博物馆。当我使用“天灾”这个词的时候,谁也不会指责我相信占星术,当我说“天哪!”,谁也不会认为我是异教神灵的崇拜者。不过这些词语却证明现代文明是从异教信仰和占星术发展而来的。“内在性”一词在实践哲学中有一个十分确切的含义,这个涵义包藏在比喻里,需要把这个含义发掘出来明确地加以说明。这种说明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实践哲学是内在性哲学的继续,但扬弃了它的全部形而上学结构,并把它带到了具体的历史基础上。所谓比喻的用法只是指旧的内在性已被超越——虽被超越,但仍被认为是思想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新的用法是由此脱胎而来的。还有一点,内在性的新概念是否彻底的新?比方说在乔尔丹诺·布鲁诺的著作里²²²似乎就有这种新概念的线索。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对布鲁诺并不陌生,他们读过他的著作,他们在这些书上所作的眉批依然保存着。此外,布鲁诺对德国古典哲学(等)也并非毫无影响。所以,在哲学史上有好多问题得探索。

语言与比喻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而且语言总是在打比喻。尽管我们不可十分露骨地说,在谈话中凡是提到什么事物或物质和感性对象(或抽象概念)都是在打比喻,以免过分扩大比喻的概念;却可以说,就被使用的词语在文明的先前各个时期所具有过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内涵而论,现行的语言是在打比喻。一篇研究语义学的论文(例如米歇尔·布莱埃尔的论文²²³)可以对一组组词语的语义变化提供一个历史地批判地追本溯源的目录。如果不考虑这个事实,换句话说,如果对语言现象缺乏批判的历史的概念,就有可能在科学和实践的领域造成许多谬误:

1. 美学性的谬误,今天正在不断地纠正这种谬误,然而在过去

却是一种流行观点，这种观点是，某些相对应的词语本身就是“美的”，因为它们是比喻的具体化：修辞学家和语法学家不断造出一些巧妙的说法，用以分辨天知道有多少抽象的艺术价值和要素。把语言学家在词源学或语义学研究中获得某种成果时欣然欲狂的纯粹咬文嚼字的“乐趣”同艺术享受本身混为一谈。朱利奥·伯托尼的《语言与诗歌》一文就是这种变态的最新实例。

2. 实践性谬误，它是一种要使语言定型化和通用化的空想，然而拥护者很多。

3. 生造新词的武断倾向，这种倾向的根源来自帕雷托及实用主义者所提出的“语言是谬误的渊藪”的问题。帕雷托和实用主义者都声称已经创造了一种新世界观，或至少是革新了某门科学并赋予新的意义，或至少对某些词语赋予了新的细微差别，或已经创造了新概念。后来他们发觉，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是，传统的词语，特别是那些老百姓和受过教育的阶级甚至语言学专家们都使用的词语，尽管内涵变了，却仍然包含着原来的意思。于是他们对此作出反应。帕雷托创造了他自己的“词典”，以表明他致力于创造他自己的“纯粹”语言或“数学”语言。实用主义者则编出一套抽象的理论，说语言是谬误的渊藪（见普雷佐里尼的那本薄薄的书）。但有没有可能把语言的比喻意义和引伸意义剔除出去呢？不可能。语言是随着整个文明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通过新的阶级获得文化以及通过一种民族语言对别的民族语言占支配地位等等而变化的，它只不过是比喻的形式吸收先前文明和文化的词语罢了。今天，谁也不会认为“天灾”*这个词同“占星术”**有联系，也不可能对使用这个词的人的意思发生误解。同样，就是无神论者也可以

* 原文是disaster。

** 原文是astrology。

说“丢脸”^{*}，而决无被误认为相信宿命论之虞（如此等等）。²²⁴“比喻”意义是随着新文化的传播而传播的，而新文化也创造崭新的新词，或吸收其他语言的词作为外来语，赋予确切的含义，从而使这些词失去原有的范围广泛的含义。这样看来，实践哲学对“内在性”这个词所赋予的新的“比喻”意义对许多人来说很可能还是头一次听说，第一次了解和使用哩。

命名问题和内容问题

说知识分子是凝固了的社会集团（也就是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历史上不间断的继续，因而独立于集团斗争²²⁵，而不是每个统治社会集团培育自己的知识分子范畴的辩证过程的反映），这种观点的特征之一恰好在于：在思想体系上通过概念名称上的一致把自身同先前的知识分子范畴联系在一起。每个新的社会组织（社会形态）都创造新的上层建筑，代表和体现这种上层建筑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只能被认为是“新”知识分子，他们是新形势的产物，而不是先前的知识界的继续。如果“新”知识分子自认为是先前的“知识界”的直接继续，那么他们根本就不是新的（即他们并不依附于在组织上代表历史新形势的新社会集团），而是那个已被历史淘汰了的社会集团的抱残守阙的余孽。（也就是说，新的历史形势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创造新的上层建筑的阶段，而继续生存在旧历史的过时的外壳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要牢牢记住，不论新的历史形势所带来的变化有多大，总不能使语言彻底改变，至少在语言的外表形式上。但语言的内容却一定会改变，即使很难确切地察觉直接意义上的改变。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在新社会集团的各

* 原文是disgrace。

阶层中存在各具特色的文化,其中有些阶层,在思想体系上,仍然沉浸在先前历史形势的文化之中,有时还包括刚刚被超越的文化。某个阶段,尽管其中有些阶层还抱着托勒密的世界观,照样可以代表某种很先进的历史形势。这些阶层尽管在思想体系上是落后的(或至少他们的世界观的某些方面还是单纯的缺乏联系的),但在实际上,即从经济和政治作用来看,却是很先进的。如果说,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明确提出和组织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改革,即使文化与实践领域相适应的话,那么“凝固的”知识分子就是保守反动的。因为,新的社会集团至少感觉到自身已从原有的集团中分离出来而且迥然有别,而这些知识分子却根本不认识这种差别,只认为他们自身同过去之间可以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这当然不等于说,过去的遗产应该全盘否定。它们在总体上所具有的“有用的价值”是应该加以吸收并使之进一步完善的。但我们应怎样来区别有用的价值和应该彻底抛弃的暂时性的哲学价值呢?往往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接受了属于某一过去思想派别的暂时性的哲学价值,就否认另一思想派别的有用价值,因为后者同前者相抵触;即使这种有用价值对反映新历史形势的文化内容可能是有用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唯物主义”一词是连同其过去内容被接受的,而“内在性”一词则因它曾经包含过某种过去历史形势的文化内容而被抛弃。难以用确切的措词表达概念内容,把名称问题同实质问题混为一谈或者反过来相混淆,这些都是对哲学一知半解、把握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缺乏历史感的典型表现,换句话说,这是拘泥于形式逻辑的抽象体系的、反辩证法的和教条主义的观念的典型表现。

对于19世纪上半叶的“唯物主义”一词,不能仅从哲学术语的角度去理解,而且应从它在由于现代文化在欧洲的崛起和势不可

挡的发展而产生的辩证中所获得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当时，凡是在思想领域中排斥先验论的哲学理论都一律被称为唯物主义。因而，不但泛神论和内在论，一切受政治上的唯实论鼓舞的求实态度——即凡是反对政治上某些最糟糕的浪漫主义思潮的（例如对马志尼学说的普及宣传²²⁶总是带着“使命”呀“理想”呀之类空洞模糊和感情色彩的抽象口号），都被称为唯物主义。直到今天，在天主教的论战中，唯物主义这个词还是经常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唯物主义是与严格意义上的唯灵论即宗教意义上的唯灵论相对立的，因而可以把黑格尔主义和一般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感觉论和法国启蒙运动哲学，统统归诸唯物主义这个总标题之下。同样，在常识的术语中，唯物主义可以包括以人间生活而非天堂生活为主旨的一切事物。超越中世纪生产领域的任何形式的经济活动都是“唯物主义”，因为看来它就是“目的本身”，为经济而经济，为活动而活动，正如今天在一般欧洲人心目中，美国是“唯物主义”的，原因是机器的使用和公司厂商的规模超出了一般欧洲人认为“合适”的限度——即不致损害“精神”需要的限度。由此看来，当初封建文化在论战中用以反击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武器，如今却被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用来一方面反对比欧洲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另一方面反对从属社会集团的实践活动。（对于这些从属社会集团来说，从一开始到他们能够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整个历史时期里，活动只能基本上是经济的，或至少以经济的和组织结构的方式来表现。）这种唯物主义观念的痕迹依然残存在语言中。在德文和俄文里，“精神的”*这个词也作“教士的”**、“教士所特有的”解。有不少论述实践哲学的作者正是把宗教、有神论等看作承认“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要害问题，由此可见上述唯物

* 德文是geistlich。

** 俄文是духовный。

主义观念是多么流行。

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一个或许是最重要的理由，应该从下列事实中去寻找：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一种主要处于批判和论战状态的哲学，然而人们却需要一种完全定型的体系。完全定型的体系总是个别的哲学家的成果，在他们的体系里，除了历史地有关的组成部分，即与当时生活条件相适应的部分而外，总是存在着一个抽象的组成部分，而就其依附于先前的哲学，以及出于体系结构上的需要或出于作者独特的风格而具有故弄玄虚的外表而论，这种组成部分也的确是“非历史的”。所以，某个时代的哲学不可能只有一个自成体系的流派或个别体系，而是所有个别哲学和哲学流派加上科学观点、宗教及常识等之总和。这样一种体系，能不能人为地创造？如果能，是由个别人还是由集团来创造？唯一可能的是批判活动，尤其是指批判地提出并解决那些反映了历史发展的⁴问题。必须加以阐述和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哲学不可能同任何过去的体系恰好相合，不管这种体系采用什么名称。术语相同不等于概念相同。

关于这个问题，兰格的《唯物主义史》²²⁷是本值得一读的书。这部著作尽管有可能或多或少地被个别唯物主义哲学家后来的研究所超越，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在文化上的重大意义还和原来一样。有好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都参阅这本书，从中获得他们的先驱者的知识以及唯物主义的根本概念。简而言之，可以说情况如下：首先，教条主义地设定一个前提，即传统唯物主义只要稍加修正（用“辩证法”来修正，因而这种辩证法是作为形式逻辑的一章，而不是作为它自己的逻辑即一种认识论而被吸收的）就直接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然后研究兰格书里所介绍的传统唯物主义，于是这种唯物主义的概念就被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因此，可以说，这套贴着历史唯物主义标签的概念中的主要部分，其创始

人和源泉不是别人，正是兰格。正因为如此，研究这本书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文化意义和批判意义，兰格是一位认真的敏锐的历史学家，他对唯物主义观念有十分精确、鲜明和有限度的定义。因而，使某些人（例如普列汉诺夫）大为吃惊甚至震怒的是，他既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把费尔巴哈的哲学²²⁸看作是唯物主义的，所以就愈发值得研究了。在这里，可以再一次看出名词术语固然是约定俗成的，但只要一忘记必须经常回到文化源泉，以辨别概念的确切意义，就会造成错误和偏差，在这方面术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同一顶帽子底下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脑袋。再有，大家知道，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从来不把自己的观念称为唯物主义的，当他论述法国唯物主义时给予了批判，还强调说要作更详尽的批判²²⁹。所以他从来不提“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是把它称做“合理的”，以同“神秘的”相对立，赋予“合理的”这个词以十分明确的意义。^{*230}

科学和科学的工具

《通俗读本》断言，科学的进步取决于科学工具的发展，如同结果来自原因那样。这是《读本》采纳洛里亚所倡导的关于“生产和劳动工具”的历史作用的一般原理后必然得出的结论（它取代了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地质学所使用的工具只是一把锤子，然而锤子的技术进步同地质学的发展根本无法相比。如果各门科学的历史，可以象《读本》所声称的那样，归结为它们各自的工具史，那又如何能产生一部地质学史呢？说地质学也是建立在其他一系列科学的进步的基础上，所以其他科学的工具史有助于说明地质学史，这种说法毫无意思，因为如果这样推而广之地引伸，最后势必

* 关于这个问题，值得再看看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文章。

空空洞洞地概括到生产关系为止。地质学的座右铭还是以“大脑和锤子”^{*}最为妥贴。

一般说来，可以认为科学的发展不能以物质为标志。科学史充其量只能通过记述工具的不断完善和机器的使用而存在于人的记忆中，工具的完善是科学得以发展的一种手段，而机器则是科学本身得到应用，但又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这样。科学进步的主要“工具”是一套智力的（甚而政治的）和方法论的程序，恩格斯写道²³¹，“智力工具”既不能从天上掉下来，又不是人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过去和现在都在历史地发展着。把亚里士多德和圣经的权威驱逐出科学领域，这对科学进步的贡献有多大？难道此举不是现代社会普遍进步的结果？回想一下关于泉水之源的各种理论的例子。第一个确切地表述泉水形成的方式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等等。可以证明，在这以前，一般群众对这一问题已有正确观点，可是当时在科学界却出现了一系列最武断最稀奇古怪的理论，力图使圣经及亚里士多德同良知的实验观察调和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读本》的论断是正确的，靠什么来区别科学史和技术史？在历史上“物质”工具的发展是随着实验方法的出现而开始的，而随着科学的“物质”工具的发展，一门特定的科学即工具学有了发展，而工具学的发展又同生产和技术的普遍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数学科学不需要任何物质工具（至于算盘的发展，我以为算不得什么有力的反例证），数学科学本身就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通过数学科学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读本》的论断是多么肤浅。

* 意大利文是“mente et malleo”。

**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G·波菲托：《科学的工具与工具的科学》，锡伯尔国际出版社，佛罗伦萨，1929年版。

“技术工具”

《通俗读本》关于“技术工具”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篇柯罗齐论述阿基尔·洛里亚的文章²³²所说，好象是洛里亚首先任意地（或是出于想搞独创发现的幼稚愿望）提出了“技术工具”的说法来代替“物质生产力”或“社会关系的总和”。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是这样表述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意译文引自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纪念》〔《纪念〈共产党宣言〉》〕一文。）²³³

洛里亚的改写如下（引自《世界与社会制度》第19页，维罗纳德鲁克尔出版社，1892年；柯罗齐强调指出，在洛里亚的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与生产工具的一定阶段相适应并建立其上的一定的生

产方式以及一定的生产关系，构成社会存在的整个方式。但生产方法的不断改进迟早会使生产工具发生彻底改变，这种改变使技术原来阶段建立其上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变得不可容忍。于是通过社会革命把过时的经济形式加以摧毁，而代之以与生产设备的新阶段相适应的更高的经济形式。”

柯罗齐补充说，《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和第14章)和别处固然强调了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并援引了技术史，可是根本没有把“技术工具”变成经济发展的唯一的和特别突出的原因。《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那段表述里下列词语倒是有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经济条件”等等，这些当然是肯定经济发展取决于物质条件，不过它可从来没有把这些条件仅仅归结为“技术工具的变化”。柯罗齐还说，实践哲学的创始人从来不打算研究经济生活的最终原因。“他的哲学并非那么廉价的。他决不会无缘无故‘卖弄’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后又去追求最终原因。”²³⁴

值得指出的是，《通俗读本》并没有摘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那段表述，甚至连提也不提。这种做法是十分奇怪的，假定这是解释实践哲学的最重要的权威出处²³⁵的话。另外，在这个问题上《读本》里所阐明的思考方式同洛里亚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说是更加肤浅和易受批评的话。谁也说不清《读本》里的基础、上层建筑或技术装备究竟是什么含义。书中所有的一般概念都是含糊不清的。把技术工具的范围设想得过于笼统，可以泛指一切装备或用具，包括科学家做实验所使用的仪器以及乐器……等等。这种探讨问题的方式只能把问题搞复杂而于事无补。

如果以这种奇异的思考方式为起点，那么一系列古怪的问题就会被抛出来。例如，图书馆是基础呢还是上层建筑？科学家的各种专业实验室又怎么说呢？如果能够肯定一种艺术或一门科学

是靠它的技术工具的发展而发展的，那么为什么就不能作完全相反的肯定，或者论证一定的工具形式既是基础同时又是上层建筑呢？这样一来，就可以说，一定的上层建筑有它自己特定的基础而同时还是上层建筑。印刷术就会是一系列意识形态、甚至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而印刷工业的存在可能足以为整个历史提供唯物主义的论证。至于剩下的纯数学和代数学的问题，既然它们没有自己的工具，也就不可能有发展。很明显，《读本》的这套技术工具论纯粹是一派胡言，同柯罗齐所炮制的记忆理论颇为相似，后者是要说明艺术家何以不满足于单纯在观念上设想自己的作品，而是把它写出来，雕刻出来，等等（在这方面遭到蒂尔格尔的有力反驳：在建筑学上，把工程师建设一座大厦看作就是为了保存对自己设想的记忆，那未免过分了）。凡此种种无疑都是实践哲学在初期由于这样一个古怪的信念而产生的偏差：即一个人愈是回到“物质”对象上去，就愈是正统。

反对经验主义

要对一组事实进行调查研究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必先设定某种“概念”，使我们得以把这一组事实同可能的另一组事实区别开来。如果没有一种事先存在的选择标准，那又怎么来选择事实，据以证明自己的设想是合乎真理的呢？但这种选择的标准究竟应该是什么，如果不是能容纳每个被研究的事实的某种东西的话？是一种直觉，一种观念，它们必须被认为具有一段复杂的历史即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应同整个文化发展的过程相联系（等等）。可以把这种说法同另一种关于“社会学的规律”的说法联系起来看，后者只是把同一事实重复两次，第一次作为事实，第二次则作为规律，所以它只是一种重复事实的诡辩，根本不是什么规律。

“正统”的概念

根据以上所发挥的一些要点，看来有必要对“正统”的概念重新加以澄清，使之恢复真正的本来面目。正统，不必从实践哲学的这位或那位拥护者身上去寻找，也不应在与这门独创学说无关的思潮有联系的这个或那个派别中寻找，而要从这样一个根本概念中寻找，即实践哲学是一种“自我满足之物”，它本身包含着为创建一种全面定型的世界观，一种总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所必需的一切基本因素，不仅如此，它还包含促使一个完整的实际的社会组织活跃起来，即形成一种全面完整的文明所必需的一切。

这种经过澄清的正统概念，有助于对“革命的”这个词下个更为恰当的定义，以避免对各种世界观、理论或哲学随便乱加这个定语。从信奉异教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是革命的，因为它是东西两半球彻底分裂的一个因素。一种理论，只有它是有意识地造成两个阵营对垒的因素并且是敌对阵营所不可企及的高峰，才是“革命的”。如果硬说实践哲学不是一种同一切传统的哲学和宗教相对抗的、完全独立自主的思想结构，实际上就意味着还没有割断同旧世界的联系，即使不说是事实上的投降的话。实践哲学不需要异己力量的支持。由于新的真理十分强大而丰富，旧世界不得不以更加现代化和更加有效验的武器库来武装自己。这意味着实践哲学已经开始支配传统文化。然而传统文化还是很强大的，首先是更加完善和精炼了，它竭力象希腊人那样在失败中采取对策，希望最后战胜那不文明的罗马征服者。

可以说，柯罗齐哲学的大部分就反映了这一企图，想把实践哲学加以吸收同化，使它变成传统文化的奴婢。但是，正如《读本》所证实的那样，就连某些自封为“正统”的实践哲学的拥护者也落入了圈套，认为自己的哲学归属于一种一般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哲

学，而其他人的哲学归属于唯心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实践哲学同旧哲学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说与基督教同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相比要少。）从奥托·鲍威尔论宗教的小册子里，²³⁶可以见到有不少地方谈到了这种结合，这是由于下列错误观念造成的：实践哲学不是独立自主的，必要时需要某些别的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哲学给予支持。鲍威尔坚持认为政党的不可知论是一个政治命题，并主张要准许党员自行分为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天主教徒等等的派别。

附注：对于实践哲学，人们总想寻找一种作为其基础的一般哲学，从而包含着否认它在内容和方法上的独创性的意思。这类错误观念的情况看来是这样的：把实践哲学创始人的个人文化素养同实践哲学的来源或组成部分混为一谈。所谓个人文化素养是指他青年时期十分感兴趣的那些哲学思潮和伟大哲学家以及他常常袭用的他们的语言（不过总是抱着他本人的独立见解，而且常常声明他之所以使用这种语言，目的在于使他本人的概念更易于为人所理解）。这类错误观念由来已久，特别是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大家知道，有一个时期，对诗歌方面的伟大作品追本溯源成为许多知名学者的主要任务。于是产生了所谓创作形式上的抄袭问题，然而，即使是“抄袭之作”而其实是文学上的模仿，也不能不承认其中有不少作品具有抄袭或模仿的独创性。²³⁷可以举出两个有名的例子如下：1. 乔尔丹诺·布鲁诺在《论英雄的愤怒》中（或在《灰烬的晚餐》中）模仿坦西洛的一首十四行诗《经您解释以后，我有了美好的希望》，这本是坦西洛献给瓦斯托侯爵夫人的一首爱情诗²³⁸；2. 悼念多加利的死者的那组诗，邓南遮提出是他自己的创作，其实是逐字逐句从汤马西奥编的塞尔维亚歌曲集里抄来的。²³⁹无论是布鲁诺还是邓南遮，他们的模仿之作

都增添了新意和独特的韵味，使人反而忘记了它们的原著。

研究象马克思这样的人的哲学素养不仅很有意义，而且十分必要。但是不应忘记，这种研究纯属谱写他个人的思想传记的领域。斯宾诺莎、费尔巴哈、黑格尔、法国唯物主义等等的原理决不是实践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也不能把实践哲学归结为这些原理。有意义的正是对旧哲学的超越，新的综合或某种新综合的因素，以及理解哲学的方式。同时还必须牢牢记住，这种理解哲学新方式的因素就包含在实践哲学创始人的格言中或以某种方式分散在他的全部著述中，因而有必要加以识别并条分缕析地加以发挥。在理论上，不可把实践哲学同其他一切哲学等量齐观或降低到它们的水平上。它的独创性不仅表现在对先前哲学的超越上，而且首先表现在它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使理解哲学的整个方式从头至尾焕然一新。但作为历史传记的研究，人们对实践哲学创始人的哲学活动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加以分析。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记住这位学者在青年时期的心理状态，对于他所研究分析的任何新思潮，他往往狂热入迷，而他本人的个性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在把许多不同的思想——加以试验和比较之后逐步形成的。因此，必须弄清楚，哪些成分是他所吸收并加上自己的思想而形成相似的东西，而尤其要查明哪些是他的创新。毫无疑问，黑格尔的学说(相对来说)是我们的创始人的最重要的哲学原动力，特别因为这一学说力图摆脱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传统观念，创立一种综合体系，这个体系无疑具有莫大的重要性，代表着哲学研究的一个世界历史意义的阶段。所以当《读本》说，在实践哲学中，“内在性”这个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时，等于没有说一样。其实，内在性这个词在这里已经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即既不是“泛神论者”所指的意义，也不是任何其他形而上学的意义，而是一种需要加以详细说明的新

含义。拿一个极普通的词〔历史唯物主义〕来说，重音应该放在头一个词——“历史”上，而不是具有形而上学根源的第二个词，这一点一直被人们所遗忘。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是绝对的现世主义和世俗思想，是绝对的历史人道主义。人们必须按照这个方式去探究新世界观的线索。

“物 质”

《通俗读本》所说的物质究竟指什么？一本通俗读物，更不必说供专家阅读的书籍，特别是一本自称是这种类型著作中的第一部书，不但基本概念应该有精确的定义，而且全部名词术语也都应该有确切的含义，以免与科学词汇的民间庸俗用法相混而造成错误。很明显，对实践哲学来说，“物质”既不能按照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机械学等）的概念去理解（因为这些概念是根据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来加以解释和研究的），也不能按照各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概念去理解。应该理解为各种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等）物质属性加在一起构成物质本身（除非你回到康德的本体论去），但这只是就它们成为一种生产的“经济要素”而言的。因此，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研究的课题，而是要研究怎样社会地和历史地把物质组织起来投入生产，同时应该相应地把自然科学看作基本上是一种历史范畴，一种人类关系。各种形式物质属性的总和是否永远都相同？技术科学史表明并非如此。蒸汽动力被忽视的时间有多久？能不能说，这种动力在它被人造的机器加以利用之前就已存在？可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并在某一时刻之前说，自然为之提供机会的，不是事先存在的生产力——事先存在的物质特性——的发现和发明，而是同社会的利益、同生产力的发展及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密切有关的“创造”？对于那种认为自然不外是经济学范畴的唯心主义观念²⁴⁰，难道不可以在清除其思辨的上层建

筑以后使之变为实践哲学的术语，并证明它同实践哲学历史地有联系而且是实践哲学的一种发展吗？事实上，实践哲学并不研究机器，并不想了解和确定机器材料的原子结构或其自然组成部分的物理的、化学的和机械的属性（那是精确科学和技术的事），而只是把它看作是物质生产力的一个因素，一定社会力量的所有权的客体，以及与一定历史时期相适应的某种社会关系的反映。物质生产力的总和是历史发展中最不易发生变化的因素：它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并可用数学的精确性加以计量，因而可以进行观察并产生实验性质的标准，以此来设想历史过程的基本轮廓。物质生产力总和的变化也是可以计量的，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在哪一点上它就不再只是量的发展而变成质的发展。同时，物质生产力的总和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晶，现在和将来历史的基础：它既是一种文献，又是能动的和现实的推动力。但是，决不可把用于物质生产力方面的能动性这个概念同物理学或形而上学所说的能动性混为一谈或加以比较。在历史上，电是能动的，但不只是作为一种自然力（例如放电生火），而且也作为一种受人类支配的生产因素纳入物质生产力的总和，是私有财产的一种对象。作为一种抽象的自然力，电早在变成生产力之前就已存在，但那时它并不起历史作用，而只是自然科学中一种假设的课题（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它是“不足挂齿”的东西，因为根本没有人对它感兴趣，或者说事实上对它一无所知）。

以上的观察有助于说明，自然科学用以解释人类历史的因果原理，实际上是一种武断的假设，如果不说是事实上的回到旧思想体系的解释上去的话。例如《读本》断言，现代原子学说摧毁了个人主义（鲁滨逊精神）²⁴¹。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把政治同科学理论这样地拉扯在一起，若不是想说历史是由科学理论亦即意识形态来推动的话，那究竟包含些什么意思？本来是想当一个极端唯

物主义者的，结果却一下子陷入了一种畸形的抽象唯心主义。如果认为，不是原子学说，而是这种学说所观察和描述的自然界现实摧毁了个人主义，就不免陷入更加复杂的矛盾里，因为这种自然界的现实被认为是先于学说的，所以，甚至当个人主义处于极盛时期，这种现实就已经发挥作用了。如果说“原子论”的现实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自然规律，那么它怎么就一直不能发挥作用，而非得人类创立了一种学说它才能发挥作用呢？是不是人们只服从他们所知道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就象是议会的法案似的？谁能把人类所没有察觉到的规律强加于他们，根据现代立法原则，无视法律是不可原谅的？再有，也不能认为，一定的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历史的规律是一致的，或者既然整个科学思想的体系是同质的统一体，就可以把一种科学变成另一种科学，一种规律变成另一种规律。假设是这样，那么凭什么恰恰是物理学中的这一特定部分而不是任何其他部分，可以被归结为世界观的统一呢？

这的确正是《通俗读本》的许多原理之一，这些原理证明了这本书对实践哲学问题的提法是肤浅的，在涉及自然科学时，它未能赋予这一世界观以真正科学的独立和应有的地位——更糟糕的是，甚至在涉及那种模糊的关于科学的一般概念，即民间十分流行的连变戏法也算作科学的那种庸俗观念时，情况也是如此。难道原子理论是一种“最后的”理论，永远不会改变？哪位科学家敢下这样的结论？难道它不就是一种可以被超越的，即可以被一种更广泛更全面的理论所吸收的科学假设吗？那么，为什么论述这个理论时口气那么绝对，说它已经消灭了个人主义和鲁滨逊精神呢？（除非完全不考虑下列事实：鲁滨逊精神有时可以是一种实际的样板，用以表明一种倾向，或用于归谬证法，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作者〔马克思〕也使用过鲁滨逊精神这个词。）但问题并不到此为止，如果原子理论诚如《读本》所标榜的那样，如果社会的历史就

是一部动荡变革史，既然社会形态不止一种，而原子理论又似乎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界现实的反映，那么，何以社会并没有始终一贯地服从这个规律呢？或者，这是不是主张：从中世纪的行会制向经济个人主义的转变是反科学的，是一种历史错误和自然错误呢？按照实践哲学的观点，能够解释人类历史的，并不是原子理论，而是别的相反的途径：换句话说，原子理论以及一切科学假设和科学观点都是上层建筑。*

量 和 质

《通俗读本》里说（但只是顺便提到，因为对这个论断既没有加以论证或评价，也没有表达这个概念丰富的内涵，只是偶然地、同上下文并无联系地提一下而已），每个社会大于它的单个组成部分的简单的总和。这句话，抽象地看，是正确的，但具体来说，含义是什么？书里所给的解释——从经验上来说——往往很古怪。它说，100头牛一头一头地数，同100头牛合在一起是大不一样的，后者称作一群，——这样一来，就成了一个名词术语问题。它还说，在数码上，12个就叫一打，好象一对、3个一组、4件一套等等说法统统不存在似的，也就是说，只是计数方法有所不同，如此而已。其实，最具体的、理论和实践兼顾的解释就在《资本论》第1卷里，它证实了在工厂制度中存在着某种生产定额，不能把这种定额归诸任何个别的工人，而应归诸劳动力的总和，归诸人的集体。就整个社会而论，也出现类似的过程，它建立在劳动和职能方面的分工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它的确大于各组成部分的总和。实践哲学是怎样把黑格尔关于量变成质的规律“具体化”的，这是又一个令人伤脑筋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通俗读本》统统视为人所共

* 原子理论可用来说明生物学上的人是躯体各个部分的总和，至于要以同样方式来说明人类社会，那简直是一种全面的理论！

知之理而未加探讨，满足于这样的文字游戏：水随温度的变化而有三态的变化（冰、液态、气体），其实这完全是受外因作用（火、太阳、碳酸分解等等）的纯机械的事实。

至于说到人，那么这外因又指谁呢？在工厂里，是指分工等等由人自己所创造的条件。在社会上，则指生产力的总和。但《读本》的作者却没有考虑到，如果每个社会集合体都大于（并不同于）其组成部分的总和，这势必意味着，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或原理不可能是物理学的规律，因为在物理学中，除了打比喻，人们总离不开量的领域。但在实践哲学中，质也同量有关联，这种关联也许是它的最有益的贡献。至于唯心主义，则把某种另外的神秘之物实体化后也称之为质，使之成为一种自己的本质，即“精神”，就象宗教对神的观念那样。但是，如果在宗教思想和唯心主义那里，质的概念就是本质，也就是说，是一种任意的抽象而不是为了作出解释而必须从事的分析鉴别过程，那么在庸俗唯物主义那里情况亦然如此，因为它把物质的本质“神化”了。

应该把这种社会观同行为唯心主义者所特有的国家观相比较。在行为主义者看来，国家最终正是这种高于个人的实体（但根据斯皮里托唯心主义地把国家和个人在和财产的关系上等同起来的后果，金蒂雷在1932年8月的《法西斯教育》上已经小心翼翼地作了某些保留。²⁴²）一般的庸俗的行为主义者的思想已经退化到只会鹦鹉学舌的地步，即认为只有冷讽热嘲才是唯一可能的批评。这就不妨设想一位新兵会向征兵官员们解释国家高于个人的大道理，并要求他们给他具体的物质的人身自由，而只把有助于建设通常所称的国家的某种神秘的东西登记入伍。或者不妨回忆一下《短篇小说选》²⁴³中的那个聪明的萨拉丁解决旅店老板同乞丐之间纠纷的故事：老板要求乞丐付钱，因为他享受了肉的香味，乞丐则不肯付；萨拉丁便把钱币敲出叮当声给老板听，吩咐老板把响声装

进衣袋，正象乞丐把散发出来的香味吃掉一样。

目 的 论

对目的论问题的论述更加明显地暴露出《读本》的缺陷，它把过去的一切哲学学说一笔抹杀，统统是浅薄无聊的陈词滥调，给读者以这样的印象：一切过去的文化乃是一连串变幻不定的酒神巴克斯的醉态。无论从哪种观点看，这种方法都是应受指摘的。想要增长知识加深理解的严肃的读者会认为受到愚弄，从而对整个体系都产生怀疑。以为对某种观点，只要把它贬低就能超越它，这，想想倒容易，实际上只是一种咬文嚼字的幻想。以诙谐的笔墨论述问题，可能对伏尔泰起作用，可惜并非人人都能当伏尔泰，当大艺术家。

就这样，《读本》对目的论问题的论述表现得十分幼稚，而且不重视康德对问题所提出的答案。或许可以证明，在《读本》里存在着不少无意识的目的论的残余，于不知不觉之中重复着康德的观点。例如请看论“自然界与社会的均衡”一章。^{*}

* 摘自歌德的《二人集》：“目的论者”——“我们恭恭敬敬地崇拜世界的造物主，当他首先创造了栓皮槲时，也就发明了软木塞”。²⁴⁴柯罗齐在其论歌德那一卷里（《柯罗齐全集》III, 12(i), 第279页）加了这样一条注：“与外在目的论相反，这种在18世纪普遍接受的理论近来受到康德的批判，他用更深刻的目的观念来取代了这种目的论。”歌德在别处以另一种方式重复了同一主题并声明是从康德那里取经的：“康德是现代哲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他的学说对我的成长有极大的影响。对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以及一切都根据其自身所特有的内在原因而存在和发展的这个科学原理（套用一句谚语的例子，栓皮槲并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瓶塞而存在的），使我同康德有了共同语言，此后我下了一番功夫研究他的哲学。”可不可以从“历史使命”这个词语中追索目的论的根子？在不少场合，这个词语的确已经获得了模棱两可和神秘的意义。但在另一些场合，它的确具有按照康德的目的论来说可以用实践哲学维护和证明的意义。

论 艺 术

在探讨艺术的那一章里断言，最近的一些美学著作强调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可以看作最突出的例证之一，说明作者不能批判地确定概念的历史，不能识别这些概念本身在各种不同的理论里的真实意义。就事实而论，识别内容与形式是由（柯罗齐的）唯心主义美学加以肯定的，不过是从唯心主义的前提出发，使用唯心主义的术语，因此，“内容”和“形式”并不具有《读本》所设想的意义。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意味着，在艺术上，内容不是“抽象的题材”，不是小说情节和大量的普通感情，而是艺术本身，是一个哲学范畴，是“特殊的”精神的因素，等等。形式也不等于《读本》所认为的“技巧”。

应该把《读本》里所有关于美学和艺术批判的观点和资料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同时可以把论述歌德的《普罗米修斯》的那一节作为例子。所作的评价既浅薄又极为一般化。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印象，《读本》的作者既不懂歌德的这首颂诗的确切历史，也不知道在歌德之前尤其是在歌德的文学活动开始之前以及活动期间，世界文学中有关普罗米修斯的神话的历史。对上述情况完全不了解，能不能作出如同《读本》所作出的那种评价？既然不了解这些情况，又如何能辨别哪些东西完全属于歌德本人，哪些东西代表着某个时代或某个社会集团？这类评价，只有并非空泛地罗列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而是有根有据，事实确凿言之有物，才能站得住脚。否则，只能贬低理论的身价而助长表面化看问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大学生》杂志上发表的给一位大学生的信中的至理名言，值得再一次重温一下。）²⁴⁵

译自葛兰西《狱中札记》1978年英文版第381—472页

《狱中书信》^①

① 本书选载16封信，均译自林恩·劳纳：《葛兰西：〈狱中书信〉》，1975年纽约英文版。——编者

致塔齐娅娜

(米兰, 1927年3月19日)

亲爱的塔妮娅:

……我的生活是天天老一套,很单调。就连想搞点研究,其困难之大,也非一般人所能想象。送来的书籍,已经转交给我一些,我也读了不少(每天读一本多点,外加报纸);不过我指的是另一种情况:似乎有一种想法,一种被监禁者所共有的想法,使我感到烦恼,即:人生在世总得做一番 für ewig²⁴⁶ [德文,意思是不朽,永久,也可引伸为超然的态度]的功业,这里引用的是歌德的一个复杂理念,就我记忆所及,这也是曾使帕斯科利为之苦恼的理念。我想订个计划,认真而系统地研究点问题,使我的精神生活有所寄托。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想到了四个方面,不过至今尚未动手,这也是实情。第一,研究意大利知识分子史,他们同文化思潮的渊源和派别,他们各自的思想方式,等等。不消说,对于这个极其吸引人的题目,由于无法获得大量必要的资料²⁴⁷,我只能勾勒一个主要的轮廓。你还记得我那篇浅论意大利南方和贝·柯罗齐的重要性²⁴⁸的短文吧?是的,我真想把当时只是作了一番泛泛之论的题目,以“超然”即 für ewig 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第二,研究比较语言学,名副其实的**比较语言学**!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超然”和 für ewig 呢?当然,这只能侧重于研究这门学科的方法论和理论方面,至今还没有人同新语法学派相对立用新语言学派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完整系统的论述。(你是否开始为这封信而感到发愁?)我

生平莫大的“内疚”之一是我深深地有负恩师都灵大学巴托利教授²⁴⁹对我所寄予的厚望，他认为我是为一举摧毁新语法学派而降生的大天使；至于他本人，作为他们的同代人，在学术上同这个差劲的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态度上，总得对这门学科的行将寿终正寝的学术著作保持一定的礼仪。第三，研究皮兰德娄以及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形成的意大利戏剧趣味的改变。你是否知道，我发现并向观众推荐皮兰德娄的作品要比阿德里亚诺·蒂尔格尔早得多？从1915年到1920年，我写了大量介绍皮兰德娄的文章，足以编成一本200页的集子，我对他的评论是独具只眼而力排众议的：当时人们对皮兰德娄不是宽纵容忍便是公开嘲笑。²⁵⁰第四，写一篇研究戏剧小品与民众的文学趣味的论文。²⁵¹我是在读到赛拉菲诺·伦齐去世的讣告后才有些想法的。伦齐是一个露天戏剧演出队（相当于戏剧小品）的节目主持人，以前我经常兴致勃勃地去看他们的演出，因为欣赏观众的情绪起伏所给予我的乐趣不亚于演出本身。

你对以上所说的一切有什么看法？其实，要是仔细地考察一下这四个题目，你就会发现有一条总线把它们贯串在一起：民众的创造精神，在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各有自己的表现。²⁵²把你的想法写信告诉我：我对你的判断和见解无限信任。你是否认为我爱罗嗦？你很清楚，我只能以书信代替交谈，每当我提笔的时候就有一种仿佛在和你当面交谈的感觉。美中不足的是，如果你的回信没来，或者回信似乎对我的话题未予理会，那么我就等于在唱独角戏。所以，请写长信来，不要光寄明信片。我将在每个星期六给你写一封信（允许每周往外寄两封），以便从我的小天地里了解情况。不过，关于我寄旅此间的印象和感受，这类话题我决不再提，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对此感兴趣。对我来说，它们有一定的个人价值，因为它们涉及到我所经历过的特殊心境或痛苦经验，要让别

人对它们感兴趣，我得用文学体裁加以熔铸。但是我可以先在这里用笔墨在所给予我的短促时间内，随时把所想到的一切急速记载下来。喔，对了——那棵小柠檬是否还在长？你上次来信忘了告诉我。我的房东太太近况如何？她还健在吗？我老是忘了向你问起。一月初，我曾收到过一封派萨尔奇先生的来信，——他感到绝望，并说他知道那位房东太太已经不久于人世；此后，我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可怜的人儿，我担心她由于看到我被捕而病情加重，因为她一向很疼爱我。当他们把我带走时她简直吓得面无人色！

紧紧拥抱你，我亲爱的，爱我并给我写信。

安东尼奥

致塔齐娅娜

(米兰, 1927年5月23日)

最亲爱的塔妮娅:

上星期你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一封信以及所附朱莉娅的信, 均收到。

为了让你放心, 我再谈谈我的健康情况: 我现在身体很好, 真的。最近一个星期我胃口特好, 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几乎三天两头托人送一些我喜爱的食物进来, 体重也有所增加。同时我早晨晚上都抽出一点时间锻炼身体。虽然受限制只能做点室内活动, 即使这样也获益非浅。我做点锻炼全身关节和肌肉的活动, 循序渐进, 每星期逐步增加活动量。这样锻炼的益处已经得到证实: 头几天我感到周身僵直, 每个动作只能做一两遍, 现在, 活动量增加两、三倍也毫无不适之感。这种新的活动还有其精神上的益处, 使我用不着为消磨时间而读些无聊的东西。别以为我用功过度, 由于精神状态以及实际情况, 不可能进行名副其实的研究。我很难做到集中精神、专心致志于某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只有全神贯注我才能弄明白手头这些材料的全部可能的关系, 并把它们理出一个头绪来。我在学外语方面似乎即将做到这一点, 力求学得系统, 不忽略语法的任何一方面——这是我过去从未做到的事情, 只满足于能够说话和看点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我至今没有要你寄来任何辞典。我在乌斯蒂卡岛时你寄来的那本科勒德语词典被那里的难友们弄丢了。等我学完语法后, 会要你另外寄本辞典

《朗恩赛特出版社出版的》来的。然后，我打算就歌德的《与埃克曼的谈话》²⁵³ 写点东西，这本书我不但要阅读，而且要从语法和风格上加以分析。眼下，我正在读文字浅显的格林兄弟童话集。²⁵⁴ 我决心把学外语作为我的主要消遣。在德文和俄文之后，我想把过去学过一点皮毛的英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重新进行系统的学习。我上大学时只学过新拉丁体的罗马尼亚文，现在打算继续学它的斯拉夫语源词，这类词占它的词汇量的一半以上。由此你不难看出，我近来已完全恢复平静，不再焦虑不安和肝火旺盛了。我已经渐渐适应，所以时间过得很快：我用周而不用天来计算时间，把星期一作为计时的基准，因为这是我写信和刮脸——两大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的时间。

我想把我所收藏的书籍中我经常翻阅和打算研究的那些书开一张常用书目给你。伊诺迪²⁵⁵ 的《财政学：大学教程》是一部很完整的著作，需要系统地加以消化。关于财政方面我还有这样几本书：《意大利的公共财政》²⁵⁶，当局在罗马大学就行政管理方法所作的讲演集，一本很精采很吸引人的书；莱温索恩的《通货膨胀史》，虽说有点新闻笔调，但趣味盎然；内阁部长弗兰克的《比利时的货币稳定》。我手头没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在乌斯蒂卡岛时，有过一本马歇尔的名著²⁵⁷，但让朋友们留下了。但我手头有莫尔塔拉的《1927年经济展望》；斯蒂法诺·杰契尼²⁵⁸ 的《农业研究》；福特的《今天与明天》，这本书我认为令人喷饭，福特也许是位大实业家，若论著书立说，他却是位喜剧人物；普腊托研究皮埃蒙特和都灵的经济结构的专著和一本《经济学年鉴》；这期年鉴辑了有关维切利地区（意大利产米区）经济结构的详尽研究；以及一套关于英国经济情况的讲座（其中有洛里亚的一讲）。至于历史和文学书籍，手头极少，只有：乔亚切诺·沃尔培²⁵⁹ 关于近50年意大利历史的著作，一本分析时局并带有论战性质的书，德·森克蒂斯²⁶⁰ 的《意

大利文学史》和《评论集》。我在乌斯蒂卡时把我的书留给那里的难友们是出于无奈，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书。

我之所以决定把所有这一切写信告诉你们，是因为这似乎是可以让你和朱莉娅对我目前的生活以及心里的想法有个大致印象的最佳办法。我并不完全孤独和与世隔绝，因为天天有一定的活动。上午我们放风。如果碰巧在院子里占个好位置，我就研究在其他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的面孔，然后，他们出售一些人人都让看的报纸。回到我的囚室后，有人送来许可我看的政治报纸。在这之后，买东西，他们把头天张罗来的东西拿出来卖，随后，开午饭，如此等等。换句话说，随时看得到陌生面孔，每张面孔后面隐藏着颇费猜测的个性。其实，只要我放弃看政治报纸，就可以每天有4、5个小时同其他囚犯呆在一起。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但还是决定独自呆在囚室里看报。偶尔结识个把难友会使我开心这么一两天甚或一两个星期，但过后这种新相识大概还是顶替不了报纸。你是怎么想的？或许你会认为交往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精神因素。作为医生，你可以向我提出某些适合的医嘱。我也许无法做到尽量客观地考虑问题。

有关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般情况，就写到这里。关于我对你们以及孩子的思念，我不想写；这一部份你一定能想象得到，我相信你是心有灵犀的。

亲爱的塔妮娅，你在明信片上又说起你提出要来米兰并有可能来看望我。这次能不能真正实现？你知道，我已经有6个多月没有看到家里的亲人。这一次我期待着见到你。拥抱你。

安东尼奥

致 妈 妈

(1927年6月6日)

亲爱的妈妈：

5月23日来信收到。谢谢你写了那么多页并带来那么多有意思的消息。你最好经常写这样的长信，并把当地的情况，哪怕你认为不重要的事情，一一告诉我。比方你信里说有8个村镇准备同吉拉扎²⁶¹合并，但究竟是哪8个呢？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会有什么后果？是否会成立由一名市长²⁶²管辖的单一的市镇政府？学校将怎么安排？是否保留各个村镇原有的小学？还是纳贝洛或多马斯诺瓦斯的孩子得每天到吉拉扎去上学，连一年级生也不例外？是否实行全镇单一税制？在这8个村镇有产业的吉拉扎的地主所缴纳的税金是否用于各村，还是只用于完善吉拉扎？

我觉得这是个主要问题。过去，吉拉扎的市镇基金极其不足，因为凡是在邻近村镇有土地的镇上居民所应交纳的地方税的主要部分都向各个村镇交纳。你应该来信谈这些问题，不要老是谈我的悲惨遭遇。关于这一点，我希望你不要有过多的考虑。诚然，我认为我的处境并不十分美妙。但是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会根据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所保持的感情而改观。我很冷静，对一切都处之泰然，充满信心。即使最近的将来是黑暗，此后的情况还是会好转的。正如我致泰雷西娜信里所说的那样，我相信我绝不会就此在监狱中了却一生。我有一种预感，我在里面绝不会超过3年，即使我被判处比方说20年。我告诉你的完全是实话，不想制造任何幻

想，因为我认为这是使你坚强起来、坚韧不拔的唯一办法。请不必为我的态度或健康担忧。你知道我的精神毅力有多大。你是否记得我们小时候的“胆量”（我们当时告诉过你没有？）：我们用石头砸自己的手指直到指尖冒出一滴血为止？今天，对于这样的野蛮考验我是畏缩的，不过我肯定已经发展了一种能够顶住事态袭击的——不论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更大的抵抗力。我近10年来的战斗生涯已使我锻炼得足够坚强。我十几次死里逃生，至今还活着：这确实是一笔无比宝贵的财产。再说，我有过幸福的时刻：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正在按照我的要求培养他们，他们将成长为两个坚强而生龙活虎的男子汉。所以，我的心情十分平静，不需要怜悯或安慰。另外，我的身体也满健康。最近6个月来我领教了各式各样的事情，发现我身体的耐力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这种抵抗力我决不会丧失，我深信我一定会再次拥抱你并亲眼看到你愉快幸福。

有时，我多么想见到朱莉娅和孩子们。我相信他们都很好，只是对孩子们有点溺爱罢了：他们的母亲、爷爷奶奶和姑姑宁肯自己饿肚子也得让孩子们有小甜饼吃，有好衣服穿。我一直没有打听到杰纳罗的确切下落：我只知道他住在巴黎并有工作，仅此而已。杰纳罗是个怪人：我认为他本人不想和我保持联系，或许他以为我在生他的气，因为我在疗养院养病时他事先没有跟我打招呼就支走了我5、6个月的薪水。至少这是我的想象，还认为他疯了。其实我知道他当时的处境，也知道他是由于我而被人打伤的，²⁶³我从来也没有要责备他或跟他要一个子儿的意思。

亲爱的妈妈，坚强起来，不要担忧，对于阿巴桑塔镇的人不要跟他们过不去。²⁶⁴热烈拥抱你。

安东尼奥

致塔齐娅娜

(米兰, 1927年11月14日)

最亲爱的塔妮娅:

几本书已经到了。《撒丁区山谷的五分之一》和蒙达多里目录已经在我的囚室里。芬克和毛拉斯的著作来了, 不过还没有送交给我。说来也怪, 我竟然要妈妈寄那本关于《山谷的五分之一》的书。我想它是我的启蒙读物之一吧, 因为它虽然是家里的藏书, 我却对它一点印象也没有。我还想要下列书籍:

1. 贝奈戴托·柯罗齐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和历史》(拉特利泽出版社出版, 巴里)。

2. 《马基雅维利选集》, 朱·普雷佐里尼编辑, (特雷维斯出版社出版)。

3. 马里奥·索布雷罗的《彼得与保罗》(特雷维斯出版社出版)。

4. 1927年8月便览。

5. 佛罗伦萨出版家瓦莱奇的图书目录, 你可以向斯珀林书店索取。打听一下《马基雅维利全集》²⁶⁵是否按佛罗伦萨的巴贝拉出版的《全集》格式出版, 如果是的话, 问问价钱。恐怕售价太贵, 至少也得100里拉左右, 看来只好将就点弄套特雷维斯版的《选集》得了。在马基雅维利逝世400周年之际, 我把我能读到的5种日报上所发表的全部(纪念)文章都读了。后来, 我收到了一本《佛罗伦萨之狮》²⁶⁶的纪念马基雅维利专辑。我所得到的印象是,

这些纪念文章的作者没有哪一位论证过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同同一历史时期欧洲各国的发展的联系。由于受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纯粹道德说教问题的迷惑，他们没有认识到马基雅维利是关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民族国家的理论家，——换句话说，他是在意大利，把伊丽莎白在英国、信奉天主教的费迪南德在西班牙、路易十一在法国以及伊凡雷帝在俄国所致力完成的大业，进行了理论概括。即使他本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上述任何国家的发展，他们提出了这个时期的历史问题，而马基雅维利则凭自己天赋的直觉去理解这个问题并加以系统阐发。²⁶⁷

罗罗嗦嗦说了一大通，大概只是由于天性温柔才使你能耐性看下去，好啦，拥抱你，亲爱的塔妮娅。

安东尼奥

致朱泽佩·伯蒂

(1928年1月30日)

最亲爱的伯蒂：

13日来函一星期前已到达，当时我（每周）两封信的限额已满。此间乏善可陈：照例的卑劣和沉闷。连书报也渐渐失去其吸引力。虽说如此，我还是大量阅读，但只是机械地、没精打采地读而已。我虽然也同人交往，但每天至少读一本书——什么书都看，这你不难想象（连费尼莫尔·库珀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我都重看了一遍），有什么书取决于监狱租书处认为图书怎样分配恰当。最近一两个星期我还看了家里寄来的几本书，但也不是什么极其吸引人的著作。下面就说说究竟是哪些书，以资消磨时间吧。

《“法兰西行动”与梵蒂冈》²⁶⁸。这是“法兰西行动”发表的所谓“黄皮书”：一部由文章、演讲和通告汇编而成的集子，其中不少内容我早就知道，因为在1926年的《法兰西行动》上已经发表过。书中对这一冲突的政治实质讳莫如深。它只包括关于信徒的所谓“混合问题”与“正当自由”的“教规式”讨论²⁶⁹。你明白问题的真相：法国有一个以德·卡斯特尔诺将军为首的大规模天主教组织，有点象我们意大利的“天主教行动”。²⁷⁰在1926年法国政治危机以前，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唯一的政党，它把自身嫁接于这个组织并利用了它的各种可能性（比如说，每年4、5百万捐款）。换句话说，天主教势力完全受毛拉斯和多代政治冒险的后果所左右，他们在1926年曾安排了一个临时政府班子，准备在（政府）垮台时上台执

政。梵蒂冈担心出现新的孔布式反教权法律的浪潮，²⁷¹ 决定同“法兰西行动”彻底决裂，并组织一个人民民主党作为议会中心，奉行布里昂—普安卡雷政策。出于不言而喻的理由，“法兰西行动”只公布了半奉承的和温和的文章；粗暴的人身攻击性质的东西则专供《逗闹》杂志²⁷² 发表，它是周刊，无意文版，不是正式的政党机关刊物；但这些东西在那本书里是不发表的。我看到正统阵营已经公布了对“黄皮书”的答复，编者是雅克·马里坦，²⁷³ 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公认的正统知识界领袖。这是梵蒂冈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马里坦在 1926 年写过一本为毛拉斯辩护的书，在这之前还在一个同样性质的宣言上签过名。目前，既然这些知识分子转向脱离，君主主义派必然越来越孤立。

亚历山德罗·泽瓦埃斯著《第三共和国史——1870 年 9 月至 1926 年的法兰西》，很肤浅，但真逗。掌故，旁征博引，等等。它起一种提示作用，使人回想起法国议会生活和记者生涯中的一些主要事件。

罗·米歇尔的《当代法国》。这本书是个骗局，它把论述法国生活中某些极端顽固方面的毫无联系的文章拼凑在一起。米歇尔由于出生于普鲁士的莱茵区即罗马传统和条顿传统汇合的区域，他便以加强日耳曼人与新拉丁族之间的友谊为己任。他集两种文化的糟粕于一身：条顿市侩的厚颜无耻和南方人的华而不实。此公否认自己的日耳曼血统，以此当作帽徽来标榜，他给他的一个儿子取名为“马里乌斯”，又借此大做文章说是为了纪念征讨辛布里和条顿部落的大捷；²⁷⁴ 我以为此人极其虚伪，一心想在学术界出风头。

戈夫雷多·马梅利逝世 100 周年纪念文集（金蒂雷等撰写）。弗朗切斯科·克里斯比的《千人军》第 2 版是这些书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本。就说这些吧，因为我不想提其他一些内容荒诞、没多大

意思的书。如有可能请来信,不过我能想象得出,这一方面,你比我还要困难。谨致亲切的问候!

安东尼奥

致塔齐娅娜

(米兰, 1928年2月27日)

最亲爱的塔妮娅:

……朱莉娅的信对我的心情起了镇静作用。我会单独给她回信, 如果可能, 将写得详细些, 因为我不想责怪她, 但又想不出怎样才能心平气和地给她写封长信。说实在的, 她不舒服或心烦就不写信, 你认为这对吗? 我认为,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 她越应该比平常更频繁更详细地给我写信。不过我不想把这封信变成喋喋不休的数落。

作为闲聊, 我给你说说有关小型“监狱”讨论会的情况, 那是断断续续进行的。有一位难友, 我想他不是福音派教士便是卫理公会派或长老会派教友²⁷⁵, 他对于我国的一些城市没有下令禁止贫苦的中国小商贩兜售小摆设一事极为愤慨, 这些小玩意儿无疑是在德国大批制造的, 但看来我国的同胞却以为它们至少体现了中国民俗的一个小小的方面。照我们这位福音派教士的说法, 这种买卖已经构成对西方信仰和思想方式的纯洁性的严重威胁。他认为这是把亚细亚偶像崇拜嫁接在欧洲基督教信仰的砧木上。这些小佛像可能具有某种特殊的魅力, 足以对欧洲人的心理产生强烈影响并有助于形成截然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新的意识形态。象这位福音派教士这样的人物居然为这类事情担忧, 这确实很有意思, 尽管这种担忧是出于对遥远的未来问题的考虑。如果向他指出下列几点, 不难把他逼入思想的迷宫而出不来;

1、佛教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由来已久，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深远得多，因为整个中世纪，从阿拉伯人入侵到公元 1200 年前后，佛的生活在欧洲被公认为被教会尊为圣徒的基督教殉教者的生活一样，只是在好几个世纪以后教会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恰如其分地使假圣徒还俗。在宗教具有强大活力并且是民众的唯一思想方式的年代，这般情节势必具有极大的影响。²⁷⁶

2、佛教不是一种偶像崇拜。²⁷⁷如果说在这方面存在什么危险的话，那毋宁说它存在于已经传入欧洲的黑人音乐和舞蹈。这种音乐已经征服相当一部分有文化教养的欧洲人，而且达到真正狂热的程度。不能设想黑人围绕着他们所崇拜的偶像跳舞时不断重复的姿势或爵士乐队固定不变的切分节奏会不产生思想影响。这是一种流传极广的现象，对千百万人特别是青年人不断施加影响。它产生着具有深远影响的极其强烈的印象。再说，它是通过音乐即通过今天现存的最具有世界性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这种语言能够传播一种古老原始文化的意象和一般印象——这种文化不仅与我们的文化相异，而且较之亚细亚文化也确实更为简单，——因而可以通过音乐和舞蹈向整个精神世界扩散并被吸收。这位可怜的福音派教士已经相信，尽管他害怕变成亚细亚人而惴惴不安，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在变成黑人，而且这个过程已经处于前期，至少是混血期。我不知道他的情况究竟如何，不过我猜想他已经不可能抛弃边听爵士音乐边喝咖啡的习惯，而且从今以后将更仔细地照镜子来观察其血色的变化。

亲爱的塔妮娅，祝你迅速彻底康复。

你的亲爱的
安东尼奥

致塔齐娅娜

(图里, 1929年4月22日)

亲爱的塔妮娅:

4月13日及19日寄来的明信片均收到, 眼下我正耐心地等待着家里的消息。在那咱们一起度过的片刻里你一定注意到我已经变得多么有耐性。过去, 我总是勉强克制自己要忍耐, 以便同笨蛋和厌物相处(根本无法避开他们)。如今我已不再有任何紧张感——监狱的惯例和自卫的本能已经使我养成了忍耐的习惯。有时我变得麻木不仁或漠不关心, 这种精神状态缠住我不放。要是看到我这副模样一定会使你很难过。事实上, 这种心情并非近来才有。朱莉娅对我说过, 你母亲早在1925年就感觉到了。那时我就象基普林笔下的独眼山羊, 老是围着圆心等距离地转圈。算啦, 咱们还是谈点较为愉快的事情吧。

玫瑰得了日射病, 所有的叶子和娇嫩部分都烧焦了, 尽管外表部分受到严重损害, 但它正在重新发芽。不, 它还没有死。曝晒之灾必然发生, 因为风刮掉了那张我不得已用来替它遮荫的薄纸。要是用一把稻草就好了, 因稻草几乎不导热, 就可以使玫瑰免受阳光照射。总的来说, 预后良好, 即使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发展的话。种子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幼苗: 一整批种子推迟了地下²⁷⁸生长期。当然, 这些种子是陈旧或被虫蛀了。那些得以破土而出的种子生长缓慢, 并产生了某种无法辨认的东西。那位对你说这是批好种子的园丁, 他的意思或许是说可供食用。实际上, 有些幼苗模样挺怪, 有点象洋芫荽和小洋葱——肯定不是花。每天

我都想揠苗助长，但总是在关于培育与万物的两种想法之间摇摆。我究竟应该效法卢梭，让一切听任自然的安排（自然从来不会犯错误而且基本上是好的）呢，还是应该利用巧妙的人工和权力的法则故意违反自然发展过程？直到现在，这两种思想还在我的头脑里斗争。但是，六株菊苣苗却随遇而安，不怕阳光照射，已经枝叶亭亭，将来一定能开花结实，有所收获。大丽花和竹子仍在地下沉睡，至今未有成活的迹象。尤其是大丽花，看来不会有希望了。为避免遗忘，我现在就请你寄4种别的种子：（1）防风胡萝卜（一种童年时代家乡纪念：战前在萨萨里，胡萝卜有时每根重达半公斤，卖一索尔多²⁷⁹一根，销路比得上甘草）；（2）豌豆；（3）菠菜；（4）芹菜。我想在3平方英尺的地里种上4、5种不同的种子，看看情况如何。这些种子，你到杜奥莫广场或布埃诺斯·阿依莱斯路的英杰诺利店里去买，并跟他要一份说明，好知道哪个月种植最为适宜。

我收到马尔维娜·桑纳女士从科西嘉岛独立23号寄来的另一张便条，²⁸⁰请把下列口信转达给她：

“我明白，去买我所开列的那本书要化很多钱。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到了，但我认为，回答向我提出的问题是我的责任。下面我准备就这些问题以及同狱中每个人都有关的事情谈一点看法：怎样才能避免浪费时间继续学习？首先，必须去掉各种‘学究式的’态度，不要梦想参加各种正规的系统的讲习班。即使处在最有利的环境里，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最有收获的学习科目之一是各种现代语言——只需要一部语法，化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在旧书摊上买到。即使不能学会正确地用这门语言讲话，但可以学会阅读，这一点很重要。

“其次，不少囚徒对监狱图书室的藏书估计不足。毫无疑问，所有的监狱图书室的藏书都是杂乱无章的：书籍是胡乱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不是已经出狱的犯人留赠，便是掌握出版处理品的

赞助人所捐献。其中总有大量的祈祷书和坏小说。虽然如此，但我认为政治犯应该能从石头里抽血。诀窍在于阅读时心里有个目的，并且作笔记（也就是说，如果许可你写的话）。让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在米兰时，我读过一系列各式各样的书——首先是通俗小说——，后来图书室主任允许我进去从尚未分发的书籍以及由于书中的政治或道德倾向而从不外借的书籍中挑选我想看的书。于是我找到欧仁·苏、蒙特平、庞森·杜·特雷尔等人的著作，这些书，只要从下列角度来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为什么这些书的读者总是最多、出版的次数也最多？它们满足了何种需要，满足了何种愿望？这些肮脏的书里流露了什么样的情感和观念，以致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欧仁·苏以什么方式有别于蒙特平，从内容看，维克多·雨果是否属于这个团体？达里奥·尼科德米²⁸¹的《残余》、《白鹭》和《飞翔》是否也算作1848年颓废浪漫主义的直接后代？

“下面是第二个例子：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格罗伊塞森最近出版了一本大部头著作，研究1889年以前的200年间法国天主教同资产阶级的联系。他对这个时期的一切虔诚的文献——布道演讲集、各个主教管区的教义问答集等等——进行研究后，汇编成一本精采的书。我以为这就足以证明能够从石头里抽血——果真如此，岂非周围连石头也不存在了！任何一本书，特别是关于历史的书，都是有益的。在监狱里不管弄到什么书，都是饶有趣味的，因为在这里，决不能用普通的尺度来计算时间。”

亲爱的塔齐娅娜，我写得过长，恐怕你辨认我那潦草的笔迹已经感到厌倦。顺便提一笔，除非我提出要求，不要寄任何书给我，务希照办。如果有任何你认为我应该读的书问世，买了以后放在一边，以备随时邮寄。最亲爱的，我希望这次出门不至于使你精疲力尽。热烈拥抱你。

安东尼奥

致塔齐娅娜

(图里, 1930年1月13日)

最亲爱的塔妮娅:

你的信耽搁了好几天才送来, 因为要补交超额邮资。这肯定是搞错了。你一定是从图里寄出的, 所以贴25分的邮资没有错。我们必须提意见。虽然邮局这一次是搞错了, 但是你要明白, 前几次它可没有弄错: 你的明信片写得太满, 都写到地址栏去了, 你绝不可在“邮政明信片”这几个字之上写字, 或许也不准在国徽之上写字。我只好交40分钱的超额邮资, 为了办理必要的手续, 明信片有时会被耽搁3天。

谢谢你带来了家里消息。至于我的心情, 我想你是难以完全理解的。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种事情对于任何人都是难以完全理解的, 因为它是由那么多因素构成的, 其中有好多因素几乎是无法想像的; 因此, 对于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一般状况, 也就更无从设想了。最近几天, 我一直在读《从1848到1861年》, 这本书收录了有关阿布鲁齐爱国人士西尔维奥·斯帕文塔²⁸²书信、文章和文件。斯帕文塔于1848年当选为那不勒斯王国议员, 在全国起义失败后被捕监禁, 后经法国和英国说项, 于1859年获释。随后出任大臣, 成为1876年以前右翼²⁸³自由党的最著名人物之一。我觉得, 在他的好多书信中, 在那个时代的语言中——换句话说, 情调相当浪漫和感伤——他完全表达了我目前常有的类似的心情。比方说, 他于1853年7月17日寄给他父亲的信里写道: “我已经有2个月没

有接到您的信；至少有4个月没有得到姐妹们的消息；至于伯特兰多[他的弟弟]，已有好长时间音讯不通了。您一定理解像我这样一个人，天赋一颗年青火热的心，这样与世隔绝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根源。我并不认为我的亲人今天已经不象过去一贯的那样爱我了；但是逆境通常有两种后果：它往往抵销了一切对受害者的爱，而且还往往使受害者丧失一切对他人的爱。我担心，在这两种后果中，在我身上所表现的第二种要大于在你们身上所表现的第一种。虽然我置身此地断绝了一切人际交往和爱，但是，那极度的寂寞、长期的幽禁、以及唯恐被世人所遗忘的猜疑，使我的悲痛与日俱增，使我的情感逐渐熄灭”。

正如我刚才所说，不管语言如何（语言是与时代的感情潮流相一致的），作者的心境却被生动地反映出来了。我感到欣慰的是，斯帕文塔不是个软骨头或爱哭鼻子的人。他是1848年所判决的600多名（政治）犯中始终没有请求那不勒斯国王恩准缓刑的少数犯人（约60名）之一。他也没有转向宗教，反而不断宣称他日益坚信：只有黑格尔的哲学提供了一个真正理性的、符合时代思潮的体系和世界观。

我的心情同1848年的这位政治犯相同，你明白其实际意义是什么吗？其意义就在于：从今以后我将认为这种心情相当滑稽是，可笑的时代错误。经历了3代人的时间，各方面都已有所进步。祖父辈时代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到孙子辈时代就不再有可能（我决不以我们的祖父辈为例，因为我的祖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你，事实上是波旁政权的宪兵队的上校，或许就是逮捕斯帕文塔——一位反波旁的、查尔斯·艾伯特的支持者——的执行者之一）。这是从客观上说，因为从主观上说——即就个人而论——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亲爱的塔妮娅，昨天是你的命名日。我想过但愿能口头表达

我对你的良好祝愿，但事实上我只能在第二天以书面形式把这些祝愿寄去，你只有在几天以后才能收读。我希望到那时你的身体将会好转并能出去走走，如果继续是今天这样的天气的话。你到图里来探望，同我谈半小时左右，旅途劳顿，遂致卧病，你知道我为此心里多么难过。我认为你对自己的身体照顾不够；我记得当初我在疗养院里见到杰妮娅时她的身体差不多也这样，后来我们彼此更了解以后，我曾吓唬她说，要是她不吃东西就要揍她。别的不说，光她不听医生嘱咐，把规定要她吃的鸡蛋藏起来，竟攒了好几百个。你母亲听说后乐得哈哈大笑，还说我吓唬得对。对你也得施加一点温和的强制。我认为你已经失去了为自己而活下去的愿望，只是为别人而活着。难道这种想法对头吗？你不是愿意为别人而更好地活着吗？如果这是你所珍惜的生活目的和人生真谛，那就也要为自己而活下去，要保重身体。我很喜欢你，愿意看到你永远坚强、健康。一想到你为了给我一点小小的安慰，解除我的寂寞，竟落得在图里这里缠绵病榻，心里就难过。好啦，不谈这个吧。这封信本来应该写给妈妈的。你代劳给她去封信，免得她因为收不到我的信而惊恐。

拥抱你，我亲爱的。

安东尼奥

致朱莉娅·舒赫特

(图里, 1930年2月10日)

最亲爱的朱莉娅:

在回想各种往事的时候,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国家书店²⁸⁴不但对外文书籍的译者付报酬,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对翻译选题的推荐者付报酬,如果他的推荐被采纳的话。因此我偶然想到向你推荐几本书,根据我目前的处境,我所了解的情况必然是不确切不完全的。不过这样做会使我比较容易找到写信的素材,因为我讨厌写些老生常谈,而我的生活又不能提供多少愉快而有趣的话题;顺便,我要让你领略一点有关意大利精神生活中最基本的和公认的思潮的评述。

去年出现了一本书的新版,这本书如今在欧洲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古代世界的资本主义:罗马经济史》,204页,拉特尔泽出版社出版,巴里²⁸⁵。该书初版于1906年问世,是从意文手稿译成法文后出版的,受到普遍的好评;不久即由卡尔·考茨基²⁸⁶译成德文,我想也译成俄文和其他文字。这本书是针对蒙森²⁸⁷所创始的,把一切“货币”经济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²⁸⁸的倾向。索尔维奥利对马克思不同意蒙森这一观点的相反意见作了中肯的论证。这一倾向,通过一位在英国教书的俄国历史学家罗斯托夫捷夫²⁸⁹教授的影响,在意大利则通过古·费莱罗²⁹⁰的追随者巴尔巴加洛教授²⁹¹的影响,现在已经具有可怕的分量。索尔维奥利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去年在那不勒斯大学讲课时去世),接受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但是已被贝奈戴托·柯罗齐修改过的意大利式的,即

不是作为总的世界观，而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实际准则。²⁹² 这本书的意大利文新版对原来的法文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增补了学术上的最新成果，删除了1906年曾经是热门的论战成分，由于作者在修订完成前去世，所以它几乎完全是一部新作。这本书的译者必须精通意大利文才能理解不规则的句法和相当累赘的句子。

另一本最近新书是现任议员弗朗切斯科·埃尔科利的《从市镇到专制国家》，一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公共法律的论文集（瓦列基出版社，佛罗伦萨，1929年版，第381页²⁹³）。它包括4个方面的研究，从非意大利文化的观点看，是多采而有趣的。第一，《中世纪末的等级斗争》，当然使意大利以外的人感兴趣的题目，既可以根据自己的权利写成本精采的小册子，也可以写成一篇文章供主要期刊发表。书中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对历史的天真想法的例子，比如认为佛罗伦萨的奇奥姆皮²⁹⁴运动的失败是件幸事，因为它使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繁荣得以发生。但也有一些很有意义而冷僻的资料（即战时在期刊上披露的档案文件，虽说公开发表，但实际上对非会员来说还是秘密的），这些资料透露了佛罗伦萨在1340—1350年期间想把被工匠行会拒之门外的作坊工人组织起来的种种努力及其在政治上的重大反响，等等。²⁹⁵

埃尔科利遵循和索尔维奥利相同的历史编纂学方向——所谓的经济—法律学派，这个学派部分地更新了历来以学术和修辞见长或至多以渊博和文字取胜的历史方法。

我不知道以上所述是否对你有用，也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和是否有机会加以利用。但不管怎么样，它使我产生了就某个题目写信给你的动机，而不是谈谈天气和我的神经系统状况：这类研究是唯一能使我感兴趣的事情，也是我目前所能做到的最佳消遣。你为什么谈谈朱利亚诺以及德利奥的智力发展情况？吻你。

安东尼奥

致塔齐娅娜

(图里, 1930年12月1日)

亲爱的塔齐娅娜:

你寄给我的药品及其他物品的邮包收到。套袜很精致, 不过我怕我的鞋是它们的剋星。无论如何, 一双袜子决不会不到一星期就磨破。给我寄什么“笨福赐仿”之类的补药或你上次寄来过的那种镇静药, 毫无意义: 因为我肯定这类药对我不起作用。我需要什么, 会写信通知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卡洛离开图里后至今没有来信, 但我能清楚地想象到原因何在。眼下我不需要钱——我还有870里拉, 足够好些日子花的。已有好几月不准我们接受烟卷, 但我们可以搞到散装烟。我跟卡洛提起过, 我被关在罗马监狱时, 我收到过不是他便是你送来的一盒土耳其烟, 我对它的评价很高, 因为它很象意大利早先的不掺美国烟丝的马其顿牌烟卷。我记得当时卖4.20里拉一包; 现在也不会大涨价, 因为外国烟叶提价的幅度很小。如果你愿意关心这件事, 不妨留心是否还能买到; 但只稍寄一点来即可, 以防万一不是那种牌子, 我们决不能花冤枉钱。我只能抽马其顿牌那样和醇的烟。

如果你能在哪家罗马书店买到卢易吉·卢索教授²⁹⁶主编的《新意大利》10月号, 那我是非常高兴的, 你把它交给朱莉娅。该期杂志刊登了一封信, 介绍最近在牛津举行的国际哲学家大会上柯罗齐与卢那察尔斯基²⁹⁷之间发生的一场彬彬有礼的争论: 是否

存在——或者，是否可能存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美学。这封信可能是柯罗齐本人亲笔，或者至少是一位他的门徒所写，行文十分奇特。

根据那封信的说法，柯罗齐似乎以一种老前辈的爱护和幽默的口吻答复卢那察尔斯基所提出的评论，引得与会者忍俊不禁，全场哄然。似乎卢那察尔斯基并不了解柯罗齐对历史唯物主义作过广泛的探讨，发表过大量的文章，不管怎么样对这个问题是极为熟悉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十分离奇，因为柯罗齐的著作有俄译本，而卢那察尔斯基又精通意文。

从这封信中还可以看出，柯罗齐前几年对历史唯物主义所持的立场，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柯罗齐竟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标志着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中世纪神学，回到康德和笛卡儿以前的哲学²⁹⁸。这简直是闻所未闻，不免令人怀疑这位高贵的殿下是不是有点儿爱打瞌睡，比荷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知道他是否将对这个题目作一系列的札记。如果他已经作了，那倒是妙极了，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援引他本人著作中的某些论述予以回敬。我以为柯罗齐在施展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哗众取宠的手法，他的批评，已经不成其为历史—哲学的批评，完全是一种一望而知的别有用心的固执。不少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家已经陷入某种类似中世纪神学的哲学立场，并把“经济结构”变成某种隐藏着的神——这种说法或许有所依据，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就象一个人想要通过议论贝加莫农民的迷信来指责天主教和耶稣会一样。柯罗齐对历史唯物主义所持的见解，如同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对待路德宗教改革那样。埃拉斯默说过，“路德登场，文明消亡”²⁹⁹；然而今天，历史学家，甚至柯罗齐本人，无不承认路德和宗教改革是包括柯罗齐本人的哲学在内的一切现代哲学和文明的发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无法想象：一个道德和精神再生的伟大时期，由于

它通过如同路德教那样声势浩大的各界民众的卷入而体现出来，在当时竟会呈现为残暴和迷信；也无法想象：由于德国人民本身——不只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精英——是改革的倡导者和旗手，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朱莉娅是否能打听到，其他地方的知识界是否把柯罗齐同卢那察尔斯基的这场争论继续下去。

也许你还记得，早些日子我曾向政府首脑³⁰⁰ 提出请求，准许阅读某些禁止我阅读的书，以及另外两本我已托人购买而尚未获得的书：福洛普·米勒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面目》，克齐奥·马拉帕特³⁰¹ 作序（邦皮亚尼出版社出版，米兰），以及列甫·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蒙达多里出版社出版，米兰）。（托洛茨基这本书的书名是否确切，我不敢肯定）。我获得了同意的答复，因此请你写信通知书店，要他们把书寄给我。我还想要下列书籍：（1）贝奈戴托·柯罗齐的《哲学的永恒性和历史性》（丛书，里埃蒂）；（2）亨利·德·曼的《愉快工作》（应为《为愉快工作而斗争》——译者）（拉特尔泽，巴里）；（3）皮亚乔·里古齐的《帕尔马地区的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拉特尔泽，巴里）。再有，说到我向政府首脑提出要求，如果卡洛打算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你最好劝阻他别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事实上一切都相当顺利。

最亲爱的，不多写了，就此搁笔。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我自己抹掉了几行：倒数第2页上的最后几行和本页的第1行。你如给卡洛写信，请转告他，我很遗憾，他这么长时间不给我写信，我也不知道妈妈身体如何。

对于你寄来的漂亮的套筒，请允许我表彰一下，好吗？袜子的确美观，不过用那么厚实耐磨的料子缝制肯定非常费力而难做。我从心底里感谢你。

致塔齐娅娜

(图里, 1931年9月7日)

亲爱的塔齐娅娜:

……你8月28日来信提及我的“意大利知识分子”研究, 谨复如后。你显然跟皮埃罗谈过, 因为有些情况只有他才能告诉你。³⁰²不过实际情况同表面印象有很大出入。我10年记者生涯所撰写的文稿, 足可以出400页一本的书15至20部; 不过这些稿子都是每天赶出来的, 所以, 我想, 发出去以后也就忘了。我一向不肯编自选集, 哪怕是薄薄的小册子。1918年, 科斯莫教授³⁰³提出, 可否由他把我每天在都灵报纸³⁰⁴上发表的文章编选一部分, 加一篇极为有利而体面的序言, 结集出版, 但我谢绝了。1920年11月, 朱泽佩·普雷佐里尼³⁰⁵使我接受了他的提议, 让他的出版社印一本实际上是专著的文选。1921年1月, 我决意赎回手稿, 赔偿了已经付印的那部分稿子的费用。还有, 1924年弗朗科·恰尔兰蒂尼约请我写一本关于《新秩序》运动的书, 拟作为丛书之一种出版, 这套丛书的撰稿人有麦克唐纳、龚珀斯³⁰⁶等。他答应, 我的稿子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改动, 也不加序或注。一个法西斯出版者肯答应这样的条件出书, 这是十分吸引人的, 但我还是谢绝了: 我至今不知道接受这个约稿是否较为明智。皮埃罗的情况不同——他写的东西都是经济学方面的, 专业刊物乐于接受并展开长篇大论的讨论。参议员伊诺迪³⁰⁷的一篇文章宣称, 皮埃罗正在编一部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集评; 伊诺迪和我一样, 对这个计划表示欢迎。我但愿自己

的英语精通到在这本书问世时能够阅读李嘉图的原著。我所制定的关于意大利知识分子研究的计划,涉及的面很广,因为我相信意大利还没有这样的专题论著。这方面的资料肯定有,而且还不少,只是分散在浩如烟海的报刊和地方历史档案中。无论如何,我的知识分子概念比一般的“大知识分子”概念要广泛得多。

这个研究也将涉及国家的概念,一般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即,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构——,而不把它看作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力,我指的是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团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因为知识分子总是首先在市民社会里发生影响。比如柯罗齐就有点象一位世俗教皇,是领导权的一种极有效的工具,尽管他有时好象同掌权的政府有矛盾。我认为,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这一概念将使中世纪公社解体的原因或原因之一得到说明。当时的公社是由某个经济等级管理的,这个等级不懂得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以行使超专政的领导权。意大利知识分子具有以神父为典籍的世界性,而不是民族大众性。为什么莱奥纳多会把他设计的佛罗伦萨防御工事平面图出卖给瓦伦廷诺公爵,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些公社结成一个工团主义的国家,从未能超越这个阶段而演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马基雅维利虽然不断指出这一点,但也是徒劳。马基雅维利曾经寄希望于增加和发展军事组织能形成城市对乡村的领导权,因此,他可以被称为第一位意大利的雅各宾。(第二位是卡洛·卡塔尼奥³⁰⁸,不过他太沉湎于幻想。)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较之公社的发展,文艺复兴是一个反动的压制的运动。³⁰⁹

我之所以谈以上各点,是为了向你证明:意大利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从罗马帝国到复兴运动时期,都可以作为一个专题加以研究,著书立说。如果我自认为胜任而当局又允许我干,我就写一个

至少50页的有关这个题材的研究提纲寄给你。不消说，搞到我所需要的书，我会多么高兴，这会启发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我以后要写的某一封信里，将对撰写研究但丁《地狱篇》第10章的文章³¹⁰可能使用的几个论点写个摘要，好让你寄给科斯莫教授。作为但丁专家，他能够告诉我是否击中要害，以及是否值得写篇文章，哪怕是篇短文，来为数以百万计的已有评注锦上添花。

安东尼奥

致塔齐娅娜

(图里, 1931年10月12日)

亲爱的塔妮娅:

你10月10日寄出的明信片收到,但并不能因此而使你2日来信变得较为惬意。³¹¹那封信,尽管并不特别刺耳,但却使我感到不舒服。你说我在扮演盲人爱好者,还说我想要“将你的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应该跟你好好谈谈,但又决定今后最好避免所有这类不愉快的事件。(我颇费踌躇地使用一个较为陌生的字眼。)你先前对我过去的记者生涯的议论中,有一句话,如果使用夸张的笔法,不折不扣地是“一支劲射之下必然伤人的利箭”³¹²。我决不是那种有奶便是娘、靠撒谎起家的职业记者,我决不同意撒谎是职业记者的看家本领的说法。作为一名记者,我是完全独立的,并且坚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决不肯为了讨好报馆老板及其所豢养的那帮人而被迫隐藏我最强烈的信念。

我明白,我说你对犹太人的态度变了,这句话使你感到不舒服。事实上,你根本没有变,因为你的来信表现出这种混乱。你的头几个结论直接通向排犹主义,接着,你的口吻却象一位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后,你的话又象出自那种上了年纪的犹太教士之口,他们反对取消犹太人聚居区,原因是担心取消这种种族隔离的聚居区会改变“种族”,并使犹太民族借以团结并保持独立存在的宗教联系松弛。说想跟你讨论这些问题,那是误会。倒不如开开玩笑,谈谈英国人的“冷淡”,法国人的“火气”,德国人的“忠

诚”，西班牙人的“气派”，意大利人“刻苦办事的策略”以及斯拉夫人的“迷恋”——完全是畅销书和一流影片的好材料。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还是想问问你并且弄明白：谁是“真正”犹太人或“普通”犹太人，或就此而论的“普通”人。我怀疑，这样的人是否应该到人类学或社会学博物馆里去找。还有，“战神”的概念或圣经上关于“选民”及其使命的说法（这让人想起威廉在战前的一篇演说），对于今天的犹太人又有什么意义？马克思说过，当基督教徒变成犹太人并吸收了犹太教的本质即投机的时候，犹太人问题便不复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整个欧洲摆脱投机即一般犹太教，那时才会出现犹太人问题³¹³。我以为这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但是，这不排除承认犹太人聚居区有其独立文化（语言、学校等等）的权利，以及如果某些犹太人聚居区能够以某种方式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边界的他们自己的领地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其他一切，在我看来，只是犹太复国主义小知识分子故弄玄虚的幌子，不足挂齿。种族问题，除了在人类学上有意义，此外别无意义。早在基督时代，犹太人就不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了。犹太语只用于礼拜仪式；他们说阿拉姆语。这是一个已经忘掉了自己的古代语言因而丧失了其历史遗产的最重要部分——他们原始的世界概念——，并吸收了征服者的文化和语言的“种族”。那么，“种族”意义又何在呢？很明显，你心里有一个新的现代社会，它既保持聚居区生活的消极性和否定性的痕迹，同时又能赋予自身以新的“性质”，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情况。

你论述这些问题时不使用历史的方法，等到你想知道为什么某些哥萨克集团相信犹太人有尾巴时才要求作出历史的解释，我认为这是很奇怪的。据一位犹太人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笑话，这位犹太人在1920年俄波战争期间曾任一支奥伦堡哥萨克突击队的政委³¹⁴。这些哥萨克人在自己家乡从未见过犹太人，受官方教士宣

传的影响，把犹太人想象为谋害上帝的凶恶刺客。他们怎么也不信这位政委是犹太人。他们总是说：“你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你不是犹太人。你和我一道打仗，身上留下那么多波兰人砍伤的刀疤，你怎么可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不是这个样。”在撒丁，对犹太人有种种的怪论。首先，有人把犹太人说成是神话中可怕凶恶的怪物；其次，有“犹太人杀害基督”之说；不过，也有“善良的犹太人”，例如帮助玛丽把基督从十字架上救下来的尼科德马斯便是。但是，对于撒丁人来说，犹太人绝不是现实存在。如果找出一个犹太人，他们便问他是否像尼科德马斯，但在他们的心目中，犹太人通常是赞成杀害基督的坏基督教徒。还有一个来源于西班牙文 *marrano* 的名词 *marranu*（被迫改宗者），用来说明犹太人的皈依天主教是假装的；但在撒丁用这个词来称呼人是一种粗俗的侮辱。撒丁人决不象哥萨克人那样轻信宣传，因此并不对犹太人另眼看待。

就我来说，问题到此结束，不打算对这个题目作进一步的讨论。除了人类学和研究史前文明的需要，我对种族问题毫无兴趣。你对不同文明时期墓葬意义的评论，也同样没有什么意思。这对研究古代有效，因为墓葬是唯一的保存下来的遗迹，其中有殉葬的日常生活用品。但无论如何，这些墓葬可以使我们对古墓建成的那个时代有一个很粗浅的概念，并且也只能使我们了解一点点当时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另外，墓葬只是反映统治和富裕等级而且往往是征服者的生活情况，决不是人民本身的情况。我本人不是纯血统：我父亲是近代的阿尔巴尼亚裔³¹⁵——我们老家是1821年战乱时期从伊皮鲁斯逃到意大利后不久归化入籍的。我祖母是贡萨莱兹人，是意大利南方（在西班牙统治结束后，许多西班牙人继续在当地定居）一个意—西血统家庭的后裔。我母亲的父母都是撒丁人，但撒丁只是在1847年才同皮埃蒙特合并；以前，皮埃蒙特的君主们在用西西里岛换取撒丁岛后（因为西西里岛隔得太远，难于守

卫),一直把它看作自己的领地。虽然如此,从文化教养上说,我基本上是个意大利人,这就是我在这里的身世。我从来不因自己的身世而左右为难,但有人却抓住这一点在1929年3月的《意大利日报》上对我大做文章,用两栏的篇幅来解释我在都灵的政治活动的原因,说除其他因素外,同我是撒丁人而非皮埃蒙特人或西西里人有关。至于我是阿尔巴尼亚裔这件事却从未有人提起,因为克里斯比也是阿尔巴尼亚裔,而且在那里上的学,还讲阿尔巴尼亚语。但是,在意大利,种族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在利古里亚,如果有个水手带回一个黑人老婆,谁也不会大惊小怪,谁也不会想要走过去用沾水的手指去抹她一下,看那黑色是否会褪掉,谁也不会去揣测那黑色是否会沾污床单。

你信上说要寄点药给我。请千万别再寄穆戈利奥或阿比西尼亚药粉。真正对我有益的药只是酵母片,已经剩下不多,只够4天服用。请照我的嘱咐办。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致塔齐娅娜

(图里, 1932年4月18日)

亲爱的塔妮娅:

谢谢你抄录了朱莉娅那封细述德利奥身体情况的信。

我准备服用“索马托斯”药片, 这我已跟你说过。既然我已准备试用, 你就不必再劝说了。

只要我看完柯罗齐的著作, 会马上写一篇短评指点你, 但不是你所要求的字斟句酌的文章, 因为那样的文章很难仓促急就。但是我已读完了头几章, 那是几个月前单独付印的, 关于你应从何处着手, 以使你的研究有个范围并且结构完整³¹⁶, 我心里已经琢磨了几点意见供你参考。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 柯罗齐今天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主要论述哪些文化问题? 这些问题是刻不容缓的, 还是凭一时热情提出来的, 或是具有较普遍和深远的意义?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柯罗齐的活动是在很久以前, 确切地说是在大战期间开始的。要理解他的近作, 你必须重新研究他的两卷本战时文集《战争随感录》增订第2版。我虽然手头没有这两本书, 但读过它们的初版³¹⁷。

让我给你概括一下他的几个主要论点: 我们必须反对法国和共济会宣传所散布的观念, 即认为这场战争就象十字军东征那样, 是一场保卫文明的战争, 以激发原始情感和宗教狂热。战争过后是和平——也就是说, 战斗停止以后, 各国必须重新开始彼此合作; 首先, 继军事联盟之后而来的是和平联盟, 但两者未必重合。如

果把应付目前形势的功利主义政策抬到普遍范畴和原则的高度，这些不同级别的新联盟又怎么能组成？知识界有责任抵制这些荒谬宣传，并且在不削弱本国战时实力的情况下，反对形形色色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以挽救未来。柯罗齐始终在和平时时刻觉察到战争时刻，在战争时刻预见到和平时时刻；他竭尽全力想对这两种可能性提供调停。

实际的结果是，柯罗齐的观点使得意大利知识界恢复了同德国知识界的联系，这是法国人和德国人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柯罗齐的影响对战后初期的意大利政府是有益的，出于国家在那个历史时刻的最深刻的需要，必须中止法意军事同盟，疏远法国而再次向德国靠拢。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并不积极参与政治的——我指的是不热衷于政党活动——柯罗齐当上了1920—1921年的焦利蒂内阁的教育大臣。³¹⁸

可是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我们是否已经不再使用纯粹战略性的政治判断，仿佛它们已是绝对原则了呢？是否已经不再扩大意识形态使之成为哲学和宗教了呢？当然不是。因此，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战斗必须继续；当前，争端象过去一样依然存在，我们不应放弃这个斗争。

第二个问题是柯罗齐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柯罗齐在战前已经受到知识界普遍尊重。十分奇怪而且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他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的知名度远比在讲德语的国家里高。他的著作的英文版比德文版或意文版出得多。柯罗齐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世界文化领袖的地位而自豪，并且承认所应当担负的责任，这一点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著作显然是面向世界精英的。

不应忘记，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柯罗齐的史学理论著作作为当时的两个主要“修正主义”运动——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施坦和

法国的索列尔³¹⁹提供了精神武器。伯恩施坦本人承认，柯罗齐的文章使他的全部政治经济思想重新定型。索列尔同柯罗齐有密切的联系，这是早已被确认的事实，但只是在今天，通过他所公开的信件，人们才了解这种联系的深度和韧度。这些信件表明，他在精神上依附柯罗齐达到多么惊人的程度。

大战期间，特别是1917年以后，柯罗齐大大地推进了他的关于修正主义的研究。从1910年起，他发表了一系列新的论文，探讨史学理论，从《编年史、史实与伪史》算起，包括《19世纪意大利历史编纂学史》的最后几章及关于政治学的一些论文，直到他的最新著作，其中包括至少我所读过的那几章在内的《欧洲史》。对于柯罗齐来说，最要紧的是他的修正主义领袖的地位，他把全副精力都倾注在这方面了。在一封致科拉多·巴尔巴加洛教授的短简中（刊登在1928年或1929年的《新史学杂志》上，确切日期我记不清了），柯罗齐直率地说，精益求精地阐述他的伦理—政治的史学理论（指20年的思考），旨在使他40年前的修正主义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亲爱的塔妮娅，如果这种评论有助于你的研究，请告知，我将再写几条寄给你。

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2年5月2日）

亲爱的塔妮娅：

……请允许我对你研究柯罗齐新作的方法提点供参考的意见，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这部新作以书的形式正式问世。即使我的评述不是连贯的，也许对你有用。把这些评论条理化，这个任务就托付给你了。

我曾经指出，柯罗齐对他的修正主义理论研究极为重视，并论及他本人公开承认20年思考的目的在于使修正主义演变为取消实践哲学³²⁰。作为修正主义者，他对经济—法律的历史学派的形成作出过贡献，这个已经起了变化的学派，其今天的代表人物是科学院委员乔亚切诺·沃尔培。柯罗齐对他所谓的伦理—政治的史学赋予文学形式。他的《欧洲史》就准备作为这方面最优秀的样版。柯罗齐的创新是什么，这种创新是否象他所认为的那样意义重大？首先，他的理论会不会那么强有力，足以取消实践哲学？具体地说，柯罗齐的历史—政治研究只是注重于在政治学上被规定为有别于强制的“领导权”、民意和文化领导等方面，不问是由立法还是行政权力机构来行使，或是通过警察干预来体现。坦率地说，柯罗齐那么自信，认为这种观察历史的方法必将彻底取消实践哲学，原因何在，令人费解。

就在柯罗齐炮制他那自诩的武器的同时，实践哲学的当代大理论家们也在相似的方向上认真推敲自己的理论，系统地“领导

权”和文化领导要素进行重新估价，以消灭对“经济决定论”的机械论的和宿命论的观念。其实，最新的实践哲学的根本要素就是关于“领导权”的历史—政治观。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不管柯罗齐在他的领域里搞了些什么名堂，出版了哪些书，都不可能是最新成就，相反，倒有可能完全丧失他的分析批判能力。他的资料似乎来源于维也纳记者福洛普-米勒⁶²¹所写的一本声名狼藉的书。这一点应当加以分析并进一步发挥，但这样你就得写一篇很长的论文。就你的意图而论，我以上所说的要点就足够了。此刻我很难再谈出什么别的意见。

亲切拥抱你，我亲爱的。

安东尼奥

致塔齐娅娜

(图里, 1932年5月9日)

亲爱的塔妮娅:

……《欧洲史》我还没有看, 所以无法和你讨论其具体内容。不过我可以谈几点并非毫不相干的想法。我已经写信跟你说过关于柯罗齐在其最近20年的历史编纂学研究中一直致力于发展一种伦理—政治的、而非经济—法律的史学理论的情况。(柯罗齐最初是通过使辩证唯物主义服从于修正主义过程而达到经济—法律的史学理论的。)然而, 柯罗齐的历史观真的是伦理—政治的吗? 我以为, 柯罗齐的历史观必然被解释为“思辨的”和“哲学的”, 而不是伦理—政治的。这种历史观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 其原因在于它是“思辨的”, 而不在于它是伦理—政治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排斥伦理—政治的史学, 因为后者是关于领导权要素的史学; 但是“思辨的”史学, 则象任何其他的“思辨”哲学一样, 是被排斥的。

柯罗齐在阐述其哲学时宣称, 他要使现代思想摆脱一切先验论和神学的痕迹——换句话说, 就是摆脱一切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痕迹。他的这种努力竟然达到否定哲学是一种体系的程度, 因为体系这个概念本身恰恰就含有神学的痕迹。可是, 由于他自己的哲学实际上是“思辨”哲学, 他也就发展了先验论和神学的目标, 为它们利用赋予历史意义的语言提供方便。柯罗齐深深陷入自己的方法和思辨语言中, 所以这些方法和思辨语言就是他所能

使用的唯一标准。假设实践哲学真是思辨哲学而不是绝对历史主义，即完全摆脱一切先验论和神学痕迹的历史主义³²²，那么柯罗齐关于实践哲学中基础象一个隐藏着的神这个说法就适用。

对于《欧洲史》的观念和结构，我还想谈一点看法。一部统一的欧洲史，从1815年即王政复辟时期³²³写起，是否合宜？论述历史“集团”形成的欧洲史根本不能排除法国大革命和历次拿破仑战争，这些乃是该“集团”形成的“经济—法律”前提，较量和角逐阶段的反映。柯罗齐只考虑后一个阶段，即在前一个阶段被发动起来的力量在经历了不妨称之为“净化”过程后重新取得平衡的阶段。柯罗齐把这个阶段看作孤立的史实，然后把它作为他的全部历史解释的根据。他的《意大利史》也是如法炮制。柯罗齐从1870年写起，这样就可以把斗争阶段、经济阶段漏掉，以证明它是一部纯粹的、仿佛刚从天上掉下来的、伦理—政治的史学著作。柯罗齐使用了当代的批评术语，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炮制了一种新型的词藻华丽的史学，而它的目前形式便是“思辨史学”。

如果认真推敲一下这本书的中心史学概念即关于“自由”的概念，那么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柯罗齐自相矛盾，把作为哲学原则或思辨概念的自由，同作为意识形态（即在实践上起作用的统治工具及道德、领导权统一的要素）的自由混为一谈。如果全部史学都是关于自由亦即自我创造精神的史学（注意，在这里，自由是精神的相等物，精神是史学的相等物，所以，史学“等于”自由），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单独提出19世纪欧洲史是一部关于自由的历史呢？这个时期的欧洲史并不是关于哲学意义上的自由的历史，而是关于这样一种自由的历史：即它正在认识自身并转化为知识分子的宗教和人民大众的迷信——那些同知识分子相结合并自认为是某个政治“集团”一分子、把知识分子当作旗手和高级传教士的民众的迷信。那么在这里，自由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一种在实践上起

作用的统治工具。让我们考察一下它所以产生的实践上的原因。作为历史概念的自由是历史本身的辩证过程，不可能有明显的可识别的“代表人物”。即使在东方的地方总督统治时期，历史也是自由。事实上，当时就有种种历史运动，否则，地方总督统治就不会崩溃。总之，说法可以不同，措辞可以斟酌，但实际内容始终不变。

有人在《法西斯评论》撰文，闪烁其词地说，如果柯罗齐恰如其分地看待过去的20年，那么他就会在自由过程中发现对今天的历史辩护。如果你还记得我以前信里跟你论及的柯罗齐在战时的立场，那么你对他的观点就会有比较透彻的认识。作为当代历史主义宗教的高级传教士，柯罗齐实践着历史过程的正命题和反命题，一会儿强调这个，一会儿突出那个，都有其“实践上的理由”，因为他在今天预见到未来，并且同样关心未来。人人都必须尽自己的本分：高级传教士的职责就是保卫未来。给这种“伦理—政治”观即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当代翻版配一剂猛烈的道德犬儒主义，倒是十分相称的。

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致塔齐娅娜

(图里, 1932年6月6日)

亲爱的塔妮娅:

……我准备答复你提出的关于柯罗齐的问题, 尽管我不理解这些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 而且在我的印象中我以前已经谈过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你重读一下我过去信中对柯罗齐的战时立场的论述, 看是否能解开你现在的一些疑团。柯罗齐1912年同金蒂雷³²⁴决裂后, 其实是金蒂雷背叛了柯罗齐, 竭力要成为一名更加独立的哲学家。从那以后, 柯罗齐的立场始终不变, 尽管他的学说有了更加明确的解释。最重大的变化早在1900至1910年期间发生。所谓“自由宗教”不是最近才有的提法, 而是对他从抛弃天主教信仰(这在他的思想自传《自我批判》中有描述)后多年来的思想的高度概括。这不是金蒂雷所不同意的一个论点。你对“自由宗教”这个提法的解释我以为是不确切的。你似乎赋予它一种神秘的意义, 说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躲避”, 这样就含有几分逃避现实的意味。真是失之千里。其实“自由宗教”只是指信仰现代文明, 不需要先验论或天启, 能在本身内部发现其内在的理性。因此, 这个提法是同神秘主义和宗教相敌对的。在柯罗齐看来, 任何一种世界观和哲学, 只要它成为一种生活规范和道德, 即是“宗教”。公开承认的宗教也是宗教, 不过它们是“神话的”因而是同历史上的人类摇篮时代相适应的较为低级和原始的宗教。这些导源于黑格尔和维科的概念是意大利哲学唯心主义的遗产, 不管是柯罗齐的还是金蒂雷

的。金蒂雷关于在学校里实施宗教教育的教育改革就是以这个学说为根据的。金蒂雷也只限于规定在小学即儿童时期进行宗教教育。无论如何，政府无意在中学和大学课程中实施宗教教育。

我认为你把柯罗齐今天的实际处境说成很孤立，是言过其实。决不要因为目前文艺爱好者和不负责任的作者们议论纷纷而受蒙蔽。柯罗齐在科波拉和内阁大臣罗柯³²⁵主编的《政治》杂志上撰文谈他目前的想法，作了一个宽宏大量的表态。好多人相信，柯罗齐的立场对于给战后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批新领导人提供严格的政治管理教育是十分有益的；科波拉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对1815年以来的意大利历史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人数不多的统治集团有计划有步骤地吸收一切原来搞颠覆的群众运动的政治领袖的成功经验。1860年到1876年期间，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行动党就被君主政治所吸收，只剩下一点残余以共和党的名义继续存在，但已不起作用，只是一种民俗现象，而不是历史或政治现象。这就叫做“演化论”，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相反，它是统治阶级形成的有机过程，这同法国由于大革命和拿破仑、英国由于克伦威尔而发生的一切是不谋而合的。事实上，甚至在1876年以后³²⁶这个过程仍然以“分子”方式继续进行，在大战结束时积聚动量，当时从表面看，似乎传统的领袖集团不可能吸收消化在各种事态发展中涌现出来的新力量。可是这个集团十分阴险，表面不露声色，暗中神通广大，尽管这个任务极其困难，却终于办成了。在他们所施展的各种手腕中，有一条便是利用柯罗齐。他的学说很可能产生了极其大量帮助消化的“胃液”。从意大利历史的角度来看，柯罗齐的勤奋乃是今天掌权集团手中用以逼迫新力量为这个集团眼前和长远的切身利益服务的最有说服力的王牌。我相信，这批领袖人物是能够识破这个真相的，虽然表态相反³²⁷。当你把不同的物体放在一起冶炼合金，表面的泡沫只不过表明反应正在发生。再说，在这

一类的人类关系中，一致总是表现为不一致，不是戏台上的拥抱，而是斗争。但是当你深入到事实真相，在底下总有一种强烈的基本的和谐。

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注 释

现代君主

(第 321 页——第 394 页)

- 1 指洛伦佐·德·梅迪西,所谓“君主”就是指他,在全书精彩的最后一章里把他请出来“使皮特拉奇的预言变成现实:“英勇将拿起武器反对狂暴,战斗有可能是速决的,因为在意大利人的心中古代的英雄尚未熄灭”。——第 321 页
- 2 卢易吉·卢索所著《马基雅维利论》,收入1937年在巴里出版的《历史的画像和速写》(«Ritratti e disegni storici»)。该文最初于何年何月刊载于何处,未能查明。葛兰西在另一条札记中(《札记手稿》第141页)写道:“卢索在《马基雅维利论》的序言中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变成了独裁论(权力与个人的要素),把《对话》变成了领导权论(一般概念与自由的要素)。卢索的观察是正确的,尽管在《君主论》里除了权力或武力外,也提到领导权或赞同的要素。同理,下列观察也是正确的:在公侯之^①国和共和国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对立;所涉及的只是权力和普遍性这两个要素的实质问题。”——第 321 页
- 3 若尔日·索列尔(1847—1922),是革命工团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以《暴力论》(1906)一书闻名于世。柏格森和马克思的学说对他影响极大,而他本人的学说却在法国和意大利(比如对墨索里尼)有巨大的影响。他的著作是集各家之说的大杂烩,经过他的改造,反映了各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反雅各宾的道德家的,社会党人的,革命工团主义的,极右翼(事实上几乎就是保皇派的)反对资产阶级、主张恢复独裁主义道德的鼓吹者以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同情者等人的观点。索列尔在《暴力论》中提出和阐述了总罢工是神话的观点:事实上,“整个社会主义都是由神话构成的,也就是说由一整套这样的想象构成的,这种想象能够本能地唤起适应社会主义反对现代社会的战争的各种不同表现的一切感情”。“凡是人民的、党的或阶级的最强烈的倾向,统统包容在这样的神话中。”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神话同乌托邦相对照,后者“在人民心目中只

是一种靠不住的对未来的幻想”。(马志尼的“狂想”则是这种神话的另一个实例,它对意大利统一的贡献,要比加富尔及其学派的所有政治家们的贡献为大)总罢工的思想“摧毁了各种可能的社会政策在理论上的全部成果,总罢工的支持者连最受欢迎的改革也加以蔑视,因为这种改革具有中间阶级的性质,在他们看来,任何措施都无法缓和阶级战争的根本对立。”因而总罢工的中心问题就是要造成对抗阶级之间的“分裂”,办法是使个别发生的每一次暴力行动都转化为一次阶级战争的行动。对索列尔来说,“分裂”就是阶级意识和自为的阶级的同义语;例如,“当统治阶级不再敢于统治,为自己的特权地位感到羞耻,迫不及待地希望同自己的敌人握手言欢,公开宣布他们害怕社会上的一切分裂时,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认识到必须坚持这种分裂的观点,否则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作用,就格外困难了。”(《暴力论》,《烧炭党丛书》1950年版第124--126,133—135、186页)——第 321 页

- 4 关于亨利·柏格森的关键概念“生命冲动”的详细内容,参看他的《创造进化论》第 1 章的最后一节。柏格森说,“机械论”“向我们表明机器在外部环境影响下逐步形成的过程”,而“目的论”则说“万物是根据预先设想的某种目的而聚合在一起的”;他提出了与这两种观点相反的看法:存在着“一种生命的原始冲动”,他把生命定义为“一种要对停滞的物质起作用的趋向”。这一理论包含着极端的唯意志论:“在生命进化之前……未来之门始终敞开着。那创造(意志)凭借原始的推动而永远绵延。”柏格森还强调偶然性:“这种作用(指对停滞的物质所起的作用)的方向不是事先决定的;因此,出现了各种各样无法预见的生命形式,这些形式是生命在进化过程中散布的。”(《创造进化论》,伦敦 1954 年版)——第 323 页
- 5 葛兰西实际上认为,柯罗齐本人恰恰就在履行“政党”的职能,而且在法西斯主义提供资产阶级“统治”的过渡形式的同时,组织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事实上,柯罗齐最初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就是在马特奥提于 1924 年被刺后,柯罗齐在参议院里还继续支持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一直支持到 1925 年亚文丁反对派遭取缔为止。从那以后,他才对法西斯主义持批评态度,不过这种批评是极有分寸的,并不妨碍他可以照常在意大利呆下去和发表文章。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主要活动,锋芒都是对准“实践哲学”的,在葛兰西看来,不管柯罗齐本人的主观意图如

何,他的所作所为都在为加强法西斯主义出力帮忙;关于这个问题参看第631—633页《狱中书信》:“我以为您过分夸大了柯罗齐目前所持的态度,您对他的认识是孤立地看问题,并没有认清他的本来面目。……柯罗齐在科波拉和罗柯(司法部长)主编的《政治》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谈他今天的观点;据我看,不仅科波拉,还有不少人也都认为柯罗齐所持的态度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它造成了一种局面,使战后冒出来的那批新统治集团得以接受怎样处理公共生活的实际教育。假如您研究一下1815年以来的全部意大利历史,您就会发现人数不多的统治集团总是想方设法拉拢在本意是要搞颠覆的历次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政治人物,而且已经成功地把他们统统网罗到自己方面去了。从1860年到1876年,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行动党都被王国方面拉过去了,只剩下一股不起作用的残余势力以共和党的名义继续存在,这个党只具有民俗学研究方面的价值,而无历史—政治价值。这种现象就叫做“进化”,但它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有机的进程,在统治阶级的形式中,它代替了法国在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以及英国克伦威尔统治时期所发生过的一切。其实,这一进程在1876年以后也还在继续着,只是规模极小不易觉察罢了。战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译者),传统的统治集团看来已没有能力象过去那样吸收和消化事态发展所出现的各种新兴力量,于是这个进程又呈现了波澜壮阔的局面。然而这个统治集团是十分狡猾的,‘鬼点子’之多实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拉拢网罗尽管棘手难办,但还是用尽了各式各样的手段在进行。柯罗齐的活动就是其中的手段之一,恐怕他的说教所产生的帮助消化的‘胃液’确实是最多的。柯罗齐的著作,联系其历史背景即意大利历史的背景来看,乃是使各种新兴力量‘符合’今天的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既指当前利益,也指长远利益)的最有力的手段,所以我以为今天的统治集团对他的功用是极其欣赏的,尽管这是一种表面现象”。——第323页

- 6 布朗热将军(1837—1891),1886年任法国陆军部长,在民众心目中,他是复仇雪耻(1870—1871年普法战争以后法国的反德情绪)的象征。政府既害怕他在民众中间的威望,同时又担心他会同王室势力勾结,于是把他免职,派往克莱蒙费朗驻戍。他组织布朗热党,提出选举新的立宪会议,恢复法国军事实力,改革“议会制度的弊端”等口号。在他以最大多数票选入国民议会后,大概有发动军事政变的企图——政变本来是满有成功的把握的——,但实际上却举棋不定,后来害怕被捕,于1889

年逃亡国外。——第 324 页

- 7 中世纪时，天主教会反对使用方言，提倡推广拉丁语作为“世界通用语”，因为这是它自己在文化领导权上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拿但丁来说，他不得不在《神曲》中为自己使用（佛罗伦萨）意大利语进行辩护。葛兰西把佛罗伦萨方言的崛起说成是出现了“一种高贵的方言”。“地方自治行政区的繁荣使各地的方言得到发展，而佛罗伦萨在文化领导权上产生一种统一的方言，高贵的方言……。这一方言随着地方自治行政区的衰落和脱离人民的统治等级制度——君主政体的兴起，而成为官方文字的标准语，正如当初拉丁语成为官方文字一样。意大利语再度成为学者从事写作所使用的标准语，而不是全国统一的民间语言。”到19世纪，在写作用的意大利语终于战胜了作为学术文字的拉丁语，并且被采纳为新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标准语以后，语言问题才在同一的标准下趋于基本统一。然而直到今天意大利各地作为“母语”的方言仍继续存在，尽管群众性的新闻媒介和普及教育在本世纪有了很大发展。——第 325 页

- 8 葛兰西在此处所说的马尔萨斯态度，一般是指害怕群众或轻视群众。他在手稿第224—229页上论述了柯罗齐对宗教的态度，以及他所倡导的“改革”的性质。葛兰西批评柯罗齐：他不理解，“实践哲学及其广泛的群众运动过去和现在都真正代表一种与宗教改革相类似的历史过程，而自由主义则不然，它只是再生着局限于狭隘知识分子集团的文艺复兴……。柯罗齐在本质上是反忏悔的（根据他对宗教现实所作的解释，我们不能把他称为反宗教的），在许多意大利的和欧洲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他的哲学……乃是一种类似于文艺复兴的、真正的精神与道德改革……。但柯罗齐从未‘走向人民’，根本不想成为‘国民’的一分子（正如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人物——同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做法相反——不是‘国民’的一分子一样），也并不想造成一批信徒……以宣传他的哲学，并使之成为一种从小学开始的教育原理（从而成为普通工农即平民百姓的教育原理）。这也许是不可能的，却值得试一试，然而根本不去尝试，这个事实无疑是意味深长的。”葛兰西接着又批判了柯罗齐的下列观点：宗教适合于群众，只有高级知识界的杰出人物才可能具有理性的世界观。柯罗齐在1920—1921年的焦利蒂政府里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曾提出过一个关于改组全国教育体制的法案草案，这一法案规定把宗教训谕重新列为小学必修课程——这是自1859年卡萨蒂法令为复兴运

动时期后的意大利的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之后未曾有过的奇闻。尽管焦利蒂撤销了这个法案，然而这一法案的基本精神实际上为金蒂雷所采纳，他出任1922年的第一届法西斯政府的教育部长期间草拟了金蒂雷法令，这一法令于1923年被通过。

需要说明一下，意大利文“*riforma*”一词既有改革和革新之意，又有改良之意。——第326页

- 9 这条札记的最后译本无标题，我们加上了葛兰西在最初叙述时所使用的标题。——第327页
- 10 福斯科罗在其名篇《凭吊》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看到纪念碑，一代伟人长眠此间；在他加强君权的同时，撕下了桂叶，让人民看到，节杖之下，血泪斑斑。”换句话说，福斯科罗认为马基雅维利一方面主张加强君主权力，同时也揭露了统治者的暴政。把马基雅维利的作用仅仅归结为鼓励人们“痛恨暴君”，对于这样的道德说教葛兰西是坚决反对的。关于葛兰西对福斯科罗等人解释马基雅维利学说的详细评论，参看《札记手稿》第115—119页。——第328页
- 11 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1452—1498)，多米尼加的修道士，公开主张教会必须立即实行改革，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尤其在佛罗伦萨。1492年查理八世的入侵仿佛证实了他的预见。他是1495—1498年佛罗伦萨神权政治国家的领袖。罗马教皇一方面以开除教籍相威胁，一方面以红衣主教的高位为诱饵，要他停止宣传自己的主张，但他不为所动，终于在1497年被革出教门。当初利用萨沃纳罗拉反对教皇的佛罗伦萨绅士们，在复杂的派系斗争过程中又反过来反对萨沃纳罗拉，用火刑把他烧死。后世常常把他看作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者。

皮埃尔·索德里尼(1452—1522)，佛罗伦萨政治家，1502—1512年任佛罗伦萨城邦行政长官，实行立法改革，赞同马基雅维利关于建立民兵的思想。但马基雅维利对他的评价不高，在他去世以后写过一首粗暴的讽刺诗：“皮埃尔·索德里尼离开人世的当夜，他的魂魄就到达地狱之门；但冥王却大喝一声：愚蠢的灵魂！不准进来！把他和未受洗礼儿童的灵魂关押在一块！”

瓦伦廷诺公爵，一般常称西萨勒·波查，是红衣主教罗德里戈·波查之子，后来当上教皇，称亚历山大六世，工于心计，擅长搞阴谋，同时也是一位将才。马基雅维利把他作为《君主论》中的主人公，认为他在罗马尼阿行省(即里米尼和拉文纳一带)已经建立了一个可以作为意

大利统一的基础的稳固的城邦，把他描绘成一位十全十美的统帅。

卡斯特鲁卓·卡斯特拉卡尼(1281—1328)也是一位统帅，统治过卢卡。马基雅维利在《卡斯特鲁卓·卡斯特拉卡尼在卢卡》一文中曾对他大加颂扬。——第 329 页

- 12 帕斯库阿利·威拉里(1826—1917)，历史学家，政治家，写过论述萨沃纳罗拉和马基雅维利的专著《马基雅维利及其时代》(《Niccolò Machiavelli e i suoi tempi》，1877—1882年)。他对马基雅维利的论述具有幼稚、浓重的道德说教色彩。——第 330 页

- 13 柯罗齐猛烈抨击那些对马基雅维利作道德说教的解释(他在对马克思的解释问题上也抱这种态度)，如对威拉里所提出的解释，他批评道：“在威拉里看来，马基雅维利的一大缺陷在于他没有注意到道德问题……马基雅维利首先从弄清事实，即社会赖以发展的斗争条件入手，然后才根据这一客观条件提出相应的原则。为什么……他非得关心斗争的伦理道德呢？”

有关上层建筑与基础以及关于“现象”的探讨，同柯罗齐在1930年伦敦哲学讨论会上论“反历史”的发言有关，他在发言中攻击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正如葛兰西经常指的那样，实际上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把“上层建筑”归结为仅仅是“现象”，诸如此类，(见于稿第229页等处)。——第 330 页

- 14 这句话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其确切的原文是：“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第 332 页

- 15 指小毛奇(1848—1916)，1906—1914年继施莱芬任德军总参谋长，他对前任所制定的对法作战计划即著名的“施莱芬计划”作了一些修改，1914年德军未能速胜法国，于是归咎于他的修改，予以解职。现代史料(以及施莱芬计划原稿的被发现)清楚地表明，他实际上是替罪羊，是名不副实的施莱芬一贯正确的神话的牺牲品。——第 332 页

- 16 马基雅维利写道：“西萨勒·波查被认为是残酷的：然而他的这种残酷却恢复和统一了罗马尼阿，使它变得太平和忠诚……因此，君主不必介意自己是否会落得残酷的恶名。”——第 334 页

- 17 班代洛(1480—1562)写过不少通俗小说,他有一本小说集是献给著名统帅乔万尼·德·梅迪西的。他在这本集子中用带点恶意的口气回忆道,有一天“尼科洛先生(即马基雅维利)让我们在太阳底下晒了两个多小时,他要按他所制定的序列来对3000名步兵进行编队……可就是怎么也编不起来”。这样,在班代洛亲自建议下,乔万尼让马基雅维利退下,他亲自出马,“一眨眼的工夫”就把队伍整顿好了。关于这一点,见札记手稿第122—123页。马基雅维利在其《论军事艺术》一文中发挥了他的方阵理论。——第334页
- 18 伯特兰多·斯帕文塔(1817—1883),哲学家,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影响,他把黑格尔的学说大量介绍到意大利,是一位对柯罗齐和金蒂雷有重大影响的先驱者。他批判意大利知识界的狭隘乡土观念,对焦贝蒂以及一般天主教思想尤表深恶痛绝,1876年以前一直担任参议员(右翼党人)。——第336页
- 19 法西斯发言人的说法,为取消议会制度辩护的口实。——第336页
- 20 原文为lazzari(无业游民)。——第336页
- 21 指在阶级社会条件下。关于葛兰西在本文所说的第一个要素,参看黑格尔《历史哲学》(多佛,1956年版,第44页):“那么,首先必须考虑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别……”——第337页
- 22 卢易吉·卡多纳(1850—1928),第一次大战时的意军总司令,1917年卡波雷托战役失败后被解职,被认为要对这次失败负全责。战争进行到1917年民怨沸腾,意军士兵普遍厌战,当然也是这次打败仗的一个重要因素。葛兰西把卡多纳作为不体察下情的独裁领导方法的象征。——第338页
- 23 法西斯分子常常把自己的党说成是“反对党的党”,墨索里尼喜欢发挥自己的“个人主义”论。——第339页
- 24 黑格尔所使用的术语,出处见《历史哲学》第53页:“这种国民精神是一定的和具体的,而且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将随同本国历史发展的阶段而有所改变。这种精神构成那些已经谈到过的国家意识的其他形式的基础和实质……由于性质、目的、目标的根本一致,这些不同形式不可分地要同国家精神相统一。只有同这种特定的宗教相联系,这种特定的政治制度才能存在;无论在某个国家,某种哲学或艺术体系里,概莫能外。”

“国家精神”的观念为法西斯主义所采用,如墨索里尼在1929年5

- 月13日对议会的演说中说道：“要是国家没有一种精神、一种道德来加强法律的威力，确保国民的服从，要是那样，还象个国家的样子？”葛兰西在此处所说的这个名词的“确切的历史决定的含义”究竟何所指，不完全清楚。——第 339 页
- 25 必须理解，葛兰西使用 totalitarian 这个词并不带有在今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所具有的贬义——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中性词，大体意思是“无所不包的和统一的”。有时我们把它译成“普遍的”。——第 341 页
- 26 由艾尔伯特尼主编的《晚邮报》在法西斯上台以前一直是米兰工业界的主要喉舌，同时也几乎是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全国性机关报，法西斯上台后，一度与当局合流，但后来又重新恢复其原来的面貌。——第 342 页
- 27 即新闻报纸。——第 342 页
- 28 中世纪伪词源学的一个出名的例子，大意说：“木头之所以称为木头是因为它不发光”。无政府主义者自称是教育者，葛兰西语含讥讽地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是那种人吧。——第 342 页
- 29 指18世纪的法国重农学派。——第 343 页
- 30 这第二种类型的党一定是指法西斯主义，而第一种类型的“党”可能是指柯罗齐所起的作用；参看手稿第172页：“关于作为统辖各种具体派系的总意识形态的党。事实上，1876年以后的意大利自由党的特色就在于，它以一系列全国性和地区性派系集团的‘公开身份’出现。下面这些党派都属于政治自由主义派：天主教自由派的人民党；国家主义（柯罗齐是艾·罗柯和弗·科波拉主办的《政治》杂志的撰稿人）；保皇派联盟；共和党；一大部分社会党人；民主激进派；保守派；索尼诺和萨朗德腊；焦利蒂，奥兰多，尼提之流。柯罗齐则是所有这些帮派集团、秘密社会所共有的理论家，是为它们服务、受它们利用的核心宣传机构的头目，是一切旨在恢复旧政治形式的文化运动的全国领袖。”——第 343 页
- 31 “关于民族的自满情绪，狄奥多拉·西卡拉有一句名言。他认为，每个民族，不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都有这样的自满心理，它在创造人类物质享受方面比任何民族要早，而且它的有记载的历史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见《贾姆巴蒂斯塔·维科的新科学》，康奈尔，1968年版第61页。当葛兰西谈到“党的自满”时，可能想起了季诺维也夫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具体针对意共而说的一句话，他提到了“共产主义自满”的危险。——第 344 页

- 32 指皮埃蒙特同英、法结盟并派遣军队参加(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反对俄国的政策。——第 347 页
- 33 1870年 5 月24日马志尼党人皮埃特罗·巴尔桑蒂伍长率领40名共和派分子,高呼“罗马万岁!共和国万岁!打倒君主制度!”的口号,进攻帕维亚兵营。1870年 8 月27日他被逮捕枪决。——第 347 页
- 34 意即不存在群众性的共产党。葛兰西当然不认为工党是敌视工业家的。——第 349 页
- 35 指19世纪下半叶的自由党及其激进派,也许尤其是指1870年后的那段时期,以张伯伦、狄尔克和布雷德拉夫为首的激进派曾经是共和主义者,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第 349 页
- 36 意大利激进党是行动党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这个党在19世纪80年代开展了争取社会立法、尤其是保障劳动条件的社会立法运动。此后,它衰落了,成为焦利蒂政治集团中力量最小的组成部分。——第 349 页
- 37 指法西斯主义的党派。——第 350 页
- 38 指“情况愈糟愈好”的观念。——第 350 页
- 39 列宁对经济主义作过多方面的说明,特别在《怎么办?》一文里,他说:“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就是要工人进行经济斗争(更确切地说是工团主义的斗争,因为后者也包括一定的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并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自由派一道去进行政治‘斗争’。”列宁提出了一个与经济主义相对立的理论,即建立一个先锋队的党的理论,这个党要使知识分子同工人联合,要“从外部”把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无产阶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的自发活动只能发展“工会意识”。

葛兰西所说的“理论的工团主义”实际上就是指“工团主义——意文“*sindacalismo*”既作“工团主义”解,又作“工联主义”解。在意大利工人阶级中有强烈的工团主义传统,在无政府主义者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中尤为突出。在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最初几年里所发生的好多起声势浩大的产业工人斗争中,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工人总是首先发难,特别在都灵,葛兰西在那里主编《新秩序》时期,一再抨击好多社会党人对这些工人所抱的宗派主义态度。另一方面,以阿尔托罗·拉布里奥拉为代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们至少在政治上是模棱两可的。拉布里奥拉在1915年时是干预主义者,虽然他本人后来成了反法西斯主义者,但其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有不少人却从国家主义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葛兰西指出了这一过程同复兴运动时期以后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演变”的联系。——第 352 页

- 40 卢易吉·伊诺迪 (1874—1961), 杰出的自由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1924—1925年参加过反对法西斯的亚文丁反对派, 法西斯垮台后出任意大利银行总裁, 后来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948—1955年)。柯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版于1900年问世, 但在1917年柯罗齐又增添了一篇第三版新版序言, 对撰写这本书的原因作了说明, 即说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90—1900年这10年期间对意大利知识界特别是史学界产生了哪些好的影响。伊诺迪的评论文章发表在《社会改革》1918年7月—8月号, 第415页。——第 352 页
- 41 阿戈斯蒂诺·兰齐洛(1886—1952),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写过一本研究索列尔的专著, 1931年投靠法西斯, 成为法西斯组合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帕雷托以其关于杰出人物的理论闻名于当今之世, 但他也曾是一位主张自由贸易的重要经济学家和理论家。——第 352 页
- 42 亨利·德·曼(1885—1953), 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 他的《马克思主义之外》(1929年初版)显然是宣扬修正主义观点之作。1934年他草拟了一个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纲领, 即所谓“德·曼方案”, 1935到1938年出任政府部长, 1946年, 因他在比利时被占领时期同德国人合作, 被判处徒刑。——第 353 页
- 43 在意大利社会党的旧不妥协派中, 一部分人促进了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 一部分人仍然留在社会党内, 是“最高纲领”多数派。本文显然具体针对博尔迪加及其弃权主义等等而发。——第 354 页
- 44 见《哲学的贫困》英文版第194—195页。——第 355 页
- 45 指列宁《怎么办?》等论著。——第 358 页
- 46 其实在1906年的《力量对比与前景》一文发表以前, 托洛茨基并没有正式提出不断革命论。但在1905年他发表了一本题目叫《一月九日以前的时期》的小册子, 有帕尔乌斯为之作序, 其中提到: “俄国的革命临时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政府……有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参加的团结政府”。这一观点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都不一致, 孟什维克认为这场革命在性质上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 所以社会民主党应采取弃权的立场; 布尔什维克则恰恰提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列宁为了阐明这一思想而写的两篇重要文章(在《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一文发表之前): 《社会民主党与临时革命政府》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主要是同孟什维克进行论战，但在第一篇文章中有一段文字是赞扬帕尔乌斯的序言的，不过也提出其中包含有一定的错误，特别是关于革命临时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提法。列宁写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拥护的革命专政才能维持长久……。但目前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还是少数，只有联合半无产阶级和半有产者，即联合穷困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才能成为绝大多数。可能的和合乎要求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这样来构成，无疑会对革命政府的构成产生影响，势必要吸收革命民主的各派代表人物参加甚或领导政府。”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当然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2月革命后弃置不用，但到20年代中期的党内大论战，特别是有关波兰和中国革命问题上，这个口号又被重新提出。——第358页

47 指上一条脚注中所引列宁所说的“穷困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力量对比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这些阶层抱有民主的或“立宪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们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并把希望寄托在宪制改革上。同时参阅列宁在1917年7月发表的《论立宪幻想》一文。——第358页

48 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58页

49 乔治·瓦卢瓦，法国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本世纪初曾组织“蒲鲁东社”，索列尔就是该社的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效法墨索里尼，依靠退伍军人，组织了一个以“国家革命”相号召的运动，这个运动既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又敌视“财阀统治”。30年代，他信奉“趋同论”，认为美国和苏联都在向一种技术高度发达的、工联主义社会形态演变。

鲁道夫·盖达将军是俄国内战时期高尔察克手下的捷克军团司令官，20年代因策划军事暴动而被免职，后来组织了一个法西斯主义的“争取选举改革联盟”，在192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大选中赢得3个席位。纳粹入侵捷克后，他想当傀儡政权的元首，不过纳粹显然对他不信任，因为他过去一直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的梦想未能实现。——第359页

50 葛兰西在评论“不妥协派”时，锋芒往往好象也指向（本文即是如此）——甚至专门指向——亚马多·博尔迪加。博尔迪加也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批评的那类共产党人，该文第8章的标题为“不作任何妥协吗？”，本身就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第360页

51 通过后文就可看出，葛兰西使用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指政治行动方面暴

力因素和协商一致因素的辩证统一。“双重前途”这一名词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国际上一系列革命遭到失败的形势下召开的，而1923年10月的德国革命失败使（欧洲的革命形势）进入最低潮。季诺维也夫成功地把自已的亲信费舍尔和马斯洛夫安插担任德国党的领袖，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右兰德勒头上，把他排挤出德共领导机构，在这以后，季诺维也夫急于想使整个事情不致受到严厉的批评，便说德国革命在不久的将来还是有成功的可能。当时，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表示不同意，他们说欧洲资产阶级正在转向以“工党政策”解决其战后政治危机，英国和法国的事态发展就是证明。在季诺维也夫的主持下，大会实际上通过了一个折衷的决议，既承认革命即将来临，又承认“工党政策”解决办法正在普遍化。《关于策略的提纲》的第8部分的标题是《两种前景》，其中写道：

“国际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它的整体的或局部的发展速度，某个洲或某个国家里的革命活动的发展速度是无法确切预言的。从整个形势来看，有两种前途：（1）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发展过程；（2）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基础已经百孔千疮，整个资本主义的矛盾迅速发展，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某个国家里单独得到解决。

共产国际必须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有两种前途的可能性的基础上。共产国际的策略必须十分灵活，能够迅速跟上形势的发展变化，即使形势的发展具有长期的性质，共产党必须对无产阶级革命抱坚定信念，团结和教育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在嗣后的几年里，这种双重前途仍然是共产国际的战略，例如，季诺维也夫在1926年初的第六次全会上就重申了这一点。虽然季诺维也夫的这一提法主要是出于当时的策略考虑，葛兰西却似乎继续认为这个提法比1926—1928年的“右”的路线以及“第三时期”的“左”的路线更为可取，认为这一原则指示可以普遍适用于无法立即发动“正面攻击”的任何时期。根据艾瑟丝·丽莎的说法，葛兰西是在被关押在图里监狱时和同狱的人进行讨论时谈到这“两种前途”的。他说，在这两种前途之间很可能出现一个从法西斯垮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某种形式的过渡时期。而他在本文批评有人把“双重前途”只归结为两种“直接性”云云，是为了反对那种把强制因素同协商一致因素分离的战略。——第361页

52 “因此，必须懂得有两种斗争方式：法律的和暴力的。第一种方式符合人性，第二种方式符合兽性。但事实证明，单靠第一种方式往往是不够

的，因此有必要采取第二种方式。所以说当君主的必须懂得巧妙利用兽性和人性。古代作者用寓言来向君主灌输这种意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以及许多别的古代君主如何被送到半人半马神蔡朗那里去学艺，请他用他那套方法培养训练他们。拜半兽半人的怪物为师这个神话的寓意无非是说，当君主的必须懂得如何按照这两者的性质来行事，否则便不能生存。”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企鹅丛书，1961年版，第99页。同时参看札记手稿第121—122页，“盖沙迪尼声称，有两种东西为国家生活所必需：武器和宗教。可以把盖沙迪尼的说法换成各种较为温和的说法：暴力与协商一致，强制与说服，国家与教会，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政治活动与道德说教（柯罗齐的伦理—政治史），法律与自由，秩序与自我纪律，或者（用带点自由派口吻的含蓄说法）武力与欺骗。总之，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观，宗教是协商一致，教会则是市民社会，是统治集团的领导机构。因为统治集团没有自己的机构，即没有自己的文化和精神团体，便把遍布各地的教会组织当作这类机构了。这种情形与中世纪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宗教已被公认是统治工具，并且作出了这样的分析研究。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雅各宾派想要建立对‘超人’的崇拜的努力才值得研究。看来这种努力是想建立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致，用专政的办法统一国家的各种组成要素（即有机的广义的国家本身加上市民社会），用不顾一切的手段掌握人民生活和国家生活中的一切。而这似乎也是政教分离的现代式国家的第一个根源，因为这种国家力求把它的历史存在的全部要素包括在自身之中，包括在自己的复杂生活之中。”——第361页

53 葛兰西是指《弗朗切斯科·盖沙迪尼的政治现实主义》一文，载《新历史评论》1930年第11—12月号。同时参看《国家的经济—团体阶段》，第173页。盖沙迪尼（1483—1540），佛罗伦萨外交家，历史学家，是马基雅维利的好友，人们经常把他们两人进行比较；总起来说，他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物，——第363页

54 卢梭在《马基雅维利论》中写道：“萨沃纳罗拉是纯粹的宗教，马基雅维利则是科学，技艺，纯粹的政治。”——第364页

55 德·森克蒂斯指责盖沙迪尼的“利己主义”。——第365页

56 见《过去和现在》第6页：“论白日作梦与想入非非。这种现象表明缺乏毅力和态度消极。人们想象已经发生某种情况打乱必然性的过程。人们的首创精神已经不受束缚。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们可以随心所

欲，人们要求有许许多多他们目前还没有的东西。‘现在’基本上掉过头来设想已处于‘未来’。一切被压迫的会得到解放。与此相反，必须使人们猛醒，正视眼前的今天，如果想要改变今天的话。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1932年）。早在1919年葛兰西就把罗曼·罗兰的格言“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当作一种纲领性的口号，印在《新秩序》上。——第366页

57 “Organica”在英语中没有与之完全相当的等值词，它的意思是军队组织，分成不同的军兵种、军衔等级，等等。——第367页

58 这是国家主义右派专门用来污蔑共产党的称呼，在早期，则专指受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的政党，后者——马志尼的行动党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同别国的自由派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联系。——第368页

59 在《过去和现在》第148—149页，葛兰西写道：“可以把危机时刻定义为对一定时期的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全部情况，如果这些情况被看作是处于运动中的话，也就是说，它们构成一个不断改变的结合的过程，经济周期的过程……。在意大利语中，‘危机时刻’一词至今仍包含着‘有利的或不利的经济形势’的含义。‘形势’与‘危机时刻’的区别：危机时刻是指经济形势的全部目前的和短暂的特征……因此，研究危机时刻就同目前的政治、同‘策略’及鼓动有较为紧密的联系，而‘形势’则同‘战略’及宣传有关，等等。”——第369页

60 1792年8月10日图勒里宫被攻占，君主制度崩溃。——第371页

61 从1793—1796年，保皇主义的僧侣和地主在法国西部旺代地区煽动农民进行游击战反对共和国。——第374页

62 葛兰西在原文中把这个英文词加上了圆括号。他的意思似乎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在其他地方由国家履行的某些职能，在英国却明显地移交给正式的地方自治机构了。在《过去和现在》第163—164页关于“自治与官僚制度”的札记中葛兰西写道：“自治是一种制度或一种政治的和行政的惯例，它是以相当特殊的条件为前提的：存在着一个靠收租生活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由于传统对公共事务富有经验，并由于正直和公平而在人民群众中享有一定的威望（同时也出于某种心理特性，例如能刚正不阿地，但又不盛气凌人地行使权力）。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自治何以只能在英国实行，英国的地主阶级加上它在经济上独立的状况，从来没有同本国人民发生过（象法国那样的）猛烈冲突，也没有（象德国那样的）庞大的全民军事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割据和独裁态度。自治的含

义在非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的改变：反对最高当局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而代之以由下面直接控制的官僚制度。官僚制度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问题的提法必然是要求形成一个公正无私的官僚制度，不滥用职权，也不受代表制度的约束。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解决官僚制度的途径和办法，这些途径和办法必然是各不相同的。”——第378页

- 63 关于“有机的集中制”，参看《札记手稿》第113页：“所谓‘有机的集中制’是以下列原则为出发点的，即：一个政治集团是以某个‘一贯正确、代表真理的人物’为核心通过吸收增选而形成的，这个人物‘受到理智的启发’，发现了一贯正确的、固有的历史发展规律，所谓一贯正确只能是从长期来看，即使目前的事态‘似乎’不能证明这些规律可以成立。”另外，见札记手稿第157—158页：“有机集体是由单个的个人组成的，他们在组成这个有机体的同时就给自己加上了，并且主动接受了一定的等级制度和领导。要是每个成员都把有机集体看作根本同自己无关，那么这个有机体显然也就不再存在，而只是头脑里的幻像，变成一种迷信……。令人惊讶而且十分典型的是，这种拜物教竟然也会在党和工会这类‘自愿’的组织中出现，但不是在‘社会’或国家中。这种倾向就是把个人同有机体之间的关系看作二元的，就是个人对有机体持一种置身事外的、批判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并不包含热情的无批判的赞美的话）。总之，是一种拜物教的关系。个人希望集体采取行动，即使他本人什么也不干，但是他没有考虑到，正因为人人都抱他那种态度，集体必然无法采取行动。此外，必须承认，由于决定论的和机械论的历史观（一种同广大民众的消极有关的常识观）十分流行，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尽管他不参与，某种事情还是要发生；因此不免有这样的想法：在个人之外，确实存在着一种变幻不定的东西，一种有机集体的抽象，一种自动起作用的神力，这种东西，虽然不长人的脑子，但还是会思考，虽然不长人的腿，但还是会活动，等等。

似乎应该有某种意识形态，比如说当代的唯心主义（尤戈·斯皮里托的学说）来重新教育个人，使之认识到个人与国家的一致；然而看来事实上没有，因为这种一致完全是空洞的纸上谈兵。各种所谓‘有机的集中制’的情形亦然如此，因为它们完全是从这样的预想出发——只有当人民的热情轰轰烈烈的非常时期这种预想才是真实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取决于统治者满足被统治者的利益因而‘必然’得到被

统治者的拥护,也就是说个人必然同全体保持一致——而所谓全体(不管涉及什么样的有机体)则是由统治者来代表的。”必须指出,博尔迪加以及1925—1926年的左派,特别是在他们向里昂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提纲中,谈到共产国际和各个共产党必须“实现有机的集中制”,并以此来反对现行的党的实践,尤其反对布尔什维克化。但是葛兰西显然把“有机的集中制”的概念用作政治组织的一般范畴,就象本文所提到的法国大革命和第三共和国那样。——第378页

64 大概指黑格尔及德国唯心论哲学对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柯罗齐和金蒂雷)的影响,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内部的影响。——第379页

65 指在统一以后把皮埃蒙特的政治制度在意大利全境推行。——第380页

66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写道:“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第381页

67 马费奥·潘特列奥尼:《纯粹经济学原理》,米兰,1931年版。——第382页

68 例如,墨索里尼在1922年的《世界走哪条道路?》里说:“战争是‘革命的’,因为它——以血流成河的手段——消灭了民主的世纪,多数,多数党和以多为胜的世纪”;又如在1932年的《法西斯主义学说》里说:“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因为它使人民降低到绝大多数的水平,降低到多数党的水平”。——第383页

69 此处意大利原文为“particolare”,是盖沙迪尼所使用的术语,他主张逃避社会生活磨难的最安全处所是各人自己的“particolare”(私利),所以德·森克蒂斯批评他的这种主张是“利己主义”。——第383页

70 意即出于保守的观点(力图使政治权力归传统的统治阶层所掌握——莫斯卡所说的“政治阶级”),而不是出于狭义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观点——即知识界精华,帕雷托,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等等。——第

384页

- 71 大概是指苏维埃制度。——第 384 页
- 72 指1916—1923年间巴塞罗那的工团主义斗争。——第 388 页
- 73 马里奥·特罗齐曾指责葛兰西和《新秩序》派是“柏格森主义”，这种指责后来经常被人重复。——第 389 页
- 74 指马克思主义。——第 389 页
- 75 参看第 6 章。——第 390 页
- 76 1282年 3 月31日，巴勒莫人民起义，反对(法国)昂儒的查理政府，这便是后来所称的“西西里岛晚祷”大起义。起义的风暴迅速席卷全岛，把法国人赶跑将近一个月。王位后来传给了阿拉贡的弗雷德里克。这次起义是人民的不满同贵族中的亲阿拉贡分子即乔万尼·德·普罗西达的密谋策划相结合的产物。起义成功后，普罗西达(1210?—1282)出任王国首相。——第 390 页
- 77 《罗马提纲》是意共成立后头几年的重要政治文件，包括由博尔迪加和特拉契尼起草的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由桑纳和格拉齐亚德伊起草的关于农业问题的提纲以及由葛兰西和塔斯卡起草的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而一般所说的《罗马提纲》主要是指其中关于策略问题的部分)；这个提纲是在 1922 年 3 月 20 日举行的罗马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后不久，1921 年 1 月举行的代表大会只是宣告意共正式成立，并对组织问题作了一些临时规定。)按照博尔迪加策略提纲的观点，认为意大利国家危机的社会民主党式的解决是主要危险，而把法西斯主义现象(各地的法西斯支队已经活动了快两年，而且 6 个月以后就发生了进军罗马的事件)看作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有机发展；法西斯主义是需要反对的，但只是用必要手段稍加遏制即可，因为它不是主要敌人。当这个提纲送共产国际审批时，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认为根本通不过——这是在意共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后来终于把这个提纲作为准备参加定于十二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发言稿，提交意共代表大会审议，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违反共产国际的纪律。在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尤其是科拉罗夫，对提纲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严厉指责不该抛弃统一战线的口号，为提纲进行辩护的不但有博尔迪加和特拉契尼，也有葛兰西，他谈到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农民”性质，担心如果建立统一战线，革命的党会被淹没在农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科拉罗夫的发言对代表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塔斯卡为首的

少数反对派。葛兰西当时之所以继续支持博尔迪加的领导，一个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担心，如果要撤换博尔迪加，结果只能是由塔斯卡及右派取而代。要到1926年1月的里昂代表大会，罗马提纲才被另一个性质相仿佛的文件——里昂提纲所取代。——第391页

78 指《新秩序》所倡导的工厂委员会运动。——第392页

79 指《资本论》(第1卷第14和15章)。——第392页

80 说现代意大利历史是由“有志者”创造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法西斯论调。在《过去和现在》第165页上，葛兰西引了一段法西斯代言人鲍博的话：“意大利的历史和文明，自这个国家从长期沉睡中被重新唤醒之日起直到今天，是由青年人的志愿行动所创造，是一种崭新的创造。加里波第所率领的义军，1915年的英勇的干涉主义，黑衫党的法西斯革命，使意大利变得统一而强大，使原来受分割的人民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葛兰西的评语是：“志愿行动是现代意大利的特点，这样说固然没有错(那个名单上还可以加上战争中的突击队)，不过必须着重指出，这种志愿行动尽管有其不容否认的历史功绩，但毕竟只是人民干预的一种替代物，就这个意义而论，它只是由于广大群众对国事消极而产生一种妥协解决办法。志愿行动和消极并存，并不象表面看来那样简单。关于志愿行动的解决办法，是要经过据称是‘最优秀’分子的一致同意，有正式的合法手续，由当局自上而下加以贯彻的。但是要想建设一种长期的历史，单靠‘最优秀分子’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调动起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才行。”在一条关于复兴运动时期的各家之说的札记里(《复兴运动时期》第60页)，葛兰西旁敲侧击地批评法西斯主义时提到，“全国民众对国家的支持被一批抽象地承认的‘有志者’对‘国家’的拥护所取代。没有哪一个人意识到，当初马基雅维利强调必须以国民军来取代不可靠的临时招募的雇佣军，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全民的’群众性行动取代‘志愿制’，因为志愿制是一种过渡形态的不踏实的解决办法，跟雇佣军一样，都是靠不住的。”他这番话正是说的上面那个问题。——第393页

81 原文是“morto di fame”，英文释义是starveling(饿汉)。——第393页

82 原文是Gottlieb即指亚马多·博尔迪加。给博尔迪加冠以“吉卜赛人”这样颇为古怪的称呼，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在葛兰西看来，博尔迪加关于党的观点同无产阶级毫无有机的联系，使党变成一种不依附于任何阶级的“志愿者”的组织。——第394页

国家和市民社会

(第 395 页——第 458 页)

- 83 此处葛兰西的论点是,1920年以后,意大利北部的资本家本来有可能同意继续支持焦利蒂的战略,即同改良主义的工人阶级领袖们合作,可是却被他们的地主同盟者“引向”了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实行全面镇压的政策。(当然,“农村法西斯”并没有进城去镇压。)但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绝对”领导权当然还是掌握在城市资产阶级手里。——第 399 页
- 84 莫斯卡(1858—1941),同帕雷托和米歇尔一起倡导关于“杰出人物”的社会学理论。他的基本思想是“政治阶级”观,他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统治阶级”观念。——第 399 页
- 85 1920年,希腊统治阶级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被废黜的康斯坦丁国王,是亲德派。一派是以维尼泽洛斯为首的“自由派”,受到英国的支持。在政权多次更迭以后,1920年8月有人企图暗杀当时任首相的维尼泽洛斯未遂,于是发生了残酷的报复。在大批被害者中有保皇派的前大臣德拉戈米斯。——第 400 页
- 86 葛兰西在《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及现代国家的札记》第148—149页里写道:“‘中产阶级’一词的含义,在每个国家都不完全相同……这个词来源于英国的社会发展。在英国,资产阶级似乎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始终被看作是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实体,因而在英国历史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人民并在人民的支持下消灭封建特权,而是贵族(或贵族中的一部分人)组成民族大众的联盟首先反对国王,然后反对工业资产阶级。英国的‘保守党主义’(迪斯雷利等人)历来深得民心。经过一系列重大的自由化改革,使国家符合中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以后,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两大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同一个阶级的内部问题上;由于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某些职能,即在有关传统、统治阶层的教育、保持一定的思想以免制度突然发生混乱、以及巩固帝国结构等方面,贵族具有日益‘资产阶级化’的特点。在意大利,封建贵族是由中世纪的地方自治加以消灭的(通过内战从人身上加以消灭,只有意大利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岛例外),由于传统的‘高’阶级已不复存在,‘中等(中产)’一词在规格上就降低了一档。‘从消极方面讲’,所谓中产阶级是指不属于民众,即不是工人或农民的

那些人；从积极方面讲，它指知识阶层，有专长的阶层及政府雇员。”——第 401 页

- 87 普里莫·德·里维拉(1870—1930)，1923—1930年期间，在君主政体的支持下成为西班牙的独裁者。佩塔·日夫科维奇(1879—1947)，1929—1932年期间任南斯拉夫王国首相，是亚历山大国王独裁统治的工具。——第 401 页
- 88 葛兰西使用这个名词术语意在暗示，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一般把墨索里尼比作凯撒。葛兰西竭力嘲弄“凯撒主义理论”，对宣扬凯撒“使罗马从城邦变成了帝国的首都”的那种观点，给予坚决驳斥，因为这种观点的意图在于宣扬在当代意大利，墨索里尼实现了同样的转变。——第 403 页
- 89 洛伦佐于1492年逝世，他的死标志着意大利各城邦之间内部均势的终结和异族入主意大利时代的开始，这种统治一直要延续到复兴运动时期。——第 404 页
- 90 指1931年麦克唐纳退出工党以后所组成的“国民内阁”。——第 404 页
- 91 1922年10月为法西斯进军罗马的时期。人民党最初在议会里支持法西斯并参加内阁，但到1923年夏，因在对待法西斯的政策问题上有争论，内部发生分裂，1924年1月的大选中，它单独提出了自己的竞选名单，大选后，又拒绝参加反对党共同阵线。1925年1月3日，法西斯当局压制新闻自由，1926年11月8日正式宣布解散反对党，剥夺非法西斯党的代表的代表权，其中包括葛兰西(他于同日被逮捕)。——第 404 页
- 92 即路易·拿破仑上台执政的那次政变。——第 407 页
- 93 这一段话看来又是指法西斯主义，如果联系后文《自我批评和虚伪的自我批评》一节的论述来看，就格外明显。葛兰西在那一节里提出了关于这种政治制度的非“划时代”性以及关于它同先前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比较所具有的“相对”进步性的类似论点。在另一段里，葛兰西谨慎地强调，在作出这样的评价时，“决不可有支持‘专制主义’倾向的丝毫表示，在强调这种现象的‘过渡’性时是很可能出现这种倾向的……”——第 407 页
- 94 这一段分析了意大利的最高纲领主义与改良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所采取的自杀性的消极态度。——第 408 页
- 95 1919—1920年间，在《新秩序》派与意大利社会党的多数派之间发生了长期的争论，前者认为工厂委员会是代表全体工人阶级(包括没有参加

社会党或工会的工人在内)的机构,后者对这种看法感到十分震惊。《新秩序》派当然也会把类似的标准运用于组织其他形式的委员会,例如本文所提到的区域性“苏维埃”。——第 408 页

96 克劳狄奥·特雷维斯在1920年3月30日发表了一篇世称“赎罪”演说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描述了统治阶级所处的悲惨局面,当时资产阶级只会吵吵嚷嚷,没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而无产阶级则还没有作好准备掌握政权。——第 408 页

97 意大利文Che fanno le mosche cocchiere(瞎忙一阵)指(法国)拉封丹的一则寓言《马车和苍蝇》,说的是一只苍蝇的故事,那只苍蝇自以为多亏了它的力量才使一辆6匹马拉的大型马车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岗;这首诗的结尾写道:“于是,有些人极尽所能大献殷勤,结果到处惹人讨厌,最后还是要被人撵走。”——第 409 页

98 也就是说,1919—1920年间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自发”行动,无异于在历来“不关心政治的”小资产阶级背上猛击一掌。葛兰西在别处(《过去和现在》)对这种不关心政治的倾向作了分析,同时,葛兰西写道:“特雷维斯的‘赎罪’演说同对干涉主义的迷恋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所包含的策略是回避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转移群众的视线,把他们的注意力和热情吸引到次要的目标上去,伪善地为统治阶级开脱历史的和政治的责任,把民众的愤怒引向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物质的、而且往往是无意识的工具;实质上,这是焦利蒂策略的继续……。很明显,战争及其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和心理上的动荡不安,尤其是在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引起的巨大混乱,势将使这些阶层变得激进起来。党没有把他们当做盟友,而是毫无道理地把他们当做敌人,换句话说,把他们推向了统治阶级一边。”(这里所说的党当然是指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共产党要到1921年才正式成立——,葛兰西所说的对干涉主义的迷恋,是指社会党人在战后时期的一种倾向,即把在1914—1915年期间在意大利参战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当作评价一切政治活动的基本标准。)——第 409 页

99 指1918年9月29日意大利社会党同意大利劳工总同盟之间所达成的关于各自活动范围的协议,即党专管一切政治性罢工,总同盟则管一切经济性罢工,“彼此不相干扰”。——第 409 页

100 1914年6月,在安科纳发生了对工人的大屠杀以后,意大利社会党号召实行总罢工。劳工总同盟方面对这一号召最初勉强表示支持,不久以

后就破坏了这次总罢工。葛兰西指出,尽管如此,社会党在1919年对待劳工总同盟问题上并没有接受教训。1920年8月,就在发生占领工厂事件的前夕,葛兰西就已在《新秩序》上撰文指出:“今天……正处于革命时期,形势有可能迫使党时时刻刻采取行动,意大利的运动却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党非但没有在实践中解决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根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运动成了两个政党的活动领域:一个是正式的党,一个是由工会领袖们组成的事实上的党。”——第410页

101 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1813—1887),最初为马志尼党人,后来在西西里又与加里波第合作,实际上他是为加富尔工作。1876年他成为第一任“左派”首相,控制着议会,直到去世为止。在后来称作“演变”的过程中,他从议会的两翼中挑选人员组成他的内阁;克里斯比把这种确保个人权力的做法称作“议会专政”,但他本人执政后也如法炮制。——第411页

102 指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秩序相对抗。——第412页

103 “无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无畏”是意大利军队里的义勇突击队的组织。邓南遮给他的民族主义的义勇“军团”取了这一名称,1921年夏季为反击法西斯突击队而组织的民众义勇组织也采用了“人民无畏”这个名称。这种义勇组织是独立的,并不依附于各左翼政党,但各地义勇组织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大都是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意大利社会党(这时刚同法西斯党签订了“和解条约”)谴责这种组织,他们鼓吹不抵抗政策。意大利共产党之所以也谴责这种组织,是出于狭隘的宗派观点,希望把这些组织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成为纯粹共产党的防御组织。葛兰西本人曾撰文公开对这种组织表示欢迎。即使在共产党正式表态之后,他还是抱这个态度,只是方式上比较隐晦,通过对社会党立场的批评来表达他的欢迎。尽管如此,从他后来写的札记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真正认为工人阶级可以指望以“突击组织”来同得到国家默许的法西斯组织相抗衡,只有群众起来反对“志愿”行动,才能产生可行的反响。——第413页

104 19世纪末叶,土耳其仍然占有巴尔干的大部分地区,即今阿尔巴尼亚、希腊北部、南斯拉夫南部和保加利亚南部等地,也就是说,拥有史称马其顿的整个地区(现在分属于南斯拉夫、希腊及保加利亚,后者所占的部分较少)。1893年由马其顿民族主义者台尔塞夫和格鲁伊夫发起在

- 索非亚成立了革命的马其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开始派遣小股武装人员(游击队)越境潜入土耳其。它们的目标是马其顿至少应得到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一点遭到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反对。其后数年间，毗邻各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效法弗拉奇人)相继成立自己的武装游击队以保护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这些游击队一方面打土耳其人，一方面又发生自相残杀的摩擦。——第 414 页
- 105 大概指爱尔兰的芬尼亚运动，1867年反英起义虽告失败，但其后三、四十年零星的反英活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第 414 页
- 106 意大利军队中的精锐部队，为拉马莫拉于 1836 年所创立。——第 415 页
- 107 指罗莎·卢森堡的《总罢工、党和工会》。——第 416 页
- 108 指彼·克拉斯诺夫的《从帝国之鹰到红旗》，1921 年柏林初版。意译本于 1928 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第 417 页
- 109 1920 年 8 月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下的红军，在反击皮尔苏茨基对苏联入侵的战役中，受挫于华沙城下。——第 418 页
- 110 大概指意大利共产党人在 1921—1926 年间，尽管劳工总同盟的改良派领导人中有人造反策应，始终未能在工会运动中处于多数派地位。——第 419 页
- 111 指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葛兰西出席了这次大会。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他说：“……要象我们打倒俄国资产阶级那样，出其不意地一举打倒欧洲资产阶级，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欧洲资产阶级比较明智，比较有远见；他们并没有虚度光阴，他们正在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反对我们。因此，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其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将不仅遇到反革命方面的先头战斗部队，而且会遇到反革命方面的大量的后备部队。只有打垮粉碎敌人的这些队伍，打得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然而作为补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就不再掌握强大的后备力量，无法进行长期的内战。换句话说，欧洲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就完全有可能腾出手来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比起我们俄国在夺取政权后的初期情况显然会从容得多。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愈是艰苦卓绝，对胜利以后的无产阶级政权进行挑战的可能性就愈小。”(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最初的五年》，先锋书局，纽约 1953 年版，第 2 卷第 221—222 页)——第 419 页

112 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自相矛盾的是，根据葛兰西在这里提出的类比，在1920—1921年的军事大辩论中，托洛茨基是运动战或者叫做革命进攻战术的主要反对者，这种战术是伏龙芝、布琼尼以及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内战时期将领提出来的，他们支持“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观点。另外，托洛茨基还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政治领域里的“进攻理论”进行猛烈的攻击，这一理论的主要拥护者为意大利，德国党内的左派以及贝拉·库恩。似乎有必要指出，把军事方面的福煦统一指挥同政治方面的“统一战线”相提并论是根本不恰当的，因为福煦实际上带有拿破仑式进攻战术的倾向。——第419页

113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第157—158页写道：“后来卢那察尔斯基以他特有的粗犷的笔调对我的革命思想作过这样的描述：‘托洛茨基同志在1905年认为，这两个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互不相同，但是彼此联结，构成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在经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进入革命时期以后，俄国和世界的其余部分将始终处于这一革命时期，直到社会革命完成为止。无可否认，托洛茨基同志提出这个观点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尽管在时间上弄错了15年。’

关于时间上搞错15年的话，后来拉狄克也重复过，但也并不因此更深刻些，我们在1905年所做的估计，所提的口号，都是以设想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不是失败，为出发点的。当时，我们既没有实现共和国，也没有实现土地改革，甚至连8小时工作日也没有争取到。但是我们提出这些要求难道错了吗？革命的失败使一切希望无法实现，岂止是我所阐述的那些前景。问题不在于革命的日期，而在于对革命内部力量的分析以及对于整个革命进程的预见。”——第419页

114 见《史料》第2辑第1期：“凡有信仰者对自己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蔑视困难，不顾危险，不屈不挠地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由于世界上事情总会发生许许多多的意料不到的变化，这样就有种种的可能，使固执己见者获得喜出望外的救助……”——第420页

115 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一位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曾和皮埃尔·莫纳特合编过《工人生活周刊》。他们两人都是法共最早的领导人之一。1923—1924年，罗斯默是《人道报》的主编，后因支持俄国党内的联合反对派而于1926年被开除出法共。——第420页

116 一般认为，这指的是1927年9月斯大林同第一个来访的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然而这篇谈话并不包含葛兰西在这条札记里所提到的内容；

再说,也很难设想葛兰西能有机会看到斯大林的这篇谈话,因为谈话记录公开发表时他已被捕入狱。但是,在他被捕以前,在他的书籍里的确夹着一本小册子,那是斯大林1925年6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演说的意大利文译本,标题是《问题与回答》,这个译本也许是9月刊行的。看来可以肯定,这本小册子正是葛兰西所提到的那篇文章。在这篇演说辞中,斯大林特别谈到了俄国党内存在着两种“取消派”的危险:第一种人认为在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里根本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第二种人认为俄国革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世界革命。斯大林接着又谈到“在那些负责处理我国对外政策的人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危险,其根源有二:一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压力,一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信心不足。——第422页

117 葛兰西所说的第一个时期显然是指大战前的第二国际,第二个时期大概是指托洛茨基在1924年以后日益鼓吹国际主义,反对关于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葛兰西所论证的是,这种要求包含着要使革命从俄国向外扩散,其方式就象拿破仑的军队把法国大革命的某些思想和成就从法国输出而传遍整个欧洲那样。——第424页

118 同时参看《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和现代国家的札记》:“在当代世界上,一致的趋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和深刻: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不但表现为全国范围甚或具有整个大陆的性质。‘总体的人’的经济基础是:大工厂、泰罗制、合理化,等等……关于社会‘一致’,应该强调指出,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某些知识分子对此表示大惊小怪实在令人好笑。一致是始终存在的,当前的问题是‘两种一致’之间的斗争,就是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一场市民社会的危机。社会上原来的精神道德领袖们感到脚底下的基础摇摇欲坠;他们觉察到自己的‘说教’已经变成纯粹的‘说教’,就是说,与现实格格不入,成为毫无内容的单纯的形式,没有灵魂的躯壳。正因为如此,才说他们是反动保守的势力;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那种文明、文化和道德一天比一天腐败,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一切文明、一切文化和一切道德的死亡;他们呼吁国家采取镇压措施,组织抵抗机构,切断实际的历史进程,从而使危机长期化,因为只有凭借危机才能遮蔽某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光辉。但是,酝酿中的新制度的代表人物,在‘理性主义’对旧的仇视的启迪下,则大力宣传理想的空想的改良计划。所谓酝酿中的新世界又指何而言呢?指生产的世界,指劳动。最大的功利主义对于创立任何分析都是必需的,它有助于说

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精神道德结构和应该宣传什么样的原理和准则。必须从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机构的效率出发来组织集体的和个人的生活。经济力量在新的基础上的发展以及新结构的进步设施，将使必然存在的矛盾得到调和，当建立起一种自下而上的新的‘一致’的时候，也就为实现自我纪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可以实现自由，包括个人的自由。”——第 424 页

- 119 埃德蒙·威塔克爵士(1873--1956)，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第 426 页
- 120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发挥的这一学说，是根据他所见到的英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而提倡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之说。美国宪法以及其他以它为蓝本的宪法都采纳了这个原理。——第 427 页
- 121 恩里科·费里的刑罚理论中所包含的主要思想是在量刑时拒绝一切关于道德惩罚的观念，主张刑罚是一种威慑的观念。——第 428 页
- 122 这个词的意大利文是“premiatrici”。——第 429 页
- 123 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1275--1342)，《和平保卫者》(Defensor Pacis)的作者。他把意大利北部兵连祸结、战乱频仍归咎于教皇统治的世俗权力，并主张教会应服从国家。坚持要求普遍限制教会的权力，他的这一主张对路德等宗教改革派的思想家有影响。——第 429 页
- 124 14世纪时，“士绅”地方议会成为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实际起作用的政权，它取代了早期发展形式的“地方自治”民主制度，是由一个家族建立王朝(多半是如此)之前的过渡阶段。在15世纪，这种王朝由教皇或皇帝承认其合法地位，称为诸侯。——第 430 页
- 125 乌尔皮恩，古罗马法学家，卒于公元228年。——第 431 页
- 126 见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伦敦，1954年版。这种观点在书中到处可见。——第 434 页
- 127 本节标题为英文版编者所加，葛兰西这条札记的原文无标题。——第 435 页
- 128 我们始终未能发现这个词在法西斯意大利时期被使用的实例，不过看来很明显的是，这个词一定使用过，即在为了反击认为反对党只是在需要批评时才有必要存在这种说法而展开辩论时使用过，而且收到了效果。1927年5月26日在墨索里尼的一次讲话中就出现过这样的辩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反对派你们怎么能行呢？……对于一个健全的政权行使职能来说，反对派是不需要的，在象法西斯政权这样

的极权主义政体中,反对派是愚蠢的多余的。反对派只是在大战前那种逍遥的时代,搞学术的时代才用得着,在议会里讨论讨论社会主义是否会实现呀,如何实现呀,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呀,而且这种辩论事实上已经够多的啦,但这显然只是说说而已,尽管有人参加辩论。至于我们,我们有自己的反对派。亲爱的先生们,我们并不是跑不快的老马,不需要别人夹鞭策。我们对自己是严格要求的……”

“自我批评”这个名词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尤其是在20年代末的苏联,无疑是已经十分流行了。塔斯卡之所以被开除出党(意共),就因为他拒绝对他在1927—1928年所持的立场作自我批评;出席1929年7月召开的第十次全会的意大利代表们不得不对意共1927—1928年的策略提出批评,同时还对意共领导在塔斯卡问题上所表现的“软弱”而提出批评;同年,这“3个人”(特别是陶里亚蒂和格里埃科)由于要求当时的意共领导对1927—1928年路线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而成了反对派。尽管如此,看来很难把葛兰西的这条札记说成是指共产党人对这个名词的用法,无论如何,从整个这一节的文字来判断,显然是指意大利的法西斯。——第436页

129 意大利文“*far epoca*”在英文中找不到确切的对应词(英语虽有“*epoch-making*”(划时代的)一词,但意思大有出入)。——第437页

130 切萨里诺·罗西在1924年马特奥提被刺以前一直是墨索里尼的新闻处负责人。马特奥提遇刺后,他被抛出来作为替罪羊,于是愤而同墨索里尼及法西斯主义决裂。他写了一部有名的《备忘录》,揭露墨索里尼在1920—1924年间所参与的一系列声名狼藉的法西斯暴行,并把这部《备忘录》交给了各反对党,自由党人阿门多拉在1925年的《世界》报上予以全文发表。很难确定葛兰西在此处所提到的“观点”究竟指哪些观点,或许是指《备忘录》里所表达的下列看法吧:“普遍的非法和懦怯的气氛是由法西斯政权的虚弱造成的。”——第437页

131 斯皮里托和沃尔皮切利是法西斯意大利的“组合经济”的主要理论家。他们声称社团主义是“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表现形式,它已经消除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葛兰西此处所说的混淆是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被调整了的”社会可以和资本主义即阶级国家共存。葛兰西在别处使用“被调整了的社会”这个词代表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思想大概是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结尾部分,恩格斯在论述国家的消亡时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

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着重点系英文版编者所加),斯皮里托和沃尔皮切利声称组合经济已经实现有秩序与和谐协调。葛兰西指出,这实际上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实现,在此以前,阶级国家将继续存在,因此决不会出现“被调整了的”社会。同时参看《过去与现在》,对斯皮里托的理论有详细的讨论:“一个根本问题是:之所以说斯皮里托和沃尔皮切利是空想,就在于他们把国家和被调整了的社会混为一谈,这种混淆的产生又是他们把许多概念按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加以串连的结果:个人=社会(这种个人并不是一个“原子”,而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地个体化),社会=国家,所以个人=国家。这种‘空想’有别于传统的空想,有别于想要找到‘最理想的国家’的一般努力的特点就在于,斯皮里托和沃尔皮切利声称他们所‘设想的’这种实体已经存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要这样对群众说:‘你们所盼望的东西,庸医们(指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所答应过给你们的东西,即被调整了的社会,经济平等之类,已经存在’。”——第 438 页

132 “道德”国家的概念同柯罗齐有关。对于柯罗齐来说,国家有两种要素,“伦理的”和“政治的”(或者叫做“道德的”和“实用的”);他认为这两种要素处于永恒的辩证的矛盾中,其具体体现便是教会与国家的矛盾。法西斯党也采用这一术语,例如参看墨索里尼1932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的学说》:“法西斯国家有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意志,因而被称为‘伦理’国家。1929年……我说过‘对于法西斯党人来说,国家不是守夜人……它是一个精神和道德事实……它教育公民懂得国民公德……’,等等。”——第 439 页

133 指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把查理十世赶走的那三天。——第 440 页

134 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结束语。——第 442 页

135 Veilleur de nuit 意思是“守夜人”。意大利文的表达法是“Stato-carabiniere”(国家—卡宾枪手)。——第 442 页

136 俾斯麦颁布过发给老弱残病者以抚恤金的法令;迪斯雷利在他所写的长篇小说中谴责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的资本主义的某些最恶劣的暴行,在他担任首相期间(1874—1880),规定了照顾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日,通过1875年的《组合法》而给予工会以有限度的承认,并于同年颁布了《社会保健法》和《手艺人居住法》等。——第 443 页

- 137 伊诺迪编辑出版时曾把葛兰西原稿中的“存在”一词改为“需要”。——第450页
- 138 显然指法西斯宣传鼓动部门吹嘘当局在公共工程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30年代的英国，赞赏法西斯意大利的人有这样的说法：“墨索里尼至少让火车准时通行”，等等。——第450页
- 139 柯罗齐在1930年9月在牛津举行的第七次国际哲学大会上作了《论反历史》的演讲。——第452页
- 140 社会党人和法西斯党人互称对方为“sovversivo”（颠覆分子），另外，别人也这样来称呼这两个党，这样就使这个词与其英语等值词“subversive”之间有概念上的差别。例如，参看葛兰西在1921年6月22日《新秩序》上发表的《反动的颠覆主义》一文中，以讽刺的笔调评论了墨索里尼在一次议会的演说中强调自己的“颠覆分子”经历的用意所在，并且指出墨索里尼实际上从来不是什么很出名的颠覆分子。——第454页
- 141 “Gentleman（绅士或上等人）”是signore一词最接近的等值词，但由于这条札记直接论述概念本身，故保留意大利文原词。——第454页
- 142 直译是“饿汉”，该词兼有怜悯与轻蔑的色彩。见正文下一段。——第454页
- 143 “carabinieri”原是1814年在皮埃蒙特成立的一支维持国内治安的武装部队，复兴运动时期以后，变成按陆军编制组织，不隶属于普通警察部队的、独立的国家公安部队，这种情况沿袭至今。——第455页
- 144 墨索里尼所撰的序。——第458页

马克思主义问题

（第459页——第544页）

- 145 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句话不是马克思说的，而是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的结语。——第459页
- 146 这里所说的“领导权的事实”当然是指苏维埃革命。至于把“领导权的概念”归诸列宁则颇为费解，因为在列宁的著作中根本没有出现过领导权（hegemony）这个词。很可能葛兰西的意思是指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理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在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的理论发展，以及例如《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1905年）一文中所提出的一

些看法等。——第 459 页

- 147 弗·奥尔查蒂：《卡尔·马克思》，米兰，1918年版。——第 459 页
- 148 《资本主义经济的价格与超价格》，副标题《马克思价值学说批判》，作者伊迪齐奥尼·阿范蒂，该书初版于 1923 年在米兰问世。安东尼奥·格拉齐亚德伊伯爵在 1922 年为罗马代表大会起草过关于土地问题的提纲，这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右翼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他是意共党内少数派的主要发言人，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统一阵线政策而辩论。1923 年初搜捕意共领导人的浪潮之后被吸收参加意共中央，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粗暴地攻击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即葛兰西在本文所提到的那本书中修正马克思主义。——第 459 页
- 149 指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的《Dell'eroico furore》（《英雄发愤》）（1585年），书中对作为思维的认识同作为积极奋斗或“英雄发愤”的认识加以区分。——第 461 页
- 150 Leitmotiv 直译为主题（或主旋律）。这是在音乐上最常用的术语，尤其是在瓦格纳作的乐曲中。——第 461 页
- 151 所谓仿真本，是指一字不易地复制作者原稿，与之相对的是评论本，即力求完美，对原稿作必要校勘或校订。发表马克思著作仿真本的重要性在于，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包括《资本论》第 2 及第 3 卷，在他去世时只是一些不完整的未定稿。恩格斯固然至少是一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编辑，但事实上，正如葛兰西在后文所指出的那样，他毕竟不是马克思，而且对原稿的校勘无论怎样仔细，终究代替不了原稿本身。——第 462 页
- 152 罗多尔福·芒多尔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热那亚，1912年版。——第 463 页
- 153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意大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重要的一位，他对葛兰西的哲学思想有极其重大的影响。——第 464 页
- 154 指《我的生平》（1930年版）中提到拉布里奥拉。这本书是托洛茨基在被苏联驱逐出境以后写的，显然不在“政治宣传”的禁书之列，所以葛兰西才能在狱中读到。——第 464 页
- 155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7—1918），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对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运动起过积极作用，1903 年以后与孟什维克同流合污。作为一位哲学家，无论在十月

- 革命以前或以后,普列汉诺夫始终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尊重,他是葛兰西所反对的正统唯物主义思潮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被列宁誉为对马克思主义最精辟的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初版于1908年问世。——第464页
- 156 奥托·鲍威尔(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员,是所谓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民主,宗教与教会》(1927年版)一书反映了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同托马斯主义的认识论和谐共存。——第464页
- 157 托马斯主义即圣·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4)的经院哲学。——第465页
- 158 “狂飙突进”是德国在浪漫主义以前的一种文学运动,以后引伸而指一切文化生活中的狂暴时期。——第465页
- 159 意大利文中的 *memento* 一词,葛兰西使用时往往既包含时间上的暂时阶段的意思,又有“方面”或“特征”以及“原动力”的意思;此处也是这种用法。——第465页
- 160 马克思主义对柯罗齐的影响,最初是相当大的,后来却等于是一种“历史研究的简单原则”,参阅贝·柯罗齐的《唯物主义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1900年初版;《柯罗齐全集》第2卷第4节)。关于对金蒂雷的影响,见《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研究》,比萨,1899年版。在这本书里金蒂雷对青年马克思推崇备至,不过他的解释是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至于对索列尔,在他后来的工团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痕迹,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都是一目了然的,甚至在他的激烈的论战文章中也清晰可辨。然而对柏格森或实用主义者却不能这样说,因为在他们的文章中即使提到马克思主义,也只是把它看作是整个现存思想的一部分。——第466页
- 161 马克斯·阿德勒(1873—1937),奥地利社会学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他同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希法亭都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从1904年形成)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着第二国际的“正统”思想,既反对列宁又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特别强调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方面,结果抛弃了革命的实践这个要素。由于他们断章取义地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只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想寻求这些规律的价值以及各种政治选择的原因,不过不是从辩证法本身的内在规律中去寻求,而是在康德的先验伦理中去寻求。——第

- 162 这两个人都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其中尤为重要 的是巴拉托诺 (1875—1947), 他曾被改良主义的社会党领袖屠拉梯说成是“我党领导集团中的哲学家”。关于这位巴拉托诺, 葛兰西写道(见 1922 年 1 月 17 日的《新秩序》): “阿德尔基·巴拉托诺右派阁下的革命词藻是盖世无双的, 只有教育家阿德尔基·巴拉托诺教授的哲学词藻能与之相媲美。……巴拉托诺的深居简出的生活, 他的理解能力, 他的想象活动, 表明他是一条只会死啃书本和报纸来吸收政治文化和哲学文化的缘虫。”——第 466 页
- 163 葛兰西的原稿中, 这个词用的是英文。——第 466 页
- 164 迪亚姆布里尼·帕拉齐先生:《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哲学思想》, 波洛尼亚, 无出版日期(1923年)。——第 467 页
- 165 这个学派的成员有: 加埃唐诺·萨耳韦米尼, 乔亚切诺·沃尔培, 尼古拉·罗多利科和罗慕洛·卡齐斯。在法西斯上台后, 这个学派瓦解, 社会党人萨耳韦米尼被流放, 而沃尔培则成为御用历史学家。——第 468 页
- 166 马里奥·米西罗利(1886—), 历史学家, 记者和编者。他的形象似乎对葛兰西有一种特殊的魅力,《狱中札记》处处提到他。在某种意义上葛兰西把他看作意大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 由于天生的机灵和浅薄, 也由于意大利知识分子生涯的普遍状况, 使他得以不必经常运用他那颇高的天分, 不管他怎样声名显赫, 也无非是一名甘愿受知识界和政治界风气之害的牺牲品罢了。——第 468 页
- 167 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一文最初发表于 1903 年 3 月 14 日的《前进报》上, 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20 周年而作。——第 469 页
- 168 在这里葛兰西似乎对 1923 年由法西斯政权的教育大臣、唯心主义哲学家乔万尼·金蒂雷主持实施的意大利学制改革特别关切。使中学里的人道主义教育颇受影响的“金蒂雷改革”的主要特点是, 企图把他所认为的意大利国家发展最终目标的“高级文化”来一个彻底的综合。——第 470 页
- 169 此处 occasionale (意大利文) 并非作时间上的“暂时”解, 而是指“非有机的”或“外表的”暂时。——第 470 页
- 170 贝·柯罗齐:《意大利巴罗克式时代史》, 1929 年第 1 版,《柯罗齐全集》

- 第3卷第23篇。葛兰西说引自《柯罗齐全集》版第11页，实际上引文出处在第12页上。——第470页
- 171 引自《Versaglia》一诗第50—52行（乔·卡杜奇：《抑扬格和抒情诗》（《Giambi ed Epodi》）。葛兰西在手稿里宣称卡杜奇吸收了海涅的思想，其实这个思想最早来自黑格尔；葛兰西在1932年5月30日致塔齐娅娜·舒赫特的信中（见《狱中书信》，第629页）写道：“黑格尔在讲授哲学史的过程中发现了法国革命同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等人的哲学之间的渊源。”——第471页
- 172 此处意大利原文为 *popolaresco*，是 *popolare*（民众的，民间的）的派生词，文中用以指“民粹派”与该词的原义不尽相符，“民粹派”一词的意大利文应为 *populista*。——第472页
- 173 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比作“倒立着的”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常用的形象说法（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以及较早的《神圣家族》第8章第4节；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4节），实际上这是套用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说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473页
- 174 盖多·德·鲁吉埃罗：《文艺复兴、改革、反改革》，巴里，1930年版。——第474页
- 175 鹿特丹的埃拉斯默（1465—1536），荷兰人道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他对路德从伦理上和神学上批判天主教机构虽抱同感，却不打算整个投身于改革阵营，究竟是出于原则的考虑还是个人安危的考虑，不清楚。——第474页
- 176 指欧洲史上从拿破仑失败及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起，到1848年革命止的那个时期。——第474页
- 177 文钦卓·焦贝蒂是“复兴运动”时期一位主要的稳健派，与蒲鲁东是一类人物，而葛兰西对他颇有好感，乍看之下令人深感意外。然而作者在另一处（手稿第185页）说得很清楚，说他们两人是一丘之貉，这指的是他们各自在法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和“比较落后的”意大利自由主义—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上，焦贝蒂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位比较激进的人物。在蒲鲁东身上，保守的因素与日俱增而有压倒雅各宾气质（借用葛兰西语）之势，而在焦贝蒂身上，趋势正好相反。焦贝蒂在逝世前一年即1851年撰写《Rinnovamento civile dell'Italia》（《恢复意大利文明》）一书时，正是在1848年革命的失败和随之而来血

流成河的镇压以后，所以他在该书中终于采取了赞成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联盟、大力恢复和加强民众力量的立场，这一立场，就其所处的时代和国家而论，比起蒲鲁东那种毫无辩证法可言的、在空想社会主义与承认资产阶级秩序(制度)之间摇摆不定的立场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第 475 页

178 参看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 19 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第 476 页

179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著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对他既十分推崇，又给予严厉的批判，特别是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从两个主要方面总结了李嘉图发现的重大意义：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理论(劳动价值论)，指出了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但葛兰西在此处和后文(原著第 412 页)关心的，并非李嘉图的结论，而是他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正如葛兰西在 1932 年 5 月 30 日致塔齐娅娜的信中所承认的，他在这里只是凭直觉而无绝对的把握，其实就是怀疑：无论是“趋向律”还是“经济人”及“一定市场”的概念，完全归之于李嘉图是否恰当？就拿后两个概念来说，最好把它们放在本世纪初“批判”(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同“纯粹”经济学进行论战的背景上来考察，这一点，葛兰西在别处(《Noterelle di economia》，手稿第 259—283 页)含蓄地提到过。在手稿第 266 页上，葛兰西把经济人定义为“对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活动的拍象，即对一定经济基础的抽象”，接着(手稿第 267 页)又说：“可以肯定，这种抽象决不会必然是超历史的，决不会具有跟经济抽象相同的性质。‘经济人’是必要的抽象，是对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活动的拍象，正如经济学家在其科学著作中所提出的全部假设无非是基于一定社会形态的全部前提一样。”关于“一定的市场”，(手稿第 269 页)写道，“纯粹经济学的一定市场是一种任意的抽象，只对学究式的烦琐分析有纯属惯例的意义。而对批判经济学来说，它应该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具体经济活动的总和，并按照一致性规律把这些活动加以归类，这些规律固然是抽象出来的，不过这种抽象并非不受历史的制约。”——第 476 页

180 葛兰西把趋向律分析为具有“真正‘历史’性质而不只是方法论性质”的规律，关于这一点参看手稿第 211—215 页上有关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札记。在此处，葛兰西也批评柯罗齐把这个规律“绝对化”而不是赋

- 于辩证的历史的意义,说来也怪,这种批评跟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第3卷第15章)对李嘉图的批评几乎相同。——第476页
- 181 这句话的出处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第477页
- 182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第478页
- 183 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第480页
- 184 见列宁在1917年4—5月间起草的《关于修改党纲的草案》第14节:“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把教学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对草案的补充说明是娜·克鲁普斯卡娅起草的,大概公开发表过,但我们始终无法找到这一文本。——第481页
- 185 意大利文为Scuola unitaria。——第481页
- 186 安东尼-劳伦特·拉瓦西(1749—1794),法国化学家,恩格斯称他是“把整个化学从其倒立着的燃素形态中颠倒过来恢复正常的第一人”。拉瓦西被处死并非由于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以前为了筹措化学实验的经费而当过包税人这样一个人人痛恨的差使。——第481页
- 187 指E.伯恩海姆的《历史方法教科书》。——第483页
- 188 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15世纪,争论的焦点是《使徒信经》中所谓的圣灵起源条款,即争论圣灵究竟起源于“天父和天子”呢还是只起源于“天父”,西方教会坚持前说,而拜占庭则坚持后说。——第484页
- 189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485页
- 190 这句话有点晦涩,把它看作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关于上述问题论述的评注,或许最妥。——第485页

- 191 葛兰西在这里所说的抽象也是指经济人这个概念而言的。——第 486 页
- 192 大家知道，“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给自己所有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从《大纲》算起）所定的标题或副标题，葛兰西也用“批判经济学”作为《资本论》的婉称。但在《狱中札记》中所出现的“纯粹经济学”与“批判经济学”的对立，意思是指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的论战。在这种用法的改变中，闹不清葛兰西究竟是指马克思本人及其《资本论》呢，还是泛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尤其伤脑筋的是，葛兰西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标准（其中有一部分是受到柯罗齐的启发），这套概念和标准本身虽然满有意思，可是它们并不考虑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顺序，而只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的概括认识的基础上。——第 486 页
- 193 大数法是一种统计原理，大致说来是这样，拍样的数目愈大，就愈有可能获得被调查“人口”的平均值。在经济学中，这意味着把各种个别情况任意组合变化而“取其平均值”将有助于表达其中所包含的基本规律。——第 487 页
- 194 这句话出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 4 章第 136 节），是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描述，原文为“che il mondo a caso pone”。——第 488 页
- 195 《贾姆巴蒂斯塔·维科的哲学》，1911年初版，收入《柯罗齐全集》第 2 卷第 2 篇。——第 488 页
- 196 葛兰西在一条有关这个问题的脚注中提到了卢索编辑出版的《君主论》（佛罗伦萨，1931年）的第 23 页上的一条注释。以下的几段文字多半是紧扣卢索版的这条注进行诠释或引证。卢索论马基雅维利的其他文章，包括他以编辑身分在《君主论》所写的导言（但不是葛兰西在这里所援引的那篇评论），都收编成集出版了（佛罗伦萨，1945年版）。——第 488 页
- 197 意大利文 Virtù 照字面直译是“美德”，不过就马基雅维利的文章来看，最好换一个不带道德联想的词来译，比如说“本领，才干”。在《君主论》里，马基雅维利把 virtù 同 fortuna（大体上相当于“环境”的意思）相对，这 virtù 实际上是指个人在一定环境下行动的能力和克服环境的能力。在拉丁文中，virtus 一词是指（例如并且尤其指）英勇善战之类的天生才能；马基雅维利想要把它变成意志力。至于英语“virtue”一词的道德

- 意义，则是经历了斯多葛派思想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的中间阶段演化而来的，在此以前，*virtue*指“内在力量”，从而也指行动恰当的能力。——第488页
- 198 “大众—民族”（或者更常见的是“民族—大众”）的概念是葛兰西思想中一个最有意思同时也是招致广泛批评的观点。据说，从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文化政策的起源上看，也许最好把这个术语理解为指介于民族愿望和民众愿望之间的一种“历史联合体”，葛兰西的广义的知识分子在这种联合体的形成中起了必要的媒介作用。但必须强调指出，这指的是大众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是一个文化概念，同民粹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第496页
- 199 莱昂·布伦什维格(1869—1944)，法国哲学家，除论巴斯加一书外，以把新康德主义的提法运用于数理哲学而著称。——第496页
- 200 由于意大利文 *sano* 同时具有体格“健康”和精神“正常”的意义，所以才产生这种问法。——第497页
- 201 朱泽佩·朱斯蒂(1808—1850)，是一位激进诗人和讽刺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反动和复辟的深恶痛绝同古风的启蒙理性主义交织在一起。这首短诗写于1849年，葛兰西的引文同原作修订版稍有出入，可能是记忆有误。——第498页
- 202 “行为唯心主义”指金蒂雷、斯皮里托等人的哲学，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种哲学认为精神具体存在于“行为”中，而不存在于自我反映的意识中。（参看乔·金蒂雷：《关于精神即纯粹行为的理论》，1916年版）关于被葛兰西说成是“声名狼藉、爱说空话的糊涂虫”的安东尼奥·布鲁埃斯，参看《民族文学和生活》1950年意文版第190页。——第499页
- 203 标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葛兰西在后文紧接着指出，只有副标题还比较贴切地说明布哈林这一著作的内容，不过那也“只有在对‘社会学’这个术语的含义严加限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说。必须指出，葛兰西本人在什么是社会学的概念上，也有点儿摇摆不定。他批评的主要对象似乎是在社会科学中所运用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这些学说的“唯物主义”形式在布哈林《读本》中的反映。——第499页
- 204 在这个问题上，葛兰西的看法与其说是针对经验主义（这是他经常批判的对象），不如说是针对以马克斯·维贝尔以及帕雷托和米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观点，他们力图在“社会学”的大题目下（这是奥古斯特·孔德首

- 先提出来的)建立一门关于人和社会的包罗万象的理论。——第500页
- 205 弗·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日)和致海因茨·施塔耳根堡的信(1894年1月25日),这两封信分别于1895年10月1日及15日在《社会主义大学生》杂志上公开发表。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两封信实际上是为了纠正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错误作法,葛兰西也就是要批判这种错误作法。——第502页
- 206 葛兰西在这里使用“文献学”这个词,一方面是按其通常意义,即指对语言和历史文献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柯罗齐根据维科的著述所恢复的意义,维科把知识分为两类:作为探索真理的科学的哲学及作为考证事实的文献学(Philology)。——第502页
- 207 所谓“非凡魅力”,是指领袖人物尽管没有法制上的权威而依然受到拥护的才能,这个概念其实不是米歇尔提出来的,而是马克斯·维贝尔提出来的,而维贝尔也是从法学家兼教会史学家鲁道夫·索姆那里吸收过来的。——第503页
- 208 详细情况见《政治党派》一书(德文原著书名为:《党派社会学》,1911年出版。从意大利文转译的英译本于1915年刊行)。罗伯特·米歇尔(1876—1936),是一位(最初)具有社会民主倾向的德国社会学家,最初移居瑞士,后来转到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他取得意大利国籍。米歇尔以其“寡头政治的铁的法则”而出名,他同莫斯卡和帕雷托都是政治杰出人物统治论的创始人。尽管葛兰西对米歇尔的方法很明显地表示蔑视,而且也讨厌他的政治学,但还是有人说,米歇尔和杰出人物统治论对葛兰西本人关于非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结构理论有某些间接的影响。(参阅G·加利的《葛兰西与杰出人物统治论》一文,收入《葛兰西与当代文化》第2卷,第201—217页。)——第504页
- 209 指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908年英文版。——第506页
- 210 参看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3部分。——第509页
- 211 烦琐哲学逻辑对推理错误类型所作的分类。——第514页
- 212 乔治·贝克莱后来当上爱尔兰的克洛伊纳教区的主教,但在青年时代他发表主观主义哲学时只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小教士。——第515页

- 213 伯·瓦里斯科的《批判的哲学大纲》于1925年问世。瓦里斯科(1850—1933)受培养当科学家,却成了一位著名实证主义哲学家,但后来逐渐转向唯心主义,最后又转成一种宗教哲学,这种哲学把上帝看作是证实世界的实在的“绝对主体”。——第517页
- 214 即所谓的polemica della zucca。——第518页
- 215 指本杰明·康斯坦特(1767—1830)的《日记和家信》,书评刊登在1929年1月的《批判》上。——第519页
- 216 维尔纳·桑巴特(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魏玛时期成为保守党右翼理论家。——第519页
- 217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英译者埃米尔·伯恩斯,伦敦[未注明出版年月],第54页)。“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第519页
- 218 意大利文 *universale soggettivo* 也可译作“主观的普遍性”。但基本意义不变,即指:主观主义者所要求的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存在某种单一的认识主体及没有分化的人类,从而使人人认识变得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下,才能避免陷入武断的相对主义的迷误。——第519页
- 219 指伯特兰·罗素的《哲学问题》,1912年出版。“爱丁堡在地球上的地理位置在伦敦所占位置的北面,即使人类根本不知道何谓南北,即使天地间根本不存在思维,情况也是如此。”(引自1967年版第56页)——第521页
- 220 葛兰西(对卢卡奇)作出这样的批评应该说是十分牵强附会的,他这样说的依据何在,根本不得而知。卢卡奇在其评论布哈林的《读本》的文章中写道:“……[辩证法的领域]乃是整个历史过程的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各个个别的、具体的和不可重复的阶段正是通过彼此之间有着的质变,正是通过它们的客观基础的不转化,显示出这一过程的辩证实质的”。即使在那本所谓非常“唯心主义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看不出卢卡奇有提倡自然史与人类史之间的二元论的观点。《葛兰西选集》(1950年法文版第153页注)中对《我通向马克思的道路》一文的论述,也无法得出葛兰西所下的结论,看来他的依据只是当时德波林等人所作的批判卢卡奇的报告。——第522页

- 221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引文。黑格尔的这条格言在他的《法哲学》中。——第 523 页
- 222 柯罗齐认为，布鲁诺的思想，以及 16 世纪一些非正统哲学家和泰莱修斯和康帕奈拉等人的思想，包含着“现代的”反先验论思想形态的萌芽，此说一出，唯心主义评论家竞相响应，就连马克思主义者也表示支持，不过是有保留的支持。——第 524 页
- 223 指米·布莱埃尔的《论语义学》，这部著作的第 1 版于 1897 年在巴黎出版。英译本《语文学，语义科学研究》于 1900 年在伦敦出版。——第 524 页
- 224 从字面上讲，“dis-grace”的意思是失去神的恩典，所以从逻辑上讲，包含着宿命论的观念。同样，“dis-aster”是指某种不祥的星象。在现代英语中这两个词都已失去其原来的含义。但正如葛兰西在另一条札记（手稿第 159 页）中所指出的那样，系统地创造新词以避免在术语使用上可能产生的混淆，此事由来已久，而且有着种种有趣的掌故。在这条札记中葛兰西还提到了皮埃特罗·乔尔丹尼在事隔多年以后回忆他在 1805 年跟拿破仑的一次谈话，据称拿破仑说过这样的话：“……我以为，凡是科学上的重大新发现，一定得给它创造一个崭新的名词，这样做，就能使新概念显得确切而突出。如果只是沿用旧名词添加新意，那么不管你怎么使劲强调，说这个名词原先所表示的概念跟最近新加上去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在人们的头脑里仍不免会产生某种联想，认为这新旧两种概念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和共同点。”——第 526 页
- 225 阶级斗争的委婉说法，（为了对付检查制度）。关于下文紧接着所说的，统治的社会集团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参看《知识分子的形成》一文，第 5—14 页。——第 526 页
- 226 事实上，马志尼学说本身就是极其模糊和毫无内容的，更不必说它的通俗解说了。马志尼虽然积极参加了 1849 年的罗马共和国（为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一——译者），却始终未能，尤其是在 1860—1870 年这样关键性的年代，对教会和教皇的地位提出一种明确的政策，而他所提出的“上帝与人民”的口号却为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的和新天主教的感伤主义提供了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借口（1850 年以后马志尼的影响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不在直接的政治方面）。马志尼主义代表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浪漫爱国主义激情的衰退，与此同时则有“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之崛起。——第 528 页

- 227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兰格：《唯物主义史及目前对其重要性的批判》，第二次修订版，1873—1875年。——第 529 页
- 228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明并加以批评的那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因为它是建立在客观现实同人的主观的独立领域之间的基本二元论的基础之上的。——第 530 页
- 229 大概指《神圣家族》(第4章第3节)论述法国唯物主义的那一节，可是马克思在这一节里根本没有象葛兰西所设想的那样，对法国古典唯物主义大加批判。——第 530 页
- 230 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他在《跋》中写道，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因此，合理的辩证法特别是针对黑格尔所发展的辩证方法而言的，但这不等于说，它应当从“唯心主义的”变成“唯物主义的”，那是费尔巴哈的观点，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 530 页
- 231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版序言：“……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它也有长期的经验的历史，其时期之长短和经验自然科学的历史正好是一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第 531 页
- 232 柯罗齐论述洛里亚的文章写于1896年，那时他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是非正统的；该文后来收入《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1900年版，《柯罗齐全集》第2卷第4篇，第23—56页)。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抨击洛里亚把马克思庸俗化和剽窃马克思的那段文字的扩写。阿基尔·洛里亚(1857—1943)是一位学究式的经济学家，自称为有创见的思想家，在19世纪80和90年代曾经出过一点风头，不光在意大利本国。洛里亚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历史经济主义”，其实只是庸俗经济学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大杂烩，毫无特色可言，葛兰西把它作为“一部分意大利知识分子的思想从而也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某些退化反常的”例证(《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第169页)并称之为“洛里亚主义”。——第 532 页
- 233 转引自柯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41—42页，同时也是下面引述洛里亚的文字并作进一步评论的资料来源。葛兰西在狱中几乎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书籍，所以此处根据意译本转译引述的那段马克思著作中的引文，对他来说异常重要。——第 532 页

- 234 见前引柯罗齐书中第43页。——第533页
- 235 葛兰西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推崇备至，无以复加，把它看作既是葛兰西本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源泉，又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指针。——第533页
- 236 奥托·鲍威尔：《社会民主、宗教和教会》。——第536页
- 237 葛兰西原文写成“关于抄袭或模仿的著作”，想系笔误。——第536页
- 238 卢易吉·坦西洛(1510—1568)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不出名的诗人，乔尔丹诺·布鲁诺在对话《论英雄的愤怒》中把坦西洛作为假想的对方。在《对话》中布鲁诺借坦西洛之口来宣传自己的哲学。本文的例子引自《对话Ⅲ》，在这里坦西洛引述了几首自己写的爱情诗，其内容变成似乎不是向女子求爱，而是渴望知识。柯罗齐在《美学问题》(1910年)一文中探讨了这种做法的美学意义，这篇论文也是葛兰西的资料来源。——第536页
- 239 在入侵厄立特里亚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多加利战役(1887年)使意大利的前卫部队全军覆没。——第536页
- 240 在柯罗齐的形而上学中，“经济学”也跟逻辑学、美学和伦理学一样，是一种独特的范畴。——第538页
- 241 “鲁滨逊精神”是人们(例如马克思)给下列思辨推理所定的名称，仿照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的模式，假设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孤零零的个人，根据他的需要来推断社会生活的各种形式。——第539页
- 242 斯皮里托是鼓吹社团国家的理论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最初是金蒂雷的门徒和拥护者，30年代同金蒂雷的行为主义分道扬镳。1930年前后，在有关国家的作用问题上，他同金蒂雷一唱一和，反对柯罗齐和伊诺迪，但他主张公民通过“社团”服从国家，比金蒂雷的观点更为极端，并且包含着反资本主义的暗示(“作为财产权的社团”)，这无疑使金蒂雷提出若干保留看法的原因。——第542页
- 243 《短篇小说选》又称《百篇古典小说》，是现存最早的19世纪意大利短篇小说选。在这里所谈到的故事是集子里的第9篇，葛兰西根据记忆叙述，在情节上颇有出入。——第542页
- 244 《二人集》是一部歌德和席勒挽歌体对句短诗集。此处的译文是根据柯罗齐的意译本转译。——第543页
- 245 恩格斯于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

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第544页

《狱中书信》

（第545页——第590页）

- 246 Für ewig, 不朽, 永久, 也可引伸为公正或超然。意大利诗人乔万尼·帕斯科利(1855—1912)有一首抒情诗的标题叫做“永久”。——第547页
- 247 《狱中札记》中有许多关于研究这个问题的笔记和要点。这些材料现在收入《知识分子与文化组织》这一卷里。葛兰西用札记第29里的这样一句话, 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一卷里的开卷第一句话:“知识分子是否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集团, 或每个社会集团是否有自己特有的知识分子?”来对这个问题作全面的系统阐述。因此, 这个研究不局限于社会学问题, 而且还概括地涉及历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第547页
- 248 指葛兰西在1926年10月即被捕前一两个星期所写的一篇题为《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的未完成的文章。警方搜查时对这份手稿未加注意, 后来, 一位共产党人斗士卡米拉·拉维拉发现了这份手稿, 把它带到了瑞士。这篇文章于1930年首次发表在意共在法国出版的期刊《工人国家》上, 并秘密运入意大利。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以相当多的篇幅讨论贝奈戴托·柯罗齐, 把他列为专题加以研究并作了全面的分析批判。凡有关柯罗齐的笔记今均收入《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奈戴托·柯罗齐的哲学》卷。——第547页
- 249 马泰奥·巴托利(1873—1946), 都灵大学语言学讲座教授, 是个历史语言学家。葛兰西虽然对语言学感兴趣, 但在被监禁时期并没有进行大量研究, 在《狱中札记》中只有一些零星的有关这个题目的笔记。关于本文所指, 可参看《札记》的《文学与民族生活》卷中的《民族语言与语法》一章。——第548页
- 250 1916—1920年, 葛兰西任都灵《前进报》的编辑并撰写戏剧评论。这些戏剧评论, 其中包括一些介绍卢易吉·皮兰德娄的重要文章, 已收入《文学与民族生活》卷的附录里, 该卷还收录了葛兰西在狱中所写的有关皮兰德娄的一些笔记。阿德里亚诺·蒂尔格尔(1887—1941), 意大利著

- 名散文家和哲学家，最早承认皮兰德娄剧本在戏剧和哲学方面的创新作用者之一。——第 548 页
- 251 葛兰西在狱中所作有关这个题目的笔记，差不多全部收入上述《文学与民族生活》卷的论述民众文学的那一章里，葛兰西在那一章里阐述了他的关于“文学的民族大众性”的理论。发表在《人民呼声》报上的几篇文章表明葛兰西早在被捕入狱之前就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第 548 页
- 252 事实证明，葛兰西的计划（在本文中分为四个方面）要比原来订的宏大，虽然他删改了一些题目，却又增加一些研究课题。意大利复兴运动，马基雅维利与《现代君主》，贝奈戴托·柯罗齐，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及根据新的历史作用更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全部问题等等——都是葛兰西在狱中所研究的问题的一部分。——第 548 页
- 253 约·沃·歌德：《与埃克曼的谈话》，弗兰兹·戴贝尔编辑（莱比锡，1921）。葛兰西在狱中把戴贝尔写的引言，埃克曼对谈话第一、二、三部分所加的前言，以及谈话本身的前100页译成意文。《札记》第 26 中也包括有一批歌德的书信和诗歌的意译文。——第 551 页
- 254 葛兰西所读的格林童话集系莱比锡版。《札记》中有他翻译的不同片断译文。——第 551 页
- 255 卢易吉·伊诺迪曾在都灵大学讲授财政学。——第 551 页
- 256 该书作者为阿尔伯托·德·斯蒂法尼，1922—1925 年曾任第一届墨索里尼政府的财政部长。——第 551 页
- 257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于 1925 年译成意文。——第 551 页
- 258 斯蒂法诺·杰契尼：《农业研究，导论，最后报告，伦巴第研究的结论》，皮亚琴察，1926年版。——第 551 页
- 259 乔亚切诺·沃尔塔(1876—1971)，意大利作家、历史学家，以对中世纪的研究而出名，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第 551 页
- 260 弗朗切斯科·德·森克蒂斯的《意大利文学史》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这部著作吸收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并包括有大量历史和政治资料。葛兰西在《札记》里有一系列的笔记是讨论德·森克蒂斯的，现均收入《文学与民族生活》卷，在该卷的一篇同柯罗齐的冷静超然、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进行论战的文字中，葛兰西提出“回到德·森克蒂斯”的主张。——第 551 页
- 261 葛兰西母亲的故乡，属撒丁大区，葛兰西从小在那里长大。——第 553 页

- 页
- 262 指由法西斯中央政府为取代民选市（镇）长而任命的市镇首席行政长官。——第 553 页
- 263 1922年12月18日，杰纳罗在都灵遭到法西斯分子殴打而受重伤。——第 554 页
- 264 紧挨吉拉扎的邻村。葛兰西以幽默的说法暗指两个村镇之间的激烈敌对。——第 554 页
- 265 指朱泽佩·普雷佐里尼编辑的选集。——第 555 页
- 266 一种佛罗伦萨出版的文化评论。——第 555 页
- 267 这封信预先提出了葛兰西后来在《札记》的大量章节中用以论述马基雅维利的某些论点，这些论述均收入《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札记》卷中。葛兰西显然不同意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传统观念，并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赖以产生和形成的具体历史情况。——第 556 页
- 268 这部书是政治集团“法兰西行动”与梵蒂冈在1926年法国政治危机时期发生争论的产物。1924年，巴黎成立了一个左翼政府，即所谓左翼联盟。通过了一些法律以削弱军队的权力并阻止当时正进行着的“复旧”过程。但不久以后就出现右翼的反击，造成1926年初的严重危机，结果产生了以雷蒙·普安卡雷为首的“宗教联合”政府。“法兰西行动”指挥了一场运动把政局进一步推向右转以恢复君主制，但它的这一企图没有获得梵蒂冈从而也得不到法国天主教徒的支持。法国的天主教组织包括“法兰西行动”在内，均以争取议会中的议席为目标，尤其因为，如葛兰西在下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解释”了农民的需要，农民要求在议会中有代表。同时不应忘记，极端排犹的“法兰西行动”在得到右翼以及在德雷福斯案件中遭到挫败的种族主义集团的支持和赞同后，它的实力有了迅速的增长。——第 557 页
- 269 “混合问题”和“正当自由”是梵蒂冈与“法兰西行动”争论中的正式措辞。后者认为宗教当局不应干预政治事务，信徒们必须“按照他们各自的政治信仰”进行投票。葛兰西使用“教规式讨论”这个措辞，意谓这场争论中所使用的语言和提法，都是以罗马教会的宗教法典为依据的专门术语。——第 557 页
- 270 “天主教行动”是直接依附于罗马教廷的意大利天主教一般信徒的组织，葛兰西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札记》中有简短的一章专门加以论述。这个组织成立于1848年。爱德华·居里埃·德·卡斯特尔诺(1851—

1944), 法国将军, 参加过 1870 年的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 年当选为议员, 作为国民议会军事委员会主席, 支持 1923 年各项军事法的实施。这些军事法后来为左翼联盟所废止。他随后成为法国一切天主教组织的首领。——第 557 页

271 埃米尔·孔布(1835—1921), 法国激进党政治家, 1902 至 1905 年任内阁主席。以其反教权政策以及禁止在学校举行宗教集会和进行宗教教育的纲领而名重一时, 并最终使国家同教会完全分离。在孔布执政时期, 法国断绝了同罗马教廷的关系。——第 558 页

272 《逗闹》, 法国一家著名的讽刺幽默报纸, 具有浓厚的民主色彩, 创办于 1832 年, 一些著名的美术家, 如多米埃、格朗迪维尔、加瓦尔尼等, 均曾受聘在该报任职。“逗闹”(Charivari) 一词的本义是“声势浩大的表示反对的喧嚷”。——第 558 页

273 雅克·马里坦(1882—1973), 法国作家、哲学家, 原来信奉新教, 1906 年皈依天主教。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即鼓吹恢复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为罗马教廷的官方哲学。葛兰西在信中所指的第一本书是《宗教至上论》(巴黎, 1927), 第二本书即为毛拉斯辩护的那本书是《评夏尔·毛拉斯及天主教的职责》(巴黎, 1926)。

后来, 葛兰西在 1930 年 4 月 7 日的信里又重新提到这个问题: “时至今日, 那本关于‘法兰西行动’与梵蒂冈的书已经过时, 只有其中的第 1 卷也许还继续有用, 因为多代和毛拉斯仍然孜孜不倦地添油加醋, 揪住这个问题不放。正因为如此, 这一卷作为对原则的解释可能仍然有其重要性。我不知道你(葛兰西的这封信是写给他的二姨子塔妮娅的) 是否理解梵蒂冈与君主主义派之间为法国历史而引起的这场冲突的意义。……这是意义深远的政教和解的法国版。已经组织为法国的‘天主教行动’的大部分法国天主教徒, 正逐步断绝同君主主义少数派的联系, 从而不再成为正统王权拥护者发动政变时的潜在的群众后备军, 同时它企图成立一个广泛的天主教共和党, 把相当大一部分今天的激进党人都拉进去……”但对这个问题作最详尽的探讨是 1933—1934 年的《札记》第 30, 即如今收入《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札记》的那一卷, 其中有题为《关于法兰西民族生活的札记》的论文提纲。1926 年的法国危机被列为单独的一章。必须指出, 葛兰西之所以重视这个研究, 不仅在于他对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形成进行分析, 而且由于它同罗马教廷与意大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的首要问题有联系; 因为恰恰就在那几年里, 法西斯

政府同罗马教廷之间正在商定一项契约，并且终于在1929年正式签署。——第558页

274 古罗马将军凯乌斯·马里乌斯于公元前102至101年期间打败了一些日耳曼部落，即辛布里和条顿。——第558页

275 他在先前的一封信里写道：“你得替我查对一下托尔斯泰所说的福音派对邻居的概念的确切含义。我记得他似乎是遵循这个词的字面的、辞源的意义：‘同你十分接近的人’，——换句话说，指你的家庭成员，充其量指本村人”。——第560页

276 关于对佛教的进一步论述，参看《札记》的《知识分子》卷中的下列条目：“关于中国文化摘要”和“关于日本文化摘要”。上述摘要，作为关于知识分子形成的研究中的章节，论述了基督教在东方的影响以及佛教和其他东方宗教在西方的影响。“首先”，葛兰西写道，“佛教连同中国文化为日本的有文化教养等级所接受。结果产生了一种宗教综合：儒教的佛教—神道教因素”。但是他也强调指出东方的宗教改革与民主发展之间的联系，并同欧洲的基督教进行比较：“与基督教不同，佛教并不想连根拔掉各种先前存在的民族宗教（在欧洲，各种民族倾向是在基督教信仰的范围内显示出来的）”。——第561页

277 葛兰西在上述《摘要》里坚持认为，佛教不是偶像崇拜；在论述日本的佛教时，他把“宗教”同“神话”区分开来，他认为后者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艺术’或‘民俗’因素”；前者是“一种仍然生气勃勃地起作用的有价值的世界观”。记载上述摘要的《札记》所注明的日期是1929年。——第561页

278 此处用了个俄文词подполье，意思是“地下”，在比喻的意义上作“秘密的”解。——第562页

279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止，一个索尔多等于1/20里拉，是面值很小的辅币。——第563页

280 葛兰西在1929年3月25日致塔妮娅的信里，向被关押在意大利另一地区的一位政治犯安东尼奥·桑纳推荐了各种哲学读物。——第563页

281 达里奥·尼科德米(1874—1934)，诙谐小品通俗喜剧和法国感伤喜剧作者。信中提到的问题是葛兰西关于民族大众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构成《札记》的一个重要章节。这些笔记今均收入《文学与民族生活》卷，葛兰西在该卷中表达了类似的见解：“在戏剧方面，达里奥·尼科德米的重大成功无疑是由于他把同民众意识有密切联系的题材

- 材戏剧化；《残余》、《白鹭》、《飞翔》等作品的情况就是如此”。葛兰西在论述民族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结合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时说：“应该指出，在不少语言中（例如俄语、德语……及法语……）‘national’和‘popular’为同义词或近义词。在意大利，‘national’一词具有在意识形态上严格限制的意义，无论如何不能同‘popular’重合，因为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严重脱离人民，换言之，即脱离‘民族’，而同传统的种姓等级制度结合在一起，这个种姓等级制度从来没有被任何来自下面的民众的和民族的强大政治运动所砸碎”。——第 564 页
- 282 西尔维奥·斯帕文塔(1822—1893)，意大利南方政治家，意大利自由运动领袖之一，两西西里王国的秘密帮会“意大利统一”的缔造者。1849年3月被波旁政权的警方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1859年减为放逐，不久，斯帕文塔便到达伦敦。1860年，加里波第解放了那不勒斯，于是斯帕文塔回到了意大利，随即任公共工程大臣。同其弟伯特兰多一起，在振兴意大利的哲学研究方面起主导作用，并且是意大利最早提倡研究黑格尔著作的倡导者之一。葛兰西在信中所提到的文集编辑了从席卷大半个意大利半岛的1848年革命起，到宣告统一时止的有关资料。——第 565 页
- 283 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的右翼，包括加富尔伯爵的政治支持者和真正的温和派。前者受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竭力主张采取外交手段是解决“意大利问题”的唯一办法，后者认为实行有限选举的君主立宪制才能实现统一。历史右翼（加富尔死后人们对其党徒的称呼）政府从宣告统一（1861年）起一直执政到1876年，当时任公共工程大臣的西尔维奥·斯帕文塔所提出的铁路国有化法案交付表决后，政府倒台。——第 565 页
- 284 葛兰西大概指苏联国家出版社。——第 568 页
- 285 朱泽佩·索尔维奥利的《古代世界的资本主义》，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那样，于1906年在巴黎出版，是若尔日·索列尔向《国际政治经济学丛书》主编推荐的作品。——第 568 页
- 286 卡尔·考茨基对索尔维奥利的作品写了书评，随后亲自把它译成德文，加长篇引言予以出版（斯图加特，1912）。考茨基（1854—1938），德国政治家，曾任恩格斯的秘书，第二国际领袖，创办社会民主党刊物《新时代》，写过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后来逐渐放弃左翼立场而采取中间立场，最终成为民族主义者，1917年后持反俄观点。

——第 568 页

- 287 西奥多·蒙森(1817—1903),德国19世纪最著名的古罗马史学者、政治家、议员。——第 568 页
- 288 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2 篇《货币转化为资本》第 6 章中(原文如此——译者),马克思在一条脚注中写道:“在有关古希腊罗马的一些实用百科辞典中,可以看到一种谬论:在古代世界,资本就有了充分的发展,‘所缺少的只是自由工人和信用事业’。蒙森先生在他的《罗马史》中也一再陷入混乱。”这条脚注是加在下列正文之后的:“但是,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存在各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90 页)——第 568 页
- 289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罗斯托夫捷夫(1870—1952),著名俄国历史学家,后移居美国。主要代表作是《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史》(牛津,1926),该书以“经济学家”的方法治史。——第 568 页
- 290 古利耶尔莫·费莱罗(1871—1942),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有研究古罗马的著作多种。葛兰西在《知识分子》卷的“洛里亚主义”一栏里对巴尔巴加洛和费莱罗分别加以论述。——第 568 页
- 291 科拉多·巴尔巴加洛(1877—1952),意大利实证学派历史学家,著有多卷本《世界史》,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即是马克思和葛兰西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治史观点。——第 568 页
- 292 贝奈戴托·柯罗齐把马克思主义只作为一种历史编纂学的方法来接受。他勉强承认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经济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完全的哲学意义。柯罗齐对马克思的批评自然是以柯罗齐的哲学观和一般唯心主义观为基础的。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观削弱了唯心主义的基础。——第 569 页
- 293 指对意大利各市镇的文化形成(11至14世纪)到它们转化为寡头统治城邦(僧主和公国)的研究,寡头统治城邦是意大利从 15 世纪起的历史特点。——第 569 页
- 294 这是对佛罗伦萨毛织工人行会会员的称呼,他们在 1378 年造反,成功地抵制了寡头统治的法令。他们后来遭到失败,遂使僧主得以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第 569 页

- 295 在13至14世纪，佛罗伦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许多受行会排挤的工匠要求成立各自的组织。‘只要最富裕的阶层（其中一部分是由行会本身形成的，不论是人数较少的高级工匠行会或人数较多的一般工匠行会）控制着佛罗伦萨市政机构，至少它抵制这种要求。——第 569 页
- 296 卢易吉·卢索(1892—1961)，民主派文人，文学史家，主编过各种文化评论刊物，其中包括《新意大利》和《太阳神》，后者于1945年创刊，今天仍继续出版。——第 570 页
- 297 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俄国作家，政治家，文学批评家，戏剧家。俄国1905年革命后，多年流亡国外。列宁的合作者之一，1917至1927年任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对欧洲文化涉猎甚广，同许多先锋派的人物过从甚密，同时也提出批评意见，在当教育人民委员之前，他同托洛茨基及高尔基一起在苏联为先锋派的观点和动机辩护。葛兰西所提到的大会是1930年9月1日至5日在牛津举行的第七次哲学代表大会。他所说的那封信出现在卢易吉·卢索的《牛津代表大会》一文中，载《新意大利》1930年10月10—20日。柯罗齐在该信中写道：“我必须向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指出，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明确的反形而上学和极端现实主义观念之上的，其实，同他的信念相反，这种学说比形而上学还要糟；它是神学的，它实际上把现实的单一过程划分为基础与上层建筑，本体与现象，并且把一尊隐藏着的神——经济学置于作为本体的现实的基础之上。经济学主宰着一切并被认为是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等现象中的唯一现实。正因为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在阐述诗歌或艺术的理论方面毫无用处，因为任何唯物主义概念绝不可能是美学的，而必然永远是经济学的……”——第 570 页
- 298 柯罗齐对马克思主义看法方面的局限性，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主要是由于他在文字上对马克思著作进行曲解，多半从实证主义角度去揣度，同时也由于他本人的政治偏见。柯罗齐本人1928年发表在《圣路易邮报》50周年纪念特刊《现代世界潮流》上的一篇短文便是这方面的证明。柯罗齐写了一篇题为《反对历史唯物主义遗风》的文章，在那个社会政治大动荡时期，这篇文章只能为美国的反工人阶级的感情浪潮提供支持（当时正是萨科和范泽蒂的年代，大萧条已经初露端倪），只能为当时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持。这篇文章坚持了上述信中所包含的理论（后来连同其他论文一起收入《文明的趋势，圣路易邮报 50 周年纪念文集》，纽约，1929年）。——第 571 页

298 葛兰西确实是在柯罗齐的一本著作里看到了埃拉斯默的那句话：“凡受路德教支配的地方，文学凋零”，出自他1528年6月20日致皮尔海默的信。葛兰西在《历史唯物主义》卷第85页提到这件事，在第222—224页讨论了前面引述的柯罗齐所写的那封信：

“柯罗齐在牛津大会美学组的发言，把他在《19世纪历史编纂学史》中所提出的关于实践哲学的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于柯罗齐对实践哲学的最新见解，我们应如何分析评价？……我们必须认为它不是一种哲学批评，而是一种抱有直接实践目的的政治行动。很明显，已经形成了一股‘蜕化变质的’实践哲学潮流，这个潮流同奠基人（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原编者）所表述的学说的关系，大体上如同平民百姓的天主教同神学或知识分子天主教徒思想的关系那样。平民百姓的天主教由于包含迷信和巫术的成分，可以被看作不能同天主教相提并论的偶像崇拜或低级宗教，同理，这种第二流的实践哲学也可以看作康德和笛卡儿以前的哲学所固有的‘神学的’或先验论的。因而，柯罗齐的表现便兼有反教权的共济会员与‘庸俗’唯理论者的特点，他们就是利用上述类似手段同天主教竞争的……”

然后，葛兰西又设问：

“任何一种哲学，如果越出了通常的知识分子小圈子范围，传播到民众中去，逐渐适应民众的心理，也必然逐渐失去其某些重要素质，那么，这究竟是加强还是削弱？任何一种世界观，如果在民众中广泛流传、深深扎根，并且由于不断涌现杰出的知识分子而经常更新，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厚古薄今的知识分子才相信，任何一种世界观可以被合理的批评所摧毁。”

葛兰西对这个课题作了如下有保留的结论：

“常常有人说，在某些国家里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这是市民社会各个领域中出现倒退的原因，但是从来没有人指出，实践哲学的传播和当代的各种伟大改革，是一种正在一国范围内实现自由主义只能为少数人实现的目标的、道德和精神改革。”

在这里，葛兰西想要论证的是，柯罗齐同他的历史编纂学观点和一般方法论自相矛盾，这些矛盾根源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具有直接政治性。——第571页

300 指墨索里尼。——第572页

301 克齐奥·马拉帕特（库特·E·冯·萨柯特的笔名，1898—1957），意大

- 利记者，作者，最初拥护法西斯，但完全持玩世不恭的态度。——第 572 页
- 302 葛兰西指塔妮娅1931年8月28日信中这样一段话：“为了撰写一部完整的知识分子史，你手头当然需要备一大批书。但是目前，为什么不先写个粗略的草稿，等你可以自由地接触各类图书时再加工？你过去总是指责皮埃罗在学术上过于谨小慎微，束缚他的写作；看来他从未自动矫正过这个毛病，但是10年记者生涯没有矫正你，这可能吗？”他们提到的皮埃罗即经济学家斯拉法。——第 573 页
- 303 乌姆贝尔托·科斯莫教授是著名的但丁专家，葛兰西在都灵大学读书时听过他的课。——第 573 页
- 304 葛兰西几乎每天都在《前进报》都灵版的“大厦底层”专栏上发表短评，今均收入同名文集中，同时，他还为《人民呼声》报撰稿。葛兰西的文章确实精采，今天读来依然生动有力。——第 573 页
- 305 葛兰西是1921年在都灵的“人民之家”里结识普雷佐里尼（一位狂热的干涉主义者和墨索里尼的拥护者）的，普雷佐里尼在那里作题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系列讲座。普雷佐里尼在《意大利文化》（1923）一文中对《新秩序》有好评，并在《无用的意大利人》（1964）一文中提到他同葛兰西邂逅相遇的情况：
“我不大擅长讲演。但是，同工人们讨论以及同葛兰西交谈，给我留下了某种印象。葛兰西是意大利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办的《新秩序》有创见，他本人有信仰，有能力，有远大的抱负。”——第 573 页
- 306 詹·拉姆赛·麦克唐纳，英国政治家，1924年曾领导第1届工党政府。塞缪尔·龚珀斯（1850—1924），美国右翼工会主义者，1886年起任美国劳联主席。弗朗科·恰尔兰蒂尼所编的那套丛书叫做《政治文化丛书》，在米兰出版。——第 573 页
- 307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卢易吉·伊诺迪——在葛兰西青年时代，伊诺迪已是都灵大学教授，——在一篇介绍《经济学家新丛刊》（该套丛书由米兰乌泰特出版社出版）的书评中提到由皮埃罗·斯拉法编辑的大卫·李嘉图文集，这篇书评载《社会改革》1931年7月—8月号。大卫·李嘉图的《论竞争条件下的利润规律》一文（载1926年12月的《经济学杂志》），发动了一场对以市场规律为基础的经济理论的修正。斯拉法和多布合编的李嘉图著作评注本至今仍然刊行，其书名为，《大卫·李嘉图著作和书信集》（剑桥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 573 页

- 308 卡洛·卡塔尼奥(1807—1869)，意大利19世纪最伟大的民主思想倡导者之一。在1848年的“米兰五日”期间领导过军事委员会，后来流亡法国和瑞士，1859年回到意大利。曾多次当选为议员，但为了不作违反自己共和理想的宣誓，从未正式参加议会。——第 574 页
- 309 葛兰西在《复兴运动时期》第13页说：“作为欧洲历史运动的文学表现，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最活跃的中心是意大利；尽管在公社时期曾有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在公元 1000 年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却使意大利的这一过程缓慢了。然而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葡萄牙，这个历史运动终于发展到形成民族国家并对外扩张，事实表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是压制性的。在意大利，从亚历山大六世开始，教皇统治机构被确立为一个专制国家，相应于其他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但与此同时，它造成意大利其余部分的分解。在意大利人中，只有马基雅维利最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文艺复兴未能产生一个民族国家，那它就是徒有虚名；不过他的思想主要集中于意大利外部的事态，而不是意大利内部的事态。”——第 574 页
- 310 葛兰西在1929年 8 月26日给塔妮娅的信里已经谈到过此事：“关于《地狱篇》第10章，我已获得一个小小的发现，我相信，这个发现可以对柯罗齐关于《神曲》的过分绝对的理论作部分的纠正。”嗣后在本信中，问题清楚了，原来葛兰西所关心的不是对但丁《神曲》的诠释评注，而是有关文艺评论的一般方法。——第 575 页
- 311 葛兰西指塔妮娅对犹太人和犹太问题发表看法的那封信。——第 576 页
- 312 信中引用了一句拉丁谚语，用的是拉丁文。——第 576 页
- 313 葛兰西指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载1843年《德法年鉴》，马克思当时还同黑格尔左派的民主激进分子合作。葛兰西在狱中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译成了意文。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如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结果是市民社会同政治社会分开。现在必须证明：把“作为人的人”同“作为公民的人”撕裂开来的原因是私有财产。（马克思当时还没有达到关于资本主义财产的历史观。）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才能治愈这个撕裂，同时也就附带地解决了“犹太人问题”。马克思的这篇长文是一篇评述1842年布朗施威克出版的布鲁诺·鲍威尔所著《犹太人问题》的书评。鲍威尔在1842年以前是马克思的友人，是黑格尔左派的代表人物。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犹太人团体一直为自身的解放而奋斗，因此马克

- 思在文章开头写道：“德国的犹太人要求解放。他们到底要求什么样的解放呢？公民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第 577 页
- 314 奥伦堡为古代囚禁犯人的要塞，1773—1774 年曾受叶梅里扬·普加乔夫指挥下的哥萨克围攻。1918—1925 年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第 577 页
- 315 葛兰西为阿尔巴尼亚族的姓。在阿尔巴尼亚东部至今仍有一个村子叫“葛兰西村”。——第 578 页
- 316 指 1932 年发表的柯罗齐的《欧洲史》头几章，其要旨已于上一年以提要的形式连同柯罗齐的亲笔信，由那不勒斯道德与政治科学院作为“19 世纪欧洲史导论”公开发表。——第 580 页
- 317 柯罗齐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是在意大利报刊上发表的。1918 年 3 月，葛兰西对其中一篇论述莫里斯·巴雷斯的文章（载《评论》1918 年 1 月 20 日）分别在《人民呼声》报和《前进报》撰文予以概述。——第 580 页
- 318 乔万尼·焦利蒂信仰自由主义，在大战前的 10 年执政期间，在意大利建立了较广泛的民主基础，实行普选，承认工会，不干预劳资冲突等等，主张发展意大利的经济，扩大公民生活。由于反对意大利介入战争，主张严守中立，焦利蒂退出政界直到大战结束时为止。1920 年焦利蒂重新上台执政，想要阻止民众和法西斯的前进，但没有成功。他并没有积极地反对法西斯，一直担任参议员直至去世。——第 581 页
- 319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德国社会党人，1880—1890 年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主编，1897—1898 年在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汇编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这些文章标志着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开端。伯恩斯坦曾多次当选为帝国议会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社会主义危机时期，他是十分活跃的和平主义者。
- 若尔日·索列尔（1847—1922），法国作家，“革命工团主义”理论家，主张必须准备好一批精选的无产阶级团体或精英以暴力摧毁资产阶级文明。他既接受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影响，又接受某种颓废的尼采主义影响，互相交织在一起。他本人对当时是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领袖的墨索里尼有影响。——第 582 页
- 320 为了充分理解本信及对柯罗齐的研究，请读者参看《历史唯物主义》卷，其中收录了《札记》中全部论述柯罗齐的文字。葛兰西所说的“理论修

- 正主义”指柯罗齐早就在自己的活动中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推导出强调历史中的经济学阶段的必要性，但又把“经济学”的含义解释得太广泛，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使用这个术语的原意，以致最终达到名副其实的“取消”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实际上，柯罗齐从经济—法律型的历史编纂学转向“伦理—政治”型。——第 583 页
- 321 指福洛普-米勒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与面貌》(维也纳,1926年)，柯罗齐于同年对该书作了评介，在意大利发表时书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面貌》。——第 584 页
- 322 这一段文字说明葛兰西的历史主义观，很重要。葛兰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绝对”的，因为它是综合的科学的——亦即摆脱了一切思辨思潮的痕迹。除了这些书信，葛兰西还同时在《札记》的一个章节里专门论述柯罗齐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难证明，柯罗齐始终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左右为难之感，今天更是空前地感到伤脑筋。在过去几年里，这种烦恼忽冷忽热地发作，关于这一点，只要研究一下他的《政治学原理》里的一些论述就足以证明。对于接连不断、永无休止的事件，必须从中确立一些概念，否则就无法理解现实(这是柯罗齐总的论点)，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同样必须记住，变动不居的现实和关于现实的概念即使在逻辑上可以区分，但必须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历史地加以表述。否则，就会象柯罗齐的著作那样，历史变成照套格式的历史，满篇概念的历史，知识分子的历史——实际上变成介绍柯罗齐本人思想的自传式历史。柯罗齐陷入了一种新的离奇的‘唯心主义’社会学，其荒唐和不得要领不亚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第 586 页
- 323 所谓王政复辟，是指紧接着波拿巴退位和维也纳会议(1815年)之后的时期。其目的是企图在奥地利霸权控制下重建法国的君主统治和保守政府。——第 586 页
- 324 乔万尼·金蒂雷，第 1 届墨索里尼政府(1922年)的教育大臣，他把在小学实施宗教教育作为他的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第 588 页
- 325 艾尔弗雷多·罗柯(1875—1935)，法学家，法西斯政客，1924—1925年任众议院议长，1925—1932年任司法大臣。在担任司法大臣期间，对刑法和刑事诉讼程序作了修改，实施一些明显地企图消灭一切自由痕迹(言论、表达和政治宣传自由)的法律。《政治》杂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意大利创刊的。——第 589 页
- 326 1876年右翼政府倒台后，左翼获得议会多数上台执政。这是由代表复

兴运动左翼(受马志尼并在某程度上也受加里波第影响的)各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逐渐与原来的右翼代表人物合流。这种从一个政治集团向另一个政治集团的转向(在本例中是从右向左转)被称为“演变”,并且同法国和英国的类似过程相吻合。“演变”是下列事实的结果:一些传统政党(例如19世纪意大利的右翼和左翼,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并不代表根本的阶级差别,而只是代表以同一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中心的不同社会阶层的集团,它们本身并没有各不相同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第 589 页

- 327** 葛兰西通过对柯罗齐在法西斯时期的“调停者”作用的批判,更明确地规定了群众政党的性质:要以工人阶级为核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避免发生演变;它的领袖们才能一方面避免宗派主义和一成不变,另一方面避免改良主义(准备随时被吸收而“演变过去”)。——第 589 页